

艾思奇讲稿选

上、下册合册

2023年10月文字精校第一版

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组

网络版(第一版)说明

《艾思奇讲稿选》是艾思奇 1953 年至 1965 年，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录音整理稿，是绝好的马列毛主义学习材料。此书由“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组”编辑整理，并于 1999 年 6 月，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在小范围内发行。

艾思奇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毛主席称他是学者、真诚的人，评价他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艾思奇对毛主席自身哲学的形成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Joshua A. Fogel 通过文献比对等研究，认为《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难以计数的相似之处”。可以这么说，艾思奇之于毛主席哲学，有日丹诺夫之于斯大林哲学的类似作用。毛主义哲学内核，和艾思奇的哲学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特别重视学习艾思奇的哲学理论。

就通俗易懂、深刻、全面来说，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一本超过此书。如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自己 1961 年编写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不及《艾思奇讲稿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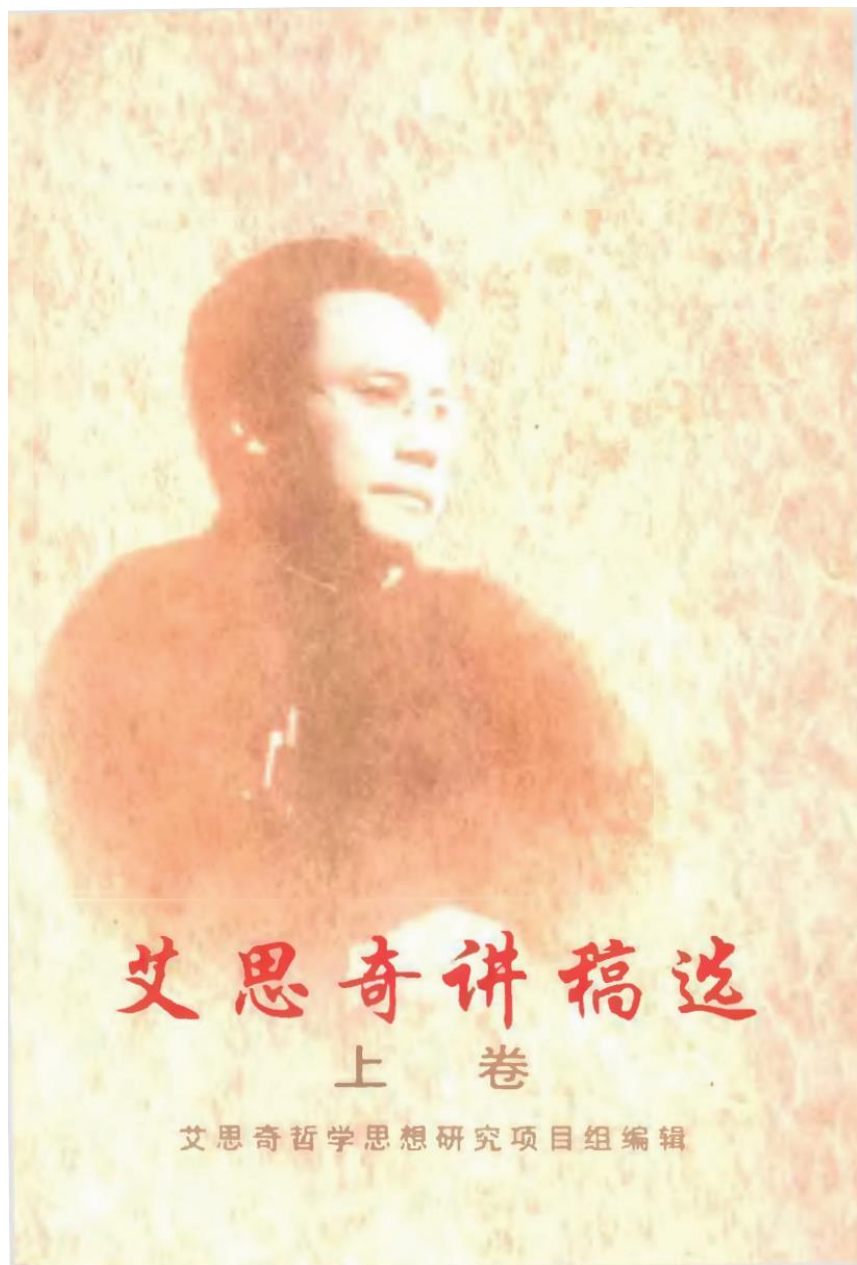
当然了，这本书不是严格按照教材体系编写的马哲教材，如果嫌弃它不够系统化，另有武汉大学 1972 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或者北京高校 1976 年编《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试用稿)》，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后，在这两套里面选一套读读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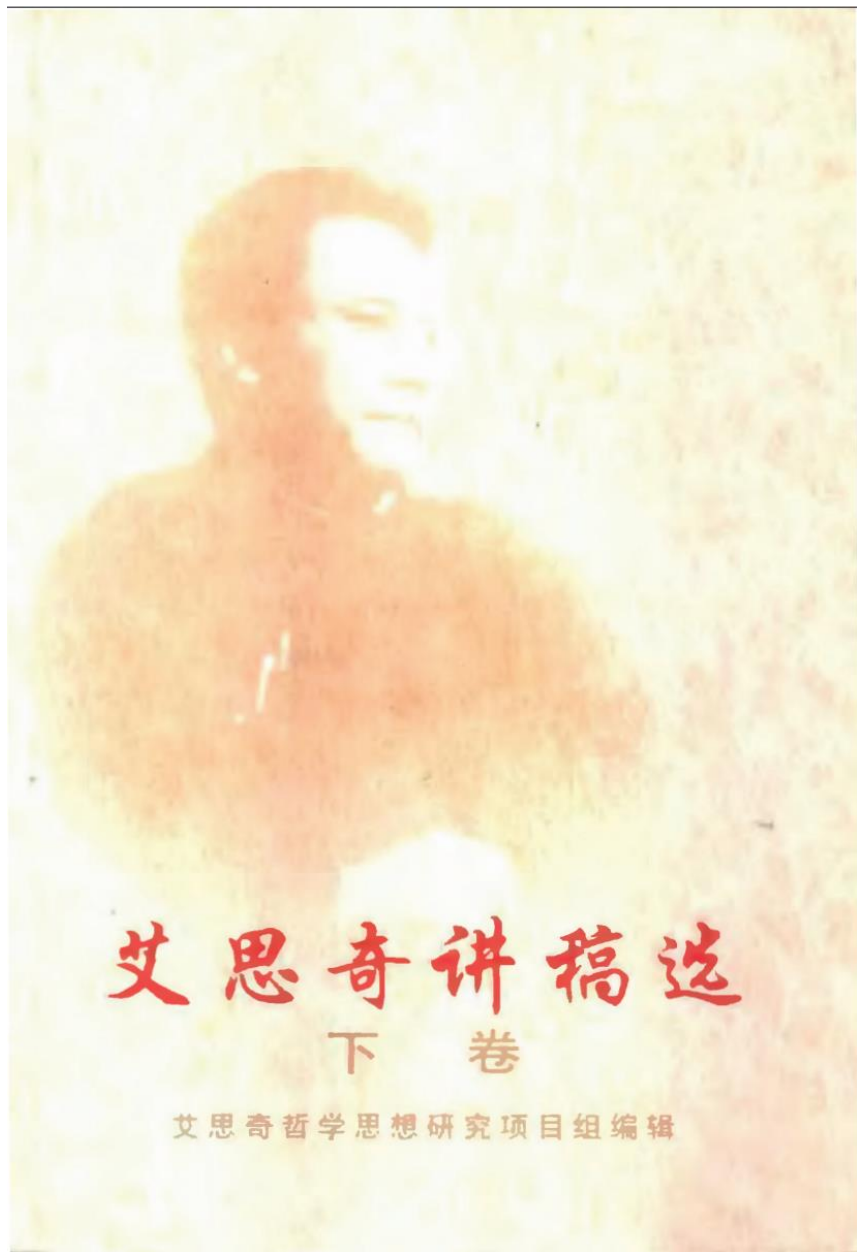
此电子书由原书转录而成，并根据《艾思奇全书》，增补了 23 章、28 章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布置”、“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这两篇极其重要的内容。

鉴于目前左翼思潮崛起，轰轰烈烈，急需优秀的马哲教材。但如此优秀的《艾思奇讲稿选》却没有的文字版电子书，非常不利于传播马列毛主义，因此我们整理了此电子版。后面我们会继续优化加工这本书，出新版本的电子版。

2023 年 10 月

原书封面





艾思奇讲稿选

下卷

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组编辑

编辑整理说明

《艾思奇讲稿选》，是一份珍贵的精神历史遗产。编辑整理印行这本集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这里所选的九十万字，是艾思奇在中央党校（及其前身马克思列宁学院）的讲课速记稿中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未公开发表过。

艾思奇从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大众哲学》以来，便是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这里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是艾思奇的智慧和学问的成果，是他的心血和精神的结晶。

这本“讲稿选”，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我们对讲课速记稿的整理，总的原则是：忠实原稿，尽力求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条做法：

- 1.对同样内容的讲稿，选择一、二个讲得比较好的；或者以一个为主，把另一个讲稿中不重复的有新意的内容，附在一个讲稿中相关问题之后，如《反杜林论》辅导稿整理就是如此。

- 2.相同内容的多次讲课稿，我们进行综合整理，如《矛盾论》辅导报告和《实践论》的辅导报告，就是把在中央党校、中国文联、解放军总参谋部、

高等军事学院、海军正师级以上青岛学习班等单位的讲课速记稿，综合整理而成。还有一些问题解答也是如此整理的。

3.对大多数讲稿，尽可能保留原貌，只作文字加工，只删去明显不适合的或有错误的地方。凡有删节的地方，我们在题注中简要说明。

艾思奇的讲课稿，因是讲课时的速记，经过速记员的整理，大致保留了讲课口语化的特点，好处是通俗易懂，便于理解，也较为生动活泼；但是，也有缺点，许多地方难免有所重复，显得文字不很精练，甚至记录和表述有不很准确之处。

我们编辑整理中深深感到，艾思奇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精通理论，知识广博，逻辑严密，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在讲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对经典著作所阐述的观点，能用自己融会贯通的理解、自己的朴实语言，深入浅出地作出解释和发挥；并且比较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甚至对世界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概括和说明。这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尤其是对我们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无论是在理论观点上，还是讲课方法上，都会得到莫大的启迪和教益。因此，艾思奇的讲稿和手稿，是很有价值的，是理论研究和教学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

这里搜集和整理的讲稿选，是从1953年至1965年十三年间的材料，时间已经过去三十至四十多年，历史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然而，艾思奇的讲稿，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这是因为他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乃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几千年哲学历史发展的概括，就其基本原理来说，就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陈旧的。当然，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艾思奇也一样，他所讲的内容，不能不反映当时的历史时代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也经过了严重曲折的历程。艾思奇经历了暴风骤雨、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也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时期（艾思奇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康生操纵的对他的批判和打击）；经历了1959年之后反右倾的错误过程；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阶段。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1957年

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艾思奇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便去世了，他没有经历这一段历史。但是在1965年以前一个时期里，艾思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自应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和方针、政策，因而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要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因而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都应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去了解的。艾思奇如果在讲课中有某些不当的地方，应当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我们认为，正像当年艾思奇在讲课中按照当时党中央所规定的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一样，现在则应当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艾思奇在讲课中经常讲，人类的认识和我们党的认识都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总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和标准。艾思奇的思想，他的理论观点，也是如此。尤其是内部讲课，是口述作品，对许多问题是探讨性的，是一个认识过程。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新的概括和总结，是当今时代理论的又一高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可喜的事情。我们应当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来研究艾思奇的讲课稿，以社会实践作为衡量其正确与否的标准，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加艾思奇讲课速记稿和手稿搜集和整理的有：王丹一、李昕东、卢国英、叶佐英、耿立、田夫、刘德庚、雍桂良等。还有许多专家、教授参加：自然辩证法部分讲课速记稿整理，是吴义生、钟洁林教授；辩证逻辑、形式逻辑讲课速记稿整理（形式逻辑在“讲稿选”中未收入），是刘健能教授；西洋哲学史讲课速记稿整理，是刘宏章、周桂莲教授；《反杜林论》辅导报告速记稿整理，是吴秉元、卢国英教授；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讲课速记稿整理，是耿立、卢国英教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辅导稿整理，是刘德庚教授；讲课速记稿中经典著作引文的校对，是雍桂良研究员，其余所有讲课速记稿和手稿整理以及最后统改、定稿，是卢国英教授。

我们要感谢中央党校教务部速记组的同志们，感谢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和办公厅档案室，他们为我们记录、保存和提供了讲课速记稿，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艾思奇讲过课的一些单位，提供了有关资料，感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朱满良、吕世诚、李少斌、张东岳、王颖、陈蓉蓉、娄彦红、王东方等同志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沈铁锦州印厂张立茜、李相如、李光及印厂工人同志们的支持和劳动，感谢所有为这本“讲稿选”编成贡献了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和同志们。

艾思奇在中央党校讲稿选的搜集、编辑、整理，前后经过了近二十年，任务颇为艰巨，涉及的问题复杂，编辑整理工作繁重，我们全是业余进行的义务劳动，且水平有限，因此，编辑整理中缺点错误难免，恳望艾思奇生前的领导、战友、学生，恳望广大读者，多加支持，并望多提宝贵意见。

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组

执笔人：卢国英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草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修改

目 录

网络版(第一版)说明.....	i
原书封面.....	ii
编辑整理说明.....	iv
目 录.....	viii
第 01 章 西洋哲学史 (1953.09).....	1
1. 怎样学习西洋哲学史.....	1
(1) 学习西洋哲学史总的方法.....	1
(2) 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	3
(3) 哲学史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	6
2. 古代哲学.....	8
(1) 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朴素唯物辩证法.....	8
(2) 古代奴隶主阶级的唯心论.....	12
(3) 古代唯物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4
(4) 唯心论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18
(5) 二元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22
(6) 伊壁鸠鲁的哲学.....	25
3. 中世纪经院哲学.....	27
4. 十七、十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	28
(1) 英国经验派中的唯物论-培根、霍布斯.....	28
(2) 英国经验派中的唯心论-洛克、巴克莱、休谟.....	32
(3) 大陆理性派哲学-笛卡尔.....	36
(4) 大陆理性派哲学-斯宾诺莎.....	38
(5) 大陆理性派哲学-莱布尼兹.....	40
5.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	41
6. 德国古典哲学.....	44
(1) 德国古典哲学-康德.....	44
(2) 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谢林、黑格尔.....	46
第 02 章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报告 (1954.09.21).....	48

1.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49
2.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就是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力求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和观点研究理论、领会政策和处理工作.....	60
3.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目的.....	64
第 03 章 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1954.10.25).....	67
1.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67
2.反对历史的唯心论.....	68
3.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76
4.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	79
5.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80
第 04 章 辩证法问题解答 (1954.11.05).....	85
01.关于全面理解一切依地点、时间、条件为转移的问题.....	85
02.关于认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	88
03.关于理解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的问题.....	90
04.关于理解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问题.....	92
05.关于理解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	100
06.关于理解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101
07.关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是不是由于我们路线错误的问题.....	102
08.关于现象和本质怎么样区别的问题.....	103
09.关于过渡时期是不是质变时期的问题.....	103
10.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是科学预见的基础的问题.....	104
11.关于理解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问题.....	105
12.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否相当于全部性和局部性的问题.....	106
13.关于究竟是主要矛盾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的问题.....	106
14.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区别只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的问题.....	108
15.关于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	108
16.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和处理方法的对抗与	

非对抗的问题.....	109
第 05 章 生产发展的规律性 (1956.09).....	110
1.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	110
(1)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	110
(2)生产、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118
2.生产的第一个特征: 生产的变化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128
3.生产的第二个特征: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134
4.生产的第三个特征: 社会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到自觉的变革的过程	158
第 06 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956.09).....	164
1.社会的经济基础, 生产关系的总和.....	164
2.社会的上层建筑.....	176
3.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内)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200
第 07 章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1956.11.24).....	204
1.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204
2.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207
3.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214
第 08 章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1959.12.01、1964.06.15).....	221
1.辩证法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	221
2.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问题	224
3.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问题.....	229
4.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230
第 09 章 辩证逻辑 (1960.07.13).....	239
1.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240
2.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	241
3.辩证逻辑的概念.....	247
4.辩证逻辑的判断.....	254
5.辩证逻辑的推理.....	258
第 10 章 党史引言报告 (1960).....	261
1.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问题	261
2.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	266
3.坚持彻底的辩证法的问题	274

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280
第 11 章 社会发展史引言 (1961.11.16)	287
1. 前言	287
2. 从猿到人	291
3. 原始公社	294
4. 奴隶社会	299
5. 封建社会	305
6. 资本主义社会	314
第 12 章 历史唯物主义引言 (1962.03)	316
第一部分, 怎样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316
1.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	316
2. 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问题	318
第二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321
1.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322
2. 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规律问题	334
3.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343
第 13 章 关于“五九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总结 (1962.04)	346
01.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	346
02.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中心问题	348
03. 关于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问题	352
04. 关于革命和建设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	353
05. 关于先集体化后机械化问题	355
06. 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问题	355
07.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359
08. 关于经济基础是否包括生产力的问题	362
09. 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	363
10. 关于政治组织、政治运动、政治制度是不是社会存在的问题	366
11. 关于上层建筑的零碎问题	367
12. 关于客观规律是否有发展的问题	368
13. 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问题	369
14. 关于飞跃过程中有没有量的积累问题	369
15. 关于生产力的性质应该怎么了解的问题	369

16.关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	370
第 14 章 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 (1963.06.10)...	371
1.正确解决了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371
2.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	374
3.明确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375
第 15 章 简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认识论学说的新发展 (1963.07.15).....	379
1.发挥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379
2.揭示了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的规律.....	380
3.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正确认识的获得也是反复实践的过程	383
4.提出了把正确认识交给广大群众的问题	384
第 16 章 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来 (1963.07.15).....	387
1.斯大林哲学著作的优点.....	387
2.对斯大林哲学著作的批评不能无的放矢	388
3.斯大林哲学思想的缺点和错误.....	390
4.公平地评价斯大林哲学思想.....	390
第 17 章 略谈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贡献(1964.06.15)	392
1.发挥了事物多方面的量和质的原理.....	392
2.提出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394
3.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	395
4.把量变质变规律具体化为工作方法原则	398
第 18 章 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1963.06).....	400
1.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发展.....	400
2.辩证法三个规律的关系.....	403
3.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404
4.哲学范畴和辩证法核心的关系.....	408
5.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	410
第 19 章 《反杜林论》辅导报告 (1964.01).....	414
1.《反杜林论》哲学篇的结构.....	415
2.学习《反杜林论》的意义	425
3.辩证法的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的讲解.....	432
4.《反杜林论》中若干问题的解答	491

第 20 章 关于《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讲解 (1964.3) .. 500	
1.关于辩证法问题.....	500
2.关于辩证逻辑问题.....	519
3.关于认识论问题.....	535
第 21 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1964.03) 555	
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意义和结构	555
2.第一封信(马克思给安能科夫)逐段讲解.....	560
3.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讲解.....	582
4.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给史密特)重点讲解.....	604
5.第十七封信、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讲解.....	620
第 22 章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1964.04)	627
1.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628
2.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所提出来的任务	640
3.《实践论》的作用和意义	651
4.《矛盾论》的作用和意义	661
第 23 章 关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布置 (1964.05).....	676
1.关于学习的程序.....	676
2.关于学习的书目	678
3.关于学习的方法.....	685
4.关于学习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690
第 24 章 世界观问题 (1964.05).....	694
1.绪论—学习毛主席的世界观.....	694
2.《实践论》—学习毛主席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	704
3.《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	742
第 25 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 (1964.07).....	757
1.关于读这本书的方法问题	757
2.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760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776
4.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782
5.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793
6.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	797

第 26 章 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 (1964、1965).....	804
1. 两条认识路线.....	804
2. 认识依赖于实践.....	807
3. 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814
4. 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826
第 27 章 学习《矛盾论》辅导报告 (1964、1965).....	834
1.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834
2.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838
3.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843
4.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848
第 28 章 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 (1965.05).....	854
1. 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决不是“合二而一”的.....	855
2. 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的，而不是“合二而一”的	859
3. 不能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因素.....	863
第 29 章 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谈话 (1965.11).....	866
1. 关于矛盾、差异、对立的关系问题.....	866
2. 关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868
3. 关于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问题.....	868
4. 关于认识的辩证法问题.....	869
第 30 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讲学提纲)(1965 春、 秋).....	870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三个五十年.....	870
2.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阶段的特点.....	873
3.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	878
第 31 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讲学提纲) (1965 春、秋).....	882
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	882
2. 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	885
3. 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889
第 32 章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讲学提纲)(1965 春、秋).....	893
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894

2.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897
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898

第 01 章 西洋哲学史

(1953.09)

【注：1953年9月，艾思奇应学员的请求，按照哲学教学计划，为马列学院七、八、九班讲授了西洋哲学史，据我们所知，艾思奇讲哲学史只讲过这一次，在其他班次均未讲过。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引文核对，几乎没有什么删节，没有增添任何内容。】

（一九五三年九月）

今天讲哲学史。我们原准备讲一次，有些同志希望多讲一点，现在准备讲三次，内容多一些，但再不能多讲了，因为我们学习哲学史不是主课，讲多了反而不好。哲学史上人名、地名非常多，很容易忘记，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正式的参考书，眼前所有的书，一般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旧书。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书，有一本苏联的《西洋哲学史简编》，以前还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后来苏联专家说，这本书也不好，所以就不指定参考书了。我今天讲了以后，希望大家提出一些意见。

1. 怎样学习西洋哲学史

(1) 学习西洋哲学史总的方法

我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洋哲学发展史，附带涉及到一些中国哲学问题。原因就是西洋哲学史现在对我们有用处，对我们的实际意义比较大一点。

有人说，中国人要学中国哲学史，这个道理一般是对的，但也要看具体情况，就是今天我们的学习更需要哪一样知识。今天，我们的学习要看一些马、恩、列、斯的书，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多半都是西洋的，因此，为了帮助大家学习经典著作，现在讲一讲西洋哲学史比较好，对我们帮助比较大。有许多在马、恩、列、斯著作中提到的问题，人名、学派，我们过去不了解，学一点西洋哲学史，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我们今天学西洋哲学史，并不是像一些人“言必称希腊”，还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学习上的问题。

其次，关于中国哲学史，我也没系统地研究过，我也不能多讲。中国哲学史本来也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就是有研究的人，也是有很多问题讲不清楚，因此就不容易讲。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只是简单地提一提中国哲学史。

我们讲哲学史，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讲西洋哲学史是为了了解哲学史的规律是怎样的；第二，是要加深我们哲学党性的观念。关于哲学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他讲的很清楚。他说，**哲学史是科学唯物论及其规律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唯物论是与唯心论进行斗争的历史**。不管是西方，或者是中国，哲学史发展总的规律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讲西洋哲学史，**先把哲学史总的规律指出来**，使得大家首先有一个总的印象。我讲下去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我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讲唯物论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唯物论怎样与唯心论进行斗争中发展的。关于总的规律的问题，大家除了参考日丹诺夫的文章以外，还可以参考《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关于党性的那一部分。列宁指出，两千年中，在哲学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是不会陈腐的。我们学习西洋哲学史，就需要了解这一点。

所谓科学的唯物论，就是唯物论的基础是科学的，唯物论是跟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唯物论的内容就更丰富，它的质量也就愈提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上每一种新的发现，都使得唯物论达到一个新的面貌。自然科学每提高一步，唯物论也就提高一步，从哲学史中也可以看出来，唯物论所以能够发展，就是由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成就证明唯物论是正确的，并且丰富了唯物论的内容，使唯物论更站得住脚，使唯物论更能够有力量克服唯心论。所以，要了解唯物论发展的历史，同时也要注意科学发展的历史。整个唯物论的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历史关系，应当有一个了解。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联系。

最初的唯物论与科学是没有多大分别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最早的哲学家与科学家是没有分工的，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后来科学发展了，科学与哲学就分开了，哲学成了一种专门独立的学问。现在辩证唯物论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与其他的科学有一点不同，就是辩证唯物论是各种科学的总结。辩证唯物论本身是一种科学，从前它不成为科学，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就不成为科学。为什么不成为科学呢？因为它与别的科学混淆起来了，有许多科学问

题直接由哲学来提出解决，比如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应该由经济学来研究，要是用哲学来讲经济学，那是不大好讲的，是有困难的。但是，以前的哲学家，就喜欢根据几个简单的哲学公式，用一些主观的道理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世界怎样发展的，自然界怎样发展的，应该是由自然科学来说明，地球怎样形成的，应该是由天文学来说明。可是从前的哲学家，他就直接用哲学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有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等等说法。用一些哲学的公式来说明世界上的具体问题，这样说明就没有什么结果，或者有结果，但是错误的。从前的哲学就是这样，与其它混淆在一起，也就使哲学不成为科学了，因为它的内容常常是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就是真正的科学唯物论。这个哲学，照日丹诺夫的说法，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学哲学，就是学思想方法。**我们掌握了这种思想方法，就能够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史，要注意一点。就整个哲学史的发展。最初唯物论还不是科学的，一直到最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才真正是完全的、科学的哲学。这种科学的哲学，它的特点，就是能够给予我们一套科学思维的方法，从前的哲学，是直接说明科学上的具体问题，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从前根本不同，就是要研究一套科学思维方法。

哲学史，就是这种科学的唯物论如何发生、发展起来的历史、如何经过几千年的发生发展，最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2)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

唯物论哲学的发展，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一种斗争，为什么说哲学的发展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呢？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哲学不仅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总结，不仅是自然科学和各种科学的总结，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斗争的总结，它包括阶级斗争。所以，哲学不仅仅是对自然斗争的总结，而且是阶级斗争的总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这一个时代社会的阶级斗争总结。**哲学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原始社会里没有哲学，最初的哲学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原始社会里只有一种原始的宗教。因为当时生产力低，文化低，不可能根据科学来解释世界，而是根据一种宗教的，迷信的形式来解释世界。所以，原始社会里没有哲学，而是在奴隶社会，**有了阶级斗争之后，才有了哲学。**西方哲学开始于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开始有哲学是周朝，如果周朝已经是封建社会，那么中国哲学是在封建社会

开始的。究竟周朝是不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现在还没有肯定下来，但西方哲学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这是肯定的。

哲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的世界观，是人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对世界都有自己的一种看法，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世界观。**唯物论的世界观，一般地来讲，都是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唯物论的世界观，是为进步的阶级服务的。**唯物论哲学家的出身是另外一件事，他可能是在反动的家庭里出身的，但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他的哲学就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哲学史上有很多哲学家，他们的出身是反动统治阶级，但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因此他的学说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具体地讲。

唯心论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为少数阶级服务的。阶级斗争在各个时代虽有不同，但总不外是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唯心论来为自己服务，革命阶级一般都是用唯物论来为自己服务。

因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世界观，所以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时候，也就一定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我们的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哲学上也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不但在党外反对，而且在我们党内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盲目冒进等等，这都是唯心论的影响，这就是唯心论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党内的思想斗争问题，也应该看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特别在今天，中央早已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周围是小资产阶级，当时在党内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当革命胜利后，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因此党内发生矛盾，也要看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在世界观方面，在党外要公开地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像有些大学教授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就要给以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也有很大的害处，如在工作中的盲目冒进，冒险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也要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所以，**有阶级的地方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哲学史为什么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呢？因为**哲学史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人类世界观上的反映。**在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有阶级斗争，在世界观方面也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因为不同的阶级，它要利用不同的世界观来作为自己思想的武器。所以，我们今天研究

哲学史，就要注意到哲学史也是在世界观上的一种阶级斗争反映。这种反映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就说明哲学上的党性，哲学的党性就是它的阶级性，就是反映了阶级斗争，一定的阶级都是站在一定哲学方面的。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唯物论，主要就是能够了解到唯物论如何为进步阶级服务，唯心论如何为反动阶级服务。因此也就应该了解到，我们要坚决反对唯心论，对唯心论绝不能采取任何调和态度，不能够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而要把它看成是一种阶级、党派的武器。如果什么地方出现了唯心论，就要注意这是反动统治阶级武器。我们工作中发现了主观主义，也不要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普通的错误，而要看成主观主义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尽管犯错误的人，他自己是革命内部的人，但只要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了。我们研究哲学史，目的就是要加深我们哲学党性的观念，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唯心论怎样有害，它怎样为反动阶级服务。从而也就使我们了解到坚持唯物论是很重要的。

研究哲学史要了解唯物论是进步的，唯心论是反动的。了解了这个原则以后，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过去的唯物论加以区别。过去的唯物论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是进步的，这是共同的，以前的唯物论，一般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但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有所区别，不要以为过去的唯物论是进步的，在今天还是好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以前的唯物论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过去的唯物论不是辩证的。它只能形而上学地解释世界，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说明一下，它不能够给予我们一套很有力的方法，帮助我们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过去的唯物论没有这个力量。因此，它本身不能够成为科学的方法。

第二点，过去的唯物论是少数人的哲学。过去的唯物论本来还是少数哲学家创造的一种思想体系，与广大的人民没有关系，不关心广大人民，同时也不向广大人民作宣传。它只是关心某一个进步阶级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带有人民的性质，它关心人民的问题，同时也向广大人民作宣传，不但在我们学校里面学习唯物论，在任何地方都要宣传唯物论，因为学好唯物论可以把工作做好，可以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学西洋哲学史需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3) 哲学史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

一方面，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哲学史也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研究哲学史也就是研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何发生与发展的。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一般认为，整个哲学史上人类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朴素的辩证法的时期，也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开始被人类所认识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相当于古代的时期。当时许多哲学家开始认识了辩证法，但是认识很模糊，只是认识一个轮廓，具体内容还搞不清楚，只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着的，甚至于了解到矛盾，但是就是不了解什么东西在矛盾，或者他自己以为搞清楚了，但实际上是错误的。朴素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模糊的，我们以后讲的时候就可以搞清楚。

这个时期为什么对辩证法认识不清楚呢？为什么说是朴素的呢？就是因为自然科学和哲学混淆在一起了，不像现在有物理学、化学以及其他科学等等。古代的哲学家他就研究自然界的学问，里面也包括哲学，理论科学是不完整的，对社会的认识当然更粗糙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多多少少有一些进步的科学，对社会的认识就更缺乏了。因此，古代的人，对世界各个部门具体的规定不能搞清楚。当时绝不能够像现在我们对自然界搞的那样清楚，如有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古代科学不发展，对世界的具体内容了解的不清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认识上的模糊。眼睛一看，整个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但变化的具体内容搞不清楚，这就是古代的朴素辩证法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时辩证法不能成为科学的方法，只是对世界的一种估计，一种比较粗糙的方法，大体上猜测世界是在变化着的。这就是哲学史上人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经过了一个朴素辩证法时期，以后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十七、八世纪哲学。

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是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支配的。整个十七、八世纪的哲学，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就是把世界上的东西看成是孤立的、不会变化的，不能够从矛盾中去看世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期呢？为什么人类的思想方法发展到十七、八世纪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呢？就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有了初步的发展，

不是很高的发展，我们说它不是很高的发展，因为它只是在某些简单的部门完成了比较科学的系统。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主要是数学、力学。这个时期研究社会，研究自然，开始注意研究世界各个部门的具体规律。古代的哲学家只看到了世界的一个简单轮廓，而对具体内容的研究没有做到。在**形而上学**时期，有些科学家就具体的研究了自然界的各个学科，把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分裂出来，**单独**地来研究，譬如把数学离开其他方面单独地来研究，把力学拿出来单独地来研究，**这种单独研究各别部门的现象，这种研究的方法，就养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习惯于部分的研究问题，不与各方面联系起来研究，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当作是不会变化的。在科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对这种情况也不了解，因为科学研究就是分门别类地去研究，因为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就养成了**形而上学的、孤立地研究问题的习惯，养成了片面看问题的习惯。**所以，在哲学上就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时期。

这个时期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我们在十七、八世纪还是封建社会，自然科学还没有发展，还没有这种哲学。中国的哲学可以说是在“五四”以前，辛亥革命时期，基本上是停留在古代状态，基本上没有超出朴素辩证法时代。

第三个时期，就是进入了更高的时期，也就是**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时期。

我们讲西洋哲学史，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讲。一个是古代哲学，就是朴素的辩证法时期，一个是十七、八世纪的哲学主要是形而上学时期的哲学。讲古代哲学，主要就是讲辩证法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不讲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基本上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产生，所以我们不讲了。最后一个问题也不需要多讲。大体上就分这样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西洋哲学史发展的历史过程。**

关于中国的哲学，大体上从“戊戌政变”起，一直到“五四”止，自然科学已被中国人民所注意了，这个时期可以勉强相当于形而上学时期。在“五四”以前，有一些人是把机械唯物论搬到了中国来，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把形而上学搬到中国来了，吴稚晖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在西洋，十七、八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哲学上是形而上学发展时期。在中国，我们很多人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了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所以，不能够把我们中国与西方简单地加以类比，因为中国形而上学不完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行，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这个根底，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西洋哲学史，在十七、八世纪中，有很突出的进步，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中心问题。

2.古代哲学

(1)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朴素唯物辩证法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古代哲学。

古代哲学是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更清楚一点说，就是**奴隶主的哲学**。在奴隶社会，奴隶所处的悲惨地位，是不能够在自己的阶级里产生哲学的，有个别的哲学家反对奴隶制度，同情奴隶，这些是有的，但真正的奴隶哲学是没有的。奴隶只有他自己的宗教，在暴动的时候，代表他的思想，奴隶要自由，要回到原始公社去，但系统的哲学思想是没有的。那个时候系统的哲学是奴隶主阶级不同派别的思想、是进步的奴隶主阶级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有些哲学代表反动的奴隶主阶级。

希腊奴隶社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按照阶级的划分来看，希腊奴隶社会首先是分为**奴隶和自由民**两个阶级，凡是不叫奴隶的就是自由民。自由民里面又有阶级，有**富的自由民和穷的自由民**。富的自由民就是真正的奴隶主，他们是使用奴隶的；穷的自由民就不一定是奴隶主，他们有许多是从事手工业，但他们也不是奴隶，身分是自由的，他们也使用不起奴隶。富的自由民与穷的自由民之间有斗争。奴隶主主要压迫奴隶，同时也压迫穷的自由民。富有的自由民就是当时希腊的统治阶级。

但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中间，又有不同的集团：

首先是**贵族的奴隶主集团**，他们是接近原始公社没落的时候发生的。他们在原始公社里面地位就很高，当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他们就变成奴隶主。他们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大批的土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怎样掌握了土地呢？原始公社土地是公有的，但原始公社垮台以后，有些酋长富起来了，一般社员贫穷了，他们要向这些酋长借债，以后还不起，就把自己的土地让给人家，本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就这样逐渐地把氏族成员变为自己的奴隶。这就是希腊社会最初产生的奴隶主，也是带有反动性质的奴隶主，**主张专制制度的奴隶主**。

后来，希腊社会里又产生了第二个奴隶主的集团。这个集团是**工商业奴隶主集团**，他们的财产主要不是土地，他们主要是做生意，最初是从事商业，发财以后，又组织了一些奴隶从事工业（手工业），通过工商业发财了，这些

奴隶主是后来出现的。他们与贵族奴隶主有矛盾。贵族奴隶主用特权来限制工商业奴隶主的发展，不让工商业奴隶主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工商业奴隶主就起来反对贵族**，他们反对贵族奴隶主的时候，是利用受贵族压迫的自由民。他向奴隶们号召，反对奴隶主，收回土地，反对奴隶制度，这样，他们就有了群众，工商业奴隶主把贵族奴隶主打倒以后，他们就变成统治者，建立了一种**民主制度**。为什么他们搞民主制度呢，因为他们原来依靠受压迫的自由民得到了胜利，所以他们不能够不用民主制度来团结一部分自由民，希腊奴隶社会就是这样曾经出现过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制度**，当时也有议会，参加议会的主要是奴隶主，有一小部分是自由民，所以民主制度主要是有限的民主，时间也不长，以后**贵族奴隶主又起来复辟**。希腊的奴隶社会大体上就是这样。这就是希腊产生哲学的背景，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就可以了解哲学的派别。

最初的唯物论哲学，叫米利都学派。时间大致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米利都是在希腊以外的地方，大约是在巴勒斯坦，叙利亚这些地方，它是希腊做生意的地方，当时希腊还是贵族奴隶主统治，因为工商业已经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主集中在这一带，因此也就产生了唯物论的哲学，最早的哲学就是唯物论。

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一开始也是唯物论，当然中国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有人说，老子^①的思想就是最早的唯物论思想。他是孔子^②的老师，孔子还拜访他。

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

① 注：老子的辩证法，含有唯物辩证法的成分，也含有唯心辩证法的成分。

② 注：孔子的儒家思想，最初是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宣扬的是套奴役人民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服务。封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地主阶级改造和加以利用，成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官方的主流哲学。辛亥革命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思想也随之被打倒，但是不久后，袁世凯、蒋介石等反革命势力，又相继捧起儒家的臭脚，企图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内走资派和一切资本主义反动势力，都公开或者隐蔽地宣扬孔子的儒家思想，直至如今。改革开放后的修正主义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公然在2013年亲自主持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创办国际孔子文化节，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在世界各国创办数量高达550所的“孔子学院”。复辟党的修正主义者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利用各种机会，宣言儒家奴隶哲学，企图麻痹人民的思想奴役人民，阻止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一句话，孔子的儒家思想，始终是代表剥削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哲学，为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服务。

第一个人，就是**泰利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也是一个大商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最有科学知识的人。他的科学知识高深到什么程度呢？在当时（二千五百年以前），他就能预见日蚀，能够提出某月某天某时，太阳要被月亮遮住，而且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思想大体上是这样的，在哲学上主张世界万物的根源是水，一切都是从水产生的。他这个主张，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荒谬的，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因为他这个思想，跟宗教的世界观表现了尖锐的对立，宗教世界观的根源是神，而泰利斯认为世界是水，这就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当然他认识上还是模糊的，可是在当时来说是唯物的，革命的，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因为他把水看成是能变为一切，把世界看成是变化的。

第二个人，就是**阿那克西曼德**。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与泰利斯是一样的，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分歧。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根源不是水，他认为世界的根源是一种无定型的物质，由这种无定型的物质，变为世界上的一切。无定型变为有定型的世界万物。为什么无定型的物质会变为世界万物呢？他认为无定型的物质里面产生一种冷与热的矛盾，有一部分冷了，有一部分热了，这样就出现了空气、水、土。世界的矛盾就是冷热的矛盾。这就是他的认识。

第三个人，**阿那克西米尼**。这个人又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根源是气。他为什么这样主张呢？因为他反对阿那克西曼德的说法，他说无定型的東西太抽象了，这种说法不能使人信服，所以，他讲的比较具体一点，他说气虽然也是无定型的，可是气能够说明问题。

以上这几个哲学家，就是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是大同小异，性质是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的因素。他们反对原始宗教，阿那克西米尼认为空气是万物的根源，因此他认为神也是空气变成的，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他是用唯物论来解释它，因此也就反对了有神论。

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反对贵族奴隶主的，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国家应该有议会，由多数人来发表意见。这就是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派。

除了米利都派以外，在希腊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个朴素辩证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列宁、斯大林的书上引过他的名字，这个人可以说是希腊最大的辩证法哲学家，他的出身是贵族，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拥护贵族的，他自己就是被工商业奴隶主打倒了的，他失掉了特权。他认为世界的一切是变化的，他就根据这个道理创造了一套辩证法。所以他的思想与他的政治立场是矛盾

的，实际上他的哲学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他的出身和他的政治立场与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的哲学与民主派是一致的，与贵族派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后来贵族的哲学家就起来反对他。在他的哲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话，他把辩证法公式化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曾经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万物统一的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人所创造的。”他认为世界永远是活生生的火，是有规律地燃烧着、有规律地熄灭。这些话除了火是荒谬的以外，其他都是很好的辩证法思想，承认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人创造的，它本身就是统一，它永远是按着规律燃烧，按着规律熄灭，列宁对这样的话很赞成。他还有一些有名的话，如“一切皆流，一切皆变”。这样的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古代来讲，这是第一次提出的。他为了说明一切都是变化与流动的原理，他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第二次走的时候，河里的水已经流过去了。我们平常过黄河，总认为黄河的水是一样的，其实今年的黄河水与去年的黄河水已经不同了，因为黄河里的水永远流着的。他还有一个学生，把这句话讲的更清楚了，他说：人不能一次走到同一条河里去，因为你在河里走的时候，水已经流过去了。这种说法是太极端了。赫拉克利特对矛盾也是很看重的，认为矛盾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他也有一些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是活的，同时也是死的，我们是强壮的，同时又是衰老的。这个道理有点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讲的，恩格斯说生与死分不开的，生的过程同时也是死的过程。因为生命有细胞，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无时不在毁灭着，又在不断生长着。他强调对立是发展的原因，不仅提出对立，而且提出斗争是发展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也有一句话，他说：万物都是经过斗争产生的。他把战争的意义看得很重要，斗争最高的表现就是战争，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因为战争使某人变成神，使另一个人变成人，它使某个人成为奴隶，又使另个人成为自由民。这些话都是很好的，说明了他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些就是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最精彩的表现。这些话在今天的许多著作里还常常碰到。

我们中国的古代哲学，老子的哲学，可以说辩证法是最多的，他也主张一切都是变化的。他有这样的话：“动而愈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愈动愈产生新的东西。老子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自然”、“变化”的思想上，这是中国唯物论的名词。老子认为一切东西都是自然的，他有这样的话，“道法自然”。所谓道，就是规律的意思，这就说明自然的发展规律是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就是物质本身的规律。“无为”就不是神与人创造了自然。老子的哲学也

非常重视矛盾的重要性，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反者道之动”这就是说反面的东西是推动规律发展的一种动力，反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发展。

在外国的哲学里面，古代辩证法思想最多的就是赫拉克利特，在中国就是老子了，因为他们规定了很多原则与公式，这些都是很对的。尽管他们有些原则规定的很好，但一些具体内容还是模糊的，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火在变，所以他的唯物论还是朴素的。

以上所讲的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人物，这一些思想的发生，并不是和平发生的，是与宗教唯心论进行斗争发生的。

(2)古代奴隶主阶级的唯心论

社会上发生了唯物论以后，跟着唯心论就来了。进步阶级打着唯物论的旗帜，反动阶级则是与之相对的唯心论。唯物论在希腊产生不久，就产生了唯心论的派别。

最初唯心论派的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虽然他们时间上比较晚，但他是反对唯物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什么派别呢？毕达哥拉斯是一个贵族集团的领袖，他在意大利曾经组织过“毕达哥拉斯联盟”，他有很多学生，这一学派是与宗教相结合的。这个联盟的人都参加过宗教，都要敬神。他的哲学是为宗教服务的，在政治上是为贵族服务的。

这一学派的特点，主张把抽象的数目当成世界的本源，认为世界的起源不是物质，他是历史上第一次用抽象原则来说明世界，他把精神摆在第一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数学观念创造的。他用一些牵强附会的办法，认为一、二、三、四这四个数目是最重要的数目，同时认为世界万物都是这四个数目创造的，也就是认为一、二、三、四是世界的根源。他怎样来讲这个道理呢？他说世界上的万物无非就是点、线、面、体的组成。譬如这一根粉笔，就是一条线，板子就是面，人体就是体。一切东西不超出点、线、面、体的范围。世界上的一切万物就是点、线、面、体的联系，随便找一些东西，不是点，就是线，或者是面或体，点、线、面、体，就是由一、二、三、四来决定的。因此一切都是一、二、三、四创造的。他把任何东西都抽象化了，是最明显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古代的人看起来还很相信。这个学派因为要与唯物论作斗争。它也研究了一些学问，它集中地研究了数学，所以它也不是对科学一点贡献没有。我们现在学的数学，有一些定理还是毕达哥拉斯发明的。大家都知道，直角三角形，有勾、股、弦，

勾的平方加股的平方，恰恰等于弦的平方，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定理。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它总是要利用一个武器。所以列宁反对的马赫经验批判论，它也是利用了自然科学，不然它就站不住脚。马赫本人是物理学家，他的物理学著作，是很有价值的，这一部分很有创造，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很有成就。但是马赫主义就利用了这一点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和唯心论作斗争的时候，不能够太轻视它，因为唯心论还有一些科学的东西，我们就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如果这样，那我们就会吃亏，承认它科学的一方面，就要证明它对科学的曲解。譬如对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承认他有一些贡献，并不等于高抬他，相反地更证明他的哲学是唯心论的。承认马赫对物理学有研究，正说明他的哲学与科学是矛盾的。任何一种唯心论，差不多都要利用当时科学上的成就。否则就站不住脚。

现在再讲一讲**爱利亚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有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后面两个人原来是“毕达哥拉斯联盟”的参加者，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拥护贵族反对民主的**，特别是芝诺曾经组织过反对民主制度的暴动，后来被判处了死刑。

这一些在政治上是反动派，在哲学上也发展了唯心论的理论，他们的思想是怎样的呢？

第一个人，**色诺芬尼**。他的著作留下来的太少，他认为世界就是神，神是唯一的，是不动不变的，他这个思想叫“泛神论”，不是认为神在世界以外，世界本身就是神，而且是永久不变的，这就是否认变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第二个人，**巴门尼德**。也有一套理论证明世界是不变的。这一套理论也很特别，就是一套在文字上钻牛角尖的怪论。他怎样证明世界是不变的呢？他用一个概念来说明，用“存在”或者叫“有”来兜圈子。他说世界就是“存在”，既然承认存在，就要承认它是不变的，而且是唯一的，是不可分的。我们既然承认它是存在，就不能又说它不存在。因此存在是唯一的，除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绝不会变为非存在，如果不是这样，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他就是在这样的空洞概念里兜圈子。

第三个人，**芝诺**。他进一步证明世界不变的道理，他有许多有名的辩论，他的辩论就是反驳运动的思想。比如说“飞矢不动”，先假定有运动，后证明这个运动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这个箭从这个地方射到另外一个地方，任何一瞬间箭都是停留在每一点上，无数瞬间的总和证明这个箭还是没有动。这就是希腊唯心论者反驳运动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是怎样产生的呢？他想要

指出运动是矛盾的，因此他就不承认运动，这就是形而上学形态的一种逻辑。他这个辩论在哲学史上是很有名的，后来讲辩证法的人反对他，认为运动能够成立，运动就是矛盾，所以，矛盾是事实，矛盾能够成立。运动是什么呢？就是箭从这里到那里，在每一点上停留，同时又不停留。恩格斯讲运动就是矛盾，斯大林引过恩格斯运动就是矛盾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运动在某一点停留，同时又不在于某一点上停留，运动是事实，所以矛盾也就是事实。

以上所讲的爱利亚学派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用一些钻牛角尖的道理说明问题，企图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证明世界的变化是假的，使贵族奴隶主成为世界上永久的统治者。这就是唯心论学派的政治企图。

这是最早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倾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唯心论的体系。

以上所讲的，就是希腊最初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哲学斗争。

(3)古代唯物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上次所讲的，可以说是古代时期最早的哲学。这个时候辩证唯物论思想开始出现了，同时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倾向也开始出现了，并且开始与唯物辩证法作斗争。但是这一些哲学派别都是比较幼稚的。恩格斯所指的古代哲学家，主要是指这一时期有辩证法思想的一些人，并不是说古代的哲学都是辩证法。

我们上次所讲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倾向，不是很显著的，不是很有系统的，比如爱利亚学派反对运动，他们想指出矛盾来否认运动，但恰恰矛盾就是运动。运动由第一点到第二点，只是在每一点上停留一下，他们想用这种理由来反对运动；但恰恰证明了这个运动，在每一点上停留，同时又不在于某一点上停留。所以是合乎事实的，这种倾向都是自己矛盾的，自己是站不住脚跟的。在爱利亚学派以及其它学派以后，又产生了比较新的学派，今天主要就讲以后唯物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古代唯物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派人有三个代表：阿那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最后一个是古代最大的唯物论哲学家，上次讲的赫拉克利特，他是古代最大的辩证法哲学家。

这一派哲学，代表当时希腊民主派的哲学。这一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产生的，当时正是希腊民主制度发展到繁荣的时期。如果有人读过西洋哲学史，就可以知道希腊有一个伯里克利时代，当时是这个人当政，他是希

腊民主政府的执政官。在他执政的时候，希腊的自由思想很开展，在议会里面可以自由展开争论，甚至于在街道上可以大骂伯里克利，当他由办公地点回家的时候，后边就有一些人跟着骂他，他自己也不在乎，他的政权也是很稳定的。当时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正是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阿那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都是伯里克利很好的朋友。这些人的哲学比较最初泰勒斯的哲学更精密一些。

这一派唯物论，是与爱利亚学派作斗争中产生的，批评爱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倾向。爱利亚学派有一个弱点，就是它把世界看成不变的、唯一的。因此一切变动的现象都是虚伪的，只是感觉上欺骗人的结果，实际上用思维研究一下，是没有变动的。这种主张与事实发生了矛盾，这一派唯物论哲学家就抓住了这个弱点，批评他们说：你说世界是不能运动的，这是不对的，世界上的物质都是运动的。在这一方面他是反驳了爱利亚学派。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受到爱利亚学派的影响，爱利亚学派认为整个世界是不动的，这一派反对这种说法，但他们认为构成世界物质的原子是不变的。在这一点来说，这一派唯物论，又比最早的唯物论退了一步。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原子构成的，他们认为最小的部分是不变的。世界上一切变动现象，都是由基本不变的各种元素组成的，承认世界不变的基本元素，就是这一派离开了辩证法，而倾向了机械唯物论，这就是它的弱点，这一派的三个人，所讲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基本方向是一样的。

第一个人，**阿那萨戈拉**。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是由无数性质上互不相同的种子组成的，比如动物，是由带有动物性质，很微小的种子组成的。他认为种子是各种各样的，他承认物质的微小部分—分子，有所不同。阿那萨戈拉根据这种说法，他认为世界都是物质构成的，认为太阳是石头构成的，因为他讲了这一条道理，就引起了所有迷信思想的人都坚决地反对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使他不得不跑到别的地方去。

第二个人，**恩培多克勒**。他对物质的元素—分子，又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分子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是分散的。所以，他规定了物质的元素只有四种，就是：气、水、火、土。这四项有点接近我们中国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我们讲五行，他讲**四大元素**，他说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这四种元素构成的骨头。人生气就是火。这是恩培多克勒唯物论的思想。他认为四大元素是不会变的，一切物质都是四大元素构成的。这种说

法，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不管怎样，他是唯物论，他是反对唯心论的。

第三个人，**德谟克利特**。他的学说就是原子论，是哲学上的原子论，不是科学上的原子论。因为科学上的原子论，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由无限多的原子构成的，这种原子当然是一种空想。德谟克利特是当时最大的学者，所谓最大，就是因为他懂得当时一切知识。大家也都非常称赞他，说这个人研究了一切（这个话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后来最有名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很多，他的家庭是一个工商业者。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得了一笔很大的遗产，他就拿着这笔遗产到处游历，到过巴比伦，也到过伊朗，他去过很多的地方，他到每一个地方都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很多，从哲学到天文学、政治学、数学都有。但是，他的著作只是在记载上有，原作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就是因为他是当时最彻底的唯物论者，他的著作都被反动统治阶级烧毁了。如当时的柏拉图，用很多的钱把他的书籍买来，买来以后就把它烧掉。柏拉图说：我做梦也要烧毁他的书籍。这说明唯心论是特别仇恨唯物论的，把唯物论当成死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认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斗争。这是不对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实际上是很残酷的**。除了把书籍烧毁以外，本人还要受压迫。在蒋介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受迫害。比如从前一个大学里聘用一个人，那就首先考虑他是不是会讲唯物论。如果会讲唯物论，那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就会不让他留下来。这是讲的国立大学。当然，私立大学还是有进步的教授的。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什么呢？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这种原子是很微小的，但性质都是一样的。他不是像阿那萨戈拉所讲的，物质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体积上与形状上有所不同，有圆的、有方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就是由这些性质相同和形状、体积有所不同的原子构成的。他的哲学与**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有相同之点。十七、八世纪的哲学认为物质的根本性质就是一样，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这样。

但是尽管他是唯物论，他的唯物论还是有很多虚构的地方，是科学之上的另外一种科学，实际上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对这些哲学还要承认它的历史意义，主要还是看它的思想本质是唯物论的。他反对神创造世界，反对精神第一，他承认世界上只有原子，而没有其他。原子的运动有一个特点，就

是它永远是下落的，空间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下落。由于原子的不同，重的落得快些，轻的落得慢一点。当时不知道在真空中，不管物体的轻重，它的下落速度都是一样的。当时德谟克利特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重量不同，落得快慢不同，就产生了旋转互相结合起来，因而就产生了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原子落下来的时候互相旋转引起结合的结果而产生的。这就是原子论的基本思想。

这种原子论的唯物本质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唯物论本质，就在于他用物质的本质说明了世界的发生与发展。他抛开了神与精神创造世界的说法。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和运动分不开，他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原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向下落，他向下落就引起了结合，就产生了世界。所以原子论的内容虽然有些机械唯物论的性质，但他把运动看成与物质是不可分的，这一点又有点辩证法的意思，**不能够说他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当然他所讲的物质运动还是机械的**，因为他只注重了位置的变化，而没有认识到物质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他的思想实质只有一点，就是用物质的运动说明了世界，他把运动与物质看成是不可分的，这是合理的。其他部分都是虚构的。

德谟克利特也用唯物论的原则来解释精神。人为什么会有感觉呢？他认为精神也是一种原子，是一种最轻，最精细，形状是圆形的原子，因为原子是圆的，所以人的精神是很灵活的。这种看法是一个缺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庸俗唯物论的。庸俗的唯物论就是把精神也看成是物质的，实际上精神是物质的一种作用，精神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这个属性发生一种作用，高级物质就有一种精神属性，所以精神就是高级物质的反映作用，但决不能说精神就是物质。庸俗唯物论说我们脑子产生思想，好像我们的嘴里产生唾沫一样。《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也批判了这一点。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精神看成就是物质，只能把它看成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德谟克利特就是把精神看成是物质，所以他是接近了庸俗唯物论。

但是，在古代来说，就不能批评德谟克利特是庸俗唯物论。我们现在所以反对庸俗唯物论，就是因为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他再宣传庸俗唯物论，那我们当然就要反对。德谟克利特的某种思想，究竟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就要看他的历史时代。在十九世纪里宣传庸俗唯物论，那就是倒退，但在当时的希腊，被德谟克利特提出来，那就是一种创造。

德谟克利特在哲学认识论上，也是唯物论的。他很注重感觉，认为感觉是可靠的，把感觉当成是物质的反映。他对感觉的解释，带有一些虚构的成

份，但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他认为感觉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里面散发出来的很多原子，它引起我们感官的刺激，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是由于杯子散发了很多的原子，这才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对象是因为我们原子的接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它的本质还是唯物论的，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但他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对社会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的，这个发展当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他认为人类最初是非常野蛮的，后来人类在自己的生活里努力模仿自然界，结果就使得我们人类进步了。人为什么能够穿衣服呢？就是因为模仿了蚕用丝把自己缠起来，人为什么能够住房子呢？就是因为学了鸟筑巢，这种说法当然也是荒谬的。但它也有唯物论的意思，因为他把生产看成是人类进步的东西，把生产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条件。

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是与唯心论宗教不妥协的。他的哲学有一个结论，就是世界不是任何人创造的，是自然发展的，精神也是物质的一种作用，如果有神，神也是要死的。所以，**宗教派特别仇恨他。**他的哲学思想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因为他的原著没有保留下来，只有少量残篇。有的是他的朋友给他保存下来的，有的是他的敌人为了反对他而留下来。

(4)唯心论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古代唯物论的哲学，我们上次讲爱利亚学派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唯心论的倾向，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体系，只是开始发生。

今天要讲的，是古代正式形成了唯心论的体系的代表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是古代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在哲学史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就特别提到他，如果我们读过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著作，占着很大的篇幅。资产阶级讲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如果对中国人讲起来，都把他与中国的孔子来比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唯心论，孔子的主要思想也是唯心论。他与老子的思想相对立，老子主张“无为”，不要“人为”，要顺着自然提倡无为，反对造作，孔子就专门讲这一套造作，孔子要“制礼”作为人的行动的标准。孔子有正名思想，名就是名分。在旧社会里，你如果是一个主人，那你就像一个主人的样子；你如果要是一个仆人，你就要像一个仆人的样子。仆人与主人

决不能混淆起来。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面，一个皇帝，一个臣子，都有一定的规矩，他不能够乱做。不能够违反这种规矩，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套规矩，人为地要求各个阶级遵守。

孔子的这一套大道理，是到处碰钉子，他说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看到自然法则与他的思想有冲突，而自己还要干下去。他与老子的思想相反，老子是根据自然法则来行动。当然，老子的学说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我们说要认识自然法则，利用自然法则为人类谋福利，就是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但老子有认识世界的这一方面，改造世界这一方面是没有的。他讲的“清静无为”，就是马马虎虎地过下去。就是尽可能少做事情。

中国过去的皇帝，在最初每一个朝代统治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老子的思想来统治。比如两千二百年前的汉朝，汉高祖的一个大臣叫萧何，当萧何死了以后，继承他的人叫曹参。曹参上任以后怎样办呢？他做了宰相以后，不是天天办公；而是天天在后花园里请客、喝酒，办公室里找不到他。后来汉高祖的儿子看到他这个样子很不高兴，责备他说，你是一个大臣，每天不做事，每天在后花园里请客喝酒，这成什么样子。他说，我这就是“清静无为”。他并且说：天下打下来以后，萧何丞相把许多问题都解决了，请问是我的才能大，还是萧丞相的才能大？是萧丞相办事办得好，还是我办事办得好？那当然是萧何丞相办得好。既然萧丞相办得好，那我还去做什么呢，所以我只按照萧丞相的规矩去做就行了。“萧规曹随”，这就是老子的哲学。

老子承认世界是自然的，但他对自然界的态度是消极的。我们讲古代哲学称赞唯物论，但我们不能够说老子的唯物论和我们今天的唯物论一样，老子与孔子比较起来，就是比孔子高明一点。孔子的正名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好的。在唯心论的色彩方面，与孔子有些共同点。孔子主要是讲道德问题，苏格拉底也是这样，他主要讲人的问题，研究人的行动怎样才是正确的，他不研究自然科学，而且是公开地反对自然科学。孔子也是这样。他有一个学生请教他，如何种地，孔子说你去请教农民，不要问我，这个学生也说，你不会种庄稼，就教我种菜吧，孔子生气了，他说我不知道，你还是去找种菜的吧。孔子说，我们是君子，为什么老讲种菜呢？这些地方都是与苏格拉底的思想相类似的。

在古代希腊的哲学里，苏格拉底的思想是代表贵族利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出生的时候，希腊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民主制度没落了，伯里克利死

了以后贵族又重新抬起头来。原来希腊贵族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势力。希腊有个城邦叫斯巴达，这个地方完全是贵族统治，当希腊建立民主制度的时候，斯巴达还是贵族统治，雅典是民主制度，当时斯巴达贵族们没有办法。当伯里克利死了以后，贵族们就起来与雅典打仗，结果雅典打败了，因此就又恢复了专制制度。这是伯里克利死了以后希腊的变化。当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是站在奴隶主贵族这一方面，苏格拉底本人甚至参加这次战争。这就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哲学的背景，他这个阶级使得他对一些唯物论的思想采取了非常仇视的态度。

直接与苏格拉底对立的，不是德谟克利特，而是德谟克利特一派的唯物论者，他们是民主派的思想集团，也是哲学集团，有人翻译成“智者派”。这个集团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用自己的教育来维持生活，教的东西一般都是科学、政治方面的知识。在民主制度比较繁荣的时期，他们主要是讲政治斗争的知识。这一个集团的人，思想上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初他们是唯物论者，是德谟克利特一派的人，以后因为专以传授知识为职业，有的逐渐变为**诡辩论者**，就是专门教别人去打倒别人。这些人的思想，后来有的人变为**相对论者**，只承认相对真理，不承认绝对真理，就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这就是智者派的一个弱点。因为这个集团是倾向民主斗争的，这种民主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贵族的民主。所以他一方面是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如何争权夺利，个人主义的色彩很浓厚，这就是他们的弱点。

苏格拉底就利用这个弱点反对智者派。他怎样反对智者派呢？就是抓住他这个个人主义的弱点，他说个别的不是真理，真理是一般的，整个社会一般地认为是真理才是真理，个人认为真理不是真理，所以当时就发生了一般与个别的争论，或者是**特殊与一般的争论**。有的哲学家说个别就是真理，有的哲学家说一般才是真理，认为个别的都是不可靠的，一般的东西才是永久的。也有一些人采取折衷的办法，认为个别的是真理，一般的也是真理。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争论，把一般和个别，用形而上学的说法割裂开来。中国古代有两个人：**惠施和公孙龙**。惠施是主张一般真理，认为一切都是共同的，个别的现象都是假的。他有一种说法，就是“天和地一样低，山和海一样平”。他有一个道理，就是天高和山高都是个别的现象，因此没有高低之分。公孙龙正相反，他把个别的东西看成都是隔离的，他说“白马非马”。白马就是白马，马不是白马，也不是黑马，就是一个马。他把个别的马与一般的马割裂开来。这个问题的解决，跟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也有关系。

一般地讲，“智者派”的哲学一般承认唯物论的。苏格拉底说一般的东西才是真理，他把个别的东西完全看成是虚伪的，个人的意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按照辩证法的看法，个别与一般是要结合起来的。唯心论者把个别与一般用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因此就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抽象的真理，抽象的真理是世界的根源，个别的东西不过是根据一般的東西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唯心论就便利贵族来利用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因为贵族是反对民主的，反对个人意见的自由争论，而主张专制制度，主张有一个普遍的权利来镇压整个社会。苏格拉底所讲的原则，就是贵族的原则，社会需要一个一般的原则，不能够让大家发表意见，这就是唯心论反动的实质。苏格拉底这一套学说，从一般到个别问题的结论，把一般当成一切事物的根源，而且推到政治上，就是拥护贵族的统治，这是反动的。他本人的实际行动是反动的，他参加了许多反动的活动。他后来的死，也是被民主政权判罪，在狱服毒而死的。

苏格拉底本人是不写著作的，他的行动与活动的方法，是采用智者派的方法，就是用嘴讲，这一点与中国的孔子不同，他是“述而不作”。

柏拉图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思想体系的完成者；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本人是贵族，是古代最大唯心论者，也可以说是唯物论的极端仇恨者，同时他的唯心论是古代最系统的。他的思想是根据苏格拉底的原理，认为一般的東西是真实的，抽象的概念是真实的，它是世界的创造主。说一个比方：譬如一个人，是抽象的人是真实的，还是张三、李四是真实的呢？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张三、李四都不是真实的人，只有抽象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且这个抽象的人是个别人的创造主。按照唯物论的讲法，人都是个别的人，然后我们把这些人的特点综合起来，才有一个人的一般概念，所以人的概念是在个别人中产生的，然后才有抽象的人。柏拉图认为是先有一般的人，先有一个人的概念。柏拉图认为个别的人都是抽象概念的模本。这个概念有一个总的名字，叫做“理念”，或者叫“观念”。他认为理念或观念是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他有什么理由说抽象的概念才是真理呢？他认为个别的東西都是要消滅的，一个人总是要死的，张三，李四都是要死的，而就是这个抽象的人始终是不会死的。

柏拉图就是用这样的一套怪道理来讲他的唯心论。根据这一套理论，就认为宗教是对的，上帝创造世界是对的。理念就是上帝，同时他也主张人不会死的，因为人死了还有灵魂存在，灵魂与理念是有关系的，因此也就利

用**唯心论**来替宗教做了辩护工作，唯心论很精巧地来为宗教作辩护，他使人相信上帝，信仰宗教，这种思想与唯物论的根本相反。柏拉图认为：**精神是不可能死的，因为精神是理念的一部分。**

柏拉图的社会思想，更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贵族倾向。他的社会思想就是一种理念的表现，他的唯心论的表现。他的社会思想认为：**合理的社会应该有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管理国家的阶层，这个阶层主要应该由哲学家组成，因为哲学家懂得理念，哲学家根据理念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就一定能够管理得好。

第二个阶层，就是保卫社会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武士，也就是将军们，这些人专管打仗，来保卫国家。

第三个阶层，就是生产物质财富的阶层，也就是劳动阶层，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他所讲的工人，农民，是指的自由民，不是指奴隶，因为奴隶在他看来，不在人的范围内，都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

人类的社会只能够由这样三个阶层，这是贵族社会的具体表现。他所讲这三个阶层，管理国家的阶层与将军们，他们是世代代传下去，永远是哲学家，永远是武士，劳动人民永远是劳动人民。

(5)二元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现在讲**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有学问**的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很多，他称赞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他自己研究过当时知识的一切领域。他的哲学是**二元论**，所谓二元论，就是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摇摆，在政治上有保守的因素，也有进步的因素。他的政治主张认为：**社会应该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阶层来统治，所谓最有力量，就是最有财产，最有社会地位，这也是贵族了。但他同时又认为：要把社会管理好，单靠最有地位的阶级也不行，还要靠一些中等富裕的人，这就是工商奴隶主。他一方面希望贵族统治，一方面又照顾到工商业者，他认为这样能够把社会管理得好，这就是他的政治思想。**

这种政治思想与他的哲学上的二元论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他的政治思想，在他的生活中由争论变成了事实。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时代，**希腊已经开始没落了**，希腊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马其顿**，这个马其顿的位置相当于

现代南斯拉夫。马其顿国兴盛起来，占领了希腊。**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先生，亚历山大当国王的时候，就帮助他搜集人才，帮助他建立学院，所以他当时在希腊建立了学术机关，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不管是天文、地理、生物都研究过了，所以他的知识是很广博的，当时的人不可能得到的知识，他却得到了，就是亚历山大对他的帮助。

他的二元论的内容是怎样的呢？他就是用二元论的观点、方法来对待个别的事物与一般原理的关系。**个别的事物他就叫质料，一般的原理他叫形式**，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个别事物与一般形式结合起来的，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了世界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当时反对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认为**个别的物质是阴影，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本来是他的**学生**，他当学生的时候就经常与柏拉图**抬杠**，柏拉图说：这个学生要用马鞭子抽。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抬杠，柏拉图说：个别的物质是假的，他偏说是真的。他说世界的存在，根本就用不着怀疑，甚至不需要证明，一看就知道是实在的。他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企图证明自然界是自己存在的话，那就是糊涂。所以这一点就完全与柏拉图的唯心论相反。他不怀疑自然界是自己存在的，物质绝不是理念的幻影，而是客观存在。在这一点上来讲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就是**唯物论**的。

那么，为什么又说他是**二元论**的呢？所谓二元论，就是除了唯物论以外，还有一些**唯心论**的倾向。他的唯心论的倾向，主要认为**形式是物质发展的动力**，物质当然不是创造的，但他是**靠形式来推动发展**。人为什么生出来又死了呢？就是因为有人这样一个形式推动了他，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完成人的形式，所以他这种思想又像**目的论**，就是物质是自然发展的，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原来就规定好了。譬如一个人一生，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人，从生到死就是要完成一个人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儿童一段，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一定要经过青年、壮年、老年，一直到死，这才算完整的人。这种思想本来可以用唯物论来解释，譬如我们说，物质概念不过是物质发展的一种概括，一个人发展的一生，到后来总结一下，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坏人，总的形式是后来产生的，这样说就是唯物论。可是他不这样了解，他认为一个人的发展，首先就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推动他发展，完成他的历史。比如孔子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按照唯物论来讲，孔子生下来，经过他所受的教育以及自己的努力，后来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是由

于一生的结果，然后完成这个概念。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来说，孔子生下来就抱定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完成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一来就把形式概念摆在第一位，把物质运动摆在第二位，这就是他**唯心论**的倾向。

亚里士多德不是完全的唯心论，因为他没有怀疑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认为世界不是精神造出来的，所以他是唯物论。但他认为自然界发展的动力是形式，虽然这个形式不是创造者，但它是推动的力量。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世界有两个根源，一个根源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从来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另外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形式。没有形式，物质就不会发展，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形式看作推动着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二元论大致的内容。

这种二元论也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这些辩证法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呢？亚里士多德他首先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永远是发展的，形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完成一个形式，还可以完成另外一个更高的形式，它不是永远固定的。基本上他认为发展是不间断的，世界是永远发展的。问题就在于他还有一个最高的形式，就是上帝，这一点是形而上学的因素。他说泥土到人的手里做了一块砖，这个泥土就完成了砖的形式，砖一块一块地再垒起来，就完成了房子的形式。这些都是粗糙的发展观点。他承认发展，这是辩证法的因素。他虽然说世界有两个根源，但认为这两个根源分不开，个别的东西与一般的东西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辩证法的因素。我们辩证唯物论主张一般和个别是分不开的，一切东西有一般的内容，也有个别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有一般的号召，也有个别的指导。只有一般的号召，没有个别的指导，那就不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亚里士多德研究过辩证法的一般形式。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是彻底地主张辩证法，只是说他研究过辩证法的形式。研究过辩证法的形式，并不等于辩证法。他研究过物质的现象，研究过物质的运动，发展是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这种说法是有辩证法的内容。由比较低的形式，变为比较高的形式，这种说法是很粗糙的。如人做砖，然后垒起房子，这是人为发展的，但是这里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形式，这些说法比德谟克利特又有一些进步，因为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不变的。

亚里士多德承认发展，当时没有认识到发展的动力是矛盾，这方面证明他的辩证法是不够的。在矛盾这方面，他与德谟克利特是有矛盾的，德谟克

利特认为斗争是万物之父，他的思想只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而不是一个真正辩证法的哲学家。

在认识论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接近唯物论的，主要就是他认为人的认识首先要依靠感觉来供给材料的。他说：如果没有感觉，思维、理性就等于一张白纸。这种说法是接近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这种认识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是相反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不需要依靠感觉供给材料，因为他认为理性是一切的根源，所以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理性。怎样认识理性呢？就是把眼睛闭上，自己去思考，也就是回忆。他认为人最主要的认识方法是回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被个别的幻影蒙蔽住了，所以只好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苏格拉底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去问一问上帝，而不依靠观察，只是依靠自己的思想来认识世界，所以这种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就完全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感觉是依靠搜集材料，他搜集的材料，差不多都搜集到寒带地方的东西。所以他认识上是唯物论的，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带有科学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在科学研究方面，在哲学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了逻辑学。我们讲的形式逻辑，古代逻辑，判断，概念，推理，还有逻辑思维的三大定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他提出来的。他第一次地把逻辑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有些基本原理一直到今天还是对的。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们就讲到这里。

(6)伊壁鸠鲁的哲学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又被罗马灭亡了，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人民的生活很苦，研究学问的条件没有了，社会走向没落，所以后来就没有很出色的哲学家了。但最后还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这就是伊壁鸠鲁。他的唯物论是怎样的呢？是进步的呢，还是反动的呢？这个问题，马克思有一个很正确的结论，就是：“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么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全集》第3卷第147页）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古代哲学就是走向唯心论，最后变成宗教哲学。亚里士多德本人已经是二元论。基本方向已经趋于没落，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伊壁鸠鲁，他发出了一点光彩，这就等于太阳快落了，又有一点耀眼的光芒。

当时虽然希腊很混乱，将近没落的时代，但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科学，当时就是伊壁鸠鲁总结了这些科学，创造了唯物论，所以这个唯物论不能不说是进步的。当时希腊革命的力最是没有的，奴隶暴动是有的，但还没有推翻奴隶社会。伊壁鸠鲁的哲学还是有价值的，虽然有价值，但其内容没有以前的唯物论丰富，哲学的目的不是想保护贵族制度，也不是想赞成民主制度，这一哲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人民能够在混乱的社会中精神上得到一些安定。因为一个人认为世界上都是物质，死了就消灭了，因此人对一切就不怕了，反正是物质的，人是物质变的，也要归于物质。有了这种思想以后，失败了也不在乎，成功了也不是了不起的高兴，因此生活就是安定的。所以这个哲学的目的就很难说是革命的，或者是很进步的。当时没有民主的基础，这个哲学使人相信世界是物质的，这就与唯心论对立起来。所以，这个哲学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这个唯物论的内容也是原子论，他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变化是由于不少的原子不断下落互相结合，最后产生了世界。伊壁鸠鲁也是这样一种看法。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有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落下来的速度是一样的，因原子有轻重之分而产生偏离，它包含着伊壁鸠鲁使人避免宿命论，生活更为安全的一种企图。这一点又说明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落下来可以偏离是直线的，并认为原子有自由意志，这一点说明伊壁鸠鲁比德谟克利特有些进步，不是像德谟克利特那样机械。他认为原子下落有时可以偏一偏，这样一偏，彼此就发生了冲突，因此就互相结合起来了。

伊壁鸠鲁为什么说原子下落有偏离，有自由意志呢？这就是说社会虽然这样混乱，但人还是可以克服混乱的影响的，可以在不安全的社会里面找到一种安全的办法。他对人民的生活也有一些看法，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因此他有一套理论，他认为人也是物质的，所以人在世界上应该设法满足物质的欲望，应该得到物质的享受，人的生活就是需要享受的。怎样得到享受呢？是不是花天酒地，乱喝乱吃呢？不是的。过度的享受会变成痛苦。所以乱吃乱喝反而得不到安定，享受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造成痛苦，应该有节制，他提倡一种有节制的享受生活。所以他的哲学还不是一种劳动人民的哲学，还是一种奴隶主的哲学。

3.中世纪经院哲学

古代以后，就到了中世纪，这一时期的哲学，变成了一种解释宗教的工具，成了宗教哲学。

在中世纪，有经院哲学，我们中国也叫烦琐哲学，经院哲学没有讲的价值，我们只是稍微地提一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完全是为教会服务的。所谓中世纪，就是指的封建时代。现在按照苏联历史学家划分历史时代的方法，是应该按照社会发展的阶段来分的。凡是奴隶社会就叫古代，凡是封建社会就叫中世纪，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叫近代，讲现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中国古代可能是殷朝，而中世纪可能是从周朝到鸦片战争。这个意思就是说，中世纪就是指的封建社会。

经院哲学是为封建教会服务的，也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中世纪哲学就比较简单，我们中国就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是从周朝起，一直到鸦片战争，那我们中世纪的哲学就很多了。就拿我们的封建哲学来说，就不像欧洲那么简单。我们有孔子的儒家哲学，有老子的“清静无为”的哲学，有“礼教”、有“道德”。我们中国封建社会是最复杂的。我们提到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看历史，不要用类比的方法来看，不是凡是封建社会都是一样的，具体内容是各有不同的。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内容总起来讲很简单，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哲学，不能超出一个范围，哲学只能够解释圣经，哲学必须与神学一致，而不能反对圣经，证明圣经是对的，这就是经院哲学的基本特点。

经院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套逻辑的方法证明圣经中许多神话是对的，他们所利用的逻辑，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机械地利用了逻辑学的规律，譬如有一个很有名的逻辑，在经院哲学里面，就是关于“神”存在的逻辑。中世纪有一个经院哲学家，他第一个这样说：凡是最完整的概念，一定包含存在的概念，如果不包括存在，就不完整。怎样算是完整呢？“神”就是最完整的概念，“上帝”也是最完整的概念，“神”是最完全的，是至善至美的，因此，“神”的概念里面，必定包含“存在”。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上帝、神是存在的。

当时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就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他们主观上也是想证明主观的道理，但是结果变成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论。唯名论就有

一点唯物论的性质，实在论就有一点唯心论的性质。什么叫实在论呢？所谓实在论就是认为普遍概念是实在的，认为上帝与神是最普遍的概念，神是最高存在的。这种实在论既认为普遍的东西是实在的，愈普遍就愈实在，反过来说，就是愈不普遍，就越不实在，个别的人就不是实在的，这个说法是想证明上帝、神是存在的，所以它是一种唯心论的倾向。

但是，这种理论虽然一方面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出了毛病。唯名论起来反驳它说，你说只有上帝是存在的，个别的人是不存在的，那么个别人犯了罪，是不是就没有罪过呢？如果个别的人不是真实的，那么只有上帝与神才有缺点，个别的人就不会有缺点。所以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就在于唯名论认为真实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实在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争论带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性质。实在论与柏拉图是接近的，而唯名论就与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在经院哲学里面，正统派基本上是赞成实在论的，而反对唯名论，虽然唯名论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它的借口就有否认上帝的危险。所以在经院哲学里面，当唯名论出现以后，就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唯名论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逻辑上的原因，逻辑上是表面的原因。实际上唯名论是代表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代表个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权威，重视个人的存在，而对普遍的东西采取否定的态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都是用个人的权力来反对封建的统治，因此个人的权力就是真实存在的。

唯名论主要是在英国产生，因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早。

中世纪经院哲学具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但它始终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千多年的经院哲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4.十七、十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

(1)英国经验派中的唯物论-培根、霍布斯

下面，就可以讲一讲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哲学，它们分为两大派。

英国的一派是经验派。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德国、荷兰，它们是理性派。理性派主张知识的来源是理性，经验派则认为经验是知识主要的来源。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所指的的经验派与唯理派，那些名词都是来源欧洲哲学的这两派。这两派中间都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这两派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都是反对的，都是反对烦琐哲学的，我们讲教条主义也很烦琐，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空洞公式。不管是英国经验派的哲学，或者是大陆理性派的哲学，对中世纪的哲学都是采取根本的否认态度，中世纪的哲学，不管唯名论或是实在论，他们主观的企图，就是为圣经辩护，为宗教服务，而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就努力地脱离了圣经的限制，因此它是近代的哲学。

这种哲学是依靠自然科学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有近现代哲学的。所以要了解近代哲学，同时也就要注意到一些近代的自然科学。英国的经验派哲学，它带有更多的唯物论的性质，它比理性派哲学出现得稍微早一些。经验派的哲学是在英国产生的。唯名论的哲学也是在英国产生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的较早地得到胜利的国家。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况，如1640年有克伦威尔革命，1668年贵族复辟，到了1689年又发生了革命，这次革命贵族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所以十七世纪就是英国革命的时期。英国在革命以前，也还是有很多农民，在十五世纪中有农民战争。德国在当时还没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真正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胜利的只有英国，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英国的经验派哲学。

英国经验派哲学第一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他在十六世纪末期就开始活动，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的哲学思想是直接与经院哲学对立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要利用一套抽象的逻辑公式，企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不研究自然科学，只是凭一些宗教的公式来证明圣经里面的许多教义。培根就坚决反对这种方法，他反对逻辑，凭理性来认识世界，而主张根据经验来认识世界，他反对夸大理性的作用。他有一些有名的话，他说：人的理性是非常狭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好像一个人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好像关在修养院里面。他说一个人如果凭理性来认识世界，这就根本不能认识、根本不能懂得自然。所以他说，人认识世界不能单靠理性，主要是要靠研究具体的事物。培根是很重视科学的，根据科学研究的方法，他总结出来了一套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归纳法，它是与演绎法对立的。培根认为演绎法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只是根据一个教条作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就是演绎法。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是依靠演绎法，它把圣经看成教条，因此人们的思想就超不出圣经的范围。培根就坚决反对这种演绎法。演绎法用一般的道理推论事物，这并不是完全没有用途的，用一般的原理指导我们研究具体事物，这还是可以的。譬如我们研究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中国的阶级斗争。演绎法可以指导我们研究新的事物，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只是不要把它当成死的公式。培根提出归纳法，他先研究具体的事物，然后从具体事物中找出共同的根本特点，这就是归纳法。

培根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总结为归纳的方法，这是培根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在当时来讲，提出归纳法是一个创造，因为他把科学的方法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这也是一些唯物论的倾向。培根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就讲过，培根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很厉害的，他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支配。为什么他受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支配呢？因为他根据他的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形而上学的，他说根据研究可以找出一般的规律，因此就可以证明，世界上的许多东西是有许多的基本因素构成的，这些基本因素的性质混合起来就产生了世界的物质。他认为物质的基本性质包括，重量、颜色、冷热、声音，这就是世界物质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是永远不变的，而且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只能够混合起来产生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科学的研究就是把这些基本原则找出来，用自己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一切的现象。所以，培根的机械唯物论，就是认为世界的物质都是机械地混合起来，这是它形而上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但是，培根的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很纯粹的，多少还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这种因素就表现在他认为物质自己能够运动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序言中说过，培根是承认物质是有一点冲突的，这一点还不是机械的。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是完全不会动的。培根在这一点不完全是机械的，因为他还承认物质的因素是各种各样的，还不是像后来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根本性质只有两三种，培根不是这样。所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唯物论在它的第一个**创始者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培根的政治思想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上是经验唯物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另外他还主张驱逐**偷懒**的人，反对**浪费**的人，反对**奢侈**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偷懒**、**浪费**、**奢侈**的人都是一些**封建地主阶级**，这就带有反封建的性质。培根认为资本家是勤勤恳恳的人，资本家是不懒的。所以培根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

培根以后的经验派哲学家，就是**霍布斯**，他比培根稍为晚一点。培根在十七世纪初期，霍布斯在十七世纪中期。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论思想进一步

地发展了。在当时的英国来说，也是比较彻底的唯物论者，所以比培根更彻底一些，同时形而上学这方面也发展了。总的来说，霍布斯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霍布斯和培根都是贵族出身，但思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在政治上，最初一个时期，霍布斯是拥护君主专政的。后来，在1651年克伦威尔革命的时候，因为他的主张与民主政治有矛盾，就逃到欧洲去了，但当克伦威尔执政以后，他又回到英国来了。所以他的思想是很顽固的，他坚持专制制度。克伦威尔以后，经过二十多年，君主专制又复辟了。当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时候，他就与君主专制妥协。所以，他的思想和政治方面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他的哲学也就与资产阶级的倾向分不开。

霍布斯怎样发展了培根学说呢？主要是把一些自然科学的原理进一步地应用到哲学上来；在认识论上都是一致的，也是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主要来源。霍布斯只是用一些数学来解释感觉。他认为我们的知识首先是从感觉来的，我们从外界接触许多感觉，各种感觉就像数字似地加起来，就成为我们的认识，思想认识是各种感觉的结合，人的思想是感觉的结合，这一些结合，我们看起来当然是不合理了。我们对思想感觉有很高的科学根据的，巴甫洛夫学说就告诉我们感觉是怎样来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当时的人们是没有这些知识的，他们只有数学和医学的知识。机械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喜欢用机械学和数学来解释一切，那些人的思想都是机械唯物论，他们认为感觉就是物质来的，真正的知识是对客观物质的一种观察的结果，这种思想是合理的，基本精神是对的，但他的解释是很机械的。承认物质的存在是他唯物论的原则，但怎样看物质，他与培根就有些不同。培根承认物质有各种各样的性质，物质有许多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小都是物质基本的要素。霍布斯就把物质的概念更简单化了，不把物质的根本性质看成是各种各样的，认为物质的根本性质只有重量，能够占据空间，在哲学上就是延长性，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广袤性，能够在空间占据位置。这些都是机械力学的性质，认为物质的基本要素只有两种，认为颜色、重量等等都是表面的现象，不是客观物质的基本性质，只是人的感觉，实际上物质不一定是那样的。机械唯物论它把物质简单地看成物体，这种物体就是物质的性质。所以这是进一步地机械化了。

培根的思想基本上是唯物论，霍布斯就更进一步地把物质的性质看成是更简单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有句话，就是说，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论系统了。

这种唯物论对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各种很生动的感觉没有兴趣了，霍布斯的哲学有这个特点，他反对精神的独立存在。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也就大体上可以了解了霍布斯的哲学。霍布斯对宗教、上帝是坚决反对的，这与培根不同，培根虽然一方面讲唯物论，但他另一方面还是承认上帝存在的；霍布斯则否认上帝的存在，认为世界就是物质的，我们所认识的东西都是从物质来的感觉，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上帝与神都是空想。这种思想是唯物论。

霍布斯的社会思想，认为人类是希望幸福的，他有这样一句话，“哲学的目的在于使人永享无上的幸福”。他说人的行动就是有一种物质的行动，这就是用力学来解释人的行动，好像人的行动就是一种机械运动，人之所以有冲动就是为了幸福。所以要想把社会搞好，就要调和各种人的行动，使得人都能够得到幸福。用什么办法使千千万万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呢？他认为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社会契约，这种思想把唯物论发展了。千千万万的人订一个契约，规定出大家的权利，这就与封建专制思想相反。他的思想就是使大家福利得以调和，能够使战争避免。除了契约之外，还要有权力，就是要有一个人上面统治。所以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提倡有契约，一方面又提倡君主专制，因此他后来就站在拥护专制政府的一方面。当专制政府有权力以后，他又与专制政府妥协。英国资产阶级就是有这种特点一善于妥协。

霍布斯是英国唯物论经验派最彻底的一个哲学家，在霍布斯以后，英国哲学家就向唯心论方面发展。英国在十七世纪大体上是革命的，到十八世纪革命就完结了，资产阶级当权以后，它逐渐就变成了保守的阶级。十九世纪末又有了第二次革命，这是一种妥协性质的革命。资产阶级起来把复辟的专制制度打倒，但打倒以后仍然维持着君主制度，不过设立了议会，资产阶级与贵族妥协了。这种结果为什么会产生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有妥协性，另一方面也是贵族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能够结合起来。

英国在十七、八世纪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2)英国经验派中的唯心论-洛克、巴克莱、休谟

第三个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洛克就变成了二元论。他一方面承认物质存在，另一方面又承认上帝和神。他说，物质所以能够存在，还是由于上帝的力量。亚里士多德也是这讲法，物质是存在的，但物质的运动要靠精神来推动。英国的二元论就是形而上学的，它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互相分离的，这就

是洛克二元论的特点。但是，洛克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还是培根、霍布斯的思想，认为知识的来源是感觉，如果离开感觉，人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一点是唯物论。洛克有一句话，心灵是一张白纸，要这张白纸有字，就要靠人的感觉，这一句话是唯物论，主张认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唯心论的倾向，他说，人的感觉所认识到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够认识到物质的根本性质。我们有一些感觉只能够认识到物质的第一性性质，有一些只能够认识到物质的第二性性质。哪一些感觉只能够认识到第一性性质呢？比如我们的触觉，只能够接触到物质的延长性。延长性，这就是物质的第一性性质，另外一些感觉，如眼睛的感觉，耳的感觉，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这就是物质第二性性质。物质的第一性性质与第二性性质有所不同，第一性性质是物质本身客观存在的，是物质真正的本质，而第二性性质就不一定是物质本身的性质，只是我们主观的感觉，所以第二性性质，并不是物质的性质。他把感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划分成为根本不同的两种，一种感觉能够反映客观物质的本质，另一种就不能反映客观物质的本质。对某些感觉就相信，对某些感觉就不相信，这就是二元论，又是唯心论的倾向。我们知道唯心论—马赫主义的特点，就是把感觉看成是主观的，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做事做坏了，大家都反对，自己一看人们的眼睛都在反对，他说这是我主观的感觉。洛克就是系统地证明有些感觉根本是不可靠的，所以是唯心论的倾向，这就是洛克二元论的认识论特点。他一方面主张认识的来源是物质的，另外又表示是不相信感觉的，这就成为后来英国经验派发展到唯心论的一种因素。

洛克的哲学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在英国发展了唯心论，另一方向就是发展了唯物论。当洛克死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有名的思想家，这个集团把洛克的唯物论彻底发展了，坚决承认物质是由感觉来的，不分第一性与第二性。这个集团最主要的人就是托兰德，也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家的领袖。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是坚持唯物论的，十七世纪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是自由思想家，唯物论者，发现氧气的，就是自由思想家发现的。后来这部分人就发展到法国唯物论的一派，另外一部分就在英国发展了唯心论。发展唯心论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主要有两个人，就是巴克莱和休谟。

关于巴克莱这个人，因为大家都学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大概都比较熟悉。列宁一开始就揭露他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是十八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代表，在哲学上是公开地、明确地把自己的目的指明出来，坚决反对唯物论。巴克莱比马赫主义还稍微老实一点。经验批判论这些人，他们的哲学也是主观唯心论，但他们不公开地反对唯物论，而是偷偷摸摸、躲

躲藏地反对唯物论。巴克莱则是公开地表明自己主观唯心论的立场，公开地反对唯物论，如果说有不同，巴克莱与后来的经验批判论就是这一点不同。这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有力量，他敢于公开地反对唯物论；而马赫主义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下坡路，所以他不敢公开地反对唯物论。马赫主义在中国很有影响，在“五四”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在中国基本上就是马赫主义，包括胡适在内。胡适的实用主义，好像有些科学的味道，实际上就是主观唯心论，不仅实用主义这样作，马赫主义也是如此，它也是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动立场，这并不是说巴克莱比马赫更好一点，或比较老实一点，而是由于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是向上的，它还有胆量来反对唯物论。反对唯物论的办法就是把洛克的二元论变为主观唯心论。他认为洛克承认物质是不对的，承认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是不对的，他认为一切感觉都是主观的，感觉以外没有客观的物质。巴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大体上就是这样。

巴克莱反对洛克的二元论，主要认为把物质分为第一性和第二性是不对的，他认为一切感觉都是主观的，不仅颜色、声音这些是主观的，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如大小、重量也只是我们主观的，它们不是物质本身的性质。所以在巴克莱看来没有客观物质的性质，更没有客观物质。为什么没有客观物质呢？他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主观的，既然我们只能认识我们的主观的东西，我们就没有权力再去断定我们的感觉以外还有一些客观的物质，所以物质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物质是纯粹抽象的概念，所以唯名论最初虽然有唯物论的倾向，但也可以被唯心论利用，也可以变成唯心论，原因就是唯名论不承认概念也是反映物质的内容，不承认概念是物质的反映，他认为一般的人都是一个空名字，概念都是空名字，这就是主观唯心论的倾向。他不承认思想是客观物质的反映，而认为概念就是主观的概念。

英国的唯物论是继承了唯名论的传统，所以霍布斯也有唯名论的弱点，洛克也是同样。巴克莱就利用唯名论这个弱点提出了唯心论的看法。认为：抽象的概念都是一个空名字，我们真正认识到的东西是感觉。在巴克莱看来，物质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感觉综合起来，给它一个物质名字，所以物质是不存在的。这样就达到了唯心论的目的。

巴克莱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个人还是一个主教，所以他的哲学是为宗教来服务的。

在巴克莱以后，就是休谟。他活动的年代也是十八世纪。十八世纪在法国是唯物论时代，而在英国已经是唯心论的时代了。休谟的思想，是以不可

知论为特征，这种思想基本上还是唯心论，但他企图遮盖巴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太荒谬的地方，他创造了不可知论的哲学。“不可知论”也叫“怀疑论”。他赞成巴克莱的一个原则，就是认为客观物质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与巴克莱是一致的，是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巴克莱，因为巴克莱是主教，相信上帝，他否认了物质，坚持上帝是存在的，没有物质以前世界上就有了精神，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精神与上帝是存在的，这是巴克莱的思想。休谟则认为：物质固然不能说是存在的，上帝与神也不一定是存在的，理由还是巴克莱自己的理由，就是我们的认识不能超出自己的感觉，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权力说在我们的感觉以外还有上帝与神的存在呢？这一点就与巴克莱不一致了，一方面他反对了唯物论，不相信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有神论。他认为究竟有没有神，我们不能知道，我们只能承认自己的感觉，感觉以外可能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知道的，这就是“怀疑论”。它不是主观唯心论里面的“唯我论”。“唯我论”是认为世界上只有我，这样说怀疑论也是不承认的。世界上有没有我，有没有上帝，都不能断定，这实际上还是唯我论，只是他自己不承认，所以叫怀疑论。

休谟对科学也表示了一些意见。科学的特点就是能够认识规律，科学知识就是客观规律的知识。当时认为客观规律就是因果规律。因果规律怎样理解呢？按照唯物论来讲，因果规律是客观物质的反映，它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但当时的科学家不懂实践，他们认为科学的规律，就是两种现象经常结合在一起，认为就是因果的关系，究竟这个关系是不是那样密切呢？那很难讲。比如天气冷了不穿衣服就伤风，按照休谟的看法，这个关系并不是客观的关系。我们两种感觉，前年发生这种感觉，去年又有这种感觉，今年两种感觉又结合在一起，因此就觉得在两种感觉中间有些联系。究竟这个联系是不是那样密切呢？那不能断定，仅仅是因为这两种感觉重复了几次，所以我们觉得有这个关系，以后是不是这样。那不能保证，所以他对因果规律的可靠性也是怀疑的，好像是两种感觉偶然结合在一起，因此因果规律也只是主观的联想。是否真正有客观的必然性，那也不能够断定。因为他认为感觉重复一千遍，一万遍，可能在一万零一次就不能结合了，事实上是不可能如此的。所以休谟的哲学是反科学的，马赫主义就继承了这种传统，实际上也是反科学的。

在休谟以后，还有一种哲学带有一点唯物论，就是一种羞羞答答的唯物论。它承认科学的因果规律是普遍的，但这种规律是不是物质的规律，还是抱怀疑的。他相信科学规律的可靠性，但还不敢承认是客观物质运动的反映，

因为怕承认了以后，会引起社会的太大的波动，因此就避免提出这个问题，仅仅提出的规律是真实的。猴子变人是真理，但是否是客观的规律，它避免提起，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所讲的羞羞答答的唯物论。休谟本人的怀疑论、不可知论，还具有一种主观唯心论的倾向，是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性的反映。这种倾向也不能完全说它是“有神论”。他与巴克莱还有所区别。所以在这方面也可以说对科学的发展还没有太坚决地反对，因为尽管资产阶级是保守的，但它还是要科学的，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还有发展的余地。所以巴克莱的唯心论是反动的，休谟的思想也可以说是英国资产阶级两面性在哲学上的表现。

(3)大陆理性派哲学-笛卡尔

现在讲大陆理性派。

理性派与经验派就不同了，在认识论上，经验派认为认识的来源是感觉，至少是认识的主要来源，认识真理要从感觉开始。所以在认识论上，经验派是接近唯物论的，理性派离开唯物论则远一些。

理性派又叫大陆理性派，就是反映了欧洲大陆一般比英国落后一点，封建势力比较大一点。英国比较先进一点，对科学知识更注重一些，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就能够开始建立经验派的哲学。欧洲大陆是比较落后的，在十七、八世纪中，只有荷兰的资产阶级发展早一点，但他是一个小国，英国起来以后，荷兰就逐渐衰落下去，除了荷兰以外，法国就比较落后了，所谓落后就是资本主义不太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在十六世纪曾参加过农民暴动，但很快就失败了。法国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也是落后的，法国在十八世纪才起来革命。所以理性派哲学的产生，也反映了欧洲大陆的比较落后，虽然落后，但还是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理性派哲学还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还是与中世纪有根本的分别，主要是超出了经院哲学的范围，脱离了圣经的限制，而成了独立的科学。

第一个理性派哲学家就是法国的笛卡尔，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提到，笛卡尔的哲学是二元论。他主张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这两种东西的并存，并且是毫无关系地并存着。如一个人有肉体，同时也有自己的精神，虽然是在一个身体内，但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认为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物质就是一种物质，完全是一种死的物体，不会动，没有什么感觉，像一块铁一样。精神与物质则是完全不同的，它能够思维，

这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所以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只能够并存。那它们怎样发生关系呢？他认为这个关系是一种间接的。讲到这里他与宗教就妥协了，他说物质与精神所以能够发生关系，是靠上帝的力量。人的身体与精神发生关系是靠脑子里有一个“松果腺”，上帝就掌握着这个东西，靠这个“松果腺”，上帝在那里指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身体与精神是不会发生关系的。

笛卡尔讲到物质性质的时候。他有许多唯物论的思想，他认为一切东西都可用机械因果规律来解释，他认为感觉外物就是机械作用。但当他解释精神的时候，他又倾向于唯心论，与宗教妥协，这方面就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此他有机械唯物论的一方面，又有唯心论的一方面。他基本上是与封建思想做斗争的，尽管他是二元论。在当时的欧洲教会已经不能允许他，所以他还是受迫害的。

他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心论的倾向，他认为认识真理要靠理性，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他认为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一就是怀疑，一切都怀疑，连我们自己也要怀疑，这一点也有二元论的性质。凡是我们所看到的東西都要怀疑。因为他对宗教和一切都怀疑，也有进步的因素。那么怀疑到最后，是不是什么都不相信了呢？到最后碰到有些问题不能怀疑了，根据理性来看，那就一定是真理了。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首先怀疑一切物质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可是怀疑到最后，有一件事情不能再怀疑了，“我”最后在想问题，我在思索这一件事情是存在的，因此我是存在的。这个“我”就不能再怀疑了，在理性认识上觉得是清晰明了的，用不着凭经验去研究，用不着搜集材料，只要闭起眼睛来一想，这件事情很清晰明了，这就是真理。所以他的认识方法就是依靠理性直观，不是靠调查研究，只是闭上眼睛想，这种方法当然是唯心论的认识方法。可是这种方法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中世纪来比，中世纪的人认为研究真理的方法，首先是研究圣经。笛卡尔就不是这样，他对圣经是半怀疑的态度，他研究问题首先是依靠自己的理性，所以他是向中世纪的人宣布人的理性的力量，现在来说，当然是唯心论。但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他是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因为他对教会的教条迷信宣布了人的理性的权威。他之所以是进步的，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但这种方法是唯心论的，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了。他为什么得到二元论的结论呢？就是因为他这样了解：不仅是我的感觉是清晰明了的，就是物质存

在也是清晰明了的，我存在有一个身体也是不能怀疑的，再一想上帝也是存在的，因为世界上有这些现象，没有上帝哪能够行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肯定：笛卡尔有许多辩证法的思想，但十七世纪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局限，例如把理性与感性分开，否认感性，孤立地提高理性，这都是形而上学。他说物质与精神根本没有关系，这也是形而上学。但他也有一些辩证法，这是个别的，他讲物质问题的时候，有时也承认世界的发展，承认世界的联系。他对世界发展的思想，多多少少还是一种“原子论”的思想，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由许多细微的原子或灰尘构成的，这样就产生了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承认了这种变化。对物质世界，对某些东西承认变化的，这当然是不多的。

(4)大陆理性派哲学-斯宾诺莎

笛卡尔以后，就是斯宾诺莎。他是理性派里面相当彻底的唯物论者。他是荷兰人，一生住在荷兰，是当时欧洲进步的地方，他本人是犹太人，他的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认识论基本上与笛卡尔一样，不太重视感觉的作用，认为真理就是依靠理性来发现，所以他在认识论上是理性派，可是他的**整个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他的唯物论主要表现这样一点，就是他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反对笛卡尔把物质与精神机械的分开，看成两种没有关系的东西，他认为物质与精神是整个客观自然界的两个方面。整个世界是一个实体，实体有两方面的性质，即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能够占据空间，有广延性，另外一方面，实体又具有思维的性质。所以他认为物质的性质与精神的性质，都是同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当时的人很重视数学，他用曲线来解释实体，他说实体就等于一个曲线，你看它上面是凸出去的，下面是凹下去的，一个实体有两方面，你看起来以为**物质与思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东西，可是仔细地想一想，它就与这曲线一样，正是一件东西的两个方面。他用这一套理由，来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实体，并不是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实体并存。

斯宾诺莎这种思想就符合了唯物论的原则，把精神看作是物质实体的一种属性，并且把精神与物质看成互相适应，因为它是物质的另一方面。好比一条曲线一样，物质是曲线的这一方面，精神则是曲线的那一方面，这里面就包含了精神反映物质的意思。他认为反映不一定通过感觉，理性可以直接反映物质，因为精神与物质是直接结合着的，因此不经过感觉也可以认识真理，这种思想是根据数学来的。理性派对数学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数学上

的定理，不需要感觉就能够认识的，如数学上有：“两点中间直线最短”。这是几何上的定理，这是自明之理。资产阶级讲数学时，就常讲这句话。他认为数学的真理是最高的真理，因为它不需要经验，这是理性派的曲解。实际上数学上的一些定理，也是从经验中来的。“两点中间直线最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还是经过经验来的，如初生的小孩子走直路就不一定会。当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理性派就依靠这些来叙述他们的认识，这是唯心论。

斯宾诺莎就认为理性是直接反映物质的，他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的方面。斯宾诺莎**坚决相信**世界上的物质是依照**因果规律**变化的，相信因果规律是可靠的，他认为客观的规律是必然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因此也有他**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他**坚决相信**世界物质的**必然性**，所以他**否认有偶然性**，认为所谓偶然就是主观的。按照辩证法来看，偶然与必然是有区别的，必然是客观的，偶然也是客观的。**形而上学**认为**只有必然，而没有偶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原因，有原因就是必然**。但辩证法不是这样认识，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事物都有原因**，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原因中间有能够引起必然性的原因，有一些是偶然的原因。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可以变成必然的，也可以变成偶然的。辩证法是怎样分别的呢？有些原因是重大的原因，能够使得事情变化一定产生那一种结果，没有那个原因就不能产生那一种结果，这种原因是必然的。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就要产生一定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发生战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是必然的，但战争的爆发，有时候常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起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怎样爆发的呢？就是奥国皇太子到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去，在路上被一个人打死了，这样就使得奥国皇帝进攻塞尔维亚，英国，法国都加入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这是不是说打死奥国皇太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然原因呢？不打死这个人，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呢？不能够这样说。没有这件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会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把这点看得非常重要，因为要分清偶然与必然，然后才知道哪些事情的发展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这才能分别出轻重。

所以，**机械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同的。斯宾诺莎承认**科学规律**是可靠的，是**必然性**的，这一点是**唯物论**。斯宾诺莎有一句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是斯宾诺莎自己讲的。他认为认识了必然就有自由。他的认识当然和辩证法唯物论还有不同，辩证唯物论认为：认识了

世界再来改造世界。他的认识还是**机械的**，他说人只要认识了必然，就顺着必然发展的情况过下去，那就是自由，所以他的理解程度还是很低的。他有一个比方也是机械的，他说，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是必然的，倘若石头能够像我们人一样知道自己会滚，它就觉得自己很自由。这句话是他讲出来的，在哲学史上是一种创造。

斯宾诺莎的唯物论，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但又有辩证法的因素，就是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把必然和自由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到了，他不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机械地分开；他把精神与物质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这都是他的辩证法的因素。

(5)大陆理性派哲学-莱布尼兹

现在讲**莱布尼兹**。他是德国人。十七、八世纪中，德国比法国落后。德国那样一个小的国家，是二、三百个诸侯统治的国家。像汉堡是一个城市，但它又是一个国家，像我们的一个县一样大，也是一个国家。像德国一个有名的人叫歌德，他就做了魏马国家的宰相。魏马也不过几万人口，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小县那样大，实际上等于县里的一个秘书长。十六世纪农民暴动失败以后。德国就分裂成为很零散的许多小国家，慢慢地资本主义发展了，中部莱茵河地区有些资本主义，也就有了要求科学的倾向，但也有落后的方面，因此就有了**唯心论**的倾向。

莱布尼兹的哲学就是“单子论”，认为世界是无数的**精神的单子**组成的。单子不是原子，原子是物质的东西。按照莱布尼兹的理解，整个世界充满着无数的单子，这是反映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单子会发展，就是由感觉到理性，没有什么物质的，物质是什么东西呢？物质是单子自己主观上产生的一种幻想。人是怎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感觉变成了理性，是不是有我们的肉体呢？就是单子一点一点地发展的。他也没有道理，他就是这样认为。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唯心论**，认为单子是唯一的**东西**，因此最后就承认了上帝；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因素**。主要还是**形而上学的因素**，因为单子是一个一个的，是彼此孤立的，但单子本身是发展的。莱布尼兹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这种发展的思想与科学发展有联系。他在科学上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高等数学**，就是**微积分**。主要是研究变量的数学，低等数学是研究固定数字的，如 $2+2=4$ ，高等数学是研究数量变化的结果怎样，把一个数字缩小会发生什么结果，把数字扩大发生什么样的结果。积分

就是把数字扩大，比如一个多边性的形体，我们把每一个边都缩小，这样边的数目就增大。缩小到最后，边就没有长短了，而变成圆形的了。微分就是研究这些问题，边的数目增大就是积分。整个微积分大体上就是研究这一数的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实际上研究起来是很麻烦的，初等数学不研究这些东西，高等数学是研究数量变化的，它是莱布尼兹的发明。

关于十七，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就讲到这里。下面开始讲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哲学。

5.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

十八世纪的唯物论，又称**战斗的唯物论**，这与十八世纪的阶级斗争有关系的。我们学过近代史，大家都了解，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彻底的，在世界上还是没有的，它接近**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个革命证明了法国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一方面法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很**顽固**，不像英国的封建贵族富于妥协，它是凭借武装反对革命运动。路易十六本人就非常愚蠢，他的领导人，就是他的老婆，他老婆很落后，所以最后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基本问题是法国封建阶级的顽固性，它除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外，再没有办法。英国的贵族自己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把土地变为牧场，用来放羊，生产羊毛，由资产阶级收买，这样两个阶级就妥协起来了，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并不是英国资产阶级会妥协。法国资产阶级有力量，它不能够忍受封建阶级再统治下去了，再加上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因为法国封建阶级的顽固性还不仅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非常残酷地剥削了广大的人民，所以当广大人民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次很大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也就利用这一形势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革命运动。

十八世纪的唯物论就是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资产阶级是代表人民向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整个十八世纪从最初到最后就贯串着这样一种思想。最初的思想代表者是**伏尔泰**和**卢梭**。

我们提纲上讲**伏尔泰**是**反教会**的思想**先锋**，他在十八世纪前期，还不是唯物论的思想，只是伏尔泰思想。他的思想是接近唯物论的“**自然神论**”。就是**披着神的外衣**，实际上是唯物论，这个唯物论还不太勇敢，还承认有神，但这个神有一个限制，他认为这个神不在世界之外来管理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依靠自然科学的规律，来管理世界。所谓神，应该是想怎样就怎样，

他这样一说，神的作用就减弱了，认为神也是反映因果规律的，所以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承认客观事物是存在的，因此实际上是唯物论。他为了避免引起旧势力的过分反对，还是承认有神，但伏尔泰对教会已经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写了很多文章，全部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的。他提倡科学，认为科学的规律是真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对人民的影响很大。

卢梭这个人最有名的就是写了一个“民约论”，讲的是社会契约思想。他的基本思想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各人有个人的利益，后来因为个人利益有冲突，大家订立契约，订立了契约，然后才有社会。社会为什么变坏呢？坏的原因就是由于私有财产，各种制度发生变化，使得有些人违背了平等契约，封建制度就是最明显地违背了平等契约，因此，要反对封建制度，恢复到平等契约的时代。所以他的平等思想，在法国革命中影响很大。法国雅各宾派的政治理论就是从卢梭那里来的。资产阶级曾经夸大这件事情，说雅各宾专政取决于卢梭这一本书的作用。它的确对封建阶级起了一种毁灭性的作用。

法国的唯物论主要是以下四个人：狄德罗、拉梅特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他们是法国唯物论的总代表，他们是百科全书派重要人物。这几个人有的是继承从英国经验论哲学，有的是继承了法国笛卡尔的唯物论。狄德罗与爱尔维修是从英国来的，他们的哲学在认识论上注重感觉，认为感觉是认识的主要来源。爱尔维修还有一个特点，他把感觉论运用到人的教育上，人的发展是感觉发展的结果，因此人是受环境的影响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国唯物论这种感觉论是可以引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来的。他主要就是根据爱尔维修的学说，既然认为人性的好坏是环境造成的，因此要想改造人，就必须改造环境，环境改造好，人性才能够改造好。这种思想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改造得好一点。

狄德罗是法国唯物论的领袖。拉梅特里和霍尔巴赫主要是继承了笛卡尔的唯物论。他们主要是机械唯物论。拉梅特里写了一本书《人是机械》。霍尔巴赫主要写了一些有关自然发展的书，他是直接反对宗教。

法国唯物论总的来讲，这些人思想的共同点，基本上是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最主要的性质是机械的性质，与以前的机械唯物论是一样的，物质就是广延性，有重量，有大小这一类的性质。但法国的唯物论比以前的唯物论，比笛卡尔，霍布斯有一些进步的地方，就是认为物质的属性还不仅是延长性，可以包括其它的一些东西，当然他还没有认识到如色彩、声音都是物质自己

的性质，但他们认为延长性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同时还有其它的一些属性。所以，物质与运动发展还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因为以前的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根本不变，这种唯物论是承认了变化的。当时他所了解的变化是有一种限制的，就是把变化看成是一种循环绕圈子，所以基本上是承认数量与位置的变化，变来变去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解释社会就是一种循环的看法，人是自然的，各人有各人的利益，根据个人的利益大家订立契约来组成社会。以后社会的财产私有了，就产生了坏的现象，最后又经过革命，又重新订立契约，又回到原来平等契约的方面去，这种看法对社会就是循环的，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看成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局限，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会把发展看成是不断的一由低级到高级。如果那样看，就是现在的社会将来还要垮台。它所想的现在的社会就是最合理的社会，因此它虽然承认物质和运动是分不开的，但只承认数量、位置的变化，所以还是机械唯物论。这种机械唯物论的性质也表现在对精神发展的认识上。

法兰西唯物论在解释精神发展的这种现象上，它的见解也是机械的，它认为精神的发展就是数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比如拉梅特里说：石头和人的认识只有量的差别，他认为石头也有感觉，与人所差的只是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只承认数量的变化，不承认质的区别，不承认低级和高级的区别，这就是机械唯物论的特点。

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就是因为它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解释世界，只承认量变。所以这种唯物论的看法，也可以叫“物活论”。“物活”就是物质都是活的，生命的多少而已。不过法国唯物论的哲学家里面，狄德罗思想是比较接近辩证法的，虽然不是那样明确。狄德罗认为感觉至少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迟钝的感觉，一种是活跃的感觉。无生物也有感觉，但它的感觉是不活跃的，动物和人的感觉是非常活跃的。他认为鸡蛋与鸡是不同的，鸡蛋没有活泼的感觉，鸡有活泼的感觉，这就是辩证法的因素。辩证唯物论也承认这一点，承认鸡蛋是无生物，但它也有反映的作用，它的反映作用与感觉不同。人有理性，无生物是没有理性的，但无生物也有反映，它能够根据外界的影响发生变化，这就是一种反映。

法国唯物论坚持因果规律是真实的，是必然的，同时也同斯宾诺莎一样把因果规律看得很机械，走到形而上学方面去了。因此它否认自由，认为自由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实际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根本上来说都是必然的，

所以，他们的唯物论有点接近“宿命论”的思想。对自由没有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与辩证唯物论不同。辩证唯物论一方面承认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一方面又可以认识客观规律，是能够进行创造的，即能够有自由，能够根据规律来创造，能够不受规律的奴役。但法国唯物论看来，人好像没有自由，它认为人的意志实际上是和机器一模一样的。法国唯物论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品质好坏受环境的决定，这也是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它没有认识到人可以在改造环境中来发展自己的品质。它对可以把坏的社会改造成为好的社会，没有正确的解释。按照辩证法的解释，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真理，然后根据我们的实践来改造世界。法国唯物论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改造世界应该靠偶然出现一个有理性的人，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它不了解人的思想是在实践中逐渐锻炼起来的，认为一般人都是受环境决定的，只有偶然出现的伟大人物才可以改造环境。

法国唯物论的思想大体上就是这样。

6.德国古典哲学

(1)德国古典哲学-康德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之中一般都是唯心论，只有康德是二元论。唯心论是主要的，同时发展了辩证法。唯心论是反动的，但辩证法是进步的。这是反映了当时德国的情况。当时德国周围是革命的环境。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革命正在顺利地进行着。国际上是革命的环境，但德国本身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在德国是比较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很同情周围国家的革命，很羡慕这些国家的革命，很愿意跟着这一条道路前进。但实际上看一看本国的状态又没有办法进行革命，只有向贵族低头。在政治上，资产阶级虽然向往革命，但又对封建势力保持着很大的妥协性。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仅仅在精神上讲一讲辩证法，概念方面的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因此就只有宣扬唯心论。恩格斯总结德国古典哲学情况，恰当地指出德国哲学是在观念上伴随了法国革命。

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康德，他的哲学是二元论。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活动时期，前批判时期的唯物论比较多一点，批判时期唯心论成

份比较多一点。第一阶段是他年青的时代，他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他的著作也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他有一本名著：《宇宙发展史概论》是讲宇宙天体怎样形成的。康德汲取了笛卡尔天体演化思想，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假说”——按照这一假说，宇宙原是一团云雾状的、炽热的、旋转的物质粒子，即“原始星云”，由自身引力与斥力相互作用而发生旋涡运动，逐渐形成太阳、行星、卫星。康德认为天体形成经历了时间的过程，推翻了牛顿以上帝为宇宙形成的第一推动力，动摇了天体是亘古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预示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新起点。所以，这个学说提出以后，引起了宗教家们疯狂的反对。这是康德年青时代的情况。

后来，康德就倾向了唯心论，当然还是二元论，晚年他写了《纯粹理性批判》，这是他哲学观点的代表著作。他在认识论上是二元论的，他承认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本源。他想调和英国的经验派和大陆的理性派，认为感觉是我们从外面物质得到一些印象，没有感觉不可能有知识，知识的第一个来源是感觉，但这个感觉是混乱的，不能够成为科学的知识，要使感觉变成科学的知识，就要靠理性。理性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悟性，再一个叫理性，当中主要还是悟性，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混乱的感觉整理出秩序来。悟性又是靠什么把混乱的感觉整理出秩序来呢？就要靠它有些范畴，这是先天的，不是客观的反映。我们人的脑子里天生就有一些范畴，就是时间，空间，实体关系，因果关系，可能性，现实性，偶然性，必然性等等。这些范畴是我们理性所固有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从感觉得到一些印象，然后就把它整理出来，某些归到时间一类，某些归到空间一类……等等。

康德有一句话：“我们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就像法律使社会有秩序一样。康德认为科学并不是客观的规律，而是我们主观的理性对感觉排列成的秩序，这就成了科学的知识。所以，科学的规律都是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的反映。康德的二元论就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认为感觉是物质的反映，另一方面认为感觉反映的东西，并不是物质本身的东西。物体的本身就是物自体，他认为物自体本身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够在物质本身得到一些表面的印象，而且是杂乱无章的。这一点与巴克莱的唯心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巴克莱否认物质，他还承认物质。

休谟的不可知论，与康德有不同的地方，休谟是根本不承认客观存在的。康德是相信客观存在的，但认为感觉是不能认识物质本身的，科学的规律知识是主观给定的，我们的认识都是一些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客

观的物质是不可知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康德与休谟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够认识客观物质是不是存在，认为我们只能认识感觉，我们的认识仅仅是感觉的关系。康德加了一些东西就是理性范畴，认为理性是总的东西，悟性是比较分散的。所以康德的哲学是：我们以为有物质，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物质本身的概念，物质概念只是我们主观的范畴，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康德的二元论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否认能够认识物质。因此他的哲学被引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康德想解决这个矛盾，他后来又写了《实践理性批判》。他说我们在世界上虽然看不到物质，但还有危险，因此我们有一个上帝命令我们，我们天生好像就有这样一个命令，你的利益不要与全体最高的利益发生冲突，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就不发生危险。康德这样的唯心论就被费希特发展了。

(2)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谢林、黑格尔

费希特基本上就不承认物自体，只承认有一种精神，我们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实践的精神来行动，这就完全变成了唯心论。但他这个唯心论开始有了辩证法。我们的实践首先是由自我出发，因此必须有一个对象，就是需要有一个对立的東西，这样就**把非我克服了**。费希特的哲学就是这样。这就是**主观唯心论**。

后来，谢林就变成了**客观唯心论**，他认为费希特有些太荒谬了。他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精神，这个**客观精神**，它的性质是辩证的。谢林是第一次公开地把客观世界肯定成是**辩证法**的过程。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些联系，当时开始发现电子，他就用这个作比方，他说磁石是一块东西，这样一看是北极，那样一看有南极，这两极是存在的，两者是对立的统一，对对立的斗争不大注意，所以谢林在政治上是倾向妥协的，还没有费希特革命。

黑格尔就是这个唯心论体系**集大成**。他与谢林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像谢林那样认为矛盾的对立是同一事物的两极，他强调对立的斗争性，经过斗争引起事物的发展。根据他的辩证法，叙述了一套唯心论哲学的体系。他的哲学里面，特别注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把否定之否定当成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架子，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特点。

斯大林讲辩证法，根本就不提否定之否定，就溶化到质量变化的规律里面。黑格尔他很强调这一点。

黑格尔认为宇宙的内在本质为“绝对精神”，它既为本质，又是一能动的主体，不断辩证地展现自己、认识自己。“绝对精神”的发展，首先表现为逻辑阶段，其后为自然阶段，最后为精神阶段，因而，黑格尔哲学体系为“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组成部分。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三个阶段，最初是绝对精神，为了表现自己就用物质来表现，物质是死的东西，所以绝对精神要进一步地发展历史，经过人类的历史反过来再认识自己，认识经过精神来实现。人认识的特点，就是最后要回到绝对精神。等到绝对精神都回忆清楚了，就是到了最高阶段。黑格尔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就是最高阶段，所以世界的发展到了这里就不再发展了。

黑格尔的一切都是用这三段发展来谈的，他写文章也是这样。

他一生的著作都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逻辑的著作，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第三部分是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他的逻辑学的著作也是分三部分：每部分又分三章，三章里每章又分三节，都是这样。

因此，这就与他的根本原则发生冲突，因为辩证法不能归结为三段论。辩证法的根本精神是事物通过矛盾而永远不断地发展；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主要也是批判这一点。

费尔巴哈是唯物论哲学家，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已经没有时间讲了，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总结了哲学史，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从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吸取了他的合理内核，从而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使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 02 章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报告

(1954.09.21)

【这是艾思奇给马列学院二部学员的讲课速记稿，共三讲，这里只收第一讲，其他二讲因重复而删去。在整理时只作了文字的加工。】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开始讲哲学课。

我们要在七个礼拜的过程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讲完。

我们学习的基本用书和参考书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

我们没有采用教科书，当然这不是因为教科书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时间并不太长；而且，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钻经典著作，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再找其他的参考书。

当然，如果有的同志看书看得比较快，在把指定的参考书看完了以后，还是可以找一些其他参考书看一看的，但不能把那些书当作主要参考书。实际上，我们指定的经典著作都是最可靠的；而一般的教科书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缺点的。是的，苏联的教科书大都是比较好的。最近，亚历山大罗夫编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书就是写得较好。但问题就在于这些教科书都有些缺点，而且不完全适合于我们老干部参考之用，因为在教科书里面对自然科学讲得比较多，这些对我们说来还不是迫切需要的；当然，将来我们还要讲一些自然科学，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自然科学也是一个缺点，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如果学的自然科学太多了，对我们现在的学习也是不太好的。同时，我们对一些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不是可以很好理解的，除非我们具有高中、大学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懂得。不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十分需要，因为我们同志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和我们的工作需要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所以不必要更多地来讲自然科学问题。还有，有些教科书在理论说明上也可能有个别的错误。

经典著作就是最可靠的。经典著作是第一手的著作，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依靠第一手的著作，而不要依靠第二手的著作——根据第一手的著作编写出的一套著作。

我在这里所以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要依靠经典著作，或者至少是轻视这一点，相反地，倒要去依靠普通的教科书。比如，有些同志要到处乱看参考书，这种热情是值得奖励的，但这样作下去可能就要吃亏，也得不到好结果。如果他看的参考书里边错误很大，那末，他就会跟着犯错误。当然，最近苏联出的教科书，其中根本错误是没有的，可是小的缺点、错误还是可能有的。虽然，教科书的条理可能比经典著作要清楚一些，也好懂一些，但是要知道，苏联同志写的教科书既然有缺点，而我们中国人写的书，其中缺点就会更多一些。我过去曾经写过一本《大众哲学》，它的缺点就很多。

我们现在讲的讲题，大体上是根据苏联的教科书编定的，当然在理论上的说明还是根据经典著作。关于经典著作，除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好懂以外，列宁的某些著作也比较好懂，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可以组织一下辅导的解释，大家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找人解答。

现在正式讲“引言”。准备分作三个部分来讲。

1.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 观，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认识世界和革命地 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这一部分主要是说明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什么东西，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占什么地位，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

同志们只要是在过去读过列宁的一些著作，就知道列宁曾经说过：整个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占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只是包括辩证法唯物论，还包括历史唯物论，这二者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讲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讲哲学；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整个马克思主义

是三个组成部分密切结合起来的整体，三个部分是联系着的，不可分割的，去掉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起一直到现在，在历史上有一种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特点之一，就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欧洲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自己号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认为可以用唯心论、二元论来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可以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这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可有可无。

从前，在俄国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在1907到1908年，列宁写了一本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批判那些错误的东西。当时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有些本来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动摇了；动摇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应该改变一下，认为恩格斯坚决拥护唯物论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应该用最新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要用唯心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列宁当时虽然工作很忙，但还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取消的，绝不能用任何其他东西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列宁认为，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性，马克思主义的党就要坚持唯物论，决不能和唯物论脱节。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确地知道，凡是在我们党内犯路线性系统错误的人，他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中国，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一直到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以及以后抗战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最近工会工作的错误，这些都是路线的错误，政策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在研究问题、看问题的时候违背了唯物论的原则、辩证法的原则，也就是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就是与辩证法唯物论相反的思想方法。毛主席所以一再教育我们要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就是因为主观主义者抛弃了唯物论，抛弃了辩证法。当然，他们抛弃了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是有意识地这样作；在这里要说明，第二国际和经验批判论这些人们就是自觉地抛弃辩证法唯物论。我们这些犯错误的人，并没有公开地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们倒公开地讲：“我赞成辩证法唯物论！”如果我们问一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犯“左”倾错误的王明同志：“你是不是反对辩证法唯物论？”他就会说：“我不反对！”可是，他当时在实际上是离开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原则，他的思想不能反映物质，不能反映客观情况。解放以后，工会工作所以犯政策错误，就是因为在工会领导人的

思想上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本来在解放以后，工会就应该注意生产，而不应该把工人福利当作唯一的问题。在解放以前，工会可以把工人福利当作第一位的问题；解放以后，客观情况就要求我们着重地去搞生产，这样，工会就应该组织工人进行劳动竞赛，搞技术革新。而犯错误的人的思想就是主观主义的，是不能反映客观物质生活的，是离开了唯物论原则的。

从以上所谈的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党的发展历史可以证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我们只要一离开这个东西，就要犯错误。反过来说，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是由于他站的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从思想说来是思想离开了物质生活，离开了唯物论，走到了主观主义方面去。所以，不能掌握唯物论的原则。就一定要犯错误；反过来，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问题。

关于这个道理，如果不学哲学，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没有哲学知识，犯了错误，也不知道。学哲学就可以弄清楚这个问题；弄清了这个问题，就使得我们懂得，要做一个真正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一个觉悟很高的共产党员，就一定要坚决地很好地来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要想办法使自己能够自觉地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它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反对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个别的，这就是认为哲学是可学可不学的东西。就是在座的同志有的也可能有这种心理；最低多多少少也存在着对哲学是非学不可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当然，在马列学院以外，这种情况就更多一些。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就认为可以不学哲学；甚至我们党办的一些研究班、训练班也不要哲学；有的是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而不要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有的地方争论起来，他说“不学哲学，我说学哲学”。这种不重视学哲学或者不要哲学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提法就可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占的地位。这就比如盖房子，如果基础打得不稳固，房子也就盖不好。如果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我可以不要哲学，这就等于说盖房子不要打地基一样。

那末，为什么说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呢？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有了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才能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不能掌握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出发点，如果出发点错了，路线就会错了，方法就会错了，整个问题的解决也就会错了。所以，毛主席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学习哲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

所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去掌握，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唯物论的观点，辩证法的方法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无法反对主观主义，就不能正确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在他们掌握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用这些方法观点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果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怎样从封建社会产生；同时也明确地提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起来以后就要垮台，就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就是依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些规律，也就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所以，先有哲学，然后才创造了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是跟着哲学来的。有了经济学的知识，也就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认识了这些规律以后，才根据这些规律来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确定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所要采取的各种战略、策略和各种政策、路线等，这些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那么，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根据什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根据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根本不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它没有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根据，只是根据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所谓的“良心”和主观愿望，根据他们脑子里的一些空想出发；他们觉得这样作是对的，他们也不考虑这样作是否行得通，客观事实是否允许。因此，他们的学说就叫作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什么是科学的呢？因为这种学说所包括的斗争战略、策略、政策和

路线，都不是空想出来的，都是根据客观事实的发展规律制定出来的，都是考虑到在事实上可以行得通的，而且这样作一定能够胜利的。我们中国现在正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之中所包括的各种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又增加进去的很宝贵的一部分。大家都已学习过了总路线，也了解了总路线，这样就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特点。我们的总路线没有一点空想的成分，没有一个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也没有一个政策不是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中国的社会就是要这样发展，在1949年，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就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有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有了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些条件就可以保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有了这些因素，就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自己捣自己的蛋。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就要倒霉，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就要被推翻，所以我们决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我们有了这些条件，社会就要向社会主义发展；可是，要向社会主义发展，就必须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不能着急，着急是对我们不利的，因为要想一下子用爆发的办法把资本主义消灭掉是不可能的，是客观规律所不允许的。如果有人想这样做，那就是冒险主义，就会弄得天下大乱。现在有些人是希望我们这样做的，托洛茨基派分子、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都希望我们这样作。我们如果这样做，就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分裂；这样，我们的政权就要垮台，工人阶级就要陷于孤立，从而就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客观规律就反映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到社会主义去，而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做到逐步过渡，而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党和毛主席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条件，根据中国的客观规律而制定出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

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其次，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来实现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

这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总路线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根据中国经济学来制定的；而我们的经济学，是由于我们对中国经

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由于反对了主观主义，是由于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而制定出来的。所以，用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例子，也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开的。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要想深刻地了解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不懂得这个东西，虽然大体上懂得了总路线，但在具体执行时，仍然可能犯错误。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具体怎样作，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去具体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就要犯错误。

所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开始就要学哲学。我们懂得了方法以后，我们再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党史和党的各种政策。这样就可以很有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掌握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学习它的重要性。

那末，为什么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这样重要呢？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本身是什么东西。搞清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同志没有学过哲学，因而对哲学总是有许多奇怪的了解，有许多误解。在过去，有些同志对哲学抱着一种神秘的观点；也有的认为：我是搞实际工作的，为什么要学哲学？这种不正确的想法是与社会影响有关系的。

在过去，资产阶级的哲学确实是有些神秘，不可了解。在旧中国也有一些所谓的哲学，如在马路上摆摊子的算命的先生，他们就信口开河地说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死，知道吉凶祸福。我们的同志们认为哲学是难以了解的，特别是文化低的一些同志，有些自卑的情绪，认为自己学不了哲学。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对哲学的误解大体上有三种：一种认为哲学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一种认为哲学虽然可以捉摸，但只有大干部、决定政策的干部才需要它，普通党员是不需要的；还有一种认为哲学是空空洞洞的东西，不实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作具体工作就不需要这种空空洞洞的学问。

这些看法的存在，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捉摸不到的，难懂的。不学，当然就难懂；学，就可以懂；但是，也不是很容易掌握的；也不是最高级的干部才需要它，每一个作具体工作的同志不需要它。事实上，即使是最小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它。在处理工作问题的时候，能够掌握哲学的人和不能掌握哲学的人比较起来就有很大区别。我们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需要学习哲学；不然，斯大林也就不

能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了。斯大林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参加马列主义党的人都应该对哲学有一个了解。而且哲学也不是空空洞洞的东西，尤其作实际工作的同志更需要它，因为哲学就是我们处理实际工作的科学的方法。

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了解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要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科学就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辩证法是研究最普遍的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是观察世界的最普遍的科学。所谓世界，既包括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的思想。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研究这样一种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科学，不管在自然界，或是在人类社会中，以及在人的思想中都可以应用。譬如，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有联系的(即都与周围的东西有联系)，都是互相依赖的(就是没有孤立的东西)。这个规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如此的，不可能有例外的。也有些客观规律只管一个部门的东西。譬如自然科学规律就只管自然科学部门，如二个东西摩擦就发热，火柴一摩擦就烧起来，这就是一个规律；可是，两个人一摩擦就不能烧起来。又如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是孤立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就要相互影响，就是彼此不说话也发生影响。在世界上从来也找不到任何例外的东西是孤立存在着的。所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规律都是普遍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又叫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唯物论是我们的世界观，辩证法也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应用辩证法看世界，就可以看出世界到处都是辩证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研究世界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是它的一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谈到另一方面，这种普遍的规律又是我们研究问题、观察问题时的总的思想方法，根本的思想方法。这二者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所以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我们认识了普遍规律以后，在研究一切问题时就可以根据规律去做。譬如我们有了总路线，在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根据总路线办事。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在总路线里面提到要搞合作化，但必须是逐步的，而不能急躁冒进，这就是方法。所以，凡是普遍性的规律，就都可以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

唯物论的原则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意思就是说思想一定要反映物质，思想一定要服从物质。所以思想的正确与否，不是思想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看思想是否与客观相一致。思想如果和客观不一致，这种思想就一定是错误

的；思想和客观相一致，那就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有了这个规律以后，无论在处理什么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当作方法。譬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想在两天、三天内就想把个体农民改造成为集体农民，那就一定要犯错误；而如果想到了要对农民进行改造，同时是采取逐步的办法，这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样作就是正确的。

掌握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这个原则，就要把它当作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研究问题以前，必须先把事实弄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唯物论的方法。

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就是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同时又是我们研究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总的根本的思想方法。这样一来，就可以打破那些认为哲学神秘、不可捉摸的错误观点。当然，资产阶级哲学就是不可捉摸的东西，甚至连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懂。过去读过资产阶级哲学的人就可以知道，“哲学的道理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资产阶级认为哲学是非常神秘的，是很难用言语来说清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故意这样作。资产阶级哲学是根本错误的。譬如，为列宁所反对的“经验批判论”的那种错误的哲学，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依靠“感觉”的。譬如大家在这里听课，经验批判论者就可以认为没有这么一回事。我在这里讲课就是“做梦”。所以列宁批判它们：这种哲学只承认世界上有我一个人，不会有第二个人。这种东西，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毫无理由的。

那末，是不是最高级的干部才需要哲学，而普通的党员就不需要呢？不是的。最高级的干部决定政策是需要这个东西，但每一个普通党员在作具体工作时仍然而且必须是必须有哲学思想。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指导工作的实际的方法。每一个党员在实际工作中不仅仅需要知道实际的东西，而且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指导；否则，就要犯错误。保守主义思想就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说明了世界上总有新的东西不断产生，旧的东西不断削减，而保守思想就不承认这一个规律，所以是错误的。

下面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根源。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的最普遍的规律。这个最普遍的规律是可以了解、可以捉摸的。但是，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规律是不容易的，而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努力，最后才

由马克思、恩格斯把它创造出来。为什么发现这个规律是这样困难呢?因为要发现普遍的规律,就需要有很多知识,需要对人类、对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而且要总结许多规律。列宁说过:辩证唯物主义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那么,为什么说必然规律一定要掌握整个人类历史才能够得到呢?因为要确定必然规律是真理,就必须有许多具体知识来证明它,要有许多自然知识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是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在很早以前,人的知识是很少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逐渐发展的。在人的知识不够的时候,就很难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必然规律。所以,在历史上,人类并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而是相信唯心论。在知识很贫乏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形而上学是对的。过去的人们,认为一切东西是永久不变的,他可以抓住很多片面的事实来这样看。特别是在过去的历史上,可以说,人类有文化的历史都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原始社会没有什么科学,从奴隶社会起才有文化。剥削阶级总希望它的统治是永久的,因此它就用一切办法来证明它的统治是永久的。所以,从它的阶级利益要求出发,它就不自觉或者很自觉地把世界上的事情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否认变化,总想肯定某些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再加上当时知识不够,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按照它的利益抓住一些片面的事实来证明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证明形而上学是对的。

我们相信动物是变化的。因为我们在最近一二百年以来,在科学上发现了很多材料证明世界是变化的。可是,在古代没有这些材料,所以统治阶级就会说人类永远是这样,人类不是什么变化来的,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没有各种科学的发展,没有很多科学知识提出材料,就不能总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总结。人类历史发展到马克思时代,才有了必要的材料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可靠的。在古代的时候,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如在老子、孔子时代就都有辩证法的思想,但是都是模模糊糊的,很不完全的。在二百年以前,即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个整个的时期是形而上学时期,那个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的。后来,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在自然科学方面、历史知识方面证明辩证法是对的。最后,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创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方面是吸收过去人类知识的精华,总结了过去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过去的

错误思想。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系的就是欧洲的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

黑格尔哲学又是总结了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知识的一种结果；而费尔巴哈哲学又是欧洲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发展的最高点。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方法的人，并且认为这个方法是最正确的方法，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自觉地对形而上学，并且想有系统地来解释辩证法；但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论的，他的辩证法是主观的，他没有严格地根据科学知识来解释科学知识，他有很多东西都是用脑子想出来的。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错误，带有很多公式主义的色彩。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错误，并把黑格尔思想中合理的东西找出来，加以根本的改变，使之变成唯物论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带公式主义色彩的，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完全地成了科学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上是和事实不一致的，他的辩证法主要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与斯大林所讲的辩证法的四大特征是不同的。他把“否定之否定”当作主要的东西，当作公式，主观地想出了一套关于变化的公式。他认为一切都是否定之否定，都是按照三个阶段发展，他认为世界是先有一个莫明其妙的、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所谓“世界精神”，这个世界精神要表现自己，于是一变就变成了自然界，所以他认为自然界是精神的表现。而我们，则认为思想是物质的表现，是物质的反映。黑格尔则认为先有精神，精神要表现自己，不知道怎么一变就变成了物质世界；等到物质世界的变化，就出现了人，于是人的思想就发展，结果人的思想就与世界精神完全一样。

所以，黑格尔认为首先有世界精神，人的思想一发展，就又与世界精神一致。他的全部著作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可以分三个部分，他完全按照这个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他这个说法当然是非常荒谬的。所以，虽然他企图有合理的东西，想用辩证法解决问题，可是，他的辩证法又是唯心论的，和事实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打垮了他的公式，抽出他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并把他加以发展。斯大林的辩证法的四大特征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决不能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费尔巴哈是有联系的。费尔巴哈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没有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费尔巴哈一般的承认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但他在解释社会问题时则完全是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一方面

是继承了过去的优秀成绩，总结了过去人类历史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在性质上都与过去又有根本上的不同。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立场不同，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过去的旧哲学都是与剥削阶级的利益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广大人民的立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要求有广大人民来掌握。

从前的哲学是为少数人研究的东西，有些大学教授讲课的时候，讲得非常深奥，只是叫两、三个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要求很多人懂，至少要求我们每一个干部都懂。只有大多数人掌握这个东西，它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所以，这个哲学本身就要求通俗化。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的公式。过去的哲学，不管是唯物论也好，唯心论也好，多多少少都带一些公式主义的毛病，过去的那些所谓的科学家都想制造一套公式来解释一切。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指出一些科学研究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条特征，都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工作的一些原则，一些方面，一些总的方针。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研究的工具，是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甚至也是规定工作作风的一种方法。

主观主义是一种作风；调查研究也是一种作风，但这是唯物论的作风。凡遇到问题时，先把事实调查清楚，而不是凭武断解决问题，也不是遇到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就凭主观的想法下结论。

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学这样一种工人阶级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研究原则，科学地解决问题的原则。

我们学哲学就是要按照这种原则来学，不要企图死记公式，死背书本。有些人刚来学习的时候，就准备多读几本书，找一些资本，想出去以后用那些条文来吓唬人。如果有这种想法一定要批评，一定要改掉；否则，你就一定学习不好。

这是第一部分的问题。

2.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就是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力求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和观点研究理论、领会政策和处理工作

这里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问题。什么叫党性？党性就是阶级性，因为阶级性的集中表现、直接表现，就是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的首先一个特点，就是公开地承认自己哲学的阶级性，公开承认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分不开的。过去的任何哲学都没有公开地承认过自己的阶级性。事实上哲学是有阶级性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代表阶级的。封建地主的哲学是地主阶级的东西，欧洲资产阶级哲学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它们可以不公开承认哲学的阶级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与人民对立的。所以，它们就不好公开地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宣布出来，相反地还掩盖自己的阶级利益，以欺骗人民，同时把自己装作好像是代表人民的。不仅是在哲学上是这样，在一切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在国家问题上，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政府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只有无产阶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承认而且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且很强调这个阶级性，强调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为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在中国，资产阶级也在解放之内。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很幸运的，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要吃很大的亏，中国资产阶级则可以通过和平道路进入社会主义。

因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公开地承认阶级性不但没有坏处，而且还有好处。立场明确是很重要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马克思的最初著作就讲清楚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反过来，无产阶级又是哲学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讲：哲学必须掌握群众，才能成为物质力量。我们现在就是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成为干部的武器。这样，干部就可以很好地工作，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辩证法唯物论需要很明确地指明阶级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懂得：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如果不学，就是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所以，强调阶级性，指明阶级性，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学习哲学的必要性。第二国际就违背了这一点，经验批判论也是这样的。陈独秀就是解除了辩证法唯物论的武装，而后就解除了一切武装，从而在各方面离开了无产阶级。我们的干部不懂得辩证法唯物论，处理工作就要犯错误；犯错误，对无产阶级事业就会有损害。我们有的同志过去没有学辩证法唯物论，而工作上也有成绩。由于这样，所以有些人就想：我何必要学辩证法唯物论，过去没有学，也一样作工作！如果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想一想。有些人把过去的成绩当作包袱；而为什么在过去的工作上能获得成绩呢？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学哲学，也可以有成绩？是不是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不是的。我们过去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我们中央、上级解决问题是按照辩证法唯物论办事的。我们工作上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按照他们的指示作了。但我们自己处理问题时，则常常犯错误。所以，我们过去工作上有成绩，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组织上表现了党性，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服从上级的指导。所以，就不能因为我们在工作上有成绩，而就可以不学习、不掌握这个武器。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地、深刻地认识辩证法唯物论的阶级性—党性；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必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的知识。

我们要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性、阶级性。那么，怎么承认呢？就是要有意识地、自觉地注意到一个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学辩证法唯物论，要与唯心论、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如果我们自己思想上有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因素，就一定先与自己思想上的这些东西作斗争。所谓哲学的党性，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地和形而上学、唯心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样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哲学的党性。在这方面，毛主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毛主席从参加革命起，一贯地和主观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唯物论，这样地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就是哲学党性最高的模范。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释哲学的党性时说：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党性问题。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

革命才会胜利。”所以说，主观主义就是党性不纯。在这里，主观主义也包括形而上学和唯心论。

坚持辩证唯物论哲学，主要要掌握以下几点：

首先，要学习辩证法，使我们时常能够作到全面地认识问题，能够学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列宁曾经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特点。辩证法所有一切特征都是为了保证这件事(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全面认识问题。因此，就必须反对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特点，正与辩证法相反，是片面地看问题，表面地看问题。以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吧，一方面要消灭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在我们中国社会条件下，又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要尽可能地争取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就会只抓住一方面，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他就只看到消灭资产阶级，而看不到逐步改造这方面，结果就会产生急躁冒进。

辩证法要求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讲到战争的必然性问题，究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剧烈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剧烈呢？斯大林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从理论上讲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可是从实际上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这就是具体分析。有些人因为是片面地看问题，所以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是更剧烈的。如果结论是这样，问题就麻烦了；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团结起来，来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这样，我们的和平政策就无法实现。虽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是在眼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是主要的；这样的结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站到和平方面来，因为它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剧烈的。所以辩证法的观点既注意到了理论，又注意到了实际问题。全面地研究问题，就能够深刻地认识问题。按照错误的说法，那就只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矛盾是剧烈的，这种主张也可以找到一些事实，但仅仅都是表面的。譬如在联合国会议上，美国提出个什么，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都接受；看起来苏联好像是孤立的。其他表面的事实还有很多。这就是表面地、片面地看问题，是不正确的。

学习唯物论的重点，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很客观地认识问题的作风。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求人的主观思想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

规律，而不要有任何主观的空想。所以，学习唯物论，要树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调查研究的作风，要反对思想上的主观性，反对夸夸其谈。

反对唯心论，就是要反对思想上的主观性。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最老实的人。老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糊涂人，对什么都说好好好的老实；一种是我们说的老实，是实事求是的老实，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而没有任何主观的虚伪的改装。

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是分不开的。片面、表面就一定会主观。因为根据一方面下结论，就会与事实不一致。比如看到在联合国会议上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美帝国主义提出的问题表示同意，举手赞成，因而你就下个结论，认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结论就是主观的。所以，要想避免主观性，就一定要用辩证法，一定要具体分析问题；没有辩证法，就不会有唯物论，没有辩证法的方法，不可能有唯物论的思想，至少不会有彻底的唯物论思想。

主观主义的实质，都是因为片面地看事实，或者抓住片面的事实来下结论。我们的同志，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看问题片面的人往往只看到缺点。这样进行批评，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很少没有缺点的共产党员，但看问题应该是全面的，既看到缺点，也要看到优点。

产生唯心论的原因，就在于把认识片面化。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反对形而上学就一定要反对唯心论；反对主观性，就一定要追究到主观性产生的根源。

学习历史唯物论也有重点，就是要树立劳动生产的观点、群众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样，就一定要反对历史唯心论，反对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作用的个人主义、个人崇拜，阶级调和主义和否认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这就是学习历史唯物论的重点，也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方向。

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个人主义，我们干部大多数都有点群众观点不够的现象。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要消除一些个人主义。甚至党的高级干部也有这样的问题。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的发展结果。在高、饶问题出来以后有些同志想不通；学了历史唯物论以后，我们就应该想通。如果没有这种问题，就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规律。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级干部都会像高、饶，但有的党员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觉悟是不一致的；觉悟高的人，问题可以解决；觉悟低的人，

问题就不容易解决；或者原来有些觉悟，结果由于受了一些坏影响，又变了。高级干部会发生这些问题，我们普通干部也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个人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是极端危险的坏思想，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警惕和克服。

此外，阶级调和思想在我们一些干部思想中也是会有的。我们有时犯急躁冒进，有时又犯右倾的毛病，比如在和资产阶级联合中，往往受他们的影响。这些实际问题是我們学习理论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要讲哲学的党性，就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克服个人主义以及轻视劳动生产、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克服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

3.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目的

我们学习哲学就是要贯彻上述的这个方针。这个方针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割裂的。我们就不能说只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而不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好好地研究理论，把我们过去没有认识的东西认识一下，提高我们的理论知识，使我们能够把一些问题提到比较高的原则上来认识。过去我们有时犯了错误，不能把问题提得更高；我们学了哲学，就可以把问题看得更高，就可以说我们犯错误是违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提高认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是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关于联系实际问题，有很多人感到很难了解。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放矢”。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把这个方法当作箭，来射实际问题这个“的”。

理论学得好不好，就看你能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你能够把实际工作问题、国家大事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处理得更好，就算你理论联系了实际。联系实际时，我们首先要将理论当作武器。马克思讲：“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我们就要把这个武器掌握起来。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就是要掌握这个武器。掌握这个武器，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大到整个世界大事，小到个人的思想问题。实际存在的问题都叫“实际”。我们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有什么障碍我们前进的东西，我们要解决它。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当然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叫实际；这里所讲的实际就是因为有问题。譬如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也是实际，可是我们学习哲学就不是为了解决自然界的问题，如种花，天气如何，气象问题等，对自然科学家说来是实际问题，而对我们就不是实际问题。我们是作群众工作、政治工作的干部，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我们学哲学时就不要把主要力量放在研究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去。

大家在毕业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实际问题。在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学得的哲学去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在学校学习也有实际问题；认为在学校学习没有什么实际问题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学习理论，就必须联系实际；单纯地了解理论而不联系实际是不行的。虽然我们在学校中学习，也要找出一些实际问题加以解决。在学校中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在工作上发生困难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思想问题。不能说我们离开了工作岗位就没有思想问题了。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就是思想问题。我们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必须把片面思想去掉。思想问题也就是我们学习中的一个直接的实际问题。

所以，根据我们的学习方针，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要善于联系我们的工作，联系我们的思想。马列学院一贯地要求我们这样作。不管讲也好，学也好，比如我在这里讲课，我事先就要了解到大家的一些思想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估计大家的想法，来联系实际问题作一些批判。这样讲课，才能讲得比较好。大家在学习中应该联系自己工作上、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应该批判的就批判，应该肯定的就肯定。从自己的思想联系起，这是联系实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光联系自己也不太好，还可以联系到一些国家大事以及对许多具体工作问题的看法。

我们的学习方法基本上是整风的方法。一方面要学习理论，一方面还要反省工作，反省思想。到一定阶段，我们要作学习总结。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个方法，我们要首先说清楚一点，就是有些人对整风有些片面的、错误的看法。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整风的积极方面，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提高思想。这些方法我们要坚持。在过去的整风运动中，曾经发生过个别的过火的现象，那是个别问题，是一种错误的东西。我们认为采取整风的

方法来学习是很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向大家说清楚；大家也要考虑，要想通；不想通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学习是会有障碍的。

第 03 章 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1954.10.25)

【这是艾思奇给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十至十四班讲课速记稿。原题是：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原理：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整理时，对大标题和小标题，按所讲内容作了变动。在内容的整理上，略有删节，作了一些文字的加工。】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讲历史唯物论的第一个题目：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1.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讲历史唯物论，首先要讲清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这是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历史唯物论总的特点斯大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特点就是说，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要了解历史唯物论的特点就先要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回顾一下。

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七个特征，如果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辩证唯物论是把自然界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按照辩证的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种客观发展的过程中有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关系辩证唯物论认为是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即物质是第一位、精神是第二位的。

辩证唯物论的这些原理完全可以运用到历史唯物论上，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完全地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要了解历史唯物论的特征，就要按照这些原理来了解。将这原理运用到历史唯物论上，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按辩证的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同样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性的，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先，社会的精神生活在后，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位的，而社会意识是第二位的。

所以历史唯物论的总的特征大体上就是两点：(一)历史是有规律的；(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精神生活。

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出规律来，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很严密地、准确地找出历史的规律来。我们不仅清楚过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今后历史的发展也可以作出相当的估计，我们可以规定总路线，能够毫不怀疑地确定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是有规律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律的指示，使我们的工作不会犯大的方向性错误。

在社会发展规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怎样、人的思想也就怎样。一定要严格地按照社会的生活、社会存在的情况来规定我们的思想内容，然后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反映实际情况，反映客观存在，如果解决问题不调查研究、不使我们的思想反映存在，我们就会犯错误。

2.反对历史的唯心论

这些历史唯物论的特点是与唯心论绝对相反的。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的这些原理时，就不仅要注意这些原理与唯心论相反，同时要注意怎样与唯心论相反。我们一方面要掌握唯物论的原理，另一方面要反对唯心论的原理，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在这种思想斗争中学习，研究历史唯物论就是要与历史唯心论对立起来来研究。因此，除了刚才讲了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外，还要跟着讲一下什么是历史唯心论，我们要反对的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什么东西。

历史唯心论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种：

第一种历史唯心论是把人类社会现象看作是一堆偶然的现象，没有任何规律，因此，他们在社会研究方面崇拜偶然性，不承认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及人类历史。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流行，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在自然科学方面崇拜偶然性，否认规律性，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现象认为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一点科学研究的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和米丘林学派对立的新达尔文学派就是代表自然科学方面崇拜偶然性的学派。米丘林认为动植物种类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可以发现、控制并利用这规律，人可以用外界的条件来影响动植物，使它们发生变

化。反对他的生物学家拼命提出不同的意见，想要驳倒他，他们对米丘林说：你的思想错了，我并不否认动植物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我承认这些变化是不可以找出规律来的。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界有些是有规律的，有些是绝对没有规律的，是偶然的，这样就对一部分自然现象就放弃了科学研究；但是他们对社会历史就认为是完全偶然的，是一点规律都没有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一般都否认社会科学这名称，认为社会研究不能叫科学，因为没有规律可以研究。所以研究社会就按照自己的一套主观的理论来任意解释社会，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明历史，尽管是胡说八道，但是找出几条理由来也就算是一派。

这种思想在中国也是有影响的，首先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全国刚解放时，我们碰到一些大学的社会学者，最初和他们争论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说没有，我们有。有的人在政治上和我们很靠拢，但是他们很长时间还不承认有社会科学，他们说社会科学这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他们现在是没有意见了，不能不承认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了。

这种思想在“五四”以后影响很大，1921年至1922年中国出版界有一个争论，叫做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玄学又可以解释为形而上学，就是否认科学的思想。那时的争论是这样，有一派主张人类生活是不能使用科学的，就是说人类历史没有科学研究的可能，人类历史完全是偶然的，历史变化完全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人生观完全是凭人的自由意志随便决定的，所以否认科学可以运用到研究社会历史上去。这一派是玄学，就是张君勱这些人的思想，很早就是反动的。

当然有人拥护科学，拥护科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唯物论，这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种也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是胡适这一派。

胡适这些人主张可以运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但是他们只是表面上拥护科学。他们所谓的“科学”是假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基础是马赫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认为世界就是人类主观的感觉，没有科学的真理。他们为什么又主张可以用科学来研究社会呢？他们认为科学有它的作用，科学虽然不能研究客观真理，但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感觉，感觉是非常混乱，没有头绪的，我们就用科学加以整理，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把感觉编出次序

来，排出队来。他们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是他们的思想本质还是反对社会科学的，和张君劢一样，因为他们归根结底认为人类社会是人们的感受，没有规律的。所以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工具，而是为了主观的便利而利用的工具。

这两派资产阶级的争论，实际上都玄学对玄学的争论，而不是真的科学的争论。不同的一点就是胡适狡猾一点，张君劢露骨一点。张君劢说人类社会不能用科学来研究，胡适这一派就警告他说：你要注意，群众是很相信科学的，如果你否认科学，就没有人拥护你了，所以还是要装做信任科学才行。所以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科学的假面具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五四”以前资产阶级还有一些科学思想，还相信科学可以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那时一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主要是以进化论为基础，他们相信自然界有进化论的规律，并且机械地把进化的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这样虽然是错误的，但当时起了一些进步的作用，就是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要努力争取进化，不要在世界的生存竞争中，变成被淘汰的失败的种族，应该努力走在进化过程的前面。

“五四”以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完全向帝国主义学了各种各样的唯心论，和科学对立起来了。这种思想一直到解放后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还有这种思想，当然还有些中学教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有这种思想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就是否认社会的客观规律，认为应该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譬如，我们现在碰到反动言论一定要打击它，我们不允许反动言论的散布。对自由主义者说来，这就是不自由，这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独裁”政策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人想怎样，就应该让他怎样。他们认为人类生活是偶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偶然的，所以即使是法西斯的思想也要让他发表，可能法西斯的思想也是正确的，因为社会现象是偶然的，或者偶然马克思主义对了，或者偶然法西斯主义对了。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有区别，他们认为法西斯是独裁要反对。但是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帮助法西斯，所以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在法西斯国家里还可以讲一下。

这种崇拜偶然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还相当流行，在我们中间当然不会流行的。但是也有的同志把事情做好了，就说运气真好；失败了就说真倒霉，运气真坏。讲运气就是崇拜偶然，以为我们的生活是偶然的成功或是偶然的失败。机会主义者也有这方面的情况，机会主义者有“左”

倾向右倾，在革命时，“左”的是冒险主义，右倾是投降主义；建设新中国时，“左”的是急躁冒进，右的是保守主义，这都是机会主义。为什么叫机会主义？因为这一类倾向都是想靠乱碰得到成功，不能严格地按照科学的规律指导工作，也就是说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按照客观的情况来规定我们的工作方法。急躁冒进就是不顾客观规律如何，自己有一个好的理想，就想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好，就要马上实现。农村的农民连互助组都没有，你就要他们排队吃大锅饭，这是不行的。所以，急躁冒进的思想也有碰的因素。有一种人喜欢贪功，希望一下子作出一件惊人的事，也不请示也不报告，也可能碰对了，但这样作终究要碰壁。这种机会主义当然并不就是有系统地崇拜偶然的唯心论，但是这种倾向有崇拜偶然的因素，是不正确的，也就是无意识地把我们的工作看作是偶然的现象。以上所说的是历史唯心论的一种主要的表现。

此外，历史唯心论还有两种，一种是相当于主观唯心论，另一种相当于客观唯心论。

主观唯心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地，是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要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是可以左右历史的。“英雄造时势”，就是这一类的观点、他们把伟大的人物看作是历史上最主要的决定力量。这种唯心论是和第一种有关系的，第一种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偶然的，这一种就是认为偶然出现一个英雄，历史就会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历史，小人物可以影响小一些，大人物可以影响大一些，杰出的人物就可以影响整个的历史，如果出一个很好的人物，全人类就有好处，如果偶然出现了一个很坏的人物，历史就要倒退。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中间也相当流行。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罗素，“五四”时曾来中国演讲，迷惑了许多知识分子。他是一个马赫主义者，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他主张全人类的历史关键就在十几个人身上，如果历史上没有这一些人，如拿破仑、秦始皇等人物，今天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把他讲的奉为经典，认为罗素都这样说，可见“英雄造时势”的话是对的。本来“五四”以前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争论：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争论了很久，好像罗素一讲就作了结论。

这种思想也是崇拜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限制在崇拜偶然的人物上。这种观点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都还是流行的。这种看法相

当于主观唯心论，认为历史可以按照人的主观意志来任意改变，历史不是按照它本身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而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发生变化的。

类似这种性质的思想在我们队伍里也还是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不会有公开的主张“英雄造时势”的人，可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了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的情况常常会发生。斯大林就批评了苏联的一种主观唯心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一定是客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可以制定规律、可以改造规律、可以创造规律、可以消灭规律。斯大林指出这是主观唯心论，因为他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可以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苏维埃政府、党的领袖忽然想起要让社会按这个规律发展，它就按这规律发展，或者忽然想到要创造一种规律，那社会就又可以按照那个规律发展。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看，我们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毛主席偶然想出来的，或者我们的党心血来潮，不要逐渐过渡而要突然过渡，制定一个短时期爆发进入社会主义的规律，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看法就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思想当然没有公开地讲“英雄造时势”，也不是认为一切社会、一切历史的发展就是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限制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认为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的一种很显著的例子，但是这种例子并不是很特殊的，而是有它的根源的。

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批人的思想是这一种类型的，这种思想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人相信就用不着斯大林反驳它了，因为它的影响相当大，有一批人坚持这种观点，另一批人虽然不坚持，但是受它的影响，没有力量来反驳这种思想。

因此，我们不能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就不会有唯心论了，应该说是会有的，而且往往也会流行起来。中国当然还没有斯大林批判的那种主观唯心论，但是毛主席也批判过主观唯心论。在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有一部分斗争是对主观唯心论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反对以感想代政策，反对有些人凭想当然决定问题，这就是主观唯心论的观点。有些干部就有这种荒谬的思想，以为英雄伟人的感想可以支配环境，以为自己是负责的干部了，我想怎样就应该怎样。有人是公开这样讲，有人是不自觉地这样讲。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看法来检查我们队伍里的思想情况，就可以发现：一直到现在，有许多人还有这样唯心论的思想，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

问题。解放初期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是因为解放后干部提拔得很快，有些干部凭自己的意志作工作。在西南，邓小平同志就批评过有一大批干部是凭自己的意志作工作，以为自己负责了，就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左右历史，这就是主观唯心论。我们自己是否有这情况，恐怕也难免。这就是相当于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

另外，还有一种相当于客观唯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斯大林批判过的，认为历史的基础是“永恒的正义”，“普遍的道德理性”。这种思想并不认为历史是可以依赖个人的意志随便转移的，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基础，但这基础不是物质的，而是思想的原则或精神的原则，或是什么公式。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按照某个公式发展的；是由客观的精神决定的。

这种客观的意志如果讲穿了的话，就是上帝，什么人在这力量能够规定这永恒的道德呢？当然没有，只有神灵的上帝，在中国就是玉皇大帝、阎罗王，他们有生死簿可以规定人类应该怎样生活。所以这种客观唯心论和宗教迷信是无形中有联系的。

“普遍道德”、“永恒正义”是不是真的呢？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这东西，而是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思想家自己想出来的。他们的所谓“永恒正义”、“普遍道德”并不是真正拥护真理，而是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想出来的。所以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唯心论的历史家，都有他自己阶级所喜欢的那种“永恒正义”和“普遍道德”，他们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考虑什么是“普遍的道德”的，所以实际上这种“普遍道德”就是一个阶级的道德。

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些思想家就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规定什么是“普遍道德”的，孔子儒学的思想就很明显。孔子是第一个企图要给社会规定一些永恒道德的原则的人，他认为应该遵守的“永恒道德”就是封建道德，企图按照封建秩序给全世界排队，他想把队伍排得比较稳定，使阶级斗争不太尖锐。地主应该剥削农民，但是剥削要有一个限度，不要使农民造反；农民应该养活地主，不要反抗地主。孟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没有君子不能治野人”，君子就是地主、统治阶级，野人就是农民。

“没有野人不能养君子”，就是说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需要的，他的理想就是劳心劳力的能够很调和地在一个社会生存。孔子也有这样的公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作皇帝的要像皇帝，臣要像臣，各排各的队，不能平等，要有一个封建等级观念。封建社会的“永久正义”，“普遍道德”就是希

望使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能够很调和、永久维持下去，不要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就是他们的天经地义。

资产阶级也有它“永恒的正义”，斯大林说的“普遍道德”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永恒的理性”、“普遍道德”这些名词，是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最初提出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它的思想家就主张反对封建秩序，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这种合理的社会就是要符合“永恒正义”和“普遍道德”。

什么是“永恒的正义”？资产阶级所谓“永恒的正义”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从资产阶级革命最初时期起，资产阶级就叫喊“自由”，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还自称为“自由”的国家，法西斯的统治已经弄得人民动都不能动了，他们还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国家。他们认为苏联和我们都不是“自由”的国家。我们看起来这很奇怪，实际上研究一下他们认为的“自由”是什么，那就不会奇怪了。因为他们讲的“自由”和我们讲的自由不一样，我们讲的自由是认识必然的自由，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就能够坚持争取这种社会，因此我们就能自由，这是唯物论的自由。

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和我们所讲的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财产的“自由”。所谓个人主义的“自由”就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最好是一个人生活不要受周围的影响。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时，英国就有人写了一篇小说，叫作《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一天坐船到海里，碰到风浪，流落在一个小岛上回不了家，同船的人都死了，他就把船上的东西搬到岛上，在岛上他一个人生活了十八年。旧社会里就描写他一个人在岛上生活了十八年的英雄历史，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理想的表现。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这样主张：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权利，人生来就不应该受周围的限制。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当然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没有这种孤立的、个人的那种所谓“鲁滨逊式的自由”。鲁滨逊不过是小说，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事，即使有这件事，也不能证明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理想，因为他在岛上十八年还是要回到社会上去；他能够在岛上生存，就是因为社会给了他船和一些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有一支猎枪，能够使他在孤岛上生存，否则早就被野兽吃掉了。

所以，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空想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没有运用到世界上，资产阶级不能在革命胜利后规定一条：把每一个人都摆在孤岛上。因此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要他们组成社会时，他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自由，就是用私有财产来解释自由。他们说，自由就是要有权

利支配自己的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规定的宪法或宣言，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看作是保证自由的重要的一条。有财产就有自由，有多大财产就有多大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意思。

私有财产既然是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没有财产也就活该，有财产的人可以任意压迫人，为非作歹，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受压迫，这就是资产阶级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所谓“自由”。所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称为“自由”国家，分析其实质，就是金融寡头、大资本家的自由，自由要按照他的财产的多少来规定，金融资本家就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被他们所垄断。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没有自由，你没有财产，你就有出卖劳动的自由、受剥削的自由。

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一定要说苏联没有自由，中国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很自由，要杀人就杀人，要压迫人就压迫人。他们想打仗打不起来，所以他们反对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运动，因为限制了他们想打仗的自由。我想侵略殖民地、组织东南亚集团、东北亚集团，把小丑蒋介石、李承晚和日本天皇组织在一起，因为有你使我组织不起来，所以一定要反对你。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他们的所谓“永恒正义”、“普遍道德”，从资产阶级进步一直到垮台，私有财产是他们唯一的最主要的自由。这是了解今天世界情况所需要知道的一个原则。

资产阶级的学者有这种客观唯心论，他们认为历史应该按照私有财产、自由意志、自由道德的原则来发展，社会应该按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建立。如果有一种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他们认为那是不正常、不合理，也不会长久的。任何社会都应该有私有财产，甚至应该有资本，譬如原始社会，原始人拿一块石头抵抗野兽，这石头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是他的资本。资本是用来剥削人的手段，但是他们想掩盖资本的本质，甚至说野蛮人的石头也是资本。这就是客观唯心论的一种历史观点。

这种观点在我们队伍里有没有呢？公开地有系统地主张历史是按“永恒正义”的原则发展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把某种一成不变的公式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固定原则，这种看法往往会发生，不自觉地有这种看法。教条主义思想的性质就类似这种思想，以为人的生活，人的历史是按照一定的公式或原则发展的，所以只要在书本上找到了一两个公式，就可以运用这公式来解决问题，就不需研究历史的本质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性质是主观的性质，以为有一个

固定不变的公式支配我们的生活，教条主义当然不是主张人的意志可以随便改变世界，但他们认为有一种客观的公式在支配我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就不去具体地研究我们周围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多余的。

关于唯心论大体上就是这几种，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要反对许许多多的唯心论的历史观点，要反对崇拜偶然性，反对靠运气、靠碰来生活和工作，反对以感想代政策，也要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

3.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是一方面，是最根本的一方面。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只有这一方面，还有第二方面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论还要承认社会意识、人的思想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社会的思想意识本身虽然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它也可以反过来对社会的存在发生一定的作用。所以总起来讲，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是相对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影响存在，是相互作用的。

如果只看到第一方面，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那就是机械决定论，也可以叫片面的因果观点，没有看到社会意识反过来又成为原因，来影响社会的存在，所以应该从相互关系上看。这是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必须注意的一点。

但是，如果只注意到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就是唯心论，唯心论也是有原因的。只是注意到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只看到精神对物质的关系，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完全不注意到这一方面，就又变成机械决定论了。这种机械的观点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又会引起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自发论。这种错误也可以说是与宿命论的性质相近，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八字好就好，八字坏就坏，人主观的活动不能起任何作用。

法国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就有一点片面性，有一个法国的唯物论者就是这样主张，他说人类生活、人类历史是完全被物质决定的，所以很可能某一个皇帝的胃口不好，也会使历史发生很大的影响；某一个将军的脑神经里有一个分子活动得不正常，就可能使战争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或者某一个皇后的情欲特别厉害，也可能使政治上发生根本的改变。他有一点根据，就是法国革命以前，路易十六的小老婆特别厉害，皇帝很受她迷惑，因此这个小老

婆除了皇帝很爱她以外，她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些将军来往，她很喜欢一个将军，她在政治上经常袒护这个将军，而那将军经常打败仗，皇帝受她的蒙蔽，政治上就受到影响；还有很多宫廷的官吏和皇后来往，他们压迫人民很厉害，生活很腐化，皇帝听信小老婆的话，对这些事情都不管，因而引起人民的反抗，最后引起法国大革命。这个法国的唯物论者就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于法国皇帝喜欢一个小老婆，受了小老婆的影响而引起的，如果法国的皇帝没有这小老婆，革命就不会产生了。

过去历史上的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还有，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类的意识，社会主义既然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什么马克思还要组织共产党、还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想难倒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还很狡猾地举了一些例子想来辩护自发论，他们说：月蚀这件事情是必然的，试问我们人类是否为了必要而组织一个月蚀党？如果不需要，为什么马克思还要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组织共产党？

马克思反驳了这种错误的思想，他说：你这位先生的譬喻打错了，因为人的事情和月蚀不同，社会和自然不同，自然界的运动是没有人参加的，自然界的规律是完全盲目的，所以月蚀当然用不着人去促进，但是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意识是人的意识，所以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占很大的地位，因此是否组织党、是否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普列哈诺夫也写了一篇文章来反对他们。

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时候，这问题已经没有了，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初期又碰到了自发论，列宁就写了《怎么办？》，斯大林就写了《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都是批驳这问题的。斯大林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但是首先要碰很多的钉子，走很多的弯路，遭受很多的痛苦。而且你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是要和资产阶级思想分裂而进行思想斗争，这是很必然的，完全没有一种思想上的直接指导是不可能设想的。因此我们应该早一点宣传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更顺利些。

列宁就是在这时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提出了这要求，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就不满现社会的制度，但是这种要求要变为一种运动，变为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不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所欺骗，就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

没有这种理论，物质条件提出的要求就不能变为运动，如果社会生活没有群众运动，那么这种要求就不会实现，始终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含必然性，但是必然性不能成为现实性，现实性就是已经显示出的必然性，而可能性就显示不出现实来。所以，要把一种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把社会物质生活已经提出来的要求变为群众的运动，就一定要通过人们自觉的活动，就要有理论指导。所以自发论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自发论。

经济主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想来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宣传一种自发论的思想；还有一种客观主义也是这样。在俄国革命初期，这些思想都是想利用一种片面的唯物论的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作片面的解释，宣传自发论，取消党的作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阻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如果列宁、斯大林在革命初期不和这些倾向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不能展开，布尔什维克就不能胜利。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自发论往往还是有的，不重视理论的思想，在我们许多老干部里还是有的。我们碰到有些刚来马列学院的同志，他们怀疑理论有什么用处，说过去我没有学理论，工作还照样作，而且作得还可以。学了理论可以增加什么呢？这种思想说它是自发论，帽子太大了，因为他不是有系统地主张这一套思想，所以不一定是自发论；但是这里有自发论的因素，有自发论的倾向。有自发论倾向的人，如果遇到一个自发论者向他宣传自发论，他就会被俘虏，因为他们的思想性质是相同的。

所以，在我们学习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就不能忘记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能够推动物质生活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够阻碍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这两方面？因为社会意识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新的、能够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所提出的进步要求的，这种社会意识就能够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起推动作用；另一种是旧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保守的要求、反映反对势力的要求的，这种思想意识就对物质生活条件起阻碍作用。

思想意识的性质并不是它自己本身规定的，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规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件事：保守的、落后的代表过去的势力；新生的、前进的代表新生的势力。就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也有这种矛盾。物质决定精神，但是精神反映物质时，按照它的特性对物质生活条件起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的进步要求的，这要求就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反对资本主义就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变革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社会思想意识中很重大的作用，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这种作用，一定要注意这种作用，而且一定要利用这种作用。

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这样。

4. 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

历史唯物论不仅仅一般地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还具体地找到了什么是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历史唯物论所以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点，而不是假的，就是因为它具体地找出了什么是社会存在。

除了历史唯物论外还有一些唯物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科学的唯物论的观点。机械决定论表面上好像也是唯物论，但它是不科学的，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还有一些历史观点，就是斯大林批判过的人口论及地理条件论等观点，一种人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口，另一种人认为是地理条件。人口和地理条件是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也是人类社会需要的一些条件。但是，历史唯物论是否就把人口、地理当作是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呢？历史唯物论就不是这样看，历史唯物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特点就是能够和人口论、地理论区别开来，把不正确的、非科学的、似是而非的唯物论观点加以区别。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学除了唯心论外，还有机械决定论、人口论等，都是应该反驳的。十八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学者马尔萨斯主张人口论，他第一个提出有系统的理论，他的主张就是认为人口的发展比生活资料的发展更快，人口是依照几何级数增加的，而食物的增加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的，所以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粮食不但赶不上人口，而且往往还要降低，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是逐渐减低的，土地肥沃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下降的。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资产阶级经营农业不像经营工业那样积极，土地的地租相当重，搞农业不易得到利益，所以资产阶级经营农业就不很注意培养土地

的力量。由于资本主义有这种情况，他们就制造这种谬论来宣传人口论。因此，所有法西斯国家都利用这理论作为侵略的藉口。

苏联的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不是这样，苏联人口的增加是很快的，但是粮食的增加比人口更快，1928年苏联每人平均可分到粮食一千斤，但现在每人可增加到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斤，还是粮食增加得快。况且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没有把农业作为重点，最近两年才作了决定，要把农业生产作为重点。

地理条件的说法也是资产阶级国家里很流行的，上面也提到一些。地理条件的谬论常常被一些人拿来和历史唯物论混淆起来，普列哈诺夫就有地理理论的因素，他有一套想法：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进步，生产关系又被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由什么决定？最后说生产力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地理论。

中国也有一种荒谬的思想，梁启超把过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出身的家乡都是很好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家乡都是有优点的，要找都可以找出来。北方说它坏是空气干燥，说它好是不怕水灾，怎样说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就说：许多伟大人物的家乡地理条件都是很好的，可见地理论的观点有些道理。想用地理条件来取消历史唯物论。

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倾向？还找不出来，不过有时我们作工作太注意环境，太重视地理条件，不重视主观努力的情况还是有的。

5.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历史唯物论所以成为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因为它根据社会本身内部的物质条件来找到历史发展的原因，这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历史唯物论就是肯定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强调或看轻了这一点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

生产就是人类为了取得自己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所进行的劳动。有的劳动不一定是生产劳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有些资本家发表了这种议论，人家说资本家不是劳动者，他很不服气，他说：宪法上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有养老的权利，如果资本家不是劳动者，就不能享受这些权利了。我们资本家也很辛苦，有时晚上都不睡觉，怎么不是劳动呢？我们说，当然也是

劳动，但是这不是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劳动，而是为了利润劳动，所以不能叫劳动，也就不能叫作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可以叫劳动，但还不是第一线的劳动。知识分子的劳动可以间接帮助劳动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科学家可以改进技术，艺术活动可以帮助鼓舞劳动热情。

所以，生产就是人类为了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劳动活动。当然，广义地讲作工作就是生产。有些同志来学习，就叫脱离生产，但是如果你写科学文章，说我从机关脱离生产来学习，那就不对了。所以对生产的意义应该划一个界限，要把科学上所讲的生产和我们一般所讲的生产加以区别。知识分子的劳动严格地说也不能叫生产，当然也可以说是生产精神生活的资料，但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辩证法有一条规律：一切东西都是在联系中存在的。生产是怎样联系的？生产所以能够进行，就是靠两方面的联系，就是对自然界的联系和人与人的联系。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联系就谈不上生产，鲁滨逊一个人在岛上生活，就是由于在他来到岛上以前和人有联系，并且以后他又碰到一个黑人，收为奴隶，形成主仆的联系。对自然和人与人这两种联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讲生产时一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联系。

生产力是指的人和自然的联系的这一方面，人要取得生活资料，就一定要从自然里去找，要靠劳动。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就是依赖自然界现成的物质资料来生活，动物不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而人就是要大大地改造自然，经过劳动进行生产。米丘林说：我们人类不要等待自然的恩赐，而要主动向自然索取。这话是对生物学讲的，但是也可以把这意思扩大来说。人和动物不同，就是人和自然联系时是有自己劳动作用的，自己主动地直接地改变自然界，是一种生产的联系，动物是没有生产的。这种生产就是征服自然界的活动，是从自然界取得自己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使自然界服从自己要求的活动。这种活动的量在人类历史上是会发展的，这就叫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由两个条件决定，一个是生产工具，另一个是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这就是生产力的要素。

有没有其他的要素？没有。从前有一种说法，生产力有三个要素，除了生产工具和人以外，还有劳动对象的要素。在斯大林的历史唯物论以前，一般的都认为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要素，但后来研究的结果，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对象归根结底就是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如果说劳动对象就

是一种生产力的要素，意思就是说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也是决定生产力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由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决定的。归根结底这结论就和普列哈诺夫的一样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自然界根本是变化很少的，差不多等于没有什么变化，而生产力则发展得很快，过去旧中国地大物博，为什么生产力不发展？新中国照样也地大物博，为什么生产力就发展得很快？这是一点也不能用自然条件来说明的。新中国生产力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社会改变了，我们国家能够在农业、工业中使用新的工具、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能够掌握新的生产经验。这两个条件就是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决定要素。

此外还要注意，劳动对象是我们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对象，并不是生产力本身。譬如打仗，我们有战斗力是因为我们运用了武器、有掌握武器的人提高了战术，再加上我们战斗的对象，合起来就有战争。能不能说敌人也是我们战斗力的要素？很明显，敌人绝不是我们战斗力的要素，敌人是我们战斗力发生作用的对象。我们战斗力的要素第一是武器、第二是战士，能够掌握武器，有高度战斗经验，战斗热情的战士。这就是决定我们战斗力的要素。敌人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有一个作用，战斗力的发挥、战斗力的表现可以看敌人的情况来决定，敌人强一些我们的战斗就有一些困难，敌人弱一些，我们的战斗就很容易；敌人弱一些看不出我们的战斗力，比较强的敌人反而可以看出我们很高的战斗力。所以敌人只能起一种表现我们战斗力的作用。所以劳动对象并不是生产力的要素，而只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对象。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发展生产力靠什么？要靠我们能不能改进技术，能不能使工人掌握技术。当然调查地理条件，调查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调查了还不等于有了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还是要有工具、有人。我们的技术革新运动靠什么？主要有三点：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和改进劳动组织。劳动模范王崇伦、张明山都是改进工具的模范；还有提高操作方法的，如郝建秀，她没有改进工具，但她能够运用工具提高劳动技能。从前也有用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的，但是我们不看重，我们认为这是生产竞赛开始时的自然现象，但不能依靠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

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即1928年至1935年间，主要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另一个口号是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就是把苏联的工业用新的技术新的工具装备起来，干部决定一切是要有掌握工具的干部。再没有第三个口号。

关于人和人的联系，就是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人在生产中必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人要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单独的个人是不能进行生产的。小农业、手工业也不能是绝对的个人生产，个体生产是小规模的生产组织。这种人和人的生产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就是进行生产时所必要的东西为谁所有，是少数私人所有还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与生产资料分不开的人和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的关系，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还是劳动互助合作的关系。其次是生产品分配的关系，生产出来的东西要维持大家的生活，就要分配。这个关系是由前面两种关系决定的。所有权的关系不同，人和人的地位的关系不同，分配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人和人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就可以用按劳取酬的方法来分配；但是，如果生产资料是少数人所有，多数人没有，人和人有剥削的关系，分配也就不同，劳动者只能得到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剥削者可以得到所有剩余劳动的产品。

这三种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回答说：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基础。

各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剥削阶级统治劳动者，劳动者不能不服从的剥削关系；另一类是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原始公社、社会主义社会和集体农民是互助合作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还有一类是由统治与服从过渡到互助合作或由互助合作过渡到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后者就是原始公社末期的家长制度的农业公社的关系，即由互助合作的关系走向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在家长制度里有前后两种生产关系的因素，最初家长制度的组织还是家族的组织，生产资料还是公有制，所以还是互助合作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了这种因素后首先家长的权力很大，在分配时家长就有可能多分配一些，另外在家长制度里已经开始有奴隶的使用了，这种就是家庭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就是作为农业公社里劳动的帮手，甚至家长也要劳动，所以奴隶就不成为主要的生产劳动的担当者，两种都有，这就是过渡性。中国有的地方几千年来这种制度都没有彻底消灭。有的地方虽然基本上是封建的，但是家长制度的影响还有很大的遗留成份，譬如买东西是一个大家族来买，

但是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分配，或者家里有人出去作官，回来时就要把箱子打开，每个人分配一点。这是原始公社的残馀，这种过渡在中国社会里时间还是很长的。

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比较低级的生产合作社，就是半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由什么决定？就是看他是否按劳分配。半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都是土地先要分红，然后再按劳动力分配。有些生产合作社是完全按劳分配，不管你是否加入了土地和工具，你参加合作社以后，就要按照你的劳动分配，做多少工作拿多少产品。这种生产合作社北京周围也有了，但现在还不能普遍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算不算过渡的形式？过去曾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的。能否普遍这样说？还要慎重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形式。是否叫过渡形式？这问题在科学上理论上还没有作结论，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作肯定的答复。如果不是写科学文章，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讲。这种制度就是逐渐排挤资本主义因素、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是有一点过渡性的。这两种因素并不是机械地并存，而是一步步地统一在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公私合营不是两种经济机械地合作，而是可以看出两种体系逐渐带有过渡性。现在资本家对我们宪法的四种所有制不满，说是应该加上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如果我们太强调这一点，就容易被资本家所利用。

我们解释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时，有完全社会主义的，有半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不能说还有一种劳动者的半集体所有制。过渡的生产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集体所有制，而是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为了不在实际生活发生误解，我们在讲劳动者集体所有制时加上半集体所有制，对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那样说了，只能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关系。所以在范畴上讲，我们说是四种所有制，这里面可以有过渡的东西，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合作以及全民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合作。国家资本主义说是过渡的所有制，可以这样讲，但不需要讲得太多，因为这问题在科学上理论上还没有作结论。

第04章 辩证法问题解答

(1954.11.05)

【这是艾思奇给马列学院十至十四班学习辩证法时所提问题的解答。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

今天我们解答辩证法的问题。

01.关于全面理解一切依地点、时间、条件为转移的问题

有些同志问：怎么样来了解一切依赖地点、时间、条件为转移这个概念，地点、时间、条件这些概念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分割？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了解：就是地点、时间、条件在任何一种事物当中都是联系在一起不能够分割的。特别是条件就是包括时间条件、地点条件。条件是一个总的概念。条件就是一种东西发生、发展所依赖的一些重要东西。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首先就依赖于全民所有制，也依赖于工人阶级政权。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所依赖的这些东西，就是它的条件，就是它生长发展的条件。

任何一种条件都有时间性、空间性。时间条件可以说是历史条件，历史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条件，是历史上的联系。比如，社会主义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依靠资本主义里出现的大工业。有了这种前提条件、历史条件，才会产生社会主义；空间条件就是环境，就是周围的联系。

时间条件是历史上形成的关系，过去历史所准备起来的条件，叫做历史条件、周围环境的联系叫作空间条件。比如我们的环境条件很好，世界形势很好，对社会主义建设就比较方便。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就不好，因为要打仗，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推迟了。俄国革命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这也算是空间条件。地点条件也是空间条件。

任何东西都在时间、空间当中存在。时间、空间都是具体的。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任何东西都在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当中存在。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之外，所以应该联系起来。

那么，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个概念是不是跟第四个特征有矛盾呢？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了承认一切都依赖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就否认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内部？能不能这样说呢？

当然不能够这样说。因为辩证法第一个特征就是笼统地讲到事物存在和发展方面的联系。我们说事物的运动是联系的，一般只谈到了联系。因为这种认识才是初步的认识，所以只看到一般的联系，还没有从一般的联系里面分析出来内部和外部。所以，讲联系，讲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并不错。因为第一个特征已经包括了内外，还没有分内外，因为认识还没有深入到内部。讲第一个特征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一条并没有违背第四个特征的原则。

第四个特征更深入了，认识更深入了，能够分清内外的区别，内外的联系。这都是造成事物发展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是内部原因。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第一个特征。一般研究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只认识这一点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区别，只有更深入地认识之后才能区别。

所以，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到矛盾时就很有分寸。他说：辩证法认为要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其他事物的联系来看出问题。并且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他在讲到矛盾的时候讲到外部，就是一事物和它事物的联系，而不是讲一般的联系。毛主席说事物内部的矛盾才是根本的原因，但并没有说联系是次要的原因。他不是讲一般的联系，而是讲一事物和它事物的联系，没有讲一般的联系都是次要的原因。因为联系有内部和外部的区别。内部联系就是内部矛盾。

所以，研究第一个特征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已经包括了内外，不过这个时候认识的比较浅，内外就不能够加以区别，只能够研究各种各样的联系。至于那种研究更重要，在初步研究的时候不能够这样作。但是，在研究第一个特征的时候，就已经应该把内部条件当作最重要的条件。实际上这样还不能分析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决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肯定了生产是决定的条件，而不是外部的地理条件。初步研究的时候，就要抓住生产这个内部条件作为最重要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生产起决定作用，还不等于了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初步研究之后抓住生产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再进一步研究，才能够了解生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是有矛盾的。矛盾是生产发展的原因，也就是引起社会发展的原因。

所以，对第一个特征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第一和第四个特征的不同，就是研究的深度不同。第一个特征一般地讲联系。第四个特征是内部和外部联系的区别，而且把矛盾加以分析。

有些同志问：既然我们承认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那么，如果我们的工作条件、工作情况跟党的政策、指示不符合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改变党的政策、指示？

提出这个问题讨论是很对的，这样讨论就联系实际了。

我们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个原则，不能够作为我们任意改变党的政策的藉口。

这样说还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呢？就是因为首先你说的情况和党的政策不一致，那就要首先了解是什么情况，究竟这个情况不一致到什么程度，是完全不一致，还是部分不一致。如果不是完全不一致，或者只是某些部分不一致，那就不能因为某一些不一致而强调特殊性，就不接受党的指示。如果这样作就错了。

我们有很多在下面工作的同志在接受上级指示时，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在没有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以前，在1947年以前，地方主义很厉害。地方主义就是不管上级指示怎么样，要怎么样干就怎么样干。他的理由就是地方情况特殊。

也有一些人因为怕困难。因为凡是完成任务就都有困难，就把困难当作特殊情况。因此就随便改变上级指示，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完成任何一个任务都要克服困难。如果把困难当作特殊，当作情况不一致，那是错误的。

当然，如果情况的确完全不一致，比如上级要你组织生产合作社，可是你那个地区还没有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还在统治着，这就是上级有主观主义，这种指示当然可以考虑改变。

如何改变呢?我们的组织原则大家都懂。就是有一定的组织程序,要请示报告。提出来之后,不能不管上级怎么样,自己就任意干一套。这样任意干一套,就是干对了,那么在组织原则上也是错误的。任意干的结果也可能干得不对,或者你所谓的特殊情况不是特殊的。

所以,当你认为情况完全不一致的时候,还要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真正不一致,要请示报告,一定要慎重,上下要沟通。如果真有不一致,就应该以为人民、为党负责的精神提出来,即便是上级不同意,也还可以坚持提意见。但是,也有可能是你错误了。四中全会时说:有人为自己的认识和上级不一致,但自己认为是对的,所以不管上级的认识怎么样,就自己去干,这样就错了。如果自己对了,上级不对,那么也不能自己干,就要一方面提出情况,要依照一定条件来决定,如果条件和上级指示不一致,就应该改变。改变时应该考虑整个的条件。因为整个国家是统一的,党是统一的,那么,我们改变指示、政策就要不违背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在这种条件下来改变。

02.关于认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

有的同志问:以前我们中国用了苏维埃这个名词算不算教条主义?

这个名词我们现在不用了。但是不是教条主义,这个关键并不是在用苏维埃这个名词上。毛主席作了苏维埃政权的主席,但毛主席并不是教条主义。

苏维埃这个名词就是指的工农苏维埃。我们那个时候用苏维埃这个名词,是列宁的号召。列宁在第三国际中讲:殖民地的人民运动应该产生跟资产阶级的联盟,但是一刻也不要放弃争取领导。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要解决苏维埃政权的问题。

教条主义不在于对于名词的运用上,而在于运用这个普遍真理时,不跟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甚至把我们的转变看成是几天的事情,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转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有的甚至把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了,甚至于两个阶段不分,这就是错误。

当然,那个时候可以不用苏维埃这个名词。那个时候我们的党还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我们要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所以临时用了这个名词。当然这个名词也不是最恰当的,不过它还是可以起些作用的。

还有的同志问：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关系怎么样？有的同志说，教条主义俘虏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排斥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轻视实际，经验主义重视实际，这话对不对？

教条主义俘虏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排斥教条主义，这一句话有一些对，但是说教条主义轻视实际，经验主义重视实际，这一句话就不对了。有经验的就看不起教条主义，有老子天下第一的认识，可是教条主义也有厉害的地方，就是有书本，有马恩列斯。经验主义虽然自认为第一，但是拿不出来马恩列斯，结果只好向教条主义投降。虽然看不起书生，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对自己的主张找不出来很多的理由，而教条主义就有一些理由。因此就能够在和经验主义互相排斥的情况下战胜经验主义，俘虏经验主义。你了不起，但是你不懂得马列主义，这样一讲，经验主义就自然低下了头。教条主义所以有势力，就是有些经验主义者无可奈何地服从它了。

而且钦差大臣无论到哪里总是下马后不讲一天，也要讲三、四个钟头，地方上有经验的人只看到这个人能拿出来一套东西，有两下，就说我们就讲不出来。在陕北高岗批评教条主义时就说有一些地方干部就产生这种思想。过去朱理治派到陕北，一下马就讲了一天。有的人说：这个人了不起，一讲一天，讲得我们都不懂。这些人下马伊始，这里也批评，那里也批评。

饶漱石作政委的时候打击陈毅同志。像这样的人他就不用讲一天的办法来打击人，他就表面上拉的很好，在背后再讲坏话，暗中挑拨，觉得成熟之后，自己就走掉了，让别人来排挤陈毅同志。

这是阴谋活动，不是教条主义，采取阴谋活动夺取领导，排挤有能力的干部。

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不同，因此，互相反驳的情况是有的。而且教条主义作了胜利者，如果不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就不会觉悟，就不会抬头。

但是，说经验主义重视实际，这也是不对的。只能说经验主义者有些经验，不能叫作重视实际。重视实际应该是任何时候都重视实际情况，如果注意实际情况，就没有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经验搬家。我们有的同志把东北的经验搬到云南，这就是不重视实际条件，有实际经验，但是并不等于重视实际。因为他只重视概括了的经验，并不重视实际。

实际是什么东西呢？

实际是客观规律，是周围的一切具体条件。而重视了经验，就不等于重视客观规律。所以，不管教条主义或是经验主义都不重视实际，都不了解一切依赖地点、时间、条件为转移这一原则。如果经验主义懂得了，那么经验主义就不成其为经验主义了，就不会被教条主义俘虏了。如果懂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解决问题，那么教条主义就吓不住他了。所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有共同点，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

另有些同志问：教条主义是不是由骄傲自满来的？教条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教条主义不一定是由骄傲自满来的，骄傲自满可以产生个人野心，可以出高、饶。所以，骄傲自满并不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了，不管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有些自满，如果不自满，就虚心了，虚心了就有可能改进自己。教条主义者有些自满，但这不是直接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

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

不是知识分子会不会产生教条主义呢？

不会的。工农干部不会产生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全是一些知识分子，主要是到过苏联的。他一定是没有任何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没有经验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就是教条主义，他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不会产生教条主义。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因此他看问题是片面的，他相信个人，相信自己读了几本书。所以，产生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加上没有经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有经验就好一点，没有经验就不能不片面，不能不犯教条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理性认识、把书本知识，把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的作用片面地夸大，就产生了教条主义。

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要改变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改变个人主义的立场，不要把书本知识片面地看成有绝对性的、无条件的、到处可以运用的。不这样作，就可以避免教条主义。

03.关于理解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的问题

先讲因果规律的问题。

凡事都有原因，没有原因的事情是没有的。因是主导的，果是受导的。因作用效果，但是果也最后反作用因。那么，这个反作用是怎么样的呢？

具体情况就不能够一概地讲，就要看情况。有的情况是这样，因产生了果，果已经出现之后又反过来变为因，又对原因产生一种结果。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就是这样。物质是原因，产生了精神这个结果，精神是物质的反映，那么，等到精神反映了物质之后，又反过来推动物质的发展，又成为原因。果变为因，因果互相转变，这样就成为一种相互的作用。

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产生了一定的结果的时候，这个因的本身也受到了影响，并且是立刻就受到了影响，这个反作用立刻就表现了。比如说，一种运动着的物体遇到了不运动的东西，这个不运动的东西立刻就运动了；反过来运动的物体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运动就迟缓了，甚至就停止了。这就是原因产生了结果，这个结果同时就使得原因受到影响。所以这也是相互作用。如果不用全面的因果观点来看，就不能全面地解释事物。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因。中国被侵略，这是果。可是这个果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又使帝国主义垮台，果又变为因，又产生了一种结果。

一个人骄傲就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失败；可是失败也可能反过来对骄傲有影响，使得骄傲减少一些。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问题就看哪一方面是主要的。比如说骄傲引起了失败，失败主要是骄傲的结果，但是失败又成为原因，对骄傲又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面我回答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

既然必然性是运动里面很确定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但偶然性是运动中间一些可有可无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按照一般的规律，封建社会必然要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在中国，因为帝国主义侵入之后，就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偶然的原因起决定作用呢？

这个问题提错了。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因为跟我们的原则没有关系。因为他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看作是一种偶然的事情，这是错误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是一种外来的矛盾，但是外来的矛盾并不就等于是偶然的東西。不要把外来的东西简单的跟偶然的東西划一个等号。当然，偶然的東西多半是

受外来的影响。但是，这种外来的影响只能是很微小的因素，一种个别的东西，很小的事件，才叫作偶然。这种外来的影响不能根本地改变它的规律，这才是偶然的東西。

比如，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两年忽然闹天灾。闹天灾就可能使封建社会不稳定。因为人民困难的时候就要起来闹；但是天灾不会决定封建社会的垮台，只会影响封建社会发生一些波动，但是这个影响不起根本的决定作用。这种外来原因是偶然的。天灾对社会多半不会起很大的影响，也可能有时候发生很大的影响。

至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就大了。它把历史发展引导到一个相当曲折的道路上。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发展了，就要侵略中国。这个力量很大，把满清时的闭关自守冲垮了，就不得不接受它的条件，造成了一种新的必然规律。规律是由很重要的条件决定的。

帝国主义使我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至于俄国革命的影响也不能说是偶然的。俄国革命是外来的，但是这个影响很大，使我们的国家走上了新阶段。

所以，不要把偶然这个东西和外部的原因看作是一件事情。偶然的原因是很小的东西，对事情发展的根本方面没有改变。

04.关于理解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问题

首先是对新生的事物和旧事物如何区别？新生的事物是不是就是发展阶段中的事物？

这个提法不算错误，但是不很完全，没有表明新生事物是在生长的。新生的事物就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旧事物就是正在衰亡的东西。在哲学上一般讲正在生长和衰亡着的東西。哪怕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東西，有些東西如果它不是正在生长的，一生下来就要衰亡，这种東西不叫新生事物。比如生出来的怪孩子，这是破天荒的，但不是新生的事物，因为他不能生长，不能发展。

如何看出它是正在生长的呢？

那就要看是什么具体的東西。

看新生的事物是不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当然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说，认识新生事物这件事情本身，就表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够认识新生事物，就表明了立

场、观点、方法是有错误的。哪怕是对新鲜事物没有感觉，这就表明了立场、观点、方法有些问题了，不能说是根本地变成了反革命，但至少是立场不稳了，不坚决了。所以，斯大林说，对新鲜事物的敏锐的感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宝贵品质。失去了这种感觉，这种品质就逐渐丧失了。丧失了这种品质不一定立刻就会反革命，但可以说立场不坚定了。

有的同志说：如果这是品质问题，那么为什么刘少奇同志不写进共产党员八条标准里呢？

因为少奇同志是写共产党员八条标准，不是写哲学，用不着用哲学的名词来说明八条，但是，如果仔细看，就包含着哲学，在八条里面就找得出来哲学的因素。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都跟认识新鲜事物，反对旧的东西有联系。

我们学习哲学，不是为了讲名词，而是为了领会精神实质，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贯穿这种精神。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员的品质。我们大家要注意，学习哲学不是为了摆名词，而是为了领会研究问题的方向，懂得了这个方向就不需要到处讲新生的、矛盾的这些名词。

我们看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里面到处都是哲学名词，毛主席的一些文章里面，有的整篇都是讲实际问题，就只加上一、两个哲学名词，就是画龙点睛一下。我们学习哲学就要会领会这种方法。不领会这一点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如果无论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搞上几个哲学名词才过得去，这样就会弄得用抽象的词汇代替了生动的东西。

群众拥护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新生的东西？

这也不一定。群众拥护的东西大体上是新的，但有的时候群众也有落后的，比如群众拥护宗教，这就不是新生的东西。所以，新生不新生这不是人的主观能确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不断生长的东西。凡是新生的东西，总可以成为群众的东西。

中国资产阶级有积极的因素，那是不是能说资产阶级是新生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资产阶级有积极的作用，并不等于就是新生的东西，因为整个地来说它是正在衰亡着的，它的积极作用一天天地小了。当然在没有死亡时，它就有一点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它仅有的一点作用。

能不能说生产力就是新生的东西？生产关系就都是旧的？

也不能够这样说。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一致的，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问题呢？

这就是机械地套，把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新与旧划了一个等号。如果可以相等的话又何必用两套名词呢？用一套就可以了。所以，凡是用不同的名词，就有不同的作用。在其他的问题上我们也要注意一点。

有的同志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是就等于物质和精神，就是第一性与第二性？

当然，如果讲什么是决定的，什么是被决定的，这一点有相同点，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精神。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等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有同志问原子弹是不是新事物。我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会有同志说，为什么苏联还制造呢？

我们说原子能这种科学是空前的、新生的东西。美国是想阻碍原子能的科学发展，可是这并不能说原子能就不是新生的事物。因为美国妨碍原子能的发展，这种社会制度一定要垮台，原子能一定要发展。

为什么说原子能是新生的事物呢？

因为它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是跟人类社会的需要密切结合的，愈是到共产主义时代愈是需要原子能。到共产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高了，水平高了，而且人类的理想也不是现在所能想到的。比如有的同志说：以后可以用原子能使人到地球上面去旅行，可以到地球以外的地方去。这个可能是有的，这就可以和人类的理想密切结合起来，能够满足人类将来很高的要求，满足人类不断进步的要求，这是很伟大的力量，所以这是新生的东西。无论如何它都要发展，哪怕是在美国遭到挫折，但是它终究要发展。

原子能所以是新生的东西，主要因为它是生产力，而不是破坏生产力的东西，如果它的破坏性无限地发挥了，那么，原子能也要垮台，人类社会也要垮台。全世界都用原子弹打仗，那么原子能和人类社会都要垮台。人类不希望这样，不希望把原子能用来制造炸弹，只有极少数的帝国主义者要这样作。

苏联虽然制造原子弹，但是并不要发展原子弹，而是为了制造原子能。现在制造原子能的科学还是有限的。苏联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并不是为了发展原子弹，同时也可以告诉美国，苏联也有原子弹。如果美国真用原子弹来进行战争，那我们就有防御的办法。

如果把原子能运用作杀人武器，这就不是新生的。因为全人类都要反对它，全人类都希望它成为生产工具，不希望它成为杀人武器，这就是最有利的条件。因为全人类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条件。

所以，一个东西是不是新生的，就要看全人类是不是要它发展。现在全世界痛恨原子弹，日本最痛恨，日本第一次吃到原子弹的亏。最近在一个岛上试验氢弹，一百多人受到影响。这种氢弹爆炸之后，在很高的空气里面就变成灰尘。这种灰尘有放射性，能够放射出来光，能够破坏人的白血球。这种灰尘飞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要受到影响，搞到人身上后，不死也要生病，有些人就吐血。所以日本非常痛恨原子弹。

最近李德全到日本去就很受欢迎。美国记者去的时候，日本警察就不允许他们去，并且说这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有些人怀疑地说，新生的事物不是不可以被战胜的，比如小孩子的生命容易被战胜；危地马拉的革命因为美国的干涉就失败了；新生的花草就容易被踩死。

按照实验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来讲，这些话都是“真理”；但是，并不符合辩证法。因为辩证法讲新生事物有一种最后不可战胜性，它总归是要胜利的，这不是讲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哲学是概括的一个总的规律。而我们的怀疑就是用个别的事实来当作普遍真理。小孩子当然容易死，这是个别事实，不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爱护小孩的，小孩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他可爱，愈是年纪大，愈是由衷地爱小孩，这就是小孩子很强的一个表现。同时它本身又是新生的。老人的血管硬化了，有很多杂质，但是小孩是完全纯洁的，没有什么杂东西，生长力很强，生长的可能性总是比老人要多一点。小孩子也有斗争。有的时候你不理他他就会哭，这种斗争他总是胜利的。在个别的情况下他不会胜利，这是因为个别人很残酷，但是人民群众总是善良的。

新生的事物有一种最后不可战胜的性质，总的趋势就是如此。这不是说它一生出来就是顺利的。比如，社会主义有最后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有最后在中国得到胜利的可能，不是说现在已经完全胜利了，不是说不会受到一点

挫折。在“三反”、“五反”以前，我们有些干部就被打败了。社会主义暂时的、局部的失败也会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讲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我们认识问题的时候要看到总的东西，要善于概括，不要受到个别的、暂时的现象的影响，要能够区别个别的東西和总的趋势。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思想方法。经验主义就是因为经常被个别的、暂时的东西所迷惑，把个别的、局部的东西当作普遍的东西，这样就只看到近处，而不能看到远处。

一个事物里面是不是包括几个新的因素，归纳起来是不是只有新和旧两大类？

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要太机械。如果我们机械地答复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几个新的因素，那如果一个东西只包含一个新的因素，怎么办呢？

有许多事情，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无产阶级是新的因素。大体上，新生的总是不会太多。

新中国有很多阶级，是不是能说资产阶级是新生的因素呢？

不能够这样说。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新生的因素，个体农民都不是新生的因素，集体农民就是新生的因素。

当然也可以说：一个事物包含很多因素，其中有新有旧。这样说没有什么错误。

首先是对新生的事物和旧事物如何区别？新生的事物是不是就是发展阶段中的事物？

这个提法不算错误，但是不很完全，没有表明新生事物是在生长的。新生的事物就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旧事物就是正在衰亡的东西。在哲学上一般讲正在生长和衰亡着的東西。哪怕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東西，有些东西如果它不是正在生长的，一生长下来就要衰亡，这种东西不叫新生事物。比如生出来的怪孩子，这是破天荒的，但不是新生的事物，因为他不能生长，不能发展。

如何看出它是正在生长的呢？那就要看是什么具体的东西。

看新生的事物是不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当然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说，认识新生事物这件事情本身，就表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够认识新生事物，就表明了立场、观点、方法是有错误的。哪怕是对新鲜事物没有感觉，这就表明了立场、观点、方法有些问题了，不能说是根本地变成了反革命，但至少是立场不稳

了，不坚决了。所以，斯大林说，对新鲜事物的敏锐的感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宝贵品质。失去了这种感觉，这种品质就逐渐丧失了。丧失了这种品质不一定立刻就会反革命，但可以说立场不坚定了。

我们学习哲学，不是为了讲名词，而是为了领会精神实质，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贯穿这种精神。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员的品质。我们大家要注意，学习哲学不是为了摆名词，而是为了领会研究问题的方向，懂得了这个方向就不需要到处讲新生的、矛盾的这些名词。

我们看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里面到处都是哲学名词，毛主席的一些文章里面，有的整篇都是讲实际问题，就只加上一、两个哲学名词，就是画龙点睛一下。我们学习哲学就要领会这种方法。不领会这一点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如果无论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搞上几个哲学名词才过得去，这样就会弄得用抽象的词汇代替了生动的东西。

群众拥护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新生的东西？

这也不一定。群众拥护的东西大体上是新的，但有的时候群众也有落后的，比如群众拥护宗教，这就不是新生的东西。所以，新生不新生这不是人的主观能确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不断生长的东西。凡是新生的东西，总可以成为群众的东西。

中国资产阶级有积极的因素，那是不是能说资产阶级是新生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资产阶级有积极的作用，并不等于就是新生的东西，因为整个地来说它是正在衰亡着的，它的积极作用一天天地小了。当然在没有死亡时，它就有一点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它仅有一点作用。

能不能说生产力就是新生的东西？生产关系就都是旧的？

也不能够这样说。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一致的，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问题呢？

这就是机械地套，把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新与旧划了一个等号。如果可以相等的话又何必用两套名词呢？用一套就可以了。所以，凡是用不同的名词，就有不同的作用。在其他的问题上我们也要注意一点。

有的同志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是就等于物质和精神，就是第一性与第二性？

当然，如果讲什么是决定的，什么是被决定的，这一点有相同点，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精神。但是生产力占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等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有同志问原子弹是不是新事物。我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会有同志说，为什么苏联还制造呢？

我们说原子能这种科学是空前的、新生的东西。美国是想阻碍原子能的科学发展，可是这并不能说原子能就不是新生的事物。因为美国妨碍原子能的发展，这种社会制度一定要垮台，原子能一定要发展。

为什么说原子能是新生的事物呢？

因为它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是跟人类社会的需要密切结合的，愈是到共产主义时代愈是需要原子能。到共产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高了，水平高了，而且人类的理想也不是现在所能想到的。比如有的同志说：以后可以用原子能使人到地球上上面去旅行，可以到地球以外的地方去。这个可能是有的，这就可以和人类的理想密切结合起来，能够满足人类将来很高的要求，满足人类不断进步的要求，这是很伟大的力量，所以这是新生的东西。无论如何它都要发展，哪怕是在美国遭到挫折，但是它终归要发展。

原子能所以是新生的东西，主要因为它是生产力，而不是破坏生产力的东西，如果它的破坏性无限地发挥了，那么，原子能也要垮台，人类社会也要垮台。全世界都用原子弹打仗，那么原子能和人类社会都要垮台。人类不希望这样，不希望把原子能用来制造炸弹，只有极少数的帝国主义者要这样作。

苏联虽然制造原子弹，但是并不要发展原子弹，而是为了制造原子能。现在制造原子能的科学还是有限的。苏联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并不是为了发展原子弹，同时也可以告诉美国，苏联也有原子弹。如果美国真用原子弹来进行战争，那我们就有防御的办法。

如果把原子能运用作杀人武器，这就不是新生的，)因为全人类都要反对它，全人类都希望它成为生产工具，不希望它成为杀人武器，这就是最有利的条件。因为全人类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条件。

所以，一个东西是不是新生的，就要看全人类是不是要它发展。现在全世界痛恨原子弹，日本最痛恨，日本第一次吃到原子弹的亏。最近在一个岛上试验氢弹，一百多人受到影响。这种氢弹爆炸之后，在很高的空气里面就变成灰尘。这种灰尘有放射性，能够放射出来光，能够破坏人的白血球。这种灰尘飞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要受到影响，搞到人身上后，不死也要生病，有些人就吐血。所以日本非常痛恨原子弹。

最近李德全到日本去就很受欢迎。美国记者去的时候，日本警察就不允许他们去，并且说这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有些人怀疑地说，新生的事物不是不可以被战胜的，比如小孩子的生命容易被战胜；危地马拉的革命因为美国的干涉就失败了；新生的花草就容易被踩死。

按照实验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来讲，这些话都是“真理”；但是，并不符合辩证法。因为辩证法讲新生事物有一种最后不可战胜性，它总归是要胜利的，这不是讲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哲学是概括的一个总的规律。而我们的怀疑就是用个别的事实来当作普遍真理。小孩子当然容易死，这是个别事实，不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爱护小孩的，小孩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他可爱，愈是年纪大，愈是由衷地爱小孩，这就是小孩子很强的一个表现。同时它本身又是新生的。老人的血管硬化了，有很多杂质，但是小孩是完全纯洁的，没有什么杂东西，生长力很强，生长的可能性总是比老人要多一点。小孩子也有斗争。有的时候你不理他他就会哭，这种斗争他总是会胜利的。在个别的清况下他不会胜利，这是因为个别人很残酷，但是人民群众总是善良的。

新生的事物有一种最后不可战胜的性质，总的趋势就是如此。这不是说它一生出来就是顺利的。比如，社会主义有最后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有最后在中国得到胜利的可能，不是说现在已经完全胜利了，不是说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在“三反”、“五反”以前，我们有些干部就被打败了。社会主义暂时的、局部的失败也会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讲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我们认识问题的时候要看到总的东西，要善于概括，不要受到个别的、暂时的现象的影响，要能够区别个别的東西和总的趋势。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思想方法。经验主义就是因为经常被个别的、暂时的东西所迷惑，把个别的、局部的东西当作普遍的东西，这样就只看到近处，而不能看到远处。

一个事物里面是不是包括几个新的因素，归纳起来是不是只有新和旧两大类？

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要太机械。如果我们机械地答复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几个新的因素，那如果一个东西只包含一个新的因素，怎么办呢？

有许多事情，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无产阶级是新的因素。大体上，新生的总是不会太多。

新中国有很多阶级，是不是能说资产阶级是新生的因素呢？

不能够这样说。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新生的因素，个体农民都不是新生的因素，集体农民就是新生的因素。

当然也可以说：一个事物包含很多因素，其中有新有旧。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错误。

05.关于理解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问题

可能性是否包括必然性？怎么样理解必然性？

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可能性，这是主观的，这种可能性不真实。比如说月亮可能掉在地球上，这是可能性，这是抽象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实在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在中国一定胜利，这是实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包含有必然性。

那么，为什么叫可能性呢？

就是这种必然性还包含在内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叫作可能性。

这种必然性已经表现出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东西了，那这就是现实性，就是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了。到了几个五年计划之后，社会主义就成为事实了，社会主义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成为现实。现在这个胜利还只是可能，还不是事实。因为很多地方还有资本主义，还不是完全不可动摇的事实，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动摇社会主义，有的时候还会受到影响。

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里面，人的主观努力是不是唯一的条件？

不是唯一的条件，而是必要的条件。像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都需要人的努力，不可能是自流的。

客观条件不够时可以创造吗？

当然可以。但是，创造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在客观规律允许的范围内，那么，人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创造。人对社会改变的主观努力，主要的任务是要创造一定的条件。

人的主观努力不是纯粹的主观，不是空洞的努力，努力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来影响事物的发展。原子能本来是在矿里面埋着，它自己没有条件爆炸，但是人就创设一定的条件使它爆炸。

怎么样创造呢？就是按照它的规律来创造。原子铀矿叫作铀二三五，如果把它炼得很纯粹，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引起爆炸。因为它有这种规律，人就可以按照这种规律把它提炼出来，然后按照它要爆炸的大小，把它制造成为两半，每两半合起来就到它能爆炸的点，把这两半分开，每一半都不够爆炸的条件，那么再制造一个人可以掌握的机器，要它爆炸的时候，就用机器把两半合起来，合起来之后，就爆炸了，不用火、电，它自己就会爆炸。而人就能创造这种条件。

社会的变化也是这样。要在社会上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个政权的取得人就可以来创造。无产阶级可以联合农民来夺取这个政权。但这个政权需要客观上允许。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业，要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也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中国有了工业，又有了无产阶级，所以经过二、三十年的战争，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一点我们看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清楚了，在第一段里就讲到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我们无产阶级就要创造条件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这个条件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我们能够创造人民民主专政？

因为我们中国的社会规律允许这样作。客观规律允许，我们就利用这个规律，就可以创造这个条件。所以，如果客观事物没有存在，不允许创造条件，那我们的努力就是空的。所以，主观努力一定要首先根据客观规律来决定，否则就是空想。

06.关于理解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就是能够主动创造一些条件。首先是认识客观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来创造适当的条件，使社会发展能跟我们的要求一致。

当然，主观能动性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就是主观能动性，这个能动性表现在人的理性认识不是简单机械地反映客观事实，而能把感性材料加以整理、加工，能把最普遍的东西抽出来，把枝节的东西撇开，能够找出来一般的规律。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但具体的事物中又包含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人的认识之所以能够把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抽出来，就是由于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然后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特殊到一般，使人的认识实现一个飞跃。这也是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解释。

总之，一般来讲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主观不会机械地被客观所决定，它总是要反映客观事物，但可以有它自己的方式来反映；反映出事物发展规律之后，运用理性认识创造条件，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这就是主观能动性。

07.关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是不是由于我们 路线错误的问题

有的同志说：如果路线不错误，那么蒋介石就不会叛变，革命就不会失败。

这个问题看怎么样了解了。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了解，一半对一半不对。说如果路线不错误蒋介石就不会叛变，这就错了；如果路线不错误，革命就不至于失败，这是对的。因为蒋介石他叛变不叛变不决定于我们的路线，你的路线正确了或是错误了，他都要叛变。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就是要迁就蒋介石，就是想要他不叛变，想把他们拉住。可是没有拉住。陈独秀犯了错误，就使革命失败了。可是，即便拉住的话，他也要叛变的，因为他不叛变就生活不下去，因为他是反动派，原来就准备叛变，或者不在那时候叛变，迟一点也要叛变。

路线不错误，那么蒋介石就不叛变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叛变的责任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为什么要使他叛变呢？这个话是蒋介石的话。

这里说的可能有点夸大了，但是不夸大一点就不明显了，所以稍微夸大一点。

蒋介石总归要叛变，不管我们错误不错误。如果我们没有错，革命可以不失败。

这个不失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共产党就可以马上得到天下呢？

也不是。这是说如果我们政策不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保存很大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站住脚跟，或者是我们很早就可以有很大的解放区。那个时候要夺得天下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很弱。我们就是依靠工人、农民的力量，当时只有湖南、湖北、江西这几个地方的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了。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些地方，不致于被蒋介石屠杀的那么厉害，可以对革命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也就是说，革命可以胜利得早一点，全国胜利的可能早一点。

不失败，不等于立刻就会胜利，这一点要注意。

08.关于现象和本质怎么样区别的问题

现象，是很容易了解的东西，一眼看去，表面的、局部的、感觉到的东西，用不着思考，就能得到的事物外表的情况，叫作现象。本质就要经过分析。

如何分析呢？就是要把现象以及和现象有联系的各种条件弄清楚之后，就可以了解这种现象的意义、实质上的意义，这就是本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那时的革命看起来就像是“星星之火”，这就是不用脑子就看到的现象，所以就不全面。我们说“星星之火”很小，这是事实，但是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小。毛主席根据这种条件，就知道“星星之火”是新生的力量，有发展前途，这就是它的本质。虽然小，但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的发展前途，有不可战胜的前途，这就是本质。

要区别现象和本质，就是要透过现象，对现象加以分析，找出来各种条件，根据条件，弄清楚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它的本质。

09.关于过渡时期是不是质变时期的问题

有些同志问：总路线规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时期为什么应该叫作质变的逐渐过渡，而不能叫作量变到质变？

我们说过渡时期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时期就是质变时期，所以基本上不能够说过渡时期是量变时期。整个过渡时期就是一个质变时期，不是量变时期。

为什么不是量变时期呢？

因为量变和逐渐过渡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逐渐过渡是新质不断积累，旧质不断消灭；而量变就不同，量变阶段旧质就不消灭。比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里面，资本主义就没有消灭，整个资本主义不但不消灭，部分的也不消灭，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在里面生长。在量变过程里面，主要是旧质不消灭。新质虽然产生一点，有时在封建社会里面还可以有资本主义产生。

逐渐过渡就不同。逐渐过渡就是社会主义一天天多起来，全民所有制一天天扩大，集体所有制一天天扩大，而旧质—资本主义所有制一天天减少。当然，逐渐过渡的时间较长，量变不是主要的东西，不是它的本质，量变是一个次要的东西、附属的东西。

10.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是科学预见的 基础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发展观点要求我们经常看到新的事物、新的因素在不断成长，这就可以帮助我们作出科学的预见。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第二个特征是科学预见的基础，这个说法太狭隘一点。因为第四个特征也是一样，研究矛盾就能够看到将来。马克思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看出来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辩证法是科学预见的理论基础，应该这样说才对，不要单独限于第二个特征。

如果有的文件认为第二个特征是唯一科学预见的基础，如果有这种说法，那不管它是什么文件，那都是片面的。

11.关于理解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反帝国主义是外部矛盾，反封建是内部矛盾；但有的同志认为反帝和反封建不能分开。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分开。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关系是决定于中国内部的关系。帝国主义为什么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没有垮台。封建制度垮台了，内部矛盾解决了，帝国主义就没有办法侵略。所以，外部矛盾是通过内部矛盾起作用的。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所以能够结合起来，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通过封建势力来压迫人民，所以反封建，同时也就反对了帝国主义；反帝的同时也就反了封建，这个结合是一致的。

这个结合并不妨碍我们分内、外。因为外部总是通过内部起作用的。我们中国就是因为内部矛盾的解决，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以，亚历山大洛夫讲外部矛盾是在内部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外部矛盾的情况是由内部矛盾的情况决定的，内部矛盾改变，外部矛盾也会改变。过去苏联和中国，在反动派统治时有矛盾。这并不是说两个国家的人民有矛盾，而是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有矛盾。我们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和中国就没有矛盾了，两个国家的关系，就非常亲密，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资产阶级复辟了，又再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那就又会产生中国和苏联的矛盾。

如果说有矛盾，那就是在小的局部问题上。比如双方有些同志在中苏交往上的态度不好，国际主义精神不够，这里面可能发生矛盾。或者苏联有些先进经验我们学习的不好。苏联教育上的一个经验叫作六节一贯制。就是天不亮的时候就上课，一直上到一点钟。我们有些学校也这样作，结果不行。因为中国的天气不同，民族习惯也不同。苏联的日子很短，就要突击一下，他们也习惯了。这是个别问题的矛盾。

内部矛盾改变了，有些外部矛盾就会改变。外部关系存在，但是内部关系成为矛盾，就要在一定内部条件的基础上解决。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一般可解释成为内、外矛盾。不同的地方讲条件是讲联系，讲矛盾是讲对立的方面，分析清楚之后，指出矛盾来。

12.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否相当于全部性和局部性的问题

这是两套名词，就不能完全相等。但有的时候也相等，所以画等号的主张也有理由，但不能够一般地这样讲。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和局部是不是一定等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呢？不一定。资本主义全部都是资本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局部有特殊性，全部也有特殊性。毛主席说：要认识事物在总的方面的特殊性，就一定要研究它各方面的特殊性，就是各个局部的特殊性。所以这不完全是相等的。比如我们过去的革命战争有它的特点，跟一般的战争不同，这个特点是贯串到各部分，可是普遍性也贯串在全体和部分中。凡是战争就有一个普遍的特征，都要进行对抗的斗争，这个普遍性不管在局部或是全体内都有；但是，各种战争又有各种战争的特殊性，全体有特殊性，部分也有特殊性，这两个概念不能完全相等。

所以，我们要根据具体事实来分析，不要离开事实来一般地类比。比如矛盾的各方面的总和就是矛盾的总体，这并不等于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是讲矛盾的共同性，各种矛盾的共同性，就是共性，这是《矛盾论》讲的。《矛盾论》一方面讲了矛盾的普遍性，讲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这是共性。还有同类事物它的矛盾都有共同点。资本主义制度都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普遍性是讲矛盾的共同点，一切事物的共同点；而全部与总体是讲一种矛盾的各方面跟它各方面的总和关系。这些概念应该弄清楚。

13.关于究竟是主要矛盾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的问题

主要矛盾是决定很复杂的矛盾的一个特征，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包含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主要矛盾决定的。比如，抗日战争的时候，国内外有很多矛盾；我们和蒋介石，英美和日本，英、美、日和我们又都有矛盾，这许多复杂的矛盾总起来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汇合成为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就是跟日本的矛盾。所有矛盾都带有民族战争的性质，都被民族矛盾所规定。又比如目前的世界有各种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总起来的一个特点，就是战争与和平的斗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打苏联，对这个战争如果不研究整个世界的
主要矛盾，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这个战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可是，斯大林说：这个战争是带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苏联参加这个斗争
是加强反对法西斯、争取民主的斗争。因为反对法西斯就不仅是要反对德国，
而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那么，现在世界上的矛盾，主要是和平与战争的性质。如果这个矛盾接
近解决，和平慢慢要巩固起来。

主要矛盾是规定很复杂的矛盾的总的特征；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说
矛盾的特点的性质是由什么来规定的。一个矛盾的特点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
来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了矛盾的整个性质。

所以，我们要分清这两个方面。

什么叫作主要矛盾？什么叫作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种看法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方面；一种认为不应该
是占统治地位的方面。前一种理由就是：占统治地位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比如旧社会因为反动派的统治，所以规定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
占统治地位的方面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可是又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该是占
统治地位。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可是那时候无产
阶级还不是统治阶级，它能够决定革命的性质，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两个意见有了争论，应该怎么样解释呢？

这个问题是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个普遍概念，具体内容很多。什么
叫作主要方面呢？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讲整个社会的性质，阶级社会里面
的社会性质，那么当然主要方面就是统治阶级。因为谁统治这个社会，谁就
可以规定这个社会的性质，统治阶级变了，社会性质就变了；但是，如果不
是讲整个社会性质，而是讲革命运动的性质，那当然主要方面就是领导阶级，
谁领导革命，谁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有些革命有资产阶级参加，有农民参加，可是领导阶级不同，革命的性质
就不同。资产阶级领导就是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

14.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区别只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列宁所讲的物质和精神的区别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是有绝对意义的，超出认识论的范围外，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就不是绝对的了。

意思就是说：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要区别一件事，就是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这个问题是绝对的，不能够有什么条件。

精神和物质是有根本区别的，是有绝对的区别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之外，不讲认识论，讲一般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那么这个区别就不是绝对的，而且往往有很多共同点。首先物质和精神就是分不开的，精神就是物质的作用，精神就是一种物质的现象。

还有，我们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意志为转移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有一定的客观作用。社会主义里还有资本主义思想，这也是物质的现象，所以，它的产生、发展就有它自己的规律。宗教的产生就有一定的规律，它的消灭有一定的规律，要想明天就消灭它是不可能的。

意识有一定的客观作用。它跟物质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只有一点是绝对的，就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区别。

15.关于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

普遍就是共同点，特殊性就是个别的。互相区别的一个特征，就是个性。如何理解毛主席说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句话？

毛主席说：一切矛盾有共性个性、普遍性特殊性，一切事物都有矛盾，都有共同点，可是每一种矛盾又都有特殊性。我们研究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两方面，才能够真正认识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这一点，如果只看到一方面，就都不能够正确地认识矛盾。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只看到普遍性，不注意区别矛盾的特点，就是不懂得研究矛盾要掌握精髓。

16.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

和处理方法的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

有些同志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是用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种说法有对的因素，但是不完全。因为既然矛盾是对抗的，所以解决矛盾的方法也要有对抗性，这种方法和矛盾的性质不可能完全对立，不可能完全没有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解决方法，也有对抗性的斗争。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矛盾的解决也可以采取很多非对抗的方式。所以，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是对抗的，又有非对抗的，而我们争取尽可能少用对抗的方法，尽可能多用非对抗的方法，特别是避免用战争这种对抗的方法。

所谓和平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不能够把和平道路简单解释成为非对抗的道路。和平道路只是讲可以避免内战，避免流血。绝对避免流血是不可能，因为对严重违法的人还是要杀。

避免战争流血，尽可能采取许多和平改造的方法、非对抗的方法；但是没有对抗也不可能，因为资产阶级要反抗，我们就要镇压，这就是一个对抗。对抗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可以尽量避免。这样来解释就比较完全了。

如果说对抗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就采取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就太简单了，但是有对的因素。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可能争取用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否则就没有和平道路了。所以，对和平道路就应该这样了解，不能够简单解释成为这个斗争是非对抗的，而是对抗与非对抗都有，同时我们争取用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

（注：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整理者）

第 05 章 生产发展的规律性

(1956.09)

【这个讲课速记稿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稿，中央党校曾铅印给学工人员学习参考，但没有标明时间，也没有注明是给哪个班讲的，只注明艾思奇本人未曾审阅。根据讲课内容所提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大约在同年九月。我们这次整理，是在中央党校铅印稿的基础上，略为做了一点文字加工，改正了个别文字上明显错误之处。】

(一九五六年九月)

生产发展的规律性准备讲三次。这个提纲比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提纲要短一些，原因是，有关社会发展历史过程这一部分，没有写进去，就是凭口来讲。

1. 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

(1)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

为什么要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讲起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里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领域里面的结果。所以，讲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注意到唯物主义的原则，首先不要忘记我们是用唯物主义原则来解释历史的。

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里面来，首先就要肯定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的社会精神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到这一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一段引用了马克思这句话。所以，讲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讲起，这就需要先把社会存在弄清楚。

什么叫社会存在呢？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有的著作来看，始终坚持的一点：社会存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或者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一个东西。同样，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也是一个东西。能不能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除了生产、生产方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来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不是生产之外的东西。作为社会存在，能够决定社会意识的这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

对地理条件、人口条件我们怎样看法呢？

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把它叫作人类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自然条件，或者叫作自然的物质条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最低限度的人口，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一个国家需要有一定的地理环境，一个社会不能够建立在大海上，也不能够建立在沙漠上，经常需要一定的、适合的地理条件。所以，地理条件、人口条件是人类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一种自然条件。

能不能把这两个条件就叫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研究。这种说法比较不够精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是这样提的，地理、人口条件也是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种提法值得考虑。首先是我自己认为这样一种提法科学性不够精密。如果说地理、人口是物质条件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是决定社会意识的，是社会自己本身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就有值得考虑的地方。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讲到社会存在时，就是指生产，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找不出充分的根据来说明地理、人口也是一种决定社会意识的生活条件。所以在我的提纲里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存在就是生产、生产方式。生产、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是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自然条件，但不是对于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把地理、人口条件跟生产、生产方式加以区别。

这样加以区别有好处，就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内因是最后的决定原因这个原则。我们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精神面貌的，是讲社会自己本身内部的原因决定一切，而这个内部原因只能是生产。只有社会内部的物质条件能够作为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性质最根本的原因。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对社会来说是外部条件，是外部的自然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地理、人口条件也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地理、人口条件也对社会起决定作用呢？有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的看法，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这样看。马克思认为决定社会意识的东西只能够是生产，只能够是生产方式，不能够是地理条件、人口条件。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对人类社会生活有影响，因为它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有的时候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是不能够成为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性质、社会面貌的决定条件。这一点斯大林的著作里也讲过的。我不是说斯大林的著作有原则性的错误。不过，把地理、人口条件也叫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概念方面有不够精密的地方。概念上有点马虎，有时也会在理论上引起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在报上看到有的文章认为，过去的历史学、社会学也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过去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也可能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报上有冯友兰、朱伯昆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原则表示要考虑。这种精神是好的。不过，不管是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他们都在许多地方反复地讲过：过去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总是唯心主义的，总是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方面。这样一种讲法是不是偶然的呢？也不会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全盘研究后得到的结论。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提出来一个怀疑，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过去的历史学上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个问题了呢？是不是过去的历史学上都是唯心主义呢？他们说：也许在外国历史上是这样，但是就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来看，就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学家就可能有唯物主义观点。也许中国是特殊的。那么，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学家有两派：一派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派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肯定的答复，他们认为过去历史上有人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理由在什么地方呢？

从他们的文章里来看，理由就是过去曾经有过一些研究历史的人主张决定社会发展，决定社会性质，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东西是地理条件。比如，管子讲过地理条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条件。他们认为像这样一种了解历史的方法是跟唯心主义了解的方法相对立的。唯心主义把一切了解为天命的结果。这种地理论者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跟唯心主义相反，是用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我想如果把地理和人口也叫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主张地理条件、人口条件能够决定社会的这些人就算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所以，如果我们说这种说法是对的话，那就要有附带条件，必须先在理论上肯定地理条件、人口条件也是社会本身的一种物质条件。可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作这样理论上的肯定。因为地理条件是社会外部条件，不是社会自己本身的社会物质条件。因此，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去说明社会性质的变化这种观点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观点并没有摸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这种观点仍然是把社会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把社会当作自然来解释，不是抓住社会自己本身的原因来解释社会，没有注意到社会本身的特点，没有抓住社会的特殊性，而用一般自然的特点来解释社会。这种观点就是和生物社会学观点没有什么区别，认为社会和生物一般的特点是一样的，最多有一些具体的不同。

所以，用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来说明社会的这种观点，最多可以说这是历史家坚持了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自然观方面他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因此，他解释社会时也解释成一种自然，用自然物质条件来解释社会。所以，严格说来，这种观点是对自然界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讲的那些原则还是对的，就是过去的历史家从来没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中去，没有根据社会自己本身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社会，因为他没有找到这个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我们讲过用地理和人口来说明社会生活的这种观点最多是坚持了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摸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门。我们为什么说是最多呢？因为有的时候唯心主义者讲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承认地理条件的作用。但是用地理条件来说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还是要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的。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面讲到：管子认为地理条件决定社会。怎么样决定社会呢？他的理由是这样：地理条件规定人的性格，人生在某一种地理环境里就有某一种性格，而这个性格又决定社会发展的性质。我们看一下这个理论主要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种理论实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来讲，人的性格规定社会性质。人的性格是由地理条件决定，可是社会本身的情况是由人的性格决定的。所以，这种观点还是认为意识决定存在，是把人的意识叫作性格，不同的性格规定了不同的社会。

实际上，这种观点不仅是中国有，在西洋也有，我们看到康士坦丁诺夫的教科书里就有这种例子。有一种理论叫作气候论，就是说北方冷、南方暖，因为气候不同，民族性格就有不同，因此社会情况就有所不同。有一种帝国主义学说认为南方热，物产丰富，因此这个地区人的性格就很懒散，这个地方的人都不进步，是生下来应该被统治的民族。这个理论恰恰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多半在热带。所以说，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由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他用自然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可是他不知道社会自己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这种观点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

至于人口问题也是这样，也是形式上好像是唯物主义的，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马尔萨斯首先主张人口论，认为人口情况决定社会情况。他认为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粮食是按照算数级数来增长，今年一倍，明年两倍，后年是三倍，可是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就是按照一、二、四、八、十六这样的比例增长的。他伪造了一个数字就得出结论说：人口总是增长得太快，粮食增长得太慢，这样社会上就经常发生人口过剩的问题。由于人口过剩，人和人就不能不竞争，强者就必须侵略弱者。这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刚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产生的理论，它完全适合于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需要。一直到现在，帝国主义还把这种理论当作他们进行侵略的武器。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张争取生存的空间，他们说：他们的人口太多了，要在世界上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也是人口论的一种。这种观点形式上好像是用自然条件来说明社会，实际上是用人类之间生存竞争的欲望来决定社会发展的情况。由于人口过多，生存竞争的欲望就成为决定力量，就使得社会发生种种的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都是用这种理论作根据。

在1947年底、1948年初，蒋介石政府快垮台的时候，美国来了一个农业考察团，到中国后被蒋介石招待了一番，回去之后按照人口论的公式作了一个结论：说中国人口太多，粮食不够，这是中国社会的情况。他们说，粮食问题是中国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怎么办呢？他们提出可以有三种办法来解决：一个办法就是节制生育。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中国老百姓太落后，不能接受这个意见。第二个办法就是大批地由美国供给粮食。怎么样供给呢？当然是要钱，中国一定要和美国作买卖。第三个办法就是内战应该继续下去，就是人工地减少人口的办法，也就是要向美国购买军火、粮食。这就是人口论对帝国主义的好处。帝国主义为什么需要人口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不管地理条件或是人口论，如果把它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就错了。我们说，这些观点就是用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那样看的话，马尔萨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美国的农业代表团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还有什么气候论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这么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太多了。

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历史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因为费尔巴哈把自然条件也当作一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是，按照上面那种观点来看，费尔巴哈的历史观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这样来看，那么恩格斯就错了。我们可以找一些费尔巴哈的书来看一下。我们翻译的有《宗教的本质》这本书，这上面讲到宗教的产生是由于自然，人类宗教崇拜的对象主要是自然。他举了很多例子，他说，最古的宗教就是崇拜自然界，有的崇拜太阳，有的崇拜火，有的崇拜某一种动物，或者某一种矿物。有一个地方的宗教崇拜盐。这些宗教所以产生，就是人感到需要依赖自然，因此就把某一种自然的東西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所以说，宗教是起源于自然。这个也可以算是地理条件论。

可是，为什么恩格斯不说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有唯物主义因素呢？相反的，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讲到自然的问题，因为费尔巴哈的观点主要不是这一点。费尔巴哈解释宗教最主要的观点是：人有一种依赖感，因为人弱小，要依赖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了这种感情就产生了宗教，这些才是他主要的观点。所以说，他是一种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人的感情决定宗教的性质，宗教和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感情决定的。至于自然是一种外部条件，首先是由于人有一种依赖感。如果把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人口条件都叫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都叫作决定社会的条件，那么很多我们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人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了。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都应该翻案，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了。

所以，我想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应该把地理和人口条件叫作自然条件，不应该叫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应该叫作社会存在，因为它不是社会存在，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应该是有区别的，这样更科学些，这样更可以减少误解。

我们这样一种提法是初步研究的结果，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

在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本书里，开头就讲宗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他说：“人的本质或上帝……真正说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 页）在第二段里又说：“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同前书第 2 页）在这本书里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谈到宗教和自然的密切关系，关于自然讲了很多。

以上说明了我们对于那些认为用地理、人口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些观点形式上是用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但实际上，一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时，它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或者用性格来说明社会发展的情况，或者用生存竞争的欲望来说明社会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的。

我们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的人，他们的思想中间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都没有。我们只是说，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那种系统的，能够跟历史唯心主义对立起来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路线。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总是一般在自然界方面跟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涉及到历史领域时，他们就不能拿出一套真正唯物主义的路线来跟唯心主义斗争。所以，不是说他们没有唯物主义，没有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历史的企图，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这种企图，想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中去，但是这种企图没有成功。他们没有找到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这种企图没有实现。

可是个别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也不是没有的。过去的历史家、哲学家中间也是有的，没有是不可能的，是不合理的。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社会精神生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哲学笔记》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第三篇“关于概念论”中说，黑格尔也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因素，比如有的地方他注意到工具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又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里讲到美国的富兰克林（美国第三任大总统，是一个大科学家）发明电现象的本质，而且用试验证明成功了。他用一根传电的线放风筝，等到打雷闪电的时候，他就用手去碰线，结果就有电花出现，他就证明闪电是有电的。我们今年就要纪念这个人。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句话第一次由他讲出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没有说人是说话的动物，他把人的特点归结为制造工具。这种人不能说他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是这句话里面有历

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他没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懂得人会制造工具，所以他就片面地了解社会。过去的人对社会的认识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只能片面地认识社会，过去只能片面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这种人是有的。中国的地理论者管子认为地理决定人的性格，这种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些观点是很庸俗的。还有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杰地灵。这就是地理论。这就是说，因为家乡的风水好，就出了英雄豪杰。安徽凤阳的风水好，结果出了一个朱皇帝，他把风水带到南京去了，凤阳的风水就不好了。所以人们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所以，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片断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还是有的。再比如，孟子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唯心主义接近主观唯心主义，叫作“万物皆备于我”，我就代表万物。这句话是孟子第一个讲的。可是孟子讲到历史问题时，有时他有片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有时能够片断地看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孟子说：一个人的职业很要紧，一个人的职业如果是制造弓箭的，他的思想就有一点毛病，他就唯恐不伤人，因为他就是要制造箭来伤人的，人被杀死的多，他的生意就好，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人唯恐不打仗。可是制造盾牌的人就唯恐伤人。两个人的职业不同，思想就不同。还说：棺材店的老板唯恐人不死。这就是说，生活条件决定人的意识，这一点就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来讲他是唯心主义，但有的时候他片断地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

在历史上，有的时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会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批判各种哲学思想时要有分析。有的可能主要是唯心主义，但是有些唯物主义因素。有的也可能主要是唯物主义，但有唯心主义因素。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有唯心主义观点。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过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也接触到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片断地认识到真理。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人类思想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所以产生是因为过去人类思想里已经有许多片断的真理，马克思把这些东西总结起来。所以，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突然产生的，以前的人根本没有接触到，这样说也是不对的。不管中国、外国，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有的，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有过阶级斗争的观点。

所以，我们否认过去的历史学上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并不否认以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可以片断地认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这些观点跟唯心主义观点有斗争。我想在报上对冯友兰先生提出的问题就应该这样来解决：不能够说过去历史学上有一个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但是，要承认过去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有过片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2)生产、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是什么呢？

生产是一种活动，一种人类社会的活动。这就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取得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一种活动。人类要维持社会生活就必须要有吃穿，必须要有种种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物质生活资料从哪里来的呢？从自然界来的。怎么样从自然界取得这些物质资料呢？就是要通过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就是人们从自然界取得自己维持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一种社会活动。

这样一种活动包含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发生关系，就是要克服自然，改造自然，要解决人和自然界的矛盾。自然界是不会把现成的生活资料提供给人类的。要从自然界找到物质生活资料就要改造自然，所以人和自然要有联系，不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就不能够生产。另一方面，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才能够进行生产。一个人孤立地去进行生产是不可能的，要以整个社会为单位来进行生产，人和人要结合起来才能够生产。要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也要解决人之间的矛盾。人和自然要建立生产的这种关系，那么人之间也要建立一定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少一方面也不行。人和自然不发生关系，那样就没有什么生产了，可是人之间没有一定的关系，一个人去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也是不可能设想的。

那么，个体生产是不是个人生产呢？

个体生产是讲生产过程中可以采取个体的形式，并不是说整个生产是孤立的，个人和社会可以割裂开单独进行生产。这是说生产经营的方法可以是个人的，绝不是说人之间可以割裂开。所以，凡是生产都是以社会为单位进行生产的，而生产总是和自然发生一定的联系，这样，生产活动就包括两方面的关系。

辩证法告诉我们：活动就是一种联系，运动就是联系，运动就是在联系中的运动。生产运动有两方面的联系，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的联系，一方面是人和社会的联系，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缺一方面也不行。

因此，研究人的生产就一定要研究两方面：人和自然怎么样在生产过程里联系，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怎么样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就叫作生产方式。人和自然怎么样联系，采取什么方法联系，人之间又采取什么方法联系，这些具体的方法就叫作生产方式。

生产是讲一般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是讲人和自然界的联系以及人和人联系的具体方式，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发展不同阶段的标志。每一种生产方式是表明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研究生产，研究生产活动，也就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生产和生产方式在斯大林的著作里是并提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要研究人的生产，就一定要研究它的具体的生产方式。

研究生产活动是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人和自然在生产过程里是怎么联系的，人和人的相互联系又是怎么样的，就是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所以，研究生产也就是研究生产方式，这是没有区别的。

首先，我们要研究生产力的问题。

生产力就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自然界的联系，就是人和自然界矛盾的运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就是人和自然的联系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性质又决定于什么呢？主要决定于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人用什么工具来生产，用什么方法使用这种工具来进行生产，这是规定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人怎么样去解决他和自然的矛盾，首先决定于他用什么工具，其次决定于他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工具如果是进步的，他的生产力就高，进步的工具就规定了更高的生产力。同时，他使用工具的方法如果是进步的，生产力也能提高。

什么叫生产力呢？

生产力就是人从自然界中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也就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矛盾的能力，也就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决定于工具和人怎么样使用工具。所以，生产力的要素有两个，也就是说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能力，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要素有两个：一个是工具，一个是善于掌握工具的人。

关于生产力的要素这个问题是有过争论的，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大多数人认为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也有人主张生产力的要素是三个，除了人和工具之外，应该还有劳动对象。一般来讲，劳动对象是自然的东西，但有一

部分劳动对象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如，纺织厂的棉花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一般来讲，劳动对象是自然的。说它也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这种理论是不是对呢？不对的。虽然现在还有人坚持这种理论，但它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自然条件看作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部分。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力，规定这个东西的应该是社会自己内部的因素，不能说自然条件也起决定作用。所谓要素就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

这个理论所以不对还有另一个原因：劳动对象这个东西是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对象，并不是生产力本身。把一个生产力应该发生作用的对象看作是生产力本身的一个要素，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部队战斗力的要素是什么呢？是武器、士兵和指挥员的品质。那么，能不能说我们战斗力的高低也决定于敌人呢？敌人是我们战斗力发生作用的对象，我们战斗力的高低是决定于我们的武器、士兵和指挥员的品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们的战斗力总是这样大。敌人对我们的战斗力的发挥有一定作用。比如，遇到很弱的敌人，我们的战斗力就不能够充分地发挥。如果遇到强的敌人，我们的战斗力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敌人这个对象对我们战斗力就是有这样一点作用，不能说我们战斗力的高低决定于敌人。是不是说，敌人强一点我们的战斗力就很低，敌人弱一点我们的战斗力就很高了呢？是不是遇到强的敌人就把我们吓跑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呢？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偶然的情况是会有，但基本的战斗力不会决定于敌人。生产力的问题也是这样，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对象。地理条件好不好，劳动对象好不好，对我们生产力的发挥可以有一定的影响。条件不好，我们生产力的发挥就受到限制，条件好，生产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有了机器、工人，但是原料运不来总是窝工，这并不等于我们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生产力浪费了，潜力没有办法发挥，但这并不等于劳动对象决定生产力。

所谓要素，是指经常起决定作用的条件。生产力的高低，它的性质，它发展的程度只能是决定于工具和人，不能决定于劳动对象。如果说生产力可以决定于对象，为什么旧中国不能发展生产力，新中国就能够发展生产力？地大物博，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在旧中国也有机器，也有劳动者，可是旧中国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它不能够跟机器和人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原因就是地理条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一定时期也有一点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影响。有了工具，有了劳动者，如果地理条件不好，生产力的提

高就会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力本身的水平，发展程度受地理条件的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否认生产力的要素是三种的说法，要肯定生产力的要素就是工具和人。这个人是一种具体的人，是善于使用工具的人。有了人，如果他根本不善于使用工具，也不能成为生产力的要素。人善于使用工具能力的大小，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肯定生产力有两个要素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在理论上应该这样肯定是正确的，在实际行动里肯定有两个要素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肯定了这一个理论原则后，可以知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推动生产力发展时，我们应该抓住什么环节。要发展生产力，这里面就有许多环节，生产关系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经营管理也是重要的环节。但是，单就生产力本身来说，要推动生产力发展需要抓住什么环节呢？就是要抓住改进工具的环节，还要提高掌握工具的人的能力，提高他的生产技能，要抓住这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环节。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抓住这些环节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利用劳动竞赛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法。奴隶占有制社会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就是用鞭子鞭笞劳动者；在封建社会中也都是利用残酷压迫的办法去推动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利用饥饿的办法。我们社会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依靠自觉的办法。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这篇文章里说：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是靠棍棒纪律来维持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是靠饥饿纪律来维持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是依靠劳动者本身底自由自觉纪律来维持的。这就是说依靠劳动竞赛。劳动的自觉性是劳动竞赛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们要注意怎样使用劳动者的自觉性。过去我们企业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总结里面有一条，就是通过劳动竞赛进行增产节约的中心环节，就是改进工具，改进劳动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要抓这三个重要的环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发挥这两个要素的作用。改进工具，这是发挥工具的作用，改进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这就是发挥劳动者自己本身的作用，就是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的问题。

苏联工业化时有两个环节：1928年时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就是改进技术装备，改进工具。到1932年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就是号召劳动者掌握技术。两个口号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工具问题，一个是

劳动者的问题，这两个口号决定了工业化的整个过程。这两个口号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撇开决定一切这个问题来看，至少首先抓改进工具，然后又抓劳动者掌握技术这一点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必须看准生产力的两个要素的作用。

在实际工作里肯定这个原则，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去抓提高生产力的中心环节。当然也不能忘记其他问题，如果只是抓住这两个问题，其他工作不管，那就不好。但是，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这两个环节来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必须明确生产力要素的实际意义。

关于生产力要素的问题，附带有一点讲一下。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继续。所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使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作更深入的了解。本来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应经常注意这一点。注意到这一点就有好处，可以使我们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能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单依靠学习辩证法要求深入了解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运用才能深入地了解。以后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里，就能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了解得更深刻。

上面我们讲到生产力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中间的关系怎么样呢？

生产工具是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力的性质的一个客观物质条件。掌握工具的劳动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生产工具既然是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的一个客观条件，那末，我们只要看使用的是什么工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估计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所以说，对过去社会的研究，只要知道它使用什么工具，就可以大致对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其社会面貌，作出估计。

生产工具是能够规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限度的一种客观条件。在使用一种生产工具时，生产力可以低一点，也可以高一点，但是这个高低是会有有一定的限制的，这是客观上规定了的。比如，使用手工工具时，生产力无论怎么样提高，总是不可能超过使用机器时生产力可能达到的水平。用手工业机器纺纱、织布，很熟练的工人可以织很多，但是无论如何它赶不上机器生产。在农业生产上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现在基本上是手工劳动，不是机械化的农业。这样也能够提高生产力，但是要提高到使用机器那样，还是有困难的。

所谓生产力发展的高低，是指劳动者在一定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多少来算的。

生产工具大体上能规定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性质表现为许多特征。简单说来，有的生产力具有集体性，有的生产力具有个体性。像原始社会的生产是集体性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是个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生产是集体性的，也叫作社会公共性的生产过程。这些生产力性质的区别，大体上是由生产工具规定的。原始社会时使用最粗的石头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进行集体生产。封建社会中使用比较好的手工工具，这种工具就适合进行个体生产，而不适合大规模有组织地生产。使用手工工具可以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像农业、手工业合作化。但是，大规模的、有精密的劳动分工的生产是手工工具所不能适合的。在使用机器时，就不能没有组织地进行生产。所以，工具就规定了生产力不同的性质，也就规定了不同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说，生产工具能规定生产力的界限。

在使用一定的工具时生产力能够增加到多大的程度，就取决于主体，即取决于劳动者。善于掌握工具的劳动者可以使这一个工具所规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最大限度，可以把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如果不善于掌握工具，也可以使生产力降得很低。所以，技术是不是熟练在生产上有很大的作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技能对生产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要提高生产力，或者是改进工具，或者是劳动者善于掌握工具。劳动竞赛中出现的一些模范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创造工具或改进工具的模范，一种是提高劳动技能，创造生产经验的模范，再没有其他的生产模范了。像王崇伦、张明山改进工具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很多；郝建秀，她没有改进工具，但是她改进了操作方法，结果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那么，劳动者和工具究竟哪个重要呢？

我们说两个都重要，各有各的作用。工具是一个客观条件，它规定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定范围，要想超出一定的范围必须改进工具。可是有了工具没有人掌握也不行。有了工具要使它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就要有人掌握。当然，比较起来，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是生产力活动的主体。但是，有了人还要有工具，没有工具，只是人也不能够生产。可是有了人就能够制造工具，人积极起来就能发挥工具的作用。

在合作化运动以前，有些干部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贫农不能够发展生产力，只有中农才能发展生产力。理由是只有中农才能掌握比较好的工具，贫农没有什么好工具。所以，组织起来如果是以贫农为主，不以中农为主，生产力就不能够提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里

毛主席推荐了一篇材料，是二十一户贫农，没有什么工具，但是他们最后可以找到工具。这就是因为有人，所以人就是生产力最重要的要素。但是，生产工具也是很重要的要素，是一个最后决定生产力范围的客观条件，也不能够轻视它。

我们中国今天的农业生产不能实行机械化，这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现在没有这样多的拖拉机。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我们发展生产主要是设法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生产经验，也附带地改进工具。组织起来后，就能很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单干的时候，个人有的经验不能够交换，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可以增加生产，可以交换经验，使生产力提高。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中指出：要使中国农业发生根本改变还需进一步实行技术改革。所以，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合作化是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搞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合作化运动也能够提高生产力，能够使我们的生产潜力大大发挥起来，像我们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指出的，可以使有些地方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到五百到八百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没有机械化以前也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

但是，没有机械化以前，还谈不上我们社会面貌的根本改变。要想使中国社会面貌有进一步的改变，就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之后，就不仅是单位面积提高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提高的问题。现在单位面积为什么能提高呢？是加工，增加劳动日，一亩地从前用二十个工，现在因为集体化了，就可以用三十个工，这种生产力的提高是增加劳动日得来的。当然，同一个劳动日可以增加生产，但是，这种生产的增加有一定的限制。机械化后就不同了，它不是一个单位面积的问题，一个劳动者现在可以耕三十亩，一个大机器可以耕三百亩。所以，生产力性质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是要改变工具。

但是，在工具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情况下，要发挥劳动者的潜力，提高劳动技能，积累生产经验，充分发挥各方面生产经验的作用，也就是发挥生产力主体的积极作用。从生产力的提高中特别可以看出劳动者的重要性。

下面讲生产关系的问题。

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结合的方式，这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人和自然结合的方式决定于工具和劳动者这两个要素。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生产关系是解决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生产力是解决在生产过程里人和自然的矛盾。

生产关系有种种历史的形式。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主要是决定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那么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就不同，人和人的矛盾关系也就不同，也就是生产方式有所不同。

生产关系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生产资料是归劳动者集体所有，还是归私人所有，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的形式。生产资料可以是劳动者集体所有，社会所有，也可以是个人所有。个人所有也有两种，一种是劳动者个人所有，一种是剥削阶级个人占有，或者是剥削阶级集团所有。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生产资料包括工具以及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条件。这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就规定了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社会上各个集团相互之间的关系，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讲生产关系常常是指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关系。实际上，更根本的一方面是所有制的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就规定了生产过程里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人和人的相互关系。

这种在生产过程里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规定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一种是劳动成员之间同志互助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中间还有过渡的关系。这两大类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哲学上研究问题时，总是作一个最高的概括。概括的结果只有两大类：一个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一个是同志互助的关系。通常讲生产关系就是指这种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相互关系。

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阶级剥削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归剥削阶级个人或者剥削阶级集团所有，才产生的。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呢？

因为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它就利用生产资料作为一种剥削手段。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可是，劳动者要想进行生产，必须要跟生产资料结合。（生产方式就是劳动者跟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生产资料被剥削阶级掌握，劳动者怎么跟生产资料结合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劳动者要受剥削者的剥削。剥削者把这些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作为剥削的资本，剥削者要生活下去，就要使劳动者跟他的生产资料

结合，就是采取剥削的方式来结合。

所以说，在生产过程里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讲经济上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此外，还有政治上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社会成员之间同志互助的关系，是在另外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下产生的，就是生产资料不是由剥削者所占有，而是由劳动者集体所有，或者是由社会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人可以利用生产资料来剥削人，劳动者就不需要被迫跟剥削者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是跟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它的结合就不需要用剥削的方法，不需要通过剥削的方式来结合。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剥削的关系，就不会有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生产资料归大家所有，劳动者在生产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被强迫、受统治的必要了。这样在劳动者中间自然就会建立同志互助的关系。

在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情况下，劳动者之间可能建立一定的同志互助关系。在旧社会里，个体农民也可以作到这一点。不过这种情况是有限的。因为虽然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但它是私有制，生产资料还是归个人所有，因此这里面可以产生剥削的因素。在这一范围内他不一定剥削人，可是生产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它变成富农就要剥削人，统治人。所以，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建立同志互助的关系。超过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也有变成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可能。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带有两重性，它本身是劳动者，但又可能成为剥削者，这是他们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不同，又由于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关系不同，因此，生产的分配的形式也就有所不同，这就是生产关系的第三个方面。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下，生产的分配是一种形式，在同志互助的关系下，生产的分配是另一种形式。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下，生产品分配的形式总的说来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形式，统治者用剥削的形式来分配生产品，劳动者是在被剥削的形式下来分配的。当然，这里剥削的形式不同，那么分配的情况也就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用地租的形式掌握生产品，农民就是得到地租之外很少的一些剩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所得到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劳动者分配的形式是工资。不同的剥削制度下，有不同的分配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互助关系的分配形式里是没有剥削形式的。但是，这种同志互助间的分配形式有各种各样的。在原始社会，大体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就不是平均主义的。所以农民的平均主义

要求，并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分配是按劳取酬的形式，共产主义是各取所需的形式，按劳取酬又有具体的形式，工人是得到工资，农民是取得一部分实物和一部分工资的形式。

生产关系就包括以上这三个方面。一般来讲，生产关系就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关系，或者是生产过程里社会集团的关系。更深刻地来讲，这种关系是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如果更详细地讲就是上面讲的三方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关系里关于人和人相互关系这一部分，除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和社会成员间的同志互助关系外，还有一个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这种过渡关系是指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苏联哲学界有过讨论。最初一个时期有人主张这种过渡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过渡到阶级社会的关系，这就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公社。但是，在农业公社里已经开始使用奴隶，所以，已经开始向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过渡了。这是讲由同志互助的关系过渡到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是由无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的社会。另外一种是由有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在这里就有不同的意见。以前苏联教科书上说：过渡关系就是指由个体农业过渡到集体农业的关系，我们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就相当于这种过渡的关系，个体农民经过合作社变成集体农民，就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照这种讲法来看，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过渡关系，特别是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但还有一点统治与服从的残余。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情况下，对抗性矛盾在消灭中，但是还有一点对抗的因素，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变成劳动人民，但他还有资本主义的一方面，是跟工人阶级对抗的。这不是说资产阶级本身又是对抗的，又是不对抗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在本质上是对抗的，但是在公私合营之后，资本家过的生活已经有一部分不是资产阶级的了。这种关系是一种过渡的关系。

我们认为这种了解是合理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一种过渡的关系，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的关系，这样了解是对的，我们肯定这种意见。不过，康士坦丁诺夫的新教科书也和旧教科书不同。旧书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新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就含混了。他说：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又有资本主义的，又有社会主义的。但是，过渡的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就没有讲清楚。因为对资本主义不能够叫作过渡，这种关系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消灭它。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过渡，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同志互助关系。所以，只能够说过渡时期经济里有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不能笼统地说：过

渡时期的经济整个来说是过渡的生产关系。我们是这样的看法。苏联没有公开写文章进行争论，但是康士坦丁诺夫的书上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含糊，恐怕大家看了发生疑问，所以顺便提一下。

2.生产的第一个特征：生产的变化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这个题目分两部分来解释：一部分是讲生产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另一部分是讲生产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生产的变化、发展所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首先因为生产是维持社会生活的根本源泉、根本条件。没有生产，就没有维持我们生活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人不能够生存，社会就不能够生存，只有经常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把生活维持下去。这种消费的需要，首先是生活消费的需要，如吃、穿等。另外，生产本身也有一定消费的需要，如工具、原料等。所以，要满足这两种消费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取得人类社会的需要。但要向自然界中取得这些资料，不是现成就有的，这就需要人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就是改造自然，就是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要把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物质改变成为适合人消费需要的物质。这是人和动物生活不同的一个特点。动物生活是依赖现成的条件来维持生活，人类就不能依赖现成的自然条件来维持生活，而必须经过生产。

资产阶级有一种社会学，叫作气候论。这种观点认为热带地方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很多，所以热带的人就享受现成的自然界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物质资料。所以，热带的人就是不劳动，不进步的。这是对热带民族的一种污蔑，好像热带民族过的是野兽生活一样，好像他们的生活不需要通过生产来维持。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人类生活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要维持生活总是要进行生产，总是跟动物有原则的区别。动物可以不要改变自然，可以依赖自然界的现成条件来维持生活；而人类一定要改造自然，人类的消费是不能中断的。社会生活天天提出各种新的消费需要，所以生产不能有一刻停止。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信里讲到这样的话，他说：人类社会只要停止劳动一个星期，全社会就可能因为饥饿而灭亡。这个道理是很容易了解的，没有生产就不能够供给人类社会消费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这样的社会就不能够存

在。所以，生产首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一个不能停止的连续不断的过程。

生产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生产过程，主要表现在各个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上。生产不是永远按照同一方式进行的，这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一种动物它维持生活永远就有一种方式，比如，蜜蜂维持生活永远是依靠它的酿蜜器官，它维持生活的方式是不会变化的。人类社会生活不同，人的生产方式会变化的。在历史发展过程里，生产方式由一种进入到另外一种，由比较低级的进入比较高级的。由于生产力进步，使得生产力性质发生变化。生产力性质变化了，生产关系也就跟着变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都变了，那么生产方式也就变了。

生产由量变到质变，首先是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生产力量的发展引起它性质的变化。原始公社由于劳动技能提高，生产增加了，于是由粗糙的石器生产进入到使用金属工具生产，由全氏族的集体生产进入到可以以家族或者以个人为单位来进行生产，这就是性质的变化。生产力性质变了，生产关系就跟着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机械工业大大发展起来。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变成集体生产，集体生产又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于是，生产力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跟着，生产关系也就变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革，这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表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我们历史上有过五种基本生产方式，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生产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五个基本阶段。我们中国就要走入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一个阶段。

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首先它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可是又不是简单的连续发展，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所以，观察生产时，我们也要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研究生产过程要注意到生产如何经过量变到质变，然后由低级到高级，我们应该用辩证法观点来研究它。

现在我们国家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农村里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也完成了。完成这样一个变革，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全国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没有到来以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没有到来以前，在一些人的思想上有一种爬行思想。从思想方法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缺乏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生产，缺乏由量

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观点。这种思想就是没有注意到合作化运动是一个飞跃，是一个迅速的、根本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是这样。这些变化都是到了条件准备到相当成熟的时候，它就要发生迅速的变化。爬行思想认为这种变化应该是慢慢来的。这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

庸俗进化论的特点就是它好像并不否认质变。一般形而上学发展的观点是否认质变，仅仅承认有量的变化，这是旧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点。到了进化论之后，这种仅仅承认量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行了，所以形而上学就不能不采取庸俗进化论的形式，表面上承认质的变化，但认为质变是一种慢慢的变化，不是迅速引起根本变化的发展过程，把质变看作是慢慢爬行的发展过程。这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二十世纪初期流行的一种发展观点，是一种变相的形而上学发展观。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里，这种爬行思想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在实质上这种思想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思想，没有把生产方式的变革看作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量的准备到了足够的程度的时候，就要迅速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把斯大林所讲的逐渐过渡这个思想公式化了。过渡时期是逐渐过渡，是经过几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过劳动互助，又经过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又经过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又经过公私合营。逐渐过渡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总之，都有飞跃。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以前，有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用量变到质变的观点来观察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中有一个公开的右倾思想，怕合作化发展快了，要进行收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在表面上是“左”但实质上是右的思想，就是不愿意接近资本家，好像是阶级立场非常稳定，对资本家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实际上是不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努力促进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不注意到我们国家应该自觉地、主动地去推动这个高潮。所以，对生产发展的过程，应该也要注意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这种辩证法的思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过去了，我们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改变的问题基本上完成了，在没有完成的地方进行工作时就要注意到以前的经验。因为我们总结以前的经验，就可以指导以后的工作。

对生产本身变化发展的过程就作这样的了解。

另一方面我们就要说明生产、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的书上说：生产、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的一个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它对社会的性质和面貌起决定作用。因此，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当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

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怎么样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呢？

首先，生产变化的过程引起社会精神生活变化的过程。生产发展了，生产发生了变化了，那么人类社会思想也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人类思想发生变化后，就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改变各种社会制度，改变各种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的变化首先是生产的变化，生产的变化就是经济制度的变化。经济制度变化引起了人思想观点的变化，主要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变化，然后再进一步是宗教、文艺、道德上的各种变化。思想体系发生变化之后，人就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来改变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所以，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来。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以前，在生产过程里先有变化。生产过程发生变化之后，然后就产生一个文化革命，以新思想批判了旧思想，然后很多人在新思想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建立新制度。比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了工业，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然后才有“五四”文化运动。当然“五四”运动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可是，如果中国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俄国革命也不可能引起“五四”这种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时候，比如说在满清末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到欧洲去留学，孙中山也到世界各国去过，孙中山并且知道资本主义是不对的，可是辛亥革命以前没有出现“五四”文化运动。欧洲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俄国革命，已经有了巴黎公社，但是这些搬到中国来也不能适用。到了中国经济发生变化后，主要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工人阶级壮大了，这时有了“五四”运动，就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了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经过1918—1920年，就使得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组织起来，就产生了共产党，就开始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制度。然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又进行革命斗争。

由“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个过程就说明生产发展如何引起整个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如何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这种基本规律到处都是一样。法国革命以前先有资本主义制度，

然后有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运动，然后是法国革命。这个基本过程对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适用的。

所以，生产、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是整个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要正确地了解社会如何发展，首先就要研究生产。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就叫作生产的观点。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要从生产方面去找根源。观察任何社会问题，或者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总是要从生产里去找最后的根源。

这样的观点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一些原则、观点的了解是容易的。但要紧的不是去了解，不是简单地去了解这些原则，而是要把这些原则掌握起来，变成我们的方法，就是在生产问题上，要把生产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当作我们的方法。任何时候，观察任何社会问题时，首先要从生产方面去注意。

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历史学家就不懂得这一点，不懂得观察社会问题首先要从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观察起，所以，他们总是要犯错误。

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决定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发展。这个原则就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首先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根本上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又是生产者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我们说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意思就是说：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并不能说生产的历史就能够代表全部人类社会的生活。除了生产历史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历史是各方面的。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点就是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就是研究历史首先是研究生产的历史。不注意到历史有各方面，这是错误的，这是片面的观点。如果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历史解释为简单的生产历史，他写历史的时候就是写生产，不写其他的东西，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就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就犯了只注意生产不注意政治文化的片面性的毛病。如果是写经济史，可以只写生产，但是要写人类整个的历史，就不能够这样写。其实，就是学习经济学，也不能够完全脱离政治和文化。马克思的《资本论》常常涉及到政治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就是研究经济也不能够把经济跟文化、政治脱离开。所以，不能把历史简单地了解为就是生产的历史。

可是，如果我们不强调历史首先是生产的历史，那么就不能够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这里提问题要有一个分寸，一方面要反对把历史简

单归结为生产这种片面性。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不注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环节这种片面性。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多半是喜欢把生产、政治、文化并列起来看。比如实用主义就是想用这种并列的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当作历史的中心的这种观点。胡适把他这种观点叫作多元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生产。胡适说：决定历史的东西不仅仅是生产，而政治、文化也决定历史，各种条件都起决定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叫作经济史观。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简单地把历史归结为经济，也就叫作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的看法：当然，经济、生产是一个决定的条件。可是生产的决定作用这个原则并不否定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虽然坚持了生产和经济是决定的条件。而经济决定论就是否认政治、文化的作用，认为经济决定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是这样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叫作经济决定论，就用多元的历史观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我们绝对不是经济决定论，但是也决不是那种经济、文化、政治并行的所谓多元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是把经济生产看作是首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首先是生产发展决定历史的发展。然后，马克思主义者又承认政治、文化对经济也有它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它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环节上，在一定的范围内，政治、文化也会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比如，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要进行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自觉地起来，这时理论就起决定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到没有无产阶级自觉的运动就不能使社会前进，不能使生产发生变革因而需要自觉的革命运动时，理论就起决定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认为生产是最根本的、经常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政治文化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在某些环节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说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应该这样来了解。

3.生产的第二个特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我们已经讲过，生产的第一个特征告诉我们观察问题的生产观点。生产观点就是把历史首先看作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运用这种观点来观察问题时，就是首先要从生产方面去找问题的根源，但同时又不要忽视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作用，这就是一般生产观点的基本原则。

另外，生产的第一特征也告诉我们观察问题的群众观点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我们肯定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群众的历史。

这样一个历史观点跟过去传统的历史观点完全对立。过去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观点主要是把历史看作是英雄人物的历史。这种观点过去很流行，就是现在也经常影响我们。可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被历史假象所迷惑的一种观点。由历史上表面的假象看来，好像历史的确是伟大人物创造的历史。本来伟大人物在历史上也有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过去历史上比较突出，特别是由于剥削阶级历史家的渲染。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总是把它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渲染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一种历史的假象，再加上历史家的渲染就使得我们长期有一种印象，历史完全是英雄创造的，而不注意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过去的历史很少写劳动群众，有的时候也写劳动群众，因为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劳动群众的作用的确很明显，这时不能不写。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有农民暴动。我们传统的历史家也要讲到农民暴动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不能不写。他不写农民暴动就不能显出来大人物的重要，他写农民暴动是为了显示他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旧小说里的《西游记》为了显示天宫的力量，不能不把孙悟空描写成很有力量的反抗人物。如果他不把孙悟空写得有本事，就不能显示出天宫的力量。

当然，也有一部分历史家对劳动群众的作用稍微看重一点。中国汉朝的司马迁，因为他对汉朝的皇帝不满意，所以在他写的《史记》中，就把跟皇帝对立的人物写得比较突出，把陈胜、吴广写得很英雄。这是特殊情况。一般正统历史家，他写历史就是压低农民群众的作用。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历史上群众受压迫，他的作用不容易显露出来。剥削阶级骑在群众头上耀武扬

威，它的作用就比较突出，因此就有一些假象。剥削阶级里的英雄人物，好像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假象推翻，按照历史的真正面目，按照自然的真正面目来认识历史，指出生产者、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首先是劳动群众，而不是伟大人物。伟大人物有一定的创造作用，但首先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然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劳动群众创立的基础上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够抹杀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过份地夸大。

为什么说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劳动群众是生产的主体，生产决定历史，但是生产依靠谁来推动呢？依靠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担任生产的任务，所以，他在历史上也起决定作用。

要了解历史是什么样的，就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里劳动群众是怎么样进行生产的。劳动群众生产的情况不同，历史发展的情况也不同。为什么在过去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到了20世纪革命之后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些英雄人物，凭空造出来的革命？当然不是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生是因为劳动群众的生产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生产过程里有了大工业，劳动群众中间出现了无产阶级，然后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来讲，历史上劳动群众的生活情况怎么样，生产情况怎么样，历史也就是怎么样的。劳动群众是用石头工具生产，就有原始公社这样的制度。劳动群众用金属手工工具进行生产，是小规模地进行生产，就必然要建立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劳动群众中间如果没有进行一种机械的集体生产，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首先，劳动群众的生产情况决定历史面貌。要了解社会情况，历史情况，首先应该了解劳动群众如何进行生产，他们进行生产的条件怎么样。

此外，还要注意到任何时候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劳动群众。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劳动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作用就会很显著。由一种生产方式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要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要把整个地球倒转过来，要作出这样大的事业，首先就要群众起来参加，群众如果不需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改变。为什么资产阶级不能够推翻封建制度？这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力量能够作到的。资产阶级利用了农民不满意封建制度这一点，然后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生，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够再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

所以，历史的变革是劳动群众自己创造的，历史的发展是劳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情。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是劳动群众要求解放自己的一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参加的愈积极，那么这个变革就愈彻底，劳动群众活动的少，变革的彻底性就会差一些。我们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法国大革命最彻底，那就是因为劳动群众参加的最广泛。有些革命是采取改良的形式实现的，不是很彻底，这就是由于劳动群众没有很积极地参加。中国的辛亥革命劳动群众就没有广泛地参加，所以辛亥革命就没有成功。

在平时，不是在生产关系变革时，劳动群众的作用不显著。可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依赖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说，不管是文化、政治的发展，它总是建立在生产上，生产如果不发展，那么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平时，历史发展快慢的速度也决定于劳动群众在生产过程里的发展速度。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停顿呢？就是因为小规模个体生产本身发展速度比较慢，又加上统治阶级的剥削，使得劳动者没有力量发展生产，社会进步就慢。

上面这些就说明为什么历史首先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理由就要运用群众观点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观察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劳动者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毛泽东同志有一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参考。要肯定群众是历史上第一个创造者，作工作要依靠群众，要把我们工作的任务看作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情，要发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作用。

这次“八大”邓小平同志把群众路线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立场、观点，一个方面是方法。立场、观点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把历史看作是群众自己的历史，因此把我们的一切工作任务看作是群众自己的任务，要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工作。所谓方法的方面，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这里讲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解决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至于方法问题也应该联系着了解。

总之，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树立群众观点，要反对英雄造时势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一种被历史表面假象所迷惑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要反对这种思想就要树立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就是要能够充分了解到历史是生产者群众的历史这个原则。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作进一步的发挥了，因为以后还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讲。我们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引起大家的注意。历

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环节之一，或者说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要树立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

生产的第二个特征主要是说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这个规律。

这个规律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这里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另外一个讲法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还有一种讲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几种说法都可以。这里我们不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我们不用这个公式。这个公式虽然是对的，但是往往概括性不够，不能概括某些具体情况，容易引起误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农业里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可是我们的合作社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生产力很落后，还是使用旧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关系是先进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公式就不完全适合了。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发展起来之后，它的性质就会完全跟生产关系一样了。但是，在目前来说，生产力跟生产关系这两方面还不完全一样，生产力性质是很落后的，而生产关系是先进的。所以，我们一般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这个说法概括性比较大一些。或者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没有合作化以前，我们的生产力就是个体劳动的生产力，是很低、很落后的生产力。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也就要求合作化了。生产力虽然很低，但是按照它的需要来讲，它需要合作化，单干已经搞不下去了，特别是对贫农来讲。农村的生产力不是一种像工业那样社会公共性的生产力。按照它的性质和现状来讲它是很落后的，可是按照它的需要和情况来讲，它需要合作化。因为它不合作化就搞不下去了，就不能够前进。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合作化运动生产能够搞起来，而且能够基本上完成呢？就是由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讲法是错的。按照总的原则来讲，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从总的原则来讲是对的。但是要概括一些具体情况，还是用我们的说法更好一些。

还有生产的第一个特征和第二个特征之间有一定的关系，需要说明一下。

生产的第一个特征说明生产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生产的第二个特征是要进一步说明生产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要由低级到高级，要由量变到质变，为什么会引起生

产方式的改变。生产的第二个特征是说明生产发展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要说明生产过程自己本身矛盾的运动。所以，生产的第一个特征一般地指出生产是发展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生产的第二个特征就进一步分析生产发展过程的内部原因。

那么，应该怎么样分析这个内部矛盾呢？

毛主席的《矛盾论》是告诉我们如何分析矛盾的一篇最全面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部分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矛盾总的特点，一定要首先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这是分析矛盾一个最根本的原则。研究生产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就是运用这个方法来研究生产过程。要了解生产、生产方式发展的特点，就要首先研究生产各方面的特点，就是要研究生产关系的特点，要研究生产力的特点，然后再总起来了解整个矛盾的特点。所以，讲生产的第二个特征时，首先就要讲生产力。

生产的发展总是从生产力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开始，所以生产力在生产的两方面中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为生产总是先由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然后生产关系才发生变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就是说，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比较起来，生产力更活泼、更革命。

这里面也有一个分析矛盾的方法，就是分析矛盾虽然是一个个方面分析，但是分析任何一个方面的时候，总是要跟另外一个比较着来分析。比如，要了解生产力的特点，就要把它跟生产关系比较着来研究。

生产力有什么特点呢？

生产力的特点就是它比起生产关系来说，它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它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以，分析矛盾，分析任何一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关系中分析。

对任何矛盾的分析都是这样。对无产阶级怎么样了解呢？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要了解这个矛盾，就要一方面分析无产阶级怎么样，另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是怎么样的。可是，研究无产阶级时，就要把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关系联系起来分析。无产阶级是什么阶级呢？是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分析时要有联系地进行分析，不能孤立地分析，要和对方比较着分析，否则，分析就成为孤立的，就脱离了总体，也会犯错误。所以说，分析必须以综合为前提，在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

研究生产力的时候，要了解生产力的特点，就要把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比较着来研究。生产力的特点主要在于它跟生产关系比较起来，它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谓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意思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更经常一些，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不等待生产关系就前进了。生产关系总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在一定的情况下，它是不变的；可是生产力没有一个时候会停止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进行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里天天积累经验，有了经验就能改进工具，改进了工具劳动技能就提高了，生产力就逐渐进步了。无论生产力的发展多么缓慢，它时时刻刻总是有进步的。而生产关系是比较缓慢的，或者是相对不变的，生产关系一般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事物的内容比较活动，是经常变化的，但形式总是相对不变的。

什么叫内容呢？矛盾的运动就是内容。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是一个矛盾，可是生产力本身又是人和自然界矛盾的运动。这就是人改变自然，从自然界中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一种矛盾的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是决定于它的两个要素：生产工具和掌握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人类改变自然，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矛盾是经常变化的。人们天天在改变自然，积累经验，同时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可见生产力是时时刻刻在活动的。生产关系是形式，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形式，它是相对固定的。一旦形成一个生产关系，长时期就不变了。所以，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是指发展过程，是指发展内容来说。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内容就需要什么形式。当然，需要是一回事，实际上能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是另一回事。有的时候，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已经很高了，但是生产关系还不变，这种情况是有的。形式可以不适合内容，但是形式迟早要适合于内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就是形式一定要适合于内容。有的时候不适合，但是迟早一定要适合。所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在没有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农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于农民发展生产的需要。按照生产力的内容来说，它要求由个体生产变为集体生产，否则生产就不能前进。由于有这种要求，所以合作化运动就能够发展起来，由个体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就适合于农民所要求的集体劳动，集体生产。现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民的劳动技术还是很落后的，但是按照生产力的性质来讲，合作化之后，

生产力的性质也是集体性的，跟集体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所以，现在不能说我们的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性质完全不适合，因为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在合作化之后，生产基本上是集体劳动，集体劳动跟集体所有制，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有了一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么就一定有某种生产关系来跟它适应，因此就可以说，生产力在生产中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力怎么样，生产关系也就怎么样。这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矛盾一方面的特点，是生产力这一方面的特点。

其次，我们讲到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有什么特点呢？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种发展形式。这种形式对生产力来说是被决定的东西，可是它又不是完全消极的被决定的形式。一种生产关系产生之后，它对生产力又有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新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它又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场所。一般来说，一种新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原来的生产力跟它比较起来，就显得范围狭小了。因为新生产关系开辟了广大的地方，原有的生产力就不能够占领这个地方，因此就显得新生产关系比起来生产力更先进一些，我们应该肯定这一点。

所以，一般说，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又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绝对化，认为只有生产力才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只有生产力才起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一点作用也没有，如果这样来看，那是机械论，是一种片面性。

总的来讲，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又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就是在新生产关系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生产关系又会显得更先进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起推动作用，原来的生产力就显得比较落后，生产关系就能发挥一种力量来克服原有生产力落后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我们“八大”结论里所讲的新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是一个事实。

这种话虽然经典著作里没有讲，但是，经典著作里讲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时，实际上也有这种意思。新生产关系有一种先进的推动作用，能够克服生产力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是被克服的，所以，它对生产关系所开辟起来的广大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阻碍作用。所以，它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我们是应该肯定的。

为什么腐朽的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呢？

这里面可以找到种种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腐朽的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两个要素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应该根据生产力的要素来说明。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首先不能保证劳动者改进工具，甚至不允许他们改进工具。其次，就是不能推动劳动者来充分发挥他的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一切腐朽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都有这种阻碍作用。比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就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个阻碍作用就表现在对工具，对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这两方面。为什么它会阻碍这两方面的发展呢？理由也很清楚，一个地主把农民剥削得很穷，他就不可能有力量再来改进工具。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所以停顿很久，就是因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使得农民没有办法把原始工具比较快地加以改进。农民当然愿意改进他的工具，可是剥削制度不允许他这样作。在个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很苦，要改进工具是困难的，要使用新式工具就更困难。他被迫不能不用旧工具来进行生产。所以说，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工具的改进是有妨碍的。

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工具的改进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工具也有一定的改进。但是这种改进是片面的，像生产军火的工具可以改进，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工业方面的工具改进时就比较困难。由于生产过剩，机器停下来，每日机器只能开动60%，不能全部开动。对劳动者生产经验这方面来看也是这样，旧生产关系会阻碍劳动者发挥他的生产经验，提高他的劳动技能。理由也很容易明白，因为在旧的剥削制度下，劳动者简直就没有什么希望，因此他对生产就没有很大的兴趣。农民本来应该对生产有兴趣，因为他有自己的土地、房子，可是地主把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抢走了，每年剩下的也吃不饱，穿不暖，这对他的生产情绪有很大的打击，他也就没有兴趣来提高生产。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最大的阻碍作用就是打击劳动者的生产情绪。奴隶社会就严重地破坏劳动者的生产情绪。封建制度下，劳动者本来应该有积极性，但它还是被剥削制度所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工人是被逼迫着进行工作的。

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就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就有可能改进工具，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改进工具，有可能使劳动群众累积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发挥他的积极性。一般来说，除了奴隶制外，新生产关系能够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奴隶制初期，让俘虏活着，让他工作，这样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可以积极劳动。但对整个奴隶制社会来说，是打击劳动者的

情绪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自己的经济，在初期，剥削少一些，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中国每换一个新朝代的最初几年，生产力总是发展得很快，就是因为剥削比较轻。资本主义初期，工人出卖劳动力也是被迫的，但是工人最初出卖劳动力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积极劳动，增加工资。这种希望也刺激工人劳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开辟了最广大的地方。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具体内容。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是在这两个要素上起作用。所以，要了解一种社会是不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能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就要看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工具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抓住这个环节就可以了解这个社会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我们运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个原则来观察社会问题所要掌握的一种具体方法。

关于生产关系这方面的作用就讲这些。

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因此就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个原则、一个矛盾规律。这种矛盾所以产生，就是由于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这个原则能不能看作是绝对的东西呢？

不能够。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这是一般的原则，不能看作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不能说，生产关系的发展绝对落后于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定要落后于生产力。没有一本经典著作在这个原则上加上绝对两个字，因此我们就不能这样来了解，如果这样来了解就是形而上学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原则我们都不能用形而上学的原则去了解，不能把它绝对化。

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是一种一般的矛盾关系，因此，它有一定的相对性。说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就是说一种生产关系形成之后，它的发展比起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就是落后的。一种生产关系一旦形成之后，它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它内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一种生产关系形成之后它就相对地稳定下来，大体上就不变了。而生产力就要变，或者变得快一点，或者变得慢一点，但是总是在变；而生产关系大体上是不变的，因此发展就落后了。在这里，一个相对不变的东西跟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比较起来，这个相对不变的东西当然要落后。这里讲落后，就是缓慢的意思。有一个原理，讲差异就是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中间有一些

差异，这就是矛盾。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起推动作用，开辟了广大的地方。尽管如此，它已经相对地固定下来了。而生产力同时就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就由手工工具向新式农具发展，再进一步就要机械化，而生产关系大体上就是高级合作制。尽管它有推动作用，可是它本身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在发展速度上它总是比生产力落后一些。

一个新生产关系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它就落后于生产力。所谓落后就是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意思。速度上有差异，而这个差异就发生矛盾。怎么样发生矛盾呢？生产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性质逐渐变化了，原来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或者完全适合，或者基本上适合，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性质就不适合了；而生产关系还是不变，生产力的性质也就跟生产关系不一样了，统一性也就没有了，可是它还是要同时存在，这个统一性就很少了，这就是一个矛盾。在性质不变以前已经有矛盾了，发展速度有差异也就有了矛盾。有了性质上的变化，矛盾就更加明显、尖锐了。那时统一性也就消失了。所以说，统一性是相对的，只是有的时候某些方面有统一性，而在生产力性质已经变化，而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矛盾的两方面也就没有统一性了，这个时候矛盾就尖锐了。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在性质上没有统一性，因为生产关系是私有制，而生产力是社会性质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本质上没有统一性。但是，在新生产关系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要互相依赖。最初，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家庭手工业，以后是工场手工业。在这些阶段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基本上适合，因为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很小，虽然是集体劳动，但是它没有使生产发展为社会公共性，还没有成为分工合作的社会体系。工场手工业可以比较孤立地发展，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体系，形成社会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个时候资本家的私有制是适合的。一个资本家投资建立了一个手工工场，就在资本家的统治下发展。那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是适合的。等到发展到大工业时，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家所有制，可以说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生产体系，生产应该是社会的，而生产资料是资本家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尖锐的矛盾。集体劳动跟资本家所有本来就有矛盾，但在手工工场时，基本上是适合的，有了大工业后，在本质上就不适合了。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就使得生产的内部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就需要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变革，生产关系

相对不变的情况就要中断，由一种生产关系迅速变成另外一种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赶上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就不能够说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时候，就要说生产关系通过迅速的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是讲生产关系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它跟生产力比较起来，它的发展就要落后。可是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生产关系还是可以赶上生产力，还是能够经过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不能说生产关系的发展绝对落后于生产力。这样的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了解，是一种片面的了解。说生产关系发展落后于生产力，主要是表明为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会发生矛盾，想要说明这个原因，因此就提出这个原则。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运动就是生产发展内部的根源。这个矛盾是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的。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由于生产关系发展落后于生产力，所以生产关系的形式由适合于生产力性质变成为不适合生产力性质，这样就暴露了矛盾，产生了矛盾。

矛盾的解决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斗争，这个斗争表现为人的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使生产关系重新适合于生产力。这样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就能够解决。对立的两方面就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就是生产关系跟生产力有一个新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一建立起来，立刻又向矛盾的方面发展，立刻生产关系又落后于生产力，又逐渐暴露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是生产发展、生产方式变更的内部源泉。这个矛盾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也就是矛盾产生和矛盾解决的基本原因，就是生产关系一方面在发展上落后于生产力，可是另一方面，它又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尽管它落后，但它迟早要适合生产力。这就是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基本原因。

讲完这些之后，附带有一个问题要说明一下。

可能引起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发展的内部根源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运动，那么，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又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就是生产关系。这样就引起一个问题，就是外因决定内因。所以，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是在生产力内部，就是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相互关系。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生产力发展的根源还是在内部，还是在生产力本身。生产力是什么东西呢？生产力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的矛盾，人要求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要求克服自然。人和自然矛盾发展的决定要素就是工具和人自己本身，但是矛盾的性质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根据。因为人需要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就要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在生产的过程里，就有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据。如果没有其他外来的阻碍就可以发展。但问题是这种人和自然的矛盾不能离开社会来解决。人要跟自然斗争，人和人之间一定要建立社会关系。所以，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力内部矛盾的运动就不能够开展。因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一种推动作用，或者阻碍作用。对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外部的东西，但它是生产力所不可少的东西。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发挥一定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说，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无论如何生产力发展的根据还是生产力自己本身。因为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要通过生产力自己内部的因素才能发生的。这叫作外部原因通过内部原因起决定作用。我们讲到生产关系怎么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通过生产力本身内部的原因才能发挥作用。生产力发展的根据是生产力自己本身，主要是看工具能不能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能不能提高。

还有，我们“八大”决议中讲到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现实的矛盾。先进制度基本的东西就是生产关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新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对这个矛盾怎么样了解呢？

要了解这个矛盾先要注意到我们读这个文件时，不要把后一句话和前一句话脱节。文件上讲到先进的社会制度跟落后的生产力现实的矛盾，讲到这一点以前有一句话说：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状况的矛盾。应该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了解。先进制度跟人民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是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的人民在旧中国，在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以前，我们已经有了把中国建立成为新工业国的要求，可是这个要求不能够实现。当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那么，这种要求就成为现实可行的要求了，就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了。在旧社会里，这种要求只是一个脑子里面的要求，不能成为实际的东西，到了新社会，就成为实际可行的了，使旧的农业也可以变为现代机械化的农业。

先进制度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脑子里面抽象的可能变成实际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遇到一种现状，就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发展先进工业国的可能性跟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有了矛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是落后的，而我们的制度又开辟了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现实的，是实在的，不光是脑子里面想的。

为什么是现实的呢？

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了，所以，我们研究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现状的一方面，也要看到劳动积极性普遍的提高这一方面；而劳动积极性这方面是主导的方面，落后的农业国这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暂时存在的东西，不是一个必然的东西。在旧社会来说是一个必然的东西，从将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不是必然的东西。必然的东西是劳动者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矛盾应该解释成为在先进社会制度下所开展起来的发展工业生产这种可能性跟落后农业国现实性的矛盾，落后的农业国这个现实性是要被克服的。所以说它是一种阻碍作用，是对我们的要求起阻碍作用，所以是一个矛盾。

把前后这样联系起来就容易了解了。这就说明生产关系在它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先进作用的。对这种作用如果说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了，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切可以考虑。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会，好像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需要。

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不需要太多的争论，争论得太多就变成一种扣字眼的争论了。问题是对这个意思怎么样了解，新生产关系是有一种先进作用，因为它开辟了广大的地方，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实在的，不是空的，是目前生活里实在存在的一个东西；而生产现状是落后的，可能性就要跟现状进行斗争。这跟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原则并没有什么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认为新生产关系总是对生产力起强大的推动作用，生产力是被推动的，生产关系是主动的东西，所以生产关系就有先进作用。这跟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这个论点没有什么矛盾。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是讲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它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生产力，新生产关系起推动作用讲新生产关系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虽然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的发展还是落后于生产力。因为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它就稳定下来了，而生产力是一直在发展。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生产关系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就是矛盾的基本的方面，能够对发展过程起推动作用，起决定作用，而落后的农业国这个现状就不能起决定作用，因为落后的农业国要被克服，先进的

工业国一定要实现，因为新生产关系开辟了这种可能性。这样，新生产关系起了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变革时期，新生产关系是主要的。在没有变革的时候，改变生产关系是主要的。改变之后，新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要进行种种工作使新生产关系建立得更好。比如，分配制就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合作化搞起来之后，分配搞不好就不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秋收之后就要好好地搞分配。这就是要好好地建立新生产关系，使它能够在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刺激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在我们新中国主要矛盾里的主导方面当然是生产关系，因为它是一个决定的力量，是规定社会性质的，规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上面已经把生产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在理论上作了一些说明。现在根据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对生产的矛盾运动做一些具体的说明。比如生产关系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如何起反作用。不说明历史的过程，对理论原理就不会有深刻的了解。

总的来说，人类历史经历了生产发展的五个基本阶段，也就是经历了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这五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性质各有不同，生产关系也不同。

最初的人类社会是原始公社。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的情况怎样呢?这主要是讲生产力的性质。当时主要是用石头工具，到原始公社末期才有金属工具。生产力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原始公社有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的时间。石头工具有前期、后期。前期是很粗糙的，是打制，把一块石头打破以后，利用破片作工具，又叫做旧石器时代。后期是磨制，使它光滑，又叫新石器时代。在原始社会中，除了石头工具以外，还发明了使用火，后来有了弓箭，最后发明了陶器，以后逐渐能炼金属。

原始公社的主要生产技能是狩猎，它占最长的时间。到末期只有一万多年的时间中，有了畜牧和农业。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性质有什么特点呢?

要了解性质，就要弄清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基本特征，然后把基本特征综合起来，就表明这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在方法上讲，就是观察问题要注意到联系、发展、量变到质变、矛盾运动、发展的曲折性、否定之否定。这是质的规定性。我们要用这种方法了解原始公社的质的规定性，把握质就是把握基本特征。比如了解这个人的品质如何，不能根据脸上的特征，说这个人生得漂亮品质就好，汪精

卫生得漂亮，但他是最可耻的。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质，就要抓住这个人的社会特征。中国离匈牙利很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了纳吉政府的质，他上台以后，对苏军采取反对态度，要依赖联合国，我们就肯定这个家伙起码是共产主义的背叛分子。匈牙利说他软弱，这个软弱走上了背叛的地步。这两个特征规定了他反动的质，共产主义者决不会这样作。卡达尔就不这样，他欢迎苏军，拒绝联合国干涉，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兄弟国家中最有声有色的一种表示。(现在有个潮流，想要放松无产阶级专政，要民主化，口号是“非斯大林主义化”。)卡达尔能表现出这三个特征，就能够确定他的政府是革命的。这就是把握质的方法，去粗取精，把粗糙的东西撇开，把基本特征综合起来，就可以肯定质是怎样的。

原始公社生产力的性质怎样呢?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特征:

第一，是集体的。生产力要依靠集体劳动才能表现出来，使用石头工具打野兽，要把比大象还大的猛犸打死，没有集体劳动是不行的。这种集体劳动基本上说是一种简单的合作的劳动，或者叫单纯合作。

第二，是没有社会分工。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种劳动—狩猎，到了末期有了畜牧业、农业，才有初步的分工，这是社会分工。

第三，生产力非常低，低到全部劳动日消耗以后，仅仅能够维持最困难的生活，没有剩余劳动。

这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力的性质。这种生产力性质是不是一定要有原始公社那种生产关系?我们说，很自然地需要有原始公社那种生产关系。单纯合作的集体劳动、没有社会分工的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力很低，必然要产生生产资料原始公社的所有制。因为劳动是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很自然要把生产资料当作公共的，在那种生产力情况下，不可能认为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是合理的。生产工具在使用时被个人占有，可是他死后仍归公社。森林、土地、猎场是公共所有。因此人和人的关系当然是同志合作关系，分配当然是没有剥削的，而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生产关系恰恰符合当时生产力的性质。

阶级社会的国家受了外来的侵略、剥削，还可以生存，像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生活还是维持下来，但最后翻了身。有些原始民族，像非洲、美洲的原始民族，遭了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乎完全灭亡，印第安人就几乎完全灭亡了。这样低的生产力是经不起剥削的。

原始公社的分配是平均主义的，但生产力稍微发展以后就有些不平均了。比如打死野兽以后，可以先割下自己喜欢的一块，别人再割，但基本上还是平均的，不然就不能维持。

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残余遗留很久，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公社制度的残余，一直到现代，偏僻的农村还有这种情形。大家庭有个家长，到外面赚了钱回家，进门就要把箱子打开让大家看，就要分配，如果把箱子拿到自己屋子里，就要受批评。

这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原始公社中生产力逐渐发展，有了畜牧业，小野兽捉来养，变成了家畜。后来出现了农业，最后金属工具也产生了，发明比较精巧的工具，最后手工业有了萌芽。到了有冶金的时候，手工业专门化了。

原始公社末期，首先有畜牧业、农业的分工，最后有手工业分工的萌芽。这时生产力性质变了，和原来原始公社几个基本特征完全相反，向对立的方面转化。原始公社基本生产力的性质是单纯合作的集体劳动，以公社为单位，到有了畜牧业，特别是有了农业以后，集体劳动的范围缩小了，最大限度就是由一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由整个氏族、整个社会的生产变成一块一块为单位的生产。畜牧以大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农业也是如此。以前狩猎是几百人去打，现在只要二三十人就可以了，生产就缩小到以家族为单位。

生产力提高了，多少就有了剩余劳动。这几个特征就是原始公社的对立面，不转不行，这是很自然的。从事农业生产不缩成小块不行。社会分工也是很自然的，生产力提高后，有了剩余劳动更是自然的。

生产力的变化，很自然地在生产关系方面不能不有所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转入原始公社的反面。

首先所有制逐渐变化，原始公社末期发生农业公社，基本上还是原始公社制度，可是跟狩猎时期不同。土地名义上是公共占有，但使用是按家族分配，起先是轮流分配，以后就固定分配来耕种，所以占有制无形中有了改变。家族内部实行公有制，可是家族之间土地各有占有权。

所有制在原始公社末期开始变化，农村公社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制度，已跟早期原始公社不同，有了向私有制转化的萌芽。虽然公社占有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实际支配的有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占有，家长制度是在农村公社产生的，家长有比较高的职权。

在向私有制发展中，社会分工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使社会中发生了交换，从事畜牧的部落或氏族要和从事农业的部落进行产品交换。中国古代的神话就反映原始公社末期的分工。比如有神农氏、伏羲氏。神农氏，实际上是指氏族，专门搞农业，所以叫神农氏；另一个氏族叫伏羲氏，就是征服野兽的，是从事畜牧的。不同的氏族只能生产一部分东西，相互之间就要交换。交换有一种条件，互相把东西当作对方自己所有，这无形中肯定了财产私有制。农业公社、畜牧公社出面交换的人多半是家长，家长就成为财产所有者。有了农业公社以后，家长的权比较大，而且财产好象变成家长的财产，家长就发展成为后来的剥削者。

交换引起私有财产的必要，引起私有观念。在很长的时期，名义上不是私有的，实际上成为私有的。工具不能不是家族私有，生产产品也是家族私有。在家族内部是公有，家族中家长又是主要的。男性中心社会主要是从农业公社开始，男性家长成为家中的代表人物。

由于生产的提高，有了剩余劳动，有了剥削的可能，因此在农业公社、畜牧公社中开始使用奴隶。奴隶最初不是由氏族内部发生，而是战争的结果，那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公社内部的传统不允许把自己人当作奴隶)，这样就开始了剥削。

这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简单情形。

原始公社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在农业公社时代开始有了奴隶，这种奴隶的使用逐渐发展，后来破坏了原始公社，就出现了奴隶社会。

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要破坏原始公社，为什么奴隶制度能占优势？在奴隶主强迫下，大批奴隶的生产劳动要比原始公社小规模集体劳动效率高。奴隶制度最初是产生在原始公社末期，大规模使用奴隶的是原始公社的一些领袖人物，专门打仗的人，氏族长一类的人。他们利用在交换中的代表地位，利用战俘进行劳动，就可以成为最富有的人，使他们能够占有大批奴隶，可以脱离劳动，专门支配奴隶进行生产。这样一来，奴隶主的经济地位比一般公社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奴隶主变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特别是因为部落战争的结果，氏族领袖掌握了军队，原来军队是为了保护本氏族的，后来军队变为站在本氏族上面的武力，后来又形成了国家。

原始公社到了农业公社以后，就必然转变为奴隶制度，因为使用奴隶的生产力比原始公社的生产力高。一般可以这样了解，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化，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集体劳动的性质变为分散

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性质。这种生产力分散的趋势，使劳动人民趋向于分散、没有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便于占有比较大的财富的剥削者来统治劳动人民。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特点，就是劳动者的经营是分散的。奴隶社会不同，在奴隶主支配下的奴隶是集体劳动。但有些国家的奴隶社会，比如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但下属的生产，个体劳动占很大的成分，特别是在初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奴隶制不能占领一切方面。这些劳动者也是被奴隶主所支配的，奴隶主的剥削方法就是税收。

生产进入手工业、农业时代，劳动发生了一种分散性，使得劳动者的力量也分散，因为缺乏自己的组织，所以受外来组织力量的统治。奴隶制度所以能产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

不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劳动者起来暴动反对统治者不能得到最后成功，就是因为劳动者缺乏组织，很容易瓦解。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奴隶社会中，生产力比封建社会低一些，所以集体劳动还占优势，一般使用的工具不是很进步的，因此奴隶主的强迫集体劳动就比一般劳动者小规模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更大，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因为他有可能来剥削剩余劳动，所以奴隶主就脱离劳动，并养活一批人来从事政治、文化的活动。奴隶制度一方面是残酷的制度，如果说原始公社是野蛮时代，是由于文化低，说奴隶制度是野蛮时代，则是因为不把人当作人；但奴隶主由于剥削剩余劳动可以养活一批人来从事政治、文化、科学、艺术的活动，所以开始有了文化，恩格斯把奴隶时代叫作文明时代的开始。

在奴隶社会中生产力有了分散的性质，可是分散的性质没有到极端，集体劳动是主要的，不过不是全社会为单位的集体劳动，而是以公社为单位的，或者是奴隶主统治下的奴隶集团为单位。封建社会的生产单位就进一步分散了，生产工具更进步了。奴隶制度基本上是铁器，中国那时有没有铁器不大了解，没有证明。战国时代有进步的铁器，奴隶时代可能已经有了铁器，封建时代开始能够普遍地炼钢。奴隶时代的铁工具是很粗笨的，所以要集体劳动。封建时代就可以通过个人劳动这说明已有了相当高的生产力。

封建社会是个体生产，充分发展了个体生产的特点，农民可以以五口之家为单位耕种土地；手工业者一个人就能维持一家的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性质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可以由个人来进行生产。生产力提高了，社会分工更多了，生产部门也多了，但大体上是农业和手工业。

在这样一种生产力性质下，生产关系很自然地要有所改变。封建社会的所有制，除了地主以外，还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生产工具的个人占有制。奴隶社会中已经开始有个人占有制，但除了奴隶的劳动以外，一般是组织在公社中的小规模集体劳动。

奴隶社会是轻视劳动的社会，所以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效能的积极性不高。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没有能很快地发展。

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极端分散的性质，很自然地产生了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劳动者占有工具，他的经营也是个体的，占有自己的经济。剥削形式是地主剥削农民。地主通过土地占有强迫农民把生产的一部分归地主所有。这种制度也是在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必然要产生的。

在封建社会中，生产是劳动者个人经营，那末地主怎能使劳动者受他的剥削呢？这是因为劳动者的生产分散，组织力量不强，地主阶级能比较便利地来统治劳动者。地主阶级掌握强大的经济力量，又有武装的国家的力量，劳动者除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起来暴动，得到一点胜利就又分散了，地主又来统治。

两重性的所有制也是很自然的，一方面是地主占有土地；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分散经营，劳动者又占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这是阶级社会发生以后，为什么生产关系跟生产力适合的具体内容。

大体上可以看到，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能够产生，主要是决定于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基本的特点，就是由整个社会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变为小规模的劳动，最后变为个体劳动。这就产生了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以后由阶级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又开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在封建社会末期，城市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开始把个体劳动组织起来，最初资产阶级是把家庭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由于个体组织集体化，是跟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分不开的。没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劳动就不能集体化，没有富农，手工业、农业就没有办法集体化。因为劳动者喜欢个人劳动，另一方面劳动者资本很小，他自己无法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要投资，这只有富农、资本家能够投资。由生产发展来看，封建社会由个体生产组织集体化，必须要有资产阶级，在那种情况

下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跟新的生产力性质是适合的。在那种情况下，除了资本家投资使劳动集体化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斯大林讲，资本主义最初时候的生产关系也是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情况的。这话是对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个体生产走向集体生产，虽然那时资本家的私有制跟劳动者集体生产已经有矛盾。德波林认为那时没有矛盾，只有差异，这是错误的。尽管有矛盾，那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在那时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为什么中国在 1949 年解放以后还要有个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方面呢？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广大的地方为个体生产所占领，所以我们要领导农民进行合作化运动。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各方面的个体生产者，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不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妨害，城乡交流就要受到阻碍。在封建社会个体生产的情形下，发展生产力在一定的時候非有资本主义不可。我们的国家是利用了这种历史的规律。有些国家一下子就把资本主义打死，我们就搞得好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使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使生产力的性质大大改变。改变过程从工具方面讲，首先把手工业集中起来，然后把手工工具变为手工机器，进一步就发明蒸汽机，建立了机器工业体系。这就使个体劳动变为分工合作的集体劳动，再进一步变为机器的分工体系。这种发展过程使得生产力的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个体劳动变为简单合作的集体劳动，小规模集体劳动变为社会公共性质的集体劳动。

建立大机器工业以后，生产过程变为社会性质。在工场手工业时代，还不能说生产过程已有了社会性质。到了机器工业建立以后，生产过程才有了社会性质。各工厂之间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各部门之间有严密的有机组织的关系。这种性质和原始公社集体生产的性质不同。原始公社是简单合作的性质，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说，已经是公共性质的了。

现在整个世界的生产，实际上打成了一片。中国对外贸易跟世界各国有许多联系。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己建立经济体系，可是不能不跟别的国家有来往。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相互配合才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建设上有过错误，就是每个国家都想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注意到生产的公共性质，没有注意到苏联、中国是大国，可以搞个完整的体系；但比较小的国家应当把生产的社会公共性质的规律应用在国际中，使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指导原则。

在这种情形下，生产力性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适合，因为生产关系是私人占有，而生产过程的规模是大的，是没有限制的。生产关系太窄小，而生产力是更广泛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多少有些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有所改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一个资本家可以投资建立手工业工场，最初的机械工场也可以由一家投资。但以后企业的规模大了，个别资本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企业，所以以后出现了股份公司、各种企业联合，最后出现了金融资本。美国有六十家资本家，大小资本家上面有银行资本来调剂，资本主义本身也不能不集中。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不是完全没有改变，这种改变使得一些改良主义者制造一些错误的理论，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和以前的资本主义不同，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了，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即用和平的办法推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家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资本主义虽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有所改变，但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虽然个别资本家经营变为资本家集团的经营，可是经济统治者、政治统治者仍然是资产阶级，所以生产关系是相对不变的。生产力是飞快发展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机会主义者把生产关系的若干改变看作是根本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生产力有了性质上的改变，个体生产力完全被消灭了，小规模分工合作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也变成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性质上起了变化，但在资本主义没有垮台以前，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同时存在，还有一定的互相依赖性，还有一定的统一性。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质上的统一性没有了。

为什么统一性是相对的呢？因为统一性在对立面能够成为完全的统一性或基本上的统一性时间很短，有矛盾就需要解决，对立面就要破裂，最后变为新的事物。

资本主义发展了大工业以后，很自然地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适合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尽管资本家私有制已经集中化，以资本家集团为单位经营生产，可是资本家之间还有利害冲突，它就妨碍了社会某种性质的生产力的发挥。现在我们的生产力是世界体系的生产力，可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家集团，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就妨碍了全世界生产力公共性质的充分发挥。苏伊士运河问题，由于英法资本家集团的利害冲突，就来个侵略，苏伊士运河停顿了，经济交流发生了障碍。有

些企业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美国就不能建立象苏联那样大的水电站，因为建立大水电站要有很大的地方受水电站资本家的支配，而且煤的销路要减少，火车运输就要蚀本，铁路资本家会不满意。我们荆江分洪水闸三个月建立起来，英国约翰逊大主教去参观，他说：这真太快了，我们要三年才能建立起来。在美国，这问题光是在会议上吵架就要吵三年。如果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公共所有，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全社会生产体系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因，这是生产力的要求。

总的来说，可以看到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如何适合生产力。

生产力的性质，大体上由原始公社的集体劳动性质逐渐变为阶级社会分散的性质、个体的性质，以后由个体性质的生产又逐渐变为公共性质的大生产。这是生产力性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和生产力发展过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氏族集体所有制变为带有剥削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再进入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整个过程中，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总是走在前面一些，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以前，生产力已经开始走向分散，规模变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以前，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社会的公共性质。从总的过程来说，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但生产关系落后到一定的时候，经过一定的变革，就赶上生产力。当生产关系赶上生产力的时候，它对生产力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工具改进了。生产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每个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都使得劳动人民在生产方面能前进一步。

现在研究历史上的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有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作为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这些规律作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

我们党和国家就是运用这个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来指导我们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怎样运用这个规律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工作呢？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受到了旧生产关系阻碍的时候，我们就要努力来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我们过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现在也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从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妨碍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使民主革命得到了胜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国家又碰到了一个主要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妨碍我们生产力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有两重性，一方面帮助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平衡的。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生产关系还能够帮助生产力的发展，最初的时候多少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由一些。最初几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大一些，最后两年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逐渐减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减少，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增长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矛盾，国家工业、商业、合作社商业的发展，总是要采取排斥资本主义的步骤来发展，不排斥资本主义，我们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一开始就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有矛盾。矛盾越来越尖锐，去年底已经是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来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但还有些残余。

经过两个革命，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新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就是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代替了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个体所有制也曾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大的地盘。生产关系显得很宽广，而生产力现状还很落后。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劳动者的积极性没有任何限制，启发了劳动者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新生产关系的先进作用，来努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前是要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现在不是要消灭生产关系，而是要巩固先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能顺利地发展。

新的生产关系只是基本上建立起来，还没有充分地建立起来，没有最后巩固起来。生产关系还不是很完备的。合作化运动以后，我们采取种种措施来巩固这种生产关系。巩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方法，就是要注意到几个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到新生产关系本身的特点，按照这个特点来很好地建立它；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固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新的生产关系要巩固，也要依赖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就是说，一方面要正确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要推动生产力发展，就要正确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是要按照生产关系本身的原则来建立。

生产关系包含几个方面：所有制形式，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分配形式。我们一定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从这几个方面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工商业方面，我们一定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国家所有，采取赎买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农业方面，我们一定要建立集体所有制，采取逐渐过渡的办法，由半社会主义形式进入高级合作社形式，使劳动者由个人私有逐渐过渡到集体所有。

社会成员的同志互助关系更重要，在农业方面我们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贫农、中农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这是符合同志互助关系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各集团之间，应该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剥削关系，而是同志互助的关系。

分配形式，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工业是工资制度，农业是农产品、劳动日的分配。按劳取酬制度应该作为我们建立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很重要的原则。如果在分配上不能遵守这个原则，那我们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可能充分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中央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以后，到现在秋收以前，强调搞好分配，要使劳动者觉得分配公平合理。这样就可以发挥推动生产力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自流的，是要人去掌握的，搞得不好，对生产就没有刺激作用。哥穆尔卡说他们的合作社生产力没有单干的高，这就成问题了。苏联有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有这种情形，就要检查生产关系是不是很好地建立起来了，检查各方面是不是符合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道理来看看中央文件为什么要强调自愿互利的原则，为什么强调分配，都是有理论根据的。

我们要善于运用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作用。要运用这种作用，就要善于正确建立这种生产关系。有的地方是形式上建立了这种生产关系，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这种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如果建立得好，生产力就能发展。同时生产关系要巩固，也得要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关系也不能巩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的，是建立在生产力之上的。基础不巩固，上层建筑迟早要瓦解。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以后，要很快地抓住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能巩固生产关系呢？因为生产关系就是财产关系，财产的占有、分配关系。要

能很好地占有财产，首先要有财产，财产要多，愈多愈好分配。占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生产力发展了，分配就多，分配多，积极性就高。农民，农产品多，分配多，就愿意参加合作社。资本家为什么锣鼓喧天地搞？这和中国的特点有关系，中国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单干时所得不多，合营以后有固定工资，比他自己搞更稳固一些。我们也是利用这点来安排资本家，使资本家觉得各得其所，不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反地，拥护这种生产关系。所以毛主席说在合作化以后必须增产，必须比单干户高。

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生产关系。尽管生产关系的原则很好，可是生产力不发展，原则也是空的。所以一方面要利用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作用，好好建立生产关系，另外，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巩固生产关系。

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规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和发展生产力的。我们要注意到新的生产力的社会公共性质，这种原则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工农业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方面要求得平衡，由国家控制各方面的生产，使各个部分能按照一定比例配合发展。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是从生产力社会公共性质出发所产生的规律，生产力本身不产生这样的规律。我们在建设工作中必须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就必须善于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来调节各方面的生产(轻重工业，工业与农业，农业中的粮食作物与技术作物等)，相互配合，不能过分强调一个部门，看轻一个部门，而使我们成为联系很好的体系。掌握这个体系是不容易的。各部门中有矛盾，部门内部也有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要调节矛盾，使生产力的公共性质能充分发挥。好的国家计划的特点，就是这种计划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公共性质，可以把这个原则作为工作的指南针。

4.生产的第三个特征：社会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到自觉的变革的过程

首先，我们应该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把生产发展过程看作是物质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认识不认识，不管人愿意不愿意，总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这种发展规律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在旧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有了新的性质，然后生产关系跟着改变。我们应该这样说，首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然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生产力总是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发生变化，有时可以在旧社会中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有时在旧社会垮台的同时产生新的生产关系。

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说得简单一点，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中产生。这个说法可以概括一般的情形，但不能概括特殊的情形。这里面有个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在资本主义中产生，都是在资本主义消灭的基础上产生。

这个过程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当人没有认识这个过程的时候，还是要进行这样一种过程，叫作自发的过程。如果能认识这个过程，并根据这个认识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带有自觉性。

当然这个自觉性主要是劳动群众的自觉性。认识过程如果仅仅是少数学者的认识，不能变为群众的行动，还是没有生产力的自觉过程，这也是要注意的。这也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原则的一种表现。没有群众的自觉，就没有真正的自觉。生产本身就是群众的生产活动，群众就是生产的主体。

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一定要表现为人民群众行动的自发性走到自觉性。这种自觉，常常要通过少数人的认识，少数人认识了这个规律，经过宣传，逐渐变为群众的认识，产生认识的自觉过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先经过自发的过程，然后进入到自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以前人类的历史大部分是自发的历史，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是片面的。就是最高明的历史家，多半是认识政治表现、文化表现，对生产历史上的作用，以前的人不大认识，因此也没有人掌握生产规律的知识来指导群众，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所以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主要是自发的，就是带盲目性的。不是认识这个过程，去推动这个过程的发展，而是自然而然的的活动。生产者不知道前途，指导生产的人也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生活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经济。

恩格斯讲，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人类历史，只是经过了一个序幕，没有真正的人类社会。

过去生产发展的自觉阶段仅仅是在革命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有新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人民还完全处

于自发状态，那就不可能知道应该把生产关系加以改变，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它用物质、思想、精神的方法来努力巩固旧的生产关系。它用一切办法使人相信旧的生产关系是对的。在旧思想的广泛影响下，就会使劳动人民处于自发的状态，使劳动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跟旧的思想作斗争。到了应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时，如果不跟旧的思想作斗争，劳动人民就不知道应该起来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变革以前就会有些先进人物提出一些先进思想向社会宣传，跟旧的思想作斗争，告诉人旧的生产关系是不对的，应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个新的思想一出现，就表现为一种思想革命运动，表现为新文化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如果得到胜利，会使相当部分的群众自觉起来，懂得应该破坏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

经过一个文化革命以后，就会产生人民的自觉的革命活动，这种革命活动就要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在政治上发生的冲突，一般是暴力冲突。完全没有暴力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阶级是用暴力维持旧的生产关系。所以自觉的生产过程，一定要引起暴力斗争，引起旧的统治的垮台，新的政权的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要靠新的阶级政权来加以巩固，加以发展，生产的自觉运动一定包含一种思想变革运动，加上政治变革运动，加上新政权代替旧政权。

所以，现在只讲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完全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原则错误。有人说尼赫鲁的政权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不同意这个说法，说尼赫鲁统治下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的“八大”报告也讲到这点，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绝对的必要。

所以，无产阶级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力量。它使生产由资本主义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生产。自觉运动里的中心环节，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任务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但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为没有政权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

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也就是由和平的生产发展过程进入政治变革的过程。

在过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自觉过程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在社会变革时有一种过程，其次自觉的高低也有历史的限制。比如资产阶级革命自觉的过程比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自觉程度高一些。它有一套批判封建主义的理

论，有整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时期，所以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到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利用规律指导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自觉性，越早就越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时候，奴隶的自觉性很片面，奴隶仅仅知道要打垮奴隶制度，不知道应该建立什么新制度。奴隶的领导者也是这样，奴隶的理想多半是要回到原始公社去，这是倒退的理想。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里，也有些以封建制度为理想的思想家。郭沫若的看法，春秋到战国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那么孔子就是这时的先进思想家，具有封建社会的理想。当时的人对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多少有些自觉，多少猜到了旧制度不对，看到了新制度的好处。郭沫若说，孔子的主要思想就是把人当作人，仁者人也，这表示要解放奴隶，但要维持等级制度。

原始公社垮台到奴隶社会建立，也有某种自觉的斗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描写了这种过程。奴隶国家的产生，有代表奴隶国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出现。

过去的生产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不过程度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生产的发展过程要成为充分自觉的。过渡完结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建设是自觉的，因为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有科学，不像从前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思想家，只有社会思想，没有社会科学。无产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规律全面掌握了，能够指导一切劳动群众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以后，又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应该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才进入了自觉的历史过程。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这就是说历史的必然规律能被人完全认识，人能掌握必然规律。所以应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不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一点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没有概括进去，但我们应该肯定这点，因为恩格斯讲了，我们是自由的王国。

无产阶级国家根据科学观点指导生产的发展、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我们认识清楚了新生产关系的性质，按照它的原则来建立。生产力的发展是认识了生产力的社会公共性质，有计划地来推动它的发展。很好地调节生产的自觉性就表现在国家的计划性领导上。

有没有自发地过程呢?不能说没有一点自发的东西。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自觉的,但在具体情况下也可以有自发的情形,因为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现实,主观反映客观,客观总是走在前面。生产过程里新的东西总是走在前面,人的认识总是走在后面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好处,就是人能比较及时地认识新的东西。整个社会的自觉性并不取消意识落后于存在的规律。因此我们的具体生产活动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新的生产力先产生了,然后领导才赶上去,从个别活动来看,仍然是自发到自觉。否认这点就会产生主观主义,好像人要怎样就怎样,国家要怎样就怎样。自觉性不能取消唯物主义的原则。社会的领导要经常注意赶上新东西的出现。比如新的先进经验怎样产生呢?多半是一个劳动者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它会不会变为自觉的,这要看领导。领导坏一点,看不到新的东西,自发的过程就拖得很长,生产的发展就受到损失,领导好,就立刻加以试验、推广、研究,就会很快地把自发变为自觉,使生产力的发展更快一点。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农业合作化,三户贫农自发地坚持合作社,领导很快地抓住了这个典型,加以推广,就变为自觉的。

苏联小的集体农庄变为大集体农庄,往往是由一两个劳动者冲破这个界限,然后才变为自觉的。《收获》这本小说就描写了这个过程。最初是小块土地分散耕种,第一年用马拉农具,收割的时候,割倒以后,一群人在后面把它捆起来。第二年换了拖拉机,但仍然划成小块,仍然有界沟。驾驶拖拉机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开得很高兴,一面唱一面工作,结果拖拉机过了界限,他震动了一下,他说:“管他妈的!”这样搞下去,农庄的人生气了,报告主席说,他太调皮了,把界限打破了,这怎样工作呢?农庄主席就问拖拉机手为什么把界限打破,他说打破界限一天能作四个劳动日的工作量。主席只好向大家解释:这样作效率提高了。这是自发的,一高兴就把界限打破了。在生产中,常常有有勇气的人不自觉地打破成规,好的领导就能及时把它变成自觉的。

我们国家在生产中要经常注意先进经验,要采用劳动者的合理化建议,这都包含有要善于使自发变为自觉的原则。

今后农村合作社、工矿企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哪里?

这个矛盾就是新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现状的矛盾,不克服这个矛盾,生产关系就不能巩固,迟早要垮台。

这个矛盾又可以解释为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和落后现实性的矛盾。因为新生产关系的特点，就是开辟了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启发劳动人民高度的积极性，这就和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发生了矛盾。

按照“八大”决议来说，就是人民要求建立先进工业，要使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就要克服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如果坚持落后的现状，就对人民的积极性泼了冷水，阻碍了积极性。

这里所讲的生产力，仅仅是讲生产力的落后现状，不是讲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发展的可能性是跟新生产关系一致的。

第 06 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956.09)

【这份讲课速记稿，讲得比较简明。讲课时间原未标明，大致和《生产发展规律性》一讲相同，中央党校曾铅印给学工人员学习参考。这次只作了少许文字加工。】

(一九五六年九月)

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讲里分三个大问题来说：

-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 二、社会的上层建筑；
- 三、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内)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1.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首先要讲的题目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社会它是直接把生产关系当作自己的基础的。生产关系是生产的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决定社会的面貌、社会的性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是生产，是生产方式。可是对社会面貌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这就是说生产关系怎样，社会就是怎样的。生产力起不起决定作用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是，生产力不能够决定整个的社会性质、社会面貌。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关系对社会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所以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生产和生产关系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里，生产力对社会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对历史的发展是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所以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

生产关系对社会的发展起直接的決定作用，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能不能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呢？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生产关系才能够规定社会生产的性质和面貌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犯错误。提纲上讲到高度工业发展的国家为什么不一定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在俄国革命以前，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团体有这样一种论调：他们主张只有高度工业发展的国家，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如果生产力发展不到高度工业化的程度，这种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迟一些。根据这一种论调看来，只有英、美、德这些国家才有可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俄国跟中国就不能设想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第二国际中很流行。那时改良主义在工人政党中很流行。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俄国革命就无法解释，中国革命也无法解释了。中国的生产力现状是落后的，但我们一天天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如英国、美国，而德国只实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事实，就必然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的改变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改变。不能够说生产力的性质怎样，社会的性质也就怎样。而只能说生产关系怎样，社会面貌、社会性质就怎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得很高，有高度的工业化，可是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力是比较落后的(但这个落后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落后到一点工业都没有。我们解放的时候，有百分之十的工业，而且很集中，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可是因为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就改变了。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可是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农业国只是就现状来讲是暂时的情况，并不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生产力的性质不能直接决定社会的面貌，而只能起最后的决定作用。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一定新的形式，那末生产关系才跟着改变，社会也就跟着改变，但并不一定立刻就改变。生产力是对社会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所以过去我们旧中国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希望发展科学改造中国，始终没成功。辛亥革命以后有很大的一批人，现在在新中国工作的很多科学家，从前都抱有这种理想，但他们的理想没有成功。因为在旧中国，首先科学工业不能发展，就是科学工业发展了，生产关系不改变，仍然是不能发展的。科学工业救国论，现在就可以说得通，现在我们国家就需要科学工业，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性质。这种科学工业救国论曾经被反动派所利用。虽然提出的这种思想是好的，但是蒋介石利用它使青年的思想离开政治，这样可以帮助他的统治。

在1927年以后，托派陈独秀离开了党，他有一种理论，就是根据生产力的性质来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这种理论曾有许多文章来为它进行宣传。我们党的理论界的人给了他们一些反驳。托派的理论主张中国的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占支配地位，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以后的工作怎样呢？工人阶级的工作就是帮助资产阶级上台，上台以后，工人阶级再作合法的运动，争取民主选举，争取关税自主，在合法运动中慢慢积累力量，然后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理论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1927年以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统治制度。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那是根据生产力的理由来说明的。他们并不是说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很高了，而是说中国已经能够使用机器了。他们着重在新的工具出现这一方面。他们有这样一种理论：使用帆船表明封建社会，使用轮船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帆船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轮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中国沿海大江有轮船了，因此中国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他们这种荒谬的理论认为，不但是生产力决定社会的性质，而且认为生产工具也可以决定社会的性质。他们不管轮船是谁的。我们中国的主要轮船所有权是英帝国主义的。甚至有一个托派搞理论的人曾经这样来叙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之所以能够进步，全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新的工具输入到中国来，使中国进步，中国的进步是依靠外来的力量。

我们党内当时搞理论工作的反对这种外来论。现代机器在中国主要是帝国主义所有，不能够决定中国社会本身的性质。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为了帮助同志们了解历史，所以提一下。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判了雅罗申柯，他多少有一点论述生产力的思想。他这种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生产力理论。在他看来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国家、政府是直接作为生产力的组织者，好像苏维埃社会是直接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上，国家直接解决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关系没有什么作用。他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矛盾，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矛盾。但总的说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限度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

产关系就应该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一个总的表现。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新中国的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标志着什么？我想也可以根据上面讲的来答复。中国将来生产关系的发展会慢慢落后于生产力。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将来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到了那时生产关系不变，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可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没有到共产主义时代，也会有矛盾的情况。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建立了以区为单位的合作社，这是冒进了。有的是一个乡建立一个合作社，但最方便的是一个村建立一个合作社。将来机械化了，技术改革了，以区为单位建立合作社也许就不困难，但也只限于平原的地方就比较方便一些，山区并不好搞。但一般来说那时如果还是以比较小的乡、或村为单位组织的合作社就显得太狭小了。这就说明生产关系会落后于生产力。现在是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将来由生产力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

雅罗申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就没有作用了。这是不对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是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的面貌也进一步地改变。就像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说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社会的面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后，它才会改变。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对社会的性质起直接作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是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因此我们说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关系上面，不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力上面。这样，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盖房子打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工人直接打桩的基础。基础的下面还有东西，还有地球。能不能说房子的基础就是地球？如果这样说就是笑话。房子的基础并不是地球，房子的基础是支持房子的那一块地方。生产力虽然是最后规定社会的面貌、性质，可是它并不是直接引起上层建筑的现象；上层建筑也并不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力上面。成为上层建筑的支柱的是生产关系。每一种社会都直接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础上。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所谓生产关系的总和应该这样了解：

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指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各个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前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种意见认为所谓构成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指的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只构成一个生产关系。这种说法是每一种社会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作为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以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基础是可以由几种生产关系总和成的，而不是由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总和成的。一个社会的基础可以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的生产关系总和而成为带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对基础也应当具体地了解，不能够单纯了解为一种社会只能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照前一种说法，旧俄国的经济基础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封建主义不可能作为它的基础，因为它主要是帝国主义。按照这种意见认为占有最重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够构成经济基础。照后一种说法，主要的次要的同样都能够构成经济基础。

这两种意见哪一种比较对呢？我看还是后一种意见比较对。经济基础可以由几种生产关系总和成。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有它的三个方面。我看这样一种看法比较正确一些。因为我们用理论解释社会生活不能够单纯化、片面化。理论是一个原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指导方向。我们解决问题要肯定它的复杂内容。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一个社会只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比如《资本论》是专门讲资本主义社会的，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那是在理论上讲问题是可以比较抽象、比较单纯来理解的。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分析问题就应该肯定这个复杂的内容，不这样就不能够解决问题。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面貌呢？你总得从它的基础上来了解，一定要肯定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是构成我们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不肯定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就不能够说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如果照前一种意见来看，旧中国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因此旧中国的性质还是封建的社会性质。这样，就不能说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为你没有肯定它的基础—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是旧中国的经济基础。既然把旧中国叫作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那它就是建立在几种生产关

系的总和上。像旧俄为什么叫封建帝国主义?因为它不但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在它广大的农村里封建的生产关系还占优势。不肯定这一点,不肯定它的基础上的两重性,也就不能够肯定整个社会的两重性。其他像日本、德国这些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还要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补课,虽然它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可是要革命还得先搞民主革命。

所以我觉得后一种意见比较正确,肯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可以包含几种生产关系类型。当然也有只有一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比如美国,它的基础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美国基本上没有经过封建制度,所以它是纯粹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英国也可以这样说,英国很早将封建土地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形式,成为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了。

所以每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它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的,这一句话并不是解释为只有一种生产关系构成的。在俄国,旧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建筑在地主阶级上,另一方面建立在财政资本家上。财政资本跟封建地主阶级同时统治着旧俄国沙皇制度。蒋介石统治的政府,有封建地主的支持,同时又有官僚资本的支持。所以说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可以只有一种。但是也可以有两种以上。除了统治的生产关系以外,每一种社会它可以包含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或者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些可以不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经济基础可以有两种以上,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算经济基础。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所有大大小小不管重要不重要的各种生产关系,同样都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说也不对。比如我们中国大凉山就有奴隶制度。那里的奴隶主是轻视劳动的。奴隶社会奴隶参加劳动,奴隶主不参加劳动,轻视劳动。大凉山的奴隶制度能不能就称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或者是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呢?在新中国来说它是残余,在旧中国来说也是一种残余。它是不占统治地位的。它是在一个小的角落里保持这种奴隶制度的。所以说这种奴隶制度不能够构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也不能够构成旧中国的经济基础。

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的社会里可以产生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如果不占统治地位,也不能够成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比如在旧俄沙皇制度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阶段。它跟西欧的英、法资本主义有联系,依赖于英、法资本主义。但它占统治地位,所以它跟封建制度构成为沙皇统治的生产关系。但是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如我们中国封建

社会的旧资本主义制度，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已经形成，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因素，而且是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纺织工业里出现得很多。现在的荣毅仁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家的。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在旧中国能不能够称为经济基础？这些资本主义在旧中国没有构成经济基础，构成旧中国经济基础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是受排斥的，没有占统治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占重要地位。所以民族资本主义没有构成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它只是一种新的经济基础的因素。那时虽然有了这种生产关系，但它不能构成新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对社会的作用问题应如何理解呢？

这个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作了一些规定：经济基础是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

这一句话要解释。在苏联的教科书上有些解释，在康士坦丁诺夫的书上也有过解释，我认为解释得还不很够。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就是指的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解释我觉得就不够了。这样解释对旧的经济基础的作用就概括不了，只能够概括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推动的作用。可是旧的经济基础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一种作用，旧的经济基础也会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作用，但也有破坏的作用，会破坏生产力。但对一些阶级来说，它也有服务的作用。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破坏的，对财政资本家来说是起了服务的作用。既然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就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经济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在生产关系里为社会服务，发展生产力可以同经济密切联系起来。但是单单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来看，还不算经济。比如提高技术，不一定是经济。经济要表现在分配上、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发展了生产力之后，生产力跟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联系，我们才叫它作经济。

所以把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仅仅看作为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真正接触到经济那个字。究竟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上起什么作用，生产力有什么用处，在生产关系里有什么用处，这种解释没有涉及到。所以我想应该有所解释。

所谓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一种经济它能够为了了一定的经济目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基础服务的目的受一定

经济关系的限制，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经济，因为它服务的目的也不同。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来服务的。

所以基础不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经济目的的。这种经济目的是具体的。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经济目的。经济基础就是满足发展生产力，满足一定具体社会的经济目的、或者叫作一定的社会需要的。所以不能够只看作发展生产力，而要看作发展生产力主要达到的目的这一方面，否则不叫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

所以各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总的原则上讲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但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在各个社会里有所不同。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什么作用，怎样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呢？

在原始社会里，当时的社会在经济上就有一个任务，就是需要维持公社社员最困难的生活。但是生产力很低，公社成员的生活很困难，需要有一定的与生产力发展情况适合的经济关系来维持一定的经济生活。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维持和发展当时最低的那种生产力，同时使得生产的成品能够保证全体成员的最低生活，而且使当时的生产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当时社会为经济服务的目的是整个社会的，全社会的成员需要有一个共同服务的目的，就是维持全体成员最低生活，使当时的成员能够生存与发展。为什么这样作呢？因为它的所有制特别是它的分配制能够保证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目的。公共所有制、同志互助的关系、平均分配，可以使得全社会的成员大致上不至饿死，大家都可以维持生活，而且有可能向前发展。

如果原始社会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没有这种同志互助关系的这种生产关系总和，如果它里面有剥削制度，它就不能够在社会生产力很低的条件下使全体成员生存下去。在生产力很低的条件下，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可以使全体成员很好地生存下来，而且使社会发展起来，这表现当时的生产关系跟生产力基本上适合。因为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基本适合，生产关系的总和才能够对社会有利，能够维持社会的生活，而且能够使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作用。

阶级社会里的情况与原始公社不同。在阶级社会里，在生产关系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阶级。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出现一种需要首先满足剥削阶级的要求。因为它占统治地位，它就利用它的统治地位使

社会首先满足它的需要。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利用它的统治地位要求社会首先满足它自己的需要。

所以，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服务的主要作用，首先是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它有一定的方法来满足它的需要，就是用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来满足剥削阶级的需要。剥削阶级是不劳动、不生产的。经济基础就是保证不劳动、不生产的阶级能够通过剥削方法来满足它的利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一般说来都有这样的作用。

当然，这种经济基础也要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需要。完全不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需要，劳动群众就不能够生存，不能够生存也就不能够生产，那末剥削阶级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所以这种经济基础，它一方面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需要，同时用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它首先满足统治阶级自己的需要。这种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能用这种方法来满足这样社会的需要，因为构成它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就是这样的。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以剥削阶级为主的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使剥削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从而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因此在分配上就有优先权。生产关系本来的性质是这样，因此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在分配上的作用也是这样，即首先满足剥削阶级的需要，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再来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

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这种作用，同时也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斯大林讲过：“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4页。）以这种方法集中起来残酷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来满足财政资本的需要、满足最大限度剥削的需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讲得很清楚，这一个基本规律，也就是这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一种表现。

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就是：用经济外强制的方法来剥削农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来满足地主阶级的需要。

奴隶社会也是这样，奴隶社会也是用一种残酷的经济外强制办法来剥削奴隶群众。把奴隶当作牛马来满足奴隶主阶级最大限度剥削的需要。

每个剥削阶级都有它最大限度的需要，而办法就是剥削这一个社会的劳动群众。所以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这种作用，同时也是—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里为统治阶级服务，也是这些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保证使生产力能够不断有所发展，也就是用高度的技术不断地把生产力装备起来，使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需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是跟阶级社会不同的。在阶级社会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剥削阶级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为全社会服务、像原始公社—样为全社会服务，而方法与原始公社不同。原始公社没有什么高度的技术装备。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使生产力不断用高度技术装备起来，使生产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全社会服务。

我们为什么—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什么把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为什么把个体农民改造为集体农民？因为改造了以后，我们也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利用这个基础使它在经济上为全社会服务。资本主义如果不消灭，我们这个经济基础就不能够为全社会服务。经济基础就要有一部分为资本家服务。个体经济如果广泛存在，就不便于使经济基础为全社会服务。因为每一个个体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它为个人服务。他不轻易把粮食卖出来，搞不好他就不卖了。特别是高度的技术装备，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够实现，也不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得能够在经济上为全社会人民服务，使得全社会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起来。没有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经济基础的改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我们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

我想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这个公式应该这样具体解释。这样解释的实际意义就很大，也比较全面—些。

根据以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基础的作用是随着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服务目的。如果经济基础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就太笼统了。这样的解释是抽象的。每一个社会都能够利

用，但不能具体利用。可以这样说：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各个阶级社会有不同的经济目的，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是有阶级偏向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有阶级偏向。因为上层建筑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在阶级社会里，为什么政治上总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在经济上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就是属于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所以政治上剥削阶级一掌握政权，它就用政权巩固基础，使基础为它更好地服务。

所以经济基础如果不变，它的服务作用也不变。在阶级社会里，如果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根本改变，那末要想使这种经济为人民服务也就不可能。如果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能够想出一种办法使经济能够为工人阶级服务，它就是一种空想。在封建社会里，想找一种办法在封建制度下使地主得到利益，而农民也很好，使社会在经济上既为地主服务也为农民服务、这样的空想家是有的。中国的孔子—儒家—就有这样的理想。儒家有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想要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使社会能够为全体人民服务。理想是很好的，但究竟是理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改良主义不对。我们不研究生产、不研究经济，我们也就觉得改良主义不好，因为我们是革命者，旧社会不经过革命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研究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以后，我们就进一步知道改良主义之所以不行，是在经济上决定的。如果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想在旧的经济基础上找到改变的方法使得它的经济服务目的有所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既为资本主义服务，又为工人阶级服务，这是不行的。

在英国流行这样一种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组织一些工人合作社，就能够改变工人的生活。这叫作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实这只能算作行会，不能算作合作社。英国工党里有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广泛组织消费合作社，通过这种合作社使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一思想是完全破产了。实质上，这种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是代表工人贵族，代表资产阶级化了的少数工人的思想。这些人生活的提高，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了，而是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

所以要使社会的经济能够为全社会、为全体人民服务，就必须改变决定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变，而想使社会的经济能为全社会服务那是不可能的。要资本主义和平走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工党是想从资本主义走入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以为煤矿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那个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资产阶级的国家，得到的利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是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服务。只是最大的资本家企业是由国家代他经营的，利息仍然是资本家的。尼赫鲁也是搞国家资本主义的。他在国际和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在国内欺骗人民，把当前的印度也叫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和英国类似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是通过国家首先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在世界上许多人看不清楚这一点，认为印度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高士写的文章就揭露了这一点，它并不是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因为它这个国家的制度并没有改变，它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不可能为工人阶级服务。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幻想，即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点。资本主义要长入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改造为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也是要经过斗争的。在中国，要经过“三反”“五反”的对抗斗争。而斗争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就是和平的道路。我们这种和平的道路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也是经过斗争的。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革命的改造，然后才能变为社会主义。

中国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简单一点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区别不大。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看作民族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就没有。但中国过去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有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带有一半资本主义这种性质的社会。

所以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过渡以前这里面就有资本主义，但不单纯是资本主义。

蒋介石的政权算不算资产阶级的政权呢？

蒋介石的政权是四大家族的政权，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它又和封建地主相结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是它的经济基础，那末它的政权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它就是四大家族、大资产阶级。不能够说蒋介石的政权仅仅是封建的政权，不能够说它仅仅代表地主阶级。

所以我们的过渡就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讲一般的原则时不必说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封建是经过民主革命打垮了，我们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封建主义不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可以撇开封建主义这一方面。实际上革命是两个阶段，民主革命把封建打垮了，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就讲到这里。

2.社会的上层建筑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和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所以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社会结合的特点，就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和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

上层建筑这一种社会结构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

它主要包括一些思想意识形态、及政治法律等制度。那末这些政治法律制度是体现了哪些意识形态呢？意识形态不能够平行存在，它是寄托在政治法律之内的。所以意识形态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统一结构。比如艺术这个东西，它有艺术思想、艺术观点，可是艺术观点要表现出来，它就要寄存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要有一个文学团体，一个出版社。政治法律思想体现在一定的法律政治制度里面。所以上层建筑是包括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跟这个观点相适应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这些东西：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主要是指它的观点，而不是指它的许多材料。有些材料并不一定就是上层建筑。比如，艺术材料不一定是上层建筑，艺术观点是上层建筑。像音乐作品不一定是上层建筑，绘画不一定是上层建筑。有些东西是有永久性的，如齐白石的画，从前的人觉得好，我们也觉得好。上层建筑主要包括一些阶级意识观点。社会的观点带有主观性。凡是反映客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上层建筑。齐白石画的虾，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客观的东西，只要反映正确，永久是生动的。所以上层建筑主要是跟这些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一些观点。这里面没有科学。马克思和斯大林在讲上层建筑的时候，都没有讲到科学。我们应当注意，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它不是主观的反映，所以它不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是依靠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经济基础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上层建筑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这算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规定的。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最后一段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是依赖于经济基础的。这个公式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讲得比较简单一点。他说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当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的时候，然后它的上层建筑也就随着变化和被消灭。当新的基础产生的时候，它也就产生新的上层建筑。这样讲比马克思讲的精密程度差一点。斯大林讲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就跟着变化，新的经济基础产生，上层建筑就产生，经济基础消灭，上层建筑就消灭了。这样讲，有些具体情况就不能概括。比如说：基础消灭了很久，像宗教这样的上层建筑并没有消灭。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这么久，宗教并没有消灭。但还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上层建筑就建立起来了。比如中国的革命，先把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然后再来建立基础。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消灭而消灭，这个公式一般说是对的。如果概括起来说，还是马克思说的好一点，即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上层建筑有的在基础变化以后很迟才发生变化，有的也会很早就变化了。

总之，上层建筑总是产生并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比如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是氏族集体所有制，氏族成员的互助关系以及平均分配的共有制度。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有宗教、艺术、道德的观点以及各种民族的制度。原始的宗教、艺术是反映这样的制度，并巩固这种互助关系的集体所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的。原始的宗教把这种制度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社祖先规定一些习惯、规矩，把这些东西都看作是神的规定。比如说他们把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同志的互助关系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的本性也体现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同志的互助关系。原始的艺术是反映生产的，比如跳舞、唱歌综合在一起，表现了他们的生产、打猎的互助关系等等。图腾思想就是一个氏族的标志，他们把某一种动物看作是一种祖先。这种图腾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某一氏族崇拜某种动物，就把这种动物当作它的祖先。图腾的对象是偶

然决定的。某一氏族以熊为祖先，或者以鸡为祖先来巩固它的生产关系。同一个氏族的人，有同样图腾的标志，它身上画一些花纹，有了共同的图腾、同一的花纹就表示是一个氏族，要互相帮助，建立同志互助关系。氏族上面有部落。氏族制度跟图腾是分不开的。图腾是氏族的标志。氏族是同一血统为单位的标志，婚姻只能够在氏族以外，氏族之间可以通婚。氏族制度本身决定了它的生产力的规模，所以生产力很低。氏族只能以血统为单位，扩大了，生产力跟不上，生产力不能够维持。生产力规模小，社会组织的规模也比较小。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只有以氏族为单位的共同生活是比较适合那种狭小的生产力规模及那种生产关系的。因此，原始公社只有这样一些东西：原始的宗教、艺术、道德、图腾思想。原始公社当时没有政治法律制度，因为没有统治阶级。如果要用政治法律，那末它的习惯就是法律。这些习惯在领袖人物的头脑里记住了，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是跟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有关，这是由于他们生存的需要。因为生产力很低，如果不是坚持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够生活下去。原始公社一个人离开公社就不能够活下去。这一种制度的保守性很大，因为这种制度跟生存密切联系的。所以当时的道德、宗教观点以及氏族制度都把这种生产关系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阶级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又是以道德习惯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在原始社会里不需要加在社会上的政治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

在阶级社会里，除了宗教、艺术、道德以外，有政治法律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还有哲学。哲学在原始公社里，可以说是没有正式的表现形态。正式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在原始公社是不存在的。原始的宗教、道德观点包括有哲学的因素。有神论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因素，但不是唯心主义哲学。一切东西都有灵魂，原始社会万物有灵的观点是后来唯心主义萌芽的基础。原始公社的上层建筑一般来讲没有什么正式哲学思想，只是宗教的观点里有这种哲学思想的因素。在阶级社会里有哲学的思想，所以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宗教、艺术、道德以及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国家以及政治法律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上层建筑在思想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是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主要上层建筑。除了这个思想方面的上层建筑以外，还有跟思想方面的上层建筑相适合的工人阶级的政权。上层建筑的政权、思想观点加上适合思想观点的政治、法律制度，成为总的上层建筑。

基础跟上层建筑的关系，首先是有经济基础，然后有反映一定阶级的思想观点，通过思想观点又产生出一定的政治法律。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这样的：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些前提条件，这就是工人阶级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没有出现，它就不能够首先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发展成熟了，它跟生产关系发生了主要矛盾，这就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反映了工人阶级思想的科学观点。工人阶级按照这种观点，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就使工人阶级成为政治化的组织。这种组织推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然后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工人阶级政权。

工人阶级有了政权，就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工人阶级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立刻就建立自己的基础。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的基础跟它的上层建筑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用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掌握生产机器。革命一方面掌握政府机关，一方面掌握银行、铁路、军火、工厂。所以大体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同时产生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革命里，新的上层建筑比较基础完成的快一点，因为它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够建立经济基础，政权如果掌握得不好，那么基础也不好建立。

说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没有基础就能建立起上层建筑，这是不大符合事实的。上层建筑建立的稍微早一点，上层建筑的时间比较快，基础建立的时间比较慢。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的基础和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差不多是同时的，不同时建立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就有一个错误，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工人阶级没有很快地掌握银行，没有很快地去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掌握了政权就迟疑了，这是一个错误。以后俄国革命时，首先是掌握政权，但同时把银行、经济机关很快地抓到自己手里。没有一点基础，上层建筑是站不稳的。没有基础，上层建筑不成其为上层建筑。在新中国解放城市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进城就掌握了政府机关，同时也接收了经济机关，首先是银行，不把它掌握在手里那就很困难。

所以上层建筑是决定于基础的。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完全没有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

现在讲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

矛盾是有统一性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的，但是有统一性，是互相依赖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为基础服务。

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讲道：“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并且替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35页；又见：《斯大林文选》第544页）他这只是一般地讲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讲为一个社会服务。具体地讲那就是原始公社的上层建筑是为当时的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阶级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上层建筑怎样为基础服务呢？主要是帮助基础的巩固、帮助基础的形成。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没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这个基础也不能够巩固，也不能很好地发展形成起来。

原始公社如果没有它的原始道德观点、宗教观点，那末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够巩固。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志互助关系，是不能违背的，违反就要受到惩罚。

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有阶级的偏向。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它的经济基础虽然是腐朽了，它的上层建筑还可以帮助它维持下去。比如美国和英国都是这样。按照它的经济基础来讲，是可以垮台的，因为它的生产力很高，在经济方面它的生产力比苏联还高，苏联是两三千万吨钢，美国一千万吨钢，人口比苏联少一点。美国钢的生产力是很高的，而所有制是少数资本家的，是很狭小的。原子能是一种很好的生产力，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很好地用于工业上。因为如果把原子能利用到工业中去，就会使资本家的利润减少，所以只能用到军火生产上去。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的上层建筑比较坚强，生产关系就还没有垮。

说它们底上层建筑比较坚强，这主要是指在思想意识方面它们统治的较强。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观点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很大。我们看一看匈牙利事情的发生，苏联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巩固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来说本来是很好的事情，美国有一些工人认为这是坏事情。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消息：当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美国工人曾拒绝搬动苏联的货物，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改良主义的影响很大。在思想上旧的东西相当巩固，所以美国的共产党不够发展，恐怕只有十几万人。美共曾受到白劳德的挫折，在克服了这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后才有所发展，但最多不过十几万人。一千万多人口的国家共产党人只有十几万人，这说明工人阶级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

大。资产阶级不但用军队、法律来统治人民，而且还用思想来统治人民。思想统治有时候比物质统治还厉害一点。美国共产党对苏联问题的看法都有些混乱，究竟苏联出兵对不对，他们内部不很清楚。当然最后还是会的清楚的。

至于另一方面，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在美国是比较巩固的。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军队没有受到挫折，相反地，它发财了。统治者有钱可以收买劳动者，同时它在国家暴力方面有力量可以维持。所以上层建筑比较稳固，是由于在物质方面、思想方面，劳动者都被它麻痹了。劳动者不能够起来革命，所以革命不能够实现。因此，要想推动任何一个革命，就要先进行思想革命。推翻旧的上层建筑在思想上的统治，新的思想建立起来，才能使新的革命组织如工会组织成立起来，再来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英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工作很艰苦。我们中国不同，旧的统治很腐朽，不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很尖锐，同时旧的上层建筑也很腐朽。俄国的沙皇统治已经引起各民族的痛恨，所以各民族对它的制度没有一点幻想。在思想上，俄国有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宣传，后来又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有一百年的革命宣传，使得旧的思想旧的封建专制在人民中完全破产了。沙皇军队又腐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败仗，前线受到很大的挫折，后面就不稳。1905年的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日俄战争俄国被打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的，在东普鲁士战场上，十几万人被俘虏了。我们中国的情况更清楚了，统治者一百多年的丑恶面貌在人民中完全暴露了。广大人民对它没有一点幻想。蒋介石是罪大恶极的仇人，所以人民的解放战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军事力量的建立使它的军事力量垮台了。上层建筑垮了台，经济基础就维持不住。

所以尽管生产力发展很高的国家，按照经济基础来看，它的革命条件已成熟了；但按照它的上层建筑来看，它还没有到直接革命的时候。因为直接革命的形势是人民不愿意照旧被统治下去了，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在美国，许多劳动人民没有觉悟，可以生活下去；上面也有力量统治下去。所以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个落后的国家尽管落后，如果它的旧的上层建筑瓦解了，生产关系还是可以改变的。有了新的生产关系才可以有新的上层建筑。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那一种理论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新中国胜利以后，还要巩固我们的上层建筑，运用我们的上层建筑来巩固我们的经济基础。在我们国家胜利以后，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要加强我们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

好，都屡次指出政治、法律工作的重要、上层建筑工作的重要。在我们新的国家里，有些人认为国家好象很重视经济工作，因此搞政治、法律工作的人就不安心。过去曾经批判过这种思想。如果政治工作搞不好，经济基础是不可能巩固的。经济工作中有违法乱纪的，就靠政治、法律工作去监督检查才能解决问题。

思想工作也是上层建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新中国的思想工作作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发生许多错误。象匈牙利事件、波兰的波兹南事件，都是上层建筑工作没有作好。在这方面群众的思想那样混乱、敌我不分，这是新的上层建筑方面有缺点。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在上层建筑方面要反对客观主义，要反对敌对思想。对旧的上层建筑、旧的政治、法律残余要加以反对，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

上面我们首先讲到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随着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要或迟或早的变化。第二、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它的反作用，它能够帮助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第三、上层建筑是指跟基础相适合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及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意识及政治法律制度不是当前基础上的一种上层建筑。这些东西有些是过去上层建筑的残余，有些是将来上层建筑的萌芽。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合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也还可以有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残余。比如，英国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它的政治法律制度里就有封建制度的残余，有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有爵位(像艾登这些人都是有爵位的)，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日本、法国也有这种情况。这些就是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残余。这些残余被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所吸收，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结合起来，帮助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工人阶级政党。这些能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呢？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了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因素。

所以，上层建筑仅仅是指正式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中成为上层建筑的仅仅是指跟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些社会意识形态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有一些思想意识观点，政治法律制度不是跟当前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而是旧经济基础上面所遗留下来的上层建筑残余，这些不能算作当前的上层

建筑。我们新中国有封建思想，这种封建思想不能说是新中国的上层建筑。苏联有宗教，也不能说这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旧社会的上层建筑为什么能够在新社会留下来呢？

原因就是上层建筑虽然是跟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可是它的变化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先有经济基础，然后才有上层建筑，或者先有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然后上层建筑的因素才会产生。先有无产阶级和大工业出现，然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出现。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原理的正常表现。如果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消灭以前消灭，那就违背唯物论的原则了。或者说上层建筑能够在经济基础产生以前产生，那也是和一般唯物论的原则不相符的。因为我们讲过，工人阶级的政权多多少少比上层建筑出现的早一点。但是，严格地说来，也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而且工人阶级政权要成为一个上层建筑，就要建立起经济基础，如果不建立起经济基础，这个上层建筑就是空的，就是不稳固的，要垮台的。

所以，每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指跟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应该跟旧上层建筑的残余以及新上层建筑的因素加以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有一种新的意见。这种意见还不能肯定它已经是结论了。有一个卡马林同志在《哲学研究》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同一个社会里可以有两种以上的上层建筑。按照我们上面的讲法，同一个社会里正式的上层建筑只有一种。除此之外，都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或者新上层建筑的因素。按照他的说法，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新上层建筑的因素都可以叫作正式的上层建筑。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那么就要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跟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比如，美国政府所宣传的一套思想观点，那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但是除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之外，美国还有一般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各样的上层建筑。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上层建筑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工人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有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其中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是占统治地位的，是政府所支持的统治阶级的观点。还有一些不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

那就是工人阶级政党以及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说法，同一个社会就有两种以上正式的上层建筑，不过其中有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

这种说法现在还不一定就是结论，我们现在不把这个说法加以肯定，因为这种说法对某些问题就不好解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那么无产阶级这个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可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已正式存在了，这样就不好说明，而且也不符合唯物主义的原则。因为经济基础根本还没有形成。不能说有无产阶级就有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为它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同志互助的社会主义关系不存在。这种生产关系不存在，就不能说这种基础已经存在了。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一种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说无产阶级这种同志互助的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上层建筑，这就很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来加以解释。所以，这个观点我们暂时不肯定。我们还是认为每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跟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合的这些意识形态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此外，就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或者新上层建筑的因素。

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同一种经济基础上面，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才是它的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消灭了，那么上层建筑也就要消灭。可是在旧社会里可以产生新上层建筑的因素，这种新上层建筑的因素跟现有的正式的上层建筑进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就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思想观点、资产阶级政权进行斗争。这种新上层建筑的因素跟旧上层建筑斗争的结果，可以推动旧上层建筑崩溃，从而也就帮助新基础的形成。上层建筑总是跟当前的基础相适应的，当前的基础如果崩溃了，上层建筑也就会崩溃。问题是旧上层建筑的完全消灭要迟于经济基础，旧经济基础完全消灭了，但是旧上层建筑在新社会里还要长久地存在。每一种社会里，它可以有旧上层建筑的残余，同时也有新上层建筑的因素。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新社会成立之后，我们还要注意到跟旧上层建筑进行斗争。就是旧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垮台了，完全没有了，可是还要注意到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还在起作用。因此，上层建筑的斗争应该长久一些。旧基础已经消灭了，如果不注意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进行斗争，就会妨碍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所以，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把封建的经济基础完全消灭了，另一方面也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消灭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以后

还要完全、彻底地消灭。消灭这个基础之后，我们有相当长一个时期跟资产阶级各种上层建筑残余，跟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所以，在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不能简单地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停止，必须要坚持跟旧上层建筑残余进行斗争，也要注意到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如果不注意这个斗争，如果希望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都是错误的。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进行斗争，那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如果希望一个斗争就完全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打倒，那就是过分的冒进了。

现在这个斗争还在继续。我们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这个斗争就继续不下去。因为哲学问题，科学问题都需要通过细致的、理论上的判断过程才能解决。唯心主义可以有各种形式，有些唯心主义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没有“百家争鸣”的办法使各种意见提出争论，那么也可能假唯物主义就占了统治地位，真正的唯物主义反而会被带上一个帽子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经过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提出“百家争鸣”的办法，经过这些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跟唯心主义进行斗争。这也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先是进攻，然后通过迂回的办法，最后达到进攻的目的。不是这样就不能彻底进行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因为一个进攻之后，有各种唯心主义就用种种办法隐藏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开放一点自由，不让各方面展开争论，就没有机会对真正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百家争鸣”实际上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一种艺术。

这个话在我们党内这样来讲，如果跟民主人士这样讲，他听起来就不顺耳。他说：你这个“百家争鸣”是让人家露出来头再来打。但这是一种误会，因为民主人士中间也可能有唯物主义思想，我们要“百家争鸣”，也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好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黑暗面。我们讲马克思主义，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把唯物主义变成教条主义，党外人如果掌握材料，就能够提出一些好意见，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唯心主义反掉。所以，用“百家争鸣”反对唯心主义，不是反对哪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用这种办法是批判各方面的各种唯心主义。

由于一个社会除了正式的上层建筑之外，有旧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所以我们要注意跟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进行斗争。解放以来，我们一直是进行斗争的。但是这种斗争不能冒进。所以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一方面又要反对急躁冒进。

最后上层建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层建筑跟生产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基础来跟生产发生联系。生产发展要影响上层建筑也是通过基础来影响。我们开始时就讲过：生产力不能决定社会面貌，直接决定社会面貌的东西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社会的面貌主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面貌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的特点。

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社会面貌。如果从生产力水平来说，美国的生产力够得上社会主义水平，但是它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上层建筑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它的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美国这种生产力如果要使上层建筑改变，首先它应该引起经济基础的改变。这种高度的生产力应该通过无产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破，然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反过来说，上层建筑对生产的影响也是通过基础。上层建筑首先巩固经济基础，然后这个经济基础按照它自己的作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如，美国的上层建筑都是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按照它自己的途径为社会服务，或者按照它的基本经济规律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经济基础的支持，经济基础提出要求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所以它按照这个方向来发展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是直接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通过基础来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好像这个原则不明确。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国家直接规定五年计划，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就直接影响生产力。

经常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不仅在中国有，而且苏联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有的人给予肯定的回答。比如雅罗申柯就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不需要通过基础，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的人企图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提问题的人好像就觉得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此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作用于生产也是通过基础。首先，不能把我们的五年计划看作仅仅是生产的计划。当然主要是发展生产的计划，但是不能看作是单纯发展生产的计划。在我们的计划里，都有关于改变生产关系的计划，或者是调整生产关系的计划。比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包括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农业的计划。这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了，

小农经济的改造也完成了。我们的计划中还要注意到分配问题，至少这一点在计划里永远也不能没有的，那就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完全消灭了，我们的计划中就要规定努力去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来提高人民的生活。那么，从实质上来说，我们计划中总的方针、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任何时候，社会主义社会里计划中的指导方针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计划不能违背规律。计划一定要用高度的技术来装备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不断发展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所以，任何时候社会主义计划中的总路线都是有目的地发展生产的路线。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的分配。

如果我们抛开这个目的单纯讲发展生产行不行呢？

如果抛开这个目的单纯讲生产就是盲目的生产，没有目的的生产，这样的生产跟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很小。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仍然有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得到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没有目的是不可能的。计划总是要有一个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要有一个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一个计划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制定的，这个目的就体现了经济基础，体现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就是分配，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一个分配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人的同志互助关系，也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

所以，我们的计划是按照基础的性质，根据基础的特点来定的，不是撇开基础来定计划。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里面有具体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按劳取酬。社会主义的分配办法，这些都应该规定在计划里。

如果我们的计划里没有这些方面，那么计划本身不仅是盲目的，而且这种计划如果拿到劳动群众中去，也不可能很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劳动人民看到计划时也考虑到分配问题。如果这个计划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单纯要工人、农民发展生产，那就要出很多问题。有一些国家，像匈牙利、波兰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从理论原则来说，我们可以归结为生产计划没有考虑到基础的问题，没有根据基础的要求来考虑生产计划。他们没有注意到发展生产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发展生产。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要正确地使计划适应于基础的要求，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主要是没有注意到分配问题。他们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忘记了发展工业，发展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样就不能

刺激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反而会破坏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至引起了波兹南事件。如果正确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来从事我们的计划工作，这样就不会发生问题。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问题，也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可以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好像政府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看法，是一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错误看法。我们定计划时要考虑到生产关系的特点。违背了经济基础的要求，计划就会落空。

上面关于上层建筑的一些特点讲完了。这些特点都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讲到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这本书一般还是好的，就是讲到爆发与逐渐过渡有些问题，把质变只归结为两种，太狭小了。另外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规定有些不精密的地方。比如说，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这样的提法不够精密。除此之外，其他原则都是好的，不过他自己没有论证，所以我在这里加以解释。

现在讲关于上层建筑的各种特殊性问题。

这里主要是讲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即各种意识形态怎样表现为上层建筑。这些意识形态就包括政治、法律观点、道德、宗教、艺术、哲学这许多社会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有各种各样的特点。

先讲政治法律观点和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直接用来进行统治的一种思想工具、物质工具。这种思想工具就是政治法律观点，这种物质工具就是政治法律制度。这种物质工具是体现了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上层建筑对统治阶级来说，有直接的服务作用。

法律是什么东西呢？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每一个阶级社会的法律都表现了这个统治阶级的意志。

政治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的关系。

政治法律是统治阶级统治的观点，它要统治谁、联合谁这就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就是统治阶级要怎么样来进行统治，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统治。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是直接反映基础，同时又直接为基础服务的。基础本身就在经济上为一定的阶级服务，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法律观点直接反映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

观点，直接来为这个阶级服务，也就是直接来巩固这个基础，来帮助基础形成。用什么方法来巩固基础，来帮助基础形成呢？那就是用政治法律观点，用政治法律制度这种物质力量来巩固基础。

我们新中国的政治法律观点，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治观点，就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我们的政治法律观点里就规定了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我们要作些什么事。工人阶级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意志，这一点就表现在我们各种具体的法律里。如果有违背我们意志的行为发生，我们的法律就要去制裁。

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依靠国家的强力来作后盾，它始终带有强制性。宪法规定之后，我们法律里就包含着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我们要实现这个观点，而且一定要实现，如果有人没有实现这些观点，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以国家强力作后盾的。违背我们政治法律观点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就一定要反对。

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这种上层建筑，是直接和经济基础联系的，因此它的寿命跟经济基础差不多，也就是说，大体上是跟着经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跟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比如，旧社会的那些政治法律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地要把它消灭，对这种旧政治法律观点的消灭比宗教快得多，比消灭旧的道德观点也快得多。旧的宗教、道德观点遗留在新社会的时间很长，政治法律观点也要遗留一个时期，但总要比较快地消灭它。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次司法改革运动，比较快地消灭了旧的政治法律观点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完全消灭了，因为现在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人参加我们的工作，所以这种思想影响还是存在。

在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这种上层建筑里，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永久东西，就是说新社会的无产阶级从阶级社会的政治法律观点中可以吸收的东西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收的。我们对旧的国家制度加以彻底的粉碎，它的政治法律观点我们也要完全加以否定。这也不是说绝对的否定，因为旧的政治法律观点中，统治阶级为了自圆其说，它就要隐蔽阶级统治的面貌，不能露骨地把剥削阶级的面貌公开地暴露出来，它要采取公平合理的面貌出现。还有些政治法律学者在主观上觉得应该使政治法律成为公平的东西。因此，在旧的政治法律观点里也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利用。在旧社会用公平合理的这种假象来欺骗人民，可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过来。他说法律不允许人压迫人，不允许有不公平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利用。

也还有这种情况，有的旧政治法律观点曾受到人民斗争的影响，这些也可以被我们利用。这就是统治者在规定法律的时候，由于人民的斗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能不有所让步。因此，旧的政治法律观点也有一些个别的東西能够体现人民的要求，这也是可以被工人阶级所利用的。我们以后学习《资本论》时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英国工人因为有了比较长期的斗争历史，英国在 1830—1840 年间就有了宪章党运动，这时就有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由于工人起来斗争，统治阶级就规定了工厂法，在这里面，规定厂主对工人的剥削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乱用童工，不能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不能乱扣工资。统治阶级为了延长和稳定它的统治，为了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作了某些让步。所以，英国的工厂法就反映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要求。

所以，总的来说，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来制定法律，但是这里面也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这样对工人阶级多多少少就有利，工人阶级就可以利用。现在世界人民讲和平，这是人民的运动，但资产阶级统治者中也有反映。艾森豪威尔也不能不讲和平，今年他的选票比较多，原因之一是他抓住了和平的口号，表面上主张和平。他本来是要搞战争，但由于人民和平的要求这样高，他不能不表面上来讲和平。这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中有它片面的东西可以被我们所利用。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这种上层建筑对新的阶级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吸收的东西。但是，有个别的東西可以被利用。总的来说，我们要把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观点根本推翻，把它跟国家一样打碎，只是利用它极个别的東西。

现在讲道德。

道德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各种行为的规范。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一定阶级的行为的规范。所以，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它会有不同的道德观点，它会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在阶级社会里一般总是有对立的道德观念。统治阶级总是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是最好的道德行为；但是在被剥削阶级中就把财产公有看作是最好的道德。我们旧中国的下层社会里讲义气，这就是要互相帮助，在财产方面要互通有无。这种道德观点跟统治阶级的观点不同。这种义气在统治阶级中间是没有的。统治阶级专讲利害。统治阶级讲仁义，但是那是表面的東西。

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的道德观点，每一个阶级有每一个阶级的道德观点。真正的道德是什么，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是好道德呢？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样看呢？

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道德时，是按照历史观点来观察的。列宁在《青年团底任务》这篇演说里讲到什么是道德。他说：道德就是要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准，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按照历史观点来看道德。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观点，如果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道德，就要根据当时的条件来看。某一个阶级的道德观点，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进步的，有推动人类生活向上的力量，这就是比较好的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在阶级社会里还是有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在无产阶级出现之后有的，是集体主义的道德，没有任何个人主义观点。这种道德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对过去历史的人物我们就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去要求他们。比如，宋朝的岳飞跟秦桧进行斗争，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他这种道德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点，它的目的是想要维持正统的王朝。岳飞和秦桧比较起来，岳飞的道德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他的观点能推动人的生活向上，不是使人堕落。他的行为长久地成为人民的一种典型，经常鼓舞着人民。所以，这就是一种比较高尚的道德。但岳飞没有一点共产主义道德，相反的，他有消极的一面。他为什么自己牺牲呢？就是因为有消极的一面在影响着他，如果他对皇帝有反抗的勇气，坚决反对下去，他就不会死。可是，在坚决抵抗侵略者这一点来说，他是高尚的。所以，我们用历史观点来看历史上某一些人的观点，看他是不是对人的生活有向上推动的力量，如果是这样，就是好的道德观点。如果他的道德观点使人的精神腐化，这样就不好。

在过去的历史上，尽管是统治阶级里面的人，我们还可以分成正派人和不正派的人。岳飞就是正派人，秦桧就不是正派的。是不是正派的，就看是不是有比较高尚的道德观点。“三国”上的关云长这个人有弱点，但是为什么老百姓崇拜他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些道德的因素能够鼓舞人民。还有刘备，他始终一贯，被曹操俘虏之后，找到机会又跑回来。这里面不是没有缺点，如果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讲，缺点很大，被敌人抓去，又给敌人作了一些事情，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在从来说，这样的人就很少了。“三国”里面那样多的人物，能够有他这样始终一贯的人就很少，多半是变来变去，被谁抓去就投靠谁。

道德跟政治法律观点有些不同。政治法律观点是依靠国家的强力来作后盾，带有强制性；道德观点它是依靠习惯来维持，依靠舆论来巩固。一个人作了不道德的事情，不需要政府来审判他，周围的人就会审判他。秦桧作了坏事情，没有那个政府惩罚他，但是几千年来老百姓的舆论惩罚了他。这个惩罚就是在岳飞坟前铸了一个秦桧的铁像跪在前面，老百姓路过就撒泡尿在他头上，这比法律上的惩罚可要厉害得多。

德国有一个诗人叫海涅，他作了一些诗骂专制的皇帝。他说：你这个皇帝不要高兴，你作了很多坏事情，这里没有人惩罚你，没有比你更高的一个政权来惩罚你。但是我这个诗人要惩罚你，我把你关在我这诗的地狱里，用我底诗句来咒骂你。在诗的地狱里，你永远也不能翻身，永远都有人知道你的丑样。像秦桧就是被关在文学的地狱里，永远不能翻身。

道德是依靠舆论来维持的。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方面依靠政治法律来巩固它的统治，巩固它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依靠道德观点来巩固生产关系。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要宣传共产主义道德，要用共产主义道德来巩固我们的生产关系。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反对个人主义的浓厚空气，使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成为人民普遍的舆论。这样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比较有利。我们中国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在青年中用了一些力量来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但是还不够，因为在青年里面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影响的，一直到现在还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作些工作。

道德是阶级的，但是道德它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即正义的观点。各种不同的阶级道德中间，也往往有些共同点。所以，道德观点里也有一些普遍因素可以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永久性。比如，岳飞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屈服的这种精神，在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里是封建道德。但是这个封建道德里有对侵略者不屈服的这一方面，这一点就带有永久性。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讲，它有消极的一方面，但是它积极的方面我们也要肯定。所以，对历史上的道德我们要有分析地来看，不能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原封不动地接受旧的道德观点，不能把岳飞看作是我们理想的人，我们应该肯定它积极的一方面，指出它消极的一方面，但是不要一笔抹杀。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上说的：不要好就一切都是好的，坏就一切都是坏的。

我们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应该是过去的人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各种道德观点的综合。所以，我们也能够吸取过去历史上人们中间一切好的行为。一

切精华我们都可以吸取，并且加以发展，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继承性。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才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但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要成为一个体系，就要适当地采取过去人们认为的确有积极意义的某些行为规范。比如，对侵略者不屈服，过去也有人讲和平，为和平斗争。这些人的道德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应吸收到我们新的道德观里面来。

下面讲宗教。

宗教这个东西，马克思说是人民精神上的鸦片。这里面有两重意义：一方面说明宗教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宗教当然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它是从人民的生产条件中产生的。当然产生宗教的生活条件是落后的，由于人民在剥削的情况下非常痛苦，生活上没有希望，再加上人民没有文化，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宗教观点虽然是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可是它是使人民消极的东西，是一种麻醉性的东西。人民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又没有办法，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来麻醉自己，所以马克思把宗教叫作人民精神上的鸦片。

如果一个人的宗教观点很深，他就觉得不必反抗下去了，认为反正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就这样忍受下去算了。宗教对人民可以麻醉到这样的程度，为了来世人民可以倾家荡产。西藏的宗教就发展到顶点，老百姓宁肯作叫化子，自己所得到的东西都要供奉到喇嘛庙里。所以，宗教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在人民中间是有害的东西，是人民消极方面的反映，可是它又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东西。

这就说明我们必须消灭宗教。社会主义要建设成功，就一定要消灭宗教。但消灭宗教绝对不能冒进。宗教有些接近道德，它在人的生活与习惯里很巩固，而且有时它的巩固性比道德更深一些。所以，反对宗教不能采取冒进的态度，要从人民生活条件根本的方面去解决。所以，总的来说，宗教带有消极性，对人民没有利。

在各个时代，宗教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我们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中说：最初基督教是在奴隶和破产的自由民中间产生的。由于不满意罗马的统治，有一些人就宣传基督教来联合人民、反对统治，结果耶稣就被罗马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把各派基督教的领袖召集起来，这个会开完之后，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把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这样基督教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基督教本来是由于人民对皇帝的不满产生的，有时也组织暴动，但是以后被统治阶

级所利用。罗马帝国想把基督教变成世界宗教。最初它把各氏族的神集中在罗马供奉在一个庙里，这样使得各氏族都把罗马看作是一个最高的统治者。可是这样作的结果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这是统治者人工地把宗教集中起来。可是以后统治者利用人民自己产生的宗教、基督教，就利用成功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况说明：宗教发源于人民生活中间，到以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在一定时期，宗教也成为人民反抗的旗帜。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暴动，几乎每一次都用宗教作旗帜，大多数是用道教作旗帜。人民举行暴动，用宗教作旗帜，这也说明人民非常不成熟，有消极的方面。这种宗教的斗争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对宗教我们要看到它有这种历史的作用，一般讲它是被剥削阶级所利用，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也成为人民斗争的旗帜。那么宗教本身是消极的，但是在宗教的旗帜下提出了一些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又有进步的一方面。

现在讲哲学的问题。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一定阶级对整个世界总的观点。我们说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因为原始公社时没有一定的、正式的哲学。正式的哲学是在阶级社会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里，一定的阶级按照它的阶级观点来综合整个世界的各方面的知识，把各方面的知识综合起来，对这个世界提出一个总的看法，这个综合受到阶级立场、观点的影响。所以，哲学总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这种观点受阶级立场、观点的限制。

哲学基本上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里又有各种各样的。不管那个世界观，每一个时期的哲学观点都是对世界各方面知识的总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对各方面的知识都作了最高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每一个哲学家的知识都非常丰富，都代表当时知识的最高峰(这是讲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中国的孔子是一个哲学家。孔子的知识最丰富，他把所有当时的知识加以总结，世人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他差不多全都知道。代表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是知识最丰富的人物，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把当时的知识加以总结。黑格尔把自己的著作——《逻辑学》叫作百科全书。因为这里面综合了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838页)毛主席把哲学放在最上面，哲学概括了人类对自然和对社会知识的全面。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点，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哲学有互相对立的两大营垒：唯物论与唯心论。每一个时代的唯物论都是进步的，唯心论一般来说是反动的。但是就哲学内容来讲，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只要是这个时代代表的哲学，它的内容就很丰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可是它的唯心主义体系里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哲学就要注意到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把唯心主义加以否定，可是它的唯心主义体系里面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很多是很有价值的。在唯心主义里面，可以找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批判唯心主义如果采取简单否定一切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些唯心主义是可以简单地否定，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我们不能轻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唯物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都有缺点，可是不能因为它有缺点而一概否定。它综合了当时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知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所以它带有永久性。在批判时应批判它消极的方面。

现在讲艺术。

艺术的特点就是用生动的、具体的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与科学、哲学有区别，科学和哲学是用概念，用理论形式来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也是一种反映，但它是用形象，特别是用典型的形象来反映现实。好的艺术作品里面都会描写一些生动的、典型的人物和典型事件。鲁迅的《阿Q正传》就把“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贫农阶级的典型性格非常突出地描写出来，描写他革命的方面，也描写他落后的方面。所谓典型，就是把它最重要的东西非常突出地集中起来，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它。齐白石画的虾，并不是按照虾的每一条脚画出来的，而是把虾最主要的特征概括起来，所以看上去比真虾更真一些，真的虾没有那么吸引人。

生动、典型这是艺术水平高不高的重要标志。比如，一个小说的艺术价值高不高，就要看他写的人物是不是很典型、生动，这是评判艺术价值的主要标准。我们新中国一直到现在所写的小说有些是很好，但是比得上《阿Q正传》的还没有。能够写出像《红楼梦》那样的小说也还没有。并不是说新中国的文艺不行。新中国的文艺前途很远大。但是因为新中国只有六、七年的时间，要作家把新人物很生动地概括出来是不容易的。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经验才能概括出《水浒传》这本书来，描写农民战争英雄典型的没有

第二本。中国几万万人的国家，几千年来农民的暴动只能概括出来一本书，所以，最高的文艺作品是不容易写出来的。俄国十九世纪出了一大批作家，写了很多很好的文艺作品。俄国革命所以先成功，跟出现这些文艺作品也是有关系的。当然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了，但文艺作家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主要是它的观点，每一个作家都有一定的观点来反映现实。这个观点就代表一定阶级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比如，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农民观点，有些地方相信宗教，在这些问题上，托尔斯泰代表农民的意识。中国的《水浒传》也是代表农民观点。《红楼梦》据说有资本主义因素，这点还有争论，但至少它有反封建的观点。《西游记》中用神话的形式来反映现实，在艺术上有它成功之处，但它的观点是反动的，它把孙悟空这个反抗人物描写成为猴子。所以，艺术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有阶级观点。

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所以叫作上层建筑，都是因为有一定的阶级观点。

艺术除了有一定的阶级观点外，主要的特点是反映现实，而且是生动地反映现实。所以，艺术就有永久性。凡是很好的艺术作品，尽管它写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可是它能把一定的人物非常生动、非常典型的写出来，它就能够永久保持下去。典型的東西，任何时候的人都会认为它有价值。齐白石画的虾，任何时候没有人反对它，因为他能够反映这些东西。我们说《西游记》是反动的，可是《西游记》描写了一个孙悟空，描写得非常生动、典型，反映了反抗的性格，反映了反封建的性格。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人见了皇帝要下跪。孙悟空见了玉皇大帝说：你这个老头，给我一个官作罢。在封建社会里敢这样写，就是反映了真实。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有这样的农民领袖，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是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认为不过是个老头子。

为什么一个有反动观点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有这样的价值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他非这样作不可。他是作家，他不能不这样作。《西游记》的作家为了要写出天宫的力量，他就不得不把反抗人物也写得了不起，把孙悟空写成神通广大的。写出他的反抗性格，目的就是要衬托出天的统治是有力量的。可是结果有些方面跟作者原来的意图相反，就是从人民看起来，最值得爱的就是孙悟空，因为他有鲜明的反抗的性格。而天宫里面的一些人物是糊涂的。为了征服孙悟空，动员了多少天兵天将都没有办法，结果是如来佛最后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最高的神。所以，作者在主观上有他的阶级观点，另一方面他要忠实于艺术，他就要写得非常生动。

所以，艺术价值就是它的典型性。我们对旧艺术作品的批判也是要这样分析，就是把阶级观点跟艺术价值加以区别。凡是有艺术价值的，它的观点并不一定很好。但要紧的是它典型的东西，这种典型就有它的人民性。尽管写的是地主阶级，如果写的的确是很典型，那怕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写的，它也有人民性。艺术的价值主要是在于艺术性。每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有它政治的方面，都有它的阶级观点。我们对过去的艺术是这样的看法。对今天的艺术的要求就不同，对今天的作家我们就不能说你的立场可以马虎一些，只要写得真实就可以了。今天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个作家有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再去很忠实地反映现实，他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更好。阶级观点跟艺术内容完全一致了，可以产生比过去时代价值更高的作品。过去的作品，阶级观点跟艺术的内容经常是矛盾的。《西游记》就是一个典型，作者的企图跟作品的效果有矛盾。对过去的作家我们不能那样要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既要忠实于客观现实，又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两方面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反映现实。所以，对过去的作家来说，我们要否定他的阶级观点，肯定他忠实于客观性这一点。对今天的作家，我们既要求他忠实于现实，又要求他掌握马克思主义。如果这两方面都有了，我相信能够产生出比过去价值更高的、数量更多的作品，也可以超过鲁迅，因为我们的新人物比阿Q要好。现在的问题是很好地描写一个共产党员的作品还没有。《保卫延安》里描写的共产党员非常生动，艺术价值很高，但是还要努力。可是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只有一本《水浒传》是描写农民的。《西游记》是歪曲农民的形象的，把反抗人物说成是猴子。《白蛇传》中描写的反抗人物，都写成虾兵蟹将，都不是人，只有法海才是人。如果过去的人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可以相信就不会只有一本《水浒传》。

上层建筑大体上就是上面讲的这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说某一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主要是讲它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整个来说，这是一个体系，围绕着一个阶级观点的体系。比如说，哲学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容不管怎么样，它是有阶级观点指导的。围绕着这个观点构成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就成为一个上层建筑。又比如，艺术所以成为上层建筑，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根据阶级观点来反映现实，也成为一种体系。宗教也是这样的体系，各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用它的观点来解释宗教，使宗教成为思想体系。围绕一定的阶级观点的思想体系，就成为上层建筑。

对这个体系如果加以分析，其中有些带有永久性的因素，把这些挑出来就可以成为以后上层建筑的一种继承性的因素。所以，研究各种上层建筑本系要注意到它整个的东西，它的观点和各部分的区别。黑格尔的哲学整个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它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如果分析它的内容，它的各个部分有很好的东西，特别是有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因素。所以，我们否定旧上层建筑，说旧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或迟或早的要消灭，这是指整个体系来说，指它的观点来说，这并不是说其中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一点价值。比如，我们把房子的基础毁坏了，这样就坏了整个房子总的结构，那么是不是这里面的砖、瓦、木头就没有用了呢？还是有用的，以后盖新房子还是可以利用。所以，对上层建筑要有分析的态度，不能说上层建筑随着旧基础而消灭，因此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思想体系的继承性，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旧上层建筑要消灭，可是新上层建筑的建立就要利用旧上层建筑的各种材料。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三个来源，就不能构成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否定了三个来源，否定了英国的经济学，否定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些不是无产阶级的，可是马克思利用了它的材料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继承过去上层建筑中一些积极的东西，当然也要否定过去上层建筑中不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学问我们还是要很好地继承下来。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团结旧知识分子。我们所以能够团结旧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还看得起他们，认为他们有些有用的东西。北京大学有些唯心主义大师、专门讲反动唯心主义哲学，解放后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了。可是我们还尽量团结他们，尽量利用他们的长处。比如，有些人的英文很好，就给他一定的翻译工作，有的人就翻译了黑格尔哲学。现在没有别人能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贺麟就能翻，金岳霖讲罗素哲学，在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时候，他可以用几年来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原来的观点，这样一来他就能写文章，我们没有办法批判的东西，他就能批判。我们讲这些问题，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对待上层建筑要用分析的方法，这样才能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来为我们服务。

关于科学的问题有一点要说明。

马克思和斯大林都没有把科学列入上层建筑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科学一般来讲不是上层建筑。为什么呢？因为上层建筑它是这样一种东西：按照一定的阶级观点所构成的一种思想体系，不管它的内容怎么样，它是反映客

观现实的，它主要的东西是阶级观点。那么科学就不同，科学主要的不是阶级观点，科学不是按照某一个阶级的观点所组成的思想体系。科学是严格地反映客观世界规律性的一种学问。科学是一个长期有继承性的学问。它可以为几个阶级所使用。上层建筑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科学可以为各种阶级服务。

这里讲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因为社会科学它总是直接跟人的行动有关系，跟阶级斗争有关系。所以，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不能掌握社会科学，也不愿意掌握社会科学。所以，社会科学就是阶级的科学，社会科学可以称作上层建筑。

当然还有人主张社会科学不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意见认为它还是上层建筑。社会科学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完整的社会科学。资产阶级也有一些片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像英国的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家的阶级观点，但是他们不能掌握完整的社会科学。完整的社会科学就是一个阶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自然科学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它在阶级社会里也有一定的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个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一个科学家他要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来解释自然科学，来总结自然科学。如果一个科学家只是一般地讲自然科学，他这个学问就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如果有一个哲学家把他的科学作出哲学的总结，从科学研究的成果里作出世界观的结论来，那么他这个科学就跟上层建筑联系起来，就有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个并不是讲自然科学本身。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科学在实际运用时，他按照阶级利益来使用。比如，美国不是把原子用在生产上，而是用在军火上。自然科学成为阶级的工具，这是讲谁运用的问题，不是讲科学本身。所以，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上层建筑的作用，但它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不是一个根据阶级观点所构成的思想体系，它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反映。社会科学所以是上层建筑，就是因为掌握社会科学必须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就不可能掌握完整的社会科学。

3.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内）的基础与 上层建筑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的只讲一、两个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怎样来理解呢？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一个单一的基础，就是只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可是这一种生产关系是由各方面的生产关系综合成的。一种生产关系又有种种方面。比如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它就不是单纯的一种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是单纯的)，它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人和人的关系一般是同志互助的关系，但它最根本的是工农联盟的关系。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也不是各取所需。按劳取酬不是平均主义，各取所需也不是平均主义，只有原始公社的分配才是平均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思想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方面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体系。这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体系中间又包含各方面上层建筑的因素。比如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这一点并不排斥批评与自我批评。另外还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文化上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因为社会主义内部有各种民族，所以要有民族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要注意到扩大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以前的了解不全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列宁讲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讲到扩大民主的问题，但是在苏联有些搞理论的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时，不能和扩大人民民主制度相结合。这跟苏联有一个时期过份强调专政这一方面有关系。斯大林领导下的这些缺点跟理论上多少有些片面性有关系。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反对“斯大林主义”。一反“斯大林主义”就来了一个扩大人民民主，就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了。所以，现在匈牙利就提得比较正确了，要专政，也要民主。我看铁托反“斯大林主义”有点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至少是不注意这一方面。反动派就利用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挑拨，搞反抗阴谋。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方面，首先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要注意到扩大人民民主。我们中国现在就全面地提出了这一点，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一方面讲专

政，另一方面也讲民主，很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些问题。

这里主要是讲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要介绍一下。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简单地来说，就是把过渡时期的基础看作是正在变化的基础。实际上两种基础正在斗争，一种基础在形成，一种基础在消灭。这种意见是苏联一般教科书上的意见。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是五种经济成分的总合，就是四种所有制的总合。过渡时期只有一个基础，就是过渡的基础。这个过渡的基础就是几种生产关系的总合。

这两种意见产生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如何来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两个意见的分歧。为什么前一种意见主张有两种基础呢？因为前一种意见根据的理由是上层建筑对基础服务，是要巩固自己的基础。因此，我们要肯定哪一种生产关系是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那么就要看这种上层建筑是要巩固和形成那一种生产关系。这个原则是在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里讲到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一出现之后，就要成为极大的力量，积极地来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并且采取一切办法来帮助新制度，来清除和消灭旧基础。根据这个理由，就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要来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基础，同时要消灭资本主义基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这个专政和思想能够巩固和形成社会主义基础，同时消灭资本主义基础。它要形成两种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它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通过农业合作化来形成这两种所有制。另一方面，它又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个体所有制。那么，这种情况按照斯大林的原则来说，我们的上层建筑形成了自己的基础，同时又消灭旧基础。所以，我们的上层建筑对四种所有制不是一视同仁的，有两种所有制我们要把它巩固起来，另外两种所有制我们要把它消灭。

因此，就不能够说四种所有制都是同一个基础，而应该说四种所有制构成了两种基础。在我们过渡时期，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了社会主义基础，这个基础正在形成，我们的国家在帮助它形成。资本家所有制跟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构成资本主义基础，而我们国家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它。我们

国家进行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促进了新基础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促进旧基础的消灭。所以说，基础是两个，这两个基础又有联系，又有斗争。这就是前一种意见的主要理由。

后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们党的政策来看，我们当然要促进社会主义基础的形成。可是在促进社会主义基础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又要团结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积极因素，又要照顾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安排。所以，我们不仅对社会主义基础作工作，而且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作工作，凡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因为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在过渡时期，上层建筑为社会主义基础服务，也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因为它照顾资产阶级，安排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要消灭它，但也是为它服务了。既然四种所有制在过渡时期都被服务了，所以，应该说四种所有制都构成过渡时期的一个基础。

这就是两种意见分歧的主要理由。

我个人赞成前一种意见，理由就是我们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照顾和安排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手段，并不是实质。从实质上来说，我们国家并不是把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基础，因为我们所要形成和巩固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要去巩固和形成资本主义基础。照顾和安排是暂时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根除它、消灭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生死斗争的关系，是一个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一个不调和的斗争。所以，我们的上层建筑绝不是把资本主义基础也当作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这就叫作不是一视同仁。

不能说凡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基础是讲我们自己的立脚点。而我们的立脚点主要依靠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愈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愈巩固。最近几年来，因为合作化发展了，资本主义改造实现了，因此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多存在一天，我们政权的巩固性就不够一天。虽然我们要利用它，可是它存在的时候总是有威胁我们的一方面。所以，照顾并不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基础，而是为了消灭它而采取的一种照顾。

后一种理由多少有一点认为上层建筑对基础有些一视同仁的味道。当然后一种意见也没有否认上层建筑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他们把对资本主义的照顾当作是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基础服务。实际上这种暂时的照顾并不等于是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服务。比如，对战争俘虏我们也要照顾安排，但

这不是对他服务，也不是使得敌人更加巩固起来。所以，后一种意见如果对的话，就跟斯大林的原则有矛盾，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里面讲的有矛盾。当然斯大林的意见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争论还是可以开展，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讨论。但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里已经过去了。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理论的总结比实际生活要迟一点。实际生活过去了，对它要作一个很好的理论的说明，将来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必再争论了。总之，根本原则是没有人反对，我们国家总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一点，所以，在主要问题上并没有分歧。

第 07 章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1956.11.24)

【这是艾思奇给中央党校学员(记录未记是什么班次)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问题有两大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现在分几个大问题讲一讲:

- 一、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 二、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 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现在简单说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专家讲过,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一般规律和动力的科学,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当然是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不是研究历史各个方面具体规律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等等。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总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一种哲学,它是研究一般规律的,它的任务是要为各种具体科学提出一种方法、提出研究问题的根本方向。

1.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我曾经说到地理和人口不能归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以内,就是说我提出的意见是有点修正斯大林说法的意思。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修正,是不必要的。

我的意见没有写成文章发表,在课堂上提出这个意见,大家考虑考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因为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常常抓住书本上名人写的东西,不敢怀疑。因此发生一种情形,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上所说的,人的思想拴在一条线上。所以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开展一点,使我们在学理论的时候避免教条主义,讲课的时候不妨把争论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介绍一下,把值得考虑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考虑,大家不同意就算了。

提出反面的意见，考虑一下是有好处的，要有对照面，然后才能发展，认识才能深刻。没有光明，就不懂得黑暗的坏处，不提出反面的意见，正面意见的正确与错误就不容易显出。我们用对立统一的法则展开我们的思想，因此有时要主动地考虑反面的问题，当然已经千百遍证明过的就不需要怀疑了，要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辩证唯物主义，这就错了。一些个别原则，一些新的原则，不妨从反面考虑考虑，使思想开放一些。

我提出这个意见，不是作结论，说斯大林的说法不对。斯大林用地理、人口和生产比较，那种比较还是对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有决定作用，地理、人口有重要的影响。他指出这点并不错，我没有否认这种解释，我们要把生产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但我们决不否认地理、人口对社会发展有很重大的影响，考虑具体社会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地理、人口条件。中国地大物博，这就使中国占很大便宜，这点对我们的革命有很大影响。从前抗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国，所以能持久，像埃塞俄比亚等小国，一打就打掉了，大国就有回旋的余地。人口众多也是一件好事，虽然现在要节育，可是人口多很好，不要拖拉机也可以搞合作化，如果地广人稀，想大规模地搞合作化，没有机器是有很大困难的，至少不会这样轰轰烈烈。人口多，帝国主义就害怕，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一去帝国主义就害怕，说人海又来了，认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口多也有坏处，人口太多，粮食的增长跟不上，不容易很快地超过人口。

马尔萨斯的学说是错误的，一般地说，粮食的增长可以比人口快些，苏联就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但我们人口太多，生殖力大一些，如果没有限制，粮食的增长就会慢了。我们需要粮食比人口增长的更快一些。十二年农业发展计划，有的地方，粮食增长一倍，五百斤增加为一千斤。十二年是不是人口就增加一倍呢？不能。因为一年增加一千万，十年增加一亿，十二年增加为七亿，不会增加一倍。所以人口总比粮食增加得慢些，但我们希望粮食增加得更快一些。马尔萨斯的说法是错误的。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粮食一、二、三、四、五这样增加，而人口是二、四、八、十六、三十二的增加，如果这样的话，粮食就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加。我们不这样看，粮食的增加是一、二、三、四，人口也是一、二、三、四，而且比粮食增加得小一些。我们希望粮食增加得更快一些，使生活更好一些。我们的节育政策的理论不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环境提出来的问题。

人口是有影响的，基本上人口多是好的。当然对于反动派来说，人口多不好，蒋介石就是觉得老百姓太多，一造反就没有办法；对于革命来说，人多是好的。不否认地理条件、人口条件的作用，而且有很大的作用，问题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否认，我们要否认的，只是名词问题，要不要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名词概括地理条件和人口？不要概括地理条件和人口，只是生产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指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指经济关系。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这本小册子最后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公式。在这段话里讲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是解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方式，也就是斯大林讲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就是指政治生活及一般的社会精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一般都是把社会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关系包括生产、生产方式、一般经济状况，精神生活包括政治思想、法律、宗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把地理、人口和生产并列起来，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内。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得到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把地理、人口看作是一种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社会生活必要的条件，而不要把它看作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社会存在，就是社会自己内部的物质条件，而地理是社会外部的物质条件，人口是生物条件，而不是社会本身的条件。

也有的同志这样理解，生产过程要和地理发生关系，所以是不是地理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种说法有点理由，但还可以解释，就是生产是必须要和自然、地理发生关系，生产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但在这种条件下，地理条件只是生产的一个因素，劳动过程的一个要素。生产过程需要有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作为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地理条件只是生产的因素，并不是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条件作为独立的东西，不能成为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能融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因素。可以参加到劳动过程中，但不能单独成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生产、生产方式，地理仅仅是构成因素。

斯大林的说法，好像生产、地理、人口是各自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几种都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中生产起决定作用，用一个名词概括三个

东西，容易引起误会。我想是不是不要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概括地理、人口，只有一个生产就够了，因为在生产中已经包括地理、人口了。

这个问题究竟是个名词问题，如果这样用不致引起很大的误会，这样用下去也没有什么大害处，大家可以不同意，我只是作为参考意见提出来，大家考虑，我也再研究一下。要我下个结论，说我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错了，这也不行。如果我将来觉得对，就写文章发表，不对就算了。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的问题，多少人反复考虑多少次，我讲了一个意见，讲以前也反复考虑多少次。现在中央有了结论，三反五反以后看不到对抗性矛盾，现在没有对抗性矛盾了。中央也是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了这个意见。

要确定新的原则很不容易，要非常谨慎，没有最后确定以前不要把它说死，经过最后的证明，再把它当作公理，当作真理确定下来，经过多次实践，加上反复思考，最后得到真理。

对于我的意见有一点怀疑都不要肯定，还是照斯大林的讲法好。不轻易确定一个新原则，不轻易推翻一个旧原则。

2.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首先是生产力的性质怎样了解？生产力性质、水平、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些名词如何了解，有什么关系？

生产力性质，就是生产力本身的一种特点。性质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集体性和个体性。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体上是由集体性的生产力向个体性的生产力发展，然后由个体性生产力向集体性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原始公社是集体的，封建社会是个体的，封建社会以后，又向集体方面发展，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业。后一个集体和前一个集体不同，前一个集体是单纯合作，规模很小，是以氏族或农业公社为单位的；后一个集体性是分工合作，工场手工业的集体性是分工合作，机器工业是社会公共的性质，甚至把国际打成一片。

除了最基本的集体、个体发展性质变化以外，还加上有没有社会分工，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多点、少点，都参加到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定性里

去。要具体地了解生产力性质，首先要研究它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然后加上有没有社会分工，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多少。

生产发展的水平，是讲生产力的量的方面的问题，是人类取得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多大。量和质有联系，不同的生产力性质也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有多少，跟生产力水平、生产力量的方面有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包括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比如以前农业劳动是个体性质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但农民需要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合作化起来，特别是贫农需要使劳动由个体变为集体。这种旧的水平、性质加上需要，就是农业合作化以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合作化。生产力发展状况是总的名称，包括生产力性质、水平以及需要等等。

究竟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还是三个？

肯定是两个，用不着再讲了。有些人认为是三个，是把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生产力的要素混淆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劳动过程是讲三个要素，因为没有对象，劳动不起来。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性质以及发展水平，是决定于两个要素。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讲得好像不大明确，引起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原来我是这样讲的，生产力的发展是需要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但生产力之所以能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决定于生产力本身的内部条件，内部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推动作用。当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是密切联系的。可是对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外来的推动力。这种力量起作用要通过生产力本身内部的因素，单单有生产关系，不通过生产力的内部因素，是发展不起来的。

内部因素是什么呢？我讲课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地方讲得比较含混。一方面讲生产力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可是生产力有人和工具的要素。这里面发生了问题，究竟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部根据是什么？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呢，还是人和工具的矛盾？这个问题需要明确地答复。

应该这样说，生产力是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矛盾的运动。但矛盾的解决是要通过工具的使用。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它的性质的决定条件，就是工具和人。

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因素就是生产力的两个要素，首先是工具，然后是人，是掌握工具的人。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性质如何，首先要问这个社会的人用什么工具来生产，然后再问如何使用这个工具来生产。这两个问题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它性质的两个根本问题。

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两个要素起作用，不是生产关系能直接起作用。为什么两个要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素呢？因为两个要素是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人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料，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是要通过工具，就是要善于使用工具，根据两件事情改造自然。

人和自然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也就是决定于工具和劳动者的矛盾运动。人使用什么工具，如何使用工具，这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矛盾。所以，现在就要明确地确定一下，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部根据，就是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是通过这两个要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可能性。生产力的发展得到解放，但要怎样才能实现解放，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一定要抓住工具和人这两个环节。我们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农业合作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是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呢？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这时生产力有了发展的可能性，得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要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要这种推动作用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就要抓住工具和人两个环节。如果不抓住两个环节，即使有了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不能发展。

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央有个农业发展纲要，里面主要是生产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农业的主要东西。我们现在不能立刻使用机器，也不必，因为土地少，人口多，可是合作化以后，就立刻考虑适当地改善工具。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新的农村发展生产力，不要改善工具，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恰当。合作化以后，我们考虑生产力的时候，也就考虑到按照我们的情况、按照条件的许可，适当地改变工具。有两种改进办法，一种是新农具换旧农具，一种是更好地使用农具。完全不改进工具，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事实。当然中国的情况主要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包括工具操作方法，包括劳动组织。

新的生产关系为什么能推动生产力呢?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改进工具比较容易,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也比较容易。旧的生产关系为什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呢?因为在旧生产关系下的种种条件使得不能改进工具,甚至原有的工具也要搞坏,同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生产经验不能积累,劳动技能不能提高。主要就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穷困状态,使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社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过剩,机器停下来,劳动者大批失业。

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阻碍工具和人发生作用;新的生产关系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能推动工具和人充分发生作用。

有了新的生产关系,就要抓住工具和人的环节来进行生产,其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规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使用手工工具和机器,水平总有一定的分别,可是工具的作用要发挥起来,需要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不积极,有再好的工具也没有办法。工具是客观条件,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工具的发展,但人是最主要的。有了工具,就要看人善不善于使用,这是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一方面的表现。

如果讲到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应该说,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旧的生产关系,一般地说,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特殊部门可以推动。但生产关系只是推动作用,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还在于生产力内部,就是人和工具的相互关系,这两方面使得生产力能不断地、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劳动人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很高的时候,生产力发展得快一些,积极性低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慢一些,但生产力本身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因素。

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工具的发展,这是斯大林讲的原则。有的同志说,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具没有很大改变,但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斯大林讲错了。我看他的原则一般没有错,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思想方法问题,就是要注意一般原则的了解和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问题,要加以区别。如果只讲一般原则,认为一般原则是指把整个人类历史算个总账,最主要的问题应当怎样看。如果算总账,可以说总的来讲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生产工具,每个时期生产力最主要的、重大的质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决定于一种生产工具的根本改变。原始时代由旧石器到新石器,进到金属工具,由普通金属工具到能炼钢,生产力又进一步由手工工具进到机器,生产力大大

飞跃一步。每个时期生产力发展划时代的飞跃，归根到底是由于工具的根本改变。这是讲个总的原则。

斯大林的著作是个很简单的提纲，只能讲主要的原则，具体运用就不能详细讲，因为提纲的东西要简单，有些地方就片面了，有些问题我们要原谅，因为这是个提纲。

这个原则总的来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适用的。要使中国农业发生强大的飞跃，归根结底还是要技术改革，不能满足于现在合作化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比过去提高很多，还可以提高，可是这个提高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无论怎样提高，比起旧生产力差得不会太远，要使生产力走得很远，还是要机械化，要解决技术改革问题。我们过去的生产力容易超过，因为那是古代的生产力，如果不能超过，我们的工作就太差了。但我们要求超过很远，现在我们超过还是靠人多，生产力高，就是一个单位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东西比过去多得多。比如一个劳动力能种三十亩地，我们希望将来一个劳动力能种三百亩地，甚至一千亩地，用手工工具是作不到的。单位面积增产用什么方法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增加劳动力，一个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总的来讲，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在于工具的变革。问题是对总的原则在具体运用时简单化，不然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要提高生产力，就要立刻搞机械化，得到这种结论就是教条主义。具体运用的时候要因时因地、斟酌情形解决问题。总的方向应该机械化，但要看情形，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现在不能勉强解决。现在我们就是适当地改进工具，不能立刻机械化，然后加上人的生产经验的发挥，劳动技能的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工具，一个是掌握工具的人。现在工具不能大规模地改进，改进掌握工具的技能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不过单单改进掌握工具的技能，生产力的提高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没有到这个限度，人力没有充分运用，生产经验、劳动技能没有充分发挥。可是发挥人的力量的同时，要根据情况适当地改进工具。两个环节如果抓得好，生产力就能够发展，新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就能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如果不能抓这两个环节，尽管有新的生产关系，还是空的。东欧有些国家的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不能适当地解决改进工具和提高人的劳动技能的问题，生产力还是不能提高。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内因是根本的，但外因有重大影响。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虽然生产力有两个自己内部的因素，也不能发展。

有人问：新中国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新的社会制度指什么？新的社会制度，应该说是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各种法律制度，其中根本的东西，就是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可以说，新的社会制度，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关系。我们有了新的生产关系，使我们的生产力有发展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可能性需要抓住工具和人的环节，使它能得到实现。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变可能性为现实性，变今天新生产关系开辟的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为现实性。

关于新的社会制度怎样了解的问题，《人民日报》有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导。一种意见认为新的社会制度不是讲新的生产关系，一种意见认为是讲新的生产关系。我认为不简单是新的生产关系，但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关系。

还有两个具体问题：蒙古这个国家由游牧生活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利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多半在落后的国家先实现的问题。

关于蒙古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只看过一些文章。从那些文章看来，那种过渡也不违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要凭脑子想，蒙古一定完全是社会主义。蒙古由革命胜利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经过很长的时间，它们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恐怕有些地方比中国还要迟。它是在革命胜利后，逐渐在苏联帮助下发展一些工业，因为是国家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老百姓的游牧生活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有一部分牧场变成社会主义的，是现代的畜牧方法，使用机器，有一部分国营，有一部分集体经营，有一部分是私人的牧群，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

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不可能，但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总是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方面走。中国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不好说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因为有些地方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还没有最后完成，农业合作化也没有最后完成，这都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相适合有联系。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是不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这也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就是对一般原则的了解和一般原则

的具体运用的分别。讲一般原则，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具体运用的时候，它的表现很复杂。

落后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呢？因为虽然它落后，可也不太落后，总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工业。俄国有帝国主义经济，我们有蒋介石的官僚资本，我们不是阿比西尼亚那样的国家，我们有比较集中的工业，在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有资本家的私有和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的矛盾。

为什么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胜利，我们这样的国家会先胜利呢？这是种种具体条件凑成的，上层建筑关系，国际关系。比如美国为什么不垮呢？因为它的统治者没有遭到严重的挫折，统治力量很大，特别是有钱，有钱就有办法收买、欺骗，使得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基础。我们这样的国家，虽然落后，又不太落后。同时由于落后，资本主义没有那样充分发展，可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更尖锐一些，生产力没有出路，首先农业不能前进，又有封建制度，又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能发展。

革命形势决定于种种条件，种种条件使得生产力没有出路，非爆发革命不可。美国虽然生产力很高，但由于种种条件，生产力还多少可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工业还可以发展，加上上层建筑的支持，可以比较稳定下来。

基本原则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则，这不会错的，具体运用要考虑到种种复杂情况。凡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都要这样了解。

生产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这个过程算不算规律？有人说不算规律，客观存在是规律，自觉性是人的认识问题。规律是生产本身的发展，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看还是个规律，因为由自发到自觉这件事也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的事情发生，总是有点自发性，到了自觉，总是靠后一点。这个规律也就是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规律。规律就是基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固定不变的，是必然的。先自发后自觉，这是必然的联系，主观落后于客观也是必然的联系。

3.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声明一下，我们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把斯大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当作正确的。现在苏联、中国有些人对斯大林的讲法抱有怀疑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基本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斯大林的意见，一种是对斯大林的意见采取反对的态度。

斯大林的意见是这样的，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个比较狭窄的范畴，比起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来说，它是比较狭窄的，基础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就是生产方式。基础仅仅是生产关系方面，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和生产力没有关系，生产力不叫经济基础。基础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认为经济结构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斯大林认为，上层建筑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什么是社会精神生活呢？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科学、道德、艺术这些东西，也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所有这些叫作社会精神生活，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指仅仅为一定阶级服务的，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那部分。

照斯大林这种说法，研究上层建筑的时候，要和社会意识形态加以区别。自然科学就不叫上层建筑，文学、艺术有些阶级观点是上层建筑，反映的现实材料就不是上层建筑。齐白石画的虾就不是上层建筑，但齐白石的观点是上层建筑。

在康斯坦丁诺夫的著作中就是这样研究的，一个东西要分成几部分，政治、法律是上层建筑，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辩证法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

苏联专家有这样共同的观点，精神生活属于材料性质的东西不是上层建筑，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跟阶级观点密切联系的东西是上层建筑。我们从旧社会接受文化遗产，是因为把旧社会的观点取消了，所以可以接受。这个解释有许多困难，一个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上层建筑，争论不休。自然科学勉强有个结论，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可是用世界观解释自然科学就是上层建筑。有人说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有人说不是上层建筑，因为掌握的是客观真理。吉谢辽夫专家认为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别的许多专家认为是上层建筑。我们暂时认为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用这种观点解释问题，有许多困难。想要推翻这种说法的一种新看

法正在生长，想把问题简单化一下，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是一切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解释几个问题，暂时是根据斯大林的说法来解释。

斯大林的说法也有困难，在解释许多具体问题的时候有争论。关于什么叫作生产关系总和的问题，有两种了解。一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们是赞成这种看法的，解释具体社会经济基础的时候，可以把经济基础看成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两种生产关系，每一种有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包括在内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比较能解释具体情况。因为很多社会比较复杂，只能肯定它的基础也是复杂的，不然就很牵强。日本是君主封建帝国主义，它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另外，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它的基础，这样说比较容易了解具体问题。

另一种看法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只能是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和，经济基础只能由一种生产关系构成，一种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总和为一个基础。照这种观点来看，任何一个社会只能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尽管成分很复杂。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基本阶级只有农民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基本阶级。这种看法在苏联相当流行，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只能由一种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它的基础，其他成分都不是基础。运用到中国，就是旧中国始终是封建社会。这种意见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很牵强。官僚资本主义也不是基础，毛主席写了文章指出，蒋介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个政府的经济基础，如果那个理论成立，毛主席这个文章就应当取消了。说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是基本阶级，也说不过去，人数少点，但作用很大。所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生产关系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有的社会也可能只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比如美国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的总和。但有的社会不同，沙皇俄国至少是两个生产关系，旧中国是官僚资本、封建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基础。旧中国还有奴隶制度，成分很小，就不算了，占主要成分的至少有两种。

关于过渡时期基础的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一个基础；一种是过渡时期有两种基础在变化、运动。是不是还有第三种看法呢？也有。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是基础，因为过渡时期是要建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当作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三个意见，头一种意见我们不同意，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础，这种说法不恰当，和列宁的说法不一致。列宁说，过渡时期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有两种，一种是过渡时期所有的经济成分构成一个基础，一个就是四种所有制构成两种基础。过渡时期就是因为有两种基础在互相生长、消亡。苏联的教科书赞成后一种意见，无产阶级国家把社会主义经济当作自己的基础，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斯大林的讲法。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讲法，就是后一种讲法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是把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基础，而把资本主义当作旧的基础。

斯大林讲，上层建筑要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旧基础。资本主义是旧的基础，资产阶级是旧的阶级，我们自己的基础是社会主义。

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讲法，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把四种所有制统统当作一个基础。我们的国家是把四种所有制都当作自己的基础，没有分新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斯大林的讲法的。

现在我们暂时肯定斯大林的讲法是对的，大家可以研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它推翻。我们的思想不要拴在一条线上，要活动活动。

理论是要从实践来的，我们要在实践中考验斯大林的讲法对不对。

我们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基本上是按照康斯坦丁诺夫的讲法，中国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和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作自己的基础，没有把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基础，国家的任务是要帮助社会主义基础形成起来，巩固起来，而且帮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是这样作了，我们上层建筑的作用很大，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就是个表现，原来以为要十八年才能合作化，由于上层建筑能正确地反映基础，为基础服务，因此促进基础的形成，两三年就基本上建立起这个基础。

上层建筑帮助基础形成，巩固、推动自己基础的形成，同时就推动了旧基础的消灭。如果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就得不到这个结果。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在

别的国家可以看出来，如匈牙利、波兰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怎样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说？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大，它是新的生产关系，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的问题是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为基础服务，叫作官僚主义。铁托说苏联的制度成问题，铁托说是官僚主义制度，如果这样，铁托还是对的，苏联的辩护没有对准目的。如果根据基础的实际情况很好地反映到上层建筑，然后想出办法帮助基础形成，就不会发生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是不能按照基础本身的情况把它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公共性质，它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公共性质，许多方面不能这样作，所以发生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律是这样一个规律，要有高度的技术装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没有按照规律办事，片面地强调高度技术观点，它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僚主义，上层建筑脱离基础。

中国在这方面搞得比较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正确地反映基础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具体情况，反映新旧的情况，然后制定正确的方针、计划。帮助社会主义的基础形成，同时促进资本主义的基础消灭。这就是在中国来说，我们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关于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也有不同的争论。现在我们所讲的意见，上层建筑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专政，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的个别制度还存在，这算不算上层建筑呢？现在我们的讲法就是不算上层建筑，只算上层建筑的因素，或者是现象。另一种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制度也还是上层建筑，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消灭，就有它的基础，有它的基础，就有它的上层建筑。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思想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没有成为上层建筑体系，没有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只是参加政权，有些党派是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不是占主要地位的，所以不能说在无产阶级上层建筑之外，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只能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些因素或现象。这种看法有人反对，你说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因素或现象也好，最多不过是加上两个字，这是名词问题。

还有些具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怎样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它的基础也是多种成分，也有国营经济，也有合作社，也有个体私有者，也有资本主义。当时经济基础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大体上是五种，不过量的方面不同。在解放区中，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小资产阶级比较占优势，另外还有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经济基础也是两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资本主义因素。

这个基础也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几种所有制合成一个基础，那种经济叫作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另一种看法，是把正在萌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基础都当作自己的基础。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以前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那时的政权，把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当作自己的基础，也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自己的基础。当然，当时国家站在领导地位，国营经济起领导作用，可是为两个东西服务，因为革命的任务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四九年以后是无产阶级专政，四九年以前是工农民主专政。全国胜利以后，国营经济占主要地位，掌握经济命脉。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政权的性质变了，上层建筑变了，基础的发展方向也变了，以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发展以后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发展。我们的政权到现在还是这样，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还有个问题，社会主义产生工人阶级贵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何在？

工人贵族是什么没有具体提出，是不是指拿薪水太多的人？这种现象不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而是由于官僚主义，是旧思想的产物，旧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使我们感到有功劳的人多享受点，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因此觉得有功的干部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应当和一般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等级方面差得太远。一方面是旧思想的残余，比如知识分子、专家的工资特别多，苏联有五万卢布的专家，这就是把精神劳动看得比体力劳动高，旧制度的残余影响我们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产生的，工人贵族这个名词是带括号的，不能和英国工人贵族的条件相比。那是帝国主义经济产生的，帝国主义者收买工人阶级的结果。在社会主义里，工人贵族没有经济基础。如果在过渡时期有资产阶级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捧来捧去的结果，一些干部就特殊了。

有同志问：派别的阶级基础何在？

也是这样。如果说是派别里有了离开共产主义的趋势，对共产主义起破坏作用，它的基础在资本主义方面，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工联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为什么叫它是共产主义里的派别呢？就是它基本上还是共产主义中的。铁托无论如何没有违背共产主义，可是他的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有破坏，他基本上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可是又反映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影响。为什么能证明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呢？因为他的民族共产主义很受资本主义国家欢迎，这反映南斯拉夫的党没有自觉性，不了解这点，如果自觉了就没有这个问题，各国给他批评是会有好处的。这个批评有多大效果就要看以后了。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思想，要解决是不容易的。南斯拉夫有它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它和法西斯打过仗，铁托和他的群众有联系，特别是军队联系得很好，他的军队都是长期和他一起斗争出来的人。他的思想肯定有错误，但要一下子纠正是不容易的。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同志说这两个概念不清楚。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指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社会面貌的决定条件，阶级斗争是生产的一个方面，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阶级斗争本身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经济基础是不是有阶级性？

有的专家讲没有阶级性，我讲基础有阶级的倾向，基础有阶级的作用。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一个基础没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新的阶级就用不着推翻旧的基础。如果资本主义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用不着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应该肯定，生产关系本身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有利于一定的阶级。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是斯大林引的一段，研究了那段，就可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一些国家延长很久，如何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讲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高利贷商业压迫农民，使农民的生产力不能发展，发展得很缓慢。因此经济关系变化很缓慢，压迫比欧洲的国家更厉害。一般说，封建社会都是很长的，因为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不容易。中国由于种种具体条件，上层统治厉害一些，还有民族侵略，这些问题要具体研究历史才能解决，可能地理条件也在内。

地理条件方便，商业容易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快点。欧洲就是海洋很多，后来发现新大陆，商业突然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只能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能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没有这样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是间接一点。

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上层建筑能否划等号？

有两种意见：划等号，斯大林的讲法是这样的。另一种讲法，是一切社会意识都是上层建筑。

社会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因素？

理论科学如果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上层建筑，如果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上层建筑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有无产阶级思想，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因素。

第 08 章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1959.12.01、1964.06.15)

【这篇讲稿是两份讲课稿的综合，一份是 1959 年 12 月 1 日给 59 班学员讲的，一份是 1964 年 6 月 15 日给 59 班、60 班哲学专业讲课中的一部分。讲稿中的一、二两个问题是 59 年讲的，第三、四个问题是 64 年讲的。在对速记稿整理时，删去了两段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例子，删去了“论否定”一文的点名批评，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加工，未增加任何内容。】

1.辩证法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

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顺便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三条规律的联系。

列宁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这也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是，因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核心，所以，要了解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要把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基础加以说明。因此，也可以说，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某一方面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部分讲到：在这里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关系，这个笔记里暂时只能引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三个规律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恩格斯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三个规律是有相互关系的，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个相互关系就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基础，其他两个规律就跟着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基础来加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核心，因此讲辩证法的时候，如果讲的很简单，往往就是主要把对立统一的规律来加以说明，这样就差不多了。毛主席的《矛盾论》里也说：只要把矛盾的规律、矛盾的问题从各方面认识清楚，就基本上懂得辩证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这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简单的来说，辩证法不过是由对立而产生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这就是辩证法最根本的东西。

要简单地把握辩证法，就可以撇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撇开量变、质变的规律，单独把对立统一的规律加以说明也就够了。当然这样作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是简单的说明，就只能这样来说明。如果把辩证法的内容加以发挥，就要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来说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两个规律都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某一个不同方面的表现形态。我们讲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都是这样来说明，这样来把握它们的相互关系。

有的人不同意这样来说明。他的理由就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应该看作是三个孤立的规律，如果对立统一的规律作基础，就是要把量变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归结为对立统一的规律。如果这样来归结就错了，就用不着三条规律了。

我们觉得这种意见不一定对。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可以作为其它两条规律的基础的。从某一方面来说，要把两条规律归结为对立统一的规律也是可以的。列宁在辩证法十六条里也讲到量和质相互转变的规律。讲这一条时，列宁加了一个注：这一条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例，是向对立面转化规律的实例。这样就很清楚了，量变和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例子，当然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可以这样归结，实际上就是对立面转化的规律一种更展开的形式，更展开的说明。

有人问：毛主席曾经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写成肯定和否定的规律。为什么这样提？这是不是说恩格斯的讲法是错误的？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否定之否定这样的提法就不对了。我看解释为肯定和否定的规律也有它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就使得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密切地联系起来。毛主席这种提法就是说：否定之否定无非是肯定和否定互相转化的规律，把这个核心指出来了。我这样的解释不一定对，但我自己现在的水平就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毛主席的提法不是反对恩格斯的提法，不是要取消恩格斯的提法，而是有所发展，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更深刻地表现出来，把否定之否定跟对立统一的联系更明确地指出来了。这样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有所补充，有所发展。这个提法是非常高明的。

辩证法的三个规律：(一)对立统一的规律；(二)量变质变规律；(三)否定之否定规律。三条规律是密切联系的。所以，量变和质变的规律，肯定和否定的规律是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和质变的规律，事实上就是量和质的互换，互相转化。由于内部矛盾斗争，经过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经过质变之后，又进一步发展量变。新的质表现为相对的稳定性，

就在这个基础上发生新的量变。量变和质变的内容，毛主席也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说明。量变为什么会引起质变呢？质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量变的过程中，在量增加或减少的过程中，内部矛盾发生变化，主要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发生了变化。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变化以前，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但是量变到一定程度，到了顶点的时候，主导方面发生很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形式上就是质变，在内容上来说，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起了根本的变化。

在量变的过程里，事物的各个方面还可以有质变。比如，在社会主义没有变化成共产主义的时候，总的来说没有质的变化。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里，它的各个方面还是有质的变化的。所谓整个社会主义没有变化，是因为分配上仍然是按劳分配，这一点没有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分配制度不同。分配制度没有变化，整个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变化。另外还有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因此，按劳分配的制度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两种所有制的存在，就使得社会主义在总的方面，始终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说，某一方面有质的变化。质和量的变化不能混淆起来，是量变就不是质变，是质变就不是量变，不能说各个方面质变的本身，也就是量的变化。各个方面是有质变的。

由量变到质变，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在量和质互相转变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因此，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可以成为向对立面转化的一个例子。

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有两点：一种是事物的发展是内部对立斗争的结果，第二点，发展过程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向更高级形式转化的过程，就是向对立面的发展。

人的思想意识的质变是怎么变化的呢？

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起了质变，是不是真的进步了，就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是变化了。有些人做自我批评，但他是以个人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结果个人主义还是占优势，这样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我们常说：有了个人主义的人，想要进步，就首先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就会跟自己的个人主义进行斗争。有些人个人主义思想很严重，人家一提意见，他马上说：你这个人很好，谢谢你，完全接受你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根本不通过脑子，这是用个人主义来对待个人主义。当然，对待批评坚决抵抗的，这也是个人主义。

党内问题不是讲应酬，讲个人感情。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就多磕几个头，少受一些批评。遇到这种现象，不要以为他是真正的转变，那是一种保护个人主义的方法。真正的质变不是那样。顽固抵抗是不对，但是痛哭流涕也不能说明真正的转变。真正的转变是老实检讨自己，把自己当作客观对象来分析、批判，毫不留情地揭发自己的缺点，摆事实，讲道理。能够作到这点，那么就可以看出来真正有质的转变，因为他主导的方面不同了，能够把个人主义当作客观对象来斗争。

由于内部对立的斗争，到主导方面的转化，使得事情的质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矛盾论》里面讲的很清楚。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比较更明确地表现出了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和转化当中各个阶段的互相联系。对立统一的规律还没有能够使我们充分了解向对立面转化时各个阶段之间有什么内部联系。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使我们了解到这一点。

在这个规律里，首先是讲肯定和否定的矛盾，然后是肯定和否定的相互转化，由一个阶段转化为另一个阶段。在转化为另一个阶段中间发生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叫否定之否定？用这个规律来说明三大规律之间的关系，讲对立面的两次转化。

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只有两次转化？当然不是。问题是把两次转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之后，就能够了解无数次的转化，就能够了解无限多地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所以，只要把三个阶段的相互关系弄清楚了，无限转化过程的内容也可以清楚了。所以，这个规律就不必叫作无限否定的规律，我们了解三个阶段就够了。就像是解剖一个麻雀，我们就能了解一切麻雀一样。

看一个转变过程够不够呢？

单单看一个阶段还不够。研究两个阶段就能够说明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关系。再一个转变过程，第三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有一些特殊情况并不能够说明。

2.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问题

我们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总是分两方面来了解：一部分是先了解肯定和否定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整个联系。

要了解否定之规律，首先要了解否定为什么的问题。

简单来说，否定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第一个阶段叫肯定阶段，第二阶段叫否定阶段。向对立面的转化叫作否定。为什么叫否定呢？就是因为它要向对立面转化。这个转化是事物根本的变化，是变化到反面去了。原来是肯定的，现在就要把它否定掉。所以，凡是根本的转化，都是向反面的转化，向对立面的转化。所以，单看否定这个名词就说明辩证的发展。

辩证的转化跟庸俗的进化论根本不同。

庸俗进化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是渐变的，是没有根本的变化的，是一点点变化的。十九世纪以来，经验派哲学，又叫作实验主义哲学，都是宣传庸俗进化论。恩格斯批判了耐格里。耐格里就是宣传庸俗进化论，否认我们能够认识质的差异，甚至说质的差异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一切质的差异都应该归结为量的差异，所以本质上只有量的发展，没有质的发展。十九世纪以来，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取得了政权，所以，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世界观就走到了庸俗进化论方面来。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承认进化论，因为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已经出现了，因此他们就把变化归结为量的发展，归结为庸俗进化论。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已经包含有庸俗进化论的因素。但那时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在根本上不承认世界的发展。所以，机械唯物主义虽然已经有把质归结为量的因素，但那个时候没有庸俗进化论的问题。因为那时在自然科学界看起来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发展，所以没有庸俗进化论问题。

庸俗进化论，是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取得根本胜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自然科学又揭露了自然界的发展过程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歪曲事物的发展过程，因此经过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来宣传庸俗进化论。

庸俗进化论是经验派主观唯心主义的主流，跟不可知论是密切结合的。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问题上，他们是主观唯心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他们是经验主义，在解释世界发展问题上，他们是庸俗进化论。这一点，在胡适的实用主义里全都有了。胡适跟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斗争，就是李大钊和胡适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和庸俗进化论的斗争。庸俗进化论把质变归结为量变，不承认有质变，因此就不承认有什么否定的过程，不承认有根本的变化，更不承认有对立面的转化。

辩证法关于否定的概念运用在发展学说上，跟庸俗进化论是根本针锋相对的。辩证法承认有根本的变化，承认有对立面的转化，承认对旧事物的否

定。量的发展不是无限的，整个发展过程是无限的。但是每一个具体发展过程不是无限的，而是连续的。不是一加一加一……无限的加一。

黑格尔的学说中，也有庸俗进化论的因素。他认为发展是连续性的中断，连续性中断的质变。

单用量变质变的规律来说明辩证法是不够的。要更深刻地说明质变的内容，还要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质变是一种否定。对旧事物的否定，向对立的方面转化。

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否定”。这篇文章有很多错误，他的方法就是曲解否定的概念。已经有很多杂志开始批判这个文章，有些文章写的非常好。

“论否定”这篇文章就是曲解否定的概念，完全曲解为庸俗进化论。形式上好像是在使用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宣传庸俗进化论。在开始，他也肯定了，否定旧的事物是向对立面转化。但是，解释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时说：这个转化由于旧事物里面有积极因素，有消极因素。那么转化的原因就是消极因素的逐渐消灭，积极因素逐渐出现。这里他使用了“逐渐”两个字，没有提到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经过斗争，主导方面发展变化。所以，这是口头上承认否定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是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不承认矛盾的主导方面，根本方面的转化。这实际上是庸俗进化论，曲解否定的规律。

这个错误不是全国性的，但是很值得注意。我们在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可以把它作为典型提出来。既然陕西有人这样作，那么，别的地方也可能有人这样作。他进一步说：否定主要是继承旧的东西。旧东西里面本来有积极的因素，它逐渐发展起来，就得到否定。所以，否定旧事物主要是把旧事物里面的积极因素继承下来。因此，他就不提根本的否定旧事物这一点。本来，我们对旧事物的继承，要有批判的继承。新事物跟旧事物不同，主要是说它有根本的不同。比如，社会主义社会跟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越的地方是什么呢？主要是有了新的生产关系。而这个新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没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积极因素要不要继承呢？当然要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要继承。但是社会主义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是不是就是因为继承和发展了这些东西呢？那不是。而那篇文章认为：新事物所以比旧事物优越，主要是因为继承了和发展了旧事物里面的积极因素。能不能这样说呢？好像能够这样说，但实际上不能这样说。新事物所以比旧事物优越，当然是有一个因素，就是能够把旧事物中的积极

因素发展起来。但是，这只是一个因素，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是因为有了跟旧事物根本不同的新事物。因为主导方面变化了，有了新的质。这个根本新的东西在旧事物里不一定有。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新事物所以能够把旧事物的积极因素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发展，主要也是因为它有新的东西，有了新的发展形式。主要不是继承了和发展了旧的东西。

修正主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取消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实质。凡是不妨碍他宣传庸俗进化论的名词，他都可以使用，凡是不接触到革命变革的名词，他也都可以利用。使用的时候，尽量把一切革命的内容取消。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有这个共同点。从伯恩施坦起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都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而宣传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修正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讲否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保护“否定”这个概念的革命内容，一定要坚持“否定”首先是根本的变化，而且是向对立面的转化，是对旧事物的根本否定。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到继承的问题。

不谈继承也不对。认为什么都否定了，否定一切，这样的了解也不对，这样的了解是片面的。但是，借口不能否定一切，因此就根本取消否定，利用不能否定一切这个因素来反对根本否定，否认根本否定，这是一种修正主义，是首先要根本反对的。我们现在应该主要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否定，首先是对旧事物的否定，是质的根本变化，是新事物的创造。同时在创造新事物中间，又批判地继承旧事物中间某些积极的因素。这就是否定阶段跟肯定阶段的相互关系。讲否定问题，首先应讲清否定和肯定阶段的关系。这个规律的第一点是根本否定，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第二点是对旧事物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是批判的继承和发展。

“论否定”的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他说：否定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把旧事物加以利用、改造、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政策当作一个普遍的方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加以利用，限制、改造。而他连限制也没有提，这就是说，新东西就是简单把旧东西加以利用，改造和发展。这是非常荒谬的言论，也是一种非常笑话的诡辩，是把消灭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变成哲学规律，扩大成为世界观，而且对具体政策也是片面的曲解了。我们说是利用、限制、改造，他不提限制，只讲利用、改造、

发展，主要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一点不提。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是暂时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它。

所以，否定阶段和肯定阶段的关系基本上是两点：(1)根本否定旧事物，要向对立面转化；(2)在根本否定的基础上，有批判地把旧东西里面有价值的因素加以继承，经过批判加以发展。所以，否定有两方面：一方面，首先是否定，然后是有批判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

我们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是必要的。按劳分配制度本身绝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对这个问题，有的人有错误看法，把按劳分配简单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社会主义原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实现了。以前有人说，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原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说：这完全是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说，按劳分配原则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呢？那是讲按劳分配某一方面的形式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是指等价交换这一点来说。付多少劳动，就一定要多少报酬，因此就有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交换的形式问题，不是按劳分配原则本身。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什么按劳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首先是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润。资产阶级法权并不能是按劳分配。我们实行按劳分配，并不等于保存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制度本身已经在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劳动者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从这一点来说，按劳分配的制度对过去的制度还是根本的否定，问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残余。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我们要逐步加以消灭，因为它是一种旧东西。旧东西跟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有矛盾。现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我们不能要求马上消灭，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保存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首先是在所有制方面，然后是在分配制度上逐步消灭。不能因为我们还是按劳分配制度，就说我们不应该否定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按劳分配是我们必要的制度，因此把资产阶级法权根本否定掉就不对了。’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掉，因为现在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些残余。但是我们的方向还是要否定，能够否定的，我就要否定。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买东西排队只要排的不是太厉害，适当的排队还是必要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老百姓一样也要去排队，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

我们不主张工资等级差别太多。我们象牙雕刻工厂的老工人，每月工资六、七十元。资本主义国家来参观的人，有的挑拨说：你这样高的技术可以住别墅了。我们就不这样作，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技术特别高的工程师比起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应当高一些，也不能差很多。不然的话，就等于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要有差别，要有适当的物质刺激，但是不能相差太多。我们鼓励劳动的积极性，主要依靠政治挂帅，适当的配合物质刺激，这样对劳动积极性提高的更有力量。这才是革命，才是否定，才叫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3.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问题

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在讲辩证法“十六要素”时也有一些涉及，这里只是比较简单的说明一下。否定之否定，对肯定阶段来说，也是根本的否定。

为什么还要提否定之否定的阶段问题呢？

主要是说明在否定这个阶段上有些东西好像是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这也是一个必然规律。因为一个根本否定，再接着另外一个根本否定，在某些方面，好像形式上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般的解释，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两次向对立面转化，就不避免的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回到原来的出发了。不然就不叫向对立面的转化。既然是向对立面转化，转化两次总是有些东西回到出发了。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用不着很多的解释。向对立面转化这个规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回到出发点去，但这并不是循环，因为每一次否定都是向更高级发展，所以，不可能是循环。总是螺旋式的发展。所以，发展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主席曾经说：发展是走“之”字路。黑格尔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发展好像是圆形的，不是一条无限量变化的连续的渐进线，不是直线发展，是“之”字形式发展。发展是曲折的，有时前进，有时是倒退的。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普通日常生活里，工作里以及自然界社会发展里到处看得见这种普遍过程，没有什么更神秘的东西。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是曲折的，它按照“之”字形式走了两个转折后，好像回到出发点来，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回到出发点，而是向更高阶段的上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的同志问：工作，休息，休息，工作，这算不算否定之否定？

我们说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休息之后又工作，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第二天的工作好像又回到了第一天的情况。但这并不是重复。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最早的反围剿，他也是当作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说明的。

现在有些人把这个规律搞神秘了，以为举工作、睡觉的例子就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庸俗化了。这种人可能说我是庸俗化了，但是我说他神秘化了。认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能用在日常生活上，这就是教条主义观点。其实，到处都有辩证法。今天工作，晚上睡觉，明天又工作，这就是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好像后来又回到出发了，但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重复，而前进是曲折的。在工作中间作到一定的时候，要使它向自己所需要的对立面转化。工作一天疲劳了，就需要转化为休息。我们要善于调理工作和学习，要有节奏的来指导工作。如果说，为了搞大跃进，就不允许人家睡觉，那就错了。个别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早就纠正了。如果一直是工作，而不休息，这样就不符合辩证法了。毛主席曾经用过孔子的一段话来说明。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在赶庙会时问孔子：庙会这样热闹，我们圣人讲仁义道德，应不应该让人民搞庙会？孔子说：庙会还是应该搞的，生活应该有紧张，有松弛，一张一弛，他说：圣人应该指导人民一张一弛。有的时候要讲仁义道德，使他紧张一下，有时也可以让他们松一下。孔子说：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这是中国古典哲学里面的辩证法。

4.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关于这个规律，曾经有过能不能存在的问题，就更能不能算作一个基本规律的问题，能不能算作普遍规律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发生过。斯大林的哲学著作里就不提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明他对这个规律的普遍性有怀疑。

我们学习时，曾经也有一些人有过这种疑问。究竟否定之否定规律算不算最普遍的规律？算不算最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表现？苏联曾经有过这种提法。苏联在斯大林的著作出现以前，有些人有过这种解释，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黑格尔的术语的残余(术语就是名词)。这个话列宁本来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里面也讲过，他批评米哈洛夫斯基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话。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了黑格尔的那些哲学著作批判了黑格尔。德波林有的时候表述形式也采用黑格尔的术语。大概苏联有一个时候以此为根据，就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黑

格尔的残余，这是两个问题。列宁讲的是黑格尔的术语的残余，表达这个规律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列宁的意思并不是没有这个规律，后来混淆了，因为它是黑格尔术语的残余。因而也就是黑格尔的思想残余，因此可以取消了。我们在苏联哲学家的解释里看到有这些解释，否定之否定规律就不成为一个基本规律了。从前亚历山大洛夫的一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教科书(1952、1953年翻译到中国来)，那本教科书是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来写的，就是没有否定之否定规律。

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黑格尔术语的残余并不等于唯心主义，并不等于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公式，黑格尔的哲学把否定之否定当作一个公式，当成唯心主义的典型，当然是错误的。这是神秘主义。但是在神秘主义里面并不是一点合理的东西也没有。

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讲的很清楚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肯定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规律。我看恩格斯的观点并不错，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它的缺点是利用黑格尔的术语。但是，术语究竟是术语，也用惯了。既然用惯了，就不会引起什么误会，也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黑格尔的术语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比较起来，他的这个术语带有一点唯心主义的色彩。

矛盾、对立、统一这些名词，都可以看作是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内容的。客观事物有矛盾，所以我们说有矛盾，客观事物是对立统一，我们的思想上就有对立统一。质和量是客观事物一些本质的概括。至于否定、肯定这个概念，就好像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似乎只是人的主观的东西。要否定什么东西，肯定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以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为例。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否定了自己？如果研究资本主义本身，可以不可说资本主义像一个人一样，从思想上把自己否定了呢？它不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是因为自己的矛盾把自己推翻了，不是像人的思想一样，自己把自己否定了。否定之否定概念是一个纯逻辑的概念。

黑格尔哲学把逻辑概念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他认为一个社会变为那个社会，就像一个人在思考，自己把自己否定了。自然界出现的时候，好像自然界就是精神，它感到要否定自己，于是就出现了自然界。

所以，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的表述方法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把逻辑的概念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把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这种客观过程看成是一种逻辑的过程，看成是人的思想否定了什么东西。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确也有黑格尔术语的残余，使用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所使用的术语。而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不是这样反映客观规律，不要用逻辑规律来代替客观规律。本来，逻辑概念是客观规律的反映，黑格尔拿逻辑概念代替了客观规律，把逻辑规律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认为逻辑规律就是客观规律，这是黑格尔的思想。

所以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带有唯心主义体系表述方法的残余。但是这个名词我们已经使用惯了，现在还是这样使用，只要理解的正确，也不会发生什么误解，否定之否定如改成肯定、否定也是这样，因为肯定、否定还是逻辑的概念，还是不能解决用逻辑的形式来表现客观规律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我们如何来正确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它有一个黑格尔式的缺点，就取消这个规律。我们要正确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包含的客观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恩格斯说它在日常生活里面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规律？我们要理解它的内容，主要是这个问题。我们讲否定之否定规律主要也就是解释它的客观内容。不去纠缠它的名词，因为名词已经是用惯了。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作过解释。列宁并不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他的解释就是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说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切发展过程都是螺旋式的，不是直线式的。用这样一个说明就可以表达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内容。

毛主席对这个规律也作了一些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波浪式的发展。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井冈山前后，毛主席就开始作这种解释。那个时候讲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应该怎么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意见就是波浪式的发展。就是发展一点，巩固一点，巩固了以后再发展，发展、巩固、再发展。你搞一个根据地，经过一个革命，开辟了一个根据地，接着找机会把它巩固起来，巩固的方法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搞好了，根据地真正被党掌握了，贫雇农站起来了，就能够保卫根据地。巩固了以后，然后把军队组织起来，发展武装，然后可以进一步发展扩大。扩大了以后，就可以又巩固。所以很早的时候毛主席就把这个规律用到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里边。以后在战争问题上，在战略问题上，毛主席也经常是这样。这

就是把战争和休整联系起来。战争、休整，又战争，这样，战争才有胜利的把握。你如果一天也不休整，打得精疲力尽，不恢复精力，那就没有办法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一直打下去。有了根据地就有休整的基地，在两次战役之间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这样，也可以使战争曲折的发展。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里的公式，是围剿一反围剿。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革命战争是很艰苦的，又是持久的。怎么能够持久？就是要能够在战略上准备好不断反复，围剿、反围剿，再围剿、再反围剿。你要准备这样的不断的反复，不要希望一个反围剿就天下太平。反围剿要一直反下去，反了以后还要准备让它再围剿，以后再反围剿。在革命战争里边，还有一个要以正规化对游击主义否定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些“左”倾冒险主义者想要以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用正规战否定了游击战。毛主席当时是坚持游击战争。他认为将来正规化否定游击主义也可能，但是不能完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就是完全否定它，那是不对的。有些可以否定，但有些基本原则不能完全否定。说是否定，也不能把游击战完全否定，某些游击战的原则要肯定，练兵要正规化，要正经地练，不能老是满山跑，所以要把“十六个字”的原则进一步发展。

在战争问题上，毛主席也应用了这个规律。这也是波浪式的发展。这个理论要举例子，“毛选”里是很多的。比如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也是否定之否定。第一个阶段是敌进我退，是有进有退；第二个阶段是敌我相持，无进无退；第三个阶段是敌退我进，有进有退。但这与第一个阶段的有进有退不同。这也是否定之否定。

在以前，毛主席著作里没有直接应用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实际上是充分应用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这个客观规律不但应用在客观事物上，而且用在这主观方面。在认识上也要充分应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也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从这些例子也可以说明毛主席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充分地展开了。从一切的具体工作里，从指导战争一直到建立根据地，一直到掌握思想，掌握认识，到处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广泛应用了。所以，根本的原则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原则，但是毛主席把它展开了，展开到社会主义科学各部门，把这个原则从各方面推进了，从各方面展开了。这就是发展。这个发展不是哪一点，哪一条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原理在各

种重大的具体问题上展开了。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指导战争，指导思想，这些重大的问题上，他都应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着重讲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没有直接应用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根据我们知道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的劲头很高，有时候容易过分，有时候只搞工作，休息也不顾了。那时候毛主席讲，工作要有节奏。1958年底，郑州会议以前，毛主席着重提出工作要有节奏。劳逸结合就是要有节奏。劳逸结合的观点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表现。工作了以后要休息，休息了以后要工作。在那个时候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劳逸结合，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强迫人家不睡觉。这当然是农村的一些青年干部搞得多，他们没有经验。上面也有一些人头脑不清醒也支持了。毛主席讲：工作要有节奏，节奏也是否定之否定，节奏也是波浪式的运动，波浪就是节奏。不过是用音乐的名词来代替波浪这个名词。音乐是有节奏的，有高有低，钟摆有节奏，摆来摆去，这叫做周期性，循环往复。那时候毛主席曾经讲过，应当举出几百个例子来说明生活也是应该有节奏的，这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最近，我们听说毛主席讲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胜利了，又出现修正主义，以后修正主义被打倒，还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波浪式的，曲折的。当然，这个否定之否定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出现，是否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修正主义？不一定。但是修正主义总是多少要出现一些。出现修正主义就是波浪的低潮。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社会革命是高潮；以后出了修正主义，这是低潮。这个低潮恢复到高潮，怎么样高起来？是个问题，能不能和平过渡到高潮，恐怕有点困难。有了高薪阶层，有了法西斯控制，恐怕要流点血，事实上苏联现在已经有点流血。有些地方罢工，对这些罢工就采取镇压。有的民族地区罢工，如哈萨克地区罢工，他们就采取镇压，还利用民族矛盾。反斯大林还不是利用死人！在格鲁吉亚那个地区不知杀了多少人。那个时候格鲁吉亚群众起来反对，游行示威，就开去军队镇压，开枪、开坦克。有些小孩子爬到树上去看热闹，机关枪一开，小孩子就像小鸟一样从树上落下去。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恐怕有一个是不是可以和平回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是到处罢工，《参考消息》上也登了。这种情形要和平恢复到社会主义恐怕很困难。

根据波浪式的原理来看，有些很好的干部忽然被人家拉过去。经过教育又起来了。他得到了教训以后会更好的。教育不过来的，那是很少数的。不

好的干部是变质了的。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的。自己再有了教训，在一次一次的斗争、教育以后，是可以更好的。经过这种波浪式，经过这种艰苦的斗争，下去搞四清的同志都有亲身的体验。所以，不是很容易的，还是很复杂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为可以一帆风顺是很幼稚的，从前我们很幼稚，三大改造以后，认为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复杂了。其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波浪式的，这就不是一个劳逸结合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有赫鲁晓夫的形式，可以有别的什么形式。那是一种很残酷的一种形式。我们这种形式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毛主席已经掌握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主动了，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主动了，所以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经过斗争解决问题。经过斗争主要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主要不是经过对抗性的斗争。这样，波浪就会小一点，但还是波浪式的。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举了这些例子。虽然没有一百多，但也不少了。我们大家再联想一些，要联想到一百多也可以。说明这个规律很普遍，而且必须要掌握这个规律，必须要应用这个规律。不掌握这个规律我们就不能主动。

斯大林在理论上就没有这个规律，他以为社会主义建成了，以后就是一条直线了，他取消了这个规律，所以他被动了。取消这个规律也就说明斯大林思想上的辩证法不够彻底，或者说后来辩证法削弱了，出现了片面性。这也是他的“罪名”之一。出现这种思想不仅是他个人错误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高薪阶层。从1932年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革命开始有点停顿。高薪阶层发展，富裕农民发展，有一部分人制造舆论。斯大林也就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象。从社会主义建成一直到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本身来说还是好的红色教科书。但是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缺点。不是偶然出现的一种理论，理论是反映时代的精神。斯大林的小册子反映了那时候的时代精神。虽然他大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已经有许多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毛主席善于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而且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以现在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应用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揭发了这个规律，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暴露了这个规律。因为有真正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暴露了这个规律，不是当作一个公式来应用。这是个规律，是用这种思想作为指导，用这个普遍原理作为指导。在革命建设的重大问题上揭发了这个规律，进一步证明这个规律肯定是普遍规律，是基本规律。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思想里，也必须要掌握这个规律。这也就是发展这个规律的思想，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进一步证明，进一步展开，进一步应用了，所以就发展了。

以前马、恩、列、斯没有这样展开过，没有这样广泛应用过。比如要搞一个根据地，以前也没有哪一本经典著作讲过根据地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列宁开始讲的，但是也没有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曲折地、波浪式地发展的，以前都没有说过，所以说是发展了。

为什么发展总是波浪式的，要说明这个原因，仍然要回到对立统一规律，仍然要回到矛盾统一规律。因为发展是通过矛盾来发展的，是对立面的联系和斗争，对立面又联系又斗争才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对立面联系就是说统一的事物内部总是有对立面。社会主义社会里不是没有矛盾，是对立面的联系，对立面的统一。这个对立面是经过不断的斗争，使相互联系的对立面发生促进发展的作用。如果只有联系而没有斗争，那就没有发展。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有斗争的。所以，就有平衡的问题，就有一个你压倒我，或者我压倒你的问题，谁压倒谁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这就会引起不断的发展。这个发展必然要有波浪式的形式，因为对立面的斗争，彼此对立，有胜有负，不会永远平衡。因为斗争是一个谁压倒谁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经过斗争必然有反复，被压倒的经过一个反复又站起来了，又压倒了对方，这种情形也是有的。因此它必然是曲折的，是波浪式的。所以发展采取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就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就是因为有对立面斗争的问题。这个波浪的形式说明对立面反复转化。所以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可以解释成对立面反复转化的过程，不过也不很确切。如果说成对立面反复转化，说的不好就变成了循环。

古代解释辩证法往往解释成循环。几乎大多数古代的哲学家解释发展过程时，不论是有点辩证法思想的人，还是没有辩证法的人，最后都解释成循

环论。所以也不好说是对立面不断转化，不好这样表达。不过在我们脑子里至少要把不断转化不了解为循环。因为不断转化不是重复，不是循环。所以，确切解释是波浪式前进比较好。转化过程是前进的，两次转化使得事物走向更高的阶段。所以恐怕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个名词，把黑格尔残余完全取消，得到代替他的方法是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或者是螺旋式发展的规律。这个提法比较确切，比较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发展是波浪式的，或者是螺旋式的，这样表达比较确切。

波浪式是讲对立面反复转化的过程，经过对立面不断反复转化，不断前进。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这就是循环的，但是毛主席说，每循环一次，认识就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每往复一次，认识就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所以，这几句话不能少一句，少一句就会发生错误。古代的辩证法就是说循环往复就完了。古代的辩证法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古代社会是停滞的，他们认为封建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不容许有彻底的辩证法思想。相反地把发展曲解为循环，最多只能说有点辩证法的因素，不能说已经很高地表达了辩证法的规律。而且主要是曲解为循环。古代最高明的辩证法差不多都是这样。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是希腊最杰出的辩证法，他认为宇宙开始是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回到火。赫拉克利特是比较高明的，因为他讲，火是万物之源。

我们中国的老子一直到后世，讲辩证法还有哪一个是专门讲辩证法呢？我的知识很少，中国古代的知识很少，根本没有这个印象。哪一个讲辩证法的人明确地来讲辩证法的斗争，是强调斗争，没有这个印象。赫拉克利特之所以杰出，就是对斗争讲的相当明确，对立面斗争的思想相当明确，可是还有循环论。最高明的古代辩证法也只能说是有一些可贵的辩证法的因素。在古代来说，从历史观点来说，在历史上就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了。

历史观点有两种，一方面是对古人要按照古代条件来估计它，另一方面是从近代来看它还是很不够，这是采取历史观点的两个方面，缺少哪一方面都不行，对古人应该不要估计过高了。不与现代比较一下，也不是历史观点。

现代表达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用波浪式的发展或者螺旋式的发展，比较确切。其中，包括对立面的反复转化，经过对立面的反复转化，事物一步一步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

这个规律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09章 辩证逻辑

(1960.07.13)

【中央党校在1960年举办逻辑专业班，艾思奇为该班讲了《辩证逻辑》一课。当时我们国内对这一门学问尚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在中央党校也是一门新课。艾思奇按照自己的体会，作了比较系统的讲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里是按速记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辩证逻辑。过去怎么样了解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包括一些什么内容？今天想初步对这些问题作一个说明。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好，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新问题，现在我也找不到一本新参考书来参考，因此，我只能够讲几点意见，把我自己的一些还不能说很成熟的见解讲一讲，目的是给大家作参考，因为大家学习逻辑，也要学习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是很容易研究的，辩证逻辑就比较难研究。我把我的意思讲一讲，如果讲好了，如果我的见解不错了，也许可以帮助大家对如何来研究辩证逻辑开一个头，如果能够指一条路就更好了，我还不不敢说是不是能够指出一条正确的路来。开一个头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有了头绪，后面就比较好好研究了。这是今天讲这个课的一个原因和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要写哲学教科书，想把辩证逻辑这部分也写上去。旧的哲学教科书不写辩证逻辑，或者只写一点辩证逻辑的原则、基本原理，辩证逻辑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不写的。现在我们编哲学教科书要写上去，不管写好写不好，我们把它写上去。为了作这个准备，所以我今天讲一讲。哲学教研室写教科书有逻辑班几个同志帮忙，这几个帮忙的同志可以多写一些，其他同志也可以多读多研究一些。我今天讲课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在写教科书这个问题上提供一些意见，将来要怎样写，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逻辑班也准备写教科书或者是提纲，主要是写形式逻辑提纲。但是，辩证逻辑大家也要研究，所以，讲辩证逻辑这个部分，一方面帮助哲学教研室写教科书；另一方面，作为逻辑班的同志们将来回去讲课时的参考。写逻辑教科书，不必要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写在一起，形式逻辑单独写，辩证逻辑应该归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里面。将来逻辑班同志如果写教科书，能够写

两本：一本写形式逻辑提纲(或教科书)；另一本，辩证逻辑单独写一个小册子。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就开始讲辩证逻辑问题。

1. 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辩证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分不开的，形式逻辑可以离开认识论来讲，纯粹讲思维的形式，当然更不必要讲辩证法。但是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分不开的，不了解认识论和辩证法，就没有办法讲辩证逻辑。所以，列宁讲过：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法、逻辑是一个东西，甚至于用不着三个名词。用不着三个名词的意思并不是就不要三个名词了，实际上，列宁也用了三个名词，他是说，这完全是一门学问，这三部分是分不开的学问。讲认识论的时候，必然要讲到逻辑学，讲逻辑学必然要讲到认识论，也必然讲到辩证法，讲辩证法不但要讲客观辩证法，而且要讲主观辩证法，讲主观辩证法就要讲逻辑。所以，三个方面是同一的，是同一门学问里面不可分开的。

在辩证法教科书里面，当然要一个一个分开来讲。我们有时候先讲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然后讲辩证法，然后再讲辩证逻辑。这是为了说明方便，还是要分开来讲，因为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侧面，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认识论的着重点是《实践论》里面所讲的：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它必须着重在这些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也就是辩证法，本身和辩证逻辑分不开，讲辩证法本身也就是讲辩证逻辑，讲对立统一的规律，讲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本身也就是辩证逻辑。因为它涉及到概念的对立统一、范畴的对立统一，涉及到量变质变的逻辑关系，肯定否定的逻辑关系，涉及到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但是辩证法着重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或者再加上辩证法的范畴。讲辩证逻辑是着重讲思维方面的辩证联系，着重讲人在思维方面，在理性认识方面，不要只着重在感性认识，而要着重在辩证法的客观规律，人的思维形式，应着重在理性认识的内部的辩证联系上。因此，必须着重在思维的形式，也就是必须着重研究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的辩证联系。所以，讲辩证逻辑就是着重主观思维形式方面的辩证法，形式逻辑也讲思维形式的关系，但是不讲思维的辩证关系。

辩证逻辑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分开来讲，主要是讲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总的来讲，辩证逻辑要讲些什么东西呢？辩证逻辑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如何用逻辑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以实践为基础。辩证逻辑着重研究我们理性认识的形式，是用什么形式去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规律，怎样反映到自己的主观认识方面来，或者说我们的主观认识怎么样运用思维形式来把握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问题，形式逻辑是没有的，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怎么样才是比较妥当的，至于这种思维形式如何去把握客观，反映客观的变化、发展、客观世界的联系，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不管。形式逻辑可以说是纯粹研究思维方面的科学，它的对象比较窄。但是，辩证逻辑一方面是思维的科学(研究人类思维的各种联系)，同时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因为辩证逻辑要注意到人类的思维，怎么样才能正确的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些什么规律？思维本身在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间，要遵守一些什么规律？所以列宁说，逻辑不仅仅是人的主观认识的科学，辩证逻辑同时也是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着重研究的对象是思维形式的辩证联系，但是研究思维形式的辩证联系时，同时也就研究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研究的对象，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有根本的区别。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本身的形式如何才是妥当的，辩证逻辑研究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思维形式去反映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

2. 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

研究辩证逻辑主要的应该注意两点，两个总的原则。

一、辩证逻辑在研究人的思维形式的时候，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认识的发展过程，要根据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研究自己的思维形式。比如研究概念的时候，要注意概念如何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研究判断时，也要研究各种判断如何反映认识过程发展的不同阶段。形式逻辑研究概念、判断，很简单。研究判断，大体有四种判断：全称判断、特称判断、肯定判断、否定判断，研究这四种判断的关系。对这四种判断的关系，也是从形式上来研究，离开认识的发展来研究，就是还研究这些判断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里占什么位置，是属于认识发展的哪一个环节，在认识发展的

哪一个环节起作用，形式逻辑不研究这些问题，它只研究这几种判断怎样发生关系。

形式逻辑里面有判断的对当关系，只研究这个对当关系。画一个☒，研究这个关系，研究什么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对这四种判断不是根据认识发展来研究，是把这四种都放在一个方块里，这四种判断放在四个角落上。然后研究四个角落互相有什么关系。上面是全称肯定，全称否定，下面是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就画四个对角线，划成一个☒，把两个角落联起来，这样来研究有什么关系。全称肯定，全称否定这两种判断关系叫作大反对，就是完全相反。比如“凡人都要死”，“一切人都不死”，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研究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完全是形式关系，跟思维发展关系没有联系。

辩证逻辑就要研究各种判断在认识发展过程里面起什么作用，每一种判断在认识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上起什么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写了单一判断、特殊判断、必然判断这三种判断的关系，恩格斯写了这样的例子，说明这三种判断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起不同的作用，三种判断反映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认识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只认识个别事物中间的偶然关系。这是认识的开始，只能对个别事物的关系下判断。因此，只能作出个别的判断。比如“摩擦生热”，这只能对“摩擦”和“发生热”单独的两种关系作出判断。摩擦是一种具体的事情，摩擦只能有火，一个单独的两种现象联系起来。后来又经过几千年，科学发展了，到了十九世纪发生了机械功能可以产生热，这样产生了机械和热的对当关系，这样就得到一个判断：“机械运动经过摩擦变成热”。这个判断就有一些特称判断的性质了，它不只是把摩擦和生热这两种单独的现象联系起来，而是把握了一种特殊运动形态：机械运动经过摩擦环节变成热，热的机械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态，不是单独的、个别的运动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态。因此，它的判断是特称判断。后来，科学又进一步发展了，就发展成任何运动形态都能够互相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够互相转化，这样就一切运动形态都包括在里面了，就变成一种普遍判断。所以，三种判断反映了人的认识过程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环节。

这种思想在黑格尔的著作里也是有的，在《小逻辑》里讲反映，照黑格尔本来的意思是反省，就是比较深入的判断，这种判断里面包含单一判断、特称判断和普遍判断。恩格斯讲的这种东西就是从黑格尔这部分思想发展起

来的，经过改造，黑格尔把这三种判断用更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单一判断就是：“这种植物可以治病”，这就是单一判断，只认识到这种植物能治病。再进一步有特殊判断，“这一些植物可以治病”，不是这一种而是这一些了，这样就比单一判断进一步了，范围扩大了，不但是一种植物可以治病，而且看到一些植物可以治病。什么叫作全称判断、普遍判断呢？像“一切人都会死”，“凡是金属都会产生电”。这不仅是一种或一些的问题，而且是一切问题，这是普遍判断。黑格尔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明白地用科学发展的例子加以说明，讲的很抽象很神秘，因为他是唯心论，所以搞的很不清楚。恩格斯这样一讲就很清楚了。人类在思维中所使用一切判断形式都跟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分不开的，不同种类的判断，在认识过程的不同环节起作用。或者说，不同种类的范畴反映人的认识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所以，在辩证逻辑里面对思维各种的形式分类方法，跟形式逻辑里面不同。形式逻辑就是在形式上来分类，把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对立起来，把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对立起来，按照它的形式来分作四种判断。辩证逻辑研究判断的时候，按照认识的发展过程来区别判断的不同种类，这是辩证逻辑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些不同的判断在认识过程中有不同的地位，这也就说明它们相互之间有变化，可以转化，随着认识的发展，个别判断变成特殊判断，特殊判断转化成为普遍判断，各种判断中间可以发展转化，这种转化反映了认识的发展过程。这种转化是服从辩证规律的，这种转化也是思维形式向对立面转化。

这个思想在毛主席著作里面有很好的发展。我们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时，应着重研究毛主席思想。这个思想主要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的第三十六条，“概念形成的过程，判断形成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的逐步形成，判断的逐步形成，推理的进行，都跟调查研究的过程分不开，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形成概念、判断，就对事情下判断，就根据判断进行推理。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形式在不断地变化，一直到形成正确的概念、正确的判断，形成了正确的推理。这个形成的过程还要经过实践反复的观察、考验。第一步形成之后，拿到实际工作里考验一下，如果不对就要纠正。纠正之后，概念的内容要有改变。判断也要加以改变，因此推理也要改变。比如说，我们首先根据一些材料形成一个概念：“和平是有保证的，和平只要经过谈判就可以保证得到”这样就形成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对不对呢？要拿到实践里面去考察一下。结果怎么样呢？应不应该把判断改一改呢？应该改正一下，如果不改正，那样的判断就是错误的。在没有经过考验以前，判断中提出来一些假设不要紧，假设也是一种判

断，经过考验之后，如果不改假设，那样的判断就要犯错误，因此判断就要改变。所以，随着认识的发展过程，要把判断加以纠正，加以改变和发展，认识到什么程度就作什么判断，判断有很多种。

所以，研究辩证逻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各种思维形式的相互关系，研究各种思维形式如何在变化中间来反映客观世界。

二、研究辩证逻辑的第二个原则。研究辩证逻辑的任务，就是要学会运用逻辑的结构，运用各种思维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和他们的相互联系。就是说如何能够把我们的思维形式安排得妥当，使它能把客观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反映在我们的主观认识里面来，要用思维形式来概括发展过程。所谓概括，并不是把客观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出来，而是把主要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概括起来。列宁经常说：《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逻辑学。因为《资本论》非常准确地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及消灭的基本过程详细地概括起来。不是概括那些细节，而是把基本过程，也就是基本规律概括起来了。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剩余价值的产生，到阶级斗争，最后到资产阶级被剥夺，这个基本过程概括起来，这就叫做理论和历史的一致。马克思的理论总是把历史的本质、要点概括起来了，理论的本身也是历史，把历史的最重要的东西概括起来(历史包括实践的历史还包括一个时期事物相互联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特点，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可以从它里面学会许多理论原则，另一方面还可以从里面找到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我们大家随便拿一本书来研究，比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四章，它又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第一章他把黑格尔哲学的产生到费尔巴哈理论产生的过程都概括了，但是同时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论要点也概括起来了。第二章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是讲唯物论和唯心论，还讲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恩格斯也在理论上加以对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如何不同，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有什么不同，可是在这一章里面，讲到唯物主义的发展，由机械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理论结构经常和历史的发展过程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有时理论原则的排列也是适应历史发展过程。比如《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概括了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由第一条到第六条，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张略图，一幅素描。我们自然辨

证法班读了《自然辩证法》，可以知道在“导言”里面，就是讲历史，通过历史的发展，来证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影响哲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的发展的，然后哲学的发展又反过来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最后归结到现代自然科学必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才能得到迅速的进步，这是理论原则。但是这个理论原则是通过历史的概括加以证明的，又有观点，又有材料，材料是历史的，观点也是历史的。

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讲到逻辑问题，他这里讲的逻辑问题也是讲辩证逻辑问题。他说：要求我们写文章和文件要有准确性，所谓准确性就是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怎样要求呢？第一就是概念要明确；第二判断要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逻辑性。概念要明确，就是说概念一定要反映当前的任务，反映我们当前所研究的任务的本质，抓住这个本质，这就不是形式逻辑所要研究的，形式逻辑不研究概念怎样才能明确这个问题。周谷城的主张有的是错误的，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形式逻辑不大管逻辑内容真不真的问题。他有一定的道理，怎样把概念搞的准确、明确，在形式逻辑里面它不负责任。判断是不是恰当地反映了当前的任务，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也不研究，形式逻辑只能告诉我们判断有几种，至于如何去运用这几种判断，我们当前对某一件事情采取否定判断是不是对，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不研究。研究辩证逻辑的时候就要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辩证逻辑要注意到判断的恰当运用和进行推理的逻辑性。这里所讲的是在逻辑性上反映事物的联系，我们说一篇文章没有逻辑性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说，某一篇文章没有逻辑性，是从形式逻辑方面来看，文章前后有矛盾。如果前后没有矛盾，那就算没有违背逻辑了，至于这篇文章是不是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联系，它就不管了。有没有逻辑性，还有另一种意思，从辩证逻辑来看，讲文章有逻辑性，就是说文章反映了事物的联系，反映了它要说明的事物的内在联系，把规律性、把本质抓住了。所以，逻辑性有两种意思，不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联系，就是辩证逻辑上没有逻辑性。

毛主席在这里着重讲辩证逻辑，要求我们概念、判断能够作到明确、恰当，推理要有逻辑性，要把事物的联系反映出来。事物的联系有两种：一种是历史联系；一种是相互联系，或者叫做时间的联系，空间的联系，都可以叫做历史的联系，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就是指当前的历史条件。辩证逻辑的任务就是要求我们学会运用我们的思维形式，运用我们的逻辑结构来把握事物的联系，包括空间联系、时间联系和历史联系。我们研究辩证逻辑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个观点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可以对它的逻辑结构有很

好的了解。历史的联系和相互联系中间都有矛盾，所以历史联系有历史的斗争，相互联系有相互中间的斗争，要反映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是反映事物的历史联系，就是反映事物的相互联系。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本书一开始就讲：当前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着重分析了这两种矛盾中间的相互联系，分析历史的联系比较少。有些著作是从历史联系讲起，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一般战争的原则、方法论的原则讲了一下之后，就概括了游击战争从1927年起的历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十六个字，发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第三次反围剿一直到批判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概括了这一段的历史。在概括历史联系的同时也分析了事物的相互联系，如中国是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半殖民地等各种条件。通过研究相互联系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分析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分析事物的相互联系。在分析当中运用各种判断，运用推理，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历史的联系。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的相互关系，从相互联系分析起，重点写四个方面的对立，由此出发说明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的历史的基本规律，预见三个阶段的问题，预见到持久战的必要性。在这些分析当中都运用了恰当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判断是要恰当的，比如我们研究毛主席的著作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就怎么怎么样，作一件事情要注意到概念、判断。不懂得辩证逻辑的人，有时单单根据可能就提出要求，或者单单根据必要就提出要求。只注意必要不注意可能，或者有的只注意可能，不注意必要，都有片面性。现在的和平主义，就是只注意必要，没有注意可能。和平共处当然是必要的。世界人民都要求和平，但是，是不是可能呢？当然如果现在不是阶级社会，阶级已消灭了，那样就既必要也可能。但是，按照辩证逻辑判断必须恰当地反映当前的情况，如果只根据必要提出任务，规定政策，这样的判断是不是恰当呢？世界人民根据人道主义的要求，目前就应该消灭战争的，就判断现在就消灭战争，这样的判断就不恰当了。按照形式逻辑来讲，那就无所谓恰当不恰当，它只要提出判断就算了。按照辩证逻辑的要求来看，就是任何一个判断应该根据当前的情况来提出，也要反映认识的情况，认识到什么程度就下什么判断，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就下什么判断。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可以下一个特称判断：“在某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坚持斗争，美帝国主义处于最大限度的孤立，那么战争可能制止”。当前，和平主义者能不能下这样的判断呢？“我们已经到了根除战争的时代，现在已经有可能消灭一

切战争了。”这是全称判断。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全称判断呢？我看是不能采取这种全称判断的。他们这些理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合乎逻辑，这不仅仅是合乎形式逻辑问题。形式逻辑有时候前后不一致，如不久以前说：艾森豪威尔是和平使者，现在又变成万恶的头子，前后矛盾，这是形式逻辑问题。判断不恰当，是辩证逻辑问题。现在客观形势发展了，还没有能够对和平问题作出全称判断来，那就是不合乎逻辑，没有把这个事物的联系搞清楚，一点也没有反映这个联系。帝国主义还存在，不仅仅是存在的问题，而且它现在还相当有力量，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资本主义统治下面，资本主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是帝国主义，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还相当有力量，而且调兵遣将，并不是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干。现在美国的行动情况虽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积极准备包围社会主义，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对解放区所采取的办法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积极调兵遣将，把军队放在解放区周围。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没有战争的时代已经可以实现了，这跟客观事物的联系，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不能反映这个联系，所以它是不合乎逻辑的，没有逻辑性。研究辩证逻辑要注意这些问题。

总起来说，辩证逻辑有两个主要原则，对辩证逻辑的研究，对各种思维的研究，以认识发展为基础，研究这些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了解这些作用处在什么情况下，应下什么判断，作什么推论。再一个问题就是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必须反映事物的历史联系。

下面就分开来讲概念、判断、推理问题。

3. 辩证逻辑的概念

概念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讲形式逻辑要用辩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讲以前的逻辑，至少是黑格尔以前的形式逻辑，黑格尔所批判的形式逻辑对概念的了解跟辩证逻辑是不同的。主要的不同是这样一点：形式逻辑的概念主要的是把概念当作简单的同类事物的共同点。这种形式逻辑的概念，我们现在还有，比如，抽象的人道主义，就是一种对人性的形式逻辑的概念，这种概念仅仅把人的某种共同点归纳起来，有的时候仅仅是人的自然方面的共同点，比如说，人都有人道主义，小孩哭都要难过，说列宁很有人情味，跟一切人都一样，写信给他的妹妹那样亲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没有共同点呢？当然有共同点，人都会说话，而且使用一种语言，资产阶级会关心自己的兄弟姐妹，无产阶级也会关

心自己的兄弟姐妹，资产阶级的小孩生下来要吃奶，无产阶级的小孩生下来也要吃奶，共同点是同类事物都有的，但是共同点能不能成为事物真正的概念？归纳一下共同点能不能成为明确的概念？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黑格尔有批判。对黑格尔的东西要有批判的继承。对古代的东西我们和修正主义有区别，修正主义要根本推翻古典的东西，我们是首先要批判，但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要继承。当然继承下来的东西也要进行改造。黑格尔讲的概念这一部分，贺麟先生把概念翻译成总念，这个意思不很确切，因为他把概念看成世界总的基础。我们说概念就是概念。共同点和共相有区别，概念的本质就是讲共相。黑格尔讲概念的内容，就是讲共相，但共相不是共同点。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我们只说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根本内容。辩证逻辑的概念是要求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全面性，不要把握表面的东西。共同点就是表面的东西，人性论里面所讲的人性，纯粹是表面的东西，从这种表面性提出来问题，就站不住脚。列宁对他的妹妹写信那样亲切，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如果假设列宁的妹妹是反革命，他会不会写那样亲切的信呢？所以把写信看作人情味，是非常片面的，仅仅从这一点来判断列宁有人情味是不妥当的。列宁之所以能够给他妹妹写那样亲切的信，不简单的是兄妹关系，表面上是和资产阶级一样的，但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的妹妹是革命者。如果说她是反革命，他连信都不会写。所以抽象地讲，列宁那么关心自己的妹妹，是有人情味的，这是非常表面的。列宁的人情是阶级的人情，列宁关心他妹妹跟资产阶级关心妹妹不是一件事。所以，要了解列宁的本质，要知道他和工人阶级的共相，要归结到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一点，才能把握真正的概念。要从阶级基础上来把握，不能从表面的人情去把握。传统的形式逻辑对概念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形式逻辑要修改。真正的概念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要区别革命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被资产阶级滥用了，我们甚至就不能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了。关于人道主义也可以在很个别的情况下看到，但是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看），现在讲人道主义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豺狼也讲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敌人也讲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脚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对概念的了解，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实践论》，强调概念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但是把握的程度有深有浅。比如人是什么？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动物的动物。这就把握了人的本质。资产阶级讲，人都有人性，这就没有把握本质。所有的人都爱和平，所有的人都反对战争，这就没有把握本质的东西，这种概念就是没有把握本质，没有形成什么概念。人都要吃饭，人有两手两

脚，这只把握了共同的特点，没有形成概念，真正形成概念要把握本质。富兰克林说：人能够制造工具，这是把握了本质，但是很不够。因为没有提到人的阶级性。对形式逻辑教科书应该对它作一些修改，当然不是修改成辩证逻辑，可以修改的地方应该修改。

这是第一点，关于辩证逻辑的概念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

过去康德和黑格尔把概念分成两个阶段，这种分法是没有必要的。他把人的理性认识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理智，一种叫做理性，理智是比较浅的理性认识，黑格尔认为，理智是比较片面，比较抽象的理性认识。用在概念上能够简单的把握共同点，就是理智形成的概念。理性概念就要把握本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理性概念就是把握概念自身。这种说法完全是唯心论。这种分法没有什么很大必要，我们用不着这样分，现在这样提一下，供大家参考。

把理智和理性严格地区别开来，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理智是讲分析的，理性就讲综合，只有理性才能把握辩证法，理智不能把握辩证法，这是德国古典哲学里面的基本思想。我们就用不着这样分了。我们说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是形而上学，一种是辩证法。我们反对形而上学，我们要掌握辩证法，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去把握概念的本质，撇开现象和表面的东西。

概念除了简单的共同点外，还有一个特点，一切概念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概念都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形式逻辑的概念，只有普遍的一方面，把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分开，不看作是统一的东西。形式逻辑有时把概念分成三种：即单称概念、特殊概念、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是很广泛的。形式逻辑不注意概念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把握概念只注意到特殊性和普遍性，又对立，又统一。比如“战争”这个概念，有一个普遍的意义，战争都是阶级社会里面的产生的，是阶级社会里面的特殊产物，这个概念，我们要把握它的本质，是阶级社会一种人和人的冲突，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样来把握战争的概念。“战争”的概念首先有普遍意义，只要有阶级的地方，我们就肯定有战争的可能性。就是说，不仅奴隶社会有，而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都有战争，所以它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它又是特殊的，就是只限于阶级社会这个条件。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就没有战争，所以，它又是特殊的。任何概念都是又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最普遍的概念它在具体生活里也有特殊性。

还有，概念跟个别事物也有联系，概念都是无数事物的概括，概念是从无数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概念本身又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同时，它是从许多个别事物里概括出来的，它是实际存在的。概念在实际生活里仅仅是通过个别事物存在，实际生活里没有赤裸裸的概念，没有离开个别事物的概念。毛主席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也寓于个别事物当中。离开个别事物，在实际生活里就没有什么概念，概念的内容就不存在了。黑格尔有一句话，叫做共相都是具体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普遍的东西、普遍的本质都是有条件的，纯粹普遍的本质只有在脑子里才有，实际生活里的普遍概念都是寄住在个别事物里的。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去看德国古典哲学著作时，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黑格尔经常讲：普遍的、个别的、特殊的联系统一。他讲这个问题时，把普遍的作为最根本的东西，把个别性、特殊性都作为普遍的表现，个别事物都是在概念中产生。贺麟翻译的《小逻辑》第 338 页里讲到：个体事物与实在事物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是从总念里产生出来的，然后才有概念表现为个体事物。我们认识概念是从许多个体事物里概括来的，而且这个概念总是人头脑里的反映。我们研究概念的时候不要忘记，概念是从个体事物里概括出来的，同时概念里有普遍性。如果我们正确地掌握概念，应当把概念写作既有普遍性，同时也有特殊性。

关于辩证逻辑的概念有两点：一点是，概念并不仅仅是同类事物的共同点，而是要把握本质，各种概念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另一点是，概念的来源是从许多个别事物中间概括出来的。这是对概念的两种了解。

第三点，讲概念的特殊性，概念有条件性，就使得概念可以互相转化，可以向对立面转化。辩证法要求我们研究概念如何互相转化。形式逻辑就不研究这个问题，形式逻辑就是把概念加以分析，把各种不同的概念分析一下，至于它们相互的关系，相互转化是不研究的。辩证逻辑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概念就不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互相转化。客观事物能够向对立面转化，因此，我们的概念为了要能够明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概念也会互相转化，也要使它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辩证逻辑的概念本身，辩证逻辑所肯定的概念内容本身，就包含有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因为我们首先肯定概念有条件，有特殊性。每一种概念的普遍使用范围都有条件，因此，如果条件变了，它自然就要转化了。“战争”是阶级社会里面的现象，我们说“战争”的本质，它是阶级社会里面的一种特殊

现象，我们不把“战争”了解为简单的冲突，如果把“战争”了解为简单的冲突，那么，人类的战争跟蚂蚁和蜜蜂的战争就分不开了，仅仅从表面上来把握，那么，“战争”的概念就没有互相转化的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战争”本质，它普遍适用于阶级社会，可是又受阶级社会的限制，在阶级社会里面也还有条件的限制。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因此，我们就可以肯定战争可能向和平转化。首先是阶级社会消灭了，就有了永久的和平世界。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如果政治斗争没有发展到最高的形式，没有采取斗争最高形式的必要，也可以不发生战争。因此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但是必须首先消灭阶级社会。

什么是和平呢？在阶级社会里面，和平就是阶级斗争还仅仅限于经济形式和一般政治形式的斗争，政治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最高点，那就是和平。所以和平是可以转化为战争的，和平的概念可以转化为战争，战争的概念可以转化为和平。为什么会有和平呢？因为政治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最高点，所以就有和平，政治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战争的形式，就是和平。怎么叫做战争？战争就是政治斗争发展到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所以，战争与和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是有同一性的。这个同一性就是发生战争以前，政治斗争没有发展到最高形式以前，那就是和平，这个和平中间包含战争的因素，和平发展到最高形式就转化为战争，战争本身是从和平斗争发展起来的，是和平斗争发展的结果。战争并不是与和平完全相对立的东西，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联系着的，互相转化的。这两个概念在形式上是互相对立的，而本质上是互相联系的。所以，要研究客观事物会互相转化，在逻辑上就要研究概念如何互相转化，目的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物向对立面转化。辩证逻辑一定要研究对立的概念的互相转化，这种问题中国古代有人已经研究了，“失败为成功之母”“相反相成”“困难转化为顺利、顺利转化为困难”。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很多概念互相转化的情况。毛主席讲“坏事变好事”，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这个转化是有条件的，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转化。坏事也可以不成为成功之母，革命者的失败，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就能够成为成功之母。但是，反动派的失败，就不一定能成为成功之母。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研究概念的具体内容，失败是谁的失败，是革命的失败，还是反革命的失败，这个问题是辩证逻辑要研究的。形式逻辑仅仅把失败和成功对立起来，所以它不能研究“失败为成功之母”这种问题。形式逻辑不研究这种问题，有没有一本形式逻辑教科书研究失败的概念，如何成为成功之母的概念呢？当然是没有。形式逻辑教科书能

不能增加一点，概念可以互相转化的问题呢？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但是不一定要增加很多，加的太多就变成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的书就讲不了这么多。

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辩证逻辑研究概念的互相转化是有现实条件的，离开这个条件抽象地讲概念的互相转化，就会变成诡辩论，诡辩论产生的原因有几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离开客观现实的条件来谈概念向对立面互相转化，诡辩的特点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前面一部分强调辩证逻辑要注意概念的伸缩性，概念是有伸缩性的，伸缩性如此之大，可以大到向对立面转化，可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概念向对立面转化，这种伸缩性如果主观地去运用，就是诡辩论，或者说是折衷主义。这种伸缩性如果客观地运用，客观这就是条件，注意这一点，就是辩证法。我们也可以讲没有战争的世界，我们也讲和平，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在阶级消灭的时候，只要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阶级剥削，消灭了帝国主义，那个时候可以谈到没有战争的世界。现在帝国主义还有力量的时候，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你就说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从何说起呢？这种诡辩论有的时候很滑头，他现在就是一般地讲没有战争的世界可以出现了，等过几年之后，比如说美国若干年后，导弹赶上苏联，导弹准备好了，也许它一下就发动战争，或者发动一场局部地区的战争。那个时候诡辩论者怎么讲呢？我们会说：你说没有战争，为什么又有战争了呢？-他还可以诡辩说：我说总归会出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他还可以说：谈判的时代到了，现在是和平时代。所以，对概念的互相转化一定要注意它的性质，不存在条件的时候，就不能说转化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讲战争转化为和平，我们可以说战争已经转化为和平，那是经过人民战争以后，譬如中国的解放。但是我们也可以讲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我们这样说就很合乎逻辑。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两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如果不提两个可能性，不提高警惕性的话，就不能说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根除战争的可能完全存在了，可是另一方面又要讲提高警惕。如果根除战争的可能有了，只有一条道路了，那么还有什么提高警惕的必要，所以在讲到概念的时候，首先要强调概念可以互相转化为对立面，但是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又要注意还有诡辩论。诡辩论和折衷主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把概念相互转化建立在主观思想上面，而没有建立在客观的条件基础上。诡辩论就是在没有客观条件的情况下空谈向对立面的转化。“失败是成功之

母”，反动派也可以说这个话，蒋介石还梦想回到大陆上来，这就是诡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折衷主义讲对立面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对对立面的转化有条件，对立面的同时存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和平共处”的思想里就有折衷主义，就是你活我也活的思想。和平共处是积极共处，就是你也活下去，我也活下去。在资产阶级方面来说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立面同时存在，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对立面概念的同—性，这个同—性一方面是有历史条件的，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另一方面在同时存在的时候，任何时候总是有一方面是中心，一方面是主体，或者说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或者是资产阶级压迫下的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压迫下就没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总是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还有统一战线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阶级也可以在一定问题上跟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比如，在印尼这些国家，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是统治者，在反对荷兰和美帝国主义的时候，可以建立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条件才能够建立。如果不谈条件，如果资产阶级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对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讲统一战线就不对了，那就是折衷主义了。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讲统一战线要有条件：一个是谁领导，一个是在什么问题上的统一战线，这两个都是现实条件问题。离开现实条件，要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团结统一，这里面就有折衷主义，要求无产阶级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合作，不管什么条件，都搞阶级合作，这就是折衷主义。

另外还有一点，概念的认识是有发展的，是跟认识发展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概念深刻的程度，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比如，“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富兰克林的发现。这是一个概念，它的确是把握了本质，但是不深刻。因为富兰克林是资产阶级，尽管他是最优秀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所以他的认识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他只能认识到人和动物的不同，是人能够制造使用工具，他不能进一步认识到阶级的关系、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的立场使他不能认识到这点。把人的概念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人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生活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这样的概念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这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以，对概念的认识是可以发展的，而发展是跟认识程度，跟发展程度有联系的。物质概念认识的发展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对物质认识到它最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认

为物质是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它又为主观所反映。这样的概念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是没有达到的。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都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来规定他们的物质概念。我们古代的物质概念就是金木水火土，用具体的物质作为物质概念的根本东西，用某几种具体物质的形态当作原始物质，这样来规定物质概念。物质是有原始东西的，原始物质就是金木水火土。以后发展到机械唯物论时代，认为物质不是什么金木水火土，物质有某种共同的、普遍的特点。这种认识就进一步了，但是他们的物质概念是根据力学来规定的。物质的本质就是力学的本质，就是质量的不可入性、占据空间性。这个认识比古代的认识有进步，但还是很低级的，它比起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是低级的。同样是物质概念，但古代资产阶级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同，古代是有错误的，机械唯物论也有错误，但是有一点共同点，就是都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以前的哲学没有这样明确，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明确地规定物质是客观存在，离开人的主观意识，又为主观意识所反映这些最根本的特点。关于概念就讲上面这些问题。

4. 辩证逻辑的判断

下面讲判断。

黑格尔对判断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一切事物都是判断。这是唯心论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概念自己对自己下判断的表现，他认为概念就是绝对精神，这是一个大概念，这个大概念为了表现自己，发展自己，它就把自己外化为一切事物，每一件事物都表明绝对精神对自己下具体判断。这是黑格尔的看法。

这种看法用唯物论把它倒转过来，就有它的真理性。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把这种思想倒转过来，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一切事物都是判断”，好像一切事物都自己在作判断，这非常神秘，有些不近情理。把黑格尔的思想倒转过来，我们就这样了解：我们思维活动里的每一个判断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主观判断就是对客观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作出恰当的论断，我们要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对每一件事物都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我们为什么在逻辑问题上研究判断问题呢？

研究判断问题，就是要学会如何在客观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上，作出恰当的判断来。这是辩证逻辑对判断所要提出的任务。研究判断问题，就是

为了作出恰当的判断来，就是研究怎么样下判断才是恰当的。为什么用另外一种办法下判断就不正确？这一点跟形式逻辑不同。形式逻辑只告诉我们有几种判断，然后再把这几类判断排列起来，至于如何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来，形式逻辑认为这不是它的任务。所以，周谷城说：逻辑不管真问题。就是因为他坚决站在形式逻辑的地位上，他否认形式逻辑之外还有别的逻辑。周谷城有一些话是对的，但是有一点就很不对，就是他认为只有形式逻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逻辑，辩证法就不是逻辑，因此逻辑就不管真问题。我们就要反对他这一点。我们说除了形式逻辑之外，还有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不一定去研究怎么样才能得到恰当的判断，但是辩证逻辑要求我们研究怎么样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来。什么是恰当的判断？什么是不恰当的判断？辩证逻辑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辩证逻辑的任务和形式逻辑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形式逻辑对真的问题一点也不研究，这种说法也不对。问题是形式逻辑没有把这个当作主要问题来研究，辩证逻辑把研究恰当的判断当作主要问题研究。形式逻辑仅仅是把主要任务放在排列各种判断上，并把各种判断在形式上的相互关系加以说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恰当判断的问题还是要研究。比如，我们说判断的对立关系，要涉及到恰当的判断问题。比如，一个全称肯定判断跟一个全称否定判断有一个关系，如果全称肯定判断是对的，那么全称否定判断一定是不对的。比如，“一切人都要死”，又说“一切人都不死”，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全称肯定判断是对的，全称否定判断是不对的。你已经作出第一个判断是对的，那你一定要否定第二个判断，这样才恰当。恰当的问题，形式逻辑也研究，但是研究的不系统，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研究，特别是没有把判断的恰当性和客观事物联系起来研究。事物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作什么判断，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不研究。辩证逻辑主要研究认识发展到什么环节，要作什么判断才恰当。在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作出判断说：“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有了”，但是我们绝不作出这样的判断：“根除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了”。因为根除不是防止的意思，防止不是根除的意思。仅仅是防止，但是还可能有战争。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这样认识是对的。形式逻辑就不联系客观情况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个总的看法下，辩证逻辑也有关于判断的分类问题。形式逻辑主要有四大分类，辩证逻辑的分类比较多。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一下黑格尔的逻辑学有好处。黑格尔的判断分类方法是根据人的认识过程来分类，他这方面的理论是把康德的理论加以改造的结果。

康德对判断的理论就比过去的形式逻辑更丰富些。康德曾经把判断分成四类十二种。四类大概是这样：量、质、伦、程。每一类里又有三种。

在量的里面有：单一判断、特殊判断、普遍判断。这是就量的方面来分类，涉及到单一的东西、普遍的东西，量的方面有大、小。“这一种植物能够治病”，这是单一判断。“某一种植物可以治病”，这是特殊判断。“一切植物都能制造氧气”，这是普遍判断。这里面也可以这样来改一改：“这种植物对人有益处”，“某一种植物对人有益处”，“一切植物因为它都能够产生氧，都对人有好处”，这些判断叫作量的判断。

质的判断也分三种：肯定判断(要肯定一事物，如“某人是革命的”)、否定判断(“某人是反革命”)、无限判断(“人不是骆驼”)。人不是骆驼这是无条件的。这种无限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判断。有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作出判断，否定了他，那就用这种无限判断。另外，有的人作出来很荒谬的判断。比如，“资产阶级也爱和平”，“资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和我们一样是讲人道的”。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就用一个无限判断来回答他：“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总归是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无限判断，这个判断是无条件的。

“伦”就是质的关系，“伦”是关系判断，也有三种：假言判断、直言判断、选言判断，这是关系判断。主词和宾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战争可以防止，肯定可以消灭”，这就是直言判断。假言判断是有一个假设的条件，“如果全世界革命人民把帝国主义反动派消灭了，战争就可能制止”，这就是假言判断。选言判断是：如果这样，就是那样，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战争或者可以防止，或者不可以防止”。“世界人民把制止战争的祸首消灭了，就可以防止战争；世界人民如果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谎言所欺骗，战争就不能制止”。“程”是判断的程度，主词和宾词的关系，联系的程度。这种判断有三种：实然判断、或然判断、必然判断。实然判断就是一般肯定一件事情。比如，“这个房子是好房子”，“这个房子对开会很适用”，这就是实然判断。或然判断有一点不定，你说这个房子很适用，有一个人怀疑一下，他说：“也许对开会不适用吧？”当你说不出理由的时候，你只好说：“这个房子对开会可能是适用的”。再一个是必然判断，就是对实然判断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这个时候可以作出必然判断：“因为这个房子很大，空气很好，所以开会非常适用”。这种有充分理由的、明确的论断，是一种必然判断。

康德把判断分成十二种，这是很大的贡献。黑格尔把康德的十二类接受过来了，多少改造一下，把量、质、伦、程的次序调了一下，把质的判断放在第一，量放在第二，下面还是按照原来的顺序。这是《小逻辑》里面都有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质的判断，黑格尔认为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的一种判断，这个判断把握到表面现象的关系，没有进入本质。他这里举的例子是：“玫瑰花是红的”、“玫瑰花是有颜色的”。这些判断只是对一些表面现象、对一些感觉到的现象，作出一些初步的判断，这种判断没有进入本质，只是涉及到一些表面的、个别事物的关系。所以，质的判断是最初级的判断，对理论来说，对逻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判断。我们搞理论的，不是要大量地讲“玫瑰花是红的”，“人的脸是白的”，“非洲人的脸是黑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些判断可能是不错的，可是没有把握到事情的本质。“拿破仑生于某月某日”，“北京在地球上的某一度”。这些都只是现象，没有揭发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没有揭发事物深刻的内部联系。所以理论上的用处不大，是很初级的判断，是认识发展最初级的判断阶段，没有完全脱离感性认识阶段。

量的判断就涉及到事物内部的关系，这里面就包含有个别判断、全称判断、特称判断。所以，恩格斯就举了三种判断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这种判断比质的判断深入一步，这种判断比较能对事物的内部关系下论断，不是对表面现象下论断。“摩擦生火”，这是比较内部的关系，比较深的关系。“运动能够产生热”，这是更深的关系。“一切运动形态能够互相转化”，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规律。特称判断更把握规律性，全称判断更把握全面规律。这种判断在理论上的用处比较多。所以恩格斯说到判断问题时，就特别举这个例子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判断更深入一步。人的认识发展到更高阶段，就适用于这些判断。至于关系判断，这种判断在认识上更深入一步，就是要认识到不仅仅是认识关系，而且要把事物的联系、条件弄清楚。比如，假言判断是假如怎么样，就只有怎么样。“摩擦生火”，是不是摩擦后就一定生火呢？比如手在书上摩擦就不一定生火。所以，仅仅是量的判断就不够深刻，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假如用一个干燥的木头来摩擦，那么就可以生火。

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还没有涉及到必然性，程度判断就涉及到是不是必然的问题，这就更高一些。到了必然判断，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已经到了最深的程度，作出的判断是确定无疑的，有充分的信心。“帝国主义必然要垮台”，这就是必然判断。“无产阶级一定要胜利”，这是必然判断。要作出这种判断

是不容易的。说出这句话很容易，但是在说出这句话以前要作很多科学研究，必然判断后面要有很多科学研究来支持它，不能够凭空说这句话。

黑格尔就是根据人的认识过程，来排列判断的关系，把判断由低级到高级加以排列，由比较浅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判断，到最深刻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判断，一直到科学的认识，用科学研究作基础来分类。

判断还有一个互相转化的问题，不仅是互相转化，而且相反的判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存在。比如，马克思说：“公社消灭了，公社万岁”。一个判断说公社消灭了，另一个判断说公社万岁，这两个判断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在一个地方提出来。

为什么两个相反的判断能够同时存在呢？

辩证逻辑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有时相反的判断可以同时提出，从这方面看可以下肯定判断，从另一方面来看，可以下否定判断。“我现在在开会，但是我们要散会了”。这两个判断可以在时间上连续出现，但是是互相转化的。我们现在开会，过一段时间就不开会了。为什么能够把这两个判断联系起来呢？因为我们研究判断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联系起来。以巴黎公社这件事情来说，公社失败了，但是创造的公社这个普遍原则是万岁的。为什么能够下两个判断呢？就是因为事物有矛盾，巴黎公社有矛盾，它的具体存在是失败了，但是它创造的普遍原则是永恒的。它有具体的存在，也有普遍的原则，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但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客观情况。根据客观情况，我们在理论上作出两个相反的判断来，一个是它失败了，一个是它万岁，它永远不会失败。辩证逻辑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作出这种判断。1957年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有人挑起群众进攻，毛主席在上海向柯庆施同志说：资产阶级闹起来你怕不怕？柯庆施同志说：也怕，也不怕。这就是把两个相反的判断结合起来。这个对不对呢？完全对。因为资产阶级闹事有两方面：闹事是坏事情，坏事情有些使人怕，如果搞不好，像匈牙利那样就可怕了。可是这个事情教育了广大人民，章乃器这些人一闹，报纸上把他的言论一发表，工人就睡不着觉，就要抗议，大家纷纷质问他，就变成好事情了，所以又不可怕。判断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逻辑要研究这个问题。

5. 辩证逻辑的推理

关于推理，简单讲一点。

黑格尔把推理分成三种：质的推理、反省的推理(这是唯心论的说法，就是绝对精神自己反省了，就是说推理开始进入本质。唯物论的说法是我们的主观认识深入本质。“反省”这个名词我们不用。把“反省”翻译成为“反映”是不确切的)、必然推理。

所谓质的推理，就是指形式逻辑最初级的三段论法。比如说，“玫瑰花是红色的”，“红是颜色”，因此“玫瑰花是有颜色的”。这个三段论法是质的推理，这些都是比较表面的推理。他认为这种推理是不深入的，是很表面的，因此这种推理在科学上的用处很少。

黑格尔顺便批判了形式逻辑，他说形式逻辑里面只是讲三段论法，实际上人的科学研究主要并不是用三段论法。三段论法不用学习，人都会用，但是科学思维常常超出了三段论法。他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有系统地讲三段论法的，可是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主要不是依靠三段论法。黑格尔有思想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有一点真理性的核心，就是他把三段论法，特别是演绎法看作是最糟的逻辑。

他认为比较高的是反省推理，反省推理有三种：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演绎推理基本上三段论法，不过它是反省推理里面比较高一些的三段论法，就是从最可靠的大前提出发，然后作出结论，就是由最可靠的普遍真理出发，作出最个别的结论，这样的推理比较妥当。比如说，“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因此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样的推理是演绎推理。这个推理比“玫瑰花是红色的”，“红色是颜色”，“因此玫瑰花有颜色”，这样的推理要高。这种推理涉及到本质问题。但是，黑格尔说，演绎推理本身还要有基础才行。最初的普遍真理是哪里来的呢？你用演绎推理推出来一些结论之后，人家要追问你的大前提，一追的结果，就过渡到归纳推理。用归纳推理来证明就更进一步了，但是归纳推理有缺点，就是排列事物归纳它的共同点，有的时候排列的结果不一定可靠，排列的东西不完全，结果归纳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可靠，因此，又要依靠类比推理。类比推理虽然没有排列出来，但是可以大胆的估计，这就叫作反省推理，比质的推理进一步，可是这种推理还是不完全可靠，可靠性不高。

所以，辩证逻辑要求我们的推理进入必然推理，就是推理要有充分的可靠性。辩证逻辑主要是运用必然推理，主要是依靠矛盾的分析方法，抓住矛盾加以分析，然后把矛盾的相互关系弄清楚，根据矛盾的关系来推测这个矛

盾斗争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点，然后推测到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推理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根据事物内部的本质、内部矛盾的关系，把矛盾分析清楚了，得出来的结论一定是必然的。这种推理的根本点是对矛盾的分析，矛盾的揭露和矛盾的解决，就是揭露概念内部的关系，然后根据揭露出来的矛盾来推测它的相互关系，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推理要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分析就是把整个的东西分别为矛盾的对立面。综合分析就是研究对立面的相互关系、它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资本论》首先研究商品，研究它的两重性，然后到价值问题，一直到剩余价值，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一个概念分析为对立面的概念，对概念又进行综合，又产生对立面的概念，这样不断分析，不断综合，并以实际材料和历史材料为基础，所以，又要有归纳，又要有演绎。这种必然推理把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统统包括在内，所谓必然推理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辩证推理。毛主席的著作里可以找到这种推理。中日战争分列为中、日两方面，然后又弄清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都是什么，这些条件都是矛盾的，根据这些矛盾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速胜，还是不速胜，还是亡国，把这些对立面提出来认真加以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是速胜不对，亡国也不对，持久战是对的。所以对上面这些问题可以根据毛主席著作来深入研究。

第10章 党史引言报告

(1960)

【这是艾思奇同志在原中央高级党校1960年理论班所作的报告，按报告的速记稿整理，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大标题和二、三、四小标题为原有，第一个小标题是我们加的。】

(一九六〇年)

同志们！今天大家开始学习党史，党委要我来开一个头。

关于学习计划问题，昨天李践为同志已经讲了，我现在是要讲引言。

我先声明一点：我对于党史和大家一样，也是开始学习，我是专门研究哲学的，研究哲学也要涉及到党史，但对党史本身没有什么系统的研究。今天讲引言，仅仅是发表一点意见。大家对我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批评，这样就算使学习开了头了。所以我讲的引言只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问题

学习计划是六个月，在六个月内，以两个革命阶段，三条总路线为纲来进行学习。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党史，使我们大家初步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使我们以后学习各种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各部分有一个思想准备。这就是说，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使我们在思想上打下一个基础，作为我们以后学习的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我讲引言主要是想讲一讲如何来实现这个任务，也可以说是，如何通过党史学习，初步了解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除了苏共以外，我们党的经验是最丰富了，或者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党的经验可以说比苏共更丰富一些。比如民主革命时候，我们的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超过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样。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个经验我们更全面一些；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运用比苏联更成熟些。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又有许多新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并且是正确地指导了我们的斗争的科学思想。我们学习党史，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

学习毛主席怎样观察历史并怎样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使它变成系统的理论，并用此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我们党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斗争历史，这四十年中，大的阶段有两个，前一个是民主革命阶段，有四个时期，如果加上“五四”到党的成立这一在干部和思想上准备了党的成立的时期，那就有五个时期。党成立以后进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是陈独秀领导的。从1921—1927年这六年，因为没有正确思想的领导，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结果失败了。以后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7年—1937年这十年中间，前七年毛泽东思想尚在形成和发展中，它还没有成为党的中心领导思想，这七年就遭受了很大的失败，遭受了损失。1935年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开始成为我们党的中心领导思想。以后是抗日战争，有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里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所以这八年的战争终于得到了胜利。抗日战争以后是人民解放战争，也就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45—1949年，这四年中得到一个全国性的胜利，按时间来说，比以前每一个时期都短，按照得到的胜利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这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1942年、1943年的整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全党空前一致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十年了，这十年比较顺利，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又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相比，也是比较快的。

四十年来党的整个历史很清楚的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党就要犯错误，革命就遭受失败；党如果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革命事业就会得到发展和胜利。把整个历史回想一下，就能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们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学习党史的中心任务，是不应该有任何怀疑的。

我现在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学习党史来初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任务怎样才能达到？我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要努力用毛泽东同志的方法来学习党史，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学习党史，或者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党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应该了解一下：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党史的？我们就是要根据他的看法来学习党史，只有根据这个观点来学才能学得好。

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党史的呢？毛主席自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到，我们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毛主席是这样给党史下了定义，这就提供了我们学习党史的方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毛主席又说到，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些话也说明毛主席对党史的看法，这个看法和上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这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分不开的。东北有一个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只是一种社会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可分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句话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过的。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单讲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也讲的，古代有自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这些人也是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但都不是彻底科学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讲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主要是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相结合的历史，这个历史开端于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先进人物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的命运。毛主席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命运的伟大代表、伟大典范。除了毛主席以外，还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毛主席是主要的代表，所以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互相相结合起来的思想，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就不能不发展，因为一种普遍真理和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运用问题，一结合就必然在各方面有新的发挥、新的展开，就必然有新的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在中国有意义，而且要肯定是有国际意义的，原因是中国革命是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够说仅仅是特殊的。有没有人认为中国革命经验仅仅是特殊经验呢？是有人这样看的。一直到现在也有人这样看。比如有人认为只有俄国的革命经验才有国际意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经验，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贡献，但是都是特殊经验。我们学习党史应该反对这种看法，否定这种看法。我们应该肯定苏联十月革命经验有普遍意义，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里也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普遍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国经验也有普遍意义，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都有很多普遍意义的东西。现在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起来革命，甚至于有些所谓已经独立起来的国家，像印度、印尼，由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人民还要起来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首先是要学中国的经验，还是学过去俄国的革命经验？当然俄国的革命经验也要学，但是中国的革命经验对他们更亲切一些。因为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与现在殖民地国家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经验更全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比俄国革命的经验更全面，这些经验对现在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来说更直接一些，所以，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思想。当然这个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结果，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命运的结果。但这个思想为其他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世界各国人民提供的典范，就是告诉他们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我们学习党史的时候应该充分估计到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重要意义。

党史既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学习毛主席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学习毛主席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学习党史必须采取的观点和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注意到：我们的党史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我们这样来了解党史，这样来学习党史，努力自觉地这样做，就可能对毛泽东思想更容易掌握一些。

这里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是平静无事，不是完全顺利的，而是充满矛盾的，是曲折的，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因此学习党史的时候，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在

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和发展，同时要注意到，在形成和发展中经过一些什么斗争。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命运的时候，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的过程中，不能不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党史看作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十年来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它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是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的问题，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命运的问题，所以学习党史要抓住哲学环节，抓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中国被运用，被发展，如何进行斗争这样一个环节，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党在历史上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哲学思想。

因此，我们学习党史，要着重抓住无产阶级世界观，抓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环节，多研究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学习，就会使我们理解更深刻一些。

今天我就要讲一讲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毛主席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革命问题。主要分为三个问题：（一）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二）坚持彻底的辩证法问题；（三）坚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问题。

我认为学习党史要抓住这三个问题：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如何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如何坚持彻底辩证法，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具体问题是很多的，党史的具体问题是包罗万象，有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文艺问题等等，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不能把每一个问题都当作重点，我们学习是以两个阶段、三条总路线为纲，在这个学习方向下，主要是抓住彻底唯物主义问题，彻底辩证法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几个问题。

2. 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

彻底唯物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为什么是彻底的？因为它一方面和辩证法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推广到社会历史方面，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和辩证法结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彻底，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如果不是唯物主义的，怎能算彻底的唯物主义呢？

毛主席在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首先当然是反对唯心主义。我们学习党史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毛主席在理论工作、实际工作上，在观察问题、分析形势、解决问题、指导工作这些过程中，努力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反对任何唯心主义偏向。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恩格斯当时讲的时候，主要是讲到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对自然界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对人类历史也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关于哲学的党性这一章里也讲到这个问题。

应该指出，所谓要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不仅仅是指用唯物主义来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作理论上的说明，而且还在于要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使它成为指导行动和斗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唯物论也应该是行动的指南。这一点特别重要，但人们往往不很注意。从党史来看，从毛泽东思想来看，这一点是尤其清楚的。

毛主席非常注重把唯物主义原则当作行动的指南，在行动中贯彻唯物主义。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当前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迫切任务。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在一个国际文件中特别提出来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贯彻在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研究上，是不够的，因为只停止在理论上，没有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没有变成行动中的唯物主义，还不能够说最彻底。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充分地贯彻了这样的思想：把唯物主义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行动中，作为行动的根本指

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用唯物主义原则来指导行动的。在分析形势，制定政策，指导行动的时候，都是坚持唯物主义原则。但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新的阐发。把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原则，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多年来的经验加以总结，写在国际文件上，这也是第一次。

在思想斗争方面，毛主席经常不断地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唯心主义，多半着重在理论方面，学术方面。毛主席在学术理论方面对唯心主义也有批判，但是更多的是批判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党史从头到尾贯串着一条红线，就是自始至终对种种唯心主义，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毛主席对这个斗争做了系统的总结，指出主观主义是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共产党的大敌。这不能不说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新贡献。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主席就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理论上提出来的反对主观主义。

对我们中国革命来说，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四十多年来，危害最大的唯心主义是哪一种呢？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当然有危险，这方面的批判是不少的，但是更大的危险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成败。所以毛主席用很大的力量，甚至用主要力量来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对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加以分析，加以研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批判。

毛主席曾指出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有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有唯心主义的的经验主义，在《实践论》里所反对的经验主义是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这种经验主义相信经验是能够反映客观事实，它的经验，它的实践是客观的，问题是它反映的是狭隘的经验，它满足于个人的经验，不把它提高到理论上认识，这种狭隘的经验到处搬家，最后变成为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因为它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轻视实践，轻视感性认识。

毛主席在整个党的历史中一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发展唯物主义。他不但在一般原则上提出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对如何坚持唯物主义，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里就讲到了，这篇文章虽然很简单，但是值得我们很好地

学，他说，主观主义就是指的的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的时候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反过来说，坚持唯物主义就是要在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的时候要坚持唯物主义。毛主席提出许多行动的唯物主义的口号，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等，这是实际工作中的唯物主义原则。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里，毛主席对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已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这篇文章规定了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分析形势，指导工作方面。分析形势是分析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方法是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加以分析。这是认识客观情况、分析形势，包括分析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的问题。政治形势主要是阶级形势，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根据分析的结果规定我们指导工作的原则，也就是规定路线、政策、计划等等。指导工作的原则是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来规定的。在革命时期，指导工作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用毛主席最初一篇文章的说法就是分清敌友的问题，肯定我们把谁当作敌人，把谁当作朋友，集中哪一些力量，反对哪一些力量的问题。这些原则要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首先要正确分析客观形势，然后根据这个分析来规定我们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再集中哪些力量来反对哪些力量。在我们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自始至终运用了这个方法。

我们的党史可以说是这样的过程：以毛主席为代表，我们的党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不断的分析，根据这种分析的结果，制定我们的斗争路线，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

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不能够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够正确的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因此，也就不能够正确的规定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路线。对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战略策略上犯了错误，因此使革命遭受了损失。

我们学习党史，是不是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学，就是学习我们党在几十年来的革命过程中，如何不断的分析复杂的形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来不断的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且根据分析的结果，制定指导工作的方针政策，运用适合不同形势的战略策略，来胜利地指导我们的斗争。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战略策略是怎样规定的呢？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条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大体上在毛主席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经有了。找到这条总路线的方法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从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到无产阶级，一个一个加以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动摇性。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总的战略策略路线是怎么来的呢？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析形势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二十几年过程中，这一条总路线是贯彻到底的。但是在二十几年中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变化，在具体政策上也有变化，比如对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有时联合，有时分裂，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都是根据形势的不同，阶级斗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总路线对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是普遍的，但是，具体政策随着不同时期的变化也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学习党史，要经常注意到我们党在每个时期当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变化以后，我们如何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在策略上工作指导上做出不同的布置。同时也要注意从反面来看，违背了上述原则，如何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者是我们的反面教员，研究他们怎样在估计形势，估计阶级斗争的力量，在规定指导工作方针的时候，如何违背了唯物主义原则，如何走向了主观主义，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正确的。总之，我们学习党史，在思想方法上首先就是要注意研究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和我们党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行动中如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要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是除了在理论方面反对唯心主义之外，还特别着重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除了反对唯心主义以外，也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或者说要跟机械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唯心主义是第一个敌人，机械唯物主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反对的错误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

中说到，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都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讲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一条是反对唯心主义，第二条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首先是反对唯心主义，为了反对唯心主义，为了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也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

我们以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一个缺点，反对唯心主义比较彻底，但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就很不够。我们从最近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更深入地看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反对唯心主义以外，也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并且发现我们以前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这一方面的斗争注意得很不够，甚至有时候不注意，有时候对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界限划不清楚，有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讲成机械唯物主义，或者把机械唯物主义当成辩证唯物主义来讲。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应该在这一方面加以注意。实际上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提的很明显，毛泽东思想也包含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所以在研究党史的时候，也要注意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问题。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没有共同点的，两者的根本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共同点的。以前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划不清，就是因为有共同点，有时就混淆起来。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点是：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客观是第一性，主观是第二性，肯定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就是肯定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共同点，所以我们在过去讲哲学的时候，认为只要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讲清楚了，只要把认识论反映论的最根本原则讲清楚了，把主观必须反映客观的原则弄清楚了，这就够了，更多的东西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很少，因此有时就把辩证唯物主义讲成机械唯物主义，或者是停止在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原则上，不能进一步展开。事实上，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即坚持彻底唯物主义，不能够仅仅停止在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上。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清楚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应该反映客观的这个原则，这样还是不够的。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反映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反映，一切唯物主义都肯定主观应该反映客观，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正确反映。机械唯物主义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真正解决。机械唯物主义只肯定主观应该反映客观，但如何反映的问题，它不能正确解决，它不能最后解决反映论的问题，所以它是不彻底的。

为什么机械唯物主义不能够最后解决反映论的问题呢?因为机械唯物主义对主观反映客观的看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是相反的,机械唯物主义把主观反映客观看成是个人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结果。机械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看问题,个人主义世界观看世界是从个人出发。机械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孤立的单纯生物的个人,人的认识也就是个人观察的结果。因此在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上所理解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实践行动获得的认识,而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观察。就像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说的:过去的唯物主义不知道主体的作用,只是纯客观的观察,一个人坐在这里以旁观的态度来看世界,人就像镜子一样,把外界世界的事物消极地反映到镜子里面来,这是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的特点和缺点。这种特点就是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论。旧的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看待主观和客观的问题的。因此它不能够真正解决反映论的问题。因为个人的感觉是有限的,他不能够全面地认识世界,而且一个旁观者看世界只能够看到世界的表面,而不能看到世界的本质,不能看到世界的规律。你要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规律,你就要改变世界,在改变的过程中,你才能够知道它的规律和本质是什么。因为个人接触只能够看到表面的局部现象,不是通过广大群众的斗争,不能够发现它的本质。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经验主义,是离开社会实践来看问题的错误方法。

所以说,机械唯物主义虽然相信经验是从客观来的,可是他们把经验看作静观的结果、个人观察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实践论》里就批判了这种经验论。经验主义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种表现。

机械唯物主义在解决主观如何反映客观问题上,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跟机械唯物主义完全相反,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把实践当作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也是最根本的观点。人类认识依赖于实践。所谓实践是讲社会生产实践、革命实践一阶级斗争以及各种政治斗争,主要是讲人民群众的斗争。当然反动派的斗争也是实践。但是,社会历史上大量的实践,是生产实践,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无穷无尽的来源。有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基础,那么人的认识就不会陷于表面性、片面性的缺点,就可以避免这种缺点。马克思主义者是强调认识总是从直接实践中来的。但是,所谓直接实践不是限于个人实践。认识最初的根源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者要

把群众的实践当作自己智慧的根本来源，把群众斗争当作自己认识的最根本的来源，不是单纯依靠个人的经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仅仅依靠个人的经验，依靠个人的知识或者是少数人的知识，少数人的经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这里就有机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毛泽东思想是以彻底革命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在认识论上不是消极的反映论，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在改变世界的斗争中去认识世界，认识的结果，也是为实践服务，为斗争服务。首先是改变世界的斗争，在斗争中积累经验，把经验加以总结，就提高了认识，又用这个认识去指导斗争，开展斗争，然后再总结经验，这样不断地反复，就使思想进一步地提高，认识一步一步地发展。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认识发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实践，我们不要解释为个人的实践，要看作是社会实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斗争的实践。

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认识论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或者说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能动的反映论。怎么样走群众路线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得很清楚。要想走群众路线，根本的方法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群众路线有几条原则，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但贯串一切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实践论》里讲的那些思想。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然后把经验总结起来变成理论，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然后又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又总结经验，又指导实践，是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运用这样的认识规律来领导群众，然后才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没有这一条，那群众路线的灵魂就没有了。你虽然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是在工作中不会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方法，你那一套为人民服务的好心是会落空的，是没有效果的，是起不了作用的。

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当然，群众的知识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因此，领导者就很重要，要领导者善于把群众最初创造的经验知识加以总结，变成指导思想，使群众得到正确的领导。

群众路线的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否相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与群众路线分不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相信群众是伟大的创造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我们不但可以得到克服一切困难的无穷力量，而且可以得到解决一切问题的无穷智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对群众运动有这样片面的看法：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主要是为了集中强大的力量打倒敌人。而忽略了另外一方面，即把群众发动起来，使我们获得克服任何困难问题的无穷智慧的泉源。群众不仅仅是人类力量的无穷无尽的泉源，而且也是人类智慧的无限丰富的泉源。前一点人们比较容易认识，后一点很多人却不注意。毛主席对一切工作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目的不仅是能够集中最强大的力量打倒敌人，而且是能够集中最丰富智慧的泉源，使我们党的认识能够提高，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从开始到最后，是不断发展的，在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都是新鲜的。我们大家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自己也可以体会到，在革命运动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提出新的阐明，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一个新的进展，使我们在认识上更上一层楼。我自己是有这样体会的。

我们如果有意识地这样来读《毛泽东选集》，从毛主席最初的文章到最后的文章，仔细读一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体会，革命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和党的战略策略总是提出些新的观点，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丰富起来，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提高一步。这些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群众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认识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表现。我们学习“毛选”要学习每个时期的革命实践、人民群众的斗争如何在毛泽东思想里作出新的反映、在党的思想上作出新的反映，如何使认识提高，使马克思主义常常得到新的发展。认识不能跟群众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就会有片面性、主观性，就会犯错误，就不可能使认识向前发展，就会停顿于老一套，因为人的智慧要想发展，要使自己的认识提高，一定使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泉源不要割断，要经常和这泉源相联系，否则人的思想就会停滞和贫乏起来。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学习党史，仔细研究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情形。

研究党史要注意到我们党首先是毛主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特别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反对把认识当作个人消极的反映。不了解人的认识是在群众斗争中实践的过程、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在群众实践中去取得认识，就会犯错误。从党史学习中应该充分吸取这种教训，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使我们的认识离开群众，离开认识最根本的来源，离开我们智慧最根本的来源。这个问题跟主观能动性有关系。机械唯物主义不重视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不大重视人民群众高度积极性的发挥、人民群众自觉的努力，不了解广大群众主观的能动性充分发挥的结果，可以解决各式各样平常不能解决的问题。机械唯物主义者只能认识这一点：人的主观应该反映客观事物，但不了解人首先应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他们只能了解到客观第一、主观第二，不了解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主观能动作用，不了解这个反作用的高度重要性，不了解它在一定时候起主导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矛盾论》里“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节中，讲到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别。机械唯物主义只知道客观物质是主要的，不懂得主观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起主要的作用，当然物质条件是一个客观基础，起最后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东西。但主观力量在某种条件下也能起主导作用。如政治思想工作对人的行动就能起主导作用，这也正是人的主观力量起主导作用。

3. 坚持彻底的辩证法的问题

我们要从党史里，学习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如何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辩证法和唯物论是分不开的。我们为了说明的便利，分成两个问题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在前面讲坚持彻底唯物论问题，讲到毛主席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就是要经常注意分析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阶级对比的状况，然后制定指导工作的方针。这是唯物论，同时也是辩证法。坚持正确分析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发展，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至于如何坚持，如何分析，就是辩证法的问题。

所谓分析，主要就是阶级的分析，就是对各种各样矛盾的分析。而分析阶级、分析矛盾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要对社会经济作一些调查研究，要应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辩证法的方法。因为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历史矛盾的表现，阶级分析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所以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也不是什么神秘难懂的，他的思想方法就是坚决贯彻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形势变化的时候，对形势的矛盾分析也跟着发生变化。在每一个新的时期，要对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矛盾的关系作重新分析。政治形势每变化一次，对矛盾的分析也要重新来一次。这个方法，在《毛泽东选集》里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如果有意识地注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中国的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阶级作了分析，分清了富农、中农、贫民，指出了谁是革命的先锋，这些都是矛盾的分析法。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阶级斗争重新分析了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时，毛主席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在抗日战争前夜，这时的形势又有了变化，毛主席又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国内外的敌我矛盾又分析了一次。一直到最后的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胜利后，又有了新的分析。在全国胜利以前和以后，矛盾的分析有很大不同。在以前，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四个朋友三个敌人”，在四九年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基础，还是根据矛盾的分析。毛主席又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作了具体分析，并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这些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彻底贯彻辩证法的方法，彻底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贯穿我们整个党史的指导思想的特点。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学习毛主席如何自始至终坚持辩证法。从中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对一切问题一贯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不掩盖矛盾，不回避矛盾，而是要敢于正视矛盾，并充分揭开矛盾。

有时矛盾是隐蔽的，这就要采取一定措施来揭露矛盾，以便解决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展开斗争，解决矛盾，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法，也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方法。是不是也是斯大林的方法呢？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个方法，但不够彻底。

在辩证法的彻底性上来说，毛主席的思想是表现得最突出的。在以前，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敢说一万年还有人民内部矛盾，还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说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马克思、列宁活到今天，他们也会这样讲的，问题是他们不在了。现在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毛主席讲出来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辩证法，而只有彻底坚持辩证法，才能发展辩证法。

关于坚持彻底的辩证法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从思想方法到工作作风始终贯彻辩证法或矛盾分析法的问题。

首先，是坚决贯彻矛盾的普遍性的原则。所谓矛盾普遍性的原则，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每一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有矛盾。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要贯彻自始至终的矛盾的分析。对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好，对一个革命运动也好，自始至终都要贯彻对矛盾的分析。揭露、展开、最后解决矛盾的原则，不管是民主革命时期也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好，不管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也好，只要客观情况有变化，就要把矛盾重新全面地分析一下，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个特点。这样的分析使我们的认识任何时候也不是呆板的，而是非常灵活的，工作指导也是非常灵活的。民主革命时期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矛盾运动的具体情况不同，分析也就有所不同，而根据这种分析的结果所提出来的策略方针，工作指导也各有差异。当然，这是在同一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所作分析的结果，具体的战略、策略，尽管有所改变，根本的革命性质不能够改变。革命的总路线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例如抗日战争以后，到了解放战争阶段，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了，可是仍然有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过去我们党跟教条主义斗争的时候，矛盾的普遍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很突出。毛主席在写《矛盾论》的时候特别指出要注意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因为那时的教条主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矛盾的特殊性。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教条主义者都不重视中国的特点，所

以毛主席的《矛盾论》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特别强调了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意义。

矛盾特殊性的原则，就是一方面要自始至终肯定矛盾、分析矛盾，但在每个情况变化时，都需要注意矛盾的特点。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分不开的，是矛盾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贯彻自始至终的矛盾分析，另一方面情况每有变化就要重新对矛盾再作全面的分析，每次分析都要指出一些矛盾的新的特点。贯彻矛盾的普遍性跟坚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的。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就不可能真正作到自始至终的矛盾分析。我们学习党史，应该注意这样的情形：整个党史的过程，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变化的过程，毛主席和我们党在认识上，总是随着这种变化不断地对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作出新的分析，不断指出矛盾新的特点，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来规定如何展开斗争，提出如何解决具体矛盾的方法。

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为什么重要呢？重要就在于矛盾特殊性直接涉及到我们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问题，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对矛盾特殊性认识错了，斗争的方法搞错了，矛盾就不能够解决。比如把对抗性矛盾看成非对抗性矛盾，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看成是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一心一意想用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总是希望在桌子面上解决问题。暂时妥协是可以的，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党内的同志犯了错误，在群众的批评下作个检讨，检讨了矛盾也就解决了。如果不检讨那就成问题了，就有可能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就是说，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而不能够混淆，所以矛盾的特殊性是很重要的，是直接涉及到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也直接涉及到工作方法，涉及到行动的成败。如何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我们还可以从党史和毛主席著作里充分学习到，这里用不着解释了。

这里顺便讲一下，毛主席对矛盾的特殊性的分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矛盾的特殊性不仅仅从质的方面来分析，而且还从量的方面来分析。毛主席在分析矛盾时，经常注意到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土地改革时注意这个问题，“三反”“五反”时注意这个问题，农村合作化时注意这个问题。分析矛盾，不仅是要分析有这样的阶级，那样的阶级，不仅仅分析当前运动中包含哪些阶级，这些阶级的趋向有什么不同，这个阶级与那个阶级有什么质的不同，而且要具体分析这个阶级的人数占多少，那个阶层的人数占多少，哪些阶级是多数，哪些阶级是少数，哪些阶层是多数，哪些阶层是少数。毛主席是一

贯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这样就把社会矛盾的分析提高到科学的精密程度。因为科学是要计算数量的，科学规律知识不但在质的方面区别事物，而且在量的方面能够加以计算。毛主席经常讲“胸中有数”，就是对矛盾有量的方面的估计。这样才能够掌握每个时期矛盾的特殊性。

量的掌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就在于我们掌握矛盾的量的对比之后，就可以使我们政策的规定能够得到精密的科学基础。我们的政策、战略、策略，怎样规定才能够正确呢？凡是正确的政策、战略、策略，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实行这种战略、策略和政策能够保证我们集中最大的力量，把敌人的力量最大地孤立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战胜敌人。社会主义建设是对自然斗争。但是，对自然斗争也要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把反对势力缩到最小，把它孤立起来，然后才能用最大的力量向自然进行斗争，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达到多快好省的标准。所以战略、策略的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了规定这个原则，是不是需要对矛盾的数量方面作正确的估计呢？那是完全需要的。如果数量方面没有正确的估计，有时把多数估计为少数，把少数估为多数，就可能对战略、策略作出错误的决定。

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产生？原因之一就是思想上对矛盾各方面的数量估计颠倒了。右倾机会主义往往对自己可能团结的力量估计过低了，而对敌人这方面估计过高，因此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左”倾机会主义则相反，他们根本不考虑团结大多数人民和孤立敌人的问题的，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错误的战略、策略、政策的来源之一，在思想上有这么一方面，就是对矛盾各方面的数量估计不准确。

所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经常分析多数和少数问题，经常注意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根据矛盾总的量的分析的结果，这是非常精密的分析，把辩证法真正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所以在学党史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思想。

关于坚持彻底辩证法的第二个问题，辩证法的矛盾分析的方法不但贯彻在思想方法方面，而且贯彻在工作方法方面。所谓思想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是要求对事物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把统一的东西分裂为二。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认识矛盾的各个方面。毛主席把这种方法用更加简单明了的、形象化地加以表达，叫做“两点论”。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分作正反两点，正反两点各自又可以再分为正反两点。我们要

在思想方法方面贯彻辩证法、贯彻“两点论”。上面讲矛盾的普遍性时已讲到这个问题，现在要特别解释的是关于工作方法问题。

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密切联系的，思想方法要贯彻辩证法，工作方法也要贯彻彻底辩证的、科学的方法，也要贯彻“两点论”，贯彻统一物分裂为二的方法。客观事物有矛盾，有两点论。因此处理矛盾的工作方法也应该掌握两点，也要全面地来对待问题。比如对资产阶级用两面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卖办资产阶级也是两面政策，有联合、有分裂，在一定的条件下还要联合。哲学斗争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帝国主义有两手，我们也有两手，有尖锐的斗争，也有谈判。要把辩证法用到工作方法上，自觉地使用两手。

为什么一定要用两手呢？因为事物有两面性，我们的斗争对象有两面性。当然最后目的只有一个：消灭敌人。但在没有消灭以前，他对待我们两手，他要战争也装要和平，我们和他针锋相对，既不怕战争，也力争和平。工作方法之所以有两面，是因为客观事物有两面，片面的工作方法不能解决矛盾。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有两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有反动性又有进步性两面，我们对它也有两面，你反动时，我就斗争，你进步时，我就联合。对敌人也要有两手，因为敌人有两手，我们也有两手，如果不自觉地运用两手，也会被迫运用两手。辩证法要求我们自觉地运用两手，又斗争又谈判；这里斗争，那里谈判；一个时候斗争，那个时候谈判。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合乎客观规律，就能够取得主动。

也有这种情况，原来只有一手，但到了情况发生变化，就要被迫搞另一手，就不是辩证法，那是从一个片面到另外一个片面。过去的教条主义者王明，他有时“左”得很，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完全右了。这是由形而上学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不是辩证法，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方法是不能长期坚持的，到一定时候就不能不被迫走到另一片面。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形而上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是掌握了辩证法。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掌握辩证法，根据客观事物的两重性，主观的工作方法也适时地掌握两点，两条腿走路就是工作方法上的两点论，这是自觉的彻底的辩证法。

自觉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一个片面被迫走到另一片面，这是两回事，不能混淆，要加以区别。自觉的辩证法是主动地、灵活地掌握全面的方法，形而上学由一个片面到另一片面，始终仍是片面的方法。

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学习方法问题。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呢?因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问题。学习党史,学习毛主席著作除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学习之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一下毛泽东思想如何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首先集中在革命问题上,在国家学说的的问题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跟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它的中心问题也都集中在革命和国家学说的的问题上。

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资产阶级也讲,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有人运用阶级观点(自然是不完全的)来分析社会,分析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别的集中点,不在于是不是讲阶级的问题。当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否认阶级斗争的。比如,实用主义者就否认阶级斗争的真实性,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人为的现象,好像是因为人们在理论上创造了阶级斗争学说,因此才会在事实上挑起阶级斗争,如果人们在理论上不讲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否认阶级斗争,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但是,资产阶级在进步时期,它的历史家们也讲过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单单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能区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别的中心点是:阶级斗争是不是要引导到革命,又经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中心问题。

列宁主义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里讲得好:列宁主义学说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贡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就像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了新的贡献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上有了新的贡献。所以,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除了注意到毛主席怎么样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来解决中国的具体实践问题之外,还应该特别注意一下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方面有什么新的贡献。我想注意一下这个方面,从这一方面进行研究,是有好处的。

首先谈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提出了如何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个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就应该抓紧领导，应该向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要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和广大农民建立联盟，这样就能保证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使革命进一步发展，使它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的思想是继承了列宁的不断革命思想，又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革命方面，毛主席坚持了列宁的原则，坚持民主革命一定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要和农民建立最广泛的联盟，同时又发展和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思想。统一战线方面，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在这里谈到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这就是党的建设，革命军队和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这是一个新的贡献。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问题上和资产阶级联合，但领导权一定要坚决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又要和资产阶级斗争。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如果不和农民建立联盟，那么，在现代帝国主义时期，就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实现。如果革命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也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资产阶级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任务。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讲到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期，如果无产阶级不领导革命，而由资产阶级领导，并由此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最后结果还是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会真正建立独立的国家，不会使真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得到胜利。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了这个规律。

有一个时期，有一些人怀疑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好像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也能够使一个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的道路上去。这个怀疑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出现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这些国家，他们跟帝国主义斗争，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得到一定的胜利，掌握了政权，帝国主义让步了。这些国家看起来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好像民族革命的任务真正实现了，从这里就产生了怀疑的思想，觉得毛主席的上述观点好像仅仅有中国的意义。但是，目前历史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国家的生产发展了吗？社会进步了吗？独立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吗？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解决，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利用反共的办法来压制人民，来解决统治者自己跟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

盾。它走向反共之后，他们的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虽然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殖民地的关系，但还是一种依赖关系，这是很清楚的。当然，和从前直接作殖民地情况有些不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仍有一定的矛盾，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矛盾，有些民族独立国家里搞得比较好的，是没有把革命停顿下来，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还保持着，还组织了武装。因此我们对这些国家还是采取又斗争又联合的方针，还是把它和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跟过去的殖民地政府加以区别。

问题是我们要在思想上清楚地了解这些国家因为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就没有解决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广大人民所要求解决的革命问题。连民族独立的任务也没有解决，民主问题更谈不上，印度的农民还是受地主的剥削，并没有搞土地改革。有些国家，革命任务并没有真正实现，只是一些大资产阶级占了便宜，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

根据上面这些例子可以证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是对中国适用，而且在当代，在国际上也是适用的，对当前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是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无产阶级不坚决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不但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没有民主革命。如果否认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就是否认革命。

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要革命的，它就是通过反对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来断送革命。我们党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事实上，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初步提出了这种思想：那个时候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但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在那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让资产阶级掌握领导，当然不会有真正的革命，二月革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方向是反动的。所以，要革命，就要无产阶级坚决领导革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就使革命能够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及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能实现不断革命的原则。这里有着右倾机会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点，是右倾机会主义跟毛泽东思想分歧的中心点之一。这个问题不仅是在 1927 年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存在，抗日战争初期也存在。

党的历史上反对过“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正确路线的分歧，在如何领导革命，如何进行革命，这个分歧涉及到革命阶段论的问题。“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特点之一是不注意革命是有阶段性的。民主革命时

期是应该集中力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企图过早超过民主革命阶段，过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危险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急于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脱离群众。就在事实上放弃了对群众的领导权。

对农民关系来说，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农民的联盟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根本不要农民，不要工农联盟。“左”倾机会主义也不懂得与农民建立联盟，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某些超过这个阶段的任务，把自己孤立起来，得不到农民的同情，这就从事实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放弃了对农民的联盟。

另外是政权问题，这个问题和革命领导权问题分不开，要革命就要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就是要使革命在胜利以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掌握国家领导权。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领导，当然也就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资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就不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他不要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是要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抬轿子。正确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在革命问题上，则一定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肯定的思想。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要走向共产主义，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对这一思想有了发展，这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可以看到，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下，可以首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然后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一定立刻实现，在它之前，还可以有一个过渡。这个思想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来，在列宁时代就有了这个经验。列宁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的时候，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是二十世纪初了，这个时期的客观情况很明显，在这时期某些国家如果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能够胜利的。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他提到在帝国主义时期，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不能够胜利，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专政是根本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独立起来的。

列宁的思想在毛主席思想里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发展是很多的，在俄国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实现的时间很短，那就是在二月革命以后两种政权时期，那时的苏维埃政权是带有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在列宁的学说里，没有指出过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样的问题。列宁只提到了工农民主专政。如果我们仅仅采用列宁的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就不够了，因为中国是一

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反帝国主义的问题，反帝就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在政权问题上仅仅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就不能完成，所以这个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情况下，就不能不有很大发展。1931年和1934年的教条主义，想简单地在中国运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他们采用了现成的书本原理，但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因此和毛主席思想有了分歧。毛主席的思想和“左”倾机会主义不同，基本上采用了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则，但是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结合表现为一些新的提法，这个提法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毛主席是非常辩证的，既采用普遍真理，又结合中国情况采取工农联盟，使工人和农民结合成为政权的基础，这样他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这个思想是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解放区能够稳固、能够发展的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就不能正确地建立当时的解放区的政权。

解放区的政权形式也是变化的，如果解放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算起，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比较接近工农民主专政，因为那个时候的农村革命，在其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起来，是1931年抗日战争以后的事情。从1927年到1931年，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跟蒋介石走，到1931年“九一八”以后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的行动改变得很明显，蔡元培是资产阶级代表，在“九一八”以前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参加国民党政权，“九一八”时挨了打，当时北方学生到南京请愿，没有找到陈立夫，陈果夫，找到了教育部，把蔡元培打了一顿。以后蔡元培竟转变了，不当教育部长了，搞了抗日救国运动，和宋庆龄一起搞民权保障大同盟，有许多人逐渐走到革命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采取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就没有办法团结愿意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1935年，我们党和毛主席，提出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这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以后，政权的内容就更广泛一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讲了抗日阶级的联合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抗日人民的联合政权。大家可以明白看到，毛主席的思想在政权问题上，是没有一点公式主义，也没有一点教条主义的。不像教条主义简单地采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来解决一切问题。

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是有一贯的线索，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提法，这些都很值得我们作为思想方法来学习。抗日战争以前有一个提法，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种新的提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新的提法。在这些提法中，有一个总的东西是共同的，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要领导，政权的基础一定是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另外参加一些革命的阶级，这些革命阶级是什么阶级，要看情况。在抗日战争初期，这些阶级包括一部分开明士绅，抗日战争以后就发生了变化，1949年搞土地改革，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了，对蒋介石政权由“洗脸”政策改变为“杀头”政策，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在后方要土改，这个时期毛主席最后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这个总路线，也就是少奇同志在庆祝国庆十周年文章里所提到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要在无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具体内容可以有变化，时期不同，政权的内容、阶级力量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政权问题，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集中问题，社会阶级斗争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权问题又是政治问题的集中点。阶级斗争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阶级关系，规定政权的内容，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使政权也发生变化。毛主席非常重视政权在解决阶级矛盾问题中的巨大作用，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和取得政权后，就把政权作为解决阶级矛盾的武器。政权的内容是跟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权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人民是有变化的，但无产阶级领导不变，工农联盟为基础也不变，在工农联盟以外，还有一些什么阶级参加政权就要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阶级力量对比而发生变化。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政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里很复杂、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思想里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怎样运用政权工具作为武器来解决阶级矛盾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主席根据中国十分复杂的情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没有解决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怎样灵活运用政权工具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都没有充分解决，马克思只是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提出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有一个工农民主专政可以作为过渡，列宁没有谈到在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可以采取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经常变化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是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实现。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政权才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主席也有很重要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是这样一点：毛主席提出了政权的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对待反动阶级的镇压的任务，一是对待人民，国家用民主的方法教育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是解决敌我矛盾，一方面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政权是解决阶级矛盾的工具，资产阶级也有政权，他用来解决资产阶级要解决的矛盾，无产阶级是用来解决无产阶级要解决的矛盾。但在阶级社会里，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时期，专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差不多就是一个敌我矛盾问题。资产阶级政权，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政权就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镇压敌人，一方面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专政的工具，又是民主的工具。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这个发展把国家的理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这也是非常伟大的创造。

无产阶级国家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两种矛盾都是集中在国家问题上来解决，这个思想的境界是非常高的，国家问题不单单是政权问题，而提到哲学高度上来理解，这个思想很值得我们深刻的加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有关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贡献，值得提出来，大家共同研究。

第 11 章 社会发展史引言

(1961.11.16)

【这是艾思奇按照中央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为 60 班学习社会发展史所作的引言报告。这个报告和解放初期所作的社会发展史讲座有不同特点，所以收入本集。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给六〇班讲社会发展史引言。这个课计划学两个星期，时间很短，我们只能讲一些要点。

1.前言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一些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学习社会科学就像学习自然科学一样也要有基本知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是数理化学自然科学发展史，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地理。

我们这门课，六〇班开始才作这个计划。本来这个课应该在学习世界史以前学习，因为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比较迟了，六〇班已经开始学习世界史，再回过头来学习也不好。本来应该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再学习世界史，最后学习中国历史。因为社会发展史是历史中最一般的东西，它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纲领，或者说提供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所以，在学习历史以前学习社会发展史比较好，现在学习历史以后再学习社会发展史也好。五九班现在就不去学习了，准备以后在学习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时候再学习。

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还有一个目的，我们的基础课世界史部分着重学习近代史，古代史、中古史就不学了，学历史专业的学习，不学历史专业的就可以不学习或者自学，不一定要专门研究，主要的是时间问题。一般基础课要把近代史多学习一些，因为这和马列主义的课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和中古史这一部分怎么办呢？就用社会发展史来代替。社会发展史这门课时间虽然短，但是它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掌握社会发展史这一门基本知识，另外还要多少代替古代史和中古史的历史知识，这是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在的讲法跟以前讲的社会发展史也有些不同。刚解放以后，我们都学习过社会发展史，那个时候我讲的很多。当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社会发展史向群众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更重要的就是介绍劳动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当时这样做是有的放矢的。全国才解放，有很多群众，很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对这些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很广泛的一门科学，要想什么都宣传不可能，因此，就宣传他们最缺乏的东西，同时又是跟资产阶级思想针锋相对的东西，就是阶级观点和劳动观点。所以，那个时候讲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的就是讲这两个观点。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者，因此我们就提出劳动创造社会，劳动创造人类。那个时候，有许多人就是不相信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不相信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历史。我们当时讲社会发展史，主要的是讲这两个观点。当时的目的跟我们现在不同。以前我们也写了一些讲义，现在就不用了，因为不太适合现在的需要。现在的任务是讲社会发展史，实际上是讲理论，并不是介绍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当然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还要注意掌握社会发展史的知识。从前我们讲社会发展史就不会介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这里面讲的东西很丰富，但一般的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让他学习这个东西很困难，当然水平比较高一点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学习这个东西。我们向一般的群众作宣传是用通俗的社会发展史的书。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材料着重是这几本书：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论国家》、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还有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了了几篇文章，这部分材料字数很少也很简单，不读也不太要紧，将来印出来发给大家。我们主要的是读这几本书，不要贪多。恩格斯的书要精读，把这个知识很好地掌握一下。这些书里主要的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材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近代史里有，所以就不必要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的材料了。时间也很短，集中读这几本书就可以了，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古代史和中古史都在这里，同时，这本书不是太容易读的，大家多花些时间仔细研读一下。

恩格斯这些著作里面，有观点、有材料，材料很丰富。从他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写文章的方法，就是观点和材料结合得很密切，不讲抽象的东西。我们的教科书在理论上作了一些阐述，但是也有一个

缺点，就是缺乏说服的材料，教科书的说服力不强。恩格斯的这本书说服力很强，每一个观点都有充分的材料证明。经典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这就是观点和材料的密切结合。所以，读这些书的时候要注意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弄清楚他的观点。他对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些基本观点，是社会史最基本的线索。对这些线索要掌握，这是最一般的，最普遍的东西。“莫斯科会议宣言”中讲到俄国革命最基本的道路有九条，这九条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最基本的观点。我们读经典著作一定要注意到他讲了一些什么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发展过程要注意到它对发展的基本线索是怎么谈的，弄清楚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个基本过程是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里面丰富的材料，对这些丰富的材料不一定要死记，读三遍也不能把这本书的每一点都记得，但是要注意这些材料是证明他的基本观点的正确，他怎样运用这些材料，怎样掌握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去粗取精地提炼出来的。

所以，材料和观点都需要注意。要着重记住他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要注意一些材料，凡是材料都有特殊性，它是从具体的、典型的材料中抽出来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抽象的说理，材料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选择出来的。恩格斯讲古代社会时，着重用了摩尔根的印第安人的材料，也综合了古希腊、罗马的材料，印第安人是活生生的还没有灭亡，希腊、罗马已经过去了。我们中国现在搞历史专业的人也可以找到活的材料，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原始社会。他利用活的材料再加上一些死的，把它综合起来证明原始公社、奴隶社会的发展。希望大家读书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的引言怎么讲呢？我感到很为难。引言要讲详细了就是讲社会发展史，要讲十几次，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不够了，同时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准备，因为还要讲别的课，没有办法。所以，现在这个引言只能这样讲：还是把我们的学习目的说清楚（刚才已经说清楚了），然后再把社会发展史的线索说明一下。刚才讲有观点有材料，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讲材料，只能讲一些基本观点、一个基本线索，作为大家读书的参考。我讲的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准备的也不一定很充分，只是把自己熟悉的线索翻了一下。根据我讲的线索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可以 clearer 一些，如果我讲错了，也可以有个对照，也有好处。另外还有教研室的同志作一些辅导，比我讲的更详细一点。我不能多讲，引言讲得多了，后面没有办法讲，讲少了也不好。不多不少比较好一些。我只准备把基本线索讲一讲。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一段话可以提出来先说明一下，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有史以前的诸文化阶段”里，把原始公社的几个阶段说的很清楚，把原始公社的基本线索也说的很清楚。在第一章最后一段，他这样讲：“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开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那它就显得太暗淡和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看见由野蛮到文明的过渡及它们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对立的全景。”(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这段话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方法。我们一般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犯一个毛病，就是对问题只要了解几根骨头就满足了，只要把教科书的基本规律了解了就以为很懂得马克思主义，或者记住几个原则，几个规律，抓几个例子作证明就满足了，像这样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作为自己的最后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把这些观点运用到某些问题、某些丰富的材料中去，把这些材料贯穿起来，把这些问题加以解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某些典型的材料加以概括总结，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列宁的《论国家》比较接近这种形式，因为当时列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作为通俗性的东西写的，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科学著作，《论国家》也是作为独立的材料。所以，大家学习这些经典著作的时候，除了注意观点以外，也要注意材料。材料不一定要死记，但是注意它怎么运用。真正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具体的，有特性的，没有充分的具体材料作为基础，要想把历史著作写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恩格斯这本书有很丰富的材料值得我们学习，材料有具体性，有特殊性，因此也有它的时间性。恩格斯所用的材料在我们现在来说就不够了，我们现在对原始公社的具体材料多得很，就是中国的材料也比恩格斯知道的多，首先，恩格斯就不知道北京猿人、我们的甲骨文，恩格斯也不知道。恩格斯的材料多数是西方、亚洲西部，伊朗、叙利亚这些地方的，有些材料也不一定都完全是事实，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他的材料也可能用错了，因为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他讲的原始社会野蛮初期到中期，西半球和东半球就不同，西半球主要是开始于谷物的种植，东半球野蛮初期主要是搞畜牧。这个材料是不是就一定准确，现在看起来就值得怀疑。中国的野蛮初期是不是就完全靠搞畜牧？我们的谷物种植很早就有了，商朝奴隶社会农业很发展，古代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材料，但是从传说来看，周朝的祖先后稷，就有皇帝教民稼穡。这说明不是从畜牧开始的。因此我们看材料不要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他运用当时所能掌握的材料来说明他的观点，而当时的材料不一定有我们现在丰富，是有缺点的，也可能有错误。提出这个问题作为大家学习的参考，研究的时候注意一下。

就是说，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是不能动摇的，当然经典著作的个别原理以及它的观点、具体材料是可以补充发展的，在很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做适当的修正。在观点问题方面恩格斯的这本书的序里讲道：“依据唯物主义的见解，历史上的决定要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品、衣服、住所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种种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属蕃衍。”（《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70页）这个观点在苏联有一个时期的认识是有错误的，认为人类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所谓人的生产就是家庭的关系，人类要维持生命也要维持再生产。苏联有一个时期认为这是错误的，后来又有争论。恩格斯不一定错，因为恩格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的是讲原始公社，原始公社家庭的关系起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问题，大体上就是这些。

下面就讲社会发展过程的线索。我讲的也是不很科学的，作为一个科学报告，就要用丰富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现在讲引言就只能讲线索。

我想分五段来讲，一、从猿到人；二、原始公社；三、奴隶社会；四、封建社会；五、资本主义的产生。

我们发的材料，除了资本主义的材料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材料没有外，其他如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了。恩格斯有一篇文章叫“封建社会的解体到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篇文章很好，最初我们作计划的时候没有找到，现在找到了，准备把这篇文章加到计划里面去。

2.从猿到人

这一段主要的是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文章，它就解决了人类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基本观点，同时，恩格斯也用他当时的材料证明了这点。

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材料来说，恩格斯当时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比起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还是很少的。比如，恩格斯所讲的猿猴将要过渡到人类的这个过渡时期，一般的生活在树上。这种猿猴现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了。但也可能找到，最近有一个消息，西双版纳又出现了野人，有人就清楚地看见了，全身有毛，下巴有胡子，这说明地球上还有野人存在。云南人从小的

时候就听说有人熊，和人一样，就是全身有毛，很厉害。这种野人跟猿猴不一样的两膝直立，跟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全身有毛，头也比人大得多，手像人。这个材料可能要比恩格斯当时知道的多一些。就基本观点来说，恩格斯在文章里首先肯定：人是劳动创造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第一段就讲：“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80页）人类一开始就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而不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不是依靠自然的条件而转移。这个观点说明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也是恩格斯第一段讲的，“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就是说，不仅是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自有人类以来，劳动就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乐生的第一需要。没有劳动就不快乐，劳动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是这样一种看法。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认为劳动是愉快的事情，共产党员认为没有劳动就不愉快，有些修养不好的共产党员也不一定这样认识。马克思根本没有讲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如果讲到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此，这是很清楚的，不劳动就根本不能活下去，没有劳动什么都没有。关于这点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说的很清楚。“每个小孩子都知道，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工作，一不用说是停止一年，就是只停止几个星期一就会饿死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462页）现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就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了。这种提法中国有，苏联也有。苏联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提法，把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看成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就要强调劳动是人类生活第一需要这个观点，向知识分子、群众宣传劳动观点，特别是劳动态度问题，不是都解决了的，许多人劳动观点也没有很好地建立。才解放的时候，我们大力宣传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都解决了，但是不一定全部解决了。学习“从猿到人”，第一就要学习劳动创造人类，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个观点。

劳动是怎么创造人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这点恩格斯的著作里也作了回答。劳动创造人的过程是猿猴出现了手和脚的分工，猿猴最初还是生活在树上，树上的生活必然引起它的手和脚的分工，到了接近于人的时候，手和脚

就出现了分化，真正的人出现了，手和脚就开始完全分化了，能够直立走路，手就摆脱了行走的负担。所以，恩格斯讲：手和脚的分工对从猿到人有决定意义。从猿到人的过渡起决定作用的，是手和脚的分工。

这里我们要讲到，过去有些不很准确的想法，认为从猿到人的转化是从一把石刀开始，决定的一步是把石头能制造成石头工具，这个看法不清楚。恩格斯这里很清楚地讲，从猿转变到人决定的一步并不是制造石刀，而是手和脚的分化，这是起决定作用的第一步。当然制造工具也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制造工具并不是第一步，第一步是手和脚发生分化，这一点要搞清楚。

有了手和脚的分化就开始向人类走出了第一步，为什么说手和脚的分化猿就能开始转变为人的第一步？因为手和脚的分化人类就有了经常的劳动，用手来进行劳动。这样手就能在长时期受到训练，能把石头制造成工具，最初是利用现成的工具，经常用手使用工具，然后才能制造工具。所以，在人类没有制造石头工具以前，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的开始是手和脚的合作，使猿开始向人过渡，能制造石头工具就是更进一步成了人。以前我们不大注意这点，认为从猿到人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没有注意到制造石头工具以前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中间有相当长的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章蒙昧时代这段讲：人们住在森林里，以采集果实为食物，开始能说话这个时间很长。这里没有讲到制造石头工具，而且他在这段最后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过渡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它还不是人，但已经向人的转化走了第一步，它是人，但还不能制造工具，所以说它是过渡阶段。

所谓过渡阶段，就是已经开始可以算作人类历史了，但是还带有过渡性，还没有完全脱离猿类的性质，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不能不记录这一段。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往往要有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还要有过渡阶段吗？现在有大过渡有小过渡，小过渡就是由几种所有制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大过渡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每一种社会形式的转变过程中总有过渡阶段，但是过渡阶段的开始也就可以说是新的阶段的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不能不把过渡阶段算在一起。过渡阶段有时包含在旧的历史时期，有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蒙昧阶段的低级阶段，没有完全脱离猿类生活，但是已经应该算在人类历史的开始了。

我很希望云南野人的确是事实，那将对人类历史有很大的贡献。很可能是事实，按照恩格斯这本书来讲，人类的祖先最初是在印度洋，一百多万年前后那一带是陆地，人类的祖先就是在那个地方生活，后来那块地方沉下去了，就变成印度洋。所以，人类的祖先就会在印度的周围存在下来，很可能是最原始的人类遗留下来的。我们最近人类学和社会学有争论，是关于有没有旧石器的争论，肯定有旧石器的就是发现北京猿人的斐文中提的，所谓旧石器就是在整个石器以前还有旧石器，这种石器还不算人创造的，但是多少也创造了一些。贾兰坡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没有。两个人的争论涉及到北京猿人时期是不是有旧石器。按照恩格斯的这种提法，旧石器这个阶段的存在应该肯定下来，比较恰当，就是说有一个过渡阶段，介于能制造和不能制造之间。那个时候也使用石器，但是比较没有规律。所谓石器时代是两个阶段：一个旧石器时代，一个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之间当然还有很小的阶段。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表面很不光滑，叫打击石器，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后来一个时期，就能把石器磨的比较光滑，这就是新石器时期，这要有一定的技术，要能掌握技术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整个石器以前，还有一个长期使用石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不是就叫旧石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过渡阶段恐怕是要肯定的。

在这个过渡阶段，类人猿在生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和脚的分工，手越来越巧，脑子也就发达了，由于劳动需要互相交换意见，语言也发生了，由于直立行走，语言的气官就发达了。这些就是由猿到人发展的第一步，也就是由猿到人过渡阶段的一些基本变化。

3.原始公社

原始公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现在看起来至少是五十万年。这样长的时期，人类劳动技术逐渐进步，首先是创造工具的逐渐进步，然后寻找食物也跟着逐渐进步了。恩格斯引用了摩尔根的一句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的第一章史前文化阶段中的第二段，恩格斯说，摩尔根把人类分成几个阶段即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依照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他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个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所说的，‘这一生产上的技巧，对于确定人类凌驾和支配自然的程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对于食物生产进行几乎无限支配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184页）

所谓无限支配，原始社会就能无限支配，但是原始公社还是有很多变化的，这个变化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又由低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这些阶段都跟生产的进步有分不开的关系，首先是跟生产工具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社会的发展是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首先又决定于生产工具的发展。斯大林的这句话还是对的，生产发展开始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开始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工具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生产力才能提高到一个新的进一步的阶段。

我们要注意对原始公社生产和生产工具的看法，我们一般认为原始公社的工具是石头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对的。比如，原始公社的生产工具主要的是石头工具，但是不仅仅是石头工具，如果简单地仅仅依靠石头工具的情况来划分原始公社的发展情况是片面的，石头工具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还有其他工具，也应该算在研究原始公社的发展情况里面。把原始公社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是最粗糙的划分。旧石器时代就是蒙昧时代、新石器时代就是野蛮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仅仅靠石器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其他工具。比如使用石器的低级阶段，说不上制造石器，最初是不是使用石器也不能说，还没有一个基本的工具，当时的工具可能还是比较乱的，有石头的也有木头的，使用的工具也不能很有规律。所以，斐文中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是不是准确？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经常使用一种工具还是个问题，或者它在末期使用石头比较经常，经过很长时期的经验，它感到石头是最好的。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旧石器的说法是准确的，这个问题要经过科学研究最后决定。

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开始有石器了，主要是根据摩尔根的划分，这里讲到的石头工具问题就是旧石器。“早期石器时代底粗制的、未加琢磨的石器，即完全或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所谓太古石器时代的石器，广布于一切大陆上，它们就是这种移居的证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85页）那个时候，它们在树林里，到处都有石头，我们中国大陆上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这个时期除了石器以外，还有棍棒与戈矛的发明，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打猪打鱼了，这个变化和发展又是人类支配自然的决定性的一步，由于钻木取火而得到了新的食物。所以，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由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有了火和石器基本上实现了人类社会。

从弓箭的发明开始，就是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在原始社会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了。但是这个时候还不知道陶器的技术，陶

器的发明也是划分原始公社很重要的标志，有了弓箭，生产力发展了，打猎也比较有把握了，生活也就比较安定一些了，就发生了定居村落。原始公社的野蛮时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新石器时代)除了石器经过琢磨，拿在手里比较灵活以外，还发明了陶器。由于陶器的发明，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由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了(野蛮这个名词是恩格斯借用摩尔根的话)。野蛮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化，在制造陶器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画在陶器上。

野蛮时代也分三个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恩格斯讲，在这个时期东大陆开始搞畜牧，而西大陆即美洲开始种植谷物。这时生活就可以安定下来了。蒙昧时候主要是靠打猎打鱼来生活，不能掌握种植，主要的是靠采集现成的东西。到了野蛮时代，就把动物变成家畜，把野生的植物变成了种植，逐渐有了畜牧和种植，经济上的社会分工就有了，有两种生产就有了两种分工。恩格斯划分西半球和东半球，划的太大了一点，在东半球有的地方搞畜牧，有的地方就搞种植。中国有两大皇帝——神农和伏羲，神农讲种植，伏羲教民畜牧，不一定有这两个人，但是这两种从事是有的，种植谷物传说是在野蛮时代。有种植是不是就叫农业也很难说，主要的生活是靠种植和畜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生活就比较安定了，人口的繁殖也多了，逐渐范围就扩大了。搞畜牧的活动性比较大，搞农业就比较安定，不过最原始的社会也不一定安定，今年种完了这块地收获了，明年就不种了，再种第二块地，原来种的那块地再长出东西来就烧掉，这叫“刀耕火种”。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到解放后还是用这种方法。有了畜牧和农业，人类生活比较固定了，能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时期建立村落，因此，文化也就可以发展了。

在野蛮的中期，种植的范围逐渐扩大，村落也就越来越大，集体也越来越大。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可以建立类似城堡的东西。人类的冲突也越来越多，建立堡垒来防止侵略，这是从经济方面、生产方面来讲的。

要研究社会发展的问題，一方面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时还要研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首先要研究生产是怎么发展的，生产发展的阶段怎样?恩格斯讲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主要是讲生产发展的各个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恩格斯讲：这幅图画是太暗淡和可怜了，并不能把原始社会全部图画丰富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研究原始公社，除了研究石器工具的发展外，还要研究其他工具的发展。原始公社最主要的是研究家庭的发展，这种家庭的组织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原始公社

氏族社会内所包含的成员都是有血统关系的，不同血统的部族不能结合在一起，因为不这样，他的生产就没有办法，不同的氏族，不同的部落要有冲突，在氏族内是原始共产主义，部落与部落之间有时就有冲突，那就是另外一种共产了。在原始公社里，家庭是生产关系所依靠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庭也有上层建筑的一方面，整个原始公社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家庭组织的上面，当然整个社会组织不一定是家庭，这是社会的管理组织，不是国家。但是家庭代表一种上层组织，在上层的关系中家庭的形式是最根本的东西，它包含一种上层关系的因素。所以，研究原始社会，不要只研究它的石器，还要研究它的陶器。两种陶器的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讲两种陶器时期，仰韶的陶器是有色彩的，灰白的底子涂上一些色彩，龙山的陶器是比较黑的陶器，比较进步，耐火力很强。这是表明两个阶段的陶器。划分这个新的时期，不能完全靠石器，还应该考虑陶器的不同。有人说，仰韶文化是表示夏代，龙山文化是表示商朝，还有不同的说法，不能最后确定。商朝里陶很多，殷墟挖出来的东西很多是黑陶，但是也有彩陶，这些问题还不能最后确定。陶器是很重要的东西。

除此以外，还要研究家庭关系，恩格斯这本书很大部分是说家庭关系的。在研究野蛮时代人类家庭关系时，他讲了三种家庭形式，最早是杂交时代，然后是对偶的形式，最后发展到一夫一妻制。这就是由最原始的杂交逐渐发展到最后的一夫一妻制。人类最初的婚姻是杂交，这跟生产力的发展有关系，这个关系恩格斯没有具体的讲，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线索去研究。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认为人类一开始就应该是一夫一妻制，恩格斯证明这是错误的。人类一开始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群婚制，那些学者是按照自然界的动物就是一夫一妻制，他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是进步，恩格斯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恰恰相反，群婚制正是一个进步，是人类脱离动物的进步。人类需要组织社会，动物就很难组织社会，人类要使生产发展就需要共同劳动，就要有共同的社会生活，这就要克服一个问题，在婚姻关系上由于互相嫉妒发生不利，要克服这一点，就要把群婚制作为一个社会合理的制度肯定下来，使大家都承认，这样才不至于在婚姻上的嫉妒而破坏社会。

动物的特点就是有时在交尾的时候有嫉妒，说明动物成为巩固的集体是不可能的。动物有一夫一妻制，有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都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恩格斯讲到动物有一夫多妻制，但是没有讲到一妻多夫制，这个材料不完全正确，比如一个蜜蜂群就有一个雌蜂。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各种家庭形式，但是最初人类的家庭是群婚制，由于生产特别需要集体，越低级的生产越需要集体生产，因此更需要这个集体不要有任何破裂的因素。最初在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如果群婚制不能巩固，嫉妒的因素就很难去掉，这是恩格斯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明原始社会的人类有这种需要，这种制度跟动物的群居根本不同，人类一开始的家庭就由生产来决定的，这种形式就跟动物不同，动物是由自然条件来决定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由于生理条件不同，它的组织形式也就不同。而人类社会的集体决定于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决定于生产的形式。所以原始社会最早的杂交时代，到对偶的形式，最后到一夫一妻制，都是跟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按照恩格斯的材料，血缘家庭是家庭的第一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行区分的，同一家庭范围内所有的祖父和祖母，都是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都互为夫妻，……所以，在这种家庭形式中，只是在祖先和子孙间，在父母和子女间，才不容有夫妇间的相互权力和义务，兄弟姐妹都可以互为夫妻。

大体上是这样，对偶形式以前是属于蒙昧时代，对偶形式产生以后是野蛮时代。这个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发展了，而且有了手工业，开始能炼金属了，能炼铁了。这个提法恐怕还不能成为普遍规律，因为他掌握的材料是希腊罗马的。按照别的民族的情况来讲，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还不能炼铁。我们中国的商朝已经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了，还不能炼铁。农业发展了，特别是畜牧上比较发展了，可以由大规模的集体耕作过渡到少数人搞一个犁来耕作。这时候一个小的家庭单位也可以种一块地，(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种地和畜牧是大片的，到了高级阶段就要分开来)分配关系必须是小的家庭单位，就叫农村公社。整个土地是民族的，分成一块块给各个小家庭来使用，使土地逐渐发展为私有，由小家庭的范围来掌握，工具也就由小家庭的范围来掌握，逐渐向私有方面过渡，土地也由分配使用过渡到私有。畜牧也可以由小家庭来放牧，这时，财产的私有制就产生了，因此，一夫一妻制也出现了。一夫一妻制以男性为主。原始社会有两个阶段，母系氏族是蒙昧时代，到了野蛮时代就过渡到以男性为主。男子的劳动变成中心，这也要看阶段，初级阶段女性的地位比较高，后来就逐渐降低，由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对偶制变成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社会组织最主要的形式，它跟生产关系联系着，同时又是一种上层社会的关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原始公社发展的线索就是这样。

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是原始公社的生产发展的最高的阶段，主要是有了畜牧和农业的分工，也有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产生了一种因素，促进了私有财产的发展，主要的是交换，因为两种不同的生产分工了，就产生了交换，这个交换就产生了私有制的观念。开始只是氏族长掌握一些私有财产，后来生产本身也逐渐要求私有制，交换的前提就是承认私有，不承认私有就没有交换，有了私有制就有了交换，又使交换更进一步发展，同时，私有制、交换又产生了战争和冲突。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以前，原始公社部落也有冲突有战争，但是这种战争是偶然的，不是经常起作用的事情，到了高级阶段末期，开始有了一个引起经常战争的社会因素，真正的战争是在原始公社末期，随着私有财产而引起的。当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除了自己生产以外，还可以经过掠夺得到财产。我们认为掠夺是坏事情，但是当时认为是高明的事情。因此，部落之间逐渐发生了经常的战争，这时部落中就有一种专门靠打仗来生活的人，这些人逐渐变成专门担负战争的人。所以野蛮时代末期，人们把打仗看作是高明的事情，社会的转变是通过暴力，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虽然不是经过阶级斗争，但是经过战争，越是末期战争越多，这个战争就摧毁了原始社会制度，产生了阶级制度，专门以打仗为职业的人逐渐变成贵族，变成了氏族的领袖，逐渐变成压迫其他群众的人。

4. 奴隶社会

原始公社末期已经产生了阶级社会的动力，出现了私有财产，产生了阶级的因素。这个动力是部落的战争，这种阶级制度的因素是暴力，一直到出现奴隶制社会(应该叫奴隶占有制社会)。这个社会是以占有奴隶为特点的，整个奴隶社会的出现到建立起来，需要较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主要的工具是金属工具。恩格斯这本书里说的主要是铁器，这个提法在历史材料上不能概括东方，埃及的阶级社会比中国还早，但那个时候还没有铁器。中国的殷朝已经用铜器了，能够大量的炼铜。奴隶社会的生产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正式开始，以金属工具为主。生产力的形式除了农业、畜牧业以外，还有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力比较高，所以剩余劳动也比较多，因此就使奴隶的使用成为可能。

奴隶社会的出现是经过这么一些阶段的，首先是在个别家庭中使用奴隶，这种家族奴隶在原始公社末期也有，并不是大规模的集体使用，在生产上也不是主要的，只是家庭的帮手，主人也劳动，这叫家农奴，但不是奴隶占有

制社会。真正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开始于集体使用奴隶，从把奴隶组织起来专门搞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奴隶劳动的使用成为正式的单位，这样才有奴隶占有制社会。总的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东方比较流行，像中国、印度等，这样的形式使用奴隶的范围不是最普遍的，主要的是在统治者手里，一般的社会生产不是奴隶担负，还是农村公社，组织在公社里的一般是自由民，偶尔公社里也有奴隶，但不是普遍的。只有国王以及他的周围统治者才大批的使用，主要的是手工业生产，所以，东方的王权之多是这样建立的，这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是公社的残余。马克思把这种奴隶占有制社会叫做幼年时期。

我们中国的农村公社残余一直到解放以前还有，这种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这句话就是表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把天下的土地作为王的土地，一般的农民在王的土地上、在公社组织里进行劳动。这个王有权把土地分配给任何人，这种制度的残余流传到很久，所以土地基本上是国有制。这和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国王、贵族向各个公社的贵族征税，公社的贵族受剥削，但他同时又大批的使用奴隶。在埃及搞金字塔，中国搞水利，没有大规模的奴隶是不行的，青铜没有奴隶也不行。中国的殷商王朝就是一个大奴隶主。希腊、罗马是更进一步的奴隶制度，农村的贵族是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贵族，国王一方面剥削农村公社，另一方面又剥削一部分奴隶。

后来，希腊出现了一部分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不经营土地，他们认为王权制妨碍工商业，因此，这些工商业奴隶主就对公社贵族进行斗争，把希腊的土地贵族推翻了，这些贵族垮台了，把土地分给自由的人。这样，希腊、罗马的公社制残余就垮了，王权所有制也没有了。这时工商业平民就变成统治者，奴隶仍然是被剥削阶级。像奴隶社会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因为它把公社制完全打垮了，然后建立了一种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跟西方的不同，因为它建立在公社制的基础上。希腊、罗马打垮了公社所有制以后，产生了奴隶占有制，把君主制也打垮了，最初希腊、罗马全部是奴隶主民主制，在法律上跟资产阶级民主制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古代罗马奴隶主的法律又有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就法律来说给它许多限制，因为他打垮了贵族以后，工商业者跟土地贵族有矛盾，所以它需要这种民主制度。早期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建立的。

大体上奴隶社会就是这两种类型，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要注意这点。

第二次讲课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

今天上午我们讲到奴隶占有制社会，主要是讲经济基础问题。奴隶占有制的所有制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国王以及贵族大规模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原始公社结合起来的制度，这是东方的形式，另外一种是比较典型的希腊罗马制度。把农村公社完全破坏了，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主要的制度是奴隶主所有制，同时有小农、自由民。

希腊、罗马这样典型的奴隶制在世界上比较少，在奴隶占有制社会比较占统治的大多数是东方的情形。亚洲、非洲历史上的奴隶占有制都是这样。马克思曾经说：奴隶占有制，很难掌握一些经济本领，即使是在统治的时候，它要占领一切经济本领是比较困难的，总是跟别的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像希腊、罗马这样典型的奴隶制度比较少，在历史上看起来只有那样一个典型。建立这种奴隶制是经过带有革命性的斗争，就是工商业奴隶主跟原来是自由民后来又变为奴隶的这些人结合起来，推翻贵族、国王这些人才建立起来的。有许多国家是这样：等到奴隶起来奋斗，工商业者起来反对贵族，经过这样的斗争，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多半贵族的奴隶主进行斗争以后，仍然建立起一个新的奴隶占有制社会，这种情形就是希腊、罗马制度。除了希腊、罗马在奴隶制的基础上产生民主制度以外，在别的国家没有这种情形。所有其他国家的奴隶社会也是君主制度，中国、东方的埃及等都是君主制。像希腊、罗马这种制度，在奴隶占有制下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才能产生。那两个国家有一定的特殊条件能够促成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在海岸线上的国家，在地中海、商业来往比较方便，在陆路尽管交通很发达，但是比起海上还是困难的。古代希腊、罗马交通方便促成了工商业者这个阶层的发展，有能力把贵族奴隶主推翻。贵族奴隶主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它掌握大批奴隶，有很强的武装，要把它推翻也不是很容易的，必须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经济很发达才有可能。所以社会发展地理条件有时起一定的作用。当然地理条件对社会是外因，不起根本的决定作用，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起决定作用，不是决定社会制度，而是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快慢在某种程度上有决定作用。我们中国很早商业就较发达，但是不可能像海上商业那样发达，中国工商业势力在封建社会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商朝的时候，就能够把贵族奴隶主的统治推翻，但是没有建成工商业奴隶主的国家，它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在奴隶社会里面就有阶级斗争，原始公社没有阶级，所以在奴隶社会就要谈阶级分析的问题。现在我们讲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阶级，基本上是奴隶主和奴隶。但是每一个阶级社会除了基本阶级以外，还有其他阶级，如果认为一种阶级社会只有一对阶级，那就太简单化了。分析具体的历史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一般的分析也要注意这一点。

奴隶占有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但是奴隶主又分成贵族地主，这种奴隶主和原始公社结合，和农村公社有关系，这一批人是从农村公社的氏族领袖，军队指挥那一批人来的。在原始公社末期专门带兵指挥打仗的，他原来是氏族的族长，在氏族里面就很有地位，还有祭司。氏族长、军队领袖在原始公社末期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脱离一般人而成为特殊阶级，最后变成统治阶级。贵族为什么叫贵族？因为它从原始公社的时候，就继承了在当时社会认为比一般人高贵的生活。这种阶级和原始公社有密切联系，它需要维持原始公社的残余，因为它是从那里来的，不打倒这个阶级，原始公社的残余就不能消灭。此外有工商业奴隶主阶级。

除了这些以外，下面就是被压迫阶级，首先有奴隶，除了奴隶以外，还有自由民。这也是两种，一种是如果公社制度没有打垮，组织在农村公社里面，那所谓自由不是完全自由，是受公社的限制，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在公社里面进行劳动。这些人名义上是有自由的，实际上要向贵族、国王交纳贡税，不是交纳地租，但是国家要向他收贡税，打仗的时候要征兵，征兵也是依靠他们。中国古代古书上讲叫国人，春秋战国都讲国人怎么样，国人大概是指一般的自由民，不是讲贵族，也不是讲奴隶。是政治上有一定的独立，但还是受剥削的自由民。另外一种自由民是希腊、罗马那一种，公社垮了，有一些土地、也有个体手工业者，按照他劳动的情况，有一点像封建社会的个体农民，实际上是受奴隶主阶级剥削。但跟封建社会的个体农民还是有所不同。封建社会的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农民不同，按照劳动来说是个体的，但是他在不同社会受的剥削不同。奴隶占有制下的农民，很容易破产，破产以后很容易变成奴隶，或者是变成了流氓，这是古代的无产阶级，这与现在的工业无产阶级不同。那时的无产阶级是破产的自由民，不劳动，在城市里游来游去，为非作歹，如果说找到了职业，那是奴隶主把他收下来了，或者是当兵，或者是帮奴隶主作坏事，当走狗，或者是讨饭。流氓无产阶级在奴隶社会里面就有了。马克思曾经说现代无产阶级是社会依靠它生活，但从前的无产阶级是依靠社会生活，奴隶占有制社会大体上有这些阶级。那一本书上讲到富人和穷人，实际上是自由民里面的富人和穷人。自由民的富

人变成了奴隶主，穷人就是自由民，自由民要破产，或者变成奴隶，或者变成流氓无产阶级。这是奴隶占有制社会一般的阶级情况。除了基本阶级以外，还有这样一些主要阶级。

奴隶社会的发展，是在这些阶级的斗争中，通过阶级斗争发展的。奴隶暴动的主力是奴隶，但是参加的常常有一些自由民。暴动的势力大起来了，由于自由民无产者参加进去，各地奴隶暴动的形式不同，欧洲是通过宗教——基督教来组织奴隶暴动的。基督教最初是代表奴隶的，在底下组织奴隶，奴隶主就利用这些流氓来打击暴动。有一些是没有通过宗教，斯巴达克领导的进行了几十年的那一种暴动就没有通过宗教。基督教产生以后，通过基督教组织奴隶，穷人反对罗马帝国的奴隶主统治。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垮台，主要是由于奴隶的暴动，这一点是肯定的。

奴隶暴动在欧洲的历史上很清楚，斯巴达克是奴隶自己组织起来暴动。但东方奴隶暴动在历史材料上看不清楚，比如中国历史上有奴隶暴动没有？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的。商有一些清楚，纣王垮台与奴隶暴动有关系，周王伐纣，纣王的军队倒戈，没有怎么打就垮了，纣的军队是奴隶。中国和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的奴隶主不要奴隶当兵，所有当兵的人都是自由民，或者是流氓无产者。殷统治者的垮台，就是把武器交给了奴隶，打起仗来碰到强敌就倒戈了，这也是一种奴隶暴动，但不是直接的。利用奴隶来打仗，在中国历史上时间相当长，秦已经是封建社会了，但是奴隶社会的残余很浓厚，秦始皇把反对他的人，当奴隶使用，把七十万人集中到咸阳建阿房宫，集中起来建坟墓。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第一年就碰到陈胜、吴广起义，很多地方闹起来，那时关中已经招不到很多兵了，提了一个建议把修阿房宫的七十万人免役当兵，后来秦二世接受了这个建议，带兵打了很多胜仗，打败了陈胜、吴广，项梁最初打了两个胜仗就骄傲起来了，后来把他打死了。中国历史上有罪人、奴隶用来当兵，把武器交给他，可以打胜仗。纣王也是用奴隶，秦始皇时不完全是奴隶。纣王时完全是奴隶，他在东边打东夷，在山东、苏北打了很多胜仗，也不是完全失败的，后来碰到周王，他败了。所以奴隶主要依靠奴隶，奴隶起来反对他，他就要垮。

中国关于正式奴隶暴动的材料没有很明白的记载，旧的历史家就是不愿意记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春秋战国的时候，有盗跖、庄骄，这两个人是奴隶暴动的领袖，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关于从什么时候有奴隶暴动，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从春秋起，有

的说从西周起。这时应该有奴隶暴动，但历史书上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有一些关于盗跖、庄骄的传说。盗跖在北方像山西、陕西、河北这一带，在当时的赵、鲁、齐；庄骄是在南方楚、吴、越。古书上把这二个叫坏人，有的说他们是强盗，有的记载说他们带头反对奴隶主，有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有许多传说。究竟有没有这个具体人？很难讲，这两个人的名字特点都有“足”旁，表示本领很强，矫本来的意思就是跑、跳。关于这两个人的传说，很多国家都有，究竟是在哪个国家？不清楚。把这两个人各当成当时奴隶活动的典型代表，可以认为是合理的，许多国家都有这种传说。那就是说许多国家都有奴隶起来反抗的问题。全国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可能没有，因为要是全国性的活动，不能不记载，尽管是反动的历史家也不能不记载，因为他首先记载统治者怎么压迫，那一定要讲被统治者怎么反抗。秦汉以后，关于奴隶暴动有记载，最大的是黄巾、赤眉，不记载历史就没有办法写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国家是割据性的，大暴动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事，而且春秋战国时打仗很厉害，各国之间的战争，掩避了奴隶暴动的活动。一部分奴隶要起来反抗，统治者把他们组织到军队里面去，把对内斗争转移到对外，这一点可能用来说明当时没有大规模奴隶暴动的原因。春秋战国时各个国家打的很厉害，打的原因一方面是要抢东西，另外一方面可以转移内部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明确的奴隶暴动没有记载，只有这样一些传说，这也不能因此否定奴隶社会的垮台不是由于奴隶暴动的作用，这个作用还是根本的，尽管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暴动，不管暴动的力量转移到对外战争，吸收一部分奴隶变成军队，对他们思想进行一些宣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有一些爱国的宣传，可以把他转移到这方面，这种转移也说明反对外国间接对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垮台起了作用，因为对外战争一方面可以比较缓和奴隶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战争越打越大，最后产生了秦的统一。战争打得太久了，打上几百年，各国都民穷财尽，就需要休战，需要一个强国来统一，这样就形成了秦朝的统一。这也说明了奴隶反对奴隶主是根本问题，春秋战争产生奴隶制垮台，经过春秋战国完全过渡到封建社会。

所以，奴隶占有制是通过奴隶暴动垮台的，这是一个根本规律。但是运用根本规律来解释具体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表现在希腊、罗马很明白地出现全国性的奴隶暴动，因为罗马帝国本来是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因此，他的奴隶暴动也是全国性的，统一的。表现在中国西周的春秋到战国，它是一种零零碎碎的，那种与奴隶主的冲突没有汇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暴动来整个打垮过去的社会制度，但是它间接地起了作用，对由奴隶占有制到封建社会的

过渡起了作用。过渡是逐渐的。罗马是一下子垮台的，经过几个奴隶暴动，再加上外来的日耳曼民族的侵入，就垮台了。

5.封建社会

根据我们上面所讲的情况，封建社会的产生按照一般规律来说，都是从奴隶占有制社会垮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垮台以后，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至于转变的情况，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东方、西方很不相同。关于不同的地方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一个是经过奴隶暴动，很快地、比较激烈地发生了转变，这是西方的情况；东方是经过一些零零碎碎的奴隶的暴动，经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样，就由奴隶主阶级逐渐转变为封建阶级。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一部分逐渐转为封建地主阶级，一部分经过战争垮台了，这和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看到奴隶暴动太厉害了，利用奴隶不太容易，于是有一部分奴隶主把土地给奴隶种，奴隶每年交80%以上的收成，这种制度叫“殖民制度”。这个名词现在用来讲帝国主义，中国叫隶农，是带奴隶性的农民，在法律上还是奴隶，可以卖掉，也可以杀掉，但是有他自己的经济。这种奴隶制度就是封建制度的萌芽，这是在奴隶占有制社会里面产生的封建社会。所以，封建社会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在奴隶社会里面就有了它的因素。

在中国这种隶农制度可能采用的比较更普遍一些，春秋、战国的过程，使奴隶大批地变成了隶农，后来奴隶主逐渐变成了封建地主。奴隶主采用这种办法也可能缓和了奴隶暴动。所以，这也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全国性的大规模奴隶暴动没有发生的一个原因。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提供大家作为研究的线索。所以奴隶主阶级自己变成为封建主，而且在中国更比较广泛，这样使得奴隶占有制社会逐渐过渡到封建统治社会。

这个转变整个周朝是八百年，如果单算春秋战国也有五百年。春秋从三家分开起有一百五、六十年，战国三、四百年，西周二、三百年，在这六、七百年中间，一步一步转变的。这种转变之所以有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形，商朝的奴隶制度是和农村公社结合的，农村公社基本上没有垮台。周灭商以后新建立的国家，也是在大量的农村公社基础上建立的。周王灭商以后开始搞封建，封功臣、地主贵族子弟到各国去做诸侯，比如把姜太公封到齐国，把功臣和亲戚封到那些地方去统治那些农村公社，收取地租、赋税，另外也掌握一部分农奴，西周的文件里面还可以看出大批的奴隶买卖。统治者手里

有大批奴隶，另外向农村公社征取赋税、征兵，有时候征劳力，比如筑城、修河，除了奴隶以外还要征一些自由民。当时分公侯伯子男，一个侯要统治万户，子是几百户，称子的是贵族里面最低的一级，孔子是称子，没有什么财产，但是有一些身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占有一块块的土地，建立一个个国家，为封建制度开辟道路。所以，西周至少为封建社会开辟了道路，如果我们要说西周是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开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虽然西周一开始还是奴隶制度，但是把整个统一的国家分成一块一块的诸侯国家，为过渡到封建社会创造了条件，土地由国有，逐渐变成为一块一块的地方所有，先是诸侯所有，后来土地逐渐转到地主阶级手里。

欧洲的封建制度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形。日耳曼把奴隶制度打垮以后，它把功臣封到各地去统治。日耳曼当时也是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它把功臣封到一块一块的地方统治，这样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欧洲也有过渡，罗马经过一、二百年，灭亡是在六世纪，到八世纪才变成典型的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比较早，西周是公元前九百多年，离现在差不多是三千年以前，西周灭亡到秦是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从秦算起也有三千年左右。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最早，至少是创造了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条件，西周也许可以说不是封建社会，但是西周是为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过渡的情形，现在我们中国历史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原来各个诸侯还是奴隶主，他的土地是由周室分封的。诸侯下面有一些大夫，这些人后来帮助诸侯治理国家，他自己也开辟土地，他就积累了很多自己掌握的经济，开始的时候是帮助诸侯来开辟的，后来大夫出了力，自己就占有一些土地，这些土地逐渐变成为带有封建性质，他们采取这种办法使得他们的经济力量比他原来的头子更强了，后来这些大夫起来把这些诸侯推翻，上升为诸侯，后来索性自称为王。这种情形最显著的是晋国，春秋战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原来晋是周室封的，姓姬，到了春秋时候，看下面几个大夫强起来了，有姓韩、赵、魏、范、知、荀，相互之间力争土地，有的被打败灭亡了，韩、魏、赵三姓强大起来，把知、范、荀的土地分了，事实上是把整个晋国的土地分了，于是晋变成了赵、韩、魏三个国家，原来三家都称子，比如韩宣子，后来他们强起来了，就要求周王升级，周王没有办法，就答应了。《资治通鉴》第一条就讲三家分晋。《左传》是记载春秋历史。《资治通鉴》是从战国开始，第一条就是周王承认三家分晋。后来司马光讲了一些道理，说周王这样做不对，国家要讲理法，三家分了地已经有罪了，你周室还要承认他，这是周

之所以灭亡的一个开头，你自己破坏了自己的纪纲，一个统治者自己破坏了自己的纪纲就要灭亡。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大夫代替了诸侯，齐也有这种情形，齐国原来姓姜，到了战国初期，一个姓田的大夫起来把姓姜的打垮了，自己做了齐王。政治上的变化，反映了经济上的变化，到了战国末年，诸侯差不多都换了班，最后秦始皇把六国灭亡了。秦没有换班，就是他原来的统治者不断地采取改良的办法。秦之所以强，就是他从春秋起就采取了一个改良办法，在春秋的时候就用了个百里奚实行变法，战国的时候实行了商鞅变法，也是在秦国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逐渐使秦国过渡到封建社会。

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分期，秦、汉是封建社会，这种看法是比较妥当，大多数历史家承认这种看法。尽管秦汉以后还有一些奴隶残余，但是应该说是正式的封建社会。有一些历史家认为一直到南北朝才转变为封建社会，这种看法理由不多。苏联认为东汉是向封建社会转变的一个关键，理由也不多。毛主席的书里就从周秦算起，说周秦以来，二三十年，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毛主席这个看法作为总的方向是对的。秦汉以前是一个过渡。一种社会形态开始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所以，从西周算起也不一定完全不正确。从春秋战国算起，是郭沫若的看法，他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我们的教科书采取这样的看法。范文澜、吕振羽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从猿向人过渡，就可以算人的历史；由奴隶向封建社会过渡，在讲封建社会的时候，一定要讲他过渡的那一段。所以，毛主席的讲法是正确的。

上面讲到封建社会的产生，转变的过程，东方与西方有所不同。印度我们没有研究，是不是有一些像中国？不知道。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快慢问题。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大家是知道的。首先，是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制度；另外，是农民对部分土地和生产工具的个人所有制。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封建社会里面还有工商业活动。手工业经济在封建社会里面带有封建性，这就是说，由于手工业是被地主阶级所掌握，是地主阶级所有，或者是开有手工业作坊的师傅，用封建形式占有生产资料。封建所有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人身的部分占有；反过来说，劳动者对地主阶级，对剥削者有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就是对人身半所有，和奴隶有一些不同，奴隶是完全属于奴隶主的，奴隶对奴隶主有人身的完全依附关系，完全属于奴隶主所有。封建社会的农民，还有封建的地主阶级掌握下的手工业的劳动者，他们在人身上归地主阶级部分所有，他在人格上，人身方面是隶属于地主阶级。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主要区别

是奴隶主对劳动者的全部所有制，完全占有，而地主对农民只有部分占有，在人身上要服从他的支配。地主对劳动者有支配的特权，除了向他收租以外，还可以任意使用他的劳动，还可以加以买卖。一部分封建国家可以买卖农奴，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农奴是可以买卖的，甚至可以转赠给别人，地主送土地给别人，连农民也送去，可以买卖，可以赠送。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没有买卖农奴的情况了，东汉光武帝禁止买卖农奴。所以，从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认为买卖人口是合法的。但是，赠送土地连农民也跟着赠送去是合法的，至少是最大的地主，比如皇帝是地方上的大奴隶主，可以把土地连人口一起赠送。因此，买卖名义上只是土地的买卖，法律上允许买卖土地，实际上在买卖土地的时候，连人口也可以买卖。把土地卖出去的时候，庄园下的庄客也转给新地主了，所以实际上是农奴。佃户是后期才产生的，我们现在讲的佃户是农奴，是受地主剥削的。地主不能买卖佃户，也不可以把佃户连土地买卖，但是地主卖地的时候，可以剥削佃户的土地，所以现在的佃户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出现的，比较早期的一直到唐、宋，基本上是庄园制度，地主有一些庄园，下面有一些农民，叫庄客，实际上是农奴。三打祝家庄里的祝太公下面的庄客就是农奴，并且要帮助他守庄子，担负战争的任务。所以，封建的典型制度是斯大林所讲的定义：地主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对劳动者的部分所有制，可以买卖劳动者，或者可以赠送，但是不能杀了。另外农民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有自己的经济，跟奴隶不同，奴隶劳动所得都归奴隶主，而封建农奴他的劳动所得有一部分归自己，当然是极少的一部分。

在封建社会里面，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另外，还有工商业者，有商人，有手工业者。封建社会的这种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这种生产力比奴隶社会的时候高得多。基本生产工具大体是一样的，奴隶社会有金属工具，比如有铁工具，封建社会大体上是铁器为主，奴隶社会有的不是铁器，是青铜器，像中国、希腊、罗马比较高的奴隶制度是有铁器，没有铁器不可能产生那样高的奴隶制度。在封建社会的时候，普遍使用铁器。在中国，战国的时候铁器很普遍。犁地用铁，刀子也用铁，西周、春秋的时候，地下没有发现铁，但是战国的时候，铁器已经很进步了。既然战国时候铁器很进步，那春秋时也应该有，因为战国是五百多年，春秋是二百多年，西周也是二百多年，铁器在西周就有，因为那么进步的铁器，不可能一下子就有的。所以，春秋、战国过渡到封建社会是完全合理的。封建社

会的铁器比奴隶社会的铁器更好一些，因为白铁打成钢这样的技术在封建社会里能够掌握了。秦汉以后的武器都是钢的，像刀剑完全掌握了炼钢技术。

封建社会制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毫无例外是君主专制制度，或者是地方割据制度。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时候又是诸侯割据的制度。在西方、欧洲，从六世纪奴隶社会垮台以后，逐渐产生了诸侯割据制度。日耳曼人分封他的功臣，开始建立诸侯割据制度。所以，欧洲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主要是诸侯割据制度。十一世纪以后，在许多国家里面长期保留着封建割据制度，中央集权的主权制度是在十四、五世纪以后才正式形成起来。十一世纪以后也开始有一些，十四、五世纪才比较正式形成。所以，也可以说欧洲封建制度是诸侯割据比较多，王权比较少。中国从秦、汉起，主要是中央集权制度。这个不同需要很好地研究，这是在历史上一个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如果单根据西方的历史来看，中央集权的王权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系。资本主义制度越发展，中央集权的王权越巩固地建立起来。在欧洲，典型的封建社会是诸侯割据制度，是地方割据制度。王权制度首先是城市工商业开始的，工商业者依靠王权作保护，为了使商业比较发展，需要打击一些封建诸侯地方割据的障碍，因此就依靠王权反对地方割据的诸侯。所以，王权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欧洲的情形。

在中国就不同，中国在秦汉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差得很远，像现在的资本主义，根本没有一点影子，可是已经有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而且能够统治这样大的国家，统治这样多的人口。秦的人口有五千万左右，现在我们是六亿，比那时多十倍以上，但是在当时来说，一个国家能统治五千万人口，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所以，照毛主席的讲法，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中央集权为主，同时也有诸侯割据。秦以后主要是中央集权，也有部分的诸侯割据，中央集权为主，并不是唯一，同时后来还有封王、封一些地方上的统治者，按照西方的历史情形来看，有了中央集权制度，应该是工商业有很好的发展，中国应该很早就有资本主义，但是，相反，中国的封建社会不但没有使资本主义很快发展，而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所谓停滞是相对的，历代的农民暴动都使经济有所发展，不是绝对停滞。但是，发展很缓慢，一直到清朝才开始有了近代资本主义。

为什么中国能够这样早的建立相当于欧洲王权制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呢？这不是中国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所以中央集权制度和工商业没有关系，不能

这样说。秦、汉中央集权能够建立起来，还是和工商业发展有关系的。中国的工业和商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相当发展了，春秋的时候，郑国就是一个奴隶主和商人合作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们自己有明文规定说我们的祖宗是和商人联系起来建立国家。奴隶社会里面有工商业，商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了，春秋、战国之所以一天一天地趋向统一和商业发展是有关系的，在春秋、战国时每一个国家工商业都发达。

秦朝的建立和商人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真正的父亲是吕不韦，吕不韦是阳泽的大商人。他做生意到了赵国，当时两国交好互相派一个人质，秦襄王的儿子异人在赵做人质，异人是秦襄王小老婆的儿子，按照道理是不能做太子的，但是很巧，襄王的王后没有儿子，她是楚国人，着急了。吕不韦对国际形势很熟悉，他到赵国碰到了异人，又知道秦襄王没有儿子这个问题，他就在异人身上打算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奇货可居”，奇货是指异人，把异人作为商品，可以在异人身上下一笔本钱，他就去找异人说：我可以使你的门弟光大起来。异人说：你怎么能使我的门弟光大起来？你光大你的门弟好了。吕不韦说：我的门弟要靠你才能光大。异人懂得了他的意思，就请他吃饭，要他讲一讲，吕不韦说秦王后没有儿子，你想法奉承一下，向她认作儿子，这样你就可以做太子了，将来的王位可以由你继承。异人说，这个办法对，可是，我没有钱怎么办？吕不韦说我可以千金来帮助你（当时的金子是指的黄铜）。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他拿了一千金，其中五百金给异人结交朋友，另外五百金他买了一些宝贝，去找秦王后的娣娣，又送了一些给王后，她很高兴地问这是哪里来的，她娣娣说，这是异人派人送来的，他在赵国天天想你，愿意做你的亲身儿子，现在买了一些东西来送你，表示自己的孝心，这样一来秦王后很高兴地说：我自己没有儿子，想不到有这样的人愿意认我做母亲，她就和秦王讲，我没有儿子，应该解决，听人说异人在赵很好，我愿意立他为太子。秦王答应了，就把异人立为太子，这是吕不韦搞的，后来吕不韦又在赵国娶了一个小老婆，已经怀孕了，没有人知道，就故意请异人吃饭，就把小老婆带来见他，异人见她很漂亮，就问是哪里来的，他说这是刚才买来的，没有说已经结婚，也没有说有身孕，异人不知道，就提出来希望给他，吕不韦在“喝醉”的时候，故意发了一下脾气，目的是抬高身份，实际上第二天就把人送去了，异人不知道怀孕，生下来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异人以为是他的儿子。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面，商人的作用很大，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始皇。秦始皇小时候不知道吕不韦是他的父亲，到了二十几岁以后才知道。后来异人死了，秦始皇做了皇帝，他的母亲

就是太后，吕不韦和太后私下仍有来往，因为这个事情秦始皇就杀了吕不韦，虽然知道是他的父亲，还是把他杀了，不是直接杀的，给了他一个诏书说：你这样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吕不韦知道活不下去了。历史家认为秦始皇是个坏皇帝，所以把他家里的丑事都写出来了。秦朝也是和工商业的发展有关系的。

春秋、战国为什么打仗打得这样厉害？一方面是农民暴动，工商业者不满意，所以在春秋的时候，许多所谓士大夫到处想办法找比较有能力的皇帝，想要帮助他们统一天下。这些人有许多代表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但是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的方向是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王国，统一的君主制和工商业的发展有好处。为什么到秦国去的人特别多，因为有许多人到别的国家都不能得志，在秦能够得到使用，所以秦逐渐强起来，一方面是地理条件好，不是四面打仗，外面的力量来打它，它有黄河、有山、有潼关，这是很有利的，把它关闭起来，别的国家来打他就不容易，但是他要出去打很容易。别的国家四面有敌人，关中这个地方很发达，同时和四川有联系，使得它的经济很发展，又使用了一些政治上比较有才能的人做宰相，所以秦朝后来逐渐强大起来。最大的商人吕不韦愿意帮助秦国，其他一些人士也是帮秦国的多，商鞅是卫国人，张仪也是在秦国以外的地方碰了钉子，跑到秦国去就用他了，很多人是在别的国家没有用，跑到秦国得志了。这样秦国得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帮助，自己的经济力量又好，所以有力量并吞六国。

中央集权的王朝建立起来以后，它帮助封建地主阶级发展、压抑工商业者、压抑商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于皇帝自己本身是封建主，他虽然依靠工商业者建立中央集权，但主要是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工商业是一种和封建经济矛盾的经济，即使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只是手工业和商业，如果发展起来，总是对封建经济有破坏作用。工商业又需要一个统一的经济制度，一个国家的君主要依靠工商业得到他的权力，在他得到权力以后，也使工商业有一些发展，当然也不愿意使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原因是因为工商业发展起来会破坏封建的自然经济，破坏地主阶级的利益。商人要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如果工商业经济力量强起来以后，可以跟皇帝对抗的。司马迁就描写了这种情形，他描写一个商人只要一百万文钱的资本，就可以每年多二十万，而这二十万的收入等于一个万户侯，这是在“货殖列传”里面描写秦汉之间的情形。所以工商业发展起来，对皇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汉高祖统治全国以后，立刻下命令不准商人穿绸缎衣服，不准商人坐马车。中国排各

种人的等级是士，农、工、商，商人最末。本来两个字是农为本，商为末，末虽然可以赚钱，但是是最下贱的职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一贯压抑工商业。

政治能不能决定经济呢？政治能够影响经济。但是不能决定经济。如果中国工商业自己有条件能够独立发展，皇帝的法令要想阻住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中国的条件有限制，欧洲的国家有很多是在海边上，海上做生意很容易，欧洲内地工商业的发展就受很大的阻碍，但是，沿海国家能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所以在欧洲，十四世纪以前，欧洲大陆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但是在海岸边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工商业城市。在十四、十五世纪以后，这些城市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城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保护自己，封建帝王要进攻他，他可以抵抗。中国工商业者就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有工商业的城市，但城市是在封建皇帝、诸侯掌握下，依附于封建皇帝。许多手工业是贵族、皇帝御用的，比如大一些织丝绸的手工业是国有的，大一些的手工业是皇帝垄断的。汉武帝制定盐铁法，把制盐、炼铁这两件最大的行业由国家掌握起来，引起了很大的辩论，有的反对，有的赞成，后来还是垄断了。中国有没有像欧洲的荷兰、意大利、威尼斯这样的海岸呢？没有。广州比较接近一些。中国始终没有产生独立的工商业城市能够与皇帝对抗，这和地理条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中国有一部分主要的手工业和农业直接结合，农村中每一户农民除了搞农业外，同时又搞纺织，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中国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发生这样一个特点，尽管政治上千变万化，但是经济状况长期地保持原状。有一些工业不能到城市里面去，在农村里面自己解决。欧洲的手工业不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城市里面建立起来的，另外一种是在地主的庄园里面，由地主直接掌握，集中来组织，不是在每个农民家里都搞。这种具体情形使得中国商业，没有能够很快地得到发展。历史上也有一些发展，有一些手工业不涉及人民生活最普遍的东西，比较有发展，比如造纸，在官方的影响下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独立地由资产阶级来掌握它的手工业的这种条件，中国很长时期没有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

总之，统一的国家对工业工商的发展比较便利一些，因此统一的国家 and 割据的国家相比，是进步的，典型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有了统一的国家，商业、工业的发展和交往比较频繁起来，自然经济状态受到破坏，所以，统

一的国家有破坏封建经济的因素，但是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封建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决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制度，跟工商业的发展有联系。在欧洲到了十五世纪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有联系，欧洲在十五世纪以后，君主专制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基本上是封建制度。在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带有过渡性质，但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不过有了比较强大的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不是过渡性的东西，秦、汉以来这种专制是正式的封建国家制度，没有近代资产阶级，它的进步性是有的，便利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与欧洲十五世纪以后那种君主专制不同，因为那个政权有过渡的性质，欧洲那种君主专制一方面是依靠了资产阶级，它脚踏两只船，一只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封建诸侯，另外方面又站在诸侯方面压抑资产阶级。在那种情形下，资产阶级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最后资产阶级要起来革命，比如法国革命。王朝有一部分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但是资产阶级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特别是身份比贵族低一等，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受压抑。凡是君主专制制度，在封建社会里面，主要是封建的，后期和资产阶级有了一些联系。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在封建社会里面有了萌芽。

封建社会的典型经济，是毛主席所讲的四点：即自然经济、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剥削，最后是封建国家。这是毛主席讲的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毛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这里就不讲了。封建国家有封建割据的国家，诸侯的国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国家比较进步，和工商业有了联系，但仍然是封建国家，它不管怎么样总是压制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种封建社会里面，到了后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和商业是资本主义的前身。中国从秦、汉一直到明朝，说不上是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资本主义的前身的工商业是有的，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清初就有了。欧洲在十四、十五世纪，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最明显的是沿海国家，完全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原则上是和封建社会、封建经济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但是在封建社会里面已经产生了，这种力量慢慢地发展起来，成为很强的能够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抗的力量，首先是在经济上有了强大的力量，就要跟封建统治阶级争夺统治权，这样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要依靠农民暴动才胜利。在封建社会里面就有了农民暴动这个问题，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多次的农民暴动，

农民暴动自己没有办法胜利。毛主席讲，农民暴动不是失败，就是被新的地主利用了。农民即使失败，但总是有结果的，每一次暴动都冲击了腐败的统治，有的就打垮了腐败的统治，尽管建立起来的还是封建的，但总比旧的好一些，减轻了一些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工商业也有了发展。所以，每一次暴动，总使生产前进一步。但是农民暴动没有办法根本打垮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农民暴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以后才打垮的。

关于封建社会问题就是这样。

6.资本主义社会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因为有近代史，就不想多讲了，只是简单地提一下。

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靠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个转变，但具体的经济转变过程是多种多样的。由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经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政治上要通过革命，有时候也通过改良，但是改良要依靠农民暴动，没有农民暴动，地主阶级不能接受改良，因为农民暴动使得它不能按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必须接受改良。因此，阶级斗争是根本的，经济上的斗争有多种多样，比如英国革命是一种形式，美国是一种形式，法国是一种形式，德国又是一种形式。在封建社会里面，在海岸线上出现了一些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变成大陆上的统治者，所以只能成为资本主义一种萌芽性质，这是个别的转变，个别地区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

英国的情形是这样的，经过了农民暴动，经过了革命战争，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逐渐资本主义化，国家的经济由封建经济逐渐自己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比如，土地原来主要是种谷物，地主收租，后来英国有了一些特殊条件，工商业比较便利，开始发展纺织业，发展的结果，需要很多羊毛，种植土地的贵族看到出卖羊毛比收地租更有利，他把大批的农田变成了牧场，这样大批地主变成了资产阶级。这种变化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斗争，转变了的地主和封建地主打仗，英国有许多国内战争，经过这些国内战争，最后经过了克伦威尔改变，资本主义地位占了优势，所以英国革命实际上经过改良实现的。

法国是经过了一个最彻底的革命，农民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把封建地主打垮，分了土地。所以英国革命以后，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法国革命以后，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出现了大批的小农，所以法国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动员的群众最广泛，接近于人民革命。

美国的情况是原来根本没有封建经济，欧洲移民到了那里，就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建立起资本主义。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顺利，法国虽比较彻底，但是后来经过几次复辟，地理条件又受到一些压抑，不如美国发展得快，按照它的彻底性，本来应该是发展很快的。

德国又是一种情形，封建地主也是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英国转变的快，它是地主把大片的农田变成了牧场，把大批的农民赶出去，德国也是类似的情形，不过过程比较缓慢一些，逐渐剥夺农奴，是土地制度改成资本主义制度，由收地租变成出佃。要把农奴制度变成佃农制度，要牺牲农业。

俄国的土地改革类似德国，它所谓的农奴解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部分农奴赶出公社，让他自己得到一定的份地，这是很坏的，为了得到一定的份地要赎买，要出很大的代价，另外一部分荒地由地主掌握起来租给农民。

列宁讲资本主义现象是两种，美国式和德国式的，许多种类集中起来基本上是两种形式，一个是封建制度建筑比较单纯，在空地上建立资本主义，这类似美国的情形，法国也是这样的情形。德国是农业经济的改良主义，地主阶级自己逐渐变成资本主义。英国的情形和德国情形类似，但是类似中间又有不同，所以在分析历史的时候要具体分析，列宁讲两种情形，是讲最大的原则，我们在研究具体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具体国家的材料，把这个国家的情形加以更具体的分析，所以，我们讲的很多，英、法、美、德这些类型都有不同，这并不是说列宁的原则不对，列宁的原则是讲更大的方向问题，我现在所提出的几种是更具体的分析，当然，这也是很粗的，但你要研究更具体的历史问题要分析得更细一些，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把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历史的时候，也应该如此。

第 12 章 历史唯物主义引言

(1962.03)

【这是艾思奇给 59 班的讲课速记稿。我们按速稿整理，整理时删去了讲“引言”之前问题解答部分，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解答，我们并入其他相关的问题解答之中。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引言”，有其特点。我们尽可能保持原貌，只作少量的删节和文字加工。】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现在正式讲历史唯物主义引言。主要讲两部分：一部分是怎么样看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哪些基本问题。

这个引言怎么讲？我考虑了很久，历史唯物主义题目很多，如果每个题目都讲一段引言，实际上就等于每个题目都讲述一遍，时间又短，就会都讲不清楚，我们有本教科书，大家看看教科书就行了。这次讲引言就比较概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作一点解释，主要的还是结合实际，结合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来讲。

第一部分，怎样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第一部分实际上是个帽子，引言的引言，要讲怎么看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比较少，只讲两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1.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在以前的教科书中都有了，但是不一定完全。现在这样提看是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理论；把握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的理论。我觉得要下定义，这样下才接近全面。如果这个认识是对的，将来修改教科书时可以用，当然教

科学不是从定义开始，也不是讲定义，但是定义是需要的。因为定义包括研究什么东西，它的对象，它的目的，它的基本方法，包括这些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这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这用不着解释，大家都了解，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从前所以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因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然后运用到历史方面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思想推广到社会历史方面。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才能做到这点，以前的唯物主义没有做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叫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成为一个整个的、最完整的体系。因此，第二句话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的一部分，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讲辩证法，如果在历史方面，在社会方面是唯心主义的，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辩证法，比如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这些人的哲学，就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门里，但是到了历史唯物主义门前就停住了，所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只讲辩证唯物主义，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在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不是哲学。他还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是不对的。当然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因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部分。实际上，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反驳了，“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上面讲：“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1页)过去唯物主义哲学就不是由整块钢铁铸成的，而是有缺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这个缺口的，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开。为什么不能分开？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哲学？有个理由，因为它是科学，但是它又有哲学的性质，本来辩证法也是科学，把哲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法的运用这点是科学，但是另一方

面它又有哲学的性质。为什么它有哲学的性质?为什么它叫哲学?凡是哲学就有这个特点,它是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是对世界一切问题总的了解,同时它又是科学研究各部门总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方法,是普遍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有这个特点,它是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总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就是要得到对人类社会总的认识。我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普遍规律就是可以使我们得到总的观点。所以,从这点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因为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识这个普遍规律,对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能把握总的观点。科学研究是研究客观世界某些方面的特殊规律,不是研究整个世界总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要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不是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某些方面、某个部门的特殊规律的具体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哲学的性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用我们认识的普遍规律去把握总的方法,可以运用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总的研究方法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指导的。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

2.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问题

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读一本书就算了,特别是不能单依靠教科书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问题,那样是不恰当的。我们发了一本教科书,那只是一个初稿,是试行本,没有公开印发。里面可能有毛病和错误,现在已经发现有个别地方是有错误的,也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有错误,还要检查。所以,教科书只能作为参考书来读。

教科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写出来了,比较系统、完整。比起经典著作有一个好处,因为经典著作是针对一定的问题来提的,它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所以,经典著作中讲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时,往往是在某一本书或者某一篇文章中就着重讲一方面的问题。而教科书就是比较四平八稳的,那一方面也不大着重,但是各方面又都讲一些。这是教科书的缺点,也是它用来学习和参考的便利的方面。按照水平来说,它没有经典著作高。经典著作是高水平的,教科书只是一般学习水平,但是用来做参考还是必要的。我们学习时要用主要力量来研究经典著作。特别是在高级党校,我们不是一般的大学,所以要求还是着重研究经典著作。在学习计划中规定的有教科书,但那只是参考。大家可以钻研这

样几本经典著作：《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本重要的书；另外，还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经典著作的方法，就是要学习经典著作的写作方法，不要学习写教科书的方法。我们写教科书是为了一般的参考，为了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纲领。但是，作为很专门的研究，作为认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能学习写教科书的方法。就是什么都懂得一点，但是那一方面都不深。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要像经典著作那样，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最高的标准，就像毛主席那样的标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明了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但它不像教科书那样说明各方面的问题，而是针对中国的实践问题，也可以说是概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经过仔细地研究写出了这篇大文章，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一般的同志写不出那么高水平的文章，但是我们要学习这种方法，努力学习毛主席写作的方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解决了一个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也是解决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将要爆发以前的经验，把有人类历史产生以来，国家产生之后，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所有国家问题都加以概括，指出一般国家的性质。《叛徒考茨基》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这篇文章是《国家与革命》的补充，补充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国家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作过几次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估计，只是比较抽象地讲无产阶级应该成为统治者。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了总结，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提出来了。《国家与革命》是把这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加以综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又把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作了概括，进一步阐明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继《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作了发挥，而着重对国家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是研究国家是怎么产生的，最初在阶级社会里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选择这几本书作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著作有一个线索，就是重点问题都是解决国家问题，这样就便利我们认识现在国家的一

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了政权之后应该怎么办？这是大问题。因此，重点问题摆在这上面是有好处的。

这样一个布置，说明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要跟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要跟各种社会科学问题、各种人类历史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哲学，但是为了把哲学研究好，那么就要结合某些具体社会科学来研究，结合革命实践来研究。所以，我们读材料时要有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问题时，要结合具体问题来作研究。每一本经典著作本身没有什么连贯，但是你把它结合起来读，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重点问题。参考教科书可以使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在了解各方面问题的基础上，着重钻研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第一点，就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要跟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要跟各种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跟人类历史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就要结合各方面的科学，所以，着重结合国家问题，附带地联系历史问题。《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原则，又是研究国家问题的原则。结合理论问题、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来进行研究就深一些，比单独学习教科书收益更大些。

另外一点，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之一就是批判。所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没有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真正唯物主义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问题上都是唯心主义。所以，在历史研究方面世界观的对立，归根结底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没有什么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

历史机械唯物主义，就是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有一些机械论的观点，但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的。苏联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他把历史发展看作是机械的力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均衡论的理论，用我们的话来说，叫作平衡论。他认为历史只有两种，就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又由不平衡到平衡，革命时期就是完全平衡被破坏了，革命结束之后，完全平衡又恢复了。平衡和不平衡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样就把人类社会历史复杂的规律一笔都勾销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都简单

化了，结果就是公式主义，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为什么说它是唯心主义呢？就是说只要有人考虑出一种办法，能够使各种社会力量平衡；那样社会就稳定了，布哈林就用这种观点解释当时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使城市力量和乡村力量平衡起来。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可以发展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应该允许自由发展富农经济。他看不起中农、贫农，他认为只有发展富农经济才能够和城市工业平衡，如果是消灭富农，使全国生产力不平衡，苏联就要垮台，因此要根据平衡的原则，来解决苏联问题。这种原则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为了在农村保存资本主义作辩护，反映了富农思想，根本反对合作化。所以说，机械唯物论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因为他用主观原则来解决实际问题。另外一些机械唯物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像法国的唯物主义在社会问题上公开说：意志支配世界，等等。

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的史观。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要立就要有破，自己的立场站不稳，当然也不能破，也不能打倒错误的思想。但是，不在破当中立，这个立也不是很坚强的。锻炼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要跟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加以对比，不只是对比，还要斗争。一切正确的东西都要跟错误的东西互相比较，互相斗争，然后才能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在战斗中研究。斗争、批判就是一种联系实际的方法。我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学习，我们讲课时也尽量这样讲，在讲正面的东西时，批判反面的东西。我们搞的资料都是正确的东西，反面资料搞的很少，这是一个缺点，以前我们没有注意，现在注意用一些反面材料。像国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里面有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可以利用一下。最近大家提了一点意见，我讲课时也要按照这个方向去作。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问题。

第二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教科书里讲了七、八个题目，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些，那样问题太多了。我们这次的教科书比从前的教科书精减了一些，从前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包括的问题很多，有的包括民族问题、党的问题、战争问题，也有的把军事问题专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章。我们认为把这些题目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专题未免有些勉强，因为有些不是一般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是专门性的问题。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在我们教科书里讲了一些，

在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部分中也讲了一些。把它当作专题研究，就变成专门的科学问题了，所以，这里我们没有作为专

399

题来写。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研究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线索更清楚，我们把它概括得更简单一些，可以归纳成三个基本问题：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

(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问题。什么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规定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普遍起作用的矛盾。

(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教科书里所讲的许多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纳成这样三个问题。下面就按照这三个方面结合实际，作一些一般的解释。

1.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一个问题研究呢？因为它是规定哲学、历史观点根本倾向、根本路线的一个首要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哲学，它跟辩证唯物主义，跟一切哲学一样，最终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意识和存在哪一方面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一性的，还是存在是第一性呢？这个第一方面的问题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在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也是一样，区别历史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路线，根本的标准也是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贯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列宁说是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就是说，从上到下，从头到尾都是唯物主义，无论是自然观还是历史观，都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按照唯物主义的标准来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把存在摆在第一位来看，对历史的理解，是把社会存在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意识摆在第二位。自然观的根本问题，也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这一点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曾指出过。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四章里面讲的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是它有彻底性，它把唯物主义贯穿在一切方面，首先是贯穿在历史方面，把存在摆在第一性来看，把意识摆在第二性来看。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

时，也要把存在和意识问题当作第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区别历史观不同路线的根本标准。这个问题在一般哲学上是最根本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里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甚至在人类历史实践方面，在实际工作里，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学术界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究竟哲学的最根本问题，是一个还是两个？有的人主张哲学的根本问题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一个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因此，讲哲学史时，有的人主张哲学应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斗争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哲学界有争论。我觉得不能把两个问题并列起来，不能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存在和意识问题，一个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问题，这样两个问题不是并列的。

恩格斯说：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哲学最高、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一般地讲根本问题，当然也可以说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也是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如果说哪一个是最根本的问题，应该说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顶点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既然是第一个问题，就不能有两个，只能有一个，就是存在和思维的问题。

我们研究某一个哲学派别时，首先用什么界限呢？首先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还是首先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应该肯定，首先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派别时，首先要问它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然后才问它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不能够倒过来。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首先我们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方面的，那么研究问题时，首先是唯物史观，还是首先是辩证法呢？首先要有唯物主义，然后辩证法才能起作用。如果首先不是唯物主义的，那么运用辩证法也就会落空。所以，第一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而这个区别最根本的标准又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又是看思维与存在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教科书里就不采取有两个根本问题的说法。我们说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历史观的问题也是这样，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我们首先看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因为我们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看问题。当然，过去的历史观从来也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在过去的哲学里，历史方面

关于唯物主义思想的片断是有一些。片断的东西不能称为是唯物主义，而是在某一点上用物质的原因来说明历史的情况是有的。不但在外国哲学里有，中国哲学里也有。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很不完全，很容易变成唯心主义。整个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就某一点来说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就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点因素。

马克思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法国的历史家曾经指出过：历史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这就说明他有一点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很重视这一点，就加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甚至这样来表彰他们的功劳：阶级斗争的观点不是我发明的。马克思是这样谦虚！本来建立真正系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真正把阶级斗争问题解决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但是法国历史家提到这样一点初步的意见，就认为是他们发明的。不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事求是的态度。谦虚就是实事求是，并不是虚伪的谦虚，因为事实上法国的历史家开始发现了初步的阶级斗争观点。

中国历史上的管子说：仓廩实而后知礼义，就是说仓库里面充实了，然后才有可能讲礼义，还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冯友兰就用这句话来证明管子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整个来说，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在这一点上，他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片断的因素不但是管子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孟子也有，或者说有这种类似的片断。

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有时候他提到工具的作用。列宁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过去的历史观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类似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把意识和存在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这个唯物主义的标准，彻底贯彻在历史研究的各方面，彻底地用这样一个根本观点来说明历史问题，就是说，社会存在总是起最后的、决定的作用，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经典作家列宁的一段话是比较典型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六章里比较典型地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特点(上面已经念过了)。

历史唯心主义跟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相反，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一般哲学唯心主义里有两种唯心主义，在历史唯心主义里也有两种：有主观历史唯心主义，也有客观历史唯心主义。不过我们教科书上一般不这样讲，因为讲起来太噜苏了，在一般哲学问题中已经解决了，在历史问题中再讲就噜苏了。不过我们在学习时还可以指出：有的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有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客观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某种客观存在的意识、精神决定的。历史逃不出某一种精神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有各种说法：历史是由天命决定的，或者说历史是受某种道德原则决定的，这种道德的原则是客观决定的，不是人主观上随便想出来的，历史发展逃不过客观存在的道德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历史就要乱，合乎这个道德原则，历史就能够稳定，国家就能够太平。这样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过去比较普遍。

我们读过贾谊的《过秦论》，这个人的思想大概是客观唯心主义，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混在一起。儒家思想是讲仁义道德、尧舜先王这些东西。道家不讲仁义道德，只讲一个道，德也讲一些，仁义就不一定讲。贾谊在自然观方面是道家思想，社会观方面也有道家思想。他有一篇文章叫“服鸟赋”，本来汉文帝把他找去作官，他的才能很高，汉文帝又想提拔他作宫卿。当他26岁的时候，皇帝提出来的问题，老大夫回答不出来的，他能够回答出来。汉文帝要提拔他，老家伙们就嫉妒，说他的坏话，说他想夺取政权，有很多标新立异的言论，不可重用。汉文帝这个人比较尊重老人的意见，听到这些话就相信，不仅不提拔他了，而且被贬到长沙去。他很失意，心情不愉快，在家里闷坐着。有一天忽然有一只服鸟飞到房里来就不走了。他很奇怪这个鸟飞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什么兆头？不知是吉是凶。就这件事情的感想写出了文章，这里面把他的世界观也写出来了，讲到他自己很失意，很苦闷，讲到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很难了解，无非是由道在里面支配着。在这篇文章里有四句话：“天地为炉，造化为公，（这里面就有唯心主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这四句话表明了他的自然观。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来说明他的自然观。因为古代最大的工业是铸铜，所以他用铜来比喻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像大炉子一样，造物主在这里面熔化铜，自然界由此就千变万化，由石头变化成铜，由铜变成石头，变化莫测，福转化为祸，祸转化为福，变化无常。他认为变化的来源是造物主，所以还是唯心主义者。讲到历史问题就更明显了。贾谊《过秦论》的第一篇是讲秦朝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把历史作了扼要的刻画。这个文章写的很好，一、两千字把整个历史说清楚了。按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说是清楚的，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不清楚，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根本不了解，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概括的。在概括了很多历史事实之后，最后一段就暴露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就是说，一个匹夫起来捣乱，一个宗庙就垮台了，自己也死了，这样会被人家笑话的。下面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他说为什么会垮台呢？是他不认识仁义的结果。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垮台的最后原因就是不认识仁义。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历史发展稳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没有仁义，没有仁义，历史就要被破坏，一个国家没有仁义就要垮台，有仁义就可以发展。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写的很好，结论也很有力量，把历史作了很好的概括，几百年的事一、两千字就说清楚了，最后两句话就把原因找出来了。就文章本身来说，很有力量，写的很好，但是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不认识仁义就要垮台，那么，秦朝在很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就很有仁义呢？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他就站不住脚了，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是典型的。

中国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儒家，儒家的历史观主要是把仁义道德的客观标准，作为确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的最根本的原因。比如，王阳明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王阳明讲仁义，那个仁义是从内心主观产生的，并不是历史上有客观仁义道德的原则。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方面来说是唯物主义的。孙文学说是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对自然界阴阳五行的观点一点也没有。中国过去的哲学家，一直到康有为、谭嗣同，阴阳五行的思想都没有断，旧唯物主义者都讲阴阳五行。孙中山的世界观里就没有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概括了现代科学，根据现代科学来说明自然界的发展，说明世界是由无生物变成有生物，产生了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自然方面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明显。资产阶级哲学里，有近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以孙中山为代表。“五四”运动之后，资产阶级都跟着欧洲主观主义走，有的是马赫主义，有的是实用主义，有的是贝克莱主义，只有孙中山带有十七、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他的历史观又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孙中山的宇宙观和我们不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唯心论的，或者说是二元论。那个时候毛主席先说他是唯心主义的，后说二元论。现在我们说孙中山是唯心主义的，不是二元论。

学术界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说法有误会，以为毛主席说孙中山的哲学整个都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二元论的。我看毛主席的话不能这样理解，毛主席并没有说孙中山的宇宙观就是唯心主义，而是说他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二元论的。毛主席并没有讲孙中山的自然观，所以，我现在说孙中山是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并不跟毛主席的观点冲突。他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很明显的，随便提几句话就可以证明。在孙文学说续论里说：

心是万事之源。这句话是唯心主义的。这句话不是指自然界的，而是指历史观点，如果包括自然观在内，那么从自然观到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

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思想哪一方面摆在第一位，王阳明说人的知识是第一位的，行是第二位的。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识之成”。他的宇宙观是良知学说。王阳明所说的“知”与孙中山的“心”有所不同。孙中山的“心”有一些客观意思，群众的心，人民的心，他已注意到了。王阳明是讲人主观的心。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中山的话可以解释成唯心主义的。在孙文学说里讲到建立人类社会的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这个问题说：建立人类社会的原则是互相帮助，人类生活的特点是能够互助。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反映。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发展依靠生存竞争。孙中山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讲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则，他认为互助，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强调互助的原则。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病态现象，他用互助论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就用唯心主义的互助原则来解释历史，所以这种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孙中山不是专研究哲学的，他的思想有些混乱，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是纯粹的主观主义。

这种主观主义在我们实际工作里有，毛主席的著作里首先批评的以感想代政策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的错误有很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可以说教条主义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好像有一个框子规定了我们一切的工作。以感想代政策就是主观主义。这几年来有很多口号是主观主义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主观唯心主义，不但是唯心主义，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怕想不到，只怕做不到”，“没有低产的土地，只有低产的思想”，这种观点毛主席概括为主观主义，这里包括主观唯心主义，也包括教条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比较多，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以考虑。我看这与我们掌握了政权有关系，有了政权，作了首长，做事情比较随便，自己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有一个时期，人好像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不顾后果，因此，有了政权后特别要注意。邓小平同志讲，有了政权特别容易产生主观唯心主义。没有政权时，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抵抗力很大，因为有敌人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敌人被打倒了。我们掌握了政权，抵抗力就不那么大了。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就有一种为所欲为的错误，再加上骄傲自满，就会助长主观唯心主义。这样解释是不是对？大家可以考虑。

在苏联也有这个问题。不仅是在工作中有，而且经济学家已经把它理论化了，斯大林在经济学上也批评了主观唯心主义。斯大林在他死的前一年发现了这个问题，保卫了列宁主义，反对了经济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那以后受批判的经济学家要翻案，说斯大林对科学粗暴，把经济学的著作一笔抹杀。看起来，斯大林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而赫鲁晓夫又在搞主观唯心主义，在农业上搞瞎指挥。苏联的瞎指挥是赫鲁晓夫亲自主持的，他领导着瞎指挥。他吹牛说62年的生产可以赶上美国，现在62年到了，农业生产还是斯大林活着时候的水平。过去说要搞草田轮作制，现在草田轮作制搞的差不多了，又责备农学家搞错了，要取消这个东西，然后种玉米，结果长出来的玉米人没有办法吃，乌克兰北部种的玉米只能长杆子喂牛吃。他们从最高领导起都在搞瞎指挥，而我们的领导是实事求是的，发现了瞎指挥就要纠正。现在我们讲因地制宜。现在赫鲁晓夫这样搞，我看一定要垮台。

所以说，主观主义唯心史观是会发展的，这次中央会议上也说，有了政权后要特别谨慎。少奇同志说：我们要注意，不要有了政权后就为所欲为。所以，现在批判主观主义的唯心史观有很大的意义。

有了政权之后，主观唯心主义容易发展，这样的提法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考虑。有了政权如果不注意，就容易发生主观唯心主义。苏联有，中国现在看起来也有。中国这两年提的一些口号，虽然没有像苏联经济学家那样理论化，但是已经在向理论上上升，如果不批判它就会变成理论，而且个别地方已经成为理论，在58年底湖北就有这样的理论：规律是可以改造的。那时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就有人要把斯大林提出的原则推翻。据说有人写文章主张规律可以改变。所以说，个别地方已经形成了理论，如果不谨慎，有了政权会产生主观唯心主义。现在苏联从最高领导起是主观唯心主义。

有些高指标我们领导上也同意了，不过这要分析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跟各部门、各级商量的时候，领导上带着商量的口气说这个数目字是不是也很好，结果新闻界就去发表了。甚至公开写文章说：毛主席是怎么怎么说的。这些话是类似科学的假设。一个领导对农村的看法，在没有直接的、长期的蹲在一个点以前，就要根据汇报来判断问题，根据汇报来商量提出指标，这样一些数字，新闻界就拿出去公布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不在领导方面，因为那是在商量问题。而且是在商量中发现高了就要批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些高指标看起来是领导上提出来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下面的材料送上来了，提出了很高的指标，看情况很好，领导上也就同意了

这种高指标。但是在同意的时候还是压低了。比如 1958 年的钢铁翻一番的指标，中央是同意了，但还是压低了，原来提 59 年两千万吨，60 年三千万吨，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时就批评了。批评之后的指标还是高了，由两千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还是高了，但领导上还是把最浮夸的指标压下去了。像这种情况不能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它的路线是唯物主义的，是在不断地跟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同意的，所以，我们的最高领导还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的，尽管受到很严重的抵抗，但思想上坚决向实事求是方面走。尽管一时群众还不清楚，尽管批评后的指标还是高的，但思想状态不是主观唯心主义。毛主席说：经济工作者经常是倾盆大雨，搞很多材料来逼着我决定，有时是迫不及待的，不能不马上作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考虑的时间短，可能发生一些偏差，发现之后就提出批评，这就不能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我看，如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恐怕也只能够作到这样。列宁说他自己犯过错误，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写文章说：我们在经济上犯了很多错误，这里包括有列宁的错误，但不能说列宁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至于下面犯的错误，也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也要分别对待。比如河南，安徽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有些虽然是犯了错误，甚至还相当严重，而他的思想方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人还是有的，公社领导，县的领导，起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的还是有的。所以，也不能一律简单化地说：最高领导没有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都在下面，这样的说法也不好。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我们现在很容易采取，因而要接受教训，任何问题都要具体分析，谁有主观唯心主义，谁没有主观唯心主义，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简单划线的办法。少奇同志讲到成绩究竟是不是三七开的问题时，他说也要看情况，有的多，有的少，有多少算多少，各地要分别情况对待。

现在我们来讲，为什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真理，把社会意识当作第一性，社会存在当作第二性是错误的呢？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因为真理要论证，要证明。我看理由有三条：

(1)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里说：人类不能任意选择他的生产条件，人只能够在现成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来活动。人在做某一件事情以前，在考虑某种问题以前，他的社会存在早已经形成了，他只能够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来行动和思考，不能任意选择自己的条件。这就是说，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以前就已经有了，不是意识在存在以前，不是社会意识在先，而是社会存在在先。人不能够希望任意选择自己活动的条

件，如果这样做了就要碰钉子。如果希望自己周围生存的条件按照自己主观愿望去转变，就一定要碰钉子。我们现有的生产力，在城市有工业，在农村有农业、农业生产是手工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工作，我们的工作只能适合这个条件。如果希望任意改变这个条件，或者很快地改变这个条件，就要碰钉子。所以，说什么苦战三年根本改变河南面目，苦战三年根本改变中国面目，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就想随便苦战一下，几个月不睡觉，世界就变了，像神话上说的一样。这就是想随意选择自己的生产条件。农业六十条本来说：十二年达到四、五、八。他就提出两年达到四、五、八。主观地规定生产指标，一定会碰钉子，而且现在证明已经碰钉子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是手工业的，就只能有集体所有制，一定要实现全民所有制，就一定要碰钉子。两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煽动性的口号，范梁提出这个口号传到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这是作诗，要陈伯达调查，并作了批评。河南说：两年作不到，我三年做到。这些都是凭主观愿望任意选择自己活动的条件，一定要碰钉子。碰了钉子后就证明历史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而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包括生产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条件、整个历史存在条件，是在人类意识产生以前就存在的。

(2)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是相反。社会存在不是社会意识的表现，而是相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正确的意识也就是社会存在的正确反映。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说：“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既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0页）社会意识只能反映社会存在，而且只能反映一部分，连马克思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也不能反映全部，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把全部错综复杂的变化都反映出来，最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找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意识只能反映最基本的一部分客观存在，所以，不能说我们思想里有一些缺点和认识不完全的东西，就说是主观唯心主义。认识不完全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甚至有一部分错误缺点，也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主要是看他能不能把握基本的东西。把基本的东西找到了，就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務。

我们讲唯物主义，不能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那样浮夸，认为唯物主义者能够把世界上的一切真理一下都认识干净。旧唯物主义者是有这种幻想和错觉的。实际上旧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很多是不完全的而且有错误的，比如，

古代唯物主义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这里面有唯心主义的解释，有唯物主义的解释。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你说它完全正确，我看并不完全正确，而且很大部分是不正确的。“阴阳五行”这个概念就不正确，就没有什么五行，五个行星是有的，但如果说一切事情都是由五个行星变化的，就没有这样的事，因为科学能够证明这个问题。人的五脏是五行；肺是金，肝是本，肾是水，胃是土，心是火，这个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但很大程度上是荒谬的，不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的方向、路线是唯物主义的，它不用物质之外的原因来说明世界，而用物质作为根本原因来说明世界，因此它的方向是向真理、向实事求是方面走的，它是要努力去揭露自然界的真面目，用五行去概括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而不用精神的原因去说明，因此，它的方向是唯物主义的，而且不完全是错误的，它的确概括了规律和经验。概括的形式是荒谬的，但是它的内容有些是有客观真理的性质。我问了一下中医，为什么说脾胃是土？他说：土生万物，而脾胃能够把吃下的东西供应到全身。这种观点跟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如果是吃不下饭，是脾胃弱了，就像我们种地一样，地力弱了，看来他是把握了客观规律。所谓人的意识是正确的，也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了客观规律。任何一种错误的意识也是反映了客观存在，不过是歪曲的反映，五行思想有错误，就是简单地反映了一些东西，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来源的，不是主观自生的。

社会意识的来源是社会存在，我们一切的经验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共同生活的条件决定共同的思想，不一定不同的阶级才有不同的思想，同一个阶级，条件不同也有不同的思想。同样是无产阶级，但条件不同，有贵族工人，有一般工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什么人都是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有各种不同的条件，人民里有各种各样阶级和阶层的分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全民的国家。因为没有什么全民的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从斯大林起一直在说什么正义上、道义上的一致，好像就没有矛盾了，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共同的思想，统一的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这是高薪阶层为了掩盖自己跟人民利益的矛盾而制造的片面的理论。这种片面的理论也是高薪阶层物质利益的反映。

(3)人的意识只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的规律性。这一点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应该加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以前总是讲：存在在先，意识在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过去的教科书中讲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一般只讲这两点，我想现在应该加上一条：人

的意识只能与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的规律性。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有这样的提法：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是一个过程，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说，就是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意识反映存在，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反映的，而要有一个过程，存在走在前面，意识在后，经过一定的时间，这个意识才能够反映存在。认识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首先是存在，然后是实践，实践当中得到感性认识，经过一定的过程，然后概括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个时候才能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认识规律，就要被必然性所支配，只能够停滞在盲目性的阶段。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道理，是一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引深，但是运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说是一个发展。因为恩格斯说：我们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由必然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王国。恩格斯这样的提法是对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盲目性所支配，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进入自由的王国。但是，恩格斯那个时候没有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没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时我们的社会意识还是要经过由必然飞跃到自由的王国，而且要有一个过程。以前的解释好像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我们是被必然的王国所支配和限制，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变成自由的王国了。以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讲法，我也是这样的讲法，好像一进入社会主义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这是一种幼稚的思想。很多青年在刚解放时也有这种思想，认为解放之后什么都自由了，因此对苏联产生了迷信，认为苏联人说的话一定不会有问题，斯大林说的话一句都不会错。有的人有这种想法：因为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我们就接受苏联的经验，有这种教条主义。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比如“二十大”的报告出来之后，我讲课时引证“二十大”的东西，就没有一点怀疑。“二十大”的文件刚一发表的时候，中央的意思还不知道，就在一次讲课时就说“二十大”所提出的几条都是对的，对苏联有迷信，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比我们多搞几十年，而且中央决议是经过反复讨论的，这不会有错，至少是要相信。反对斯大林的问题，有一个时期半信半疑。可是又有这样的想法：要相信苏联领袖。这就是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由必然到自由要经过一个过程。毛主席就很了不起，从来没有迷信过斯大林和苏联，开始我们不知道，以后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对斯大林那里来的东西也是批判地接受。“二十大”一开始，就对和平过渡的问题表示了不同意。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能不能这样快的发展，我想恐怕不可能。当

然还有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但是，如果是没有毛主席，我们对修正主义的认识不会这样快。认识，总是要认识的，因为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党总是革命的，修正主义暴露到一定的程度上，总是能被人民认清的。跟着苏联跑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人写信给我们，像捷克的工人写信来表示不满意他们的党跟着苏联跑，明确地指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而且明确地说：希望在中国。他说：希望就在非常好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毛主席的身上。

认识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有了政权之后，不要以为可以随便自由了，我们就不会在必然性面前碰钉子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口号。它的错误有两点：一点是把想到放在前面，想是第一，做是第二，这是主观主义的。另一个错误是不懂得应该先做到，然后再想到，要先做一个过程，然后才能想，在事实上也是先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这个话说起来好像不符合普通人的想法，平常在做以前总是要先想一想，然后再做。可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应该是先做到，然后再想到，想到之后再进一步做到，不做到就能够想到，这是很奇怪的。人的认识过程是这样：在做的开始阶段，对事情并不曾想到（这里所说的想到，是说理性认识）客观规律、事情的发展，要做一个时期才能想到，最初的时候人不会想到自己做的后果怎么样，做的时候有了认识，但那是感性认识。人不会一点认识没有就去做，一做就有认识，这个认识不是想到的，是感觉到的。做以前看到是有，做到就能够看到，但是不能够想到。所以，要先做一段，有了一些感性认识，然后才能想到客观规律，真正想到之后然后再做，用所想到的再去指导行动，然后才能进一步做到。这是社会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原则的具体化。我们对客观规律必然会想到它，但是要做一下之后才想到。开始的时候往往用旧方法来想，或者对所做的事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比较不完全的想法，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种想法也不是一下就想到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问题就讲这些。除了上面讲的三点之外，再加上一点：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就能对社会存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上这一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意识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大体上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中，错误更多，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歪曲的，其中错误是主要的。落后意识中，是不是也还有正确的东西？还可以研究一下，有些落后思想是不是也

把某些情况反映出来了?一般来讲,落后意识总是对社会存在有一些歪曲,因此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总是比较正确的反映客观存在,其中正确的东西是主要的。比如,孙中山的思想,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他的思想主要是正确的。虽然他有很多错误的方面,特别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当时主要是正确的东西,那么这种正确的意识就能够把历史推动。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把几千年的皇帝统治打倒了。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这一点,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也讲到了。列宁说:“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0页)要使我们意识去反映客观存在一切主要之点,这是人类最高的任务。过去的人类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虽然不可能把经济进化、社会存在进化的全部一切都把握住,但是可以把握一切主要之点,这也很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达到最高目的。

这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教科书里已经有了,但不完全,将来修改后再补充。

2. 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规律问题

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我们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仅仅是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最起码的原则。这个问题要具体运用到历史上,就需要作许多具体的分析。真正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根据这个原则对社会历史的各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如果没有这个分析就不能解决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也建立不起来。

要对历史社会作具体的分析,最主要的就是分析人类社会历史里面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揭发基本矛盾,或者说,首先要具体的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把什么是社会存在和什么是社会意识作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面所讲的就是最起码的公式,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先讲,把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原则树立起来,但是讲这个原则还不是很具体的研究历史,

只是把历史最起码的原则讲一讲。这些问题的内容比较贫乏，联系实际也不容易犯错误，只是把一些错误的例子举出来说明违背哪些原则，也不会有大的争论。当然，也会有一些小的争论，比如，是不是一切错误都是唯心主义？都是主观和客观的分离？我认为有些错误不一定是唯心主义，因为错误和正确不能孤立的来看，要看它在认识过程中占什么地位，要从运动中看，在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同，它的意义就不同。它可以起主观唯心主义的作用，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但是不起主观唯心主义的作用，相反它还是起开路的作用。科学研究不仅有利，而且证明为真理的有时也会有错误，因为它有片面性。比如牛顿证明光学是离子，牛顿以后有人提出光学是波动不是离子，牛顿就错了，但是电子学说发明以后，又证明波动是片面的，光是由波动和离子形成的。所以，错误的片面性在认识过程中可以起作用，为了追求真理有时可以冒错误的危险，错误是必经的。这个问题可以有争论，可是争论不多。但是涉及到具体分析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这个争论就很多了，要准备反复辩论，我们多用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所讲的很可能有错误，希望大家在讨论中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

首先，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这个问题稍微具体点就有争论。可以有这样两种意见：

①社会存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说，社会存在就是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只限于经济，经济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仅仅是生产关系，其他如政治、法律、思想意识等都叫社会意识。这是一种意见。

②社会存在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仅仅是意识形态。

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我看后一种意见对。因为这个意见比较符合于经典著作的提法。我们先引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一种基本提法。为什么说是基本提法呢？在毛主席说了这段话以后，经济学家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前后对起来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讲社会存在就是指

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都是社会存在，意识是反映社会存在的，而意识对社会存在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的教科书的最后也引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的一段话：“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是政治、法律、上层建筑赖以树立起来的基础，然后就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它相适应。社会意识一方面是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是跟社会意识形态分开的，所以，意识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相适应。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相适应，它反映这个存在，又对它起伟大的影响作用。这些话都是很明确地具体分析了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这个问题。这样讲是不是妥当可以研究一下。

也可以根据另外的理由来不同意这个意见，根据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有一个提法，他的提法是：经济基础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然后社会意识又创造了某种政治法律制度。这个公式是：基础—社会意识—政治法律制度。这个提法跟马克思的提法不同，马克思的提法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制度，然后社会意识形态与这些东西相适应。有一些搞社会科学的人根据斯大林的提法就这样了解，社会存在就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上面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又产生一个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都是属于社会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物度，但是因为它是跟着意识形态来的，所以它也是意识形态。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搞理论的人是相信这个提法的，认为斯大林的著作是后出的，他可能概括了更新的经验，改正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不很确切的东西，因此对原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的提法就忘记了。

过去我也有这种想法，最近一、二年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毛主席的提法比较妥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具体的说，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有三方面：首先是研究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第二是经济基础如何规定政治法律和上层建筑；第三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如何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又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问题。最后还要研究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研究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相互变

化发展的规律，如何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样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系统性了。

下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所谓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是讲一切社会经济变化的普遍规律，不是讲某一个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研究各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学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比较普遍的规律。

要研究这个普遍的变化规律，主要的是要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经济基础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影响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所以第一个基本矛盾问题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其次就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相互关系问题。经济基础怎样规定了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怎样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如何对它们起伟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经济基础规定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又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上层建筑一方面属于社会存在，一方面又属于社会意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各种问题中最复杂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们写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最多的篇幅是分析这个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复杂性比较少一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矛盾，所以首先弄清楚这个矛盾问题，然后才能弄清楚其他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第二个基本矛盾。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主要是抓住这两个基本矛盾。这两个矛盾是一切人类社会任何一个阶段普遍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的意思就是：它也是比较普遍的对各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这样一种矛盾。社会历史有两类基本矛盾：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次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思想是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们才清楚的，以前是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决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至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作为基本矛盾来看，现在看来不应该这样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析、研究这两个基本矛盾问题，这两个基本矛盾分析得清楚，问题解决的正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也就能把握、能认识。

现在我们就分别讲一下这两个基本矛盾。

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矛盾、决定一切社会形式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分析这个矛盾，一切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个矛盾运动的表现。

这个矛盾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想先简单的讲一下，所谓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互相依赖互相排斥，又统一又斗争，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么了解呢?也是这样了解：一方面要了解它的同一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个相互依赖就是：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总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依赖；另一方面，生产力又对生产关系有所依赖，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跟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是相互依赖。但是又有相互排斥的方面，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差别的，差别就是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有所不同，生产关系总是比较缓慢的，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比较迅速一些，所以生产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处于相对的静止。当然，生产力也有相对静止的时候，但是比较少一些，生产力也有它的不同阶段，但是它更活泼一些。所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常有不适合的地方，或者基本不适合，或者某一方面不适合，这样就跟生产力有所矛盾，就有排斥，就有斗争。或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名词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在不适合这些方面时，总是障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生产力就是斗争，就是排斥。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生产力一定要突破生产关系的阻碍，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个规律，是这个基本矛盾规律的核心。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它不能长久的不适合可是总不能完全适合，在不适合的时候又要改正，这样就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这个运动就影响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抽象的原则，可以讲的很简单，只要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行了，我们抓住这个中心是很重要的，是有现实意义的。

斯大林的著作特别强调这点，在理论上是有功劳的，他强调这个规律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有关系，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生活研究方面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必然王国变成自由王国，要对经济生活给予自觉的指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中心问题就是要认识如何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切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经济工作的指导，中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性

质的问题，说得复杂一点，就是如何去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做经济工作，研究经济问题，如果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任务就会使我们的头脑清楚一些，经常注意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如有不适合就加以改变，这样在各种工作中，研究各种问题的时候头脑就比较清醒。

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我们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头脑不很清醒，不管适合不适合，乱搞生产关系问题，不仅在生产力方面瞎指挥，在处理生产关系上也有瞎指挥。苏联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害怕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想去主动改变生产关系。苏联“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纲领以及赫鲁晓夫的报告，都几乎没有讲到如何去改变苏联现有的生产关系问题，总是讲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把经济学庸俗化，把经济学变成技术学，没有考虑到经济学主要的是处理生产关系问题，当然也涉及到生产力，主要的是解决生产关系如何变化、发展，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民主革命时期，1947年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中，就说到我们的革命任务就是改变旧的、封建的、买办官僚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因为那种生产关系把生产力压着不能发展，这是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有这样的任务，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我们要注意经常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尽可能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跟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或者基本不适合，因此要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这是革命时期的提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生产关系大体上跟生产力的性质适合，因此我们的任务就不是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再这样提就“左”了。这几年，有许多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强调不断革命论，没有注意到革命阶段论。有的人在理论上，在实际工作中想把生产关系很快的作根本改变，认为生产力需要解放了，把生产力估计的很高，认为很快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调整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使它最大限度的适合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跟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斯大林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就讲过：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个话是对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尽可能的适合生产力的要求，是我们生产工作、经济工作很大的问题。不能仅仅谈

到技术，只谈到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方面，技术再好，生产关系搞不好也没有办法使生产力发展起来。生产关系调整了，技术就会起作用了。

所以，在经济生活、经济工作中，正确的指导就能符合这个规律，错误的指导就违背这个规律，错误有“左”的也有右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可以从各方面来，思想根源也可以从各方面来。所有的错误只要有路线性，系统性，方向性的就是主观主义，暂时的、部分的就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都是有主观片面性。但是片面不一定是主观主义，基本上全面了，就不能说是主观主义。当然，全面也只能说是基本上全面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大体上全面，就是正确了，我们所说的片面成为毛病了，就是比较大的片面性，就有主观性，坚持下去就是主观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这样。但是还可以具体分析，对经济规律掌握不好也就是错误的根源，不善于掌握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也是错误根源。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不敢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像陈独秀那样，害怕根本革命，怕得罪资产阶级。“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是由于对生产关系改变的要求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样一种分析是不是适合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恐怕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有过右的思想错误，也有过“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56年以前过渡时期，由于有右的错误思想，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个提法毛主席批判过，指出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还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制度，其中还有资本主义成分，是不是要使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长期和平共处？我们的任务是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不能提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不敢或者不愿意根本改变生产关系。但是，那个时期“左”倾冒险主义也有，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搞起来以后就发生“左”的倾向，希望一下子把资产阶级消灭，而且提出来对资产阶级采取剥夺的办法。这就是对生产关系改变的要求过早了，超过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后来中央给予了批评，并指出对资产阶级还要有统一战线，这种“左”的倾向就被制止了。

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基本矛盾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赖、相互排斥的。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上层建筑依赖基础，反过来上层建筑又为基础发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基础又依赖上层建筑，总是相互联系又有斗争。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

落后于基础的，它反映基础、适应基础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一般的都是这样，先是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然后形成政治运动，然后才有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概括。我们学习世界史就有这样的问题，它讲无产阶级运动先有经济斗争，然后才有政治斗争。先有一些罢工，1824年前后开始有危机，危机中就开始有了比较大规模的经济斗争，那时已经有了英国的工联会的组织。再过几年，到了1830年才有政治运动，如法国的里昂暴动。政治运动虽然有政治思想指导，但是法国当时还没有有体系的政治思想，到了1844年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才开始形成。所以，基础跟上层建筑的顺序是这样的。在具体问题中就复杂了，有时经济运动也有政治思想，有经济运动就有经济思想，有政治运动就有政治思想，但是有体系的政治思想必须在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时候才有，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在1848年以后才有。所以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顺序，先有经济运动，再有政治运动，然后才有思想体系。思想体系形成以后，这个过程就倒过来了，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然后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然后就形成了无产阶级自觉的政治运动，才能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搞了几十年，才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是这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在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以后建立？这个过程不是违背存在决定意识吗？这个怀疑之所以产生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个变化过程割裂开来了，实际上要考察历史的过程必须从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个规律是很清楚的。先有存在决定意识，然后上层建筑对基础起反作用，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规律。先是有经济变化，然后就形成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就推动新的思想意识的形成，这里有联系，又有斗争，形成一个新的意识就要向旧的意识斗争，这是矛盾。有了新的意识形态，然后就反过来促进新的政治运动，这里也有新旧政治斗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结果得到了革命运动的胜利，再进一步反映到基础上，这里也有经济方面的斗争，这种过程就很复杂。基础和上层建筑互相依赖、互相斗争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但基础与上层建筑有矛盾，而且基础本身也有矛盾，上层建筑本身也有矛盾，这是很复杂的。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任何一个社会基础本身都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基础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最清楚了，因为首先就有经济上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同，所以修正主义就利用这一点说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政治

上没有矛盾。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矛盾的，工人和农民之间有矛盾、还有收入上的矛盾，高薪阶层与低薪阶层也有矛盾、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了。波兰有一个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波兰虽是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但是有时有些地方跟苏联不一致，不过波兰的经济学家只是一般地讲社会主义社会有分配的不同，就形成了阶层的不同。基础本身就有矛盾，任何时代的经济基础都有矛盾，因此就反映到上层建筑也有矛盾。

经济基础是一种经济关系，讲到关系就有不同的人的关系，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就是政治关系，就是政治上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阶级社会就有阶级斗争，阶级统治。不能把专政看成是单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反映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个政治关系是经济上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这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反映到意识形态里面，又表现为思想关系，这个思想关系，有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上层建筑，不是单纯的讲一种思想是某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理论界过去有这么一种想法，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只有一种思想，其他思想就不是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一种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不光能反映这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同的思想体系，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中有什么样的矛盾，有什么样的内容，在思想里也有什么样的矛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这样的话：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光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政治上上层建筑有不同的思想，有统治思想，有被统治思想。所以经济基础方面有经济上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政治上也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思想上也有统治思想和被统治思想的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统治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反映到思想上，无产阶级的思想也在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中存在，但是它是被统治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了，在经济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其中还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残余，这个残余包括在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包括农业的个体所有制。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的矛盾。要正视这些矛盾，只有这个矛盾肯定以后，才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有矛盾。所以，政治上必须要由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说国家是全民的国家，总要有一些人作为专政的对象，有一些人代表资本主义残余，而这个残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实际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反对就产生矛盾。这个矛盾可以有两种性质，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有一小部分需要用专政来解决。要肯定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里面也包括思想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在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要经常注意保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不是很小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政治上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又能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就能对政治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就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思想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建设就能保证高速度的发展，高速度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这就要靠上层建筑对它有正常的反映，也就是上层建筑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如果上层建筑的统治关系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在思想上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占了主导地位，修正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就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全民的国家，再进一步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就不能逐步发展为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就不能很好的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它适合于生产力的需要，苏联就有这个问题。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对，大家可以考虑。

3.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这个题目也可以改为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人的问题，因为历史一方面是根据客观规律的发展，但是历史又是人的活动。所以历史科学跟自然科学不同，历史科学一定要研究人的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要有这样的体系：首先是解决社会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然后进一步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然后再说明这些矛盾规律怎么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离开人的活动，历史的规律就不存在，规律性只是普遍真理，一切普遍真理都是通过具体事物来实现的。这是普遍性与特殊

性的关系。历史的特殊性，就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最后就要研究人的活动问题。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摆在最后一章，这也是客观规律，它不能摆在前面，说明客观规律不讲人的活动，历史的特点显不出来，所以最后要讲入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人的问题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的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人的活动力量就推动历史前进，所以，人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所有这些客观规律、历史规律都和人的活动有关系，比如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是人的生产力，是劳动者的生产力。

怎样给生产力下定义，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就有这个问题：“一种商品，如果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其价值量也不变。但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上的每一种变化而变化。”（《资本论》第1卷第12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18页）这段话可以给生产力做一个定义，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上的每一种变化而变化，就是说，生产力在一定的劳动时间里面，劳动者能取得一定的物质财富，或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一定就有程度的不同，一定程度就有大小，这里就有劳动时间的限制。

生产力也就是人的生产力，以人的力量作动力。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什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关系就是阶级之间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思想关系也是人的思想斗争的关系。所以人是历史活动的动力。这个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反动的动力；一种是先进的动力。反动的动力是指反动派，先进的动力是指革命的人。所以，如果不研究人的关系问题，只抽象的研究客观规律就不能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我们讲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关系，着重就讲这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力，人民群众包括什么群众呢？主要的是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劳动群众是社会发展一切力量的来源，劳动群众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

历史的发展如果很缓慢，处于停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找原因，归根结底可以从劳动群众这方面去找。在历史的过程中，劳动群众被压抑，不能翻身，生产力很低的时候，如封建社会没有农民暴动，劳动群众不活跃的时候，历史的发展就停顿；劳动群众活跃了历史就发展，就前进一步。所以，劳动群众的积极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劳动群众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劳动群

众有不同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才能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才能解放自己。

另一方面，劳动群众的力量是需要组织，需要指导，才能发生作用的。劳动群众创造物质财富要经过集中，才能形成集体的精神财富。劳动群众不能自发地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组织自己的行动。这个组织作用，领导作用，集中起来就要归到杰出人物的作用。杰出人物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集中物质财富的力量，把它引导到某一个历史条件所允许的方向。封建时代的杰出人物能起一定的作用，汉武帝时，生产力很发展，物质财富就比较丰富，在国内开辟土地，在国外与周围的不同民族发生联系，逐步组织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武帝的领导起了进步的作用，当然破坏也很大，好的地方就是使历史推进了。这些作用在过去历史上是不自觉的。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我们是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人民群众是主体。但是这个主体要加以领导集中，因此，党的作用，领袖的作用在一定的斗争中有决定性的作用。有没有英明的领袖，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没有人民群众也不行，没有物质条件也不行。但是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没有善于集中、善于组织、善于领导的人物出来，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过去任何伟大的领袖都没有这个自觉性，而我们就要发挥这个自觉性，这就是掌握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我们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很大的创造。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又分两方面，一方面要相信群众，依赖群众，这也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力这样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要相信他、依赖他。另一方面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群众需要领导，需要组织。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实践当中就是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这样。

第 13 章 关于“五九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讨论 的总结

(1962.04)

【1962年4月，中央高级党校59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结束，艾思奇参加了该班全体学员的课堂讨论，针对学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总结发言，回答了大家所提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里是按当时速记稿整理，整理时只删去了关于人民公社及自留地问题，其余均保持讲述速记的原意，只作了文字、标点和段落的加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十一日)

我们今天结束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以前我讲了引言，现在再来讲结束语。有些问题再说一说我的意见。

首先，对这次学习中大家讨论的情况作一个估计。这次讨论得很好，主要的是大家都能结合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把理论方面的问题深入一步。和我讲的引言比较起来，大家讨论的内容丰富多了，我的引言只能是抛砖引玉。参加大家的讨论后得到许多启发，我现在才可以对许多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说明。在讨论中大家也涉及到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有些也可以讲一讲。现在先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留在后面再讲。

0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

大家提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像辩证唯物主义一样抓住一个核心来谈。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矛盾统一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马、恩、列、斯的著作里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根据，没有明确的讲这个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自己来考虑。当然还是要根据经典著作的精神来考虑的。这个问题是有必要解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在哪里？贯穿一切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个问题来谈谈我的意见。

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基本矛盾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问题的核心。

也可能有人这样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我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条件和起码原则。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首先是看怎么处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首先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因为社会历史有它自己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核心，因为它是最根本的原则。但是单单这样一个原则还不能解决社会本身的具体规律问题。如果仅仅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进一步研究社会存在是什么东西，社会意识是什么东西，还不能具体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不能把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区别开。所以，要把握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规律，关键问题就是进一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为只有分析了这两个基本矛盾，然后才能具体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这个问题要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来说明。不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不能说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各个历史时代的人民群众和个人是不同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而农奴和奴隶就不能？虽然都是人民群众，因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杰出人物，但是每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原因在哪里呢？要了解这个不同，就要根据两个基本矛盾来分析，两个基本矛盾分析不清楚，这个问题也不清楚。

总的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三个大问题：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两个基本矛盾的问题，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像辩证唯物主义有三大规律一样，都是基本问题，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两个基本矛盾问题。

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时，究竟以哪个问题为主要的呢？也可以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大，在短期训练班里就可以着重讲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别的问题可以不专门讲。我们在党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也要着重讲这个问题。因为解决群众路线的问题，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从理论上认清群众路线的重要，必须对于干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在学术理论上进行争论的时候，也要着

重讲第一个问题，因为搞社会科学，首先就要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专门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是理论斗争需要专门讲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短期训练班，不是为了解决专门的问题。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的中心问题，是分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着重讲了两类矛盾。我们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有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从哪里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来源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有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表现，有时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表现。有时为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和人也发生矛盾，比如 1956 年三大改造时就有人和人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1957 年的反右整风，有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敌我矛盾，这个矛盾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表现。在两个基本矛盾中，第一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中最基本的，是核心中的核心。

02.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中心问题

大家讨论中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规律的集中表现，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问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经常要揭露、要解决，其结果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个规律又可以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规律的核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可以从各方面说明，中心问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这个规律在斯大林的书上说的是经济规律，恐怕还不只是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最根本的规律，也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守的根本规律。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本书里反复讲了这个规律。现在看来反复讲这个规律有它的重要意义。但这不只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且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规律。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更应该相信这点。1952 年斯大林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规律，不很清楚，

今天就很清楚了。这个规律要反复强调，并应该经常注意遵守。如果不注意，我们一定要发生错误。这几年的错误就是不注意这个规律。

我们的错误都叫做主观主义，但是主观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看它的具体表现在哪里。民主革命时期主观主义错误的具体内容有哪些？现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观主义错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首先是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客观规律的掌握上，犯了错误。当然，这个主观主义错误的内容，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讲，如在政治上违背民主集中制，也是主观主义。但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首先是忽视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适应这个规律。今天我们反复强调这个规律有很大的必要。毛主席的眼光很远。1958年就提到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现在才深刻的了解了这一点。

要把这个规律的内容规定一下，怎样来理解这个规律，这个规律的内容怎么规定，怎么把握，这点也值得注意。这个规律可以从各方面来理解，也可以作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定，就是生产关系不能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性质，同时也不允许人为地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就是有这两方面的内容。根据这十几年的工作情况，根据社会主义的客观情况，根据大家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我看可以把这个规律这样规定。这两种情况都要反对，不反对就要发生错误。

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我们让生产关系比较长久的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要犯右倾保守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是在主观上想要使旧的生产关系比较长久的存在下去，害怕变革生产关系，因此使它落后于生产力；另一方面，如果企图人为地使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这几年来可以说主要的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为主要的倾向是人为的想要使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面。这几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样。1956年以前，有过右倾机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搞起来了，但是领导工作的人要把它砍掉，群众已经起来了，领导不去支持它，反而想把搞起来的东​​西砍掉，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个时候批评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并没有批评错，因为他对已经搞起来的东​​西，采取消极的态度。1957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主要的倾向是想要人为的使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发展的前面。生产关系如果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落后的比较多，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关系多少总是要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因为发展的速度不同，生产关系是比较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比

较活泼一些。生产关系稍微或者某一方面、某一个环节上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经常有的，如果落后久了就会有错误。生产关系如果是人为地使它超过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引起生产力的破坏。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使生产力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已很清楚的证明了。

现在要问一下：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这件事，会不会成为客观存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存在的。人为地想把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的情况可以做到，在形式上好像是走在前面，比如搞公社的所有制，搞全民所有制，使公社掌握了所有权和分配权，按照全民所有制的办法搞。形式上好像是走在前面了，这个形式也是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形式里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全民所有制，真正的公社所有制也没有实现，只是剥夺了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比个体的形式还落后。就这点来说，向“左”和向右的错误有共同点，当然内容还是有所不同的。“左”倾冒险主义做的结果跟右倾机会主义有共同的东西，因为都是错误，这点是共同的。所以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这种事情就客观规律来说是不存在的，生产关系只能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不能走在生产力发展的前面。

我们过去搞合作化运动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中国有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过去党校的苏联专家吉谢辽夫同志就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和他有争论。党的“八大”会议的决议上也有这种提法，毛主席就不同意，几次提出来修改，有人讲我们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认为没有这回事。

先进的生产关系要看怎样的先进，每一个国家的先进的生产关系都跟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有关系。我们的生产关系是适合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的，并不是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了。我们没有搞机械化就搞了合作化，我们的合作化是适合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的。我们的生产关系不是苏联的生产关系，苏联的生产关系适合于苏联的生产力水平的。当然，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总是比生产力要高一点才可以推动生产力前进，从这方面理解也可以。比如，还在工场手工业的时候就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不是生产关系已经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了，这样讲也有一些理由。但这样讲只是讲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先进的生产关系要这样看：一方面要看这种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两方面有些不同。如果讲基本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开始到没落，基本形式是不变的，都是资本家所

有制，一直到帝国主义阶段，也是资本家所有制。但是不能说因为基本形式不变，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场手工业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一样的。不能这样说，有它不相同的地方，这是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

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少研究，但是简单的东西也还可以说一点。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比较小，利用手工劳动，这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也是资本家所有制，但是一个资本家办一个工场，不需要股份公司。有了机械工业以后，小的机械工业，还可以一个人或几个人合办，大机械工业就不行了，开始有了股份公司，就要有资本家集团。资本家私有制就有这个问题，铁路就不可能由一个资本家的资本搞起来，就要搞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也可以由某一个家族为主，资本的来源是一个家族。一般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私有制不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它的资本是某个资本家集团垄断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但是部分制度还是要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时代大不相同。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的时候只产生了资本家个人所有制，股份公司是后来才产生的。生产力不发展到机械工业，股份公司是不会出现的，在工厂手工业时代，一般的说只能有资本家个人所有制，搞股份公司反而不方便，垄断更不必要，没有什么可垄断的。

所以，先进的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从开始发生一直过渡到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不变的，可以几十年甚至于一百年其基本形式不变，但是具体形式是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而变的。我们现在开始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工业上有了大机器工业，还不能说是电气化，部分电气化是有了，整个电气化还没有。工业的生产力比较高，农业还是手工业的生产力，没有机械化，所以我们农村的生产关系就要适应这种没有机械化的情况。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点也没有超过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性质，恰恰适合于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现在这种公社化的具体形式跟我们现在生产力的性质是相适应的，跟农业没有机械化的形式相适应。合作化、集体化不一定要先机械化，因为合作化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合作化是初步的，这种初步的合作化不需要机械化，可以先合作化，然后再机械化，有了机械化以后再进一步搞合作化，再进一步提高公社化的程度，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取得了典型的经验。如何使农村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情况，逐步调整，逐步提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摸到这方面的经验，老是停留在集体农庄的程度，集体农庄已经自发的联合起来了，但是领导还是阻碍它，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

我们中国这几年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虽然碰了钉子，但总结了经验，掌握了这个经验。

03.关于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问题

大家讨论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能很快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

我看，这是因为客观规律的掌握不经过一定的实践是不可能的。正像毛主席说的一样，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要经过一定的实践。反过来说，只要通过一定的实践过程，迟早我们总能掌握。这个过程有长有短。

为什么有的人迟一点，有的人早一点呢？是不是都可以早一点呢？我看是有可能的，问题是要注意掌握规律迟和掌握规律早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看能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个根本条件，通过这样的实践一定能掌握客观规律。但是如果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即使通过了实践，也很不容易掌握这个客观规律，甚至于就根本不能掌握这个客观规律。如果不是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时间就会很长，根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可能永远在必然王国里面走不出来。如果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总结经验，就可能很快的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由盲目性走到自觉性。

我们中国的经验就是这样，能及时的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能很快地掌握。从1958年到1962年四、五年的时间中我们掌握了人民公社的规律，就全国范围掌握这个规律来讲，时间也不算长，别的国家四十年还没有掌握完全，如果列宁还活着，也许早就掌握完全了。现在是修正主义的领导，根本就不能掌握这个规律，他不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合这个环节，只抓技术这个环节。我们也很困难，但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过去了，不一定。

在实践过程中，一定的时候不能掌握这个规律，因此就有错误，就“左”右摇摆，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还没有把经验总结起来。免不了在工作中“左”、右摇摆，免不了犯错误，这也是客观规律，因为认识客观规律要有一个实践过程，没有通过这个实践过程，也没有总结，发生“左”、右摇摆

也是必然的。这种“左”右摇摆的偏向，“左”倾冒险或右倾保守也是自然的。一般的讲，群众运动没有起来以前，右倾保守的偏向可能多一些，群众不起来就是因为有保守思想，领导上反映了这种保守思想就会出偏向。群众起来以后，做的时候搞的过头一些，就会出“左”的偏向。“左”的偏向碰了钉子以后，又可能回过来走向右的方面。“左”右摇摆的大小，也决定于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作指导。没有经验必然要摇摆的，但是如果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这些都决定于虚心谨慎。能虚心谨慎，就能实事求是，就能走群众路线，就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能这样做，大的“左”、右摇摆就可以避免。这几年来有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可免的，特别是个别省份已经带有路线性的错误。如果领导的人能真正虚心谨慎、实事求是，大的摇摆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小的摇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碰钉子要想掌握客观规律是不可能的。学习总是要花学费的，问题是花的多少，我们这几年学费花得多一点，部分地区花的太多了，如果搞的好一点就可以不出这么多的学费。“难免论”可以运用在小的摇摆问题上，小的错误上。但是大的错误，大的摇摆不一定是难免的，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也有条件。像王国藩公社一直增产，他已经避免了大的摇摆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将来去某个国家当专家，一定可以帮助他们避免搞“共产风”，也可能要小小的刮一点。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这几年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对世界上的贡献很大，我们得到了无价之宝。

04.关于革命和建设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

同志们讨论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求由逐步调整走向根本变革，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

我讲辩证法的时候也讲到这点。根据我们这几年来全部正面、反面的经验，好像应该有这样的规律，在工作中应该掌握这个规律。由一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是普遍规律，应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这个问题，要逐步提高，由各个环节部分调整进入到根本变革，由部分质变进入到全部质变。我们的经验是按照这个规律做工作就可以避免生产力的破坏，就可以一方面逐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程度；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可以发展。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做，就要发生很大的损失。

我感到斯大林讲到关于社会主义里面有逐步过渡的思想，有一定的真实性。逐步过渡这个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否定根本变革。我现在感到还是这样看好。这并不一定就是改良主义。因为这并不否认逐步调整进入根本变革，部分质变进入全部质变。而且这些运动还要通过群众运动。即使是部分调整，群众运动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环节上还是有必要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调整工作，因此就斯斯文文的像绣花一样地来搞。

社会变革不能这样搞，群众运动还是需要的，因为没有革命的运动就不能形成很强大的革命力量把旧的排除掉，把新的建立起来，推陈出新没有强大的群众力量不行。旧的东西不能很容易的退出历史舞台，旧制度的抵抗力是不小的。这种抵抗力量不是用武装力量去解决，不需要军事斗争，但是群众运动的推动还是需要的，没有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把变革搞透，只是这里搞，那里没搞。搞群众运动就不能斯斯文文的搞，因此就免不了过一些。问题是过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革命斗争、群众运动一起来就要做过一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比较大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要群众运动，因此也免不了做的过一些，可以避免太过了，但是不能避免某种程度做过一些，除非不要群众运动。当然我们要求的群众运动要以细微的工作作基础，通过典型试验然后再普遍推广。我们这两年没有典型工作、细微的工作作基础，所以在某些方面做的太过了，这是不好的，应该避免。但是，经过典型试验就能保证一点也不过？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毛主席讲的“矫枉必须过正”这个原则是真理，不能希望矫枉一点也不过正，而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一个东西变了，要搞直它就要搞过一点才能直，这也是一种事物发展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不能因为我们这几年搞的太过了，因此就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斯斯文文的调整，不能搞群众运动，一点也不应该搞过了，这是马克思主义跟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怕群众运动搞过一点。有的同志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超过生产力，刚才我讲了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就群众运动来讲，要树立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有一个群众运动，因此总得在做的中间过一些。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肯定这种说法。要搞先进的生产关系，要把旧的东西扫除的比较干净，新的东西必须在一个好一点的基础上，新的基础打一个比较结实的起点，就必须过一点，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中国革命的经验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很快，搞的时候是过了一点，1947年的土地改革有的地方就过了一点，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也有点过，但不是太过，完全不过的事情是没有的。我们细致工作的基础上搞群众运动，多少也要过一点，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土地改革搞的很透。当然也有不透的地方，像河南光山县群众运动没有搞起来，旧的东西扫的不干净，新的基础打的不坚固，所以就有地主复辟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搞的透，在全国得到政权六、七年以后，到1956年就全国合作化了，这样的速度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我们中国搞的比较普遍、比较透，这跟我們不怕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搞的粗糙了，就是太过了，有不应该的地方，是错误的，应该批判，代价也太大。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得到的是无价之宝，苏联四十年的建设也没有我们这样的经验。

05.关于先集体化后机械化问题

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在原则上是不是对？有的同志说，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做了，但是在理论上是不是应该这样概括？我认为是可以在理论上作这样的总结的，先初步的集体化，然后用机械化推动集体化。除了高度的集体化不能在机械化以前实现外，初步的、一定范围内的集体化，是在机械化以前实现的、实际上苏联也是这样，苏联普遍机械化是在集体化以后实现的，苏联28年开始搞集体化，30年才大规模的成为群众运动，这时还没有机械化，32年在农村的拖拉机才逐渐多起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是机械化，但是我们已经初步公社化了。我看在理论上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集体化有各种程度，不能说一下子就集体化了，生产关系是相对的稳定的，也还要有不断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并不是说就是绝对不变的，各个环节的变化还是逐步发生的。所以，我讲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在理论上的概括还是没有毛病的，更完全的概括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然后通过机械化进一步推动集体化。

06.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问题

大家讨论了生产关系包括什么问题。讨论当中有一个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按照斯大林的提法生产关系有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方面没有必要。

理由是生产关系就是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关系，第二个关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有没有必要?看起来也有点理由。我的看法，第二个方面还是必要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这个提法，还是可以不变的，因为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不是一般的指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因为一般地讲，人在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可以分别从各方面具体说明问题。

所有制也是人和人的关系，分配也是在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总的概念包括各方面。所以第二个方面是有点特殊意义的，不是一般的人和人的关系。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是不同劳动的时间内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也是指这些人在生产中相互所处的地位。比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处于主人的地位，奴隶处于奴隶的地位，就是人身完全依附于奴隶主的这种地位。奴隶主根本不劳动，要奴隶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奴隶要忠实的为奴隶主任意支配进行劳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是半奴隶主的地位，农民是半奴隶的地位，大部分劳动是依附地主，小部分劳动还是为自己，所以劳动的交换和奴隶社会不同。虽然这一小部分有时被完全剥夺了，但是按照理论上讲是有一小部分属于自己的，所以在劳动交换方面有一小部分不能由地主任意支配。

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对资本家没有人身从属地位，在法律上在交换劳动的市场上，工人和资本家是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是商品所有者，工人是劳动力所有者，资本家是金钱所有者，资本家要使用劳动力，就要向工人购买，在原则上按照等价交换，实际上不一定按照等价。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等价交换，这个工资保证劳动力的价值，保证劳动力的生活，同时还要保证他的后代继续成长受教育，工资本身不够还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这个等价交换是原则和实际大体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远不能这样，它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生活，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他还要劳动者受教育，因为工人完全没有文化不能劳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熟练的劳动力工资就高一些，原因就是工人和资本家虽然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在经济上还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位，这点跟奴隶社会是一样的，马克思说过工人是工资的奴隶。但是有一点不同，在法律上他没有人身从属的问题，在法律上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

所以，劳动交换问题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的交流，还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交换问题，这个交换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也没有剥

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拿的工资是保证劳动剩余价值，工人和农民之间是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生产关系有差异。所采取的等价交换总的来说是平等的，但是交换的结果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的生产力有不同的报酬，不同的生产力有不同的价值，熟练不熟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资有差别，但是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问题，只是劳动交换的问题。

关于生产关系第二个方面讲的比较多，主要的是因为骆耕漠同志在《光明日报》经济副刊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要了解生产关系不仅仅要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而且还要注意到劳动力所有制的问题。他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具体了解每个时代生产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一条根据，如奴隶社会的劳动力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封建社会的劳动力部分归封建主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归自己所有，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应该归谁所有？他认为应该归公有。否则，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完全。

这个理论在任何一个经典著作中都没有讲过，这是值得注意的提法。这个提法对不对？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可以“百家争鸣”一下，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同志可以研究。他把这个理论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创造，而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力应该归公有。这种提法如果联系实际，也可以看作有积极的意义，也可以看作有消极意义。如果说有积极意义，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公有，因此人的劳动力应该让国家调配或者让集体支配，从消极方来看，既然劳动力归公有，如果肯定这点，就肯定平调劳动力是有理由的，也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来的提法，那么，他现在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因为他没有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向来的提法来看，这个问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已经解决了。劳动力归谁所有根本不用提，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是不需要这样提。

生产关系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处理劳动者相互关系，劳动交换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方面还有必要讲，因为除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外，还有劳动交换的问题。如果不这样提，第二个方面就没有办法解决，这是地位的问题。按照斯大林的讲法，把它大体上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一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实际上这种的分法比较笼统。

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各有时代的不同，奴隶社会时代是通过法律上、道德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来达到生产过程中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个人身依附关系又叫做经济以外的强制关系。奴隶的整个劳动力，在法律上是属于奴隶主所有的，这个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保证了生产过程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保证了奴隶主在生产过程中任意支配奴隶，最后达到剥削的目的，这是奴隶社会人和人的关系，这不是劳动力归谁所有的问题，是劳动力归谁支配的问题。

封建社会主要方是经济以外的强制，人身的依附，但是有一小部分劳动者还有个人的活动，个人的经济。照斯大林的提法就是地主对农奴是部分占有，通过这种部分占有保持他在生产中、在经济生活中建立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最终目的是使得地主能剥削农民，在这样的生产关系里地主对农民可以有大部分支配权，但是有一小部分劳动者可以自己支配，自己处理自己的经济，这也不是对劳动者所有制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对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在经济生活中是处于支配地位，这样来达到剥削的目的。但是这个支配关系不是依靠经济以外的强制，不是依靠人身依附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在法律上跟资本家有形式上的平等，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在形式上来说，工人阶级对资本家是平等的，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建立，是依靠经济上的强制作用，是依靠劳动力的出卖和购买劳动力。资本家给工人一定的工资，在一定的时期内购买劳动力，当然不是购买整个的劳动力，而是在一定的时期根据契约的关系购买劳动力，然后强迫劳动者被剥削，这里没有经济以外的强制。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这样说：工人阶级把劳动力作为自己所有，资本家也承认劳动力是工人自己所有，但是这个所有权可以出卖，一出卖这个所有权就不是工人的了，所以，这个所有权也是形式上的，他不出卖就不能生活，一出卖就没有自由了，也没有平等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最后讲：资本家和工人在自由市场上是自由平等的天国，但是市场交换一结束，到了工厂里工人变成了奴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归自己所有也是形式上的，形式上他可以出卖，他不能不出卖，但是一出卖就不是自己的了，就归资本家所支配了。所以骆耕漠这种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归劳动者所有的提法，好像对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新的东西，但是不是全面，很值得考虑，这是应该注意的。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究竟“劳动力归谁所有”这种提法全面，还是“不同社会阶段相互地位的关系，劳动交换关系”这样的提法全面？需要研究。照我们现在的分析，提出劳动力归谁所有这样的提法不全面，不能概括每个时代各方面的情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归劳动者所有也是形式上的，实际上一到生产里劳动者就归资本家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究竟劳动力归社会所有，其中包括同志式的互助关系，还是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包括劳动力归社会所有？我认为同志式的互助关系更全面。而且，把劳动力看作是社会所有，这种提法恐怕是会出毛病的，联系实际还有它消极的方面。这个理论在大家讨论中，有的组已经注意到了，在这里值得提一提，现在没有跟他争论，以后可能有人争论，而且应该争论，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

这个提法我还有一个不同意的地方，就是他把人和物混淆在一起了。生产关系的第一个方面主要的是讲物的问题，即生产资料问题，人和人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相互关系。第二个方面是讲人 and 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讲人和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为中心讲人和人的关系问题，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看成是一个东西，都算作所有制问题，这就是把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混淆不清。对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和对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应该加以区别。生产资料是所有制问题，劳动力的问题，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是人和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为基础人和人的关系。

07.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劳动力归谁所有的问题，也涉及到资产阶级的法权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各方面，有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有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是有一个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在法律的形式上承认劳动者和资产阶级平等自由，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者，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利。资产阶级法权与封建法权之不同，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形式上的平等自由，实际上是阶级政治压迫的统称，在形式上没有人身从属的关系，没有形式上人和人的等级特权关系。而封建法权在形式上，实际上都有等级关系，封建的地主阶级对人民不仅是统治者、压迫者，而且在法律的形式上，在道德上都明确肯定从属关系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这种情况，形式上是同志，实际上不平等，也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有资产阶级法权，应该肃清资产阶级法权。实际我们在政治上也有

封建法权残余，如下级对上级是人身从属关系，我们各个地方组织里最坏的典型就有这种情况。另外，也有虽不是打骂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不应有的特权，实际上没有民主，上级说了算，下级不能提意见。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残余，这些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应该有。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不同了，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应该避免的，但是也有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有全部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还是要保留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讲的很清楚，不单是资本家所有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工人的所有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只有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资本家的所有制和工人的所有制，封建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有劳动者完全的所有制，特别是小农。法国革命以后，法国的农民都变成了个体农民。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照列宁的说法，分配劳动、分配产品的标准方面要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这也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没有等价交换的问题。资本家要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商品的买卖，劳动力的买卖是等价交换，这些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部分的继承下来了，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继承哪一部分呢？资本主义所有制不能继承，个人所有制留下一部分残余如农民的自留地以及一些农具等，这些至少在长时期内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保留这点残余。另外，产品的分配标准要采取等价交换，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继承的多一些。按照《哥达纲领批判》上所讲的虽然是继承，但是有很大的不同。“此地显然通行着一个规制那商品交换(只要这交换是同等价值的)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是变更了，因为在变更了的环境之下，除了他自己的劳动以外，都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供给，并因为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手段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成为个人底财产。”(《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20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4页)马克思只是一般的讲除了自己的劳动和个人的消费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供给，所以等价交换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改变，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个形态的同量劳动可以与另一个形态里的同量劳动交换。”(同上)马克思特别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所实行的等价交换，跟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等价交换虽然原则上一样，但实际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劳动者的等价交换原则和实际不一样，是有矛盾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原则和实际没有矛盾，是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社会和劳动者的等价交换。形式

不同，内容也不同，一个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个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实际就没有矛盾。

等价交换的运用，在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但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还是继承下来了，继承在按劳分配方面，这个原则跟资本主义购买劳动力是不同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这里就要注意，不要把按劳分配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里包含了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但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根本不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这个制度里继承是经过改造的，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旧资产阶级法权的等价交换。

1958年，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人民日报》上有争论，有一个叫郑继乔的写了一篇文章，硬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后来被批判了，他的理论是不对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动者的劳动给工资，但是，并不是按照劳动者实际所付出的劳动给工资，它里面有剥削。资本家按他的资本拿利润，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家剥削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因为没有人剥削人。虽然这个分配有高有低，有等级，也是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里不能否定。虽然有等级，但是没有剥削。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继承了资产阶级法权，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是不能不继承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水平，人的觉悟水平，都需要这样做。不到一切产品极大丰富，至少是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的时候，要废除按劳分配制度是不可能的。产品分配制度只能是有等级的分配，因此就有不平等，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跟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平等又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平等是在市场交换平等，在法律上肯定人格的平等。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在法律上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志间以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在这种制度里不能说劳动力归社会所有，或者归劳动者所有，说归社会所有也可以，说归劳动者所有也可以，恐怕说归劳动者自己所有更恰当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力，形式上归劳动者自己所有，一出卖以后就不是自己所有了，实际也不是自己所有，因为有劳动力不出卖不能活着，一定要出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真正的自己所有，自己使用劳动力来得到相应的报酬。说归社会所有毛病很大，社会可以随便平调。

08.关于经济基础是否包括生产力的问题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提法包不包括生产力？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还是要包括生产力。两、三年以前，报纸上，杂志上也发表过这样的主张，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同志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经济基础应该包括生产力，这篇文章没有刊登，大多数人不赞成。我现在也还不赞成。

我认为，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包括生产力，经济基础是一个制度，生产力不是经济制度。生产力是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它被经济制度所包括，但是它并不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上层建筑不仅仅适应生产关系，也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既要适应经济基础，又要适应物质基础。生产力是物质供应基础，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的力量由它的物质基础决定。这个问题在恩格斯的著作里有些地方的提法好像说生产力也是经济基础，其实不能这样理解。恩格斯在给施塔尔肯堡的信里这样说：“我们所视为是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一定社会中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被此交换产品(就存在有分工而言)的方式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504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31页)这是讲生产关系。下面又讲：“因此，这里面也包括有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也决定着交换以及产品分配方式”。(同上)这句话好像恩格斯把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也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了，我从前也这样看，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以后，尤金又作了解释，他根据恩格斯的这段话在经济关系概念里，其次包括有这些关系所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并且有事实上由各先前经济发展阶段遗传下来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和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以及当然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同上)尤金说恩格斯把地理社会环境，技术都归纳在经济基础里是错误的。那个时候都讲恩格斯的错误，现在仔细看起来恩格斯不一定错。仔细研究这段话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实际上并没有把技术和地理都看作是经济基础。下面他又讲：“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也决定着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方式。”(同上)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技术直接就是经济基础，技术决定交换。地理基础问题也是这样，他只是讲经济关系包含地理基础，地理基础是依赖经济基础活动的，并不直接就是经济关系，而是经济关系依赖发展的地理基础。环境也是这样，依赖环境来活动而被技术

所决定，根据恩格斯这段话来看，文字不是很精密的，但是从这句话里决不能得出技术和地理环境都直接是经济基础。这样的结论，恩格斯没有错。所以我是这个意见，经济基础只包括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不包括生产力。

09.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

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也可以作出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一样的规定，上层建筑必须去适应基础，不允许上层建筑长久落后于经济基础，也不允许主观的超过经济基础的发展情况。恩格斯在 1890 年，给施米特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是一般的讲上层建筑，是讲国家政权，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国家权力可能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那时事情就会发展得较快；国家权力可能逆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那末它在现代每个大民族那里经过一定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国家权力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进程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后一种场合，最终又归结于前两种场合中的一种。”（《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 卷第 493—494 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701 页）这是指什么情况呢？恩格斯没有举例子。就是指落后民族进入先进民族后，把国家打垮，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破坏了，恐怕是这样的情况。如蒙古侵略中国时开始把田地变成牧场。罗马帝国没落的时候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政权，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前两种情况。如果新的上层建筑跟原来的经济发展的方向一致，会重新把经济发展推动起来，如果跟原来的经济基础发展相反，这个经济就会垮台。这个问题就说明了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基础，不允许长期落后于基础。恩格斯在这里没有讲主观的超过基础的问题，实际上超过经济基础在客观上不存在，是人的主观上的想法、作法企图去超过基础，这也不允许。

举我们现在的例子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首先一方面不允许落后于基础，如果有落后的政治残余跟经济基础就有矛盾。有官僚主义就要克服。封建复辟在一个时候起作用，但是终久还是要垮台的。政治制度是这样，一个不适应基础的制度总得要垮台，看它维持自己的力量大小，国家政权，暴力强大，可以垮得迟一些，如果暴力受了损失就垮得快一些。帝国主义政权多半是在打败的时候垮台，革命也是在战争以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有，如俄国 1905 年革命是在 1904 年打了败仗以后，1917 年革命也是在世界大战后，1916 年沙皇打了大败仗，他的政权就

容易垮台。美国的政权到现在还没有垮台，他的政权力量没有受什么大的挫折，所以他稳定下来了，但是他终久要垮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反对民主集中制，这些都不是长久的，都是落后的，有些是反动的东西。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不是每一点，在任何时候都适应，就它的发展来看，总是要适应的，但是在具体情况下，不一定都适合基础。

有没有主观的想要超过基础的例子呢？也有这样的例子，想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早的消灭国家，想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没有国家，因为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就是有一个统治阶级，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国家变成全民族的就是没有国家了。列宁说阶级消亡了，民主制度也就消亡了，是指民主制度的国家消亡，如果阶级完全消亡了，作为国家的名词也就要消亡了。可是，国家消亡了以后，人民还是要有组织的，经济上要有总的领导，这是不是可以叫政策。有的国家政治是可以消亡的，作为经济集中的政策，还是要存在的。

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不要政策？不要教育？不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恐怕不会这样。民主集中制恐怕一万年以后还是要的，但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名词是可以消亡的，因为这种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是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有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集团，有需要镇压的集团，这个集团首先是对企图要进行反抗的资产阶级，也有一部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不良集团，如流氓，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以为在消灭国家以前，可以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主观的，以为可以超过经济基础，甚至过早的要求消灭国家，过早的要求消灭国家，是无政府主义。苏联的全民国家就是修正主义，所以，主观地把国家说成是全民的国家，实际上是跟经济发展相反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超过经济基础的主观提法。思想领域的上层建筑也有这种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落后的思想，反动的思想要反对，跟经济基础发展方向相反的思想也要反对，而且这种思想迟早要肃清，不可能长久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会比较长期存在，但是它要逐步被肃清，它不是长久的都是这样多。但是，另一方面，企图一下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主观的想要超过经济发展情况也是不允许的，这种思想终久要碰钉子，所以，上层建筑和基础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大家可以考虑。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明一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所以，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一种最后的决定作用，不是唯一的决定作用。

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有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决定作用，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这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唯心主义只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看不到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在历史上的运用，要看到两种相互关系。恩格斯在 1890 年致布洛赫的信中强调讲这个问题“…根据唯物史观，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或马克思从来都只不过是如此断定而已。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断语变成毫无意思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 卷 488 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95 页）恩格斯这段话在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必须的好好注意。下面讲到上层建筑对基础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起决定作用。“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进一步发展为教义体系。这是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同上）思想意识对历史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形式有时会起主要作用。所以过去历史上把经济因素说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就不能说明这点，因为当时基督教成为主要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在费尔巴哈以前，主要的是宗教，这跟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有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无产阶级建立起政权来的反映，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各种各样，法国是巴黎公社、俄国是苏维埃、中国采取人民代表大会，这跟当时参加革命的人的思想、主张有关系。俄国革命的时候，工人、农民主张有一个苏维埃代表会议，列宁把它集中起来。我们中国的工人没有把苏维埃的形式看作自己的形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搞过苏维埃政府，当时有的人对苏维埃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的形式。决定历史作用的东西是经济基础，但是所利用的形式还可以由别的东西来决定。所以，领导我们斗争的人就要注意民族形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是教条主义的领导，他不注意民族形式，硬要搞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东西不能长久，后来被毛主席给取消了。我们现在搞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各阶级、各民族都能接受，如果搞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农民还能接受，资产阶级就不能接受，所以，作领导工作的要注意如何运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

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但是形式方面的起的决定作用也要注意，因为它涉及到能不能联系广大群众的问题，不注意这个问题，国家就不能开展。所以，形式也不是小事情，它是内容发展所需要的形式，如

果形式搞得恰当，内容就好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搞苏维埃共和国，我们的统一战线就不好发展，不但对资产阶级、对农民的统一战线也不好发展。

10.关于政治组织、政治运动、政治制度不是社会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是社会存在。有的同志提出怀疑，我还是肯定原来的意见，属于社会存在的范围。斯大林的提法并不是否认政治运动、政治组织这些东西是社会存在，不过他的提法有点片面，有点颠倒。存在决定意识就要把存在摆在前面，应该是经济基础集中为政治，然后反映到思想意识。首先讲经济基础，然后讲政治，然后再讲思想意识，这样才符合马克思原来的提法。毛主席的提法，跟马克思原来的提法是一致的。斯大林的提法并不是否认政治是社会存在，但是他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政治制度不是社会存在，使人感到经济制度仅仅是思想意识产生的结果，好像思想意识决定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不能决定思想意识。他的顺序先是经济基础，然后反映到思想意识，然后产生政治制度，好像是经济基础决定思想意识，然后思想意识又决定政治制度。思想意识能不能决定政治制度？在起反作用方面来说思想意识可以产生政治制度，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先有了思想意识以后，才能产生政治制度。

实际历史顺序并不是这样，经济上有了变化，首先代表为政治现象，产生政治活动，然后才产生思想体系，思想体系形成以后，又反过来产生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然后再反过来推动新的经济制度形成。所以，就起决定性作用来讲，根据顺序还是先经济再政治，再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反映经济、反映政治制度。斯大林这种提法不是完全错了，而是片面的，对处理思想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有点颠倒，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的关系没有全面谈到。意识形态既应该反映经济基础，又反映政治制度，反过来又为经济基础服务，服务这方面是反作用，首先是反映然后是服务。

“基础”这两个字不能凭空用，不是一讲基础就是经济基础，基础有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对政治来讲是政治基础。政治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为政治服务，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文化反映这个政治，再为它服务，这样提是符合我们的政策的，不是文化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文化，反过来文化在服务这方面又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提法，好像是意识决定政

治，文化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又为政治经济服务。这不是把斯大林的提法和毛主席的提法对立起来，而是对斯大林某些提法的片面性作若干纠正，斯大林的观点并不是跟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观点对立，但是他有片面性，有毛病。

11.关于上层建筑的零碎问题

1.原始公社制度过渡到阶级的国家，是不是要通过暴力？

这个问题有争论。因为原始公社就没有阶级，这种阶级推翻阶级的暴力活动就没有。但是由原始公社到阶级国家要形成一个暴力的组织，不形成这个组织就不可能出现阶级统治的国家。要形成这个暴力组织就不能不通过某些暴力冲突或暴力战争，因为要有一部分暴力集团来压迫其它集团，所以这个冲突或多或少总有些，这个暴力活动跟阶级社会的暴力活动不是一回事，但是这个革命转变还是经过某些冲突的、希腊罗马形成国家的过程就是经过暴力冲突的。

2.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联邦制好，还是民主共和国好？

这两种制度没有什么对立。苏联的联邦制也是共和国，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恩格斯曾经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后来没有成现实。他根据德国当时的情况，提出推翻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后来没有出现。俄国革命出现了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共和国采取联邦。究竟联邦共和国好，还是民主共和国好？这不是哪个好的问题，而是历史条件问题。恩格斯当时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就适合德国的情况；法国革命就采取巴黎公社；我们中国就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民族特点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俄国革命以后，就是联邦制好，中国就是搞民族区域自治好。俄国原来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待国内少数民族采取殖民主义的办法，少数民族对沙皇政府有离心倾向。另外，俄国少数民族很多，俄罗斯民族很少，跟中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提这种口号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的信任，少数民族就不能很清楚的政府和沙皇政府有什么区别，所以要跟沙皇政府划清界限，就要讲民族自决，这样才能取得少数民族的信任。这样提口号反而使少数民族由离心走向向心，成为统一的国家。联邦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的。我们中国没有这种问题，我们中国虽然有汉族主义，但是我们是统一的国家，压迫少数民族的还是帝国主义，少数民族对汉族基本还是相反的，他宁肯受汉族的压迫也不愿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不提民族自决，我们很早的时候提过这个口号，后来取

消了。斯大林提的民族区域自治对中国最合适，在苏联提民族区域自治就要瓦解，不能联合各民族。所以，在苏联民族区域自治就不好，在中国搞联邦共和国就不好，联邦制在苏联是进步的，在中国就是反动的。这个问题也是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形式起决定作用，对各民族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对历史的发展形式起决定作用。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就决定我们要采取区域自治的形式，在这点上，上层建筑有积极作用。如果我们只从经济基础上来讲就不能说明问题，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为什么它是联邦制，我们是区域自治呢？就找不到说明，要找说明就不能简单的从经济基础来看，而要看各民族上层建筑的历史条件。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以不像教条主义那样简单地搞苏维埃共和国。

12.关于客观规律是否有发展的问题

有的同志主张客观规律有发展的，他根据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句话：“……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3页）所以可以肯定客观规律是可以发展的。问题是对客观规律的解释，说规律可以被改造，被人创造，但发展是它自己客观发展的过程。所谓改造，所谓创造，是人的主观作用，人的主观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也不能发展规律。发展是讲它自己客观上有这么一个过程，具体内容就是客观规律。这是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相结合，一般规律总是有具体表现，具体表现总是有发展。战争规律总是普遍的，但是这种规律如何具体表现，就有各种各样，如集中优势兵力，怎么集中法？可以打阵地战，也可以在运动战中集中，也可以主要在游击战中集中，这就要看历史条件的发展，根据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斯大林的提法是不是这样，有些时候规律的条件不同，就让位于别的规律，有些规律就是条件的变化了，也不让位。由自然规律变到社会规律就是自然规律让位于社会规律。但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并不让位，始终起作用，但具体表现形式发展了。所以，条件变化了，规律就被让位，是讲具体规律。任何规律总是有普遍规律和具体规律，普遍规律总是寓于特殊规律之中，因此普遍规律在具体生活之中总是变成各种各样的具体规律。

13.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 问题

质量互变的规律不可以分开?但是,又有密切联系。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这个理论原则是在政治斗争中提出来的。

我们指导革命应该注意革命的发展要有阶段,但是又要不断革命,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只能贯彻一定的路线,要有阶段,同时又不能停顿。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在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质量互变的规律是辩证法普遍规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具体表现。

14.关于飞跃过程中有没有量的积累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准备多讲,主要的是要注意飞跃的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个飞跃,一般的都有这种情况。有些飞跃过程是逐步过渡,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一种社会制度才能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中国由49年到57年,过渡了八年。这八年就是由阶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八年是一个飞跃,但是这个飞跃是相当长的时期,所以它本身又构成一个过渡时期,是由阶级社会到基本上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这个过渡是整个时期,就有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1957年以前是量的积累,57年是一个飞跃。57年以前又有几个阶段,初级社、高级社的合作化阶段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把辩证法用到实际生活中要注意它的复杂性,根据不同实践要求,作不同的分析,不要简单化。

15.关于生产力的性质应该怎么了解的问题

生产的性质作一般的表示比较难,只能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比如手工业的生产性质是分散的零碎的,所以,适应这种性质,经营规模就不能太大,小规模的合作化可以适应这种性质,但是合作化的规模大了就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生产过程是社会公有的,因此适应它的生产关系最好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适应。

性质,水平有什么区别?这没有什么区别。水平是高低,在一定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之内,能产生的平均数量就是它的水平。这个定义可能有意见,认

为是把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混淆了，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劳动生产率是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能产生的具体物质财富；生产力是讲平均生产时间里能产生的使用价值、财富的能力。

16.关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

为什么这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以基本矛盾为中心，不以国家问题为中心？我们的国家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这个理由是不是对，应该不应该这样做，还值得考虑。同时，大家在学习中，实际上是以两个基本矛盾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首先还是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可以作为我们的教学经验，以后我们怎么讨论好，大家可以谈一谈，把这个经验总结一下。

第 14 章 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

(1963.06.10)

【这是艾思奇给中央高级党校 61 班党员干部所作的问题解答中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题目，艾思奇只讲了一个轮廓、要点，但是，讲得比较集中，又简明扼要，所以单独成篇。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文字加工。大小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

学员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哪些发展？

这个题目很大，要求系统的介绍这很困难，只能讲一个大概的轮廓，讲讲主要的发展。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全面的。所谓全面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最主要的东西都有发展，这里就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

1.正确解决了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唯物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识论问题。

认识论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正确的认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认识，就是杨老(即杨献珍同志——整理者注)所说的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最近中央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问你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认识论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主要是解决什么是正确的认识的问题，反复解释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存在第一，思维第二，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反复解释这个问题为的是什么呢？杨老讲了很多，我不再讲了。反复解释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认识，什么是错误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就是遵循着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原则，就是注意到认识必须反映客观存在，思维如果不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不是根据客观存在

产生自己的思维，而是脱离客观存在，那就是错误的思维。错误就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了实践，不管什么错误都是这样。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列宁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那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想在理论上、学术上用诡辩的方法混乱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所以列宁有的放矢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了很大的力量作了彻底的粉碎性的打击。

列宁有没有“正确的思想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方面。《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有两章是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全书里占的分量比较小。

毛主席有什么发展呢？

我看毛主席的发展就是正确解决了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列宁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毛主席在列宁解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充分地解决了。列宁解决的很简单，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标准这个问题解决了。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把认识过程规定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感性的直观，第二是抽象的思维，第三是实践。列宁简单地写了一个公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解决，但是没有作充分的，系统的解决。

毛主席特别作了系统的、充分的解决。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一直到最近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系统地充分地解决了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是很大的贡献。列宁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充分地解决了，并且作出了完整的公式。这就是《实践论》最后一段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297页）这个循环也是否定之否定。实践，认识，再实践，经过一个循环，认识就进一步，就有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实践”，是要去做工作。“认识”，就是把工作转为反面，又思考，否定了工作，从事思考，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思考的时候不工作了，可是工作经验就在思考中间得到提高的，然后思考之后又进一步实践。进一步在实践中把思考的东西作一个检查。错误的东西把它丢掉，正确的东西肯定下来。每一个循环使认识提高一步，多次反复循环的结果就可以得到比较完全正确的认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实践、认识过程又用另外的形式来表述，就是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过程。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不断反复，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样完整地来说

明认识过程，完整地论证正确思想从何而来，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新创造，是重大的发展，是对最根本原理的发展。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毛主席只发展了这一方面，而是说主要发展了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至于正确认识和错误的区别，这个问题，毛主席当然也有发展，在很多著作里都提到这个问题，主观要符合客观。我们党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要划清界限，以后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里讲到：重要的问题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我们就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认识要符合客观情况。最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又讲到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以前，首先提出存在决定意识。毛主席在这一方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正确与错误界限划分的原理，那么有什么发展呢?这个发展主要是适用在实际工作里，在实际工作里区别正确与错误。

所以，列宁主要是解决了划界限的问题，而毛主席是更重要地解决了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是不是说，毛主席凭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点都不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马恩列斯已经知道的东西，毛主席更加发展了。以前，我讲过一个比方，说毛主席的发展好像树苗和成长的树一样，如果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来比，这样比不恰当。但是，就一个问题来讲，是可以这样说的，比如，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只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在《哲学笔记》中讲了三条，但是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实践论》，还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里也讲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列宁讲到的丰富得多了。像这样的个别问题，就可以作比方。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列宁只讲了两句话：“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可以说这是一棵树苗，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里，是树苗和成长起来的树的区别。就毛主席发展的一些突出的问题上讲，可以看出是树苗和成长着的树的关系。整个来说不好这样比。整个来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吗?在1959年时，中央同志已有这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主干，我们中国的经验是枝叶。这样的比方是确切的。当然这些比方并不是完全的，所以不要把它当作绝对的东西，任何一个比喻都是有缺点的。

2.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

毛主席在辩证法方面是有发展的。列宁主要有这样一些发展。确定了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的规律；确定了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等等。

列宁在讲辩证法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辩证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研究辩证法时，要着重方法这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就不懂得这一点，只是把辩证法当作几个现成的公式。以为研究辩证法主要是用一些例子来证明它。列宁着重在方法方面，就是怎么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第一句话：统一物分解为二以及矛盾的各方面的认识……是作为方法来看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也就是讲方法，认识事物不要片面，要从各方面来加以认识。

毛主席把列宁这个思想作了充分的发展。列宁提出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没有写出系统的文章加以充分的发挥。毛主席解决了列宁提出来的问题。《矛盾论》是把列宁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作了系统的解决。

这个方法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所谓矛盾的普遍性，就是我们运用辩证法的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个普遍原理，不要动摇，不要说在某些问题上对立统一规律不适用了。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就没有矛盾了。毛主席说：亿万年后都有矛盾。修正主义者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矛盾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没有矛盾了，发展动力已经不是矛盾了，发展的动力是统一。在很早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是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最初提出来不是修正主义的，是暂时性的错误。在斯大林死以前开始纠正这个问题，但是不彻底，修正主义把这个思想发展了，取消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讲辩证法-就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动摇。事物的发展，是矛盾推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首先要分析矛盾，绝不动摇。同时，在坚持分析矛盾的时候，又要注意每一种矛盾的具体性，特殊性，一定要注意具体分析，要注意

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整个《矛盾论》的精神，就是既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

这些思想，马、恩、列、斯都有，但是，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概括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有了这一点，既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又可以避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就是要修正矛盾普遍性的法则。我们坚持矛盾普遍性的法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克服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只讲矛盾的普遍性，不注意具体分析，就可能产生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东西简单地用到中国来，不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那就是教条主义，王明就是一个例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原理简单地运用到中国来，不注意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又有联合的一面，因此，就成为教条主义，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就可以在方法上保证我们在认识上能够正确地走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保证不偏到修正主义方面去，也不偏到教条主义方面去。毛主席说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所谓“精髓”的意思，就是保证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不会发生偏向。当然做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坚持这个原则可以减少偏差。毛主席解决了列宁提出来的没有充分发挥的问题，而是集中概括出来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像这样集中的说明，在以前的哲学著作里，是没有的。

3.明确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还有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问题。这是对辩证法的贡献，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进一步肯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思想当然马、恩、列、斯是有的。如果马克思生在今天，他也会像毛主席一样要肯定地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在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也早去世了，所以他们都没有作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不作出这个结论？因为他们严格地遵守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原理，没有实践的时候，他们不作这个结论。如果他已经有了这个实践，他们当然要作这个结论。纯粹用理论推理的方法，纯粹用演绎的方法，抽象思维的方法，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但马

克思他们不这样作，因为他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遵守自己建立的学说。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很喜欢没有根据地去作结论，而且以为自己很聪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按照实践的经验，纯粹从书本原则上推出结论。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王明这些人就是在中国经验一点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作结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面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我们的思维究竟是不是正确，不纯粹是从理论上可以证明的，而是在实践里得到解决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个问题不作结论，因为没有实践，不能作出结论。

斯大林本来有一点实践经验，1932年把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可是因为经验少，再加上有点骄傲自满，经验没有总结好，也否认了基本矛盾。

毛主席肯定了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新肯定下来。这个重新肯定，同时也就是发展。重新肯定这是一个普遍原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重新肯定这个普遍原理的时候，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作出了新的结论。虽然只说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一句话，但这是新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有没有这句话，关系很大，没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就会停顿。苏联现在的社会主义，按照生产力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按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仅仅是1932年的水平，最多是1936年的水平，现在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纲领，那是吹牛！这就是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新肯定了普遍原理，所以说是发展和贡献。

在肯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人和人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阶级的、民族的矛盾。这个原理完全是新结论，马克思时代是不能作出这个结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那时不但没有实践的根据作出结论，就是理论上也没有，但苗头可以看出来。马克思说：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是有阶级才需要专政。因此也可以估计到，马克思那时候有点估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有矛盾，但是他不作这个结论。毛主席

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毛主席明确作出这个结论，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有没有这个结论，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斯大林有伟大的贡献，他在苏联国内作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说建成，还差得很远。

斯大林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把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并没有使它巩固起来，进一步发展。因为他认为已经建成了，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毛主席的发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巩固，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方法讲问题，那么，在1956年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成了。毛主席没有搞教条主义的习惯，就不允许我们宣传，毛主席清楚地看出来这只是初步的建立。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提出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些问题呢？以前我们不了解，现在可以了解了。毛主席知道一个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之后，还要巩固，还要发展，将来还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

解决的方法就是分析出制度里有什么矛盾。首先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肯定是有矛盾，要去分析矛盾，所以毛主席首先讲十大关系。到了1957年，进一步总结和集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人的矛盾。在坚持普遍性的同时，又注意到矛盾的具体性。现在的矛盾有两种，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有两种情形，一部分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部分是敌我矛盾，把这个特殊性搞清楚，又坚持矛盾的普遍原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逐渐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为肯定了矛盾，就要经常注意矛盾，肯定还有阶级斗争，就要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经常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抓住这个线索，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巩固呢，就是因为有敌对阶级在破坏，不是个别的原因。毛主席看清楚了一些，巩固问题就好解决了。敌人进攻，你就打退他的进攻，我们巩固起来了。这几年来，我们辛辛苦苦，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很快就恢复了。资产阶级不甘心我们的恢复，又要来捣乱、破坏，我们就进行斗争，这样就能巩固，能巩固就能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如果解决的好，就可以很顺利的发展。

这些问题具体地要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解释，现在只能简单地讲一讲，讲一个比较模糊的轮廓。毛主席的贡献是什么，唯物主义部分的贡献是正确

的认识从何而来；辩证法部分的贡献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普遍性和特殊性；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贡献是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有人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思想。

第 15 章 简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认识论学说的新发展

(1963.07.15)

【1963年7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刚发表不久，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中出现：毛泽东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有哪些新发展?艾思奇根据自己的体会，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来，他在其它讲课中，又作过多次讲述。在这篇口述作品中，讲得比较集中，有一些独到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我们整理速记稿时，独立成篇。整理时删去了少数有关阶级斗争的事例。】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

学员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于认识论的学说有有什么新发展?

我要声明一下，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系统地讲，文件才发表不久，我也是正在学习，因此有许多问题讲不出来。现在，虽经过一些初步思考，但是要拿出一个非常详细、系统的意见，还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现在还是只能提纲挈领地讲，讲一个要点，讲讲我的初步体会。对于认识论的发展有哪几点，只讲一些我现在所体会到的，大家听了可以补充，如果大家在讨论中多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比我讲的还要充分一些。政策教研室讨论了这个问题，分析了一下，提出了一些意见，我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来讲的。

毛主席对认识论方面有一些什么发展呢?

1. 发挥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草案”里面已经做了具体说明。这是一个新发展。

认识的基础是实践，这个原则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已经是肯定了的，认识的唯一来源就是实践，认识的标准也是实践，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肯定了。但是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很明确地分析。当然也讲到了，《费尔巴哈论纲》里面讲到实践是革命实践，是社会实践。但没

有更进一步分析。毛主席在《实践论》里对实践的内容，也作过分析，这一次做了详细分析，更明确了、更深刻了。实践主要是三个：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使我们知道要找正确思想从哪里去找，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工作中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有底，现在我们更清楚了。

以前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是究竟依靠什么实践，是不很明确的，所以，可以有这种情形，口头上讲要依靠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但实际行动上却不依靠实践；在课堂上讲依靠实践，实际上找不到什么叫真正的实践。有了毛主席这种思想，我们现在很清楚了，任何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一定要投入生产劳动，要参加阶级斗争，要进行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也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里面的典型实验。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要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但在搞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先做一个实验，经过实验以后推广。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实验，这是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早已经提出来的，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做了。

毛主席在认识论问题上，具体分析了什么是我们认识的实践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说把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比较原则提到的东西，做了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这就是发展了。

2.揭示了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的规律

这个思想也应当说是一种发展。

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于这种思想说的很原则，没有像毛主席这样具体的加以发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里面提到了这个问题，逻辑的公式在实践上重复千百次以后才形成公理。这只是讲逻辑的公式，没有讲一般的认识，但逻辑的公式可以概括为一般的认识。所以可以说是原则上已经讲了这个思想，逻辑上的许多公式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千百次的重复以后成为公式，在人们的思想里面固定下来，他讲的是逻辑学。

毛主席发展了这种思想，人的一切正确认识都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完成。这种思想在《实践论》里面也有了，已经提出来一个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不断循环往复，这种循环每重复一次，人的思想就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实践论》里面的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思想，现在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比《实践论》又进了一步，认为对每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经过多次实践反复得到完成的。这个发展是很清楚的。正确的思想是实践不断反复的结果，这种思想应当说是一个新的东西，说明了正确思想要通过一个实践与认识的路线来实现的。

认识是一条路线，不是一种灵感。从前往往把认识当做是一种灵感，一个聪明人忽然心血来潮，就把真理认识了。这种看法有一点类似宗教的看法，有一个上帝对他特别看中的人，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面给他一个启示，于是这个人就了解上帝的意志了，就能够说出一切真理来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有这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人的认识好像一次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偶然的的机会，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想到一切正确观点，不必经过一条认识路线，不必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忽然一下子得到了启示就可以认识真理了。这是错误的，这是把正确的认识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

毛主席反驳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观点，指出正确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得到什么启示得来的，不是什么聪明人生来就会有的，认识一定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条认识的路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经过这条道路以后才能完成认识的过程。

我们要找正确的认识，一定要花工夫，在生产劳动中，在阶级斗争中搞科学实验，反复多次，毛主席经常举这样的例子，“六〇六”这种药品是经过六百零六次的实验，失败了六百零五次，最后六百零六次成功了。正确的认识要经过艰苦劳动得到的，不是睡在床上或者读几本书能得到的，而是要在阶级斗争，生产劳动里面经过辛苦的劳动，同时要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正确认识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是经过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路线得到的。

错误认识是怎么来的？可以反过来说，违背这一条路线，一定会得到错误的认识。脱离生产，脱离劳动，脱离阶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不做调查研究，不耐心在反复实践中间仔细思考问题，或者虽然是搞多少搞一些实验，可

是不用脑子，不让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陷在经验主义里，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一定会犯错误，也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如果是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这样的错误还可能会成为路线错误。这种错误自己不能发现，自己不能改正，因为没有能力发现，没有实践，又不想问题，错误就没有办法发现。

错误有两情形，一种是我们上面说的情形，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一定会犯错误，而且可能是犯大的错误，甚至是路线的错误，这种错误自己不会发现，自己不会改正，甚至碰了钉子也不会发现错误，如果没有外边的帮助自己不会发现。就是有了外边的帮助，自己不会接受教训。不虚心，永远也不会改正错误。碰了钉子，有外边的帮助，自己能够虚心起来，能够接受教训，可以改正。但是这种性质的错误自己没有力量发现，自己没有力量改正，要经过外边工作，有改变的可能，但也不一定，像王明这样的人，经过了工作也不可能改正。有的是经过工作暂时改正了，以后又犯错误，也有的是不认真改变认识路线，经过工作暂时改正一下，后来老毛病又犯了，这种人在我们党内也是有的，有的人就是不改正，有的人是改正了又犯老毛病。

错误还有一种情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来寻找真理，终归可以得到正确认识，但是，正确认识没有完成以前，可能有一个时候还有错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里面，会有一些错误，可能大也可能小，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带原则性的，但是这种错误自己有能力发现，而且可以改正，因为路线是正确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两种错误情形，不聪明的人要犯大错误，犯了以后自己不能发现，不能改正，聪明的人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自己有能力发现，有能力改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要求，不是要求绝对不犯错误，要求不要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自己能够发现，自己能够改正，这就是唯物主义。能认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做到这一点就不大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能遵守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这是毛主席的发展，这种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但毛主席具体加以发挥，加以分析了，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我们更便利。学习经典著作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这样对我们更好，对于我们处理工作，解决认识问题，更亲切，也更清楚。

3.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正确认识 的获得也是反复实践的过程

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我们人的正确认识也要通过认识过程，实践和认识不断反复才有可能完成。搞社会主义建设常常出现主观主义，以为我们有了政权，怎么搞都行，以为有了政权就不会有盲目性，有了政权就可以利用政权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不注意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反复过程。《实践论》已经指出了这种主观主义。

我们在工作中，以为有了政权什么都可以解决，实际上没有这么一回事。有了政权更要求谨慎，从实践中不断地反复找正确认识，因为没有政权我们可以小心一些，没有骄傲情绪，不容易犯错误；有了政权更应该虚心，不然更容易犯错误，有了错误更应当注意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更要小心注意到生产中间、阶级斗争中间去求得正确思想，更要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不提高这样的自觉性很容易犯错误。政权在手里很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生产，脱离阶级斗争，对待问题很容易不用科学态度，结果就出现了盲目性，就要犯错误。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还是有这么一个阶段：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是自发地在群众里面搞起来的，然后我们的领导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也通过科学实验，总结经验，使自发变成自觉。我们中央对许多问题都是这样的，先是群众起来，然后中央总结经验，做出了决议，决议是精神，然后把决议拿出贯彻，精神变成物质。在变成物质的过程中又总结，又变成精神，然后又拿去指导运动，又变成了物质。从1958年到现在1963年这五、六年，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反复过程，后来有了农业六十条，有了十中全会决议，有了今天的农村若干问题决议(草案)，这是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这个过程完结了没有呢？还没有，还要发展。

我们党中央是自觉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过这一条认识路线把群众中间的自发运动一步一步的提高到自觉阶段，每一个决议使我们的自发运动变成为比较自觉的东西，每一个新的决议都比一个旧决议更能够提高群众行动的自觉性，现在我们中

央的决议，就使我们运动的自觉性达到进一步的高度，当然，以后还会发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不但是在阶级社会里面，人的行动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也有这个过程。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自觉的过程差不多要到革命的时候，才可以出现，在没有实现革命运动以前，群众的行动差不多都是自发的，整个社会发展到革命运动出现的时候，才开始自觉。封建社会里面，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自发过程，到了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才有了自觉性，无产阶级自己就是这样，到了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时候，才由自在变成自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过程就不是这样，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一开始就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不是要等到社会发展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才出现自觉运动，不是要到这个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时候，才出现自觉。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里面，是不断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但是，我们经过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一个正确认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运动，也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不过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定要到社会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才有群众的自觉性，而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恩格斯说过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不断认识必然性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不是到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改变的时候，而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面就不断能够认识必然，使我们不断达到自由。但这个认识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不是运动一开始必然性就完全认识了，就能够达到充分的自由了。现在我们可以达到很大的自由，所以我们的经济好转得很快。

4.提出了把正确认识交给广大群众的问题

这个基本思想马克思有了，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为物质力量。只要把革命理论拿到群众里面去，就可以变为物质力量的思想，现在毛主席把它更具体化了。就是文字也有一些改变，把理论掌握群众改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文字上有了

发展，具体化了。至于内容更具体了，一定要注意把正确思想拿到群众里面去宣传，使群众能够掌握，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是根据错误的认识做工作，错误的认识被群众掌握，就变成了反动的物质力量。

物质变精神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成为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一个方面，是错误思想也可以被群众掌握，赫鲁晓夫的理论可以被群众掌握，那就变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变成了反动的力量。用正确思想反对错误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写八篇文章(现在成为七篇文章，把对印度的除外了，印度不值得提，不是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加上我们的 25 条，来对世界上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目的是为了群众掌握正确的理论，使它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变为世界的革命力量。

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不是一般的把正确的理论拿到群众中间去使他们掌握，还要把认识论也交到群众中间去。这一点特别深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使群众掌握了认识论，就能够正确掌握认识。

怎么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交给群众掌握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研究，一下子也很难说清怎么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哲学，要使群众掌握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群众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要靠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很重。怎么把哲学从课堂上、从书斋里面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武器，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就是我们搞哲学的人，我们干部和群众结合起来，和群众一起在行动上贯彻认识论，才能够解决问题，不能简单的靠嘴上说。我们可以在课堂上了解这个问题，对基层干部，对群众要靠像现在这样课堂上讲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主要的办法是靠我们自己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去，运用科学实验的办法，带着群众一起在行动上运用认识论，通过行动，通过实践使群众了解认识论。要不要讲课？可以讲，在自己行动的实践基础上，要懂得哲学的人讲一点，可以使得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的认识论变成自觉的东西，不过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只能在他的行动过程里面，工作过程里面指点一下。毛主席说，讲哲学不要讲长了，讲短一点，最好是在工作中、运动中抽时间讲几十分钟，这样可以使干部一下子了解根本问题。我们大家这样做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样来讲哲学，意义会更大一些。

毛主席关于怎么把认识论交给广大群众的问题，这对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如果我们领会了毛主席思想去做工作，就会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深刻的了解。我们做干部的人需要很好的学习，很好的了解毛主席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交给广大群众，首先是基层干部，以后要交给世界上的广大群众，把这个工作做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快了。

关于认识论的问题，就讲这一点。这只是我的一些初步的体会，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第 16 章 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来

(1963.07.15)

【这这是艾思奇为中央党校学员解答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讲得简明扼要，这是一个专门问题，所以，抽出来独立成篇。按速记稿整理，题目是我们加的。】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

学员同志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提出：怎样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对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评价？

这个问题可以简要地讲一讲。斯大林的哲学，特别是对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本书如何评价呢？

1.斯大林哲学著作的优点

首先应当肯定，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绝不是修正主义的著作。这本书简单明了，有一些地方也是相当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简单明了、字数不多，便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起来的著作，在以前的经典著作里面是没有的。斯大林这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马克思的一个愿望。马克思曾经有过这样的希望，很想把哲学用很简单、很通俗的话写出来。马克思自己没有写出一本通俗的，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斯大林这一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的愿望。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也是实现了马克思的这个愿望的。《实践论》，《矛盾论》在认识论问题上，在如何分析矛盾这个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著作更具体，更深刻。

斯大林著作的优点，首先第一句话就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党性，这是很突出的优点，和修正主义哲学比较起来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现在苏联有两个哲学教科书，根本不提哲学的党性。斯大林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一句话，修正主义是害怕的。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库西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取消了斯大林这一思想，也就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尽管他们长篇大论地引用了马克

思、列宁的话，但是他们取消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党性，实际上根本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前几次讲课中曾说，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著作在辩证法唯物主义方面看不出多少修正，这是说从字面上，形式上好像看不出什么修正，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讲实质上。在实质上是根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了。因为只要把要害的东西取消了，马克思的整个观点，把它重要一点取消了，这个观点就没有了。比如一个很好的机器，你只要把它的一个重要螺丝钉弄掉了，这一架机器就没用了，形式上好像还是那一架机器。修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就根本没有了。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什么别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这个词取消了，就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斯大林哲学著作的一个突出优点，是第一句话就讲哲学的党性，毛主席的《实践论》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性就是党性。苏联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全民的哲学，是人性的表现，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

2.对斯大林哲学著作的批评不能无的放矢

有些人批评斯大林说，他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了，这是无的放矢。他首先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然后分开来说，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理解，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用来观察世界的方法。所以，斯大林是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讲的。世界观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又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一个是理解的方法，一个是研究的方法，实际上还是方法。那种批评是没有意义的，是无的放矢，没有任何作用。

斯大林的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一条哲学原理都指出它的实践意义，就是说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点也是他的优点。比如这一条原理是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运用到实际中去怎么来解决实践问题，这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这一点斯大林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了，方法是指导实践的方法。这也是他的优点，这一点也很深刻。第一句话讲哲学的党性很深刻，每一条原理都讲到实践意义也是很深刻的。

苏联对斯大林有一个批评，说斯大林把哲学原理简单地拿来对具体问题做出结论。这个批评也是无的放矢。斯大林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

究实际问题的方法，一般不是简单的做结论，他所有的著作都不是那样简单化，而是用哲学原理对具体材料做具体分析。比如民族问题，列宁主义基础，都没有简单的套材料，或是原则加例子的痕迹。指出某一条原理的实际意义，不是把原理简单地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他总是说，这个原理作为方法来来看有什么意义，在方法上提供一个什么原则。

唯物主义肯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是一种世界观，物质在先，精神在后。这个原理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实践问题的了解，首先要研究客观规律，并不是说这一原理对某一个具体问题可以做出结论，一般的是告诉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它的客观规律，不要从主观出发。这是对的。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它的实践意义就是我们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分析矛盾，注意斗争。这没有什么简单化的东西。

斯大林解决问题一般不是简单化的，也许在个别问题上有，在自然科学上可能有，比如在处理李森科学派、摩尔根学派问题上，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这有一点简单化。摩尔根学派有很多是唯心主义，有很多是神甫、牧师，但有一些人不是唯心主义，像中国的谈家桢是摩尔根学派，但他不是唯心主义，他现在相信唯物主义。就算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了，那也是个别问题，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登徒子的办法，修正主义攻击斯大林就是登徒子的办法。

有些人批评斯大林，说他在结构上有问题，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论。这个批评也是不对的，讲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一个绝对的结构，要看具体情况，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面，把辩证法放在历史唯物主义后面来讲，先讲道德和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面问题，后来才讲辩证法。我们的教科书是先讲辩证唯物主义，后讲历史唯物主义，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论。这不是斯大林的问题，是苏联哲学家的的问题。斯大林这样做不一定错，在一定的条件下，怎么写更有利就怎么写，没有一个绝对的写法。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唯物主义，辩证法几乎没有讲，历史唯物主义在最后一章讲了一点。难道列宁错了？列宁没有错，当时理论上的斗争需要这样写，就这样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的、死的结构，它本身是发展的，灵活的，所以它的结构也应该是千变万化的。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没有一个规定，没有格式。比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讲辩证法的规律，也不是错误。

3.斯大林哲学思想的缺点和错误

斯大林专讲辩证法，不讲规律，可以说有缺点，但不能说是错误，斯大林不讲，别人可以讲，恩格斯已讲过，也就可以了。现在苏联批评斯大林的这些所谓错误，实际上不是他的错误，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批评到斯大林的真正错误所在。

如果说斯大林这本书有错误的话，我看只有两点：

第一，是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不注意到对立的统一。就是认为根本对立的東西是没有统一性的，统一的东西不能有斗争。这样一种思想就不对，在贯彻对立统一这个规律问题上有一些不彻底，这是在理论原则上有一点缺点。讲到对立斗争的时候，不承认有统一性，讲到统一的时候，不知道统一内部有斗争。这个缺点影响他另外一个缺点。

所以，第二个缺点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没有看清楚。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实际斗争里面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矛盾，首先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其次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统一的，因此不注意它有矛盾，特别是不注意它有斗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本书最后表示斯大林逐步改正了他的错误，肯定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矛盾，但是改正的不彻底。在书里面还讲到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会变成对立。这个提法很不清楚，怎么不会变成对立？我们现在很清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可以发展成为对立，所以他虽恢复了辩证法，但不彻底。

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恢复辩证法的情况，一直强调各民族、全国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这一条，认为上层建筑和基础没有矛盾了，这可以说是一种错误。

4.公平地评价斯大林哲学思想

斯大林的错误是个别的，不是要根本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修正主义。所以，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第一次由社会主义物质变为社会主义精神。在第一次物质变精神中间那个精神，不能完全反映物质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和缺点，但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特别是要首先肯定他的成就，肯定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然后来批评他的个别错误，这样才是公平的，像修正主义者那样，把他一棍子打死是有害的，是要打击无产阶级事业，打击共产党，不是真正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第 17 章 略谈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贡献

(1964.06.15)

【这是艾思奇在 1964 年 6 月 15 日给 59 班、60 班哲学专业所作的问题解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集中，所以单独抽出来独立成篇。这次问题解答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问题”已和另一次问题解答中相同的内容，合并整理成篇。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部分的问题解答，也已与另一稿合并。这个稿子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未增加任何内容。】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又叫质量互变规律。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是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转化，所以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化，也是最普遍的具体表现。量和质是最普遍的对立统一，普遍到任何事物里面都有，因为这两个对立性很普遍，人们用两个概念把它概括起来，一个是量的概念，一个是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概括了宇宙万物最普遍的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有联系，有斗争，又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这两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同时存在，同时又互相转化。

这些基本原理不讲了。根据大家的要求，在这里讲一讲毛主席著作里对这个问题有哪些主要的发展以及有哪些新东西，就我所了解的谈一谈。

1. 发挥了事物多方面的量和质的原理

毛主席着重发挥了对于每个事物，量和质的分析要注意到多方面，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多方面的质和多方面的量，不是一种事物只有一个质，一个量，量和质是多方面的。

这个思想在恩格斯著作里就有一点初步的说明了。我们学的《自然辩证法》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著作里讲了一事物有多方面的质，都肯定了，但在哲学上直接讲这个问题的只有《自然辩证法》。自然界里的一个事物有多方面的质，一种东西有化学的质，有物理的质。从前常常有人搞不清这个问题。比如水变成气，能不能算量变质？因为水变成气以后还是氢二氧一，

化学成份没有变，怎么能说质变了呢？就是因为不了解水变成气以后，化学质没有变，但物理的质变了。

毛主席著作告诉我们，要分析多方面的量和质。在毛主席的著作里，直接提到这个问题的首先是《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里讲到三个阶段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是敌我力量的变化。毛主席说：“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467页）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中，我们这一方面是一个退却阶段。在这阶段我们要损失一些东西，但也要增加一些东西。毛主席将它归结为旧的量和质与新的量和质。我们旧的量和质要损失，就是说有些旧军队要瓦解很多（在数量上瓦解很多）。因此，旧的质也随着量的瓦解也损失很多，向下了，而新的量和质却要向上，我们人民方面，由于敌人的进攻，又加上有好的领导，数量不增加，而质有了提高，因为经过锻炼，人们的觉悟提高了，觉悟的人民更多了。整个抗日战争中间首先可以分成两方面的量和质，旧的质和新的质，有旧的量和新的量。第一阶段主要是量的下降，生产受到削弱，土地也削弱了，人民遭受的压迫也更高一些，军队人的数量也减少了。这是量的下降，但旧的质也要下降。新的质在第一阶段上涨了，主要是质的上涨，新的量的上涨在后一阶段。所以，《论持久战》在量变质变问题上有新的发展，并要求我们分析旧的质和量及新的质和量，一个事物都有这两方面的质和量。

这个原则不仅可以运用在抗日战争上，也可以用在其它问题上。是不是对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说，在多方面的量和质中间至少有新的质和量，旧的质和量的区别。拿来运用到个人身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多少？我们马克思主义进步的质和量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我们落后的思想又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或者是新的质和新的量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的？我们落后的思想有多少，也就是旧的质有多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至少可以分成两个质和量。所以，《论持久战》中的这个思想，虽然是对战争的分析，但是也发展了量和质的普遍规律。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到毛主席关于量和质的辩证规律的新发挥。这是很明显的发挥。虽然不是直接的哲学著作，但是有哲学理论。

2.提出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在今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特别提到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的问题，要注意到一个事物有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质变不仅仅是总的质变，还可以有部分的质变，这个变化也必须经过量的积累才能转化。这个原理是十分重要的。这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解决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前，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也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要经过多次质变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并不是经过一个合作化运动，农民集体化过程就算完成了，以后就是一个纯粹建设的过程，纯粹的建设问题了。而且这一个建设问题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前是有这样的看法。斯大林特别提出逐渐过渡的思想。这样就把量变和质变搞混起来了。

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中讲的思想，我们还没有听到毛主席明确肯定还有一种逐渐过渡的质变，但是也没有反驳。比如，语言的变化是逐渐的过渡，你要反驳还要作些研究。文字的变化，可以肯定是有突变的。比如，我们中国的文言文变为白话文，是“五四”运动时突变的。这个突变以前，就有渐变，以前就早有白话文了，《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以前的白话文是被统治的。《水浒传》、《金瓶梅》各种各样的小说，都被看作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些大胆的思想家，如金圣叹就称赞这种作品，敢于把它列为才子书，跟司马迁的《史记》摆到一起。但毕竟这个新的质、新的量是处在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到“五四”运动才是一个翻身，白话文才变成统治地位。白话文的统治，也还是我们解放以后，才真正形成。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政府使用的文字，实质上还是文言文。解放后我们政府的文字才用白话文，白话文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工具，而且成为统治的、使用的文字。语言本身的变化，它在什么时候突变，就难说了。它有一点道理，总结这一点道理就把它引伸。所以，研究一些变化也是逐渐过渡，这也有问题。

斯大林在晚年时调查研究不够，虽然他主观上是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调查研究不够，所以有些问题看得比较简单，比较片面。还是毛主席这样解决非常准确。因为有总的质变，又有部分的质变。比如说，我们的过渡

时期，由第一个过渡到第二个过渡可以说是总的质变。由三种经济成份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单一的经济成份，这是总的质变。这个总的质变里面是由许多部分的质变构成的。比如合作化，它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就是由一部分一部分的质变构成了一个总的质变。

所以，提出这种部分质变原则，就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复杂的问题，使我们解决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比民主革命复杂得多。从前我们有点教条主义观点，以为三大改造完成了好像是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受苏联的影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认为三大改造完成了就是社会主义完成了。脑子里没有问题了，以为无论如何比以前简单一点。实际上一搞，复杂得很，比以前更复杂，斗争更隐蔽，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清楚就相当费劲。有时候敌我矛盾看起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有时候人民内部矛盾看起来好像是敌我矛盾。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还相当复杂，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前进。所以，这一点意义很大。

毛主席关于分析质和量要从多方面来分析的原理和部分质变的原理，是概括了我们的全部革命经验，包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后，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很好地研究。我们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以后，还要更进一步地、深刻地了解这个问题。

3.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证法上是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以前提出过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是在1840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来的，就是革命得到胜利以后要不停顿地继续革命，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他那时已经有了这个思想。法兰西革命是民主革命，他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革命，接着就要准备把革命进一步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这个思想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进一步发挥了。后来，托洛茨基把这个不断革命论作了曲解，把不断革命论解释成全世界同时革命。所以，不断革命论从托洛茨基曲解以后名誉就不好了，以后就不敢讲不断革命了。我们一讲这个原理，有些人就怀疑是不是跟托洛茨基的思想一样。实际上跟托洛茨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不断革命的辩证法，在根本上就是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宇宙的发展总是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变化发展的，一次又一次的质变发展的，宇宙发展不是渐变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的质的飞跃的过程，这个飞跃就是革命的新的质的变化。狭义地说，革命就是政治革命。修正主义就是想把革命这两个字解释得很狭窄：解释成政治上夺取政权，解释成暴力革命。我们不这样解释，我们把暴力革命看作是革命性质变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革命性质的变化不是只有这一种形式，一切质的飞跃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变化，这是根本的改变，根本的变化。根本性质的变化都是带有革命的意义。

宇宙的发展，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质变构成的，而在两个质变中间有一个量变的间隔，这量变的间隔只是一种质变的准备。所以，一次质变以后就要准备第二次质变。两次质变都是不能混淆的。两次质变有一定的间隙。所以革命是有阶段的，不能把两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同时进行两次革命的变化，同时两次总的革命的变化、根本的革命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要把这两次革命的变化看成是没有联系的。第一次的革命变化为第二次的革命变化作了准备。这个准备可以长也可以短，但是必须有这个准备。

量的变化过程是相对稳定的过程。相对稳定实际上是再一次质变的准备，再一次革命的准备。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以前，这两种质变之间的衔接是自发的。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以后，不是老是封建社会，发展几百年、上千年，而是自发地准备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革命以后就会停顿了。革命的阶级也就不革命了。以后又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地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就不同了。无产阶级参加了民主革命，就要把这种自发的过程变为无产阶级自觉地加以指导，促进这种发展过程。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来促进这个过程。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都有主观能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行动有目的、有计划。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并不妨碍以前社会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尽管当时在行动上有一定的能动性，可是它对客观规律并没有一个认识，它对资本主义规律没有认识，对资产阶级观点没有认识。所以，它的能动性就表现在眼前利益上。他们没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不能指导长期的革命，不能够高度的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的行动整个是自发的、盲目的。归根到底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而不能掌握客观规

律，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后，产生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克服行动的盲目性。资产阶级尽管有主观能动性，但是行动也是盲目的。他的市场是盲目的，生产是盲目的，他们的眼睛只看到眼前很近的一点，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首先是这个特点，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利益。不能够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发挥到能够克服盲目性，发挥到能够自觉地用客观规律来指导长远的行动，它只能应付眼前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一个新的质的程度，就是克服盲目性，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主动地长期地指导我们的远大行动。

能动性和主动性还不同，在《论持久战》里讲得很清楚。有能动性并不等于有主动性。有点理论、有点计划，并不等于自觉地掌握了规律，主动地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主动地用客观规律指导长远的行动。要把能动性发挥到主动性就要掌握客观规律，用这种规律指导我们的工作、行动，指导相当长久的活动。我们所谓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这样发挥，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地硬干，即使你以为发挥了，实际上没有发挥。因为被动是要碰钉子，要受挫折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我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认识了客观规律，经过调查研究；总结了这个规律，然后作出指导我们行动的计划 and 办法来。这样行动就主动了，避免了盲目性。那么，我们打仗就有胜利的把握，就可以使我们在战争中掌握主动，而使敌人处于被动。这样就有胜利的把握，即使不胜利也不会吃大亏。有时认识了客观规律，但对坏处想的不够也会吃点亏，但不会吃大亏。所以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可能失败，但是失败不会吃大亏。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提出来，所以讲一讲。

上面讲的就是量变质变规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就要我们在量变和质变这个问题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指导革命，所谓把量变质变规律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总的来说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联系。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是提到不断革命论，没有把革命发展阶段论补充上去。毛主席的提法就更进一步，更全面地体现了这个规律。一方面我们不要混淆了两个阶段的质变，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在一次质变以后，接着就要继续准备第二次质变。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要立刻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第一个过渡，完成以后接着就要搞第二个步骤，准备进行第二个过渡，不要使革命中断，不要使革命运动中断。但也不是一次革命，以后没有一点量变的间隙。没有一点准备也不会

有第二次革命。这就是量变质变规律。应用到不断革命问题上也是一种发展。在最近几年，不断革命论的内容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发展。

除了一次又一次的质变之间的联系外，还有一个是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的联系。在一次总的质变以后，它要准备第二次质变，但是准备第二次质变并不等于第一次质变完成。在为第二次质变作准备的量变过程中，还要经常作新的部分的革命、部分的质变。所以，不仅仅是在一次革命以后接着就要主动地准备第二次革命，而且在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过程中同时进行部分的革命，进行部分的质变。这种思想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是没有的。把质变和量变规律发挥的这样全面、具体，这是毛主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积一百多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积四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是经过好多年才总结出来的。经过惨痛的失败，经过出现赫鲁晓夫这样惨痛的失败，才得到这样宝贵的经验，不是轻易得来的。辩证法不是轻易就发展的。但是得到这些新的发展，有了这些新的理解，反过来对我们分析问题，对我们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可避免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因为我们有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作指导，我们现在在搞部分质变，不断革命。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思想，那么指导我们的工作就非常主动了。斯大林不了解这个思想，就是被动的。斯大林从1932年写《胜利冲昏头脑》文章的时候，恐怕就开始被动了。因为《胜利冲昏头脑》里说集体化出现了一点毛病，就沉不住气了，赶忙就压制，一压制就杀了和打了一些人。这一压制，富裕农民就得到支持。那时候是有些乱，但是贫雇农还是很有革命劲头的，有点过也是难免，但马上纠正。这样实现的一些合作化、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彻底，成了夹生饭。以后在1936年肯定社会主义建成这一思想不是偶然的。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说可以不要革命了。有些人用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不要革命了，不断的质变就不存在了。以后也就被动了，不是主动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主动性，那么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有了主动性，所以赫鲁晓夫之流就开始上台。

4.把量变质变规律具体化为工作方法原则

大家翻一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的第七段，叫作胸中有数。这也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的一个重要发展。

胸中有数，做工作要胸中有数。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了。不管是研究哲学也好，做实际工作也好，这一段话不能忘记。毛主席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2页）

如果不懂得事物的质量和数量的界限就是犯错误。质量数量的界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质量有一个数量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变质。毛主席还说：“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同上第1442页—1443页）。1947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这个问题研究的很多，这就必须有一个数量界限。还有打击面多少的问题，这跟革命的性质有关系。比如，搞土地改革，规定了只能打击百分之五，不能打击百分之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击百分之五，不能打击百分之五以上，甚至百分之十以上。为什么以打击面只能这样一个界线？因为地主阶级的人数大体上是这么多，所以打击地主阶级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你如果超过了这个界线，那就会打击了中农，打击了富农。你如果打击了百分之五以上，甚至百分之十，不但打了地主，富农，而且富裕中农也打了，打了富裕中农就超过了民主革命的性质。1930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是连富农也打，富裕中农也打，就是混淆了反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严格控制了这个界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击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其他可以不打击的就不打击。

总之，百分之九十五一定要团结。这个数量界限和革命性质的界线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一般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我们也可以说是发展。因为把它直接应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变为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辩证法。具体化也就是发展。因为以前也还没有应用的这样具体。所以，应该说是发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把哲学直接用在实际工作里边去，变成非常活的哲学。

第 18 章 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1963.06)

【这个稿子主要是根据艾思奇在 1963 年 6 月 10 日和 1964 年 6 月 15 日给学员作问题解答时所讲的内容，重新整理而成的。因为讲得比较多、比较集中，所以单独抽出来独立成文。整理时在文字和内容上以及逻辑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但没有增添什么观点，力求反映出艾思奇在这个问题的基本思想。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的关系是怎样的？辩证法的核心和辩证法的范畴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明确讲过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等等。我在讲课时多少都讲过一些这个问题，但讲得不集中、不透彻，所以，大家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根据我的理解，回答一下大家所提的问题。我讲得对不对，大家可以考虑，可以提意。

1.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地说过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做了，也这样说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讲到辩证法的特点时又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24 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概括《资本论》的总方法，他说这个方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对任何事物采取：一方面从肯定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否定方面来理解。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又是，又否；又肯定它，又否定它。

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范围内要肯定，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否定它。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从价值、使用价值，一直到积累，到资本主义灭亡，这中间一直是分析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时，首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作贯串一切的中心，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贯串一切的中心。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这是生产力在向前发展，他肯定了这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发展是为了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发展过程中，加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冲突，因此，就有了否定的方面。结论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顶点，这个制度就要垮台。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时，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当作核心。他是这样做了，只不过没有用“核心”两个字。

恩格斯也没有明确说过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恩格斯在当时碰到了“回到康德去”的潮流，因此，需要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反驳，要宣传黑格尔哲学中合理的东西，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本东西加以概括和说明，所以，把黑格尔哲学里面的主要部分概括为三个基本规律，对杜林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进行批驳的。恩格斯受到当时这样一个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是指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而没有突出来讲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8页）对于这一段话，我去给中央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辅导这篇著作时，曾经作了解释。我曾说，恩格斯这段话事实上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是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理解：“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有同志就提出一个疑问：恩格斯是不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辩证法的核心。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核心”，和列宁所说的辩证法核心不是一个意思。恩格斯不是说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规律里最根本的东西，不是这种意思，这里是讲整个发展过程里最普遍运用的规律，他总结了《反杜林论》前面所讲的否定之否定的许多例子，说明发展过程里都是采取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所以，应该说，一切发展过程里都是贯串着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切发展过程里的核心。这里很清楚，恩格斯不是讲发展根源。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还有这样的意思，“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构造他整个体系的核心。

所以，我们要注意，读书时不要拘泥于字句，不要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冲突。有时同一个名词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必要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社会必要劳动，一个是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一个名词可以有两种用法。恩格斯所说的“核心”和列宁所说的“核心”，不能理解为一个意思。

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是列宁。列宁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方面当时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阉割它的革命精神。修正主义要用庸俗进化论来篡改革命的辩证法。庸俗进化论认为，发展是量的增加和减少，否认质的飞跃。修正主义者就是用庸俗进化论的方法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列宁为了跟庸俗进化论斗争，简单明了地把两个世界观对立起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发展是对立统一的问题，是对立统一斗争的问题，提出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

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2、305页）

列宁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需要说明和发挥的任务，然而，列宁没有完成。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写了一部《矛盾论》，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问题，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阐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阐明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问题，阐明了对抗矛盾和非对抗矛盾的问题，等等，从而出色地实现了列宁的遗愿，完成了“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以后，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一书中，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矛盾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进一步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

2.辩证法三个规律的关系

我反复考虑，要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必须首先弄清辩证法三个规律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我以前讲课中讲过，辩证法规律可以讲它是三个规律，也可以讲它是四个特征，说它是十六个要素也可以，这就要看你是怎样理解了。归根到底，辩证法的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两个对立部分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对立的斗争和对立的统一。实际上，从最本质来讲，辩证法就是一个规律，一个特征，最根本的要素就是一个。所以，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只能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一种展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展开为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曾经使用过肯定否定规律的名称。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样的提法，适合中国语言的特性，比较整齐，大家已经习惯。我们一般不大使用“肯定否定规律”这样的提法，而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概念，大家已约定俗成，比较熟悉，同时，也可能比较更完全一点。所以，习惯于使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至于肯定否定规律这个提法，我们一般地不用，但到底能不能用，也还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讲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个概念的内容有一些缺点，但是，不管怎样，应该这样理解：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都是这一规律的表现。

为什么恩格斯说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基本规律呢？因为这两条规律比其他任何辩证规律的普遍性更大一些，它们是涉及到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规律，没有任何一种东西不受这种规律的支配。

有一些规律也是辩证的，但不是那么普遍，比如，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到实践，它虽然是辩证的规律，是思维认识的辩证规律，但这个规律只能用在人的思维过程，用到客观世界就不行，所以，只能是认识规律，不能叫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不能普遍应用，不能应用到其它问题上。因为它本身作用范围就不是普遍的，而只是思维和认识的规律，所以，它不能叫做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至于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不管是客观世界也好，人的思维也好，到处都能起作用，都是没有例外的。从高深的科学所研究的一些复杂

问题，一直到简单的日常生活，到处都有这种规律，所以，它们就成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辩证法基本规律有三个，但是，这三个基本规律并不等于就都是辩证法核心。辩证法的核心，只有一个，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3.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简要地说，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实质，只有从这一点上也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及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关系。

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呢？这个问题可以主要根据两本经典著作来回答。

一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本著作里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有一段话：“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这两种状态也就是量变和质变状态。“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这些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角度讲的，讲到了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的关系，讲到“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

另一本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过的那段话：“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这一段话可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

从上面这两段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弄清辩证法三个规律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系。

量变质变规律，这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里变化的普遍规律，一切变化总是逃不脱这个规律，总是这两种状态反复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来说，就是因为事物内部矛盾统一和斗争的表现。事物内部两个对立着的方面又统一、又斗争，这样就推动事物的发展。发展过程中，有时

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有时就突然出现激烈变化状态。因此，只有用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说明为什么两种状态互相转化，才能说明转化的根源。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泉源。不了解对立统一规律，就不能够了解事物自己发展的源泉。形而上学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它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就不了解发展是从哪里来的。列宁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说：“按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一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按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列宁接着进一步指出：“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5卷第306页)列宁的这几段话是很深刻的，可以帮助我们从事物上来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的关系，理解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如果觉得列宁的话太抽象、太原则，我们可以作点具体解释。事物发展为什么一个时候会是相对静止?为什么一个时候又能够稳定，以后为什么又不稳定了，有激烈的变化，又发生了革命?最好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来说明这个问题。两种状态的变化，是由该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矛盾斗争在一定的時候，还处在量的准备过程中，还没有到破坏统一性的程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能够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就处在相对静止状态。然而，矛盾斗争是不断的，在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势力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势力也发展了，但是，对比的结果，无产阶级势力更强了，这样，有朝一日，矛盾斗争激化了，无产阶级就会起来革命，斗争性就会破坏统一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就要被打破。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统一物的分解，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等等状态的破坏，变成相反的状态。现在世界上有僵持的局面，这个僵持的局面用什么打破呢?就是世界人民的力量正在发展，有朝一日，人民的力量发展到跟帝国主义相比，出现了很大优势，那个时候，这种状态就会破坏。这种状态破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帝国主义认为它的战争准备已经够了，帝国主义开火了，那个时候，僵持局面也全部打破；或者相反，世界人民的力量很强大，修正主义有了很大克服，革命斗争很发展了，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国家又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出现世界革命的形势。

所以，只能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质变规律，而不能反过来，用量变质变规律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不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而只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事物由于自己内部的对立而统一和斗争，推动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发展，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出现激烈变化的质的飞跃。

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发展，就是说，总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永远不向对立面转化这种发展过程有没有呢？绝对没有，没有一种发展过程是可以不向对立面转化的。每一种发展过程都有一种极端，一走到极端，就要向对立面转化。白天工作总有一个极端，因为工作造成疲劳，疲劳到一定程度，就非要向对立面转化不可，非要睡觉不可。休息也有一个极端，休息到一定程度非起来不可。躺在床上太久了也会生病。任何事物都会走到极端。议会民主制走到极端会变成法西斯制。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这篇文章里说：修正主义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社会民主制发展的结果，一定会走向暴力革命。如果精神上没有准备，会造成比应有的暴力革命更厉害得多的暴力革命。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的，每一个极端朝向对立面转化。

这个规律，古代的辩证法者也看到了，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祸福，到了极端，都会向相反方面转化。还有像：“穷则变、变则通”，穷到了顶点，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要变。不过，怎么样变，他没有讲。古代辩证法是有一些模糊，变到什么地方，不清楚，只说了个“变则通”。任何一个东西发展都有一个极端。在数学上有一个极限，一到了极限，就变成了另外的数字。战争与和平，战争总有一个极端，战争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和平。在阶级社会里，就有战争的因素，和平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有战争。战争与和平有互相转化的局面，也有一个极端。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有一个极端，到了极端，一定要向对立面转化，转化之后，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又要向对立面转化。这样两次转化的结果，否定之否定那个阶段就会在形式上重复肯定阶段里的某些特征，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最初阶段的重复，但这不是循环。因为两次否定，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一些相似，有的像得多，有的像得少。比如，有工

作、有休息，就像得多，第二天的工作和第一天的工作是相像的。有一些东西就不很像，但也有某些相像的。比如，个体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是不像的，但是还有一个特征像，就是个体经济也好，共产主义经济也好，劳动人民掌握自己的工具，劳动人民手里掌握生产资料。

否定之否定规律有没有普遍性呢？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恩格斯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到处都可以看到，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

有同志问：我们举的社会例子多半是讲从原始公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否定之否定，没有人讲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又到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把这些作为否定之否定的例子来举，这是什么原因？

并不是不可以举，是因为经典著作里没有举。经典著作里在说明问题时，不需要什么例子都举，他一定是举最典型、最显著的例子。不典型、不显著的例子不举，举出来要作很多的说明。用典型的例子，可以少作一些解释，问题讲得更简单明了。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表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都起作用。

封建社会跟原始社会有相同的地方，劳动者都有自己一定的生产资料，这一点跟奴隶社会相反，是奴隶制的对立面，但是跟原始公社所有制有共同点。原始公社是原始的集体经济，生产资料在劳动者手中，经济属劳动者自己所有。封建社会的劳动者也有自己的经济，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始社会。在封建社会，劳动者自己的经济是不完全的。在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基础上，个体生产者才有自己的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剥夺者被剥夺，实际上是讲的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又到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劳动者经济的对立面，封建社会的劳动者、个体经济转化为无产阶级，这样，就由自己有经济转化为毫无自己的经济。然后，资本家也被剥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又把生产资料拿到自己手里，又建立自己的经济。这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

不仅这样大的一个段落里否定之否定，列宁甚至这样讲，封建社会的垄断，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又到资本主义的垄断，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有封建社会的垄断，就是行会的垄断，不允许自由竞争，不允许有所发明，不允许传播技术；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不垄断，而是自由竞争；到了资本主义末期，出现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又对新技术发明采取垄断。所以，

凡是事物两次向对立面转化，都可以看出否定之否定的作用，第三阶段重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发展也都是如此。打仗之后要休整，休整之后又要打仗；我们党的发展也是这样，要有发展过程，又要有巩固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来一个大的发展，然后调整、巩固，到了一定程度又来一个数量的发展。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规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渐进到渐进性的中断，中断之后，又渐进，由量变到质变，又到量变，这也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包括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但是，质量互变规律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所以，必须把它单独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包括它，但不能完全说明量变质变的特点，所以又不能代替它。否定之否定只是说明事物的波浪式的发展，讲对立面两次转化的关系；量变质变规律还要说明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静止状态和激烈变化的状态，特别是说明社会中和平发展和革命变革的两种状态，实际意义很大。所以，要成为一个单独的规律。辩证法还是要分作三个基本规律，都是事物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但从它们的作用和地位来说，又不能并列，核心还是对立统一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源泉，还是来自对立统一规律。一种事物为什么向极端发展？为什么不能顺着一条直线发展下去？因为它内部有矛盾，对立面互相斗争，斗争中两方面都互相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的被支配方面转化为支配方面，这个时候就走向反面，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所以，从源泉来讲，只有用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才能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就不懂得为什么事物发展总是曲折的、螺旋式的。可见，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4. 哲学范畴和辩证法核心的关系

我先来回答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辩证法的范畴这个名词是不是确切？

说本质、现象、现实性、可能性等等范畴，是不是辩证法的范畴，还可以研究。现在教科书里这样写了，但是经典著作中没有这样写。教科书上所以这样写了，是因为1930年苏联批判德波林时，米丁这些人写教科书是这样写的。到现在我们都沿用这个习惯。现在看起来不确切，将来写教科书恐怕要改一改。我们曾经讨论过，但是没有想出适当的改写方法。所以，暂时还这样写。

实际上，有些范畴是属于唯物主义部分的，比如，现象和本质，是不是一定说是辩证法的范畴？现象和本质和认识论有关系，当然也与辩证法有关系。但是，现象和本质又是唯物主义的范畴。自由和必然，也可以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称作辩证法的范畴不很确切，需要改。

现在讲这些范畴实际是指什么呢？是指除了辩证法基本规律之外另外一些比较普遍的矛盾规律，总的属于哲学范畴。一般叫哲学范畴就可以了，单纯说范畴就不行。这些范畴不单只是思想领域里的范畴，这也是客观规律。如本质和现象，是客观的东西，不仅是人们脑子里的范畴。客观事物的范畴本身就包含着本质和现象、可能性和现实性、必然和偶然，这些都不是主观的。所以，这些范畴实际上所要研究的是客观事物某些最普遍的矛盾运动、矛盾关系。因为它也是最普遍的，所以归到哲学范畴里来研究。它不像经济学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等范畴那样，仅仅是经济学里的范畴。经济学范畴，超出经济学的范围就不起作用。现象和本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这些范畴，不管在经济学中也好，在自然界也好，都起作用。自由和必然这个范畴，在自然界中不起作用，只是在社会范围、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才起作用。其他一些哲学范畴，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起作用。比如，在人类思维中有没有可能和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实不知道的东西，以后都可能知道，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动物没有这种可能性，自然界也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人一定要认识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要有一定的条件。

范畴本身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各方面的普遍的表现，是本质和现象方面、必然和偶然方面等等这许多方面的表现。这种对立统一，实际上除了教科书上写的以外，还可以提出很多。比如，一般和特殊，都是对立统一的范畴。实际上，所有哲学上的辩证法、哲学上的一切学问，都是处理对立统一的最普遍范畴的学问。唯物主义要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也是一对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实践和认识，也是一对普遍的哲学范畴。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研究世界各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普遍范畴，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起，一直到现实性、可能性，等等，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学问。量变质变也是一对范畴，肯定否定也是一对范畴，对立统一也是一对范畴。所以，一切辩证规律，归根到底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因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从对立统一规律这一点出发，可以解释辩证法方面的一切规律、一切哲学范畴。对立统一是一切矛盾运动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要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话的原因。

5.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

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们已经从上述各方面作了解释，问题大体上已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再深入一层，问题还不算透彻。我们进一步问：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呢？这就要深入理解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问题，要弄清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原理，这正是深刻理解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关键问题。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讲两种发展观时，指出发展是对立统一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这是提供理解一切事物辩证发展的“钥匙”。接着，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6页）列宁在针对庸俗进化论提出发展是对立面统一和斗争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

这个原理，大家在学习中经过讨论，大多数同志有了较深的理解，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还是觉得不能充分理解，还有的同志总觉得，既然是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也应当是绝对的。我想，这个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原理，反正是真理，如果不能充分理解可以再研究，再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争论，经过讨论、争论、再加深理解。

如果要纯粹从逻辑上、理论上理解，就很简单明了。既然叫对立面，它的互相排斥是无条件的，离开实践，纯粹从逻辑上理解对立面本性就是要对抗，就是要斗争，就是要互相排斥。这种互相排斥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如果有条件就不叫对立面。那末反过来说，对立面要成为统一性，那就非有条件不可。因为他本身是对抗的，对立的，是互相排斥的，要把两个排斥的东西让它能够在统一体中联系起来，那就非有一定的条件不可，没有一定的条件怎么能联系起来呢？至于说任何矛盾都有统一性，都有斗争性，因此说，统一性也应该是绝对的，这是没有理由的。虽然，我们认为任何矛盾有统一性，但是，任何矛盾的统一，都是一定条件下的统一，都是有条件的统一，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使对立面联系起来。没有统一性当然不能成为矛盾，这是肯定的，但是，斗争性是对立面本性，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它的统一性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来实现的。要联系实际，例子很多，可以从各方面来看。

比如说，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是怎么一种统一性呢？这种统一性要充分实现，就要思维正确地反映存在，就是要人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样，才可以说他的思维和存在充分实现了统一性。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理论可以看出，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实践和认识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这就说明正确的认识不能一次完成，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能不能说没有完成正确的认识就没有统一性呢？没有完成正确认识也可以有一点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没有发展到完成的地步。也不是说，认识还有错误的时候，就没有统一性。因为错误的认识也是经过实践产生的，或者是由于立场的错误，那就是直接由实践来的。或者由于方法错误，那是在处理实践中得到的材料时发生错误。所以，来源也可以是实践，但是，对实践材料的处理有毛病。总不能说错误的认识已经完成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不能这样说。有统一性，但不能说是完成了。正确的认识完成了，以后如果你不进一步发展，又会变成错误，由统一变成了不统一了。

统一性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在思维和存在问题上不能一下子就完成，而是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反复，所以它是有条件的。思维和存在之间互相排斥，那还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思维和存在是对立面，所以它仍然有脱离的倾向，你一不注意它就脱离了。这种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但它的对立性是无条件的。就是说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如果不继续发展还可以变成错误。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它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如果实践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命题仍然不变，就变成错误的。发展的过程里面，马克思主义就一分为二，有的跟着实践发展了，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发展，就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不是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的阶级斗争，那就更清楚了，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革命人民。

统一性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某一方面或者是某种程度、某种性质的统一。统一性总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性质上，随着资产阶级情况的不同，程度也不同，在某种不同程度上跟无产阶级有统一性，能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就是具体的联合。我们跟帝国主义，比如法国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矛盾问题上，就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统一性，因为法国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法国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反美”这一点上——有了联系，

我就跟它采取一定的联合政策，跟它建立关系。美帝国主义跟我们就没有这个统一性，但是也有一点统一性，就是它总是要跟我们有一点联系，一点不联系它也做不到，所以，在波兰华沙会谈一百多次，一直不断，直到现在还在谈。它要跟我们联系，我们也需要跟它有点联系，但这也是有条件的，是一定程度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必要的。帝国主义虽然反对我们，反对得那样厉害，但它跟我们断绝任何联系，也是做不到的。所以，研究统一性问题要联系实际，就要这样联系。

研究统一性要非常具体地研究，就是要看条件，看那些方面，看多大程度，什么性质。我们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我们不因为敌人或是剥削阶级跟我们对立面，就把任何统一性都排斥了，如果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总会有点统一性的。但是，要考虑统一性，并且体现到我们的政策上，就非具体研究这个联系是什么条件，怎样程度，那一方面是什么性质，要把它搞清楚。所以，在研究这问题时不要脱离实际抽象研究，要抽象地研究就简单，但是解决不了问题。要联系实际，要很具体地联系。斗争虽然也有各种具体的方法，但斗争的方法寓于统一性中，斗争性是绝对的。因为统一性很具体，所以，斗争方法也很具体。统一性的相对性影响我们的斗争方法，但不等于斗争本身有相对性。需要考虑不同的斗争方法。

毛泽东对列宁的关于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有深刻的说明和发挥，而且，运用得非常具体、非常巧妙。毛泽东在好几篇著作中讲到，我们跟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矛盾总是有联系的，联系很具体，程度不同、性质不同、方面不同，需要具体研究。坚持运用一分为二哲学，要善于具体研究，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才能准确地决定我们行动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于列宁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原理，作了深刻的透彻的阐释和发挥，我希望大家要深入研究一下。他有两段结论性的话：

“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属，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

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强调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这几段话琢磨透了，我们也会深刻明白列宁所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明白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从而也就更深刻地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道理。

第 19 章 《反杜林论》辅导报告

(1964.01)

【艾思奇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主要是哲学编),曾作过两堂辅导报告,第一堂是1964年1月22、24、27日,分3次(三个半天),为中央高级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所作的辅导;第二堂是1964年7月2、3日,分2次(二个半天),为中央高级党校“60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所作的辅导。这里整理的是以第一堂速记稿为主,也吸收了第二堂速记稿中不重复的有新意的部分。所增加的第二堂辅导内容用〔〕表示。删去了少量明显不合适的例子和重复的段落,不增加任何观点,尽可能保持辅导报告的完整和丰富的内容,力求反映艾思奇的哲学思想。

艾思奇辅导的《反杜林论》,是用的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译,所有引文皆出自这一版本。为了查阅方便,我们又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反杜林论》新译本页码注明。】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

第一次辅导

(1964.1.22)

今天讲《反杜林论》。原来计划上没有这一课,后来教研室同志说这本书很重要,有些问题要我来讲一下。因为是临时增加的,决定的时间也很短,准备得不够。我主要的是回答一些问题,同时还想着重地讲一讲辩证法的那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

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准备讲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 一、《反杜林论》哲学篇的结构;
- 二、学习《反杜林论》的意义;
- 三、辩证法的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
- 四、前一段辅导中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1. 《反杜林论》哲学篇的结构

哲学篇为什么这样写?内容为什么这样安排?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写文章,特别是研究怎样写论战性的文章。为什么《反杜林论》这样安排?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系统的,它的系统是活的,是发展的(有一次我和“59班”支部的同志谈问题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是跟实际问题联系着的,如果有争论的时候,跟争论的问题有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会在一篇著作里面把马克思主义各个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谈到,总是有个重点,着重阐述那一方面。所以,我们看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哲学著作,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系统。同一个恩格斯写的两篇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系统就不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是批判黑格尔,着重讲辩证法问题,第二章是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第三章才讲到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第四章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是这样安排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费尔巴哈的哲学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批判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他要从黑格尔讲起。写黑格尔学派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吸收辩证法的问题,然后在继承的过程中发展了唯物主义。这就涉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二章就讲唯物主义,然后就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又着重批判了宗教问题,因为当时主要的是宗教批判问题。在费尔巴哈以前,德国哲学界还没有直接谈政治问题。所以讲历史唯物主义也主要的是谈宗教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很多,像人民群众的问题,国家问题等等,但是他着重谈宗教问题。他是根据论战的需要安排系统的。

《反杜林论》哲学篇就不是这样的系统,等一下再讲。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几乎没有讲辩证法,只讨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而在认识论问题中又着重于认识论的最根本问题,最起码的问题,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反映论问题。他在那篇文章中从头到尾贯穿这样的问题。第六章讲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其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讲;那么大一本书只是全面地解决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个哲学上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他主要的是解决了什么是正确的认识问题,而没有着重解决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像《实践论》里面所谈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根本没有提

到。他在这本书里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各方面，如自由与必然的规律性，但是归根到底是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很透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面还没有这样的透彻、深刻地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是他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好处是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透，如果说他有缺点，就是他解决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哲学界发生的主要的争论就是这个问题，当时哲学思想界、工人运动里面成为危险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根本问题上动摇了。由于 1905 年革命失败了，一些人被敌人关进监狱，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上跟着资产阶级走。所以当时这个问题最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要垮台。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最根本的理论就要被拆台，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怎么能行？！所以列宁就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1937 年 7、8 月，毛主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当时还有哲学提纲和别的问题，不过突出的是这两篇。因为在中国革命运动里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中心的问题是这两个问题，所以毛主席写了这两篇文章），为什么这样写？《实践论》着重写与实践基础上认识的反复，一直到现在还发挥了这个思想。《矛盾论》着重写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深入阐发矛盾问题。列宁那个时候，主要是暴露在学术上根本取消马克思主义。而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不是这个问题。中国在这时主要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为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脱离实践，不知道从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当时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跟着教条主义走的。所以毛主席着重讲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实践在今天的意义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从前是教条主义使得我们脱离实践，现在我们有了政权，主要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所以，《实践论》、《矛盾论》今天还有重大的意义，在反对官僚主义脱离实践时，结合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这也很有意义。

《反杜林论》这本书这样的写法，和当时的论战、跟当时敌人提出的问题有关系。这本书首先有《引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要看引论。包括哲学篇在内，《引论》就是讲提出的中心问题。现在我们究竟要争论什么问题？把这个主要的矛盾提出来了。《引论》里面又有两节，一节是概论，一节是杜林先生作了何种诺言。这两节就是两个对立面，究竟我们主张什么？杜林主张什么？概论是讲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杜林要把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否定，只有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才是“终极真理”。

凡是写文章，开头总要把问题说清楚，一般理论文章，或者是论战文章，总要有这样的程序。不管怎样开头，开头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一般总有个原则，一开头就把争论的矛盾提出来，大文章也好，小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大体上总要这样做。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所有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这样。《实践论》、《矛盾论》一开头就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了。《矛盾论》一开头就讲矛盾问题是根本问题，只要了解了矛盾的规律，就基本上弄懂了辩证法。《矛盾论》是为了反对德波林学派的，一个小的开头就把全章要争论的问题指明了。这样，读的人才能知道读这本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反杜林论》开头比较长。概论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的。什么叫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要说明科学的社会主义能站得住脚。第一，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有认识了斗争的规律，认识了斗争的前途，才能提出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客观规律，不是凭空想出来的。第二，理论的形式，理论材料是从长期前进中探索积累起来的，是继承了以前，特别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有的知识财富，经过批判、研究，得出的结论。把以前启蒙学者思想的优点、缺点都研究过了，他们思想中好的都发展了，他们的缺点都克服了。启蒙哲学思想包括许多方面，包括法国的唯物主义，包括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想，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还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所有这些以前的学说都批判过了，才能得出这样最高的结论。从理论本身来讲，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而是经过非常辛苦的科学研究的，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它的内容是有客观基础的，它的形式是经过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思想家、科学家从各方面摸索的结果。这样，矛盾的一个方面就树立起来了，这是正面，是站得住脚的。现在忽然又出现了杜林，这个杜林先生自己认为很了不起，把自己说成是空前绝后的人物，好像只有他的思想才是唯物主义的，是绝对正确的，所有过去的思想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看他有没有一点像赫鲁晓夫？他把斯大林以前一概否定，当然还不能直接否定列宁，但是他认为列宁主义也过时了。他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一点错也没有，错的也是对的。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完全能够站得住脚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提出一套自认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怎么办？就要斗争一下。《引论》的意思就是这样，把对立面树立起来，在概论的一开始就讲了，我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不赞成杜林，他是吹牛皮。这样把态度表明。至于我们的态度对不对，请看下面再一章一章地批判。

这本书的结构也是从哲学到经济学到社会主义，恰恰适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它比较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写是有原因的，这跟论战有关系。如果没有杜林这个人的出现，恩格斯也没有机会全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有杜林这个人想搞一个包罗万象的典型，他自己搞了三部分东西，第一是“哲学讲义”；第二是经济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第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他也是三部分著作，当然还有其他著作，但这三部分是他最基本的著作。他全面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也全面地向过去一些学说展开大举进攻，这个进攻是相当猖狂的。杜林这套东西，后来还得到伯恩施坦的称赞。

伯恩施坦是怎样称赞他的呢?伯恩施坦写了一本书叫《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的发展过程》，这本书大概是他自己的自传。他在这本书里面讲，“1872年的晚秋，欧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一书出版了。这使我对这位失明的学者的兴趣大为增加，……。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他也相信杜林是社会主义—艾注)，他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4页)。伯恩施坦也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像《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只有杜林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一个概括的表述。伯恩施坦把杜林说成是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从恩格斯的批判来看，杜林主要的还不是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他是黑格尔的图式主义和机械论，有些地方他是唯物主义(主要是唯心主义的，但里面也包含机械唯物主义)。他主要的哲学观点就是这样，唯心主义是黑格尔的图式主义，他的机械唯物主义就是把对立统一的规律解释成两种外力的对抗。把对立统一规律解释为对立的力量对抗，用外力对抗的规律来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这是机械唯物主义。

所谓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从伯恩施坦的眼睛里看，杜林的这些社会主义主张，有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彩。有没有这种色彩呢?也有。他也是改良主义，迁就现状，不是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谓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就是着重眼前利益，迁就眼前现状，这点很合伯恩施坦的口味。

我们提出这点是说明杜林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他写了很大的著作，很吓唬人。在当时杜林的著作很流行，在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有

伯恩施坦这样的人给他宣传。所以，恩格斯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来粉碎他，实际上他的内容不值得批判，很肤浅的，杂乱无章。一方面轻视前人，另一方面却又非常浅薄的抄袭前人的东西。口头上把黑格尔说成是神魂颠倒的、非常愚蠢的，但是他自己恰恰又抄袭黑格尔的东西。机会主义野心家都有这样的特点，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一方面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同时斯大林的错误，他抄了很多，而且发展了，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他不抄。杜林也是这样，一方面全盘否定黑格尔，但是黑格尔完全错了的东西，他又都抄过来了。当时恩格斯就碰到这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水平那么浅薄，那样无聊。但是他在理论界，在工人里面却有影响，所以要给他系统地批判。因为对方的理论有三个大部分，恰恰使得恩格斯有机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系统地说明。所以，这本书也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正好是批判对象的三个部分。

哲学部分，他先讲分类、世界图式论……最后才是辩证法。这个顺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顺序：头两章是讲唯物主义，第五、六、七、八章是讲自然界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第九、十、十一共三章是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第十二、十三两章是讲辩证法问题。这个顺序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教科书那样。教科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顺序，或者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他为什么这样搞呢？这也是跟杜林这个斗争对象、这个对立面的特点有关系。因为杜林把他自己的哲学作了分类，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分做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总的东西，总的哲学思想，关于存在的基本原则，详细一点说，就是对一切存在都适用的关于形式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存在首先要研究这种形式原则，然后再进一步把这些形式原则用到自然，用到社会。因此接着就有自然哲学，然后是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哲学。杜林的体系就是这样的。因此，恩格斯的批判也就按照他的结构，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批判。哲学篇的结构就是这样，先批判他不变的形式原则，然后批判他怎样运用这个形式到自然界，然后再批判他怎样运用到人类社会，也就是道德和法，最后有两章关于辩证法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总结，意思就是说，所有杜林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违反辩证法的。这些问题的对立，都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最后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来概括全部争论。然后来一个小结，这个结论很短，无非是说明杜林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的，是反辩证法的。这个哲学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哲学篇共有十二章，实际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三、四章，批判杜林总的哲学观点，就是他所谓的适用于一切存在的形式原则。这是批判杜林

最根本的哲学思想，指出杜林这种哲学观点是先验主义。所谓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认为有一种思想原则，一种形式原则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没有存在以前，在宇宙中先存在，在有人经验以前，先有一种思想原则。先验主义认为理论在经验以前就存在了，这是颠倒的，这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是在经验以后产生的，先有经验，然后才有理论，理论是经验的概括。所以理论不可能在经验以前。先验主义认为，在没有任何经验以前理论已经存在了。“先验”这个名词是康德的名词，他认为理性原则是在人的经验以前就存在了，一切人可以经验到的东西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先有一个理性原则，先有理性的形式概念，这些东西是在世界以前就存在。所以，从世界发展史来说，从宇宙论来说，他就是唯心的，他认为精神在物质以前出现，自然界，社会历史没有存在以前，先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原则，由于这些原则的发展，最后出现了自然，出现了人类社会。这个观点和黑格尔完全一样。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杜林的看法和黑格尔的看法完全一样，他批评黑格尔，否定黑格尔，但是他的宇宙论是跟黑格尔一样。“分类。先验主义”这一章，即《反杜林论》中第三章，主要是揭露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实际上是不高明的，非常粗糙的抄袭黑格尔哲学的结构。

《反杜林论》的第四章，是世界图式论。他所谓的形式原则、所谓的世界图式是什么东西呢？把杜林的世界图式分析一下，恩格斯说，杜林的世界图式也是黑格尔逻辑学非常不高明的抄袭，是非常粗糙的、没有连贯的一种很浅薄的抄袭。杜林说：世界图式要从存在的概念开始，黑格尔也是这样。但黑格尔还比他高明一点，没有胡说存在是惟一的，存在的概念是统一的。黑格尔讲存在的时候还讲辩证法。他说：真正的存在是存在和不存在的结果，存在和不存在相结合，存在和不存在的统一是生成。就是说，一种东西在生长，生长和不生长，存在和不存在的统一。杜林也抄了这点，他先讲存在是惟一的。讲存在是惟一的，就不能讲不存在。他又说存在太抽象了，抽象的存在等于虚无。因此就要使存在成为一种暂时的存在。纯粹的存在等于虚无的，因此就使存在的概念成为切实的存在。有一种具体内容的存在，就是存在是什么东西的存在，然后，既然是有切实的存在，就要有质，有质就要有量，这是比较自然的发展。黑格尔讲这些问题有一定的道理，这跟人的认识发展过程有关系，人认识事物就是有这种过程。当然黑格尔讲这个问题时讲得很神秘，但是用到个人认识过程中，还有一点道理。有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人的认识开始的时候，模模糊糊的觉得有存在，开始不会认识到有什么东西

存在，如果自己只满足于这种存在就没有认识，所以存在不等于存在。因为自己有这种反省，觉得模糊的认识没有什么认识，就要搞清楚什么存在。搞清楚确实有一个东西存在，模糊的认识也许有东西，也许是一个方向，要进一步搞清楚。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开始感到有苗头，但是模糊，要弄清楚确实有这个东西，而且弄清楚是什么东西。弄清楚有什么东西也就弄清楚是什么质。弄清楚是什么质，就要搞清楚这个质有多大的量，弄清楚量就要弄清楚质和量的关系。黑格尔哲学合理的东西就是他反映了人的认识过程，但是他错误的地方是把人的主观认识过程看做是客观存在，看做是宇宙产生以前就有这个过程，自然界还没有出现以前，好像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东西，不晓得是上帝还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存在。然后又搞出一个确实的存在，又考虑质和量，最后，这一套逻辑讲完了才出现自然。这一套黑格尔是这样讲的。但杜林讲自然界不会自己跟自己矛盾，如果要想把存在到存在中，就有虚无，又觉得存在和不存在是统一的，他开始讲存在是统一的。逻辑上非常不连贯，比黑格尔混乱多了。

下面就是自然哲学，这几章里面主要是讲杜林对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不是用辩证法去理解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他想用一种图式(公式)去说明一切问题，结果又自相矛盾，因为他是形而上学者。历史哲学也是这样，在谈道德问题、善恶问题、真理和错误等问题的时候，可以看到都是指出杜林用一种死的公式去套问题，想找一个绝对真理。因此陷入了形而上学，违背了辩证法。

最后两章讲辩证法，这等于总结了前面所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然首先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但是从具体问题来讲，实际上也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杜林的形而上学是唯心论的，否定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矛盾的规律，用外力冲突的规律来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是两种力量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互相对立，一方面又分不开，又统一又斗争。而杜林认为两种力量是绝对对立的，如果讲对立，是两种力量从外部的对立。

哲学篇的结构就是这样。

(注意：凡是【】内的内容，均为第二堂课中所讲，以下不再注明—编者。)

【《反杜林论》有一个引论，是全书的主题。究竟这整本书要解决什么问题，引论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究竟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怎样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是要像杜林那样，由他个人来发明最后真理

来解决，是不是杜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最后真理？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不算数了？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跟杜林所谓的绝对真理拿来对比一下。

所以，引论里第一段简单地叙述了一下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这个发展说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史，反映了阶级斗争，反映了欧洲当时阶级斗争的变化。在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以前，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资产阶级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号称自己是代表一切阶级的，代表全人类的。实际上这种所谓代表一切阶级，代表全人类是一种假象，“正是这种情形，使资产阶级的代表能够标榜自己不是某一个别阶级的代表，而是全部受苦的人类的代表。”（《反杜林论》第15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6页。以下只注明“又见同上书”的页码）资产阶级自己标榜代表一切阶级，代表全人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学说只代表资产阶级。而且在资产阶级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时候，同时已经出现了与它对立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某种独立运动了。所以实际上资产阶级那种所谓代表全人类的名誉是虚伪的。

这一章我们要联系到不久前的一个争论，就是跟冯友兰的争论。冯友兰认为革命的阶级（其实是资产阶级）他能够代表全人类。这次争论有点真实的意义。他真正能代表全人类？大体上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提出一种普遍的形式，这种普遍的形式能够符合各阶级的要求。这个理论我们有人反驳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可以作为反驳他的内容。恩格斯的末一句话讲：资产阶级真能代表别的阶级么？而且讲资产阶级标榜自己能真正代表全人类，不过是形式上代表全人类而已。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初步思想。

所以，无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出现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出现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思想形式还是唯心主义的，体系、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是从资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些方法，就是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反杜林论》第17页；又见同上书第358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内容是反映无产阶级要求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在观点上是唯心主义的，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种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没有把它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学说本身是阶级斗争的

反映，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看，而看做绝对真理、永久正义的表现。这种思想首先是从法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所以，形式往往是继承了以前的东西，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绝对真理的表现，看做是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样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社会主义的来源。好像社会主义思想是可以偶然发现的，跟空间、时间没有关系，只是有一个什么聪明人一发现，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在唯心主义的观点之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当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是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他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就不能从无产阶级群众里面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想凭上层人物用恩赐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到群众中去，不是去发动群众来争取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提出了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因为经过了一段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发展起来了。然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法的观点去观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拯救人类历史，然后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从阶级斗争这个观点出发，以阶级斗争为基础来观察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样，就使空想社会主义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了。这种科学的产生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作基础的，科学是不断推进的。“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而现在的事情首先是在于把它的细目（及其相互联系）进一步加以发展。”（《反杜林论》第27页；又见同上书第366页）

马克思奠定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以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要在细目上进一步地发展。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也要不断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把真理完全看做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一下子被偶然发现的，一经发现一切都解决了，不是这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原理，让以后的人逐步地加以发展。社会主义学说本身要不断地发展。

看到这地方我们就要想想今天。今天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

是不是大大地发展了？比起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候来说是不是更多了？显然是更多了。比起列宁，我们也知道的更多了。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谓绝对，就是一切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方向

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是指走向共产主义的每一个时期，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的认识水平、工作水平有历史的限制，我们今天只能做到我们今天这种地步。我们要想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不行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要过渡的。如果是两年，我们还只能是搞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发展。再过20年我们这些人如果还活着，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比今天更多，社会主义的问题会更发展。而杜林所讲的绝对真理，片面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发展的，所以，又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关于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有很多人觉得难以了解，常常一提起这个问题就觉得不清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因为它不断发展，总是又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它的绝对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方向、规律是不依赖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如此的，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发展总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受历史的限制，所以是相对的。

《反杜林论》中第一章《概论》就是把这样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阐明了，告诉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了。】

【《反杜林论》的结构里，我们有什么可以学的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写文章不需要一个死的公式，要看批判什么对象，再决定怎样写。恩格斯针对杜林这个对象，是这样一个个体系。我们一般大学的教授都喜欢讲系统性、概括性、科学性。搞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这个系统是有机的、联系的、完整的。搞一本教科书，搞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哪一个问题摆在前面，哪一个问题摆在后面是不能动的，实际上永远不能成功，因为系统总是要发展的。

所谓系统性，我们常常讲系统性不能只看到形式上的固定的系统，总是要针对一定的目的，解决一定的问题才有系统性，有一定问题的系统性。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系统。

哲学系统是不是恩格斯就是惟一的？列宁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也另有一个系统。在这里辩证法、唯物主义也没有讲，从头到尾就解决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问题。可不可以说，列宁只讲了这个问题，没有恩格斯系统？不可以。因为列宁当时要解决的问题跟恩格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恩格斯是要批判杜林，杜林提出了这样一套东西来，你要针锋相对地批判，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系统。列宁活着的时候，当时最成问题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大流行。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流行，腐蚀、影响无产阶级，这

时就要集中力量驳倒主观唯心主义和马赫主义。因此花了那么多功夫，写了二十多万字，从头到尾从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系统。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是活的，活哲学、活理论，不能有什么死的形式。】

2.学习《反杜林论》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一下，空洞地讲意义是没有办法讲的，必须具体地讲，而且也不是讲几条就能讲完的。因为学习经典著作要联系现在，要看现在的情况，现在有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东西用不上，用不上的就摆在一边，一般地只能这样讲。我们研究《反杜林论》要研究恩格斯是如何批判杜林。首先，我们要学会如何对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里包括斗争的方法。比如我们刚才讲的结构问题，系统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学习有两种学法，一种学法就是恩格斯跟杜林斗争采取这样的形式，我们现在跟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照着恩格斯的办法，机械地把赫鲁晓夫的言论排列成三个大部分，他的言论哪些是唯心主义的，摆在第一部分，再找一些讲自然哲学的材料，然后再搞一些关于道德和法的材料，把赫鲁晓夫的材料串起来，最后搞辩证法的材料。这种学习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要这样学习。我们要抓住精神实质，总的来讲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要针锋相对。既然是针锋相对，那么机会主义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要考虑什么问题，他提出什么问题，我们也要打他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写反对赫鲁晓夫的文章，就不能机械地照搬恩格斯的公式和结构来搞。我们学习《反杜林论》决不能看到恩格斯怎么排列的，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也这样写，这样做一定要失败的。值得学习的是针锋相对地写。我想一般地讲有这样的意义。

杜林这个学派不是修正主义的，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它跟修正主义不一样，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克思主义。杜林是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得一钱不值，把《资本论》也说得一钱不值，认为就是他对。因为他写著作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最后在工人运动里面取得支配地位。杜林的书是在1872年巴黎公社以前出版的，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支配地位是在1872年以后第一国际结束的时候。这时，马克思主义把巴古宁主义粉碎了。1872年以前，工人阶级中的机会主义都是可以公开打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拉萨尔、杜林都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鲁东也是这样。杜林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做得不多，他

主要是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杜林和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修正主义不同。但是，他是机会主义，这点跟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所以有许多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我们今天学习《反杜林论》就可以找一些武器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找武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应该从总的方面找一些恩格斯已经发挥了的武器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辩证法，恩格斯就坚决主张辩证法。比如恩格斯在概论里面讲到关于经济学的问题时，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他说：“事实日益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伪性——这些学说，说资本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说自由竞争的应有结果是普遍协调和普遍的人民幸福。”（《反杜林论》第24—25页；又见同上书第364—365页）恩格斯所批判的这种经济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有没有呢？还是有的。所以，当我们研究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经济思想时，就可以把恩格斯的武器拿出来运用。我们研究《反杜林论》可以从里面找正面的武器，也可以找反面的武器。所谓反面武器，就是把现代修正主义和杜林加以比较，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说：你这种思想不仅仅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的思想，而且是杜林的思想。比如，在哲学上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首先攻击对立统一的规律。恩格斯在辩证法量和质这章一开头就引了杜林的这段话：“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和极重要的原理，就是矛盾的排除。……”（《反杜林论》第122页；又见同上书第460页）现在修正主义在哲学上是不是也排除矛盾？他也是排除矛盾的，不过他不像杜林那样露骨，不是公开讲要排除矛盾，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转弯抹角地讲排除矛盾。恩格斯就反对排除矛盾的学说，今天我们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也要排除矛盾，当然可以用当时恩格斯的武器来批判他。但是光用恩格斯的武器还不够，我们要根据恩格斯的话对现代修正主义排除矛盾的狡猾手法作进一步的揭露。杜林就用不着揭露，因为他自己就公开地讲排除矛盾。但是现代修正主义不公开地反对矛盾的规律，他口头上还承认矛盾规律的辩证法，但是他用各种各样的诡辩手法来掩盖矛盾。使用恩格斯的武器对我们是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支持下，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进一步揭露，就可以有效地达到我们斗争的目的。

学习《反杜林论》，一方面要把文章弄懂，把原理搞清楚，不过更重要的还是用到现在，要注意哪些地方跟现在的问题有关系。也可能有些东西看不到，将来再翻的时候也可能看到，现在要我举出哪几点今天有用，哪几点没有用，也没有办法，因为这往往要在斗争中才能发现，真正要批判的时候，

本来不注意的地方，现在也有用了。所以经典著作不能看做那几条，它是根本原理，用处是无穷的，这要根据实践来决定。

再一个意义就是跟毛主席思想挂钩。一方面要把《反杜林论》里面的基本原理弄清楚，另一方面跟毛主席思想做一些比较，这并不是说毛主席有另外的东西，而是说毛主席在根本原理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关于先验主义这个问题，这里有没有关于认识从何而来的思想呢？也有。恩格斯就提出了“思维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原则呢？从它自身中吗？不，……。”（《反杜林论》第34页；又见同上书第373页）毛主席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恩格斯是讲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是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里说明毛主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恩格斯在这里仅仅着重说明原则是从客观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主观来的。而杜林认为数学是思维本来就有的，人的头脑里就有，或者是先验的，在没有经验以前就有。恩格斯就强调原则是从客观事实概括起来的，而概括首先要根据人的经验，这里没有讲实践。在37页中讲到经验，数学的公式也是从经验来的。算术的计算为什么用十进位，因为人最初的计算是用十个指头，自然而然的就十进位。如果人的两只手是七个指头，可能就是十四进位了。可见数学是从经验概括出来的。有许多原则恩格斯全讲了，但是讲得很简单，也不很展开。比如说由经验到原则要不要飞跃？恩格斯在这里就没有完全讲，他只讲了一点。在37页上（又见同上书第377页）他说：“要作计算不但要有被计算的对象，而且还要具有这样的能力，使其在考察这些对象时，能够摆脱其他的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而这种能力则是长期的依据于经验之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人的计算不仅仅要靠有对象，而且要靠有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抽象的概括能力，考察对象的时候，要摆脱其他特性。人就有这种能力，比如在讲1、2、3……10的时候，他就能摆脱一个人，一只狗，单考虑1、2、3……10。最初的时候还有许多东西，比如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用指头代替人、狗。最后就是1、2、3……10，指头也没有了。这种能力动物是没有的，就是高等动物猴子也没有，甚至原始人也没有这种能力。刚解放时云南的原始人就不能计算太多的数目，10以上就不能计算了。现在我们有这种能力，能脱离十个指头抽象地计算，11、12，一直到100,1000,……。这个经验，是人类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初的人不行，后来由不能脱离十个指头到能脱离十个指头计算，这是一个飞跃。我们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原始人来说，困难大得很，要经过多少万年才能有这种能力。要有一个实践、经验的过程，到了几十万次才能得到抽象的概

念，所以这是一种飞跃。毛主席用飞跃这两个字把这个过程(由实践到理性认识)很形象很生动的讲清楚了。从恩格斯这里讲的，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实践论》里讲反复多次才能飞跃，就是因为飞跃要长期的实践经验。越是早期的人，实践、经验的时间越需要的长。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不同，认识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由感性到理性比较快，当然复杂的问题也不行。革命的问题要经过几十年，或者是几年才能抽象，对社会主义建设要达到规律性的理性认识，也必须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实践过程才行。一个巩固的概念，一个原则的思想形成，就要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经验。不见得开始觉得对，后来又觉得不对，总结经验里面看到成绩，后来又发现有缺点，又怀疑，或者是总的不怀疑，部分怀疑。这个过程有的长，有的短，这和我们的经验有关系。大庆的领导坚信人民群众，没有动摇，这跟他们军事干部长期的斗争经验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过去长期从经验里面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得到一个巩固的原则的知识，真正地掌握了理性知识，思想就比较巩固。如果理性原则还有点动摇，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从经验飞跃到理性，他的方向还不那么坚定。

我们读《反杜林论》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看清楚恩格斯已经阐述的问题，毛主席用新的形式又发挥了。第一，使我们对毛主席思想得到更深刻的了解，因为毛主席思想是从现在的实践中发挥这个原则的，恩格斯是根据当时的斗争经验，从某一个角度加以阐述。所不同的是毛主席所发挥的一个“飞跃”，恩格斯没有从“飞跃”来讲，而是说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依据于经验之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它跟经验有本质的不同。这样就会加深我们对“飞跃”的了解。

第二，可以知道毛主席是从经验、实践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又发挥了这个原则，或者还有某些方面补充了。比如正确的认识要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这里恩格斯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讲到。

我们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采取这种态度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益处，就可以避免简单背诵。

【下面再讲一讲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反杜林论》。这个学习的总原则就是联系实际。讲原则大家都知道，是老生常谈。但是在学这个著作的时候怎样具体来应用这个原则呢？我看可以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就是要用比较的办法。用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哲学思想，跟恩格斯当时所阐述的这些原理作一些比较，根据这些比较就可以联系实际了。恩格斯在当时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到今

天我们又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要讲?从中我们就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发展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多少了解了。要了解发展就要了解历史与当时的情况,和今天作比较,就要注意到今天我们的哲学为什么有一些新的发展。我们学《反杜林论》可以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反杜林论》中辩证法这两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说是把辩证法的内容说得最完全、最全面的著作。

讲自然哲学、道德和法,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其中对辩证法规律全面加以说明的还是这一本。

大家要学习经典著作,我要推荐这一本,原来大家想学《费尔巴哈论》,我没有推荐。因为《费尔巴哈论》没有这本完全,当然它有它的系统。恩格斯著作中系统是不同,因为他的目的不同,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这一本书就辩证法来说,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了全面的说明,而且是很通俗的。

这本书用领读的方法不大合适,因为很多地方大家可以看懂。领读这种方法也不能绝对化。也有这种看法,好像本本书都要领读。这本书可以把难读的几段读一下,其他的东西,大家学了就都懂得。我是很外行的,没有大家懂得的多,那还领什么读呀!所以,任何方法都不能绝对化。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对辩证法说得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跟列宁所讲的辩证法来比,跟毛主席的《矛盾论》来比,他讲的内容就比较简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辩证法的东西比《反杜林论》讲得更细致一些。有些应该突出的问题《反杜林论》中没有突出,所以要比较。

我们学习的方法也是讲的方法,也是用比较的方法。因为通过比较的方法可以联系实际。为什么恩格斯那个时候只讲那么多,我们今天有一些问题要讲得更细致、更突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理论是从实际来的。当时实践工作需要理论着重讲某几点,马克思就要比较突出地概括某几点。等到事物发展了,辩证法的另外一方面就需要突出起来,那就在另外一方面发展。所以,《矛盾论》里的一些东西,《反杜林论》里没有讲。这不能怪恩格斯,不能说恩格斯水平低,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时代的条件问题。绝不能解释成为标准低的问题,是历史条件的问题,实践条件的问题。某一个时候,实践需要突出某一些问题,《矛盾论》里突出了一些主要的矛盾问题,都是为了当时的斗争来突出的这个问题。把主要的矛盾问题归结到现在,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实际斗争

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个问题，所以就要特别阐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写辩证法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没有这个实践的需要，并不是他不懂，如果有了实践的需要他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如果活到今天，他要讲这个问题。他活到19世纪，他解决19世纪的问题。

通过历史的比较来联系实际，这样来学习经典著作也就好学了。

比较以什么为中心呢？以我们现在的东西为中心，就是我们应该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来比较，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什么要以现在的东西为中心呢？因为现在的许多问题更展开了、更清楚了。所以要以现在的东西为中心，再回过头去理解以前的东西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以前的东西是比较原则性的。原则性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它可以有各种解释。因此，它可以引起争论。那么，争论应该怎样理解呢？以现在所概括出来的东西为准。比如我们最近讲课时经常说到这个例子，有人说列宁讲过这样的话：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引了这句话。有人问：列宁说对抗消灭了，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有对抗性的矛盾呢？是不是列宁错了？或者是列宁正确，我们不应该这样说？是不是列宁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矛盾呢？是以列宁的话为中心来解释问题，还是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观点来解释问题呢？我看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观点来解释列宁的话就不会出错误。如果用列宁的话来解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作这样的回答：要理解列宁的话，就要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理解。以前的人对列宁的话作怎样的解释不管他，反正要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解释。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概括了更多的经验，概括了列宁死后三十多年的经验。列宁的话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原则的，想用那个话来概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概括不了的。只能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观点来解释列宁的话。如果以前有人解释过了，而且解释的不符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观点，那么就要重新解释。以前就是这样解释列宁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进入社会主义对抗就消灭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的矛盾。以前就是这样解释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解释。修正主义他们否认苏联有阶级、阶级斗争。后来我们给他一批评、一攻，他们马上改口说：我们并没有否认有阶级，只是否认有对抗。苏联现在就是搞这种鬼名堂。这是以前的解释。

以前的解释对不对呢？我们说要重新解释。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要重新解释。以前的解释要取消，因为修正主义也是那样解释嘛，就是散布所谓对抗消灭了。应该怎样解释呢？应该解释成对抗逐渐在消灭，不应该解释成为对抗已经完全消灭了。应该大胆作这样的解释。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中心，才能学得好，才能学得准确。

还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政权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也是很原则的话，对这句话有过解释。

苏联有过解释，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解释成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初期。资本主义刚刚过渡到初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过渡时期。1936年以后苏联就结束了过渡时期，这就是从前的解释。

这个解释我们要不要保留？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学习苏联我们就不要保留。我们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所以我们要重新解释。这两年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对马克思的话就要作重新解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刚刚一建立起社会主义就实现过渡了，实现共产主义了，而是一直要到高级共产主义。这个解释就正确了。因为新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俄国革命胜利后四十几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从1936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苏联的发展过程证明苏联的过渡时期并没有结束。

用历史的比较法来联系实际，同时以现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作为中心来学习才能得到益处。不然就会学成只会背旧教条。《矛盾论》里有些话恩格斯没有讲，那是不是《矛盾论》有点问题了？有人说，恩格斯讲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之否定，而列宁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的统一。究竟是以列宁的话为中心解释问题，还是以恩格斯的话为中心解释问题呢？实际上，恩格斯的话也是以对立的统一为核心（后面要讲这个问题）。他这话的意思是另有所指。

我们大家学过《资本论》，很清楚，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解剖人是了解猴子的关键，把人的身体解剖了，了解了，要了解猴子也就容易了。了解了更发达的东西，那么，不发达的东西就更能够了解了。根据人的身体情况来了解猴子，能不能根据猴子的情况来了解人呢？那就不能了。当然，做比

方要注意确切。因为恩格斯、列宁不是人与猴子的问题。不要误会，误会就要犯错误，大家不要多用这个例子。

但是，事实上是有这个问题的。根据比较展开的东西能够了解比较原则的东西，使我们对原则的东西了解的更深刻。如果只重视原则的东西不重视展开了的东西，那么，你对展开的东西的了解就有所限制。恩格斯在这本书里讲辩证法，对立只讲了对抗，非对抗这个名词没有讲，这些都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接触对抗、非对抗的问题，所以他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想，这是一个学习方法，也是我讲这本书的方法。这个方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考虑。这是我的观点。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我觉得应该这样了解。】

3.辩证法的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的讲解

这两章比较容易懂，不需要采取领读的方式来讲，不过重点的地方可以讲得详细点。这两章是讲的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最根本的内容都有全面的说明，我想还是按两章的顺序作一些说明，然后再概括地讲一下总的內容。

量和质这章说明了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规律。这两个基本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讲到最根本的方面，讲到矛盾的普遍性问题。这两章虽然是讲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但是应该看到从头到尾，归根结底还是讲的对立统一规律。质和量、否定之否定这两个规律应该看做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虽然它们也是基本规律，但是更基本的还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的规律就是量和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实际上是讲肯定和否定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的规律。

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辩证法的核心是什么？列宁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在这个地方又说一切核心是否定之否定，究竟是列宁对了、恩格斯错了，还是恩格斯对了、列宁错了。在这里列宁和恩格斯发生了矛盾。这个问题应该说明一下，我认为还是列宁说对了。列宁讲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三个基本规律的核心还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否定之否定，归根结底还是对立统一规律。

恩格斯讲一切核心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思不要只从前面去看，要把前后的文章连起来去看，要把整个量和质的意思连起来才能看出来。关于这个

问题恩格斯在书(《反杜林论》第144页;又见同上书第483页)中讲道:“所以,我们在卢骚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骚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的说法: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否定之否定”。他首先是讲对抗包含着矛盾的过程,这个矛盾过程又自己表现向对立方面转化,最后作为一切核心才出现了否定之否定。由矛盾过程到否定之否定,逻辑上有一个很自然的环节,就是说这个过程中的矛盾也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使得这个过程达到一定阶段就转到自己的对立面,最后才出现否定之否定。这里所讲的一切核心,不一定就是辩证法的核心。也就像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的分歧一样,当时的争论是杜林反对否定之否定,他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是不变的公式,这是他们争论的核心。我们了解了过程是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是会向对立方面转化的,这样才能理解最后的核心——否定之否定。

这里所讲的否定之否定,是两次向对立面转化的结果。首先是因为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引起事物向对立面转化。而且转化不会是一次,转化了再转化,结果出现了否定之否定。这个道理很平常,并没有什么神秘。

下面先把辩证法两章的逻辑结构讲一下。这两章讲了三个基本规律,首先从矛盾的规律开始,由矛盾规律转到质和量的规律。然后再一章讲否定之否定。这个结构跟刚才讲的几句话是相适应的,首先要反对杜林排除矛盾的思想,肯定矛盾是存在的,一切过程中存在着矛盾。肯定这点以后,指出矛盾的过程引起对立面的转化。最普遍的就是量和质的转化,这样就引出量和质的规律。量和质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是矛盾过程引起由量转化到自己的反面一质。然后再进一步就有了两次转化的关系问题,这就表现为否定之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内部包含着矛盾,这个内部矛盾表现为发展过程也采取对立面互相联系的这种形式,就是向对立面转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表现为量和质的转化这个普遍形式,在表现为两次转化中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种形式。因此,量和质的转化关系,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规律,这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所以它们也是最普遍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因为这两个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再简单地讲,就是事物都有矛盾,矛盾的内部斗争,使得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向自己反面转化。最普遍的是由量向质的转化,而这个转化不是一次就行了,向反面转化以后,再经过斗争,又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种两次转化中间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否定之否定的

关系。这个规律也是普遍的。量和质的转化也表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还是否定之否定。凡是两次转化总是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三条基本规律中间归根到底还是一条最根本的规律。这两章在逻辑结构上就表现了这个关系。所以，讲辩证法要从对立统一的规律讲起比较适当。从量和质的规律讲起不大合适。我们写教科书一般还是先讲对立统一规律，因为把这个规律说清楚了，量和质的规律才好说明。首先说明为什么从量变为质，又由质变为量，这就要先懂得对立统一规律才能很好了解。这就是这两章的结构。

这两章的内容是论战的内容，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斗争的内容。杜林的观点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恩格斯用辩证法来加以批判。这里附加说明一点，从杜林哲学总的结构来说，是唯心论的结构，但是，他又包含着机械唯物论的成分。他的观点主要的是唯心主义的，但就他的自然观点来说是机械唯物论。因此，杜林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混杂的东西，是一个大杂烩，不要把他看成从头到尾是一个一贯的体系。所以恩格斯讲他是唯心主义的，是对的。列宁讲他是机械唯物论，也是对的。如果把杜林的学说看做是一贯的体系是不对的，他和黑格尔不能相比。历史上比较大的哲学家大多是一贯的观点，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当然大哲学家也有混杂的东西，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有，在历史观上不是一贯的，那是不彻底的。杜林的思想没有什么系统的东西，所以不能按照杜林的原则运用到自然观方面，他自己没有什么逻辑性，前后矛盾。他反对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因此我们不能从杜林的哲学思想中替他找出一个体系来。

有的同志问，杜林是怎样从形而上学滑到唯心主义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难以说明，当然他的唯心主义就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就是把思维的形式和存在形而上学的等同起来，认为思维中最原则的形式也就是世界图式，客观世界要反映他的思维。唯心主义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把思维和存在等同起来，没有看到它矛盾的差别。另外他还有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形而上学，所以他不是滑过去的问题，而是凑上的机械唯物主义。

法国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以这样说，因为法国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把自然界当做是客观存在，但是又认为它是不变的，因而他们是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把这种不变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把人类社会也当做一种不变的自然现象，结果他就要从人类社会中找到一种不

变的東西，找來找去就找到一種精神原則，覺得人類社會是從精神、良心來的，找到這種東西就滑到唯心主義去了。費爾巴哈認為人類社會精神是第一性的，要去找不變的人性，最初認為人性是和自然界一樣的客觀存在的物質性，原來他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到了後來，把人性作為解釋一切的最根本的原則，人性變為第一性的，具體的東西倒是第二性的，這樣一來，就變成了唯心主義了。

杜林就沒有這種轉變，沒有這種由形而上學到唯心主義的自然邏輯關係，他就是雜湊的。所以，我覺得找不出這種聯繫，他並沒有從唯物主義轉到唯心主義，他總的觀點就是唯心主義的。所以在他的道德和法中講的唯心主義也不是從機械唯物主義轉來的，他跟唯物主義不是一個東西。法國的唯物主義是從唯物主義開始發展到唯心主義的。而杜林總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他是從唯心主義出發，湊上一些機械唯物主義，所以這種思想體系是非常混雜的，沒有真正的邏輯體系。

現在就正文作一些解釋。量和質這一章開頭引了杜林的一段話，杜林說，應該把矛盾從存在中排除出去，他認為這是存在的基本邏輯特性的第一個和極其重要的原理。這個存在好像也是人的思想里面存在的概念。可是因為他是唯心主義的，他認為思想里面存在的概念也應該是客觀存在。思想里面既然有存在的概念，客觀里面也就應該有存在。所以這個存在主要是邏輯上的存在概念，但是他把它看成是客觀世界的存在。他不但在思想上排除矛盾，而且認為周圍世界也不應該有矛盾，首先認為存在應該是惟一的，因此不應該有不存在的東西和它並存，而存在這個概念本身不應該有矛盾，因此客觀世界也不應該有矛盾。事物中有矛盾是荒謬的，事物中只應該按相反的方向互相反抗的力量的對抗，這種對抗是世界及其一切生物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所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不應該是矛盾，而只應該是对抗。他是用機械對抗的形式、機械對抗的原則來代替對立統一的原則。這是杜林在認識論上的基本思想，只承認外力的對抗，不承認內在的矛盾，當然內在的矛盾也有對抗，但它是內在的對抗，而不是互相反抗的兩種外部力量的對抗，這是有區別的。下面恩格斯引了一段杜林批評黑格爾的話，可是他批評黑格爾的地方也正是黑格爾對的地方。他說：“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學，或確切些說，按照邏各斯學說，矛盾並非存在於思維中(思維按其本性只能被看做是主觀的和自覺的)，它客觀地存在於事物與過程本身中，並且可以說是能以肉體感觸到的，這樣，荒謬就不再是不可思議的思想組合，而成為實際的力量。……”(《反杜林論》第122頁；又見同上書第461頁)這裡恩格斯對杜林的看法做了一些引申，杜

林认为矛盾就是荒谬的，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不应该存在。杜林认为他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很容易明白，这种明白就好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一样的。

恩格斯说，从一般常识来说，好像矛盾是荒谬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的说法，在一般常识来说好像是对的，但是高等数学微分学就不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微分学要把曲线成为直线，这要作通俗的解释确实是很难的，不过这种数学无非是研究一种数量的变化，结果会怎么样？一种数量逐渐变小，在变的过程中无限变下去，变到无限小会发生什么结果？在数学上应该怎样计算？微分学就是这样一种数学。普通数学只研究固定数量，微分学就要研究某一种数量无限变小，在数学上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如果用在曲和直的问题上可以作通俗的解释。如果比较长一点的曲和直，曲线就是曲线，直线就是直线，这个矛盾不能统一。假如这个弧无限缩小和它相连的直线也无限缩小，确实小到无限，最后的结果怎样？小到无限不一定消灭，但是小到无限最后就会发生一个结果，距离也缩小到几乎等于零，那么两条直线和弧线发生一个关系，就是曲线差不多等于直线。到了这种程度，在数学公式上计算就可以把曲线当做直线来计算，而且这样计算不错，结果会很准确。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就是要无限小，如果不缩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是固定的，始终是这样大，曲线和直线中间有距离，也不能说曲线就是直线。可是如果无限缩小下去，最后到了极限，就等于零，那时曲线就等于直线，最后曲线就几乎变成一点，两点几乎合在一起。当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觉得曲线是曲线，直线是直线，可是在数学上计算可以把曲线当做直线来计算。按照常识来讲讲不通，但是在数学上计算是可以计算准确的。恩格斯在后面还讲，数学家自己已经用微分学去计算也得出了结果，但是数学家还不能懂，因为他们有形而上学思想。有辩证法思想就可以想通了，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曲线和直线到无限小的时候就相等了。高等数学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初等数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不但无限小是这样，无限大也是这样，如果把圆的每个弧线无限放大，结果会怎样？结果圆的每个弧线就可以成为直线，最后圆的弧线就可以按照直线计算。天文学往往把曲线当做直线计算，这也是准确的，相反天文学上的直线也可以看成曲线。

【现在就从正文来研究。有一些我估计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就不念了，有一些地方作一些解释。

在第十二章，开头一段引了杜林的话。杜林的思想全部都包括在头六行里。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和极重要的原理，就是矛盾的排除。”（《反杜林论》第 122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0 页）

杜林第一句话就讲到排除矛盾。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反对对立统一的规律，反对矛盾论。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首先破坏矛盾的规律，第一个就是矛盾的排除。

“矛盾是一个范畴，它只能同思想的组合有关系，而决不能同现实有关系。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认为矛盾就是实在，这是荒谬绝伦的……”（《反杜林论》第 122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0 页）

修正主义、杜林都是攻击的矛盾规律，认为它是荒谬绝伦的。下面就是杜林真实的思想。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诸力量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诸因素和诸个体的力量在方向上的抗衡，和荒谬的矛盾观念丝毫不符合……”（《反杜林论》第 122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0—461 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杜林提出了一个机械论的规律来反对对立统一的规律。认为一切事物的基本形式是以相反的方向相互抗衡的各种力量的对抗，这就是两种外部力量互相发生对抗。

辩证法的观点是内部一分为二，矛盾对立的观点，即统一物一分为二。而杜林是两个外部力量互相抗衡结成一个东西。一个是内部一分为二，一个是外部互相抗衡，这是两个根本的对立。

一开头杜林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就明确的对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杜林的观点的对立，第一句话就搞清楚了。恩格斯在下面就是要驳斥杜林这种观点，就是着重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事物自身有矛盾，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而不是两种外部力量。量和质这一章，开头这部分主要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做了具体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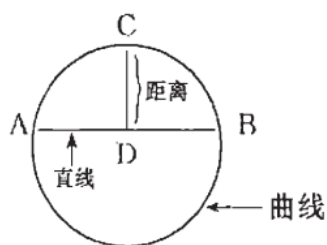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引了杜林的话之后说：“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矛盾等于荒谬，所以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其他方面具有足够常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一见解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的说法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反杜林论》第 123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1 页）

只要有普通常识的人也许认为客观事物是这样的，这跟曲的不能看做直的，直不能看做曲的一样。但是，下面恩格斯就说：

“可是微分学却不管人的常识的一切抗议，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直线等于曲线并因此达到人的常识(它固执地认为曲直相等是荒谬的)所永远不能达到的那样的成果。”(《反杜林论》第 123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1 页)

你说直的不是曲的，但是在微分学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微分学里，在一定的条件下，直线要等于曲线。不这样相等，微分学你就搞不懂。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还要犯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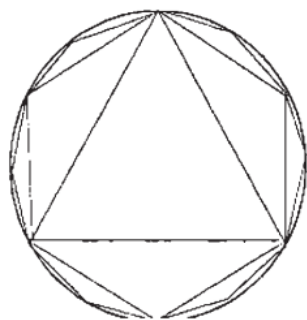
有没有同志学过微分学，高等数学简单讲不大容易懂，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微分学就是讲微积分，研究数字变化的数学。普通数学、代数、几何叫常数数学。就是数目字不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考虑变化，公式和数目字是绝对的。微分里要研究一个数学公式里某一个数目字是会变的，变小、变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研究这个问题的数学叫做变数数学，专门研究数字的变化。微分就是研究如果一个数目字变到无限小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样的意思：直可以曲这个例子，我用图来说明一下。



这里有一条曲线，圆就是曲线。我看有好几种例子可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讲圆吧。这个圆可以看做是一条曲线，在圆上划一条直线(AB)与圆相交，则这条直线(AB)叫做

切线。切线(AB)把圆切下来一部分(AB)叫做直线， \widehat{ACB} 是曲线。微分学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圆不断缩小，缩小到无限小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圆是这样大，使这条直线(AB)和曲线(\widehat{ACB})之间有距离(CD)。但是，当这个圆无限缩小下去，缩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直线(AB)和曲线(\widehat{ACB})的距离(CD)是不是会缩小呢？是会缩小的。直线(AB)和曲线(\widehat{ACB})之间的距离可以设想缩小到无限小，缩小到最大限度就使直线(AB)和曲线(\widehat{ACB})的距离(CD)差不多等于零，差不多没有了。到了那种程度就可以看出直线和曲线完全相等。切线(AB)和曲线(\widehat{ACB})就完全合并起来。直线和曲线不能合并，但是直线缩小到最后无限小时终归有一天会和曲线合并起来。这样直线(AB)等于曲线(\widehat{ACB})，数字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直线和曲线就相等了，至少可以看做相等。如果你不看



做相等，数学上的计算就会出毛病，高等数学有这么一个问题。



还有这样的情形。比如说，这里划一条相等的线，无限地划下去，划到最后的一条直线和圆很靠近了，也就相等了。就是说，如果圆不缩小，但是切线成倍增加，一倍、一倍地切下

去,切线就越来越短,短到最后切线差不多等于圆周上一点了。所以直线就变成曲线了。这里是讲微分。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确有点不能理解,你再怎样小切线跟圆周总有一点距离。但是无限缩小,小到极点,总会相等的。要承认这一点,而且在计算微分方程式的时候一定要肯定这一点,才能算准确,否则会犯错误。微分是这样。

积分也是这样。变得无限大的为积分。恩格斯在后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两条相交直线只要离开交点相当远的程度,无限延长,就可以看做是平行线。如图:如果是这样两条线:就不能说是平行线。但是要计算大量的数目字,如计算天文学上的数字,离开交点时,无限延长,这两条线就可以看做是平行线,因为两条直线永远也不会相交。两条线距离越来越大,大也大不到多少程度,大到一定的程度,大体上不相交,就平行了。在无限大的情况下,相交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变成平行线了。

只学过初等数学的人是很难了解的,但是一学到高等数学的人非承认这一点不可。所以,直线中有曲线的因素,只能一分为二。这不是什么外来力量对抗的结果,就是他本身在运动中出现的矛盾。】

恩格斯在这一章讲矛盾问题,着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举的都是一些特殊的例子,也就是平常大家认为没有矛盾的,如普通数学看起来好像不应该有矛盾,但是结果还是有矛盾。比如平方不应该有复根,结果还是有复根,在某种情况下还应该有这个东西。

【恩格斯引了人的思维矛盾,说明人的认识也有矛盾。

“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类认识能力仅仅在那些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一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一连续系列之中解决的,是

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反杜林论》第124页；又见同上书第463页）

这一段是说明人类是有认识实践的无限能力，人能够认识无限的实践的真理。人的认识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可是这个能力在一个人身上不能实现，无限的能力在一个人身上不能实现。一个人的一生只能认识自己的运动所能认识的东西，不能认识一切东西。人类的无限能力在个人身上是受到个人限制的，这就是无限能力和有限能力的矛盾。人的认识就有这样一个矛盾，人有无限的认识能力，但是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这是人的认识矛盾。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这个矛盾就要在无限的发展中解决。人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一代要比一代知识多。人类无限的传下去就能实现无限的认识能力，就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说，人类认识能力的矛盾，是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原因。

如果人的无限认识能力在一个人身上就能够实现了，那么认识就没有发展了。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在他的哲学里面就能够实现了。有了这样一种观点以后，他就认为后来的人类用不着思考问题了，人的认识用不着发展了。所以，人类的认识如果没有矛盾，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不能发展了。人的认识之所以需要无限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的认识有矛盾。马克思主义是无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无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使人能够认识世界一切真理的绝对的方法。但是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只能认识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那样高、那样伟大的天才，有些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问题，他们也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身就有矛盾，他们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受他们生命的限制。所以要由第二代——列宁来继承和发展的。列宁死了以后由斯大林、毛主席进一步来认识这些新东西。

这个问题也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有关系。人类的无限认识能力，就有认识全面的绝对的真理的能力。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个人只能认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也就是只能认识相对真理。所以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矛盾使人类的认识科学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永远不能自满自足，永远不能认为某一个人的知识已经够了。比如说，有的教条主义者说：你看，恩格斯这样说了，我们就不能多加一点。恩格斯只是讲了对抗，我们说还有非对抗。恐怕有问题，你这样说就是不了解辩证法。恩格斯他有他的历史条件限制，所以他的《反杜林论》所讲的辩证法，就他的根本原则来说是绝对真理，但

是他对原则的阐述是相对真理，他只讲了这么多，并没有我们还要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只是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说：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的、孤立的，或者是单独的、相互并列的东西的时候，形而上学就有一些用处（《反杜林论》第123页；又见同上书第461—462页）。我们平常说形而上学的方法是错误的，但是恩格斯说，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察问题时可以使用。是不是说形而上学没有一点用处，这个问题在我们学辩证法的时候要弄清楚。恩格斯在这里肯定形而上学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用处的。这就是说在我们讲辩证法的时候，我们认为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但是也不要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做是绝对荒谬的，一点用处也没有。恩格斯这个思想恐怕和我们同志们讲辩证法时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在讲辩证法的时候，认为辩证法是正确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因此形而上学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错误的，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就得到这种结论。这样的结论恐怕恩格斯是不赞成的，因为这种看法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看辩证法。辩证法既然是正确的，因此跟它相反的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没有用处。这样的看法就太绝对了，看问题太绝对了也有错误。因为事实上我们经常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而且在一定的问题上使用形而上学也不一定完全碰钉子，也不一定就会失败。法国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它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可是法国的唯物主义还是一个时代很优秀的思想，这是事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论断一件事情，不考虑矛盾，不考虑它的反面，也不一定就成问题。比如就拿这两章的例子来说，这里举了波义耳定律，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认为波义耳定律是正确的，违反波义耳定律考虑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说，波义耳定律是正确的，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一点不同程度的误差，首先这个定律应用在一定的气压、一定的温度，而且还只能应用在一定的气体上，有些气体使用这个定律就得到准确，有些就不准确。就是对它最适用的气体也不能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丝毫一点误差也没有，如果具体的考虑这些细微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讲。所以在一定的时候，波义耳定律是真理，对这个气体，对这样一个气压，就是真理。恩格斯说，在家庭生活中形而上学是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都用形而上学，只是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要暂时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研究，在这个时候形而上学是可以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形而上学使用的范围是有条件的，比如在科学发展的初期，要分类整理的时候，这就有必要把每种东西当做孤立的東西来看，

这个时候形而上学是适用的。这样的提法是不是说我们观察问题应该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混杂起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工作中观察问题，一般地都要观察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只是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有时暂时把一件事当做孤立的来看，这时自然而然就有形而上学的方法，因为那时需要把它当做孤立的东西来看，所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也不会出大毛病。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混杂起来用。有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把它当做孤立的东西来看也可以，不会发生坏的结果。但是一般地做工作，研究问题，绝不能把问题当做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看。从总的原则来说，我们的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我们的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因而要考虑矛盾运动，不能满足于静止地看问题。要研究一个同志的思想，要研究他怎样变化，注意他的发展，不能满足于讲他是好同志，同时还要注意他的缺点。做工作也是这样，不能只讲我们工作中有成绩就够了，一定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检查缺点，因为成绩和缺点在我们工作中是统一的，我们必须自觉地注意，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检查缺点。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怎样发展，不知道我们还要怎样努力。所以观察工作的时候，就不能把它当做孤立的、静止的东西，一定要从联系和发展中观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一定要采取辩证法，排除形而上学。但是另外要注意形而上学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可以使用，而不是我们的工作中这个用辩证法、那个用形而上学。我们总的方法是辩证法的，但是也要注意形而上学也曾经起过作用，而且不一定都会引起错误的结果。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是片面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也不会发生错误的结果，这样做就不会使我们的思想绝对化。

恩格斯这段话是说明，对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也要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不要绝对化。怎样才能不绝对化？具体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我认为，就是既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又要肯定形而上学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它适用的范围，可是又不能说我们可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要紧的就是要把这种关系弄清楚，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也还是有一定的形而上学的障碍。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往往因为我们还有点形而上学，真理和错误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要克服我们脑子里的形而上学的习惯很不容易。虽然我们是运用辩证法的，但是碰到某些具体问题，形而上学还是起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矛盾的普遍存在，而且还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很多例子，着重证明矛盾的普遍性，肯定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的规律，指出否定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客观事物没有静止的、孤立的，所以形

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方法来说也是错误的。既然形而上学的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有时又能使用呢？它本来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我们暂时把它当做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看，是为了方法上的便利，研究上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形而上学没有多少妨碍。从总的来说，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只有承认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观点，只有分析矛盾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一分为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辩证法可以说还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对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到有对立有统一，而没有提到有对立面的斗争性，全篇都是讲对立面互相联系，统一中有对立，没有讲到斗争。实际上社会问题经常要讲阶级斗争，列宁把斗争性问题发展成为普遍原则，对立面的斗争问题是绝对的，对立的本身就具有斗争性。恩格斯在这里没有讲，这是不足的地方，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意思，他强调对立也包含着这个意思，不过他没有发挥出来。列宁把它明确地讲出来了，这就是发展。

在这里恩格斯所以没有特别讲这方面，也和论战有关系，这个论战不必特别讲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特别注意这方面。实际上不讲斗争问题也不能说明对立面互相转化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得很清楚，由渐变到突变，为什么会变？这和矛盾的斗争有关系，质量是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由此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发展。这个原则在毛主席以前没有人讲，毛主席讲到了，这跟中国的复杂实践有关系。

【还要说明一点，就是恩格斯在这里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到事物有矛盾，对矛盾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具体说明，没有很展开地讲什么叫做矛盾，矛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没有很具体地讲这个问题。他这里所讲的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比自然辩证法所讲的还少得多，自然辩证法还讲到对立面。矛盾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矛盾的对立面互相斗争引起事物的发展。在《反杜林论》里，矛盾的同一体性、斗争性没有具体说明，特别没有讲对立面的斗争。这一点要注意，因为恩格斯在那时候仅仅是为了反驳杜林，杜林强调事物是相反的两种力量的抗衡，不是事物内部有矛盾。恩格斯着重回答他，每一件事物内部都因矛盾，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转到对立的方面，所以事物内部有矛盾。至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方面有什么关系，同一体性、斗争性的关系，为什么会转化？这些问题恩格斯就没有回答。大概在当时的论战中不需要都回答，这并不是说恩格斯不认识矛盾对立的斗争性，而是因为当时的思想斗争、理论斗争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来，因此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讲对立的斗争讲的是比较多的，而且把斗争看得比较重要。一般在社会科学上都是讲阶级斗争的，所以不能因为这里字面上没有讲到矛盾的对立斗争，就认为恩格斯不提这个。以后列宁特别在《谈谈辩证法》里讲斗争是绝对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条件的问题，实践条件的问题。那时候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就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斗争，强调阶级调和。所以，列宁跟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矛盾的斗争性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因而在那种情况下，在哲学上把斗争性的问题做了新的概括，提出斗争是绝对的。而在反驳杜林的时候，当时的确不需要。因为杜林是讲对抗的，讲暴力的。所以，在当时的理论斗争中，斗争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不是要不要斗争的问题，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力量对抗的问题。首先不是外部力量的对抗而是内部矛盾。内部矛盾也是对抗，而是外部力量有发展，在否定之否定中证明：

“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反杜林论》第144页；又见同上书第483页）

这段话是恩格斯在这本书里关于对立统一的规律的比较全面的概括。他承认本质是对抗的，内部是对抗的，包含矛盾的斗争。恩格斯在这里把对抗解释成为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意思。我们要用今天的观点，用今天新的了解，用更具体的观点来解释以前的经典著作。这样来解释以前的“本质的对抗”几个字，所以，把它们解释成为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比较好。排斥和斗争可以包括非对抗的斗争。那时候恩格斯用对抗两个字，并没有考虑到我们今天要考虑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所以对抗与斗争、互相排斥，用一句话就概括了。

我们学习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拘泥于字眼，要根据我们今天的发展灵活地理解以前的提法。如拘泥于字面上了解这句话，好像恩格斯跟毛主席就发生对立了，恩格斯只讲对抗，毛主席还有一个非对抗，列宁也有一个非对抗。所以，对抗要作灵活的解释。本质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也包含了矛盾的非对抗的一面。当然，这个问题恩格斯当时不明确。这也不是要责怪恩格斯，不能因此而贬低恩格斯。当时恩格斯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伟大的思想也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他只能说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他当时的论战也只需要写到这种程度。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写出了这么大一本书，再说明其他很多东西，就多得不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应该有的放矢的，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可以不讲。所

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就没有讲辩证法。因为当时的斗争没有直接涉及到辩证法问题。】

关于量和质这方面，恩格斯做了很深刻的阐述，并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你们是哲学专业，可以自己研究，我不用多讲了。

【从第 128 页第二段起就讲量和质对立统一的规律。

一开始就引了杜林的一段话，这段话是用来攻击量变、质变的规律。

“例如，根据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这种糊涂混乱的观念，所以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因为这个量的增加而变为资本，一这话听起来难道不滑稽吗？”（《反杜林论》第 128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6 页）

恩格斯主要驳他的这句话。杜林的这句话是对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做了一个曲解，下面恩格斯根据他的曲解做了批判。

他的曲解是两点。第一点：杜林好像是说，款项增加到一定界限，仅仅因为量的增加而变为资本。这是一个曲解。好像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量的现象转化为质。

实际上是什么情形呢？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实际上是对立统一规律表现在量和质的关系上。对立统一的规律里面有一条，我们大家学过哲学都知道，就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立面是要有条件才能转化；没有条件不能转化。量和质互相转化也是服从这条规律。

这里举《资本论》的例子。资本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货币达到一定的界限就转化为资本。货币到一定界限转化为资本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杜林解释成为：就是仅仅一定量的增加就会变为资本。就是数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质量。数量变为质量，当然数量本身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是一个方面。但同时，达到数量程度的本身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质、转化为资本。不是任何一个量，达到任何一个界限就一定会转化为资本的。

要使货币变为资本，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也不能仅仅有了一定数量的货币就可以成为资本的。不能这样说。

比如说：1000 元钱可以成为资本。是不是仅仅有了 1000 元就可以变了资本呢？不能这样说。如果，1000 元摆在皮包里，会不会变为资本？把 1000 元锁在柜子里会不会变为资本？如果一天摆上 100 块，摆上 10 天会不会变为资本？不会的。仅仅有 1000 元是不能变为资本的。

恩格斯就批驳了他这一点：不是仅仅量的增加就会变为资本的。量转化为质，当然要有一定量的数目，但是达到这一个量的数目以后，还要有一定的条件货币才能变为资本。

比如后面恩格斯讲到货币时说到：货币不是到一定数量就会变为资本的。问题在于，货币一部分要成为工资，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购买足够的生产资料，要有足够的投资，来雇佣足够的工人，要有雇佣工人的条件，然后才能转变成为资本。

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常常有这样的问題：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任意曲解。曲解以后按照他的曲解再来反驳。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先说成是很荒谬的，然后再攻击，这当然好攻。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像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讲的那样。这种曲解就是杜林说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变为质量，就可以达到转化，好像对立面的转化是无条件的。这完全不符合辩证法。还有一种曲解就是，杜林好像认为马克思就是把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这一个原理当做公式。硬套到每一件事情上去。他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

杜林是唯心主义者，是从原则出发。思想方法是先讲原则，再用原则硬套到资本中去。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也是按照唯心主义方法定出一个原则，然后按照这个原则来任意解释一切。在这里恩格斯给予他一个反驳：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崇高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加到马克思身上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量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数量(这个数量虽然因条件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可是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时，它才能转变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而杜林先生却硬说马克思有这样一种思想：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化为质，‘所以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变为资本。’——可见和马克思讲的完全相反。”(《反杜林论》第129页，着重号原有；又见同上书第467—468页)

马克思的方法是先研究货币和资本的关系，具体地把这个关系完全弄清楚了。货币达到一定的数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清楚了，然后做出结论。这是黑格尔规律的证明，先有事实，然后再有原则。先根据事实，再来说明原则的正确性。

而在杜林好像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先有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原则，然后不加调查研究就随便说款项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变为资本。一个是从事实出发然

后到原则的唯物主义；一个是杜林的曲解，就是从黑格尔的原则出发，然后任意解释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者应用辩证法时不能采取杜林的这种方法，而要采取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方法。

这段话值得我们很好地注意。因为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我们虽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常常容易犯这个毛病：脑子里面先想好一个原则，然后用原则简单的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什么？是把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先不用它来解释问题。先在脑子里面开一个门，然后，首先是对事实做调查研究，把事实研究清楚了，然后根据事实来看我们的原则正确不正确。如果事实研究的结果和原来的原则一致了，那么我们说，事实证明了原则。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原则证明事实，而是用事实来证明原则。如果对事实研究的结果和原则有一点出入，我们就要修改这个原则。比如列宁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他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第一句话不很明确。

如果我们按照唯心主义的方法，我们就根据列宁的这句话来解释我们的社会。我们就会这样解释，大概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其结果就会发生很多问题，我们会忘记阶级斗争，忽视了敌人的捣乱。

如果我们从原则出发，列宁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动，一点也不能增加，一点都不能重新加以理解。那么，我们一定会犯大错误。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这样。毛主席照样引用列宁的话。1937年在《矛盾论》中毛主席就引用了这句话。到了1957年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简单重复了这句话，是不是用列宁这个原则来解释当时的社会主义问题？不是的。相反，是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做研究，然后再概括。概括以后再得出结论。现在我们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对抗的矛盾和非对抗的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后，就使列宁原来的原则得到发展。列宁的原则就不会机械地用来证明现在的事实，而是用事实、用一九五七年综合起来的事实证明了列宁的原则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又发展了他的原则。所以，理论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间概括出一些新的理论，补充了旧的理论，发展了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要这样，首先从实际出发，任何时候不要把已经有了的现成原则、公式当做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药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认为已经

有的书本公式能把我们的一切具体问题都解决了。只要简单地加以证明就行了。不能这样。任何时候都应该首先从实际出发，先研究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已有的原则来做对照。对照以后，能够证明的就要证明，不能证明的就要修改。如果证明不够的就要加以发展。

杜林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是恩格斯反驳的。恩格斯的这个反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这个毛病？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就有这个毛病。当我们在碰到恩格斯说的话和列宁的话及我们的话有些出入就没有办法想通了，常常有这样的问題。不了解恩格斯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發展，对恩格斯所说的话再进一步了解，进一步来解释。对列宁的话也是这样。

下面恩格斯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讲，杜林是制造了一个假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曲解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虚构一个达尔文来反对达尔文。我们要注意这个方法。

现代修正主义也经常用这种手法。他们的所有言论都是把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先加以曲解，曲解成好像是非常荒谬的东西，然后再来攻击。他们对我们真正的言论他不敢给公众看，同时还歪曲地做一番解释，说我们不要和平共处，不要和平，就是要搞核战争。这样曲解以后，再来进行攻击。这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方法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不用这种诡辩。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办法驳倒的。他要想把马克思主义驳倒，只能加以曲解，把它解释成为可以驳倒的东西。因为只有说成可以驳倒的东西，才能驳得了。我们没的，他们也是要造谣曲解。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是一点也不能驳倒的。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揭露这个问题。

下面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例子不作解释了。有些自然规律的、化学的例子也不解释了，还是大家看一看好。

对于量变质的问题，我想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著作进一步讲一讲。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于量变质的规律讲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说明量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变为新的质。这个原理是量变质的规律的基本思想。

新质出现以后，又发生新的量变。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又变为质，质出现以后，又开始新的量变。这是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实际上，这个规律也可以叫做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量和质的互相变化的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量和质关系上的表现。所以也可以叫做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

因为这些名词不重要，主要是讲讲它的意思。主要说明量变质的规律本身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

《矛盾论》就是根据矛盾规律来说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矛盾论》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那一段里，有一段话，讲到事物变化一种是平静的变化状况，一种是激烈的变化状况。平静状况就是量变的状态，就是渐进的变化状态。激烈变化状态就是质变的状态。《矛盾论》里已经说明了这个规律。

在《矛盾论》里，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量变、质变。在“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段中，讲到由量变到质变是矛盾的一个变化过程。

矛盾的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暂时存在的这种情形，事物就发生平静的变化状态。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发展到对立物分解、破裂的时候，就出现了激烈的变化状态。

量变到质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还是因为事物内部有矛盾。为什么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引起质变？内部矛盾还能够共处于同一体中？在这样情形下，事物发展是量变。当矛盾内部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了，对立斗争非常紧张了，弄到对立面相互依赖、共处同一体中就等于不能维持下去。这种情况就要发生激烈的状态，就要发生质变。

所以毛主席是进一步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对量变、质变转化的关系做了说明。

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具体说明，但是实际上是把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看做对立面互相转化。所以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原因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由量变变化为质变。量变到质变本身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转化为质的。

我讲一点毛主席的著作是希望同学们联系起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说明它是最根本的规律。量变和质变的规律本身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同时这种变化过程也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说明，用事物内部矛盾变化情形来说明。

另外，再讲一讲毛主席在量变和质变规律的问题上，有没有新的发展？想讲一下这个问题。

从党的历史上来看，从《毛泽东选集》来看，我们觉得毛泽东思想在辩证法上、对立统一规律上是有发展的，有许多新的、更具体的说明。根本的原理没什么变化，还是恩格斯这些原理。但是在许多具体方面有新的展开，有新的发挥。

我这里主要讲三点。

一、对事物多方面的质，多方面的量的研究问题。

二、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在实际工作里面质的数量的界限问题。

这几个问题想先讲一讲。《毛泽东选集》里有的想提一下，大家作为研究时的参考。

关于多方面质和多方面量的研究问题，主要是从《论持久战》里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讲到一种自然界的事物中有多方面的质。用什么证据可以说明？

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由量变到质变的现象。例如：水在 100°C 的时候可以沸腾，变成蒸汽。有人说水到 100°C 沸腾不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例子。他们说：虽然水沸腾变成蒸汽，但是它的化学成分不变，还是 H₂O，蒸汽还是水的成分，怎么能够说是质变呢？以后我们是这样回答他：你就是不懂得事物有多方面的质。我们说水到 100°C 时就会沸腾变成蒸汽，是质变，指的是物理学上的质，不是讲化学上的质。如果讲化学上的质，当然没有变，但是讲物理学上的质就变了。因为物理学上水和蒸汽大不相同。

比如，开火车，用水就不能开动。但是把水烧成蒸汽就能够使火车开动。水和蒸汽根本不同。水不能对火车有这么大的压力，而蒸汽就能推动机器。水变成蒸汽这是物理的质变，而化学的质没有变。所以，水有物理的质，也有化学的质。

一切生物都有质，人有人的质，动物有动物的质。人主要的质是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人的质主要是阶级性。但是人也是动物，也有动物的质，动物的质不是人的本质。因为动物也有质，但不能成为人自己的本质。人的身上也有两个质，有动物质、也有化学质，医生就是研究我们身上的化学变化，医生不研究我们的阶级性，他专门研究我们的生理质、化学质。

所以，一种事物有多方面的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只讲到一句话，讲得很少。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里一般没有很大的发挥。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发挥。

《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那一节里，在不同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个阶段有什么变化？在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是敌进我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要有一些东西下降，要有些东西上升。

下降的主要是量的下降，就是我们的一些抗日军队经过第一个阶段，力量会有所减弱，人会减少，数量会下降。这个下降主要是量的下降，质并没有很多的下降。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些东西上升了。主要是我们质的上升。某些量有可能上升，但是主要是质的上升。质的上升是指我们的战斗力是逐渐上升。开始抗日的时候是国民党的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一起打敌人，后来国民党的军队腐败，垮下去了，量下降了，也可能他的质也下降了。但是他主要是量下降了。同时我们有一个东西上升了，就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质上升了。觉悟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但是人数不一定增加多少。主要是讲质的增加，新质的增加，量也有增加，但是主要的是质的增加。

这是把量变质变的规律运用到我们的抗日战争上来。至少在抗日战争里有两种质。一种是旧质，一种是新质。旧质被敌人一攻下降了，而新质增加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至少有两方面的质。

毛主席讲到这个问题，说不要看轻多方面质的这个思想，用它来分析我们抗日战争的问题，就能够使我们对抗日战争的变化得到全面的了解。

亡国论只看到我们数量下降的方面，没有看到上升的方面。特别是质上升的方面。亡国论分子是这样来看的。我们是要全面的看，是有下降有上升。

这种方法不只在抗日战争里，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分析我们的工作，分析我们的思想……都可以用它。如我们思想有矛盾时，可以一分为二。我们的思想不是非常纯的，这是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两种质在我们脑子里闹矛盾，这种情形是有的。坏事变好事，坏事里有好事的因素，也是从两方面来看质的。坏事不能说就是等于好事，但是坏事可以说起促进好事的作用，可以起教育的作用。也就是说，坏的质和好的质可以联系起来看。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值得注意的发展。我们研究哲学要注意这些问题。这里也有一个例子，虽然不能直接讲量和质的关系，但是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在否定之否定里，杜林是反对马克思的。说马克思讲的将来的共产主义是简单地把个人所有制废除了。实际上马克思的否定之否

定先有个人私有制，以后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被剥夺之后就恢复了公有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而杜林却曲解为简单的个人私有制，而个人私有制就是公有制。对此恩格斯进行了反驳。

恩格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在共产主义里，我们是讲生产资料公有制，至于人的消费品方面还有私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还有两种情形。质的两重性经常要注意的。比如马克思讲过在共产主义的两种生产资料完全公有，这种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还办不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也还是不完全是公有的，生产资料有一部分还是私有的，还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制度说它完全公有制就片面了。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看的。实际上它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是有私人所有制性质的一部分。

私有公有互相矛盾。这里有多方面质的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

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以后，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发展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看法。

比如总的质和部分质的关系。质是有各方面的质，还有一个总的质和部分质的关系问题。总的质变并不等于部分质变，部分质变不等于总的质变。在总的量变的情形下，还可以有部分质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多方面质的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不很重要，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就很重要了。比如我们得到政权以后，总的来说旧社会的质变了，变为新社会了，我们已经是新社会了，旧社会发生质变了。但是能不能说新社会完全是新质了？新社会是不是已经从政权到各个部分全都是新的制度了？不能这样说。

我们说，总的来讲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但如从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来讲，旧社会的残余还很多。所以总的质变以后，接着还有部分质变的问题。总的质变依靠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是革命力量发展的结果。革命力量一天天增长，在斗争中逐渐发展把反动势力完全推翻了，在总的质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并不等于部分质变也变化了。最初几年，部分地区还要搞土地革命，在土改以后还是个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实际上还是旧制度，它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总的质变以后还要有一个一部分一部分地变。先搞土地改革，然后搞互助合作，再搞公社化。

在城市里面，总的质变是把官僚资本没收。但接着还要把民族工商业逐步进行改造，还有部分质变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大概是 1953 年毛主席开始提出总的质变和部分质变的思想。以后常常提这个问题。

部分质变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里意义很大。所以毛主席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说的这些问题可以证明一点：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就在哲学上有了新的概括，就在原来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新的解释，做了一

些新的发挥、新的解释，没有这些新的解释就不能解决新的问题。

新的理论是从新的实践里面来的，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如果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里不考虑部分质变的问题是会犯错误的。现在苏联的理论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太简单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了，清一色了，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幻想。

部分质变就是包括在多方面的研究质的关系的思想里面，这是一种发展。我们研究量变质的问题，不能不同时考虑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思想，要了解这个规律，要了解这种新的思想。

其次是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和量变、质变有关系，它是以量变和质变规律为基础的。

革命阶段论就是两次质变不能同时进行。在发展过程中，第一次质变和第二次质变不能同时进行。所以，两次质变中间要有阶段，两次革命变化中也要有阶段。

本来质变从广义来讲，是一种革命式的变化。量变是渐进性的变化，革命是质的变化，这是一种质变。革命，从广义来解释，就是质变的意思。狭义地解释是指在阶级社会里夺取政权的革命。

修正主义现在就强调这点，说：以后没有革命了。因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就没有夺取政权这种政治斗争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修正主义建立了统治地位以后，是不是不要夺取政权了。将来要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是不是还要重新夺取政权？恐怕还要重新夺取政权。

修正主义总是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了，也没有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问题了。所以革命的名词就不能使用了。我们觉得

用真正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还是应该把一切根本性的质变都叫做革命性的变化。

事物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特点，一次革命变化之后，要经过一个阶段，经过一个量变的间隔才能发生第二次革命(质变)的变化。由量变到质变，质变之后还要经过一个量变的渐进发展的过程。然后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出现新的再一次的激烈变化的革命的飞跃。

革命阶段论是讲两次革命中要有量变的过程，量变的间隔，不能把前后两次质变合在一起来实现。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新的变化。两种新的变化不能同时完成。1949年我们完成了民主革命，全国胜利了。1949年以后开始准备，并且初步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全面地实现还是1956年—1957年。1956年和1957年三大改造胜利。以后在1957年又有反右斗争的胜利。三大改造在经济基础上实现了革命。1957年的反右整风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实现了全面的革命改造。所以1956年、1957年社会主义才算比较全面地得到了胜利。

1949年主要只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所以决不能说：1949年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这样说。实现民主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同时。所以革命是有阶段的。两次质变中有量变的阶段，量的间隔。革命阶段论就是这个意思。

不断革命论的意思，是进行一次革命质变以后同时就要积极准备第二次革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民主革命实现以后，立刻就打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准备全面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提出来的。比较明确地提出来是在《法兰西内战》里面。那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战役胜利以后，接着就准备进攻，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时间，那时候就这样提出一个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在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对这个思想加以曲解，把不断革命解释成：同时发动世界革命。以后不断革命论的名誉就糟了，没有人再谈起了。一讲就有托派的嫌疑。所以没人敢讲了。

以后毛主席又讲了，还是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意讲。革命要不断地进行，一次革命以后接着准备第二次革命。

我们现在讲不断革命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此它有新的意义。

不断革命论的意思不仅仅是对总的质变来说的，前面讲的不断革命论是讲的总的质变。在民主革命的总的质变中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指总的质变来讲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部分质变的问题。一个总的质变以后，还要积极准备部分质变的问题。三大改造的实现是一个总的革命，将来还要有什么总的革命变化呢？肯定还会有的，这要看社会主义发展和实践的情形。在不断革命论里，总的质变里面，还要进行部分质的改变，这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简单讲一点，大家可以参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条是“胸中有‘数’”，做工作要“胸中有‘数’”。所谓“胸中有‘数’”，就是对问题要经常掌握数量界限。那时候他是指什么问题说的呢？是指当时搞土地改革要掌握一个打击的百分比。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打击百分之十以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谈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政治上要有数量的界限。一切事物中都有数量界限。超过这个数量，界限，质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要控制着只打击百分之十以下，甚至只打击百分之五。要能够控制着这个数量，大体上可以保证斗争的胜利，大体上能够保证民主革命的性质，就是打击对象的确能保证集中在地主阶级、封建富农阶级的身上。如果打击对象超过了这个数量，超过了百分之十，就很可能超过了民主革命的界限。因为超过了百分之十，打击对象就可以扩大到富裕农民身上去了。打击到农民身上就有点不是民主革命了。控制人数可以保证反对的对象不超过民主革命阶段。

量变成质的规律在实际工作里是非常深刻的运用方法。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哲学原理直接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变成直接指导实际工作的具体方法。是哲学，但不是只讲原理。哲学本身变成活生生的工作中的哲学。这是一个例子。量变质的规律，我们学校里面有的教员讲得神乎其神。量变质、质又变量，讲来讲去讲了很多名词。与生活根本没有联系。

同样，毛主席关于工作里面要做到胸中有数，这个原则也是量变质的规律。根本原则也是一个，也可以说没有增加一点，或者减少一点。可是也增加了一点，就是量变质变的规律，成了活的科学的哲学直接指导工作的哲学。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突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也有关系，所以值得特别谈一下。

毛主席关于量变质的规律问题方面的发展大体上讲这几点。也许我所讲的还有遗漏，大家可以进一步研究，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根据我所了解的有这几点。

我觉得，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一定要联系现在的发展来研究，否则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就很贫乏，特别是不能联系实际。所以，我是用比较的方法讲的。不知道这种比较方法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研究。】

第二次辅导

(1964.1.24)

今天接着讲十三章一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章是专门讲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因为杜林也反对否定的否定。这一章开头，恩格斯把杜林的话做了引证。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杜林的书是很大的一本著作，写的东西内容很多，恩格斯从中找出最重要的一段，加以批判。这是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里讲的剥夺者被剥夺那一篇的攻击。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大家都学过《资本论》，是了解的，用不着解释。

杜林这一段话的攻击，有许多手法，可以把它揭露一下，恩格斯也揭露过这个手法。

1.杜林说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依靠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是黑格尔公式里做出来的结论。这个意思就是把马克思的方法解释成为公式主义。他说：“这个历史的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算是马克思书中还比较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他除了倚据科学的拐杖之外；不再倚据辩证法的拐杖，那么或许更要好些”（《反杜林论》第133页；又见同上书第472页）。这就把否定的否定当做一个“拐杖”，当做一个公式。后面还讲这个公式“起着接生婆的作用，因它之助，便从过去的胎中产生了将来”。

2.杜林把否定的否定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循环。他说：“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达到了个人所有制的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之后跟着产生另一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同时被称为是‘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同上书)。他把马克思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方法，曲解成一种循环，即从“个人所有制”又回到“个人所有制”。

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杜林说:“如果马克思先生把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高级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用黑格尔的游戏文字来表达,这就是矛盾同时既被克服又被保留……”(同上书)这里他把否定的否定第三阶段,一方面曲解成一种循环,另一方面把第三阶段的“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硬说成为一个东西。第三阶段本身是一个高级的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他说这是“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称为“公有制”。这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曲解。即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曲解成绝对的统一,把对立的方面硬说成绝对的统一。这是攻击辩证法的一种方法。你说有对立的统一,即前面杜林讲的,马克思认为对立的统一的一切东西都是一样的,都融合为一,他在前一章讲过这样的话:“归根到底一切都成为一样的东西。”要不是这样就是否定对立的统一规律,如果你要承认对立的统一规律,那你就要把一切都成为一样的东西,把“个人所有制”看成为“公有制”。他硬说马克思是把“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看成为“公有制”。就是说,好像是马克思是这样讲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恢复到“个人所有制”而“个人所有制”同时也是“公有制”。他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对立的完全融合,完全相等。

恩格斯引的这几段攻击否定的否定的话,就是包含着这三种曲解,把否定的否定看成是这样一种非常荒谬的东西。实际上,否

定的否定规律本身不是他所讲的这样的东西。用曲解的方法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现代修正主义也是照样用这种手法。比如他们把否定的否定说成是一种简单的死的公式。这种曲解,不但杜林这样做了,后来的民粹派也是这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说明了这样的攻击。杜林在这里把马克思讲的否定的否定硬说成“个人所有制”的恢复。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简单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恩格斯揭露了这一点,马克思讲的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这个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公有,个人所有只限于生活资料这一方面。杜林硬把它说成是恢复个人所有制。这种曲解的方法叫偷换概念的方法。他攻击对方的时候,把对方原来是合理的概念偷换成为一个很荒谬的概念,然后进行攻击。

还有一种,就是用简单的形式类比的方法,来攻击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把否定的否定比成基督教教理。他说:“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起着从基督教教理问答中剽窃下来的堕落这一概念的作用,而第二个否定则是起着引

向赎罪的高级统一的作用。”(《反杜林论》第133—134页;又见同上书第472页)

这是《圣经》上的故事。知道基督降生的故事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就是说,原来人类在天国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没有罪,后来有一个使者偷了上帝的苹果吃了,上帝降罪了,后来上帝为了要拯救人类,要人类赎罪,全人类都为那个使者因为偷了一个苹果而赎罪。而偷苹果的罪叫原始的罪,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所谓原罪。人类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使者犯了原始的罪过。所以人类的生活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在上帝乐园里生活,没有罪,没有什么痛苦;后来犯了原罪,就永远受苦受难;最后,如果经过人类的赎罪,上帝就来拯救了。

从形式上来看,基督降生就有点否定的否定的味道。因此他用形式类比的方法进行攻击。你看,基督教就有这样的故事,仿佛马克思是模仿基督教的故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在这里,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杜林这样的错误理论里,恩格斯能够抓住它一段最典型的材料集中加以批判。下边就是恩格斯对杜林的反驳。

首先,是揭露杜林对马克思的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内容加以曲解了,最后归结到对规律应用的曲解。

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给马克思加上他所从来未提过只字的什么所有制的高级统一。他说:“马克思说:‘这是否定的否定。它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果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就是说,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土地的共有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从那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自然是比从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长久很多,困难得多,艰苦得多的过程’。全部就是如此。”(《反杜林论》第134—135页;又见同上书第473页)

恩格斯对这一段话下面做了解释,就是说,马克思讲的这个个人所有制,这是讲产品的消费的个人所有制,它的基础是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那么这个高级的统一当然也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但它主要的东西是公有制,而不是简单恢复的个人所有制。这是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对马克思的曲解。

恩格斯在下边又讲:“既是个人的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种糊涂拙劣的观念,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得出的无稽之谈,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马

克思让其信徒自己去解决的这种意味深长的辩证法之谜——这一切又是杜林先生的随意捏造和臆想。”（《反杜林论》第135页；又见同上书第474页）

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不过这里面值得讲一点，辩证法讲的对立的统一，不是对立面的相等。但是，我们一般讲话有时候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成为对立面相等。比如，修正主义的出现是不是好事情呢？我们用辩证法的原则，一般地讲，可以说，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说简单一点，如果从字面上了解，好像坏事就是好事。曲解辩证法的人常常是用这种手法的，说辩证法是把对立的東西搞得好坏不分了。实际上，我们讲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这是讲这件事的两方面，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危害性，帮助了帝国主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它是件好事，并不是因为它帮助帝国主义这件事本身就是好事，帮助帝国主义当然是坏事，决不能说这是好事，我们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它有另外的一方面，它可以向我们提出问题，使我们了解到修正主义的危险，使我们得到教训，提高警惕，搞社会主义要防止修正主义，所以是好事情。辩证法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不是把对立的東西任意混淆起来的方法。一分为二怎样分？就要看对象。有的东西，对立面很清楚，很容易看出来。如一个社会，有无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一看就知道。有些对立面，在形式上多多少少好像又是外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形式上是阶级区别的对立面，但它们之间又有内部联系，那就是表面上不容易看到的，要用思想去理解，如资产阶级影响到无产阶级队伍里面，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修正主义。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头脑去想，光靠感觉去感觉出来是困难的。有些东西，它暴露出来我们感觉不到，不容易看到它的内部联系。一分为二，就是思想上一分为二，理解它的不同方面。各种事物都是这样的，外部不易暴露对立面。如修正主义的出现这件事，可以把它看成好事的方面，这是不能感觉到的，只有从长期的经验中才能体会到，用自己的思想去领会才能领会到。但是不管怎样，对立面总是两方面。我们说这件事是坏事又是好事，并不等于说坏事本身就是好事，是说这件事有坏的一方面，但也有另外的一方面，即它附带着起好的作用。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还要注意到它的本质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不是折衷主义，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消费个人所有制。修正主义本质是坏事，但在附带方面，次要方面又是一件好事，可以使坏事变为好事。

有的同志问：怎样一分为二？一分为二，首先是看到事情总有两方面，其次是要搞清楚以哪一方面为主，根本不是对立面的相等。杜林荒谬的所在，就是把对立面看成相等的东西。

第 136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5 页)中间一段，是恩格斯揭露杜林对马克思的曲解，好像不可能是无意的，不可能是无知的，而是有意的。原因是他的曲解是三读《资本论》之后才这样做的。他在作这种曲解之前，他的书已经出了两版，也没有讲这个问题，后来突然出来这个问题了。恩格斯在这一段最后几句话里讲到杜林的方法。他说：“而且几乎是杜林先生逼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杜林先生在这里故意地来‘有利地扩展’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说对杜林先生自己有利。”

伯恩施坦曾说，他很欣赏杜林的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杜林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图式论，机械唯物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实用主义，对我有利，有用就是真理。这是实用主义的原则。当然，伯恩施坦讲的实用主义主要的是讲他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用到工人阶级队伍里面来就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追求眼前的利益迁就现状。这就是实用主义的特点，也是机会主义的特点。杜林曲解马克思的方法，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性质。

第 137 页上，就是《资本论》上讲的剥夺者被剥夺的问题。马克思是这样讲的，由小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又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都读过《资本论》，这里用不着解释了。

第 138 页，是恩格斯对上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些解释，这个思想是完全合理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分析，并没有什么像杜林曲解的那种情况。恩格斯在头一段的第 5 行说：“马克思只是从历史上予以证明并在这里简短地概述，说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产生自身消灭的条件，即小私有者被剥夺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自身也产生了使它一定归于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了……。”(又见同上书第 476 页)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很清楚。恩格斯这种解释还是想来说明否定的否定规律反映了什么？就是说一种东西，如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必然产生自己灭亡的条件。这个思想可以用到一切东西上去。任何东西，它在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自己灭亡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它的对立面。对立面的出现，结果使这种事物开始消灭。所谓消灭，也就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否定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只是事物的一种形态的消灭。小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的集

中生产，走到它的对立面，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自己消灭的条件，即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最后是资本主义也归于灭亡。而这个灭亡，也是转到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

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的内容，无非是说：一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原因，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矛盾，矛盾的发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对立面以后，又产生自己新的对立面。经过两次转化，就形成一种否定的否定关系。为什么叫否定的否定关系呢？就是说，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带有曲折性或者是螺旋的形式，经过两次否定。原来是个人劳动，个人私有为基础，经过两次否定，出现了共产主义，好像是有些恢复又有了个人私有，和最初的个人私有有某些相同的地方。所以第二个否定常常在某些方面好像又恢复了最初阶段的某些特征。恩格斯在这里具体说明了这个内容。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讲得更清楚。他讲到否定的否定在外表上的反复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而是某些特征的反复。

另外，关于发展使事物转到对立的方面的思想，它的核心还是对立统一的规律。首先是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矛盾。所以矛盾的发展，就是对立面的发展。对立面的发展使事物转到反面。矛盾的发展怎样引起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斗争。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这本书里没有讲。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过了，现在要作点补充。当然不是说恩格斯写这本书犯了什么错误。因为在那个论战中不需要提出斗争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出来，但是对立却讲了。毛主席讲辩证法，着重讲对立统一规律。他解释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普遍存在的规律。事物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对立面的斗争使事物向反面转化。由于事物向反面转化就引起发展，引起质变。这里或者再加上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毛主席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过这方面的原理，比恩格斯当时讲的更展开了一些，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就更清楚一些。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方法，这是简单的说法。但是要说得全面一点，应该把毛主席说的所有的这些话都说出来。首先是事物是统一的东西，但有对立面，对立面的关系是又统一又斗争。又统一又斗争，通过斗争引起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然后推动事物前进。两个向对立面转化，就是一个否定的否定，一般可以这样说。向对立面转化，也有集中进行的，一个整个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资本主义的灭亡，到社会主义，是整个的向对立面转化。也有在斗争的过程里，对立的一个方面向对立面转化，这也是对立面的转化。如我们党内要整风，整风就有对立面，有正确的思想，

也有错误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经过斗争，结果会发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斗争的结果是不是会使我们的整个党向对立面转化呢？当然不是这样的。经过整风，不是使党向对立面转化，而是达到更统一更团结。但是经过这个斗争，可以使有错误思想的人向对立面转化，使正确的思想提高，正确思想的支配地位更加强了，所以党就更发展了。对立面的支配地位发生变化，或者是矛盾根本解决了，或者是矛盾双方的某一方面由被支配的地位走向支配的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使事物发生质的飞跃，对立面的支配或者被支配地位不变化，但在某一方面发生了转化，使事物更前进了一步，一般是量的变化，或者是部分质变，阶段性的发展。也可以有相反的情况。比如，在苏联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斗争的结果，统治地位变了，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这也是一种发展。这一种发展是带有倒退性的，复辟性的发展。复辟这件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它的必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如进行一个新的事业，搞一个新的创造，一点经验也没有，出发点是先进的，但到了一定时候，因为犯了错误，碰了钉子，遭受挫折。从形式上看是倒退的，实际上也有前进的一方面，因为他可以通过吸取教训，再向前进。在发展的过程中，绝对的倒退是没有的。当然如果不接受教训，那就不能再前进。人类要搞一点什么新的事业，碰了钉子，绝对不取得教训是没有的。这一部分人得不到教训，另一部分人会取得教训。有人提出：有了正确的方向，经过失败达到胜利，算不算否定的否定？可以这样说。在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般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有了经验就不同了，那就不是失败的问题了。如我们中国可以接受国际上的教训，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还会有某种反复，也还会碰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在发展过程中，还会或多或少地经过曲折。这个曲折也就构成了否定的否定的一种形式。因为有了旧的经验，也可能对一些新情况不了解，再碰到一些新情况，还是没有经验。在斗争中还可能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或多或少的曲折都会有的。

第138页的第二段，就讲到否定的否定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恩格斯说：“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说明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过程是否定的否定，并不是先拿一个否定的否定作为公式来套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经过研究，简单做出结论，说将来一定会出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不是这样做结论的。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否定的否定规律是作为一种方法，一个向导，不是一个用来证明问题的公式。什么是证明公式呢？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不经过任何调查研究，只根据现有的一些现象，就直接做出一个结论，说这个现象一定要走到它的反面。反面的

结果，即否定的结果怎么样，他不管。如果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做出结论，他说是根据否定的否定规律，所以我的结论是对的。黑格尔讲一切事物都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把否定的否定规律看做同杜林讲的一样，把它当做证明某个结论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用不着对事物作调查研究就可以按照这个公式作结论。

初等数学有时候可以这样做。如两条不相连的直线——，怎样证明它是相等的？这就要把一条线的一端摆到另一条线的一端，再把一条线的另一端摆到另一条线的另一端上，使两条线相垂，我们说它是相等的。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公理，两条直线的两点都合在一起，那么这两条线是完全相等的。两条直线只要两端完全重合，它就相等。我们这样做了，完全符合这个公理，它是相等的。这就是证明的工具，初等数学常常用这样证明的方法。

杜林就是把否定的否定看做是简单证明的工具。因为初等数学很简单，这样做了就能证明。可是，社会的发展，自然界许多复杂现象的过程，就不能这样简单地来证明。运用否定的否定规律，就是说，我们根据以前观察的许多事物研究的结果，发现了否定的否定规律是普遍规律。因此，我们以后在研究一个新事物的发展规律的时候，把这个规律作为一个向导，估计可能会有这样的过程，但会不会实现这个过程，要具体研究，特别是怎样否定、怎样被否定，要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做出结论，在没有具体分析之前，不能下结论。

否定的否定总是表明事物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才能够发展的，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因此，不管是任何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好，一万年以后也好，它的发展过程还可能会表现出否定的否定的形式，也就是采取曲折的形式，螺旋的形式。肯定地说，共产主义也不是完全直线发展的，这是可以估计的。至于怎么样发展？我们现在不能提出具体的估计。

所以，辩证法这种方法，只能作为我们研究方向的指南，不能直接用来帮助我们对事物未来的发展做出很具体的结论。

辩证法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那么是不是它本身就完全是绝对真理了呢？有没有相对性呢？一切真理都有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法的普遍规律本身也有相对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真理性也是受限制的。受什么限制呢？就是说，只能把它作为向导，作为研究的指南才有真理性，如果想把这个限制夸大，突破这个限制，把它当做万能的公式，那它就荒谬绝伦了。辩证法的对立统

一规律,包括一分为二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只能当做开辟真理道路的工具,它才是真理,而不是当做死的公式,否则就是错误的。

有人问:一分为二怎么分法?

如果要求我们定一个很具体的一分为二的方法,那么问题就来了,对立统一规律不能回答如何具体的分法,普遍规律不能回答我们对一个具体事物究竟应该怎样分法,它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方向。一切问题都要采取两分法,当你碰到问题时,不要只看一面。任何时候,如总结工作的时候,都不要只看见成绩或者只看见缺点。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那样好,也不能说它就没有缺点。我们和大庆油田比,我们的工作差得多,但不能说自己的工作好像一团黑暗。所以要反对两种倾向。学习大庆油田经验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估计也是这样的,估计过低了也不行,把自己估计过高了,故步自封也不行。

怎样看事物的两面呢?对不同的具体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东西,从表面上就可以分为两部分。如世界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空间上就分为两类。有的东西,它有两个方面。如一个人的思想有两重性。你不能把一个人分为两部分,但每个人的思想上都有两重性,如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有的人即使有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但是也会有缺点,总有两重性。而同样的两重性,但又有程度的不同。

有了一分为二的方法作指导,并不等于直接就能解决问题,只能做为一个向导,它告诉我们怎样一分为二。如果要真正把事情的两方面搞得很清楚,那就需要很好地调查研究,要自己做具体的努力,不可能依靠一个公式就立刻把问题解决了。辩证法是一个向导,要把它运用得很好,使它真正起作用,还是要靠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问题。还要经过调查,经过实践,在辩证法两分法的指导下,可以把事物的矛盾揭露出来,然后才能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办法。

第138—139页这一段,说明了杜林不懂得辩证法的本性。

刚才讲过,辩证法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作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的向导,不是证明的工具。形式逻辑从形式上来看便是一种证明的工具。形式逻辑叫三段论法,三段论法在形式上就是一种证明的工具,一切的推理大体上都分三段,或者是三句话。前两句话叫前提,后一句话叫结论。一般的推理形式都叫三段论法。普通教科书的三段论式,如一切人都要死,某人是一个人,所以某人也必然要死的。如秦始皇是人,他虽然想长生不老,但他还是要死

的。这个三段论法的公式，有一些相互的关系。第一段叫大前提，一切人都要死，这是普遍原则；第二段是具体事例，秦始皇是人；第三段是把普遍原则和具体事例结合起来得出结论，秦始皇是要死的。大前提是原则，小前提举出具体事例，第三是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第二个前提做出的论断。这是形式逻辑最基本的形式，基本的公式。如果我们把一种事情看做是很简单的，是孤立不变的，那么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证明问题。只要有一个大前提(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比如人都是会死的，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公式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用不着请医生，请生理学家研究这个人的生理，只要根据三段论法，就可以做结论。凡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事物，用推理的方法直接可以做出结论。又如杯子，一切杯子都可以盛水，我手里这也是个杯子，结论，它可以盛水。很简单的事情可以用三段式来作结论，不需要研究杯子为什么可以盛水?它的质量怎么样?用什么质料做成的，形式逻辑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用做证明的方法，对简单的事物直接做出结论。

恩格斯在第138—139页上讲道：“……形式逻辑首先也是寻找新结论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就是说，已经知道了普遍的原则，那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情结果应该怎样研究，我们可以运用三段法来求得。形式逻辑可以直接证明问题，用不着作什么结论。恩格斯说：“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而且，辩证法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这就是说，形式逻辑的眼界比较狭隘，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经过研究就作论断，所以它只能运用在比较简单的事情上，比较复杂的事情就不行了。

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化。那么可不可以根据这种原则对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做出结论说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一定贫困化呢?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的趋势来说劳动者是要贫困化的。可是，可能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它的劳动者普遍不是贫困化，有点稍微富裕起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会有的。如劳动就业的问题，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失业现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充分就业了，一个是瑞士，一个是西德。南斯拉夫有许多人跑到西德去找工作。现在西德又有失业的了。这种情况用三段论法做结论就不行。在这里，形式逻辑就没有用了。如果你想用形式逻辑做出这样的结论，瑞士的劳动者一定会有失业的。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有失业?有什么证明?你回答说，有三段论法作证明。三段论法是普遍原则，一定能运用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上去。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失业，瑞士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瑞士必然有失业的。你

看，三段论法是这样的，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果你要这样来证明，那就要落空。

因为社会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用那种公式来作结论是不可能的。这就要用辩证法来解决问题。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失业，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劳动者的贫困化，这是普遍的规律。但是普遍的规律应该这样了解，它是资本主义总的发展趋势。但在总的发展趋势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具体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殖民地很多，从殖民地掠夺超额利润，使本国的劳动人民比较富裕起来。所谓比较富裕是平均来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比我们高一点，这是一种矛盾现象，如果不分析这些现象，就搞不清楚。总的趋势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终归要发生问题的，失业的情况，在任何国家里，迟早是要增长的。现在还没有失业情况的国家，将来还是会有失业的，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在暂时一个阶段里，又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不作具体的调查研究是不能理解的，也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这就非用辩证法不可。这就要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眼界，到广大的事物中去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要联系到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联系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关系，联系到全世界的经济情况。

恩格斯说：“辩证法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反杜林论》第139页；又见同上书第477页）这就是说对世界的看法能够看得更广大了。所谓广大，也可以从数量上来说。初等数学运用于狭隘的范围内是正确的，高等数学要运用到广大的宇宙空间才能显出它的广大。高等数学要用辩证法，从广大世界范围内来看，就要把曲线看做直线。

当然，形式逻辑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要用形式逻辑的公式作证明。有时在检查一种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要运用三段论法的公式，你违背了它也会犯错误。从前，古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搞的形式逻辑，目的就是要向当时的诡辩论作斗争。当时的诡辩论者就是设法利用混乱的逻辑进行诡辩。形式逻辑把逻辑的规律搞清楚了，可以用逻辑的规律来检查一个人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形式逻辑作为证明的工具有时是需要的，但不能真正对事物作科学的研究，而简单的证明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恩格斯在第139页的第8行说：“在这里，简单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内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肯定地

落到了次要地位。可是高等数学中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开始，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初级数学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同样，像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必然如此。”用辩证法来研究，我们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趋势当然是劳动者的贫困化，资本主义要产生失业。用辩证法又可以说明瑞士可以充分就业，而形式逻辑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像这一类的问题很多。孙中山也批评过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讲过，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总是喜欢延长劳动时间，这不见得对，像美国福特汽车厂，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他也是想用三段论法来证明马克思是错的，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是进行了矛盾的分析，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可以延长劳动时间，也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增强劳动生产率。一个是延长劳动时间，一个是缩短劳动时间，要进行对立面的分析。孙中山只抓住一面想来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错误的。所以，形式逻辑不能证明辩证法研究的结果。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初等数学都是用已知求未知的方法。初等数学也是用两个数来求两个数，用已知求未知。代数也是根据公式然后把未知数找出来。这都是由已知到未知的方法。

形式逻辑有两种：一种是演绎逻辑，一种是归纳逻辑。演绎逻辑是根据两个大前提、原则来推测某一个具体事物，由已知到未知。有时候自然科学常常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由已知推到未知。

比如达尔文有这样一件事情，他经过对很多事实的研究得出许多植物的花的花粉总是要靠昆虫来传播。因此，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断定凡是有蜜的花都是由昆虫来传播花粉的。后来有一个读过达尔文的文章的人，在非洲发现了一种花，这种花很大，也是有蜜的花。但是花太大了，很难想像有一种昆虫能来给它传播花粉，于是他就写信给达尔文，说我就不能设想这种花会有一种昆虫能给它传播花粉，因为太大了，恐怕你讲的原则不对。达尔文回答他说：你再去调查调查，如果你所发现的那形状的花可以肯定，传播那种花粉的昆虫一定能找出来。后来这人根据达尔文的信，就找到了这种虫。不过不容易找到。

在非洲发现了一种花，形状与达尔文研究的花一样，达尔文推测这种花一定要有一种昆虫来授它的花粉，他还没有找到这种虫，但是他可以推测。这就是说，简单的形式逻辑也可以帮助人们从已知到未知。

人都是要死的。因为某人是人，所以要死的。这是演绎逻辑。一切人都是要死的，这是普遍规律。因此对个人作结论就一定准确。根据这个原则就可以推测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规律：要死的。如果有谁说我发现长生不老的药，吃了这种药可以不死，那可以根据形式逻辑肯定这是错误的。

逻辑，即使是形式逻辑也可以帮助人们由已知推到未知，辩证法不过是更高级点。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可以指出一个方向，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可能采取这种形式，至于是不是一定要采取这个形式发展，那还要先进行具体地研究。不能直接作结论。规律只是一个向导、方向。有了这个方向，在观察问题时可以注意这个方向。

所以，不能把理论原则当做简单的公式。初等数学有些问题可以用公式来简单的证明，但不是占主要地位。这段话恩格斯讲过。他说：即使是初等数学也是一种推测未知的方法。有时初等数学的公式也可以简单地证明问题。因为初等数学比较简单。大家读过初等数学都知道。

恩格斯又说：“可是高等数学中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开始，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初级数学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反杜林论》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7 页）

如果用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来证明高等数学的一些结论，那是完全不能证明的。初等数学认为，直线就不能是曲线。如果要用这种观点来理解高等数学就必然要犯错误。初等数学认为，两段之间直线最短。这种公式可以证明日常生活中许多问题。比如我们想走最短的路自然而然要走直路。因为比走弯路近一些。这是初等数学。但是到了天文计算时，很长的两段距离中间最短的并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是常识所不可设想的。高等数学的公式只能这样计算。在用微分法分到无限小的情况下，也不能说两段之间最短的就是直线。在研究地质，研究最基本的粒子运动时，如果简单地按照两段之间最短(就是直线)来计算也会犯错误。高等数学中的最大的和最小的东西跟日常生活中的最大和最小又不一样。

“同样，像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必然如此。”（《反杜林论》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7—478 页）

形式逻辑有一条规律，就是和实际不能有矛盾。A 就是 A，甲就是甲，甲不能又是非甲。就是不能有矛盾。这种形式逻辑的观点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不需要发展，不需要考虑复杂的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杯子就是杯子，不能说它又不是杯子，不能考虑变化的情况。但是到如果要考虑它的发展，

这个公式就不行了，直线可以是曲线，直线在一定条件下就是曲线。是可以这样的。】

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8 页)最后一段，这里讲到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像杜林讲的像《圣经》上的故事那样一种神秘的法宝。恩格斯讲：辩证法“这是非常简单的、到处、每天发生的过程，如果清除掉它上面的、被旧时唯心主义哲学蒙上的、而且无能的形而上学者如杜林先生之流为着自身利益还想继续蒙上去的那层神秘的翳障，那么它是任何小孩子也都可以理解的”。下边，恩格斯举了一些很通俗的例子作说明。

这一段说明很重要。我们一般同志在学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障碍，觉得否定的否定规律很难理解，是一个很神秘的规律，好像中间有很难了解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是日常存在的东西。毛主席说过，工作要有节奏，要劳逸结合，事情是有曲折的，波浪式的，有起有伏。劳动—休息—劳动，这种简单的事情就是否定的否定。生产是波浪式发展的，就是否定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有繁荣，有危机，又有繁荣，也是否定的否定。

形式逻辑这个名词，有时候是指纯粹的形式观点，不研究内容。不研究内容，当然就不研究矛盾，所以是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这个名词，有时候是同形而上学混用的，有时候又有区别。形式逻辑就是讲形式逻辑的科学，形而上学是世界观，是方法。形式逻辑不是世界观，是具体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是这样分的。有时候把形式逻辑看成和形而上学差不多。主要是它只表示形式的一种片面、表面的思维方法。形式逻辑在科学研究上，作为帮助证明的次要方法还是有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作科学研究，搞工作的时候要排除，不能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做工作，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只能用辩证法的方法。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方法。

要注意，为什么有一些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人们的思想里影响这样大呢?为什么我们在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问题时常常碰到困难呢?这是有原因的。恩格斯讲：形而上学的方法在日常家庭生活范围内使用它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问题作研究，看得表面一点、片面一点也不会碰钉子。在日常生活里，表面看问题，片面看问题成为一种很巩固的习惯，加上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发展，并着重进行宣传，所以就形成一种巩固的习惯。也是由于在日常生活里不会使我们受很大的害处，而且也

还方便，所以容易形成这样的习惯。但是一旦要涉及到要真正研究、解决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没有辩证法就一定要碰钉子。这个意思，绝不是说形而上学在科学方法上还可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它在科学发展到一个历史阶段上曾经作为一种习惯起过作用。形式逻辑这个名词，如果用形而上学的意义去了解是要不得的，在科学研究上要反对形式逻辑。但仅仅思维时所采取的逻辑，还是要用的，我们除了主要用辩证法的分析矛盾之外，在逻辑上我们要弄懂问题。

正因为否定的否定是一种普遍规律，所以它可以作为我们考察问题的向导。这样一种平常的普遍规律，连小孩子都可以了解。当然，小孩子的了解并不等于真正理解了这个规律的内容。因为事物都是波浪式的、曲折的发展，一看就可以知道。走路用两只脚走，也是否定的否定。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引用了一些例子，如麦粒的例子，数学的例子，关于正与负的关系，关于微积分的问题。恩格斯在这里讲了 dx 和 dy 的关系。

$\frac{dy}{dx}$ 本身就是微分，无限小， xy 是实数。可以用具体数字来代替，如

$\frac{4}{8}$ ，这是一个不变的分数，8 与 4 微分之间的关系等于 $\frac{0}{0}$ ，8 与 4 都会变小，假如不断地变动，小到无限，小了又小，总是小下去，最后出现的结果是，8 接近于 0，4 也接近于 0，结果 $\frac{d4}{d8} = \frac{0}{0}$ 。那

么 $\frac{0}{0}$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普通的初等数学来了解， $\frac{0}{0} = 0$ ，那么

$\frac{4}{8}$ 的关系是不是最后变成零了呢？所以用普通的数学观点来看 $\frac{4}{8}$

是 $\frac{1}{2}$ ，再小下去也是 $\frac{1}{2}$ ，可是就很难理解微分不是 $\frac{1}{2}$ ，变成了 0，

在微分学上，它一直小下去应该达到这样的结果，而不是 $\frac{1}{2}$ 。用

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就想不通。好像 $\frac{1}{2}$ 的数就消灭掉了。微分

学一直小下去，具体的分子等于否定了。用初等数学的看法，这个否定完全没有了。但在微积分看来， $\frac{0}{0}$ 是不=0 的，但也可以说

=0。应该这样理解，无限小下去，可以设想是=0，接近 0，可是

你说它就是0，也不对。因为它再怎么小，它原来是 $\frac{1}{2}$ 的关系。在微分学上应该怎样看 $\frac{0}{0}$ 呢？一般说来，数学家叫不定等关系。初等数学认为 $\frac{0}{0}=0$ ，在微分学上 $\frac{0}{0}$ 是不等的，为什么是不等的呢？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0，也可以不是零，它还是 $\frac{1}{2}$ 。恩格斯讲，又可以把它看成积分，积分也可重新变大。微分之后有积分。积分就是把无限小变回来，走向相反的方向，结果还是 $\frac{1}{2}$ 。所以 $\frac{0}{0}$ 可以=0，但也不=0，还可以是 $\frac{1}{2}$ 。因为这里面有变化。高等数学要经常注意变化， $\frac{0}{0}$ 是不定等的。所以 $\frac{4}{8}$ 的微分关系可以是 $\frac{0}{0}$ ， $\frac{1}{9}$ 也照样是 $\frac{0}{0}$ 。高等数学里面，0的内容非常丰富。初等数学的0是没有什么东西的，高等数学的0就有无限的内容，可以产生 $\frac{1}{2}$ 的关系，可以产生 $\frac{1}{9}$ 的关系，可以产生 $\frac{1}{10}$ 的关系，可以产生无数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等于0。一个公式，经过微分的结果就是0。但它还可以作积分计算。

还有一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这本书的《引论》里讲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变成现代的辩证法，这是否定的否定，最初，古代罗马的唯物主义，后来变成唯心主义，后来又变成唯物主义，这都是否定的否定的关系。恩格斯这里讲的，也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否定的否定关系的。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学术上争论的问题。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会不会转化的问题。照恩格斯的说法，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可以转化的。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唯心主义后来又发展到唯物主义。哲学史的过程是这样的。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冯友兰等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恩格斯这里的提法，肯定是有这样的关系的。我们感到这个关系的主要问题似乎有点难于理解。唯物主义本来就是唯物主义，它怎么能转化为唯心主义

呢?唯心主义是荒谬的哲学,为什么会转化为唯物主义呢?抽象地讲是绝对对立的,不能转化的。问题是具体的历史过程有这么一个关系。唯心主义怎样产生的呢?就是早期的唯物主义有些问题还解决不了,唯心主义就从它的缺点中产生出来了。古代唯物主义本身是有缺点的,自己内部有矛盾克服不了,所以它对立的方面就发展了。这里主要不能理解的是恩格斯讲的思维与物质的关系。人的大脑怎么产生思维,古代人搞不清楚。我们现在搞清楚了。我们经过实践,达到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古代人没有这个认识,设想精神是独立的东西。设想的结果,越来越认为精神脱离物质而独立,精神越来越成为主动的东西。再加上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由于剥削阶级,脑力劳动者占统治地位,强调精神的独立作用,就转化为唯心主义。这并不是唯物主义本身就会变成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本身包含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结果唯心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唯心主义发展的结果,又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客观规律,这些知识有认识的来源和客观的来源,科学越来越发展,知识越来越发展,这就越来越清楚,要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概括客观的知识即自然的知识,社会的知识,是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和它的观点相矛盾。最后,唯物主义打倒了唯心主义,而这个唯物主义是从唯心主义内部矛盾生长出来的。如果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绝对不转化,那么势必发生这种观点:世界上原来有一个唯物主义,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和唯物主义没有关系的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一个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和唯心主义没有关系的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这还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还是应当运用事物自己内部的矛盾使自己被消灭,产生另外的事物,把自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才是符合辩证法的。冯友兰说,唯物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唯心主义的。“经过”的讲法不妥当,好像唯物主义的发展非经过唯心主义不可。这不是具体的分析。从矛盾分析的方法来说,转化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永远转化的。古代的唯物主义可以转化为后来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唯物主义。现在,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在一个时期转化为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呢?当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有的。将来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时候唯物主义占优势,一个时候又犯了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然后又克服了主观主义回到唯物主义方面来,这种过程以后还是会有。至于整个的历史时期都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一定。社会主义有列宁的唯物主义,斯大林的唯物主义。斯大林是唯物主义者,部分问题上出现了主观片面性。由于这个主观片面性没有很好地克服,现在苏联就出现了主观唯心主

义的统治，修正主义现在影响到整个哲学界。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极端，它要碰钉子，结果还要转回唯物主义。

这就是我的一种解释。这是个学术问题。我这几年老在想这个问题，反复想过好多次了，还是感到这样讲妥当一点，符合辩证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唯物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唯心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都是可以分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具体的。凡是具体的东西都是可以分的，都有矛盾。当然，它是唯物主义的时候就是唯物主义，但它有自己的矛盾，这个矛盾发展了，就会导致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如果说得妥当一点，可以说是唯物主义转化为唯心主义的时期，唯心主义转化为唯物主义的时期。不能简单地说法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唯物主义。

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问题。恩格斯还讲到：“现代唯物主义一否定的否定一不是简单地恢复旧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和古代唯物主义有共同的特征，但决不是简单地恢复。因为新唯物主义有一个特点：“一般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并表现出来。”（《反杜林论》第143页；又见同上书第481页）

这一段话较难理解，有个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曾经有些托派把恩格斯这段话做这样的解释，他们说：恩格斯认为在黑格尔以后哲学就消灭了。当时有一种叫做“哲学消灭论”的观点，只要有科学就够了，不需要有哲学了。我们当然反对。我们要反对他们，就要对恩格斯这句话作解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哲学。为什么“一般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新的特殊的哲学，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如果说这仅仅指的是以往的那种哲学，那么也可以不叫哲学。但是，如果哲学是指的世界观，那么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过去的哲学不同。过去的哲学是想要超越各种科学之上，不要严格根据科学知识作基础，自己设想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哲学的特点。恩格斯这里讲的“一般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就是指的这种哲学，那么现在是不需要的，要消灭的就是这种想要超越各种科学之上的另外搞一套的哲学。这种哲学，大部分内容与科学没有关系，是主观臆造的。所有黑格尔以前的哲学，都有这种特点。恩格斯讲，这种哲学没有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世界观，它不是在科学以外去虚构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它本身仅仅

是把各种科学成果作一个概括，从各种科学中抽出来的，因此，各门科学都是适用的。并且任何一门科学，每一次新的发展，都证明辩证法的正确性，都使辩证法得到一次新的证明。所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哲学，不过不是从前那种哲学。从前那种哲学是不是完全消灭了呢？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呢？那也不是。从前的哲学，它的整个体系是消灭了。它有许多虚构的东西可以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代替，这些就不需要了。但在从前的哲学里面，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即从前哲学研究过的形式逻辑，研究过的辩证法，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恩格斯讲“扬弃”的意思，就是说，“同时既被克服又被保留”了。整个体系消灭了，但它里面有价值的东西被新的科学、新的哲学吸收了。所谓批判地继承，就是这种意思，把所有的糟粕取消，但对某些有价值的精华的东西保留下来，加以发展。这些问题，还涉及到道德的问题，以后解答问题的时候再谈一下。

【《反杜林论》第143页中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最高结果，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哲学的历史。总的说来，科学唯物主义发生、发展，完成的历史，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完成了科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表明科学的唯物主义开始完成了。

这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把两千年来历史本身和全部的思想内容加到唯物主义的巩固基础上去。这个思想不要机械地来了解，不要把它理解为两千年全部的历史推到唯物主义上去，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应该了解现代唯物主义是两千年来哲学发展的最高的结果。两千年来哲学中消极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都被克服了，凡是积极的东西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有一种特点。每一个哲学家都企图自己完成一套最后的哲学，完成一套绝对真理，企图把历史知识的全部真理包括在自己的哲学著作里面。这些哲学家都有一种幻想，以为自己的哲学就是人类认识中的最高峰，不能再发展了。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要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这种做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根本不需要，也是根本没有的。任何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都不可能在自己的一生里建立一条永远适用的绝对真理，不可能幻想自己搞出一套系统，以后别人就用不着研究了，前进了。这种思想从马克思起一直到毛主席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以前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这种幻想。这就是以前所有的哲学的糟粕，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几千年来哲学经验做出了总结，把几千年来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经验做了最高的总结。同时又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根据当前社会革命的经验，概括出一些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都是用来帮助我们指导研究具体问题的，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来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的实际问题、社会斗争的实际问题，不是想要在哲学上建立一套体系，来代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只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出一个正确的指导原则。比如《矛盾论》就是提出了一些我们怎么样去研究矛盾的指导原则，研究矛盾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系，要注意抓住主要矛盾，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抗与非对抗等等。这些都是给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不是要用这些原则作为死的公式来代替我们的具体研究，而是用来帮助我们具体研究问题，为帮助我们具体研究问题提出原则性、方针性的意见，是一些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所以，在这里恩格斯这样说：一般地说，这里已经不再是哲学了。是不是它就不再是哲学了，是说不是以前的哲学了，不再是黑格尔以前的哲学了。马克思的哲学跟黑格尔以前的哲学有根本的区别。以前的哲学都是想搞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代替自然科学，代替社会科学，或者想超过社会科学，企图建立一种科学的科学。是科学的太上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只是在科学的研究、社会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思想上的指导原则，世界观的原则，方法论上的原则。所以不再搞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种哲学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以前的那种哲学被扬弃了，所有的体系被克服了，被扬弃了。但是它的合理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以前的哲学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总想搞包罗万象的体系，另一方面也企图搞出一些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后一方面被马克思主义保留下来了。所谓保留也不是简单的保留，是提高了，改造了，发展了的。所以恩格斯讲：包罗万象的被克服了，但是真实的内容被保留了，哲学上的真正的原则、内容、任务保留下来了。

所以，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是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要是从前的哲学家，就要写几十万、几百万字，单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几十万字，而且他还有体系，还有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美学等，都是他的

哲学。《逻辑学》，还只是他的方法论，他的第一本东西，逻辑学里还有一个精神现象学。每一本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字。所有他的哲学的整个体系里，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逻辑学》。因为他的《逻辑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

的根本原则。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吸收黑格尔的合理的东西，主要是从《逻辑学》中吸收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吸收的比较少。因为他的真实内容在《逻辑学》里，特别是辩证法是在《逻辑学》里面。

抗战以前，有一个托派的人叫叶青，根据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倡一种“哲学消灭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了。恩格斯已经讲过，哲学已经不是哲学了。他主张用科学来代替哲学。那是根本错误的。恩格斯并没有说用科学来代替哲学。从前用哲学代替科学当然是错误的，用科学代替哲学也是错误的。恩格斯的意思不过是说：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站在科学之上另外搞一套体系，就在科学中，把各种科学的成果做出哲学的概括。哲学是要的，任务是从科学斗争中总结出哲学来。现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攻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哲学无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帮助，这些观点苏联的哲学家也就顶不住了，有些苏联哲学家就接受了，有些哲学家反对、批判。这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一种，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修正主义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修正，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修正。】

第三次辅导

(1964.1.26)

现在从 144 页讲起，这一段是把以上所讲的许多道理作一个总结。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怎么来的？就是根据卢骚的书来的。恩格斯在第 144 页（又见同上书第 483 页）这段话最重要的是第三行那句话，这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本质。为什么会有否定之否定规律呢？他上面讲：我们在卢骚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骚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的说法（所谓相同点就是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话。这个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呢？下面讲）：“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否定之否定。”这段话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也谈过，现在再讲一下。

首先说辩证法的内容，应该注意“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这里用对抗这个词，并不是说一切矛盾都是对抗的矛盾。当时恩格斯还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还不能提出对抗和非对抗的区别问题。所谓本质上的对抗，应该理解为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不能说不调和就一定要冲突。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对立面都是不可调和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所谓矛盾的对立面不能调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立面的矛

盾不能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斗争不一定就是对抗，不过终归要斗争。调和矛盾，折衷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矛盾。调和矛盾的情况有没有呢？调和矛盾的情况是有的。修正主义讲调和和矛盾，有没有这个调和呢？也会出现这个调和，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有时也采取调和的办法来处理，但是这种调和的办法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矛盾。调和是暂时出现的现象，不能成为解决矛盾的道路。一切本质上对抗的过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过程，这种过程发展到每个对立的极端就会向它的对立面转化。所谓极端是什么意思？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极端，这个极端主要决定于矛盾内部的对立情况，有时也决定于外部条件，比如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极端，资本主义的极端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化。过去修正主义者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极端是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因此，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他们思想上认为的那样高的程度，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转到社会主义。就是说，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者曾经想给资本主义规定一个很详细的数字上的极端，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所谓极端，是有一定量的极端。这里也包含着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但是每一件事究竟什么是极端，这又不完全决定于量的本身，而是决定于内部矛盾的发展情况，也决定于某些外部条件。一个社会力量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极端？列宁讲过，统治者不能再统治下去了，被统治者也不能再忍受统治，矛盾、阶级斗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革命就会到来。这主要是决定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片面地决定于生产力，当然生产力需要有一定的水平。什么时候革命来了，决定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情况。不但不由事物量的极端决定，就是同一个事物在同样的条件下，它的量也不一样。比如水的沸腾是摄氏 100 度，同样的水在西藏高原可能是 90 度或 80 几度就沸腾了，有些地方连饭都煮不熟。这是自然现象，量的极端随着气压而变化。应用辩证法的规律只能做一个向导。对事物的转化一定要作具体研究，作具体分析。辩证法就是这种方法，要注意问题的方向。比如旧社会要向对立面转化，至于什么时候转化，怎么转化？要作独立的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问题作独立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是基础，但是不能因为有了唯物辩证法就可以取消调查研究，有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还是要搞调查研究的。

这里还有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问题，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毛主席讲向对立面转化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比如鸡蛋不能转化为石头，鸡蛋只能转化为小鸡。所有事物本身的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它的矛盾引导它必然

要转化为那个对立面。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化到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转化到共产主义，也不能转化到原始公社或奴隶社会。当然，倒退的转化也可能有，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它可以向共产主义转化也可以向资本主义转化。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但是个别倒退也是存在的。倒退也有量变质的关系，比如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斗争到一定程度，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就向资本主义倒退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再占统治地位，又可以仍然回到社会主义。每个极端都朝着它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但是每个极端究竟向哪一个对立面转化，也还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要注意有可能转化的方向，这个方向具体的怎样实现，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辩证法离开了唯物主义就不能真正成为我们科学的武器，辩证法要用唯物主义作基础，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的方法。

恩格斯讲了前面的两句话以后说：“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发展过程向对立面转化的一种结果，矛盾过程发展到最后才能暴露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里讲作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现在争论的核心，因为事实上恩格斯在这里仍然把对立统一的规律、矛盾规律看做辩证法的核心。哲学篇从引论起，都是把对立统一规律看做辩证法的核心。引论中有一段还可以说一下，第20页开头讲：“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孤立地被研究的。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又见同上书第360页）形而上学者认为的对立就是绝对的对立，否认对立的统一。

下面，恩格斯又说，“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反杜林论》第20页；又见同上书第360页）这是说形而上学不讲对立统一的规律。“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相互的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

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反杜林论》第20页；又见同上书第360页)这里恩格斯还举了例子，下面他说，“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确信地说，某种动物存在或不存在，可是在更切近的研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常是极度复杂的事，像法学家所熟知的，他们苦心焦虑想发现在母亲子宫内杀死胎儿，究竟超出哪一种合理的界限才算是谋害，可是毫无结果。同样的，死的时间也是不能明确地确定的，因为生理学说明，死亡并不是一种突然的，倏忽完成的事件，而是一种延续的过程。”(《反杜林论》第20页；又见同上书第360—361页)恩格斯所举的例子都是讲对立统一的，杜林就是不了解对立可以统一，他认为要不就是绝对对立，要不就是绝对统一。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杜林是用机械唯物论来代替辩证法，他主要是不懂得对立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联系，可以成为统一的东西。恩格斯也就是针对他这点来批判的，反复说明对立的東西可以统一，统一的过程中总是包含矛盾的。所以，从恩格斯和杜林争论的特点似乎可以了解恩格斯为什么没有提斗争性问题，就是因为当时的争论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不是要强调斗争性问题，而是要强调对立面可以统一，对立面是统一过程中的对立面。杜林主要是不了解内在矛盾，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内在的统一。恩格斯必须着重说明对立面的统一，因此斗争性这方面就没有特别加以发挥。我们现在感到没有谈斗争性有点不足，这并不是恩格斯的错误，恩格斯在当时只能这样处理问题，在争论中着重展开对立面的统一这方面，粉碎机械的对抗观点、绝对对立的观点，这是应该的。如果恩格斯那时就强调讲对立面具有斗争性，斗争性是不调和的，是绝对的，那恰好杜林就要说恩格斯同意他的意见，斗争是绝对的，所以说对立面也是绝对的。读者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杜林对，还是恩格斯对。所以，那时不必强调斗争是绝对的，这是适当的。在别的问题上可以强调斗争性的时候，他在另外的场合强调了斗争性。这些地方是值得我們学习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正着重批判一种错误思想时强调辩证法的某一个方面，但另外方面也不能忽略，不过强调的这方面还是突出的。斗争性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对抗的”这句话里就有了，如果不讲这点也不行。

有同志提出一个意见，认为恩格斯讲的形而上学好像是指的形式逻辑，因为他讲形而上学在家庭里面是可以尊敬的伴侣。我看不是这样。第20页清清楚楚是讲形而上学，不是讲形式逻辑。

恩格斯讲：“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都是指我们在一定的情况下，把事物暂时看做是不变的、孤立的东西，有时需要这样做，这种时候形而上学就能使用。但这并不是说客观事物是孤立的是静止的。是说我们有时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看做是孤立的、静止的，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且也有一定的便利。这并不是说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只能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或者是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暂时便利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所以能这样做，就是因为客观事物虽然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可是它有相对静止的一面。所以我们有时把事物当做静止的来看，在一定的范围内也不会碰钉子。如科学发展的低级阶段就要用分类的方法，就要把自然界当做死的、固定的东西来看。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方法是科学的、完整的，但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暂时这样做，才能分类研究，分别看清楚各种各样的自然面貌。在日常生活中用是则是、否则否的观点来处理问题就行了，但涉及到要深入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大家提的问题我只能这样解释，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是不同的。形而上学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做为一种方法来说，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方法。首先是片面的，如果把这个片面性坚持下去，就变成主观主义的方法，再继续下去就会发展为唯心主义。形式逻辑不是世界观，它是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这种规律只是一些很单纯的规律，所以这种规律很可以普遍运用，我们用辩证法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在辩证法总的指导下，适当地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形式逻辑当做普遍的方法来代替辩证法，也会陷入形而上学，会发生错误的。形式逻辑在辩证法的指导下，在辩证法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可以运用。

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失业，必定要出现就业不足。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如此，在特殊情况下就不一定。在这个大前提下把矛盾弄清楚，然后又在小前提下，资本主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暂时不出现失业，这样就符合形式逻辑。问题是大前提、小前提怎么处理，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一定要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如果没有唯物主义辩证法，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套到三段论上去，就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形式逻辑只是思维的初级阶段的一种手段，但是应该普遍遵守。它作为初级阶段的东西，要受高级阶段的支配，就像人的身体是高级的东西，但是高级的东西一定要包含低级的自然规律。比如人走路是机械的运动，但是机械运动不能直接解决人的生命问题，人的生理问题指的是生命现象，研究生命的规律才能了解人

的身体情况。高级现象可以包括低级的东西，辩证法是高级的思维，所以也可以包括形式逻辑。真正的辩证法是不会违背形式逻辑的，但是并不等于形式逻辑。《资本论》的体系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严格地符合形式逻辑的，但是不等于形式逻辑。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这样，矛盾的过程走到反面，两次向对立面转化。就是表现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否定之否定就是表示第一次波浪到第二次波浪之间的起伏关系，一起一伏，然后再起，螺旋式地旋转一个圈，再重新旋转，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用科学上的名词讲就是周期性。毛主席用了很通俗的名词叫做有节奏。节奏和周期是一个意思。一个否定之否定表现为一个周期，出发一次又回来再出发，这是一个周期。为什么不叫多次否定过程，不用这个名词表现这个规律？就是因为多次否定没有显出周期性来。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可以用，就是因为它表现发展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比如由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又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一个很大的周期。经过这个周期，人类发展到新的阶段。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是产生两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序幕。从原始社会起人类就脱离了动物，开始自己改造自己，就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很低级。在阶级社会里面，人类对自然界有很大的改造能力，但是对社会本身就不行。人类对社会本身基本上受社会发展规律的盲目性支配。革命时期不同，人类认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就有些自觉性。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来说是盲目起作用的。在阶级社会里面，没有哪个统治阶级能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得到政权以后，才开始能比较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要表现有自觉性。当然修正主义是另一回事，赫鲁晓夫就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发展是不依赖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就会走向垮台。但是有了无产阶级自觉性的国家就不同，社会主义就能胜利。我们周总理的非洲之行是大胜利的进军，一走就十几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真正的人类历史是这样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从原始社会到科学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周期，是否定之否定，这有很大的意义。人类经过这个大的周期(小的周期很多，从原始公社起每个社会阶段都有它自己的周期)，这是真正人类历史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人类历史的发展又要有新的规律。

如果有人将来说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被否定，这是历史的幻想。否定之否定将来还会有，而且现在也有，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曲折的，有各种各样的曲折。比如战争与和平的曲折性，苏联也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曲折性也有。无产阶级第一次得到政权的时候，这是它的正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还有没有经验的问题，这个政权怎么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最初得到政权的时候是没有经验的，所以需要取得经验，这个经验怎么在实践中取得？就要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新事物，这就会得到一些新的感性知识。碰到一些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答复。人类不可能对新的问题一次答复得正确，很自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对所碰到的新的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会出修正主义呢？因为一开始时就有矛盾，但是不暴露。它的本质是对抗的，是不会调和的，经过一个时期这个分裂就表明了，分裂就必然斗争，经过斗争把错误克服了，又得到统一。

我们党内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否定之否定的自觉运用。毛主席是善于运用辩证法，这是辩证法的发展，这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运用到党内斗争。

第145页(又见同上书第484页)第二段讲：“所以，什么是否定之否定呢？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因而也是非常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表现于动植物界中，表现于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对于这一规律，就是杜林先生自己，不管他如何顽强抵抗，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遵循的。当然，譬如在我说麦秆的发展过程是否定的否定时，我还丝毫没有讲到麦粒从发芽起到麦秆死亡为止的特殊的发展过程。而积分的演算也同样是肯定的否定。这么说来，要是我限于这种一般的论断，似乎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谬论，说麦穗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演算，或者说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正是形而上学者常常强加到辩证法身上的。当我说到所有这些过程是否定的否定时，我是用这一运动规律把所有这些过程概括起来，因此我就不去注意每一特殊过程的各别特点。”

否定之否定虽然是普遍规律，但是它表现在每种具体事物中都有它的具体过程。我们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无非是宇宙的一切事物中曲折的、周期性的发展过程的一个总的概括。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最普遍的规律，这个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千千万万的客观事物周期性的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先有原则还是先有事实？当然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原则。黑格尔的逻辑学认为先有原则的形式，杜林的观点也是先有原则的形式，然后才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事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先有千千万万的事物，然后才有人的头脑、

人的思维，把千千万万事物的共同发展规律概括起来。所以这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这个问题。“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第 145 页)这个普遍规律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千千万万客观事物具体发展过程中，把它的共同点概括出来的。所以，辩证法这个哲学里面的规律，无非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研究清楚的无数规律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不是在科学之上的一种特殊科学，而是在各种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共同规律，它要依靠各种科学，而不是在科学之上自己单独搞一套包罗万象的东西。把辩证法运用到具体事物中也只能做一个向导，只能研究大的方向，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所以对辩证法绝不能要求具体的公式，它只能告诉我们有一个方向，不管研究什么对象总要一分为二，不用一分为二，认为是绝对统一就错了，如果这样得出原则，这个原则也是错误的。怎么分呢?就要调查研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办事。

下面讲否定之否定有其特殊性。每一件事物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都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因此，对某一个具体事物，要使它能够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要按照它自己的特点、它自己需要的条件来推动，才能实现否定之否定。每一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对立面，你不能要求它不向它的对立面发展，如果要求它不发展，就等于破坏它的过程。所以麦子只能按照它自己的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它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把麦子埋在土里，有一定的水、温度，让它发芽(否定)。如果磨碎了、吃掉了，就不叫否定，是简单的消灭，这不是辩证法里面所讲的否定，这是一种过程的中断，麦子也不能发展，因此也不能再长出新的麦子，因为麦子已经消灭了。这种过程中断的现象世界上也是有的，这是过程的破坏，在人类社会里面也有。比如非洲、美洲有一种社会的人，被欧洲人整个消灭了，整个消灭的民族不可能又整个恢复。否定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否定自己，这种否定同时又是规定它的成为一种新的东西对旧形式的否定。这是辩证法讲的否定，这种否定必然会再发生否定，这也是自己的否定。每一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特殊否定的过程，所以要使任何一件事情按照它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必须要有它自己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条件不能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如果把数目字写在纸上，涂掉，涂掉了再写上，他说这只是一场儿戏，不是什么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中，出发点和第三个阶段有些类似，道理并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到出发点，在某些方面和原来的出发点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第一个否定当

然跟肯定的内容是相反的，再否定又跟原来第一个阶段有点类似。当然类似的程度可以不同，有些很类似，几乎等于出发点，有些类似的情况比较少。比如水的波浪运动，否定之否定的类似情况比较大，第一波起来，第二波又起来，几乎和原来的一样，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只是类似的情况比较多。人类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就不同，原始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公有制这点上有共同点。所以否定之否定阶段跟肯定阶段，在某种情况下有类似的地方，但只是外表形式上有类似，并不是本质上完全相同。周期性的发展必然有这种情况。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日常生活里到处都有的，非常普遍的，谁都可以理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规律。所以它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个问题前几年理论界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认为，否定之否定不是普遍的规律。在斯大林的哲学小册子里，根本没有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也说明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有怀疑。斯大林的哲学小册子出来以后，苏联哲学界一般都不讲否定的规律。他们有一种解释：说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名词是马克思读黑格尔哲学著作后带出来的残余，是黑格尔术语的残余。

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是黑格尔创造的。这个名词的性质也的确是有点黑格尔式的残余。这是一种逻辑的名字。否定、肯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人的思想里面，是主观的。我们要肯定某一种事情或者否定某一种事情，把逻辑的名词拿来当做客观规律，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形式。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所以他认为肯定、否定这种过程不仅仅是人的思想过程，而且客观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精神。所以，客观事物自己可以肯定自己，自己又会否定自己。客观实践按照逻辑的方法自己肯定自己，或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他把客观实践的过程与人的思想过程看做是一件事情。因此，他就直接使用逻辑的名词来表达客观规律。所以，否定之否定的名词是黑格尔学术语言的残余，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它跟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不同。对立统一规律不只是人们脑子里面的问题，客观事物本身就是又对立又统一的。对立的统一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术语，它是直接概括了客观事物的规律。质和量也是这样。质和量是两种概念，它是客观事物性质和数量的一种概括。

所以，质变量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可以直接当做唯物主义的术语来看待的。而否定之否定这个术语有点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是可以肯定的。本来是一个客观规律，但他把它说成是一种逻辑的过程。比如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里；现在我们在学习和工作，这是肯定。晚上我们睡觉就是否定。明天我们又起来工作和学习，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表现。生活就是这样：工作—休息—又工作—又休息……。这就可以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看。那么是不是我们白天工作就肯定自己？晚上工作就否定自己？明天工作又对自己作否定之否定呢？如果这样来解释就有点牵强。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工作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不休息也不行。不能工作了、疲劳了，劲头就转到反面。休息够了，老躺在床上，像死人一样，这样受不了，因此就要起来。这说明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转向它的反面。

所以，否定之否定规律还要正确地表达，要作为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要把“否定之否定”换成真正是唯物主义的言，就不能用否定之否定的名词，用波浪式地前进，或是螺旋式地上升比较确切，因为事物的确是这样的。例如经过白天的工作，这是一波起来了，晚上休息，这个波浪又下去了，明天起来工作，波又起来了。就是这样一起一伏。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有起有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起有伏的，这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毛主席的辩证法比斯大林高明。斯大林说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这就是不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有片面性。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起有伏的，有时候甚至是很尖锐、很激烈，有时候是平静的。有起有伏是波浪式的或是螺旋式的，看起来好像是绕圈子，是循环，实际上是上升的，上升到更高的阶段。

所以，否定之否定这词有点唯心主义的残余，而唯心主义者又把它说得很神秘，好像是一个事物的理性，因此很难理解。我们要把它倒过来，把唯心主义去掉，这样，这个规律是很普遍是到处都可以利用的，甚至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有些东西，比如光线，看起来好像是直线传播，实际上它不是直线传播的，而是波浪式的。没有一种前进运动不是波浪式的。走路也是波浪式的，两只脚走路也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为什么两条腿走路也是波浪式的？因为一只脚走路是不大好走的，就是你一只脚走路也是跳跃式的，也是波浪式的，飞跃起来后还是要下去的。】

【事物发展都是这样的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前进过程。自然科学的名词就是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周期性也是循环的意思。绕一个圈就算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完后，然后又有一个周期开始。化学里不是有元素周期表吗？有九十七种元素，每八种元素一行，到了第八种又是一次开始。因为第一种到第八

种是两个阶段。开始，化学元素是金属性，以后是非金属性元素。由金属到非金属再到金属，这也是否定之否定。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也有一个化学的周期，每八种元素排列，一行一行，大体上十来行。

化学元素的变化是周期性的，将来进一步研究粒子、电子、质子。现在还没有发现，到完全发现以后也可能列出周期表来，这是一定的。因为它有正、负，电子有阳电子、阴电子；中子有中子、反中子；质子、反质子都有正、负。所有这些都矛盾，都

有正到负的变化。以前认为是没有的，以为电子是阴性。后来才发现了阳电子。原来说中子都是阳性，都是正电荷，后来又发现反中子，中子有阴、阳。总之，层出不穷。列宁这样讲过，电子元素的东西也不是纯洁的，也是一分为二。原来认为不能一分为二的结果都能一分为二。科学越发展，一分为二越清楚。

否定之否定无非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使它到了发展的阶段就向反面转化。两次向反面转化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周期性的发展关系。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关系是普遍的规律，毫无例外，没有一种事情可以例外，没有一种运动的发展可以例外。恩格斯所举的一些非常平常的例子是说明这些问题。】

【毛主席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从来都是坚持应用这个规律的。从民主革命时期起，我们只要举几个大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江西讨论怎样发展革命力量的问题，有的同志说，红旗恐怕插不下去了，到城市去搞秘密工作。这不对。有些人认为，可以一直向前发展，仗打下去，到处搞游击战争。以为可以一条直线向前发展，这也很不妥当。

毛主席就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按照否定之否定精神，要采取波浪式的发展的方法。就是打一次仗得到胜利以后，要停下来巩固，搞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搞好了，然后再参加武装斗争，再进一步发展。就是巩固和发展不断地向对立面转化，这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巩固和发展互相交替。这种思想后来是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了。比如，发展党员也是这样，发展一段，巩固一段。发展组织，发展合作化，甚至搞新运动也是采取这种办法。战争一休整一再战争一再休整，在战争间隙中间抓紧时间休整。这种思想都是自觉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个规律是正确的，所以斗争能够得到胜利。

在战略问题上，大家可以看《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战争的围剿—反围剿—再围剿—再反围剿，这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运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很多的辩证法思想，里面否定之否定这个思想用的比较多。因此，战争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过程。而且在这种过程里面，对否定之否定这个规律掌握的不好，不可能取得胜利。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艰苦的斗争，发展的过程慢一点还不要紧，激烈的斗争过程，只有掌握好否定之否定这样的规律才能胜利。斗争很紧张，发展很迅速，在这个时候，如不在紧张中间及时休整，天天紧张，就会搞垮。紧张一段之后要休整，然后再来更大的紧张。战争也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来的。打一次围剿，准备一下又来围剿，战争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所以要适应这种过程，能很彻底的、非常注意掌握这种节奏，很好地利用这种周期性。从《论持久战》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规律。

《论持久战》中讲战争有三个阶段，速胜论与亡国论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三个阶段实际是否定之否定，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个阶段是相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反攻阶段，是我进敌退。这就是说，第一阶段有进有退，第二个阶段基本上是没进没退，第三个阶段是反攻阶段，是我进敌退，有进有退。第三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有点类似，不过时间不同，第三阶段是我进敌退，这也是否定之否定。毛主席是自觉地运用了 this 规律，而且这不是套公式，是根据客观矛盾发展的情况。矛盾斗争发展的情况，它自然有这样的过程。把这个自然过程加以具体地调查研究，而且把它叙述出来，这就证明了否定之否定。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也是常常用这个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最显著的就是 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些农村工作的同志热情太高了，不准人睡觉了，不许农民睡觉。我们有些同志也搞过农村的工作，恐怕也有这种情况的。不准人睡觉就是不懂得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反复讲过，工作要节奏，节奏就是有否定有肯定，节奏就是钟摆。劳逸结合就是否定之否定。所有的工作要有休息，不能只有工作没有休息。那个时候毛主席还用古代的话，大概是用孔子的徒弟讲的一件事情来加以说明。就是孔子的学生去看了一个庙会，他就跟孔子讲：这些人这样快乐，未免太松劲了，生活未免太悠闲了。孔子答复他说：这是需要的，很多事情就是一紧一松的，他的说法是一张一弛。就像拉弓一样，一张就紧了，一放下来就弛了，事情总是一张一弛的。那个时候孔子最崇拜圣人，尧舜、文王、武王等。所以他说，如果是张而不弛，只是拉紧不张开，那是“文王、武王难为也”，

但是张而不弛，“文武非能也”。就是他们也做不到。张而不弛圣人也做不到。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也。这是圣人要走的道路。所以，这有点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当时讲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哲学关系还有一点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活着的时候，他们是要极力强调黑格尔的哲学的价值。因为那时候资产阶级的哲学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都有人主张，完全扬弃黑格尔。当时有一个口号：回到康德去。把黑格尔当做一条死狗看待。所以，他们那时的任务，是要积极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我宁愿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他本来也是黑格尔的学生，可是学生与老师不同。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与黑格尔不同，并且是完全相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读恩格斯著作的时候，要考虑到这样的历史情形。那个时候反对马克思的人都说：马克思应用黑格尔的公式，简单地用黑格尔的公式。而他的所谓的公式，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公式。他们集中攻击的就是否定之否定。杜林集中攻击的也是否定之否定。

以后还有这种情形：俄国的民粹派反对马克思的时候，也是反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里也有整整的一段话说明这个问题，也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民粹派。所以那个时候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问题。那个时候，矛盾的问题，对立统一的规律，不突出。那时斗争的中心是正反合公式，是三段法，是庸俗的形式主义。根本的问题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但当时突出的是这个问题。因此，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为核心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是因为当时争论的需要。

同时，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否定之否定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弱点。因为黑格尔自己的确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一个公式。这是出自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架子，一个骨架，钢筋水泥的架子，是以否定之否定来制成的。他的哲学著作都是三段法。《逻辑学》是有三篇，每一篇有三章，每一章有三节。都是机械得很。每一个事实都要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他的整个《逻辑学》第一是存在论，第二是本质论，第三是概念论。他分三大篇，存在论又分三章，第一章是质，第二章是量，第三章是质量，质和量统一。他的否定之否定的第三段是整个的统一，质和量的统一。本质论又分三段：本质论，原因论，现实性三段。现实性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他的概念论又分三段，第一是主观性，第二是客观性，第三是理念，又

是正、反、合三段。本质论也是有起有伏的。质量、本质、现实、现实性，然后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理念，这样的结构。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不是讲合理的核心。唯心主义的体系是否定之否定。这是他的弱点。他把否定之否定搞成了一个死公式。所有这些东西他讲得很勉强，是勉强凑进去的，他要凑成一个架子。黑格尔哲学合理的核心还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讲的核心应当当做当时争论的核心。

我们还可以顺便说一下，马克思搞《资本论》也是多多少少学了一些黑格尔的体系。不过，不是公式主义。《资本论》有三篇。有否定之否定，一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三是资本生产的总过程。

我们搞经济学专业的同志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些地方他是学的黑格尔的体系。说明黑格尔的逻辑里面有合理的部分。他的整个结构是这样。有个别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情况。有许多东西常常是三段。比如生产剩余价值部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然后又是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三章有否定之否定，它有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不是套公式，根据资本的发展过程，的确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他就根据这种客观的情况做了安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价值形式也是做了这种安排：有简单的价值形式，复杂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三种。

我们写文章，搞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一定这样搞。但是可以参考马克思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也有一种体系？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然后是生产和流通综合起来的总过程。作这样的全面联系。虽然不一定要那么长，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可以考虑。

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在列宁的辩证法十六条要素里面，否定之否定也是当做例子来说的。否定之否定的例子就是量变、质变，还有形式和内容。实际上否定之否定就是讲对立面的转化，就是两次转化的关系。我们现在因为用惯了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是唯心主义的残余，但已经用惯了还是可以用。只要正确理解就行了。只要不用唯心主义来理解，那就没有问题了。】

下边是总论，举了两个例子，第 144—146 页是对否定的否定作一个总的概括的说明。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规律的意义在哪里，那就要用哲学来说明。

我要讲的关于《反杜林论》一书中内容的理解，就讲到这里。

4. 《反杜林论》中若干问题的解答

下面，我把大家提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解答一下。

(一)关于存在这个概念怎么了解?

“存在”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了解。这里的“存在”是认识论里面的一个基本概念。黑格器和杜林都是从存在开始，他们所讲的存在都是抽象的存在，不是指具体的那种事物的存在。杜林的思想 and 黑格尔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在宇宙及一切事物没有出现以前先有一个绝对精神，因为有这个存在的概念，才逐渐产生了世界一切具体的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先有概念的存在，然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存在，这个存在的概念跟我们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同。唯物主义认为先有具体事物的存在，把这千千万万的具体存在的事情概括起来，然后才在脑子里概括成一个存在的概念。唯物主义的存在概念是客观物质存在的反映，黑格器和杜林的概念存在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动力。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存在的概念不同的认识。唯物主义讲到存在的概念时，是指一切物质存在的反映，所以存在也就代替了物质的概念。但是存在的概念和物质的概念也不相等，因为思维也是存在。这点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承认，物质是存在，思维也是存在，不能说物质是存在，思维不是存在。说物质和存在的概念不相等，是因为物质的概念比存在的概念范围还大一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思维存在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思维存在只是附属于物质存在的。一般的讲存在就是指客观存在，就是指物质。思维也属于一种存在，但是思维这种存在是物质存在的反映。

思维是什么呢?思维和存在的区别就是第二性与第一性的区别，离开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不会有绝对的区别，因为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又是存在的反映，思维还是物质的产物，它基本上是物质的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物质派生的东西，因为它不能离开物质。所以把存在和思维对立起来，总是在第一性和第二性这个意义上。在认识论上只就第一性、第二性问题来说，存在和思维是绝对有差别的，物质绝对是第一性的，精神绝对是第二性的，这个差别是绝对的，绝不能混淆。离开第一性、第二性问题就要涉及到转化问题，物质转化为精神，精神转化为物质，这个差别就不是绝对的。物质转化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我们的思想、认识。既然说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就是说物质和精神的差别不是绝对的，精神既然能转化为物质，也说明精神

和物质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它是同一的。马克思主义用存在的概念代替物质，就是因为除了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以外，没有绝对的差别，并且根本的东西是物质的。

能不能说思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撇开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把思维当做一种作用来看，也可以说是客观存在。我自己对大家的思维认识是我的主观，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的思想是大家脑子里活动的一种作用，这些作用对大家自己来说是主观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每个同志用自己的脑子思维。所以大家的思维是离开我的主观而客观存在的。我的思想当然也是我脑子的活动，但是对我自己就要加以区别，一方面是脑子活动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一种主观意识，就这个问题来说，思维和存在也不是绝对的差别，大家的思维就是大家脑子的活动，所以也是客观存在。

(二)关于机械运动外力能把它推动，然后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起作用的问题。

机械运动一般的从形式上看都是要靠外力推动的。但是外力怎么能把一个东西推动？就是因为它现在是不动的，但是又可能动，它本身有这个矛盾，如果它没有这种矛盾，外力就不能推动。比如这个房子要用我的手推就不能推动，因为这个房子没有被推动的可能性。这是讲用人力推它的内部没有这种可能性，用机械推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桌子我来推一下就能推动，因为桌子有可能被一个人的手推动，他自己内部有不动和动的可能性的矛盾，只要有人用手去推就可能动。可是一座房子没有用个人的手去推动的可能性，所以再怎么推也不能推动。这就是机械运动最后决定于内部问题。外力也是必要的，任何事物都有外力联系，所以任何事物的运动都需要有某些外部的条件，但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内部。

(三)思维的运动形式是否是物质的运动形式，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

所谓运动是物质运动的形式。物质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我们主要谈谈社会的和思维的运动形式。比如说，一种是人脑子的运动形式，一种是社会运动形式，人的思维一方面决定于人的脑子，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发展。思维的运动一方面不能离开人脑，同时也不能离开社会发展规律，不能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说它是独立的运动形式。当然，它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客观世界不存在普遍规律，客观世界的普遍性都是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在客观存在中都是具体的。把人的思维看成是纯粹普遍的东西在脑子

里概括起来，这是它相对的独立性，它把事物的本质，事物规律的普遍性采取纯粹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思维本领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人类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有时也使人发生麻烦，所以我们人类运用这种思维的时候，不要使它的相对独立性变成绝对独立性，不要脱离社会实践，不要脱离经济基础。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它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

(四)关于时间、空间的无限性怎么论证？

这个问题不好答复。要论证也可以写一本书，但是最简单的论证是这样，不管怎样把时间、空间设想成有限的是讲不通的，总是要碰到矛盾的。比如说世界有一个边，当你想到边的时候，立刻想到边之外还有什么，所以有限不能设想。但是这种设想的矛盾可以解决，就是说，要承认空间是无限的，但是具体事物的空间是有限的。物质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空间积累起来的。时间也是这样，宇宙有一个开始，盘古开天地，一想到这个，就立刻想到盘古以前又是怎样。以后也是这样，宗教上有上帝的末日，大家都上了天国，以后又怎样呢？上了天国不还是发展吗？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就是物质的无限性，物质是不断运动发展的，不能设想它有尽头，宇宙的存在也不能设想有一个边，所以无限又有点想不通。想不通也没办法，设想它有限也不行。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这样论证的，说它有限想不通，说它无限也想不通，只能说整个物质是无限的，个别物质是有限的，整个宇宙是有限和无限相结合。杜林就想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所以他是荒谬的。恩格斯反驳杜林也是这样，恩格斯说杜林讲宇宙有个开始，可是还有一个倒退回去的现象。所以只能说具体事物有一个开始，整个宇宙就没有什么开始。

(五)道德究竟有没有继承性？

第95页最后一段，恩格斯讲：“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可不是也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或许至少这就是永久不变的道德之一端？上述道德论，表现了同一历史发展上的三个不同阶段，这就是说，它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此而言它们已不能不包含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的阶段，道德论也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自从动产的私人所有制发生以来，在一切存在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的箴言不能不是：‘勿偷盗’。这个箴言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箴言呢？绝对不是。在任何偷盗动机都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从只有神经病者才会偷盗的那个时候起，如果某一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勿偷盗为永恒的真理，那么他将受到如何的讪笑！”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阶级社会的东西，这种道德论有共同的东西，虽然有不同的道德论，但是这里有些共同的东西，有共同的东西当然就有点永久性。恩格斯是这样设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道德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相同的特点，有共同的背景就可能有相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的阶段，道德论也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他说在经济发展到私有制阶段，道德就有共同的箴言，共同的口号，就是说不要偷盗，讲善恶的标准，偷盗不好，不偷盗就好。勿偷盗被认为是好的，这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在最早的原始社会不存在，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只是到了末期才有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就反对偷盗，这跟阶级社会有某些吻合，但是这些吻合不是相等的。恩格斯的说法有分寸，他说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的情况下，道德的标准就有某些相同点，有某些吻合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不同的阶段的道德标准是相等的。这是第一。

第二，这种吻合并不等于有了永久的道德。所以没有什么永久的道德标准，没有完全相等的道德标准。恩格斯着重指出两段，勿偷盗这个道德标准在早期原始社会不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几千年里面成为国家采用的道德箴言、道德标准。可是每个时代所采用的标准也不一样，只是有某些吻合。过去社会历史上说的勿偷盗是指的什么呢？主要的是你不要偷盗地主、贵族家里的东西，地主、贵族向农民家里拿东西就不认为是不道德。庄子讲，窃钩者杀头，窃国者封侯。偷窃的标准每个时期使用的范围也不同，相同的就是形式。

关于道德的继承性问题，恩格斯没有讲。恩格斯只讲了有没有永久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应该想通没有永久的道德。现在争论的是道德有没有继承性，现在学术界的争论，我也没有时间看，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所以我想暂时不要讲继承性的问题。对旧社会的道德是不是要继承，一般地讲继承是不对的。比如说对封建道德要继承便是错误的，首先它是封建道德，所以我们就不能继承。一般讲，对资产阶级道德也是如此。因为在阶级社会道德的阶级性非常强，它直接反映了阶级利益。哲学中，能反映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因素我们可以继承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尽管它被歪曲了)，我们也可以继承，当然要批判地继承。道德和法就不是这样的东西。它是直接反映阶级利益的，而不是直接反映客观规律的，所以对过去的道德，过去的阶级意识，我们是采取彻底揭露、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我们对道德问题的前提。怎样说明有些过去的人所赞成的事情，现在我们有

赞成呢?比如岳飞抗金,这个戏我们也演;现在提倡节约的美德,薄一波同志讲日本这个民族有节约的风气,是不是要继承这些东西?这类问题比较复杂,要很好地研究。下面提出几点意见,作为研究的参考。

1.对过去的人做的事情,有些要肯定它是好的,肯定它有继承的意义,肯定它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过去的人虽然是剥削阶级的,但是他在上升的时候有些行为是起了进步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这个活动在当时是起进步作用的,但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拿来使用。比如资产阶级讲自由、平等、博爱,这在反封建时期起进步作用,要求个人解放,这点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要肯定他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但是绝不是说因为它在历史上是好的,因此我们也完全照搬。关于个性解放,我们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把个性解放。有的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今天就不一定起进步作用,有些历史上最好的,今天可能要反对。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2.另一种是恩格斯所讲的,在共同的背景下面提示某些道德标准。比如说受到侵略要反抗,岳飞抗金,我们觉得他是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所以他在历史上是好的。如今如果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反抗。因此,我们现在赞扬岳飞的精神,并且作为今天教育的一种方法。这就是说,在历史上肯定起了好作用的,今天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采用。就这点来说,今天适当的利用是可以的。比如勿偷窃,从前勿偷窃的意思和今天我们反对贪污、偷窃的意义根本不同,但是今天可以适当地利用这种形式。这是在有这种条件下运用,而不是简单地继承过去反对偷窃的观点。

历史上的反侵略和我们今天反对侵略有共同性。有共同点,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问题不要一般地讲继承,而是利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今天的人。但是利用的过火了也不行。苏联由于利用历史的东西利用过火了,就搞成大国沙文主义。这是第二种形式。不承认这点,全都绝对了,把过去历史上的东西都不要了,也不行。完全否定了共同的东西也不符合辩证法,这就是矛盾,一方面要批判揭露,另一方面要利用某些形式。

还有一种,尽管人的道德标准本质上是直接反映阶级利益的,可是某些道德标准带有反映客观规律的形式。比如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利用。像节约这个问题,节约能使社会扩大再生产,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节约?就是要使他的资本扩大再生产。所以节约成了一种风气,它体现了发展经济的一种必然规律,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一种道德标准,他那个节约是想把劳动者的裤带勒紧,资产阶级自己就不一定,实际上是一种剥削的

方法。但是它所表现的客观规律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采用的。节约这个风气能使生产发展，它那里有一部分带有客观规律性的，凡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问题是不是叫继承？恐怕一般的不要用这个名词，但是也不能说过去的东西跟现在的没有联系，也有一些联系。这就是说，过去尽管它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道德标准，但是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东西。

关于道德问题，我只能讲这点。有没有继承性问题？这不是继承问题，说有继承性就容易出毛病，剥削阶级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继承，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美德我们要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根本决裂。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是根本决裂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可以采用。

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就是道德有没有否定之否定问题？否定之否定是否运用于道德问题？这就要看道德有没有发展过程，有没有曲折性。如果有曲折性，就要具体研究一下，不能抽象的讲。从大的方面来说，原始社会的人是原始共产主义的道德，阶级社会出现了私有制的道德标准，以后又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这就是否定之否定。道德是反映社会的，社会有否定之否定，当然道德也有否定之否定。一般的，大的方面可以这样讲。

对过去的文艺有没有共鸣的问题，我自己是没有研究。不同的阶级有某些不同的东西引起共鸣是可能的。现在的人欣赏过去的文艺有共鸣也是可能的，而且对过去的文艺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欣赏。比如对《红楼梦》，欣赏的人很多，但是在那里看出好处的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说这方面好，有的人说那方面好，毛主席特别注意了冷子兴的那段话，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就不注意这方面，而去注意贾宝玉这个人。解放以后对《红楼梦》多是注意欣赏它个人的东西。《红楼梦》也有规律性的东西，像毛主席所看到的冷子兴的那段话，毛主席有时也欣赏被压迫人们的反抗性，像探春、晴雯，他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文艺作品的。

文艺作品和理论有某些共同的东西，由于它反映某些规律，过去好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规律，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继承。文艺作品反映旧的阶级意识，那些阶级意识我们还是要跟它决裂的。《红楼梦》里面的阶级意识、情调，我们还是要决裂的。但是反映阶级规律的，还可以利用。冷子兴的话总结了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制度的没落规律，我们还可以利用。

(六)关于真理和错误的问题。

错误的来源有各种各样。我们工作中最主要的、比较大的错误，是脱离实践的结果，当然也有官僚主义、阶级立场问题。正确的认识总是从实践中来的，而错误之所以产生，第一的、最大的原因是脱离实践。这是第一个原因，这种原因可以使得人们犯很大的、根本性的错误。另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不是脱离实践，而是经验不够，或者是有了经验，概括经验的方法不好，这也会犯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比前一种错误犯得小一点，可能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自己克服，因为他不脱离实践。前一种错误是应该避免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后一种错误往往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能在进一步实践中丰富经验，学会更好地概括经验。我们总结 1958 年以来的错误，大量的的是后一种错误。

关于真理，真理和谬误的关系问题。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有两个意义，客观真理中就有绝对真理，但是客观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有绝对的一面。总的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相对真理的全部就是相对真理的无限总和，任何时候也不能把相对真理的全部统统认识完。相对真理都有绝对的一面。任何一点相对真理都有绝对的方面。所谓有绝对方面，也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

真理和谬误的转化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第 92 页的那段话，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真理和谬误可以互相转化，真理可以变成谬误，谬误也可以变成真理。同时也讲到真理和谬误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如果超过这个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真理和谬误可以互相转化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讲到真理和谬误的转化问题。毛主席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天》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讲了辩证法，当时搞合作化，富裕中农反对，贫农坚持要搞。富裕中农就挖苦他们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毛主席指出，这对合作化是一种障碍。“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

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从古以来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就不是真理了，就要变成谬误。所以真理是有条件的，真理的相对性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真理，超过了这个条件，就会变成谬误。恩格斯在这本书里用的是波义耳定律，如温度不变，气体的容积和加在它上面的压力成反比例。在这样的范围内波义耳定律是真理，如果超过这个条件，就不是真理，所以真理可以变成谬误，谬误可以变成真理。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点，肯定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理本身包含着可以变成谬误的因素。真理本身是矛盾的，它是真理，就带有普遍性，为什么带有普遍性？就是只要这种条件存在，它就是真理。所以它有普遍性，可是这个普遍性又是有条件的，又是相对的，这就是它的矛盾。它有相对性，可是它还有普遍性。鸡毛不能上天这个真理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普遍性，这是就这个条件来说，它有这个条件就是真理，就有普遍性。可是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历史条件，所以又限制它只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是真理。因此它就有矛盾，它不是绝对普遍的。又是普遍，又不是普遍。如果这个条件不存在，就变成了谬误了。

另一方面，真理是由我们人来认识，真理都只能是近似的。百分之百的一点误差也没有的不是真理。除非抽象的讲，真理和谬误一点联系也没有，如果这样看当然是真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一点谬误的因素。但是实际上真理只是人认识的真理，没有离开人的认识抽象的存在宇宙中的真理。唯心主义者说，整个宇宙就是真理，那是黑格尔的说法。唯物主义的说是，真理都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客观世界无所谓真理，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以及它的运动规律，它的本质，它无所谓真不真，也无所谓假。客观事物也没有什么谬误不谬误，它就是事实。所以客观物质本身没有真理和谬误的问题。真理是人认识的真理，没有离开人的认识客观存在的真理，所以凡是真理总是具体的。我们说具体就是人自觉的最大限度近似的认识客观情况，这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真理，就应该承认真理是可以包含谬误的因素的。真正存在的真理不可能是纯粹正确的，总有点误差。只要能做到近似的反映客观事物，就是真理，就不是谬误，应该肯定这点。哪怕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还有百分之十的误差，也应该说是真理。《资本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规律，也是近似的反映。不然为什么列宁还要写《帝国主义论》？还是讲得不够，所以还可以补充。甚至个别真理还可以在进一步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以纠正，或者是按照新的条件加以改变，所以真理里面难免会包含着某些谬误

的因素。但是不能因为它包含着谬误的因素就说它又是真理、又是谬误。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大限度的近似就是真理。恩格斯在第93页讲：“这样他或许就把自己的本来是正确的结论变成为错误，而与这一错误相较，则包含少许错误的波义耳定律可以说是真理了。”包含某些错误因素的真理就不能说是错误，就应该说是真理。在原则上说真理就是真理，错误就是错误，抽象的、原则的讲应该是这样。所以从原则上讲真理不包含错误。但是人们认识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纯粹的原则，人们认识具体的真理都可能包含某些错误因素。

所以，真理不包含错误这个说法太绝对了。恩格斯在这里肯定真理是包含错误的，不等于没有条件限制。所以我们叫真理的东西总是包含某些不足，可以补充，可以在个别部分加以修改。这样了解问题才有好处，免得我们的思想僵化、凝固，变成思想僵化的人。这样有利于人们认识的发展、真理的发展。

我这样讲是不是和现在报纸、杂志上的论战有点不同？恐怕有点不同。现在的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相对真理都不包含错误；一种是主张真理就不包含错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很生硬。恰当地说，真理因为是人认识的真理，所以是具体的，是近似的，总是会有点误差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

第 20 章 关于《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讲解

(1964.3)

【1964年3月初，艾思奇按照中央高级党校教学计划安排，应59班、60班哲学专业学员的要求，辅导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札记和片断〕》，共辅导三次，按所讲解的主要内容，我们分别标了“关于辩证法问题”、“关于辩证逻辑问题”、“关于认识论问题”，讲解中内容有所交叉，事实上，艾思奇在辅导中贯穿了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是统一的东西的思想。1979年7月5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按速记稿做了初步整理，印发给校内理论班哲学专业的学员参考。现在又做了进一步整理。原稿用的《自然辩证法》原著，系1955年中文版，现加注了1971年中文版页码。】

(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讲解

(1964.3.3)

今天辅导《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断〕》中的辩证法问题。

这里有两部分要辅导，我想把第一部分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一下，再着重讲第二部分。同时，顺便把《〔札记和片断〕》总的内容也介绍一下。

《〔札记和片断〕》是恩格斯的一些笔记，内容有点像列宁的《哲学笔记》，随时读书，随时研究，记下一些感想。当然这些感想都是经过考虑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这本书恩格斯自己没有编，而是出版时经过编辑的人编的，大体上是按照恩格斯原来的顺序编的。

1. 关于辩证法问题

《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辩证法总的规律；一部分是讲辩证逻辑和认识论。这一章的内容虽然是一些零碎的笔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方面价值是很高的，内容可以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相媲美，意义都很大。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许多问题是发

挥了这个札记的思想。恩格斯在这里专门对辩证法和辩证逻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把意见写出来。这种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面是很少见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面讲到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统一的东西，这个思想可以从恩格斯的札记中看到。为了更好的了解列宁的《哲学笔记》，先学习《自然辩证法》这部分是很必要的。

《(札记和片断)》对辩证法问题讲得很全面，比如第一部分，辩证法的一般问题，基本规律、基本公式，开头几句就很全面地讲了。当然他没有直接讲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的规律，不过最主要的内容这里讲得很全面。开头一句很重要，客观辩证法也讲了，主观辩证法也讲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主观辩证法是讲认识论和逻辑的，它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艾注)，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自然辩证法》第174页，新版第189页)对立面的东西经过不断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最后互相转化，或者是转化到较高的形态，这样就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可以想一想毛主席经常讲的辩证法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里面，还有后来的政论文章如《1957年夏季的形势》，都提到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首先是矛盾的法则宇宙的根本法则，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前进。对立面经过斗争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或者是整个事物转化为反面，或者是一个事物转化为它的反面。但是如果斗争得不好，正确的思想也会转化为错误的思想。

对立面的转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向前进的方面转化，一种是倒退的转化。我们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能使我们中国向前进的方向发展。错误的思想可以转化为正确的思想，模模糊糊的正确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很清楚的正确思想。有的人有错误思想，经过斗争，可以向正确的思想转化，这是向前进的方面转化，是事物的前进。但也有向倒退的转化的。

转化的中心问题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不成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统一物的对立面，所以中心问题是斗争问题。经过斗争，或者向前进的方面转化，或者向倒退方面转化。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是一分为二，就是找出对立面然后展开斗争。矛盾暴露清楚了，然后就展开斗争，力争使对立面向前进的方面转化，这是我们运用辩证法总的方针。

恩格斯这段话，把辩证法的核心，重要的内容，比较全面地阐明了。列宁后来讲的东西，毛主席全提了，有些细节更充分，更展开了。

这段话很重要，《(札记和片断)》的第一部分，整个贯穿着这个思想。这段话里面还有一点，特别强调了不断的斗争，谈到了斗争的绝对性。我们上学期学习《反杜林论》的时候没有学到这点。《反杜林论》是反驳杜林的机械论错误，杜林主要是用外力对抗来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因为恩格斯要谈这种观点，所以强调对立的统一，谈到对立面互相渗透，就没有谈斗争。在和杜林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没有着重提对立面的斗争问题。如果我们片面地解释恩格斯的著作，根据《反杜林论》就说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就错了。因为在那个论战里面任务不是需要着重谈斗争，主要的是要解释对立面是内在的对立面，不是外力的冲突。在《自然辩证法》中，对斗争问题都提到了，不看《自然辩证法》就可能曲解这个问题。

恩格斯不但是一般地讲对立面的不断斗争，引起对立面的转化，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而且特别讲到斗争。可见，对立面的斗争性并不是专指人类社会问题，可以说，斗争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也表现在自然界。苏联有一个时期展开了很大的争论，自然界有没有对抗性的斗争，最后得到一致的意见是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著作就不能这样解释，自然界不断的斗争，其中自然有对抗，而且这里讲到自然界生活。首先讲到吸引和排斥，在一定的时候可以作为对抗来解释，地球有吸引力，把一个东西从高处引到低处来，结果就要发生冲突。恩格斯在这段话里不但一般地讲了，而且举了具体的例子。

下面讲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比如父亲的特点遗传给儿子，但是儿子又要适应新的环境。这两种倾向中的矛盾，就要不断的斗争，但不能说是对抗。一个人自己身上为了要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不是跟自己祖先的特点对抗？可以说不是对抗，但还是斗争。因为列宁讲互相排斥就是斗争，适应和遗传就是互相排斥，所以就有斗争。

下面一段讲到“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的问题。恩格斯讲“非此即彼”的时候，是讲对立面的斗争发展到顶点，发展到立刻要向对立面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非此即彼”。但为什么会出现“非此即彼”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原来有个“亦此亦彼”，原来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物里面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原来就有对立，就有差别。活着的人是活着的，但是也可以说有死的因素。原来就有“亦此亦彼”，原来就是对立的统一。所以，对立面经过斗争到一定程度，就“非此即彼”，这不是外在的突然来的，因为原来内部

有“亦此亦彼”。先有“亦此亦彼”，然后才有“非此即彼”。以后恩格斯始终是讲统一性中有对立面，都是向“非此即彼”的东西转化，讲辩证法一般的是讲这样的问题。其中特别举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在搞科学研究的时候，就要考虑“非此即彼”，因为科学是从偶然中找必然的规律，因此就要撇开偶然找必然性。但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任何时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大体上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开始时偶然性占优势，但包含着必然性，发展到最后，必然性占优势，这里就有“非此即彼”的问题。事物发展到最后，必然就暴露在表面，但是新的事物在萌芽时期往往是通过偶然的因素出现。

大家让我讲抽象的同一性这一节，这节也不是太难懂，这节自始至终就是要解释世界上没有绝对同一的东西，任何同一性都是内部包含着差别、对立的必然性。没有一种纯粹的同一性，也就是抽象的同一性。抽象的同一性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既然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为什么能在人的脑子里起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时免不了要把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抽出来单独地研究，要研究同一性的东西，在人的头脑里就把差别性撇开。人的主观思想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习惯，这种能力对人是有好处的，便于人们对事物的分析、解剖。

研究同一性的时候，暂时把差别性摆在一边，在数学上研究数量的时候，把质量放在一边，客观世界没有抽象的1、2、3……10，世界上有的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一间房子，两间房子。但是我们人的脑子能把一个人，两个人，一间房子，两间房子放在一边不讲，专门考虑纯粹的1、2、3、4、5、……这个纯粹的1、2……5，就是抽象数量的同一性。在实际生活中，任何数量同时都是质量，任何一个数目不和质结合，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数都和具体的质结合。所以数量抽象的同一性在原始世界就没有。但是人的头脑，人的理性有这个能力，在脑子里设想脱离各种各样质量的纯粹数量。他可以设想一条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和高度，如果有宽度和高度就不是一个数学上的长度，而是一根棍子。这种数学上的长度，在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但是人的脑子可以设想，这是长度，除了长以外不包含任何东西，不和长以外的任何数量相联系。世界上没有哪个资本主义不夹杂着封建的东西，或者夹杂着其他旧的不纯粹的东西。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英国还有女皇。它是资本主义，但是它又有封建的遗留，可能还有公侯伯子男。可是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时候用英国做典型，这个资本主义和一些非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关系。人有这种能力，能把复杂的客观事物某一方面抽出来

单独研究，这是人的高级思维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也使人的思想有可能养成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就是不能由于把同一性看成抽象的东西，认为客观事物的同一性也是抽象的，脱离活的辩证法。人的这种能力叫抽象能力。抽象能力是好的，但是，不要因为运用了抽象能力结果，产生了一种抽象同一性的观点。我们研究数学上某个数的时候，可以把它抽出来研究，但如果因为这种研究引起我们一种认识，认为客观世界可以有一种纯粹的数就不好了。

我们运用抽象能力研究问题，才能研究得深，撇开一切复杂的影响，专门抓住最本质的东西，用抽象的能力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抽象的能力来研究。但是我们运用抽象能力的时候要避免产生抽象同一性的观点，不要以为世界上存在抽象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和自己的对立物没有联系。这种观点就错了。《资本论》里所讲的资本主义，虽然是脑子里概括出来的，但是，他每讲一段抽象的原则，都要引用具体生活中的统计材料来认识，除了抽象的分析以外，还加上具体材料作证明。比如，在积累那部分，积累的结果资本家越富，工人越贫穷，这是一个趋势。讲完这个趋势，把英国的实例，统计材料拿来具体的充分的加以证明，这样就可以避免纯粹的抽象研究。当然，这里讲抽象的同一性问题，主要的是讲否认内部有矛盾的同一性。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虽然是用抽象法来研究，但是他经常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就这点来说它的性质和抽象同一性根本不同。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同时研究资本主义自己产生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研究任何东西都不要只把它当做统一的，而要看到它的内部会产生破坏它的力量。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也不要把它看成天下太平，要看到社会主义里面，也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毛主席是彻底的辩证法，他一开始就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矛盾。1956年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系大体上开始建立了，那时就考虑了社会主义矛盾，就提出十大矛盾，十大关系问题，提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都可以一分为二。而且永远有矛盾，永远可以一分为二，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了，也还要一分为二，有先进和落后等等。一万年之后，还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第177页(新版第192页)第6行，已经都讲了，现在讲第7行：“然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及其诸范畴却还继续存在。”这句话非常有现实意义，有普遍作用。我们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我们是搞革命的。革命斗争也经常破坏抽象同一性的观点。

自然科学也有这个问题，古代讲的物质不可分的最后单位就是原子，后来化学发展了，证明原子内部还是复杂的，并不是不可分。主要的是镭的发现，原子一分，就有了电子、质子、中子。镭的发现破坏了形而上学，也破坏了原子抽象的同一性，这时有了辩证法。电子学说一出现以后，自然科学得到一个胜利，但是立刻又回到老的观点，认为电子、中子、质子是最新的，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叫基本粒子，这是物质最基本的东西。列宁在 1908 年就说：电子也是不能穷尽的。就是说电子还可以一分为二。但是列宁不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看不起列宁。一直到现在有些自然科学家还是把电子叫基本粒子。这种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抽象同一性的观点。如果说电子不可分，为什么电子有阴电子和阳电子，另外阴电和阳电结合起来还可以变成原子。有些内部原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有些已经搞清楚了，比如电子有什么自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想的自旋？很难说，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特点，中子还可以分很多种。所以值得警惕的就是形而上学。抽象同一性的观点经常要来进攻我们。所以，要经常保持辩证法的高度自觉性，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有人认为 176 页(新版第 191 页)第一段：“由量到质的转变=‘机械的’宇宙观”，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把质归结为量，另一种解释就是反对由量到质的转变是“机械的”宇宙观。现在看起来，后一种解释妥当一点，因为“机械的”三个字是打括号的，说明是引用别人的，不是恩格斯自己的意见。有些人认为，“由量到质的转变是‘机械的’宇宙观”，就是量的转化改变了质，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最后一句话，“绅士们从没有猜想到这点！”绅士们就是指那些形而上学者。因此他们把它叫“机械的”宇宙观。

有人问，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是否有共同的原则？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形而上学是一种错误的、片面的世界观，形式逻辑是一种关于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和规律。所以形式逻辑不等于形而上学。因为人的思维可以不遵守形而上学，但是一定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人的思维起码要符合形式逻辑。当然，有人可以把形式逻辑的规律曲解为形而上学，就是说它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它的公式 a 为 a ，或者是甲是甲，这个规律可以曲解成形而上学的规律，可以把甲是甲解释为甲和甲是绝对相同的。

第 178 页(新版第 193 页)第 3 行，恩格斯讲：“旧的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a=a$ 。每一事物和它自己相同。”就是说 a 和

a 绝对同一，没有差别。这种解释是形而上学的，是把形式逻辑解释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形式逻辑的规律并不等于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的 a 等于 a 的规律，在形而上学看来是绝对同一的规律。前一个 a 是 a，后一个 a 也是 a，实际上不是这样。形式逻辑的第一个 a 和第二个 a 有区别，头一个 a 叫主词，后一个 a 叫宾词，主词和宾词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把这个公式具体化，比如人是动物，人就是主词，动物就是宾词，a 是 a 就是：人是动物。但是人是一种具体的高级动物，动物是一般的动物，人这个范围比动物小。动物的概念可以叫普遍概念，人可以叫特殊概念，或者叫个别概念。所以，a 是 a 这个公式是表示主词等于宾词，不是主词等于主词，不是人等于人，或者是动物等于动物，而是人等于动物。或者再逻辑一点，叫特殊概念等于普遍概念，或者叫个别概念等于普遍概念。它并不是简单的 a 等于 a。所以这个同一是有差别的同一，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包含客观的意思，它的意义也是有差别的，包含不但主词和宾词相等，还有一种逻辑上使用的概念前后要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接近抽象的同一性。比如我们说，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写文章的时候，解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意义，前后都要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任何一篇文章里面，这个名词都要这样解释，不能前后不一致。形式逻辑在这个问题上要求概念一致、论断一致。人是动物，就要始终承认人是动物，你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就要始终承认。但是要求名词前后一贯，并不等于要求对名词概念用绝对同一性来解释，思想要一贯，讲也要一贯，看矛盾要一贯，研究矛盾也要一贯。这和抽象同一性有点接近，但并不等于抽象同一性。

上一段就是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做了总的叙述，下面讲对立面的同一性。这里举了偶然和必然的例子，否定之否定只提了一下，没有正式讲。

下面讲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1930 年以前讲辩证逻辑，1930 年以后主要的是讲认识论。大体上是这样分的，因为辩证逻辑和认识论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和认识的发展结合的。认识论里面也有辩证逻辑，而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又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基本表现，逻辑和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以这一部分札记虽然也不是有系统的东西，但大体上还是有条理的。一开始还是解决物质和精神，认识和自然的关系。它有一个题目叫“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实际上也就是讲的认识和存在的统一，精神和物质的统一。

这一段是讲精神应该是自然界的反映，理性认识也是自然界的反映，意思是这样的。但是他的提法，他所采取的叙述形式，我们看起来有点难懂。难懂的原因是有许多提法，借用了黑格尔的语法。他的札记，一方面是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是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这里着重是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好的评价，利用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解决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因此有许多说法现在看起来比较难懂。比如“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黑格尔的说法。我们要理解这句话就要用列宁告诉我们的方法，用倒转的方法。因为他是札记，很快写下来的，而且不像《反杜林论》是写给别人看的，他是为了将来写给别人看的参考，所以就按照黑格尔的话写下来了。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理性是自然界的反映，如果按照原来的顺序讲，就是自然界不能不反映为理性认识，或者倒过来讲，理性能反映自然界，理性不应该不反映自然界，这样来了解自然就通了。

这里说，“希腊人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了”。希腊人所有大的哲学家认为，了解自然界要通过理性，不能通过感性，通过感觉不能真正认识自然界，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界。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争论，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辩证法的，认为自然界是不断变化的，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巴门尼德是另一个学派，主张自然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庄子的《天下篇》里面讲的“飞矢不动”，箭本来是飞得很快，但是他说这个箭不动。巴门尼德这派人就是这样的主张。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箭动是你的感觉，你用理性去了解它，就知道它不动。他的理由很怪，看起来似乎又有点对，如果说箭是动的，必然要从这一点动到那一点，由这点动到那点就必须通过甲

点到中点再到乙点，这样动下去中点是无限的。首先问你承认不承认从甲点到乙点中间通过无限中点，两点中间的距离可以无限分的，因此是有无限的中点。既然看到通过的中点是无限的，就是说它永远也通不过。他就是这样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在古代人是了不起的，一下子反驳不了。有一个故事，巴门尼德派有一个人和赫拉克利特派的一个争辩，这个人原来在洗澡，搞得他没办法，一着急从澡盆里走出来了，他说，你看我可以走出来，不过这是你的感觉，你要用理性想一想，我也不能走出来。赫拉克利特派不是这样看，他说，我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变的，但是由感觉来看，石头山都不能变，你要用理性来思考，山也是变的，石头也是变的。这就是说，只要大家用理性思考，结果大家就觉得应该不成问题，没有人要求证明它。恩格斯这

段话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不需要用理性来证明，人的实践中就可以证明，希腊人谁也知道，已经成了习惯，成了不证自明的道理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主要的是批判经验主义者。他在第 184 页(新版第 200 页)里面讲：“现在最愚蠢的经验论者甚至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这句话是说，有许多经验主义者是很愚蠢的，认为用理性不能认识自然界，所以理性和自然界不矛盾。实际上，认识自然界主要的是实践问题。经验论者不讲实践，他们认为单凭观察、感觉就能认识，把感觉看成是惟一可靠的认识工具，靠感觉、观察来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他对理性的实在性不相信，实际上他不相信理性是否真正反映自然的本质。有些经验论者就变成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多半是从经验论者来的。后面恩格斯引的休谟就是不可知论，也就是经验论者，经验论者事实上就是不同程度的不可知论，因为他认为人只能根据感觉认识现象。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性，究竟是不是确实存在，这要通过感觉来判断，但是不能证明是不是客观存在。

为什么恩格斯要讲经验论呢?就是因为经验论者本身就怀疑理性的确实性、实在性，因此，有些经验论者就不得不百般想办法，证明一切理性认识是符合自然界的。有些经验论者怎么就相信理性是符合自然界的?恩格斯这话是反话，实际上是说不相信。因此才想办法证明，本来是用不着证明的，长期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的这话还有这样的意思：经验论者要证明他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但是他们相信了没有?没有相信。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经验论者实际上不相信理性。这些经验论者是一些什么人呢?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讲到了，早一些的是德国的黑尔姆霍兹，后来是英国的赫胥黎。这些人是经验论者，也就是不可知论者。这种不可知论者和后来的不可知论者不一样，他们不是不承认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又表示对唯物主义怀疑。他们的理论是，科学上发现的自然规律，的确是有效的，这点肯定要相信，但是这种客观规律究竟是不是最后符合于物质本来的情况，我们还是不能知道。这些规律运用起来是客观有效的，可是，是不是符合于物质的本来面目就不知道。多多少少承认一点唯物主义的原则，人的思想反映客观规律，羞羞答答地承认一点，但又不承认这个规律本身就是物质本身，或者是这个规律来自物质，来自实体，他只承认理性认识对自然界是有效的。这段话批判的经验论实际上是不可知论。这是认识论的一个前提，辩证唯物主

义认识论首先要肯定精神和自然界的同一，理性能反映自然界。这段话的意思正面阐述了这点。

物质的前提讲完了，后面就讲逻辑。

逻辑主要是研究概念的，人的理性认识的特点，就是用概念、推理、判断的形式来反映事物，所以辩证逻辑也和形式逻辑一样，就它研究的直接对象来讲，是研究理性概念的关系。所以，184页(见新版第200页)(乙)第二段一开头就讲：“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本体和变体)的发展对于它在个别辩证学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对于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或者不如说是它在历史中的发展以及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

第二段主要是讲：辩证逻辑总的要求是什么？总的要求就是研究人的概念是怎么发展的，怎样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发展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发展的。原始人的概念就比较简单、粗糙，现代人的概念就很复杂、高级。形式逻辑就不研究概念的历史发展，而辩证逻辑就要研究人的概念的历史发展，或者一般的说研究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理性思维的发展就是概念，所以又可以叫概念的历史发展。黑格尔的《逻辑学》里面专门讲辩证法的部分可以叫概念，就是因为逻辑的直接对象是研究概念的运动，这是辩证逻辑总的要求。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不同就在于形式逻辑把概念、判断的思维形式加以排列分类，不研究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概念的发展规律)。辩证逻辑是怎样研究人的思维发展规律呢？研究的方法就是把整个人类思维的历史加以直接概括。人的思维历史要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有很多经验，概念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连续发展经过几千年。辩证逻辑就是把这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过程，把它的基本规律概括起来。因此，几千、几万年的历史，可以在一个小小的例子里说清楚，因为只讲它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这段话是做了比方的，他说：“……辩证学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对于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胚胎学就是研究一种动物在胎里发展的情况，从一个受精卵开始，最后成为一个动物。胚胎学研究的过程得到一个什么规律呢？这是动物在胎里面的发展过程，由一个受精卵成为一个动物，比如成为一匹马要几个月的过程。胎儿的变化等于重复一遍生物进化的过程。生物的进化要有几万万，但是在胎儿里面由单细胞的卵子，变成成形的马、猴子，虽然时间那么短，但大体上重复了生物的进化过程。单细胞分裂，就变成最简单的生物，慢慢地就

变成类似鱼的形态。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在胎儿里有尾巴，到了六七个月的时候就没有尾巴了。这是由单细胞到简单的生物，然后变成鱼、再变成走兽形状的东西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辩证逻辑里面也是这样，基本上重复了人类从原始人一直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过程，从最简单的认识到最复杂的认识，并且要研究这种过程，研究一个人由一个简单的概念起，最后形成一个最复杂的概念，也就是能反映自然界的概念，经过一个什么过程，是研究简单的思维怎样变成复杂的思维能力的这种过程的。这就是辩证逻辑总的任务。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是唯心的，有荒谬的东西，但是大体上是按照这样的原则研究的。最初研究最简单的概念，叫纯概念，一直到最后研究到最高的概念，能把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的概念这样一种过程。总的来说，辩证逻辑学是能表明人的思想发展过程、思想发展规律的。

现在讲第三段(见新版第 200 页)。前两段讲了以后，特别是第二段讲了辩证逻辑，下面就好说明了。

第三段是讲抽象的和具体的。

这段就是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了解抽象的和具体的是统一的，所以把抽象的和具体的当做一句话。辩证逻辑要求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统一起来，不要把抽象的和具体的绝对离开，抽象的东西中有具体的，具体的东西中有抽象的。下面举个例子，“运动形态变化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态变化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一般规律应该是抽象的，个别具体的例子应该是具体的。但是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一般规律里面有具体的东西，而且甚至比任何个别具体的例子更具体得多。如果把一般规律的某一方面拿来看，可能就不具体了。比如全部《资本论》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没有讲哪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当然以英国为典型，但是也不完全是讲英国。《资本论》里面除了英国以外，任何国家都可以用，当然要讲《资本论》的某一节，那是另一个问题。比如第二章第一节只讲商品，这就没有具体讲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情况，没有个别具体的东西那样具体。但是把整个的拿来跟个别具体的国家来比，把整个《资本论》全部叙述的东西拿来和马克思那个时候所知道的英国资本主义来比较，就琐碎的现象来讲，英国可能比《资本论》所讲的还丰富一些，《资本论》里面就没有公侯伯子男，也没有女皇，英国就有，有很多混杂性的东西，可是就资本主义本身的规律来说，英国这个资本主义是不是能表现像《资本论》中所讲各种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是在英国完全暴露了，也

不一定。有些原理不是从英国概括出来的，是从德国、法国概括出来的。总的来说英国是典型，但在某一个问题上英国又可能不是典型。所以就这方面来说，《资本论》就资本主义本身的规律暴露的全面性来说，要比英国资本主义丰富得多，具体得多。因为《资本论》虽然以英国为典型，但是它不仅以英国为典型，它还概括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东西，甚至于俄国的情况也概括了。而且他叙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商品叙述起，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说起。所以这里有些规律不是纯粹表现英国的。总的来说，虽然作为一般的规律是抽象的，但是一般规律把一个事物的发展总过程全部暴露出来，它就具体了。就它一部分一部分来说是抽象的，一章一节都是一些抽象的原则，一章讲商品，一章讲价值，一章讲货币，一章讲劳动者。这样每一章把整个资本主义有机体的一部分抽象出来，当做纯粹的东西来叙述，综合全书就反映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生、发展、一直到灭亡的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就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要灭亡，但是当时英国没有灭亡，正在上升；指出剥夺者要被剥夺，但是英国的剥夺者没有被剥夺。所以，辩证逻辑一般的规律，比认识一个个别的、具体的例证更具体得多，因为它更全面、更丰富。

辩证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把一部分一部分抽象的原则，综合成一个具体的事物由发生、发展到灭亡的总的规律。把一部分一部分抽象的东西综合成具体的东西，这叫由抽象到具体。辩证逻辑要求由抽象到具体，把一个一个的抽象原则联系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具体的，某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总的过程，这个逻辑上所反映的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具体事物发展的历史中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也和第二段所讲的关系一样，一个事物的发展和胚胎发展的历史一样。

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几百年，由发生、发展到灭亡。从15世纪就有资本主义了，到现在已经四五百年，将来可能还有几百年。这么长的历史在三部《资本论》里就反映完了，甚至第一卷就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回头看一下，它的基本过程和《资本论》是一样的。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只有几万字，把八年抗战的历史都讲

清楚了，那还是1938年抗战的第二年写的。抗战胜利以后，回头来看，抗战的发展过程和毛主席描写的过程一样，就基本过程来讲，没有超出持久战的原则。

所以，这节里面讲的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不是指一条规律，是指辩证逻辑所阐明所反映的某一事物由发生、发展到灭亡的总的的基本规律。这种基

本规律比任何个别具体例子更具体得多。《论持久战》里面所讲的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过程，在某种意义来说，比我们八年抗战更完全一些，八年抗战的反攻阶段，由于苏联的参战缩短了，没有完全按照《论持久战》所讲的规律充分暴露出来。没有苏联的参战，可能抗战还要打几年，可能更充分地暴露《论持久战》中所讲的过程。

我们学习辩证逻辑主要就是学会这种本领，学会在思想上把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基本上反映出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那些矛盾，最后把这些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指出它的结果。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夺者要被剥夺，这个结论的产生就要分析很多矛盾，比如商品和价值的矛盾，货币和商品的矛盾，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步一步地暴露。各种矛盾暴露清楚了，然后掌握这些矛盾的联系，就提出一个总的结论，所有矛盾汇集一个结果，就是剥夺者要被剥夺。

平常反映一件事是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矛盾是怎样萌芽出现，怎样展开的，由一个萌芽的矛盾变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矛盾逐渐复杂，最后经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得到了解决。好的文艺作品就有这样的本领。比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从矛盾的萌芽开始，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暴露出来了，归根结底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压迫者，一种人是被压迫者，这两种矛盾斗争的结

果，大观园没落了，贾宝玉出家了。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所以没有资本主义的前途。文艺也讲辩证逻辑，这是封建社会一个一般的规律在那里的表现。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掌握辩证逻辑，也就是要掌握这个本领，先是一条一条的抽象，先把矛盾加以分析，然后再把矛盾联系起来加以说明，最后的结果得到一个事物发展中的规律。《资本论》就是辩证逻辑的一个典型。以后我们还要学习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说明人类的思维，由发生到发展，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程，由最简单的概念一直到最后理论的形成要经过什么步骤。《资本论》就是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方法，从最简单的思想，最简单的概念说起，然后回顾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得到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出现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这几年就有争论，突出的是王亚南和吴传启的争论。王亚南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主要是辩证法，不是辩证逻辑。吴传启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不是辩证法，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

逻辑的方法。这个争论如果大家好好研究对方的意见就可以综合起来。《资本论》就方法来讲，当然是辩证法，但是这个方法在逻辑上的表现，是辩证逻辑。这个方法是一分为二，表现在概念上也是一分为二。首先分析商品，把商品一分为二，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来看运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使商品向前发展。这个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三种价值形式，单纯的价值形式，特殊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经过这三个阶段就出现了货币，货币和商品又发生矛盾，而货币又是商品的一分为二。原来只有一个商品的概念，一分为二，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抽象概念中的一个抽象概念变为三个抽象概念：单纯价值，特殊价值，一般价值。货币和商品又发生矛盾，货币如果一发展，又出现了资本。这样不断的抽象，又不断的综合，结果由于抽象越来越具体，不断的抽象就不断的更具体，最后反映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所以辩证法的方法和辩证逻辑是一个东西。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不是抽象的运用，他在理论上要通过概念的分析，概念的发展，必然要表现为辩证逻辑形式。辩证逻辑的形式就是由抽象到具体，不断分析，不断综合，不断抽象，不断的又更具体，具体以后，又抽象，又更具体，最后得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个争论可以综合起来。他们的文章我没有仔细看，谁是谁非也不能判断，似乎王亚南这方面对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联系看得不够一些，只着重辩证法。分析矛盾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辩证法必然要表现为辩证逻辑才能在理论上实现。客观辩证法使事物的矛盾暴露，在理论上反映客观辩证法，就要暴露矛盾，就要解决矛盾。

第四段(新版第 200—201 页)讲悟性和理性。

黑格尔规定人的感性认识以外，还有理性认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看法，人的认识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感性能力，一种是思考能力。思考能力又分为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悟性是一种单纯的思维能力，是比较低级的思考能力，理性就是辩证思维，是高级的思考能力，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思考能力。一般的讲，动物只有感性认识，只有人类才真正有理性认识。但是事情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一般地讲动物只有感性认识，那么就一点理性认识的因素也没有了吗？还应该用“亦此亦彼”来认识，高等动物已经有了理性认识的思考能力了。恩格斯的这段话是指这个意思。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能力，比如狗是四足的食肉动物，鸟是两足动物等，对未知对象加以分析，高等动物像猴子能把果实打开，这是分析的开端。某些综合能力，动物例如狐狸也有狡猾的伎俩。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某种动物会实验，比如啄木鸟就有综合和分析能力，它知道某种声音有害虫，某种声音没有害

虫，对树有实验的作用。运用它原来的经验去实验这个树，如果它听到有虫的声音，就进一步用舌头伸进去把虫吃掉。动物也有这种实验的活动，所以这种能力在本质上人和动物是相同的。高等动物也有这种综合、分析的能力，但是都是表面的、外部的，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人的特点就是辩证的思维，在第185页(新版第200页)第八行恩格斯讲，辩证的思维“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这是黑格尔的话。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的概念本性就是内在矛盾，辩证的思维就是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为基础。这种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这种思想，在黑格尔的著作里没有，因此他只提出概念本性。在黑格尔看来，概念就是客观存在，唯心主义者的概念本性，也就等于唯物主义的客观事物的本性。这种能力只有对人才是可能的，而这个人还不是原始人，还是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这里恩格斯举了佛教徒和希腊人，他没提中国人，这不是看不起中国，是因为恩格斯对中国的材料不熟悉。我们中国古代人有很多辩证法的思维，从老子起就知道概念本性，正反的联系。相反相成是我们中国很早的话。下面恩格斯接着讲：“而其完满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可是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化学研究的方法首先是分析，但是也要综合。

下面讲判断。

判断问题可以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辩证逻辑是什么东西，整个判断这一段的基本思想是从黑格尔的著作里面发展起来的。

这一段一开头就讲：“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论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形式逻辑的排列是按照外表的形式排列的。形式逻辑的判断大体上有四种，一种叫否定判断，一种叫肯定判断。人是动物，是肯定判断；人不是植物，是否定判断。还有一种叫全称判断，讲总的，所有的人都是能说话的，这是全称判断。再一种是特殊判断，是讲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某一个特点。全称判断就是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的结合，“所有的人”，就是普遍概念，能说话是特殊概念，表明一个特点。还有特称判断，就是有些人是完全的辩证法，有些人是完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所有的，不是全称，不是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的联系；是一个普遍概念，一个特殊概念，一个个别概念的联系。“一些人懂得一件事”，是一个特殊概念和个别概念的联系。

逻辑都是概念联系，各种各样的概念互相联系。形式逻辑多半是研究这四种概念的关系。

但是，辩证逻辑就不是随便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辩证逻辑研究判断的时候就要研究判断的发展，把它们出发点的东西由低级到高级联系起来。黑格尔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下面就讲黑格尔把判断分为四大类，这是黑格尔《逻辑学》里面有的。这四类排列起来由低级到高级，由比较简单的判断到复杂的判断(简单和复杂是讲内容)。这些判断大家可以自己看，这里各判断的特点都有解释，实在判断、反省判断、必然性的判断、概念的判断四种。有些逻辑书又把这四种判断用另外的名词，实在判断叫质的判断，反省判断叫量的判断。

质的判断就是对事物表面性的一些判断，比如说玫瑰花是红的，玫瑰花不是蓝的。反省判断又叫量的判断。

所谓量的判断就是不断出现数量关系。有些论断，这在黑格尔看来是更深一步的判断，最初由简单的论断来判断，到进一步研究量。不仅研究它是什么，而且要研究它有多少，有点反省，深入的想一想。不过这个反省还是初步的，还不够深。

第三叫必然性的判断，有人也叫关系判断，就是说不只是性质怎样，数量怎样，而且是和性质联系起来，所以更深一点。玫瑰花是植物，玫瑰花和植物联系起来。不仅是玫瑰花的一种表面现象，还要把玫瑰花的性质联系起来。假言判断，研究它的关系就比研究现象深一些。

最后他认为最高的是概念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深入到本质了，要去抓本质判断，抓最后的必然性。必然性判断，还不完全确切，只是把关系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翻译可以研究。实际上最高的判断是概念的判断的最后一种，概念的判断要掌握必然性，掌握本质的联系，虽然不一定就掌握得了，但是思想深入到本质。这里是这样解释的：概念的判断就是主语对自己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己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就是主语所表示的客观事物的本质掌握到什么程度)。这里有几种：“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坏的’；或然判断：‘如果这所房子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它便是好的’；必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这很肯定，这个必然性也是很肯定的。

这样来看黑格尔的分类逻辑比较好说一点，所以恩格斯用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指出，这些在本质上的东西是天才的思想。他讲到概括人类认识的

历史，根据判断分类来说明人的知识是怎样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通过判断来概括人类对事物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黑格尔这些基本思想可以从人类的认识历史得到证明。他下面举了摩擦生热做例子。

恩格斯不是机械地按照黑格尔的十二个特征、四类判断去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抓住了黑格尔的精神，重新从人类认识的历史出发再来概括。黑格尔的基本精神也掌握了，但是不受黑格尔的东西限制。他大体上分为三类：个别判断、特殊判断和普遍判断。判断的最高级是普遍判断，因为它把一个事物全部的联系都掌握了。个别判断，比如摩擦生火，只掌握了个别运动的联系，一个是摩擦，一个是生火，两种运动形态联系起来，这是个别判断，又是肯定判断，又是实然判断。黑格尔的十二类可以综合起来，主要的是个别判断，由个别判断进入特殊判断。特殊判断就是一切机械运动都可以通过摩擦变成火，在摩擦这个条件下变成火，再进一步掌握普遍判断就是一切运动形态都能发生转化。恩格斯在这里指出，必然判断是判断的最高形式，但是内容还是要发展。恩格斯那时所知道的运动形态无非是机械运动通过摩擦生火，那时还没有光变成声音，声音变成电，当时恩格斯还不知道火可以变成光，光可以变成声音，声音可以变成电。

个别判断在今天还使用，但是有发展。特殊到一般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是实践的基本过程。还可以举别的例子来说明，比如，人对物质的认识，物质的定义，古代的物质定义是什么呢？古代所认识的物质就是某种原始物质的代表，原始的物质就是水、空气，我们中国最原始的物质就是金、木、水、火、土，再加上气，气实质上就是阴阳的矛盾，就是由个别的物质来代替一切物质，所以是个别判断。当时的物质定义是用个别判断来表现，以后进入到十七十八世纪，天文学，自然科学发展了，这时就出现了机械唯物主义。它的物质定义是什么呢？物质就是一切机械实体，物质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机械力学的特点，它有重量，占据一定的空间。这就是由部分物质的某种特性来代替物质的特性，比古代进了一步。这种判断是特殊判断，就是用某种物质的特性来代表物质，它比古代进步，思维能力提高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一直到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现在的唯物主义，现在的物质定义就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不是以某种个别具体的物质来代替物质，也不是片面的用某一种具体物质的特性来代表物质。现在我们所说的物质，普遍有一种本质，就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个判断是普遍的判断，这个判断就到了物质定义的最高形式。这个形式以后还改变不改变呢？基本上不改变，以后科学发展了，革命发展了，越来越丰

富这个定义。不是不要发展，是要发展的，可是这个基本形式已经形成了，已经完成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认识过程，比如我们搞土地改革运动，就有个别研究、典型实验和普遍推广的过程。首先要个别研究，把麻雀解剖一下，然后找一个地方搞典型实验，然后就可以普遍做。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讲黑格尔的判断有很高的思想，他的基本思想和我们人的认识历史，实践历史有内在的联系，基本思想是天才的。

这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辩证逻辑研究思维的发展规律，判断分类表现了这种发展规律。

第 188 页(新版第 204 页)，这段可以把上面讲的告一段落。辩证逻辑就是研究概念发展、思维发展的，这一段多少有一点带总结性的。恩格斯在这段开头讲：“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着的三个规定。”概念本来就可以分为这三种，整个逻辑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个别概念、特殊概念和普遍概念的联系。说它复杂，归根到底也不复杂，它就是研究这三大概念的联系，概念是逻辑的基本元素，研究化学是研究分子，研究生物学是研究细胞。资本主义的细胞是商品，逻辑学的细胞是概念，首先指概念的个别、特殊、普遍。某一个人就是个别概念，《水浒传》上的武松，就是个别概念，某一类人，如梁山泊上的英雄，就有点特殊性，因为他们不同于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英雄，这是特殊概念。农民英雄就有点带普遍性，其中包括梁山泊、李自成，包括黄巢、洪秀全。所以，由武松到梁山泊的英雄到农民英雄，就是由个别概念到特殊概念再到普遍概念，概念都是分这三类。但概念的分类是相对的，有的特殊概念也可以当做个别概念来看，只是程度不同。梁山泊的英雄，撇开武松是个别的，农民英雄就是特殊的，他不是一切英雄，是指农民英雄。农民英雄跟无产阶级英雄有区别，比梁山泊英雄高一点，梁山泊英雄是个别的，农民是特殊的。但是他又比革命英雄低一点，革命英雄是指无产阶级英雄，它有更普遍的意义。运用概念的时候不能省略，刚才我们讲判断有三种，就是以三种概念为基础。摩擦就是个别的，但是机械运动比摩擦高一点，然后就有一切运动形态。推理也是这样，推理更复杂了，里面包含各种概念的关系，这一方面以后再讲。

判断是两个概念的联系，摩擦可以生火，是一个个别概念和一个特殊概念的联系，推理基本上是一个段落联系起来的，所以也叫三段论法，推理的基本形式是三个判断组成的，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推理是三段论。比如，共产党人是守纪律的，某人是共产党员，所以某人要守纪律。这是推理，三句

话、三段论、三个判断里面每个判断里面都有两个概念，所以就有六个概念，实际上，六个概念中三个是重复的，因此，一个推理是三个概念组成的。像我们讲的共产党员是守纪律的，某人是共产党员，所以某人要守纪律。这里只包含三个概念，就是共产党员、守纪律、某人。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推理的组成是三个判断三个概念。在形式逻辑上把它看成一个规定，一个基本推理应该是三个判断，三个词(概念)。一个基本推理不能违反这个规定，如果由四个或五个判断组成的推理，可能不是一个基本的推理。可能是两个推理连起来的。如果一个基本判断里面不是三个词，是两个词或者是四个词，这样就搞不成推理，或者会使推理错误。如果说只有两个词，共产党员守纪律，共产党员是守纪律的，守纪律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要守纪律。这就不能算推理。

研究逻辑总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讲推理都是这样。三种概念又反映了由个别到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这点我们从前面讲的判断问题就可以了解，在认识上、逻辑上来说，上升是由低级到高级。黑格尔说，这种上升运动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公式来实现的。

在逻辑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公式，但是经验论者相信归纳法，而且把归纳法看成惟一的科学方法。恩格斯说，赫克尔们就是这样一个经验论者，他主张由个别到特殊到普遍，就是要通过归纳的形式，而不能采取别的形式，只有先通过归纳法以后才能搞演绎法。这种思想，一方面把归纳和演绎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把归纳绝对化了，把归纳的作用看得太高了。实际上，由个别到普遍的上升，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归纳和演绎要同时并用。如此由个别判断到特殊判断不仅要归纳，而且也要演绎。所谓演绎，就是把一切有联系的原理，在新的事物中加以运用，发现特殊判断的时候，在作研究工作的时候，要运用原来的个别判断经验。做实验是不是就仅仅用归纳法？从一个具体的事情中归纳出一般的原理？不只是这样。做实验里面一方面要从实验中归纳经验，另一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运用各种原理。

所以，恩格斯批判赫克尔有三条：

“（一）他们在这些名称下是不自觉地应用了完全另外的推理形式”。赫克尔虽然那样赞成归纳法，但是他自己搞的时候，却不自觉地运用了演绎，或者还运用了其他形式。我们现在的辩证法，矛盾的分析方法，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我们用的是一分为二的方法。

“(二)只要他们不能把全部丰富的推理形式都勉强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中，他们便情愿把这一切丰富的形式全都丢掉”。事实上他不能看到各种形式。

“(三)因此他们把归纳和演绎这两个形式变成了纯粹的蠢话。”在实际生活中，单纯的运用某一种形式是不可能的。逻辑是包含着归纳和演绎的。

第二次讲解

(1964.3.5)

2.关于辩证逻辑问题

今天要讲的是逻辑问题，主要是讲推理问题，即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作用问题。还有，就是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分别。

这两种逻辑处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时的观点有所不同，形式逻辑一般的是把个别、特殊和普遍分开来，看做是两个推理，辩证逻辑还要研究这三种概念的内在联系，就是说，辩证逻辑要看到个别中有普遍，普遍中包含着个别和特殊。这个地方恩格斯没有讲，我们先说明一下，下面就好了解了。

下面讲完逻辑问题，就讲人的认识问题。

人的认识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究竟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就是说认识到一定程度为止，还是包括发展，主要是处理这个问题。

整个这两部分札记就是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逻辑学。(甲)段是关于辩证法的一般问题，主要是研究辩证法。(乙)段前半部分一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逻辑归纳，是讲逻辑学，最后一部分是讲认识论。这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把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应用到逻辑学方面，也应用到认识论方面，逻辑和认识论分不开。三方面判断：一方面讲认识的分类，一方面讲认识的发展，辩证逻辑同时要研究逻辑的发展，逻辑的发展也是认识的发展。

《资本论》中的逻辑学，就是由最简单的概念，一直发展到很复杂的高级概念。由最简单的商品价值，一直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积累，到否定之否定，剥夺者被剥夺，很复杂。这是逻辑的发展，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同时也跟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基本一致，就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个胎生学的缩影、一个概括。人类正式认识社会以前，开始先认识商品，我国古代春秋前后，对商品就有所了解，六七千年以前就开始有交换。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资本，然后人类才认识资本。出现了资本以后，对资本的认识也

是不断地发展的，开始只是一般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罪恶，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推动资本主义灭亡的力量还看不到。空想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最初10年产生的，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危机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最初的危机是1825年)，从那以后逐渐产生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最初的工人组织是英国的工联会，到了30年代才有工人的党，这是历史的变动、发展。人的认识也跟着发展，逐渐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队伍，然后才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集中，最后到消灭。

《资本论》就概括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过程，又在逻辑上概括了人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过程，而这个变化过程也是整个人类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缩影。

所以，列宁说：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是同一个科学，在理论上阐述可以分开讲，辩证唯物主义可以单独地讲辩证法、唯物主义；逻辑可以单独地讲概念、判断、推理，认识论可以讲相对的、绝对的。可是实际上要把它看成一个统一的东西。

刚才讲的这些是总的观点，用总的观点来读恩格斯的书，才容易了解。不注意这点，就不容易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断贯串起来。

下面讲推理的形式。前面也提到这个问题。

逻辑只是研究个别、特殊、一般的关系，讲各种判断形式、推理形式的。

在这个札记中归纳推理讲得那么多，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界把归纳法的作用夸大了。他举了赫克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最可靠的逻辑，主要是归纳法。甚至认为演绎法不等于推理，演绎法和归纳法是对立的，意义不大，对科学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他崇拜归纳法。这是经验主义的意见，经验主义认识事物，只是完全靠感觉观察来的，就是靠感觉上一个一个的个别事物加以表面比较，比较以后归纳出共同的，这样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结论。

归纳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根据感觉所感到的，经验所观察到的表面的特征来对世界上各种复杂的事物加以分类。把某些特征共同的归纳为一类，如有四只脚走的叫走兽，马、狗、猪都有四只脚，都归为兽类。兽类里面还可以分，猪是不太能跑的，马是能跑的，或者马是吃草的，老虎、豹是吃肉的，又分食草类、食肉类。这样一类一类地分，每一类都有一定的特征作标准。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完全由这些表面上的特征来划分的，各类中间没有什么根本联系。

15 世纪以后，一直到 17、18 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归纳法，因为这时期，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阶段，把自然界各种事物分门别类地排列，所以，归纳法逐渐成为主要方法。到 19 世纪，黑格尔把这个归纳法看做主要的方法，并在理论上加以宣扬。其实，到了 19 世纪中叶，黑格尔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进化论，这时再把归纳法作为主要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更不能把归纳法当做惟一科学的方法，惟一正确的方法。

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什么分别？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对立的推理方法。归纳法是根据事物的特征归纳成类，这种研究方法是由个别到普遍。演绎法是根据普遍原理来估计某一种事物，由普遍到特殊到个别。比如，归纳法认为，狗、猪、马、老虎都有四只脚，凡有四只脚的都是兽类，所以，狗、猪、马、老虎都是兽类。而演绎法则相反，它认为凡是兽类都有四只脚，老虎是兽类，所以老虎也有四只脚。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可能有的同志不了解，所以我讲一下。

下面就念 188 页(新版第 204 页)原文：“归纳和演绎。赫克尔，第 75 页及以下各页，在那里歌德做出了归纳的推理：通常没有颞间骨的人，必须有颞间骨；于是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正确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恩格斯不赞成赫克尔的意见。他说：归纳法不能说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它的正确性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的，但夸大了它是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归纳法的出发点是把一个一个的事物列举出来，然后归纳它的共同点来做结论。比如后面举的例子：

哺乳动物都有乳腺。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就是从一个一个动物观察过后所得出的结论。一切动物都有颞间骨，这个结论是一种一种动物观察过的，凡是观察过的兽类都有这个特点，因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动物都有颞间骨。但是做这个结论的时候，虽然观察了所有的动物，就是没有观察人，人究竟有没有？这是观察一切兽类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是可靠？这个结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靠的，应用在兽类是可靠的，如果夸大了这个结论，说归纳出的结果是惟一可靠的，一点问题也没有，那就会成为错误的。因为个别事物是列举不完的，有时有例外，归纳的时候没有发现，就没有列举。那时归纳的结论对例外就不能使用。所以归纳所得到的结论不一定有完全的普遍性，它的普遍性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如果认为归纳法是惟一正确可靠的方法就错了，归纳法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说，在对通常的人来说，哺乳动物有颞间骨。但对人就不适用，人是哺乳动物，原来的结论

是哺乳动物都有颞间骨，按道理这个结论是绝对可靠的，用到通常的人也应该可靠，用通常的方法推测，人一定有颞间骨，可是恰恰通常的人就没有颞间骨。这说明归纳法是错误的。这里讲错误的归纳法是夸大的归纳法的作用，不是讲归纳法就是错误的。

赫克尔就是夸大了归纳法，他认为归纳法的结论是惟一正确的，所以他说：“……得出了正确的东西！”这句话，这说明赫克尔相信归纳法的结论。因此我们对人也有这些估计，人也应该有颞间骨，那么，这个估计同样是不对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也是对的，所以，“得出了正确的东西”是在特殊情况下，就是说，人在胎儿时期有颞间骨，离开胎儿时期，一出生，颞间骨就没有了。这个归纳法只是适用于那种特殊情况下，所以说夸大了归纳法是错误的。他之所以得出正确的东西，并不是那种归纳法那么可靠，就是因为他碰到例外的情况，一种是在胎儿时期，一种是偶然有个别人出现返祖现象(若于代祖先有的特征，好几代、几十代、几百代没有，突然有一个人又出现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归纳法那么准确，但是对人来说，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准确，并不是像歌德所讲的那么准确。因为一种逻辑形式的运用范围都有限度，人的认识要反映客观形式，需要各种逻辑形式来反映，不是依靠一种。

科学家认为归纳法是惟一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按照辩证的观点来看，它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要想能从逻辑上充分地反映客观现实，除了归纳法以外，也要看到演绎法。实际上赫克尔要用演绎法，而这演绎法后来又经过新的发现，发现胎儿有颞间骨，经过几个反复才得到正确的结果，这个正确的结果并不是单靠归纳法得来的。至少靠两种形式，第一是归纳法，第二种是歌德根据归纳法的结果，用演绎方法估计人可能有颞间骨，然后又根据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在人身上，只是胎儿，只是个别反祖的人才有的，经过这样的反复，才能得到人有颞间骨的结论。这个过程，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精神到物质，物质到精神，然后再由精神到物质。这里讲“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正确的东西”，是对赫克尔的讽刺，实际上他认为夸大归纳法是错误的。歌德并没有简单地依靠归纳法得到这个正确的结论，这个正确的结论是经过好多逻辑形式得到的。人的认识由个别到发现特殊的東西、普遍的东西，要经过各种逻辑形式。

这段比较费解，这段了解了，后面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下面：“赫克尔的荒谬：归纳和演绎对立。(他是排斥演绎的——艾注)似乎演绎不等于推理，因此归纳也是一种演绎。这是由两极化而来的。赫克尔，‘创造史’，第76—77页。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第188页,新版第204—205页)

归纳和演绎推理的结果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可以帮助人作进一步的研究。歌德根据归纳推理估计人可能有颞间骨，有了这个估计就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是把演绎夸大了也是不对的，歌德的演绎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歌德说一切人都有颞间骨就错了，如果说人可能有颞间骨，这个估计就对了。为什么人没有颞间骨，只有胎儿的时候有?这个道理和进化论、胎生学有关系。胎儿重复人类的进化，哺乳动物有颞间骨，人是更高级的动物却没有，但是胎儿有。胎儿阶段不同于兽类阶段，因此，一般地讲颞间骨在通常的人是没有的。只是因为胎儿过程中要重复动物进化的历史，所以有这种情况。归纳法也有它的正确性，演绎法也有它的正确性，但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应看做是互相补充，交叉加以运用。不要把归纳和演绎推理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方法对科学都是有用的，如果绝对对立起来，那么每种方法都会成为荒谬的，都会成为错误的。

这是讲认识的相对性，逻辑的相对性。

下面的两句话：“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是把归纳和演绎绝对起来，看成没有联系的东西。

“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新版205页)。现在再一归纳又不是了，就是因为从前归纳的材料还不足。海虾和蜘蛛是比昆虫更低的动物。海虾和蜘蛛是昆虫是对的，实际上海虾和蜘蛛和蠕虫中还有一类叫X类。

“现在用归纳法发现了这是荒谬的，并且发现了有X类存在。这样，如果所谓归纳推理和以分类为基础的所谓演绎推理可以是同样错误的，那么所谓归纳推理的优越性是在什么地方呢?”这都是批判赫克尔的。

下面是讲归纳法不够的地方。“归纳法绝不能证明：世界决不会有无乳腺的哺乳动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然而鸭嘴兽就没有乳房。”进一步研究，发现了有一种鸭嘴兽就没有乳房，所以说归纳法的结论也不是绝对可靠的。

下面讲英国人惠威尔把归纳法全部弄得混乱了，也是设想把归纳法和演绎法对立起来，因此把一些科学说成是归纳法，一些科学说成是演绎法。有

些科学比较多的用归纳法，但是也要用演绎法，有些科学看起来是用演绎法，但实际上还是归纳出来的，比如数学的许多公理也是人的长期实践归纳出来的。这段的最后一句话：“从个别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的，而且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事实上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A—E—B开始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也有演绎的成分，它本身是归纳法，但是也要依靠演绎。以经验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总是要运用过去的原则，运用过去的经验，把过去的经验作基础。

下面就是讲这个问题：“事实上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A—E—B开始的。”也是从个别开始的，归纳推理应该说是从个别开始，但是实际上是由普遍到个别到特殊。这个意思有点难懂。什么叫从A—E—B开始？这是恩格斯从黑格尔的《小逻辑》上引来的。归纳的公式是A—E—B，是普遍经过个别到特殊，普遍的东西以个别为媒介达到特殊，然后根据普遍现象对个别进行归纳研究，发现某些共同特点。黑格尔的《小逻辑》里面有这个例子，(在《小逻辑》里面关于推理这一章最后一部分，很容易找。)那里讲反省推理、讲归纳推理。

反省推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是把它算作推理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有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推理，也是按照三段论来进行推理的，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一个结论。如铜是金属，铁是金属，金也是金属，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这是大前提，所有的金属都能导电，这是小前提，结论是凡是金属都能导电。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A—E—B的形式。提出一个大前提，说明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这是普遍判断，这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它是金属，所以以经验为基础，这个大前提的本身就是演绎的结果，就是运用过去普遍经验演绎的结果。然后是一个小前提，根据现在的研究，金、银、铜、铁、锡都有一个特点，把金、银、铜、铁、锡一种一种地研究，都能导电，都有导电的特殊性。金属的特殊性就是导电，所以就找出了特点。一个普遍经验，经过个别研究，以个别为媒介，得到特殊性的发现。实质上归纳就是这样，所以，一般地讲，归纳法是由个别上升到普遍，但是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一般到个别到特殊。一般的判断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实际上它是包含了演绎的因素，但是这个推理不是演绎的推理，只说明归纳推理中有演绎的因素，没有演绎不可以作归纳，没有过去的经验，这个推理就搞不起来。

这个 A—E—B 的公式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就是从推理形式来研究，我们刚才讲归纳推理的公式，三段论形式本身是推理，也是讲 A—E—B 三个字的关系，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这个大前提里面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有两个词，上面是个别这个词，下面是金属，是普遍这个词，写成公式，就是个别是普遍。小前提是金、银、铜、铁、锡都能导电，这个判断又可以叫个别就是特殊，可以划等号。最后的结论：所以，凡是金属都能导电。金属是普遍的概念，导电是特殊的概念，结论也可以这样写：普遍=特殊，逻辑形式是这样。这个形式，第一个判断是前提，第二个判断是小前提，第三个判断是结论。这里有三个概念，每个概念重复一遍，等于六个概念。这些概念在逻辑学上有它自己的名词。我们分析有这种情况：三个概念在大前提、小前提里面都有，结论里面只不过两个概念，有一个概念在结论里面没有出现，就是个别这个概念在结论里面没有，只是有普遍和特殊在结论里面有。在结论里不出现的概念，在逻辑学上叫中词(项)；大前提里面出现，又在结论里面出现的词叫大词；在小前提里面出现，又在结论里面出现的词叫小词。三段论逻辑有三个判断，三个判断又包含着三个词(大、中、小)。

三段论逻辑可以这样下定义：凡是推理都是大词以中词为媒介和小词联系起来，就是以中词联系大词和小词，这是在逻辑上的基本形式。所以，在逻辑上普遍、特殊和个别的基本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大词以中词为媒介和小词取得联系，这个联系就是结论，这个结论要经过中词作媒介，这就是逻辑学推理的形式关系。我们刚才举的归纳推理就是普遍概念，就是大词，它的中词就是一些个别概念，小词就是特殊概念，所以归纳推理就是普遍概念以个别概念作媒介和特殊概念联系起来。归纳推理就是这样，因此它的公式自然就写成这样。A—E—B 这样写也是很自然的。正是个别概念，是中词，它把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联系起来，所以 A—E—B 的关系从形式上讲就是这样。

下面这段用不着讲了，他是讲归纳法到处会发生问题。用赫克尔的归纳法归纳出的结论总是常常有问题，因为它总会有例外，每天总有新的事实发现，把旧的归纳结论推翻。这段是进一步批评赫克尔的。现在是十九世纪，进化论都出来了，他到现在还狂热地拥护归纳法。说明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暴露了自然界辩证法，说明你要观察事物的联系、发展，就不能把宇宙的生物看做是一成不变的，光归纳分类就完了，而归纳出几类，还要研究它各种种类的发展过程。这时候你狂热地拥护归纳法，归纳出来的机械分类，就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起了作用。好多科学已

经暴露了辩证法，而科学家的头脑还是形而上学。生物界的进化论已经证明，每种物种都是亦此亦彼，都包含着对立面，没有抽象的同一性。可是赫克尔还是用归纳法把生物归纳为这类那类，中间没有独立的，没有亦此亦彼的情况。

下面讲进化论。

除了归纳一些表面的特征之外，还要用脑筋思考，用理论说明。这个东西靠归纳法不能说明，有些需要用演绎来说明，用血缘关系来说明不同物质之间的联系。所以一切种属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不会向归纳法让步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新版 205—206 页）。相对性就是有条件的同一性。把归纳的结果看成是绝对统一的思想，是不对的。

再下一段（第 189 页，新版第 206 页），恩格斯讲归纳万能论者。

我们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这种人？现在也有。赫鲁晓夫跑到美国，看到美国的玉米很好，回到苏联就大种玉米，这也是归纳万能论者。如果苏联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条件和美国一样也可以，问题是有条件的，随便拿到苏联用是不对的。

“……世界上的任何归纳法都永远不会帮助我们吧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作到这点。”这句话很重要。

辩证法怎么看归纳法？辩证法看归纳法和归纳万能论者不同，赫克尔是表面上看归纳法。我们讲归纳法的意思也可能是他们的归纳法，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讲归纳法是包含分析的，这个分析就不是一个一个的看表面现象，要把认识过程所发现的问题加以分析，这里就用分析矛盾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进行这种分析，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归纳法本身也包含着演绎的因素。而赫鲁晓夫的归纳法就一点分析也没有，他就是从表面上看现象，做结论。玉米虽然有高产的优越性，但是这个高产的优越性在什么条件下表现出来，在什么条件下表现不出来，这种矛盾他不去研究。一般地讲，归纳中就有分析，演绎是把普遍和个别联系起来，就是综合。实际上，归纳也是综合，经过一个过程，把普遍和个别联系起来。

“我们不应当在两者之中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高高地抬上天去，我们应当力求在其适当的地位来应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而要想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这是恩格斯的结论。

下面是举一个例子讲纯粹归纳法不对，意思和前面一样，所以不作解释了。

第 190 页(新版第 206 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是讲赫克尔虽然是提倡归纳法的，但实际上他也懂得进化论，所以，他的实际研究已经超出了归纳法。

“……假如归纳法果真是不会错误的，那末有机界的分类中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们是归纳法最独有的产物，然而它们却互相消灭着。”

过去的归纳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现成的，达尔文运用归纳法推翻了过去的结论。这个意思就是说归纳的结果是互相消灭、互相冲突的。赫鲁晓夫用归纳法归纳出一个大量开荒，后来又用归纳法归纳出开荒可以不搞了，其实这个思想实质不是归纳法。前后矛盾是因为客观事物有矛盾，要正确地分析这个矛盾，就不会有前后矛盾的问题了。所以单纯地用归纳法是不可靠的。

下面还有一段再讲一下。

“归纳和分析”。这段(新版第 206—207 页)和前一段相呼应。对归纳的过程要很好的了解，要分析，这段也是讲归纳本身最高的、更高的方法要靠分析。

“……在热力学中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证明归纳法之妄图作科学发现的惟一的或甚至占统治地位的形态的想法是如何地没有根据。”他下面举了蒸汽机的例子：“从热当中能够得出机械运动，这点已由蒸汽机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更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它们只是愈来愈逼迫物理学家们必须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思想和毛主席所讲的“解剖麻雀”一样，只要研究一只麻雀就能了解几万只麻雀。这种分析研究下面还讲到一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点。这种采取典型研究的特点，不能纯粹靠表面观察，而要靠脑子思维。

这里举了卡尔诺研究蒸汽机，不是研究蒸汽机表面形态，而是发现了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辅助过程所掩盖住了。所以，仅仅靠表面观察对蒸汽机的了解，就不那么清楚了，特别是对它的根本规律的了解不清楚，因为那个规律受其他影响，不纯粹。因此，卡尔诺就设想一种纯粹的蒸汽机。这个抽象的思想也是根据观察得来的，但是他又超过了表面观察。因为他先经过观察发现蒸汽机不纯粹，因此他就用思维设想一个纯粹的蒸汽机，这样就找到了蒸汽机的根本规律，就和马克思

写《资本论》一样，他用英国这个具体国家作典型，他也观察、也归纳，但是观察的结果，又把英国资本主义里面的复杂因素撇开了。英国资本主义里面有封建残余，这个封建残余有些什么作用？对英国资本主义有许多作用，这个作用在《资本论》里面一句也没有讲，只讲英国资本主义的那一方面。这样他就能抓住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真正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能适应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适用别的国家时，又要根据具体情况，但是这个根本规律是有效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这样的理论，都是研究最根本的东西的。这种最根本的东西不是完全靠观察，要以观察为基础，经过抽象，把最纯粹的东西在脑子里加以考虑，然后得出规律。毛主席在观察抗日战争开始一年多的情况以后就写《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里面不讲很多复杂的东西，不讲很多具体现象，只讲抗日战争的基本矛盾关系，敌我关系，撇开暂时的因素。就是一般设想，敌人有四个特点、三个缺点、一个优点，我们也有四个特点，而是三个优点、一个弱点，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对立面。两方面都有特点，这种特点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候会起什么作用？因为敌人有三个弱点，所以他想把我们灭亡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弱点，我们想很快把他们打败也不行。所以，既不是亡国论，也不是速胜论，这个战争是持久战。8年抗战只经过一年，根据以观察为基础得来的材料，经过抽象分析（就是矛盾的分析），就把矛盾分析清楚了，就可以预见8年以后7年的规律，不但知道持久战，而且知道持久战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怎么样。这个辩证逻辑靠什么方法？只靠归纳法行不行？全世界只有一个抗日战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而且抗日战争只出现了一年，用归纳法没有办法归纳。所以只能用辩证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里面有归纳法，就是归纳过去的战争经验。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战争能胜利，因为已经有了10年内战的经验，证明人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指挥得好，就能胜利。这里有归纳也有演绎，把过去10年的经验归纳了，用这种经验对矛盾进行分析，结果就能准确地估计8年抗战的前途，把规律搞清楚了。

到了这段，恩格斯就把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真正科学归纳和演绎的辩证逻辑说清楚了。马克思的方法既要归纳，也要演绎，但是主要的不是简单的依靠归纳和演绎，主要的是对事物内部矛盾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不是表面观察，是用自己的思想把最根本的东西把握住，这就是理性认识。认识要到这样的程度，才能真正实现飞跃，归纳就不可能由感性到理性。单单归纳不能实现，单单演绎也不能实现，演绎只能把先前的经验拿来运用，却不能把我

们今天所碰到的新的矛盾和规律加以掌握。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是矛盾和观察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为基础，也运用归纳法，也运用演绎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推理逻辑不是简单的归纳，也不是简单的演绎，而主要的是把矛盾加以分析。分析的结果正确不正确，也不能用归纳和演绎来证明，而要靠实践证明。

第 191 页(新版第 207 页)还有短短的一段，就是讲这个问题。“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于人类活动中，在实践中，在劳动中……”这一段是两句话，这样造成一种结果，就可以肯定实践的结果是正确的。

这几段的中心意思就是这样。

下面一段是讲归纳法可以对必然性提供材料，但是不能全部证明必然性。经过动物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材料：哺乳动物都有颞间骨，但是不能证明任何哺乳动物都有颞间骨，也不能证明为什么它会这样。所以对人的认识必然性的证明，主要靠实践。

下面都是说明这个问题，证明必然性，证明真理主要依靠实践，实践可以证明真理，也可以证明错误。这一段用因果性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各个物体的个别运动的相互间的联系，它们相互间的制约。”相互间的联系和相互间的制约还不是因果性，因为因果性只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不仅看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看到：只要我们造成某一特定的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一特定的运动；甚至我们还能产生在自然界中完全不会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运动；我们能预先规定这些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性观念的基础，而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因果性观念说明不仅反映，而且是反映人的活动，这种联系要经过人的活动，经过实践，才能在我们思想上一致起来。所以，这里说人的活动建立了因果性观念的基础。就是说，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因果关系。

“……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例如，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 *posthoc* (在这以后) 决不能确立 *propter,hco* (由于这)。”

休谟是主观唯心主义，又叫怀疑论，他最主要的思想是关于研究因果关系的思想。在哲学上，一个时期他的直接活动就是对因果关系怀疑，这在 18 世纪初期也就等于怀疑科学。所以这种思想是反科学的，他认为科学规律是不可靠的，科学规律、科学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能反映世界的事物本来规律性，这是不可知的，是值得怀疑的，是不能证明的，是另一种现象，是人类感觉现象和出现的事物经过几次反复，在感觉上给我们多次反复，我们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实际上，这仅仅是我们感觉上感到它先后继续出现，至于它本身是不是真正有现象和联系，这是不能证明的，这只是表面感觉而已，因此因果关系是不可靠的，这个规律没有必然性。休谟是 18 世纪初的英国哲学家，在贝克莱以后，休谟比贝克莱的反动性稍微轻一点，因为贝克莱直接否认物质的存在，肯定上帝的存在。而休谟讲：我们既不能肯定物质的存在，也不能肯定上帝的存在，所以是怀疑论，这就是不可知论。有没有物质？是不可知的。有没有上帝？也是不可知的。所以，恩格斯讲：不可知论有时动摇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有时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有时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他根本否认必然性，是经验主义，认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规律。因果规律无非是感觉的先后联系，先后出现两种感觉，经过几次重复，人就认为有因果关系，不承认那些必然性。恩格斯在这里特别举出他来，因为他的哲学最起作用的一个论点，就是对因果规律否定，就是反对因果规律。

恩格斯讲：19 世纪末期的赫胥黎也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他有点特殊性，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是进化论者，是为达尔文辩护很有名的人。他相信进化论的规律有必然性，但是他的怀疑论在于这个必然性是由物质来的，或者是由上帝来的，这是不可知的，所以他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但是在事实上还是不能不承认唯物主义的一些原则。对于科学规律有客观必然性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客观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就不敢明确主张了。休谟根本否认客观必然性，一切规律他都认为是感觉的一种重复，感觉的先后联系，不是客观事物的联系，而是感觉上的联系。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怀疑论(休谟的观点)的一点道理，他认为休谟反对因果规律是错误的，但是他反对因果规律所提出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恩格斯还是肯定了他的这一点。实际上休谟讲的只是经验的一个特点，就是个别经验的观察不能证明因果性，这是暴露了人的纯粹经验观察的弱点，不能证明必然性。休谟把这个弱点夸大了，好像人除了经验观察以外，就没有别的能力。因此就走到怀疑论去，走到主观唯心主义。我们要驳倒怀疑主义是有办法的。我们虽然不能

证明必然性，虽然就总的来说，休谟是对的，可是他还不懂得人类除了经验以外，还有自己的实践，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造成自然界所没有的不会发生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证明因果关系。

“但是人类的活动却造成了对因果性的检证。如果我们用凸透镜把太阳光恰恰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火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雷管、炸药和子弹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已往经验所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化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力。在这里怀疑论者也就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有了这个实践，休谟的怀疑论就站不住脚了。

“……不过有时候在事实上并不发生恰恰同样的情形，雷管或火药不起作用，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些事实恰恰就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于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引火物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做了双重的检证。”

经验的观察就不能证明因果性的必然性，实践就能证明。用经验观察的那种感觉，先后连续出现，尽管出现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的因果性关系。但是人的实践就不同了，人的实践就能证明因果的必然性，实践能出现预期的结果，就能证明因果性。不能出现也能证明，就说明有另外的原因。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纯粹凭经验观察来判断的，我们也用经验来观察，但是主要的不依靠经验来观察，主要是依靠通过实践，对实践进行分析，对实践中的矛盾进行分析、归纳，经验观察是敲门砖。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讲，现象是我们观察事物的向导。只靠经验观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维。”这是指赫克尔等人，以后列宁批判受唯心主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一样。现在马赫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影响，所以，现代自然科学家还有这个问题。

“但是人的思维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这段话很重要，也是《实践论》的证据。

“……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雷拍和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就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因此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这些科学家也不是根本否认人能制造工具，人能制造机器，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能反映自然，这种能力对人的认识的作用。这里讲的都是认识论，不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如果讲一般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那么，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都不会否认人能认识自然，人能制造工具，来改变自然界。你说自然科学家否认人能改变自然，也不是。因为他的确相信人能制造工具，制造机器改变自然。离开认识论，单个地讲人能不能制造工具改变自然界，任何自然科学家都能承认。问题是这里讲的是在认识论上，自然科学家一般的都承认了，至少是不注意人能反作用于自然界，人能改变自然。人的认识直接决定于自然界，还是主要决定于人对自然界的改变？就认识论来说，人的认识的发展，主要还决定于人改变自然界的活动的发展，而这些自然主义历史观的人，以及赫克尔这些人认为，人的认识就是简单的由自然反映到人的认识，就是简单的经验观察，不知道人的认识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去认识的。在认识论、反映论里面，自然界反映到人的认识里面，和人作用于自然界相互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人所以认识自然界，主要是人改变了自然界，人不改变自然界，人的实践根本没有接触自然界，人一般的不能认识自然界。生产越发展，接触自然界的范围越广，人的认识领域也越广。人所以认识自然界，基本上是人改变了自然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点我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修正主义对这点做了很大的歪曲，利用对这个看法的歪曲，曲解成唯心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有这种情况。

我们要认识自然界，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改变自然界，在马克思他们的早期著作里面讲这个道理讲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自然界是人改变了的自然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在《哲学·经济学手稿》里使用了这些话)。这些话被现代修正主义曲解了。马克思讲这些话是就认识论范围内讲的。现代修正主义把他夸大了，就脱离了认识论，而一般地讲自然界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进而人也是自然化了的人。那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结果整个宇宙和人分不开，马克思是在认识论范围内讲自然是人改变了的自然。而修正主义指的是整个的自然界都是人化了的自然界，人也是自然化了的人，结果就和主观唯心主义搞在一起了，人和自然分不开，离开了人就没有自然了。人和自

然是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是因果关系，主观和客观就变成原则同格了。主观不能离开客观而存在，客观也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这样一来，列宁所讲的，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这样一个定义就取消了。

下面讲第 192 页(新版第 209 页)“相互作用—这是我们从近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第一个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态：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如果现在姑且把有机的生命除外，—这一切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而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的总和在其一切变化着的形态中始终是不变的。”

这是讲整个宇宙是一切事物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总体。“运动的总和在其一切变化着的形态中始终是不变的。”这句话要注意，在整个运动中，一切变化形态是不变的，物质是无限的，在自然科学上叫能量守恒原则。宇宙，事物是变化的，但是运动的质量是不变的。这不是否认发展，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整个物质就是这个物质，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只讲它综合不变，这个综合实际上是物质的综合。如果说宇宙的东西可以增加，谁来增加？就有这个问题。如果说可以减少，可以消灭，谁去减少？谁去消灭？如果有这种思想，就要请上帝帮忙，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或者是本来有的东西，把它消灭了。一种具体的东西消灭了是可以的，可是消灭并不是绝对的消灭，消灭实际上是转化，消灭是有消灭，有不消灭，消灭只是一个方面。资本主义要消灭，但资本主义的消灭并不是绝对消灭。资本主义自己消灭了，同时它又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这个创造是物质自己的创造，是一方面消灭，一方面又创造。消灭了一个东西，又创造了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没有消灭，就具体的东西来说又消灭又创造。这句话的意思就要按照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原因自身)”，就是宇宙本身，没有宇宙以外的原因，物质变物质，就是一种物质消灭了，另一种物质产生了，并不是物质以外的力量来创造它，它自己消灭，又自己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整个宇宙就只有物质。唯物主义一定要承认这点，宇宙就是物质的宇宙，这个物质的宇宙在总体上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一切创造、消灭都是物质自己内部的运动，如果否认这点，就是否认唯物主义。所以，整个宇宙就只有一切事物相互作用的总体，这个总体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一切变化现象都在实体自己内部。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他的话是正确的。

下面，“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causafinalis(究极原因)。”最后的原因,部分的原因,可以说某一件事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是相互作用。

“……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正是在它背后恰好再没有什么要去认识的东西了。”除了相互作用，再认识更深的的原因，就不能认识了，再追究就变成神秘主义了。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有很多东西是唯物主义的。这句话就完全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打破了他的唯心主义原则。

“……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运动形态(因为自然科学存在并不久，所以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也就认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恩格斯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

“……(格罗沃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有了要点，但没有把它用抽象的思维形式表达出来，所以他便弄糊涂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个别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个别的现象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更替着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下面，“对于否认因果关系的人，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不能比这更进一步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这就是不可知论，还是休谟的观点，他认为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因此他认为自然规律都是假说。因为人有些感觉先后连续出现，而且重复多少次，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人们就叫因果关系。

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都不承认科学规律是客观真理。实用主义也是这样，而实用主义更露骨一点，更资产阶级化，就是一切所谓真理都是由我假设，对我有用就是真理，对我没有用就不是真理。因此，真理的思想，甚至科学都是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

第 193 页(新版第 210 页)讲到的耐格里，也是当时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归纳万能论者，所以，他不相信人能认识无限，只相信人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整个是接近不可知论的，怀疑人的认识科学的能力，怀疑人的认识的客观性，或者至少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人有无限的认识客观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怀疑唯物主义。

“耐格里首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跟着又说这类‘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只讲矛盾。一方面是不可知论，另一方面自己又要设想认识自己制造什么东西。自然界没有绝对质的差别，这是正确的，可是他又说不能认识。这种经验主义者的思想很混乱，他又反对唯物主义，表面上跟着唯心主义者，但是又偷偷的承认唯物主义。这种人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这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有点区别。自然科学的不可知论不完全是唯心主义，它是羞羞答答的，偷偷摸摸的，也讲点唯物主义。

第三次讲解

(1964.3.6)

3.关于认识论问题

下面第 193 页(新版第 210 页)是恩格斯自己的意见，他主要是反驳耐格里所讲的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的问题。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并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是可衡量而又可认识的。”

“第二，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

这句话里面讲的质是不存在的，脱离了物的质是不存在的，因

为没有抽象的离开物的质，实际存在的质是物，而这个物是具有无限多的质。这个“无限多的质”这句话需要注意一下，恩格斯讲的所谓物的质是有无限多的，这个无限多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物就有无限多的质，物有多种多样。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有一种事物也可能有无限多的质，不是一个物只有一个质。

我们一些学校讲哲学的同志是不是这样的看法：一种物只有一种质。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质，但是这个统一物包含着的质可以从各方面来看。从前我们讲哲学的时候，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讲量变到质变的时候，举这样的例子，水变汽到摄氏 100°C就沸腾了，就是质变。有人就反对。这个例子恩格斯讲过，黑格尔也讲过。他们为什么反对呢？他的理由是这样，他说，水到了一百度沸腾，只是沸腾而已，水并没有变化，他认为水的质就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化合成的，沸腾也好，不沸腾也

好，质是不变的。这样的想法是不了解它的质是多方面的。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百度沸腾就变质，这个质是物理质，他用来反驳的理由是化学上的质。

人的质，就有社会质，也有生物的质，人又是社会的一种事物，但是又和一种生物、自然界动物一样，人有两种质。当然最主要的质叫本质，还是社会的东西，就是说把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要跟动物加以区别，主要的在社会关系。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差别，主要的是社会性，所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人也是一种哺乳动物。不过这个质不是主要的，不是指和其他动物区别的本质。或者本质是指一个物质表现为他自己的主要特点，这种质是他的本质，所以本质还是质，一种物可以有多种质。如果一个生物学家看人，就把人看成一个动物，比如巴甫洛夫研究人的脑神经的时候，也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的关系。但是这种研究着重生理关系，当做自然关系来研究。如果是化学家，可以研究人身上的化学变化。物理学家可以研究人身上的物理质。一个物包含各种各样的质，越高级的物包含的质越多，其中有一个是他的本质。

这个思想和毛主席的总的质和部分的质这个思想是一致的。总的质没有变化，但是部分的质变化了，如从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总的都是共产主义，但是它有各个阶段，这些阶段里面还有小的阶段，所以，许多独立的阶段就表现为部分的质，有许多不同，部分的质来源于部分的矛盾，总的质来源于总的矛盾，即最根本的矛盾。这句话很有意思。

“……两种不同的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其他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而另外还有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之一所完全缺乏的。如果我们分别拿两种极端相异的物——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那么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不过是两者都有重量和其他共同的物体属性。但是在这两种物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的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它们容许我们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填补起来，并指出每一物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因而可以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第194页,新版第210—211页)

人和陨石为什么共同点不同，要从进化论上来看，因为人是物质发展到最高级的物质，而陨石是比较最低级的矿物质。很高级的和很低级的距离很大，所以共同点很少。从最低到最高的质，还有一系列的等级可以填补。两种相近的物质，共同点就多一些，比如陨石和泥土比起来，它的系列有共同点，都是矿物，都有重量，甚至有些化学成分还是一样的。在这里恩格斯讲

物质的差别是不能按照归纳法的办法并列起来分类的，由进化发展系统，由低级到高级排列。19世纪以前，对物质的分类往往是并列的，19世纪有了进化论，完全按照发展正确来分类。

第二条中说明差别中有共同点，绝对差别是不存在的，但是差别还是可以认识的。

第194页(新版第211页)“第三，我们各种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这是讲我们主观的感觉可以感到不同的质。

“……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经验到的属性，因而会是绝对不同的。”

只讲物质本身的质，属性是讲我们感觉到的，是物质本身的表现，和别的事物接触以后表现出来的特性。比如光波和我们的眼睛接触以后，常常产生颜色的属性，属性是一个事物的质和外界事物接触以后表现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它本身的质表现在外部。所以，由于感官的不同，我们所感觉到的属性也不同，一个事物的属性有各种各样，我们不同的感官可以从各方面感觉到。这里要和主观唯心主义区别，主观唯心主义认为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是惟一的存在，唯物主义认为我们感觉到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在这里这些差异随着研究的进步而消灭。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两种相近的同类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类的。视觉和听觉两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

这也是说明进一步研究各种属性，绝对差别就消灭了。这条所讲的和上条讲的不同，上条是讲客观事物的绝对差别是不存在的，这里是讲主观上所感觉到的事物属性也不是绝对有差别，表面上看起来有绝对差别，进一步研究绝对差别就会逐渐消灭。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这个问题有时会产生错觉，比如雕刻一个人的身体，本来石头硬得很，但是因为雕刻得很好，用手去摸会感到很软。寒假我到西安去参观，看到一个白玉少女像，雕得很好，不用手摸，一看就感到很美、很软，这是艺术家的表现。

“……最后，总是同一个‘我’，接受许多相异的感性印象并且改造它们，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而另一方面，这些相异的印象是由同一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一般属性，因而就使我们可能认识它。”

我们利用五官感觉到各方面的属性，我们不是把各种属性孤立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而这种一般的属性就包含各方面的属性。化学上最常用这个办法，比如金子有什么一般的属性？它的重量比一般的金属都重（除了白金以外），它的熔点很高，不容易熔化。但是我们确定各种属性并不是分类；而多半是通过各种属性综合起来。你看到一种属性就不能确定某一种事物是什么东西，如果说银子是白的，这可以，如果说白的是银子就错了，因为锡也是白的。必须把两种物质的属性加以区别。

哲学上的规律就是通过属性来规定的，有时也叫特点。某一种东西是什么性质？怎么确定？就是要看它有几种特点。斯大林说辩证法有四个特点，有些人攻击斯大林，为什么讲辩证法有四个特点，不讲三个规律？认为斯大林讲的特点依据不完全，比如发展的曲折性，否定之否定规律没有规定。批评他不重视否定之否定这是对的，但是批评他讲辩证法不讲三个规律是不对的。辩证法可以讲三个规律，但是对特点只有一个总的概念，所以，讲四个特点也不是不可以的。

现在苏联攻击斯大林是抓辫子，但是这个辫子也没有抓住。比如说斯大林不注意实践，实际上斯大林讲辩证法的每条都讲实际意义，怎么说不注意实践呢？说现在的教科书不注意实践倒是真的。斯大林的教科书的缺点不在这个地方，缺点就是辩证法不够，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主要还是这些根本问题，并不是枝枝节节的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说斯大林把理论和方法分开了，辩证法是方法，唯物主义是理论。这种批评也没有多少道理，因为也可以这样分，并且斯大林也不是这样机械的。他一开始有句总结的话：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他总的指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都是世界观。然后再讲理论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方法，这和毛主席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现在苏联和法国都有些人攻击斯大林这些观点，但都是攻击的没有道理。

“……说明这些只由不同的感官才能接受的不同的属性，确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有一个总的感官，或者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气味和滋味。”

科学研究就是把这些特点联系起来，把各种特点指出联系起来，这就是一种科学。所以斯大林的提法也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下面一段：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样‘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关于这些领域人们告诉我们说，它们是不可理解的。全部的混乱是发生于关于质和量的问题上的混乱。根据盛行的机械观，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在别处还有说明的必要)；质和量在他看来是绝对不同的两个范畴。形而上学。”

耐格里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观点，他为什么要讲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又说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呢？这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可是他所以要讲这两句话的目的，是为了要否认这个差异，或者是把这个差异简单归纳为量的不同。因为量的差异，量的多少取决于质的差异，混淆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实际上，他不相信事物有质的差异，他所以不相信是因为他不了解绝对差异不存在是什么意思。他把绝对差异不存在这种客观事实，解释为差异不存在，差异不可认识，质的差异都是量的差异。

第 195 页(新版第 211 页)“‘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有限的东西等等。’只要在我们的认识范围内碰到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

认识要从无限当中看到有限，要从偶然现象当中看到普遍规律，看到普遍规律才能算作认识，因此说明我们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它有普遍性，所以叫无限的。

下面就是解释：

“……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完全在于我们在思维中能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一般；完全在于能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

这段话就是说，真正的认识一个东西，不是看到一个感觉现象就认识了，而是要认识它的本质，认识一般性。把个别的东西集中起来，集中成一般的。从物质到精神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观察中研究它的特性，然后集中成为一般的东西，这样就完成了由物质到精神，完成了这个集中。反过来就可以指导工作，就可以由精神到物质，进一步创造新的物质。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认识论的观点。不懂辩证法的人，看到只

有这点点红色，就觉得完了，但是懂得辩证法的人，看到这个问题就感到这是特点，这里有个方向问题，这样就坚定起来，就是要搞红色小点，革命就是要从这些根据地搞起，就是要在农村搞起。我们要学习这种方法，注意发展新的个别的东西，研究它的特点，然后从这里归纳一般的方向。

“……然而一般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的形式；它是把许许多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

恩格斯在下面举了例子：

“……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气体氯化氢；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了上述的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这件事情，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千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一般的形式便是规律，而对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

凡是规律总是一般的东西，这里要注意由个别到特殊到一般这个规律，个别经过特殊，才能真正指导一般。在观察个别东西的时候，还要研究某些特殊条件，条件弄清楚了，然后才能抓着一般性。经验主义就做不到这点。上一段恩格斯反对经验主义，就是批评这点，马克思主义不只依靠表面现象观察，不是搞个别归纳，而是先研究特殊性，然后再上升到一般。赫鲁晓夫在美国参观玉米，就没有上升到一般，他只是表面上看美国种玉米好，能高产，他没有研究美国种玉米有什么条件，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玉米高产的规律，机械地拿到苏联去种，结果就失败，没有找到规律。现在对化肥也是这样，以为把化肥一撒下去，植物就长起来了，不知道用化肥还要有一些特殊条件，把这个规律掌握了，才能用化肥高产。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认识规律是普遍的，是永恒的，又是无限的，但同时又是有条件的。从普遍的无限的这方面来看，它是有条件的，只要有这个条件，哪个地球上都能出现这个事情，这是绝对的，但是一定要有条件，所以它又有相对性。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永恒性，他所以讲永恒性是反驳耐格里。在《反杜林论》里，他又否认永恒真理，因为杜林片面地讲永恒真理，杜林只讲绝对的一面，而恩格斯就讲相对的一面。耐格里片面地讲相对的一面，恩格斯就强调绝对的一面。因为真理是有相对和绝对的，这里帮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怎样阐明这些理论，怎样反驳错误的片面的理论。

“……因此，当耐格里说如果人们不限于只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把永恒的东西和它搅在一起就会把有限的东西弄成不可理解的东西的时候，他不是否认了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便是否认了它们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是绝对的。”

有些人说，恩格斯没有讲过真理是绝对的，这种提法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驳倒了。为什么有这种提法呢？因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只讲到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些人不注意《自然辩证法》，就认为列宁的意见和恩格斯的意见不一致。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困难。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只是由有限物所组成，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的头脑所组成，而人的头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代跟一代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犯实际的和理论的错误，从歪曲的、片面的、谬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确定的途径进行，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里斯特利)。”

这段话是说，认识绝对的东西是有困难的，有时要许多人花脑子才能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这段话大家可以联系毛主席讲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飞跃。我们可以认识绝对的东西，但这不是容易的，是有困难的，要经过许多反复，中间要犯错误，要通过克服错误的过程，通过各种认识上走弯路的过程。

绝对认识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认识了一般的规律，就算是认识到绝对的东西。这个意思是一个比较有限的条件下认识。只要认识到氢和氯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为气体氯化氢。认识了这一个条件就有这个结果，就算是认识了一个永恒的东西了。就这一个有限的规律本身来说，已经是认识它的永恒性了。但是这个认识可能还是有限的，这只是认识了氯和氢的关系的一部分，氯和氢除了这个规律以外还有其他关系，氯和氢碰到一起燃烧起来，化合起来就是盐酸。我们只了解爆炸这件事情还不等于认识氯和氢还有其他作用，爆炸以后会变成什么东西，不知道，还有其他方面的规律，我们还不认识。你要认识其他方面的规律，又得花力气来研究。所以，虽然找到一种一般的规律，虽然有点普遍性，但是这个普遍性只是真理的一小部分，还不是全部，因此还是没有绝对性。就总的来说还没有绝对性，因此，这个认识

还是有限的，还是相对的。就是说只认识这个问题，这个认识还是受研究条件的限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绝对性认识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事物各方面的规律充分的认识。全面的认识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绝对性的认识不是一、两个人的认识，甚至不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认识，甚至于几万人、几十万人也认识不了。事物的规律可以是无限的。我们是不是把社会经济的规律绝对的、全部的认识了，还没有。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经济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认识。就是现在，也是大体上估计一下，还很不完全，到了共产主义，还要具体的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认识，因为共产主义还要发展，社会经济永远还要发展。因此对社会经济里面所包含的规律可以是无限的，我们要认识它就要经过无限的认识过程。所以这种绝对认识就是一种真正的无限认识，就是说，这种绝对性本身是无限的，人的认识也是没有完的，只有经过无限的认识发展过程逐渐接近它。恩格斯的这段话就是讲这种无限是要经过世世代代人的努力逐渐增加的，而在这个努力中还要走弯路。某一方面的规律经过曲折、经过错误认识清楚了，又有另一方面的东西我们还不认识，又要经过曲折、经过错误才能认识。所以，这个无限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认识过程。

相对、绝对的统一，有两种意思：

一个意思是，每一种规律本身就是相对、绝对的统一。每一种规律都是有条件的起作用，只要有这个条件，不管在哪里都起作用，这是绝对的；但是，它要起作用一定要有条件，这又是相对的。这就是又绝对又相对的道理。对一个真理比较容易认识，一个人经过若干次摸索，经过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若干次反复就认识了。

另一个意思是，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每一个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这个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就是讲宇宙的绝对发展过程是无限的，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也是无限的。

下面是讲第二种绝对和相对的意思。

“……因此，对无限的东西之认识是被双重困难所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讲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进的过程中实现。这已经足够使我们敢于说：无限的东西可以认识，正如不可以认识一样，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者就需要这样看，只说无限的东西是不能认识的不对，但是说无限的东西是可以认识的也不对。

“耐格里却可笑地说着同样的话：‘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們也能认识在我们感性知觉范围内的一切有限的东西。’我们感性知觉范围内的有限东西在总和中就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根据这个总和构成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有限的东西等等，他就没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任何观念了。”

无限就是有限的总体，这里说明耐格里不懂辩证法，结果自相矛盾，还是受辩证法支配。

“在这无限性研究面前有下列几点：

(一)空间和时间上的‘细小领域’。

(二)‘感觉器官之大概不完备的发展’。

(三)‘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变动的、暂时的、以及程度上不同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转用到自然物上，只能用衡量它们本身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对于无限的或永恒的东西，对于经常的和稳定的东西，对于绝对的差异，我们是一点观念也没有的。我们准确地知道一点钟、一米、一千克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东西’。”

这三段话还是这样一个意思，耐格里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说只能认识有限，不能认识无限。时间和空间这些最细小的领域我们不能认识；感觉器官不完备，所以不能认识无限，我们认识事物只能用有限的来衡量它，不能设想无限的尺度。所以，他说我们只能准确地知道一点钟、一米、一千克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东西。不是具体的有限，在感觉上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我们就不认识，一般的时间、空间、具体的一米、一点钟我们可以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抽象和具体的问题，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问题。耐格里还是经验论者，他认为我们感觉上能感觉到的东西就能认识。至于抽象的东西，理性所设想的东西，我们不能认识。他是这种观点，就是否认理性的实在性，把无限的东西和理性上抽象的把握的东西混在一起。

下面恩格斯就反驳了。

“这是老生常谈。首先人们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它们，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

时间、空间本来是脑子里抽象出来的东西，只能用思考去理解，不能用感觉去理解。

“……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他所习惯的经验的认识之中，以致他以为他在研究抽象的时候自己还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之中。”

理性认识是一种感性认识的飞跃，是质变。具体的东西可以用感觉来认识，抽象的东西只能用思考才能认识。我们研究这段的时候，可以参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一节中提到的，我们有些问题不能凭感觉，要用脑子去想才能了解，有些事情直接看不到，要用脑子去想才能想到。你要用眼睛去看资产阶级的性质、根本特点行不行呢？比如肯尼迪是帝国主义的头子，他就代表帝国主义的本质。你能不能从肯尼迪的脸上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呢？他的脸和其他人的脸一样，所以必须根据他所作的具体事情概括起来，然后给他一个概念，叫帝国主义本质。

这段总的来讲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驳耐格里的荒谬。他要想看抽象的时间、空间、力和物质，抽象的运动，这些东西当然看不到。

“……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是其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小时的总和，空间是其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立方米的总和！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假若没有物质当然都是无，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然而确实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还没有任何人以其他的某种感性方式看到或体验到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人们所碰到的只是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实物、物质无非是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本身无非是一切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态的总和；像‘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种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只有研究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且因为我们认识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

这里是讲抽象的东西不能离开具体的东西，一方面不能希望直接去感觉到抽象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要了解抽象的东西，就一定要以具体的东西作基础，从具体的东西里面概括出来。你只要把具体的东西一个一个地研究清楚了，把它的重点研究清楚了，一般的東西就搞清楚了。

“……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仅仅是说我们首先凭借自己的头脑从现实世界制造了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一切认识都是由感性来测量的！”

这是耐格里的经验主义的看法，他就不知道还要用理解来概括。

“……这正是黑格尔所指出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却不能吃果子，因为没有任何人吃过果子本身。”

经验主义就是这样，要吃果子就是这样荒谬。我们平常也有这种人，他只相信他直接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就不相信。赫鲁晓夫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理论，他只相信胃的感觉。什么叫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桌子上、盘子里多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离开了黄油、面包、土豆、牛肉，共产主义就不能理解。修正主义都是由经验中来的。

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就是经验论。我们去年、前年讲大好形势，资产阶级就不相信，有些半信半疑，有些人不相信不敢说，有些人就说出来了。我们说我们不孤立，他们说我们孤立了，从现象上看是孤立，我们说不孤立是从理性来的，资产阶级不相信理性。现在有些资产阶级也相信了，为什么相信了呢？因为他看到周总理出去有那么多人欢迎。外国有个文学界的人，就认为中国孤立，要垮台，一直到今年才相信。他说：为什么中国的石油自给自足，为什么周总理到非洲去飞机场会上会受到那么多人欢迎？他现在还是不理解，还是凭感觉看问题。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他认为都是例外。多少有点理论就不会认为是例外了。

“如果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大概有许许多多我们感官所不能感知的运动形态，那么这只是一种可怜的遁辞而已，它就等于——至少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否认运动是不可创造的这个定律。

要知道，这些不可感知的运动形态是可以转化成我们所能感知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不难说明了。”

这段是耐格里认为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他认为我们的感觉器官不完备。恩格斯讲自然科学家抱怨自己有五个感觉器官，耐格里就抱怨因为感觉不到，因此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们不能认识，抽象的东西不能认识，还有许多具体的东西也不能认识，只要我们感觉器官感觉不到的，就不能认识。恩格斯指出这是遁辞，有些理由他回避了。所谓的理由，就是下面恩格斯讲的，说我们的感觉器官虽然有限，但是不完全限制我们的认识，

我们还是可以认识的。电子里面小的东西怎么能认识呢?实际上,现在的电子也可以听到,现在研究电子有一种计数管,电子在里面能起作用。电子通过一下就发生爆炸,这些爆炸就可以发生声音。所以,爆炸一下就知道有一个电子通过。而且还可以看到,现在的电视就是物理电子冲击到荧光板上,本来是没有光的,但是冲击到上面就有光。因此就有一种仪器,有一个电子接触到荧光板上,就亮一下,每一个电子通过都可以看到。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的感觉不能感觉到,这是遁辞。

耐格里否认运动是不可创造的这个定律,实际上,是运动可以转化。运动不可创造,就是一切运动都是有来源的。不是可以主观上去创造,他认为有许多运动形态我们绝对不能感知。这种观点在认识上否认了运动可以转化,否认现在不能感知的运动形态可以变为感知的运动形态,我们能感知的运动形态都是有来源的,都不是随便能创造的。他说:有些运动形态我们能感知,有些就不能感知,感知和不能感知这两种运动形态绝对没有关系。同时又设想我们能感知的运动形态就仅仅跟我们的感官有关系,跟不能感知的运动形态绝对没有联系。这样一来我们的感官也能创造一种运动形态。如果我们的感官存在了,这种运动形态也存在。主要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把运动形态是不可创造的这个定律搞清楚了就能懂,这两个提法是一个意思。

“Advocem (关于)耐格里。无限之不可理解。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存在着的,即是以恶的无限的形式存在着的,而且这样一来……”(第 197 页,新版第 214—215 页)

这段话实际上是解释上面的话,我们讲这个规律的时候,就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存在着的,它本身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谁也不能消灭,谁也不能创造。无限的进步也叫恶的无限,就是说这个无限没有尽头,有时感觉不可理解。对人的思想来说,有点难理解、有点作恶的意思。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了这里所必须理解的一切东西。最多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东西—以大循环的形式—的某种永远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和向上的分支呢?”

就是有进步和退步,最多有这个争论。这两个理解是有机械论和辩证法的分歧,机械论的理解是同一个东西永远重复。真正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也承认物质是无限的存在,但是就是不承认发展,而辩证法就要承认发展,承认有进步、有退步,有向上、有向下。

“”的无限性。”就是没有什么尽头。

“黑格尔已经把真实的无限性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第198页，新版第215页)

这个意思就是说，黑格尔的著作里面对无限性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恶的无限性，另一种无限性是跟有限来的，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有限的。这种问题具体例子可以找，刚才我们讲的一般规律也是无限的，但是它和有限结合，又是有条件的，这是一种真实的无限性。比如数学上的无限大无限小，它也可以有一个范围，它是无限的，但是可以有一个范围。我们上次也举了这个例子，曲线同直线的关系，弧和弦的关系。把弧线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这个缩小可以无限，小到直线和曲线成为一个东西了。无限大也是这样，把曲线或弧线无限放大，结果直线和弧线相等了。在数学上一想起来成为相等了，就同有限相联系。黑格尔叫现实无限性，或者叫真实的无限性，恶的无限性是讲抽象，没有有限范围的那种无限，这样一种无限叫恶的无限性。

这个问题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普通算术的分数，三分之一是一个有限数目，如果用算术计算，得一个什么等数呢？三分之一等于零点三三……这个三就是无限的，怎么也结束不了。这个例子可以了解这个问题。无限是现实无限性，它尽管是无限的，但是它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尽头。

“黑格尔已经把真实的无限性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这是说黑格尔把有限和无限统一起来了。

“……今天整个自然界也都溶解在历史中，并且历史和自然史之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其自身中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恶的无限性——”。自然界和历史要讲它的发展前途永远没有范围，所以这是恶的无限性。

“……这只是被扬弃了的、虽然是本质的、但却不是占优势的因素。”

恶的无限性是被扬弃了的本质，设想自然界和历史只是无限的发展过程，不能设想一个尽头。这个问题虽然本质上是这样，但却不是占优势的因素。在认识的时候只讲恶的无限性，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具体认识问题的时候，还要把无限和有限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认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恶的无限，但是我们研究总有一定的范围，总是把无限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来研究。

“……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的范围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去认识自然界时所用不着的。”

后面讲，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还是地球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这些东西还是以地球为基础，对我们的地球有关系我们才能研究，恶的无限我们可以设想，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还是有限的。所以他说恶的无限被扬弃了，我们也不能否认恶的无限，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具体的东西还是有限的。这段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

“……此外，只有千百万个太阳中的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基础。对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对于有机科学则完全是这样。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无限的多样性和认识自然界却没有本质的损害，类似地、但更大地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狭小的一部分地球，对于历史同样也没有害处。”

“(一)依据黑格尔，无限的过程是一个空漠的荒野，因为它不过是同一物的永远重复：1+1+1 等等。”这个问题实际意义不大，不必深研究。

“(二)然而实际上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是前进或后退，因此它成为运动的必然形态。它决不是无限的，这一点更不必说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预见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是地球也不是全宇宙。”

实际生活中，无限是发展的，但发展有阶段。所以在时间上，它也是在这个阶段来说是有限的，在空间方面来说，有一定范围。我们说要研究有限，都是跟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联系的这种无限，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某一个范围。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发展的，要不是这样，自然界就不会是精神自己的外在了。”

这是讲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是无限的，自然界是不被发展的。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过程是‘精神’的惟一真实的存在形式，虽然他空想地认为这个发展是有终结的——在黑格尔哲学的确立中。”

“(三)也有无限的认识：*questa infinita che le cose non hanno in progresso, la hanno in giro*(事物在前进过程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过程中必定有)。”

这也是从耐格里来的，他本来否认无限认识，但是他说在循环过程中是无限的。

“……这样，运动形态替换的规律是无限的，是自封的。然而这样的无限又感染了有限，只是片段地出现。 $1/r^2$ 也是如此。”

$1/r^2$ 是指的圆周率，圆周率的公式是有限的，但是这个等式一边是有限的，另一边是无限的，无限感染有限。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规律。”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自然规律是一般的变化规律，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它所以能起作用，是表明自然界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像水的沸腾和结冰，要依靠一定的压力和温度。这个规律只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发展阶段，像地球这个阶段，才能表现出来。这是反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是现成的，永远如此，永远不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化论，所以他有这种观点。恩格斯讲：到了 19 世纪中叶的时候，自然的一切规律都表现为历史的规律，不仅仅人类有历史，自然界也有历史，每一个规律都表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规律。

下面都是例子，不念了。

这里有一个名词，倒数五行有个“热之唯动说”，就是说热是由运动产生的，然后向其他能量转化。各种运动形态都能转化，热的形态是由机械运动转化来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这个规律也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规律。

这段的最后两句话：“……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中一个跟一个地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就是说，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态来支配的历史，而且这样一来，只有运动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

就是说，每一种具体运动形态的规律，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真正完全绝对的东西就是运动本身，是没有条件的，具体的运动形态都是有条件的。每一种具体的运动规律，如水变成汽是普遍的，有绝对意义，但还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而运动本身就没有条件，宇宙是永远运动的，这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是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有这种问题：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那么运动本身这件事

是不是有条件?我们搞辩证法的人要回答,就是普遍的运动,总的运动是无条件的,具体的运动是有条件的,可以互相转化。一切都有条件,运动是没有条件的。

下面一段:

“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并且已经很公正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5页)。”(第200页,新版第217页)

古代天文学家认为地球是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那种观点是错误的。哥白尼就反对。现在又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这不是回到以前的观点,不是说地球是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说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研究是以地球为中心,我们的一切研究为地球服务。这不是又回到太阳绕地球,而是说我们的研究目的还是为地球服务。

“……(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着一些小行星而存在着。)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虽然断言这些科学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因而只是相对的,可是它们并不因这种说法而损失什么。如果我们认真地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么我们就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

我们的研究点要有一个中心,现在研究的中心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

下面讲:“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勒保克),但是在对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却比蚂蚁前进得多。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并且作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这个事实就表明了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这里是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可以利用运动的相互转化,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有思考能力。有些运动形态我们的感觉不能接受,如紫外线,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工具设法把它变成感觉能接受的形态。

下面讲:“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关于思维活动的情形也正如关于视力的情形一样。”

所谓思维活动形式也是有限的,但是也不能限制我们的认识。思维活动有抽象性,有时会犯教条主义,抽象的结果错了。它只能概括地了解问题,

不能像感觉器官一样具体地感觉问题。思维有它的缺点，思维里面的东西没有感觉接触的那样生动，那样具体。可是这种缺点对我们的认识没有限制，我们可以把抽象的概念不断地综合起来，又丰富了具体的东西。把一个具体的事物发展过程，扩大到思维中，把握起来，所以思维可以像感觉一样，有缺点，但是不能限制我们的认识，不能说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

“……为了知道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在康德后一百年，企图从理性的批判和从认识工具的研究去确定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第200页，新版第218页)

康德的哲学专门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多少。他有什么原则呢?那是错误的观点，我们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徒劳无益的，正如黑尔姆霍兹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的确是必然的缺陷：能看见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和眼睛的构造(它使目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不能给予完全正确的再现)来证明我们的眼睛对所看见的东西的性质的报告是不正确和不可靠的一样。”

黑尔姆霍兹的认识有缺点，他想证明我们的眼睛有缺陷。我们不需要作这个研究。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的确是必然的缺陷：能看见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什么东西都看到，到处都是亮的，如果我们的眼睛把光线看得跟太阳一样，我们的房子就是一片光，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是辩证法，没有比较就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光明和黑暗的比较，对事物就不能认识。毛主席讲真理是和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错误也看不到真理。不搞百家争鸣，大家把不同的意见比较一下，究竟哪个人是真马克思主义，就看不清楚。赫鲁晓夫就不敢比较，所以他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发表。我们将了一军，他勉强发表，《真理报》印了5万份，只有国外版，没有国内版。所以苏联国内看不到我们的“二十五条”，当然也有看到的，只是很少的。

人的感觉器官有些缺陷，因为它有缺陷倒有好处。认识也是这样，因为它有抽象性，不那么生动，所以避免那些混乱，就可以抓着最本质的东西。善于思考的人和不善于思考的人就有这个区别。所以认识能力，认识器官的有限性，反而是它认识有限的一个条件，没有辩证法观点就不能了解这个问题。

这段以后可以不研究了。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究竟蚂蚁把化学射线看成什么样子。谁要为这件事情苦恼，那我们是一点也不能帮助他。”（第201页，新版第218页）

这就是说，有些缺陷对我们没有什么妨害。

下面这段是讲自然科学的假说问题。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件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就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那种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的新的说明方式了。更进一步的实验材料便会洗清这些假说，取消一些，修正另一些，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纯粹化的定律。如果我们要等待建立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等于说在此以前要停止思想的研究工作，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这段话可以用毛主席的《实践论》作参考。《实践论》也是讲的这个意思：要认识真理，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假说的阶段，不能一下子得到正确的认识。在得到正确的认识以前，先作一个假说，做了假说有什么好处呢？假说就是初步把物质变成精神。但是变的准确不准确还不知道，所以反过来，用假说去指导我们的实践过程，来检验这个假说，有不对的就可以纠正。反复多次就可以最后完成这个正确的认识。这是科学研究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归纳、演绎，是由具体认识到假说，由假说再回到实践，再做出第二个假说。如此反复，最后变成正确的认识，变成真理。这种反复也是对立的，辩证逻辑要和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前面讲的逻辑的那一部分，恩格斯的意思是利用逻辑认识问题，也就是在理论上认识，首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逻辑形式，不要片面地把某一种逻辑形式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那样的看法不对。不管哪种形式都有缺点，归纳逻辑本身不能证明真理，不能证明必然性，演绎逻辑也有限制，它也要有一个大前提，如果大前提是错的，它的结论也会错误。每种逻辑都有缺陷，但是都有用处，都应该使用。不过更根本的方法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对事物的矛盾的分析，对事物的特点的分析。如果善于分析，就用不着一个一个的归纳。你研究一件事情，如果对这件事情分析的好，你也可以得出比较好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对不对？还要经过实践。所以，辩证法对辩证逻辑要求各种形式。着重分析事物的矛盾，事物的特点，把实践当做推理的条件。实践是证明必然性的唯一的标准，运用实践的时候，要对实践的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我们采取的总

的概念就是这样。所以要得到真理，首先要观察一下各种事物，加以分析，得出结论，然后再实践，再观察，这样修正假说，修正几次就得到了真理。

下面：“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观念(哈勒尔和歌德)。”

不懂得辩证法的科学家就有这个问题。

“……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都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这种观点的最后形态就是‘物自体’。”(新版第218—219页)

不可知论就是假说多，假说互相排挤，归纳的结果前后不一样，后面的归纳推翻了前面的归纳，结果就出现了不可知论。认为没有必然性，事物的必然性是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就有这种观点，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假说。这种观点，恩格斯在札记上也提到了：把什么都看成是假说，这种人很浅薄。要经过假说才能得到真理，他就认为不可能得到真理。这种观点的最后形态就是物自体，这是康德的观点。

“……认为我们不能认识物自体的这种论断(黑格尔，《百科全书》，第四十四节)，第一，是离开科学而转到幻想里面去了。”

物自体是幻想，既然说不能认识，为什么你又说有物自体?所以这是幻想。

“……第二，它丝毫没有添加我们的科学知识，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于我们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并且是永远不适用的。抽象地说来，它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且让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像有四条腿，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或是一条也没有’，那么我们对这个动物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如果一个数学家首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知道三角形到底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 2×2 好像等于四，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数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第201—202页)

把这些已经决定的真理看做是不定的真理。

“……但是自然科学家们却小心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物自体这个名词，只有在转到哲学时才允许自己应用它。这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是如

何不严肃地对待它，它本身的价值是如何地微小。如果他们严肃地对待它，那又 a guoi bon（为什么）终归要研究点什么东西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一事实就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下面一段是恩格斯引的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是黑格尔驳康德的物自体的一段话。康德认为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表面现象，都是假象，和现实的东西没有关系。黑格尔就驳他，但因为他不是唯物主义，所以他不能用现实驳，只能用逻辑来驳。他说：康德你说看见的东西是假象，可是你又把物自体包含在假象里面，这是自相矛盾。就是说，一方面认为你的感觉不能认识世界，你又说你的感觉已经认识了世界的一切内容了。黑格尔的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黑格尔说，你一方面认为假象是不存在的，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物自体，可是你又说，存在假象是包含世界的一切，所以是自相矛盾。

“‘……这个内容可以完全没有存在、没有物或物自体作基础；这个内容对于自己始终是它那样；它不过从存在转到假象而已。’”（第 202 页，新版第 220 页）

它本身就是存在，就是假象，所以就没有物自体，假象本身就是客观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话翻成唯物主义的话，归根结底还是承认了假象就是反映了存在，并不是跟存在没有关系。

“……黑格尔在这里比起近代自然科学家来是一个更加坚决得多的唯物论者。”

就这句话来说，他是承认人所以认识现象是存在的反映，这话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

“康德的物自体之有价值的自我批评，（证明了）康德在思维着的‘自我’上面也失败了，在‘自我’中他也找出一个不可认识的物自体（黑格尔，第五卷，第 256 页及以下各页）。”

这段意思，好像在康德写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这个问题。人既不能认识物自体，人就像瞎子一样生活，就生活在自我中。世界上只有我可以看见客观世界，所以，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又讲到，我们虽然不能认识物自体，但是实践理性引导我们和世界的本质得到一致，实践理性能使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实践理性里面包含对上帝的本质一致，一直使得我们能跟世界本质沟通的一致那样。所以他这里讲康德的物自体，有一种自我批评。

第 21 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1964.0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辅导，是艾思奇在 1964 年 3 月间，给中央高级党校“59 班”、“60 班”哲学专业所讲的讲课速记稿，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用的是艾思奇自己的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 年 7 月第 1 版，1961 年 6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研究时，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新译文(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月第 2 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没有的 4 封信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还可参考 196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这里不再一一标明。讲课稿原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我们整理时所加。】

(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辅导

(1964.3.10)

今天开始讲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我准备用我自己翻译的本子来讲，因为准备时是用的这个本子，所以讲时也用这个本子。这个本子翻译的时间早一些，译法接近直译，稍微难看一些，其中有一两处翻译错了，我讲的时候提一下。大概编译局要把这个本子重新校过，另外出版，既不是这本，也不是另外一本。出入不太大。

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意义和结构

“《书简》集”也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很早的时候(大概在 1936 年、1937 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有一个版本，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所以我的版本也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后来出的两卷集里，改叫做《书简》，原因就是原来这信集里只有 9 封信，连给库格曼的信都没有，后来马恩选集再版时又增加了十一封，范围比较大了。加上的这些信都是中间的，两头是原来的。加上的这些信里

讲阶级斗争、政治、国家的较多，都是揭露拉萨尔、巴枯宁这些人的。因此，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而是涉及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就不再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而叫做《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我的译本仍然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因为我原来最早出版的版本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就沿用了这个名字。沿用以前的名字也不算大错误，因为革命问题、阶级斗争、国家问题也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叫做《书简》也好，因为它不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 11 封信，就可以看到，这个本子虽小，但包罗万象，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国家与革命的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问题、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在这书里都有了，不过没有展开就是了。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有的同志说，你讲讲现在读这本书的意义。我说，这里的内容很丰富，这一点就很有意义。所谓意义，简单地讲，无非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世界观的认识，加深我们对毛主席思想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这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修正主义，但是反对了各种机会主义。这里有一些反对机会主义的信，特别是 1865 年 2 月 23 日给库格曼的信，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很好的参考；还有第十五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格等人的通告》，也是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此外，第十一封信、第十二封信都是揭露巴枯宁的，对反修正主义很有参考价值，这两封信揭露巴枯宁搞宗派主义、分裂活动，嘴上讲团结，利用团结的口号搞分裂，我们“七评”上面就引用了上面好几段话。其他的反对蒲鲁东的信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在反修正主义中参考的东西。

所以，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意义就是看现在斗争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有什么意义，它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很难说哪点有意义、哪点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根据现在斗争的需要来说，就可以着重讲某点特别有意义。这本书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著作，我们哲学专业要注意根本的理论方面；同时，要注意里面反对机会主义的信，这对我们今天反对修正主义很有意义，这一点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信主要就是中间的几封。

整个这本书好像很有逻辑地安排，同时又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编的。包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早期著作直到恩格斯临终的时候(1846年到1894年)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信，按照时间排列起来。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大体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斗争。和马克思、恩格斯斗争的机会主义主要有三派：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杜林算不了什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影响和活动，后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时有了名望，但是时间很短，影响很小，不像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他们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和马克思作过长期的较量。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线索，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线索。

所以，这本书有些像小百科全书，仔细研究，味道很深。不但是历史的顺序，而且逻辑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封信很长，里面讲到全部的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和观念形态、由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

第二封信很短，接触到了阶级问题。

第三封信进一步谈到无产阶级的党、党章党的问题，还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第四、五封信谈到了和阶级斗争有关系的军队问题。

第六封信就进入政治了。其中揭露了拉萨尔的投降主义。第一次鲜明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应该怎样，是否能够随便地妥协？阐明了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和机会主义观点的对立。

第七封信谈到政治斗争。有政治斗争就有党的问题，这里就谈到党的问题，反对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第八封信中间插了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这是插进来的，本来这些信主要是讲政治的。这里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科学的任务是观察本质，不要只看表面现象。把庸俗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

第九封信就进入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谈到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

第十封信也是谈革命问题。

第九、十封信都是谈革命问题，又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称赞巴黎公社。这里有这样的思想：革命士气可鼓不可泄。尽管巴黎公社有错误，是失败了，但是你应该承认他们有冲天的干劲，对这种干劲应该赞扬，这是历史性的创造。所以，革命运动，不管他犯什么错误，首先要肯定他的创造性。当然，错误也要检查，但首先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要看他创造历史的英雄行为。

第十一、十二封信就进入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里主要是反对巴枯宁的宗派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权威？无政府主义者想利用反对权威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宗派主义。赫鲁晓夫还不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这和巴枯宁反对权威有什么区别？形式上有区别，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第十三封信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系，这里也是讲宗派主义和党的统一问题。前两封信是揭露那些高叫团结、实际上搞分裂的人。这一封信里讲到一个思想，就是我们要怎样的统一，是主要争取一两个犯错误的人和我们统一，还是面向广大群众，从广大的群众中找统一的意志？对那些犯错误的人，你争取他，他也可以进来，他进来以后当然经常要把错误的观点带到里面来散布。这些人要搞分裂，分裂就分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有广大群众做基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做基础，我们就可以忍受这些分裂。

第十四封信就是讲，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也有胜利。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国际共产主义威信大大提高。但因此也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想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解释这个运动，因此就要有各种不同的分歧，就会有人搞宗派。

第十五封信是一个通告，是对党内新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警告，这种倾向是以三人的宣言表现出来的。三人里面包括伯恩斯坦。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党内要出修正主义。当时不叫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这些人还不敢大规模地向党进攻，还没有系统地进攻，但是已经有宣言，并且已经提出纲领来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修正主义了。

讲到关于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的，就是这几封信。从第六封信到第十五封信，包括了以下六个问题，阶级斗争、政治、国家、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正主义。

从第十六封信起，就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般的理论范围。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四封信都是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这两个问题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讲到，第一封信里只是讲了一个方向问题，没有讲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生产起什么反作用。从第十六封信直到第十九封信，这四封信就专门讲到相互关系问题，肯定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性的关系。肯定了第一性的关系并不能否定还有第二性的关系，这就是精神反过来又作用于物质，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还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个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每一种上层建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最后决定于基础，但是它还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比如，哲学有哲学的继承性，它是利用以前的哲学才能发展，它并不是割断以前的联系而简单地、直接地从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各种上层建筑有相互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宗教，宗教可以影响政治。不仅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互相间有第二位的决定作用。政治斗争当然最后决定于经济，但政治斗争的形式(只讲形式)往往又决定于别种上层建筑。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就采取了宗教战争的形式。所以采取这种宗教的形式，并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宗教情况决定的。如果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例如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因为中国的宗教势力不是那么大的。当然，中国的农民战争也还有宗教战争，如太平天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宗教的性质。

这里有历史的过程，也有逻辑的过程，开始第一封信讲第一性的关系，最后再补充第二性的关系，如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后来的补充是因为早期没有这样的问题，批判蒲鲁东主要是打击他的唯心主义，所以强调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强调了这方面，就忽视了反作用的方面，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相对作用。

第二十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也是补充前面没有讲过的问题。农村公社是什么东西，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当时俄国还有民粹派，这封信好像是反驳民粹派在这方面的主张。1893年到1895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系统地批判民粹派的主张。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已经开始谈到民粹派对农村公社的错误看法。

最后一封信是比较综合的，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并且也具体分析了一下经济基础的概念。

这本书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结构，它既反映了历史，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逻辑结构也是历史发展的索引，是整个历史过程的胎生学的反映。整个的逻辑结构概括了历史，把历史的复杂过程撇开了，只把历史的最基本的关系概括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把这本书仔细读一下，加以展开，联系别的经典著作，联系毛主席的思想、联系现在我们的斗争，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的。

我从前翻译的时候，也没有看全书，现在准备讲课，就等于再学一遍，一学就感到内容很丰富。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有人问我：你翻译这本书有什么体会？我一点体会都没有，只是适应大家的学习要求。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样仔细地读。

面对这么多的东西，怎样讲呢？我想这样：挑两篇最难的读一读，对其他各篇只把一些重要的向大家提一提。准备读一读第一封信、第十八封信和最后一封信，别的信就不读了，只把里面重要的几段指出来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信都容易读，没有读《自然辩证法》那样困难，我看大家是能够读下去的，问题是有些历史知识需要考证，可以由别的同志作些辅导，把知识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这方面我就不讲了。

2. 第一封信(马克思给安能科夫)逐段讲解

现在就从第一封信讲起。

马克思的这封信(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是他的另一部哲学著作，即《哲学的贫困》的提纲，他写了这封信就准备写《哲学的贫困》，所以这封信大体包括了这本书的思想。

第一段、第二段说明了蒲鲁东那本书很不对，很不好，他要批评那本书。

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讲蒲鲁东随便抓了一些哲学的词句就想来解释经济问题。这里有一句难懂的话：“蒲鲁东并不是因为作为可笑的哲学的所有者，才给予我们以政治经济学上的虚假的批判，他之所以把可笑的哲学供给我们，是因为他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第1版，1961年第8次印刷，第5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这个意思实质上就是讲，蒲鲁东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经济知识所以错误，并不直接地因为他有一整套错误的哲学，主要是他对现代社会

制度的客观情况不了解，所以勉强抓了一些哲学词句套上去。这是知识的贫乏，主要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研究，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没有什么知识。“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就是讲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联系。由于他在这方面没有去研究，根本不懂，所以就要勉强地解释。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抓唯心主义的哲学，从傅立叶书里随便抓一些片面的东西来勉强加以解释。“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是借用傅立叶的话，傅立叶当然也不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但是他多少知道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锁链”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就要解释成“规律”。

“为什么蒲鲁东要讲到神，讲到普遍的理性，讲到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说它是任何时候都没有错误的，说它先是和自己本身相等的，说人们必须对它获得正确的表象，才能够掌握真理？何以他要依靠浅薄地摄取了黑格尔的哲学，来把自己描写成深刻的思想家？”（第6页）

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浅薄的，但是还要借用黑格尔的名义把自己装作深刻的样子。他的思想内容，无非是说世界上有一种永久存在、永久正确的理性，这种理性不知道存在在哪里，反正世界上有。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就要从天上找到这种理性，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这种理性，才能得到真理。天上有一个永久的理性，只要你善于祈祷，它就会降临到你的脑子里来，宗教家经常讲祈祷，请“上帝”给他“启示”，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要好好地听，上帝是正确的。蒲鲁东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你看，讲社会主义的人可是又讲神的理性。

蒲鲁东为什么这样说？下面一段是解释。蒲鲁东觉得有一个永久正确的理性，这不是决定于个人，个人只能去认识它，适应它，但不一定能够掌握它，个人的认识有时会错误，与理性不一致。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他自己给我们提供了揭破谜语的关键。

“他自己就提供给我们揭破谜语的关键。蒲鲁东在历史中看见社会进化的某种序列。他看出历史是进步的实现。总之，他看出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们，没有理解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是错误地设想了自己本身的运动。这就是说，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发展似乎是超越于、独立于、不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发展的东西。”（第6页）蒲鲁东看到了历史发展不依赖于个人的情况。本来他已经看到了规律，看到了历史的必然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力来解释这个事实”（同上）。

人的历史为什么不依赖于个人发展，为什么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有的时候是出乎人的意外的。中国的形势发展得这样好，不是就出乎他们意外的吗？今年有十大意外：石油自给，周总理到非洲这么受欢迎，法国居然能够承认我们，美国到处碰壁、对这么小的南越竟没有办法等等，都是意外。为什么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总是出乎人的意外呢？蒲鲁东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由于他不能解释这个事实，“于是在这里就出现关于自己显现着的普遍理性的臆说。再没有比发明神秘的理由，也就是发明缺乏正确意义的空话这件事更容易的了。”(第6页)好像有普遍的理性、客观的理性支配人类的历史，历史是服从于这个普遍理性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如果他真正了解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用不着用什么理性来解释。但是他不能这样解释，他觉得很奇怪、很神秘，只能用理性来解释。客观唯心论都是这样产生的，所有的客观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宗教产生的原因都差不多，由于人类对自己周围的规律无法认识、无法支配，经常出乎意外，于是只好用上帝、鬼神来解释。古代的人知识少，就说是上帝，近代的人文明一点，就说是普遍理性。所以，理性和上帝就是一个东西。

下面作一个结论：“蒲鲁东先生不是正因为承认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完全无知—当他从普遍理性、神等等大吹大擂的名词里去找依靠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理解经济的发展吗？”(第6页)

承认对历史的完全无知，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能力去理解经济发展的法则。用神来解释历史，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自己无知。这并不是说，蒲鲁东公开承认自己无知，他认为自己还是很有知识的。马克思说他是客观上承认了自己无知。这是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的揭露。

下面是马克思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什么是社会，不管它属于哪种形式？是人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社会形式吗？决不能。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一种相应的交换和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换、消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形式，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组织、阶级状况，一句话，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政治状态，而这政治状态正是公民社会之正式的表现”。(第6—7页)

上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性的关系：由生产到交换、消费，一直到阶级、国家、政治状况等这样一条线索。这都用不着解释了。要解释的是这

样的问题：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不讲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那时他的概念还没有最后形成和确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还没有使用。这里说的交换，消费的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对他也应该有历史的观点，不可能要求什么概念都确定下来。

这一段最后还有一句：“这一切，都是蒲鲁东先生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以为，只要从国家转向公民社会去诉求，也就是从社会之正式的总结转向正式的社会去诉求，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第7页）这意思就是说，蒲鲁东不懂得国家政治是反映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他不懂得政治是国家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就不懂得要解决经济问题，根本的关键在于解决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所以，他以为可以离开国家转向工业、转向经济，直接通过经济搞一个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离开社会的集中的东西而只是讲社会性，把目的放在社会本身而不放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这是批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还必须要再附加一点：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不是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已经获得的力量，都是从前活动的产物”（第7页）。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以前已经形成的了。

接着说：“固然，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同上）这里也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以前已经形成的，不是自由选择的。

接着说：“任何后来的世代都是靠着先前的世代所获得的生产力（它对于前者是作为新的生产的原料）而存在的，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在人类历史中间构成了一种联系，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这历史，当着人们的生产力愈更发展了时，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愈更发展了时，就愈更成为人类的历史。”这里是说，不仅仅是受自然的影响了。

“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人类的社会史，常常只是他们的个人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对于这点是否意识得到。”这里讲的“个人”不是讲一个人，而是讲许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每一个人都要在历史里起作用。不过这一点他不一定能意识到。

“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物质的关系，只是他们的物质的、个人的活动藉以实现的必然的形式”。这里的“个人的活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个体生产，还是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活动的。这是和“普遍

的理性”对立的，历史并不是受“普遍理性”的支配，而只是每一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这里总是提“个人”。这并不是个人主义，并不是认为个人决定历史。而是说，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

“蒲鲁东先生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这是把上面的话总结一下。历史是一个事物，不是受观念支配的，观念只是反映这个事物。而蒲鲁东认为，理性就支配历史，历史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样，就把事物本身和观念混淆起来，好像事物的运动就是观念的运动。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结果，所以是一种事物，它本身不是观念，它本身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只是反映事物的历史。蒲鲁东认为历史是观念的历史，就是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

下面是另外的解释：“人类决不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也不放弃那他们藉以获得某些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完全相反，为着要争取取得的成果不至于丧失，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实，人类在他们的交换方法不能再和既已获得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瞬间，就不能不改变他们的传统的社会形式——我这里所说的“交换”是指最广义的用法，就等于德文里的‘往来’(Verkehr)的意思。”(第8页)这里讲的“交换方法”、“社会形式”都是指生产关系。这里讲的“文化成果”也不是指思想文化，而是指人类进步的成果，即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生产力是一种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生产力。我们到故宫博物馆去参观，古代的铜器、铁器有许多是生产力，但是也叫文化。要使生产力的成果不致丧失并继续发展，就要在一定的時候抛弃生产关系。“交换方法”就是指生产关系。“往来”就是指人和人的联系。

接着下面是：“举例来说，譬如特权，行会和社团的制度，中世纪的法规等，都是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仅只是适应于既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以前存在过的虽使这些制度产生出来的社会状况”。就是说，这些社会关系以前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

“在这些社团和法规的庇护之下，资本就积蓄起来，海上贸易发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来，而人们如果还想要保守着那使这些果实在其庇护之下成熟起来的形式，那么他们就会连这些果实也要失去。由此才发生了两次暴动，即1604和1688年的两次革命。”(第8页)这里讲，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行会就不能要了，历史上发生的两次暴动，就是为了取消行会制度的。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旧公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即政治的状态等，在英国都被打碎了。这样，人类实行生产、消费，

交换等所依据的经济形式，都是过渡的、历史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就改变一切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仅只是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第8页）

这里面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混用了。我们讲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生产方式已经包括经济关系了，这是现在这样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用得不是这样严格的，他说的生产方式有时是指生产力，就是指技术方式、劳动的方式、劳动使用什么工具。生产方式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说用什么工具，另一方面是在生产中采取什么方式，互相结合。就是说，人和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人和人怎样结合，这样两个方面。这里讲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讲人和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力。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

“这些都是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尤其是很少论证到的。由于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现实过程，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幻影作为补充，而这幻影是力图要成为辩证法的幻影。他不觉得有必要来讲一讲17、18和19世纪的事，因为他的历史是出现在想象的九霄云雾之上，并且是高高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限界之外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派的废物；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们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这里讲黑格尔的历史是在九霄云外的历史，不是在现实世界里面的历史，所以说是观念的历史。

“……按照他的观念，人类只是被观念或永久的理性利用来使自己发展的工具。”

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世界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拿破仑到了德国的时候，黑格尔说：这是骑着白马的绝对精神。因为个人是没有意思的，所以黑格尔把个人和绝对精神对立起来了。

“……进化，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天国里实现着的进化。如果你揭去了这神秘词句的掩盖，你就会看见蒲鲁东先生是在向你叙述着那种秩序，那里面的经济的范畴都是在头脑中安排成的。用不着很大费力就能证明，这是最糊涂的头脑的秩序。”（第9页）

他口头上说世界理性支配历史，实际上他解释历史是用他自己脑子的观念来安排历史，不去研究客观世界，糊里糊涂的想，这种头脑是糊涂的头脑，是脱离现实的，凭脑子想来随便解释问题。和黑格尔一样，教条主义虽然讲

的是马列主义，但实际上是把脑子里凝固化了的一些死的东西看做是支配客观实际的动力。

下面就具体地批评蒲鲁东的那些范畴。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一开始就讨论到他所爱好的玩艺，即价值。对于这一部分作品，我现在不打算加以分析。”

“永久理性的经济进化的系列，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他认为蒲鲁东脑子里所想象的那种发展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所以首先讲劳动分工。“对于蒲鲁东先生，劳动分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一定的样式吗？难道行会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另外的样式吗？又，难道在英国由17世纪中叶开始而到18世纪末叶完结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不是绝对地有别于现代大工业的劳动分工吗？”(第9页)

这里批判蒲鲁东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是死的概念，简单的就是劳动分工，他不知道劳动分工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不懂得行会制度的时候，有封建时代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时代，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而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又不同于现代大工业的分工。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这些问题是蒲鲁东一点也不研究，说明他对经济一点都不懂，就是简单地讲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他就没有这种观念。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善于了解事情的本质，以至于竟会忽略掉连普通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忘记的事情。讲到劳动分工时，他全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谈一谈世界市场。难道说14和15世纪，当殖民地还不存在，当欧洲还不知道有美洲，而和东亚的交往仅只能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那时的劳动分工不是应该根本地区别于已经有了殖民地的充分发展的17世纪的劳动分工吗？”(第9—10页)

就是说，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的发展也有不同。

“但还不止此。难道说各民族的一切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是劳动分工的一定样式的表现吗？难道说这一切不会要随着劳动分工的变化而变化的吗？”(第10页)

这一段讲蒲鲁东不懂得生产力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社会组织，他是用当时的语言来讲的。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能够理解劳动分工的问题，以至于连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也没有提到，这分化，以德国为例，是从9世纪到12世纪之间产生的。”(第10页)

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他们在作理论分析时，同时就说历史概况，所以，可以使我们知道许多历史过程，读了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在欧洲什么时候有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以此为榜样，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也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城乡分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理论分析要和历史概况密切结合，这种方法是要经常注意的。总要研究历史经验，概括历史经验，毛主席、党中央从来就是这样。我们听了周总理、陈毅同志的报告，他们在非洲时，人家和他们谈问题，他们总是讲中国历史的经验，讲了就能解决人家的问题。马里凯塔总统一定要在公报上写他是搞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对，他就不高兴，我们就讲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到了全国胜利，还不谈是社会主义，要等待、要研究，使人民脑子里成熟了。不能以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写上社会主义，你写上大家不能接受，就会脱离群众。把历史经验一概括，他就没有话讲了，还很佩服。如果非常生硬地说：你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写。那就要搞僵了，还叫什么统一战线？所以，说服人要善于利用历史经验。毛主席和外国人谈话也是用这种方法。因为讲我们的经验就讲到普遍规律，我们的经验带有典型性，讲我们的经验也能说服人，人家也不好反驳，因为我们讲我们的经验，并不强加于你，供你参考，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经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胜利，他也不能不尊重。所以，这样就能够说服人。蒲鲁东根本不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讲城乡分化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他有确凿的证据，时间、空间确实确实的，在9至12世纪中间，德国有了城乡的分化。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分化是永久的，不变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它的产生，也不知道它的发展。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里是这样地论述着，好像这一定生产方式之下的产物，是会永久地继续存在下去似的。蒲鲁东先生关于劳动分工所讲到的一切，都不外是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已经讲过的东西的概括，而且还是非常肤浅的，不完全的概括。”(第10页)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

“永久理性的第二步进化，是机器。”这是说劳动分工产生机器的观点，第一步是劳动分工，第二步是机器。“劳动分工和机器之间的联系，被蒲鲁东先生讲得非常神秘。劳动分工的每一种样式，都有过自己的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就不是完全用手工作，他们有许多器械，而且还有极复杂的，如像车床、船只、杠杆等等。”(第10页)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出现一般地看做劳动分工的结果，是非常荒谬的。”(同上)

马克思说，它们的关系应该反过来，工具的发展产生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而不是劳动分工产生机器。所以蒲鲁东是荒谬的。

“顺便指出，蒲鲁东先生对于机器发展的历史之缺乏了解正像对于它的产生的历史一样。”

这里说的“它的产生的历史”就是认为机器是劳动的分工产生的。至于机器怎么发展，蒲鲁东也不怎么懂得。

“……应该说，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的时候——以前，消费的需要一般地是比生产的发展快，而机器的发展，则是市场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1825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战斗的结果。但这只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欧洲各民族，那么，他们之被迫应用机器，乃是因为不论在他们本身内部的市场上和国际市场上都受到了英国的竞争的缘故。最后，在北美洲，不但由于对别的民族的竞争，也由于劳动人手不足，即由于北美洲工业的需要和它的人口之间不相称，唤起了机器的采用。根据这些事实，你就可以断定，当蒲鲁东先生把竞争的怪影当做第三步进化，当做机器的反命题召唤出来时，是表现了怎样的一种识见。”(第11页)

蒲鲁东是这样的公式：劳动分工产生机器，因此，同样的，劳动分工使机器发展了。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历史上机器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蒲鲁东根本是主观主义。同时，机器的发展原因之一还有竞争，由于欧洲受到英国的竞争，所以欧洲非用机器不可，所以竞争产生机器。但是蒲鲁东认为机器以后才有竞争，所以把竞争当做机器的反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

“最后，把机器看成与劳动分工、竞争、信用等等相并列的经济范畴，一般地说也是荒谬的。”(第11页)

下面就解释。

“机器不能算做经济范畴，正如拉耕犁的牡牛一样”，这是一种工具，工具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说，生产力要素和经济不是一回事。

“……现代机器的应用，是我们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关系，但机器的利用方式并不等于就是机器本身。火药总是火药，不管它的使用是为着要引起人类的伤害，或者是为着要治疗人类的伤害。”(第 11 页)

这里附带可以联系这样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把核武器的出现这件事说成是决定了时代的变化，使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不存在了。这种观点也是把一种工具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好像核武器的出现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了，时代就变了。实际上，核武器的出现是一回事，这是人类发现的一种工具；另外，正义与非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决定于阶级关系，决定于社会制度，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所以马克思讲，火药总是火药，至于用火药来治疗人们或者伤害人，那是人的关系问题，和火药不是一回事。

“蒲鲁东先生作了空前的努力，来把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差额、信用和所有制等，按照我这里所列举的秩序，从自己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第 11 页)

在竞争以后，又出现了垄断。竞争、垄断、税收、警察……这种排列都是主观的。

“……几乎所有的信用制度，在英国，在 18 世纪初期，在机器还未发明以前，就已获得了自己的发展。”不是在机器竞争的时候，而是在机器以前。“国家信用仅只是使税收得到提高和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所造成的新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新的方法。最后，所有制在蒲鲁东的体系里构成末尾的范畴。在现实的世界里却相反，劳动分工以及蒲鲁东先生的一切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它们在总体上构成现在时候人们称做所有制的东西。”(第 12 页)

所有制不是最后出现的，劳动分工的出现就有所有制，各种社会关系都以所有制为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有制不是在最后，而是几乎在最前面。

“……离开了这些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就不外只是形而上学的和法律的幻想。”(第 12 页)

还没有所有制以前就有这种社会关系。

“……另外时期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由于断定所有制是孤立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就做出了某些比方法论的错误更坏的事情：他暴露自己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由于没有看见我们的社会的建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不能理解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发展，蒲鲁东先生对于它们就只能给予教条主义的批判。”（第12页）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制在很早就有，对所有制本身也要历史地看。蒲鲁东最坏的一点就是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了自己不懂得这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他把所有制的各种方式都看做是永久的、固定的支配人类历史的，所以，蒲鲁东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当要说明发展时，蒲鲁东先生就不得不依靠虚构。依他的想法，劳动分工、信用、机器等等的发明，都是为着他那麻烦的观念——平等观念服务的。”（第12页）

他认为分工、信用、机器等，最后总是要发展到平等。

“……他的解释是极端地幼稚。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平等的名义之下构想出来。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是趋向于反对平等的。”（第12页）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平等相矛盾的。“他的全部议论都处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说，他采取随意的臆测，但是，由于现实的发展每一步都和他的虚构相抵触，他就由此做出结论，说矛盾存在着。同时他却掩盖了这一点：即矛盾仅只存在于他那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之间。”（第12页）

他也承认了矛盾，但是，他就不知道他的那种虚构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是惟一的矛盾。这并不是说否认客观矛盾，他所讲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矛盾，他真正碰到的矛盾，主要是他的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这不是否认矛盾的意思。

“这样，蒲鲁东先生首先是由于没有历史知识，因此就不了解，人们是在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时候，也即是在生活的时候，就发展着一定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是不可免地要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发生变化。”（第12—13页）

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中没有用“生产关系”这个词，但是并不是没有生产关系的含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他不了解，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只在这些关系存在着的时候才具有真理性。”(第 13 页)

人的主观范畴受客观的支配，范畴只是历史经济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经济关系不存在了，那么这范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重要的是他两句话在一起，范畴要反映现实的关系，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不仅仅是反映，而且范畴的真理性要关系存在的时候才具有。这个关系如果已经过去了，你还要使用这个范畴，那就要犯错误。所以，真理也还是相对的，要在它所反映的事物存在时才有真理。所以，没有永久的范畴。修正主义者就认为有永久的范畴，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永久的，将来共产主义就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的革命过去了，这个口号就没有真理性了。现在讲自由、平等、博爱就是骗人的口号。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也要有些人不自由，自由和不自由是联系的。平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没有经济平等。我们讲平等也不是讲平均主义，不是抽象地讲平等。平等友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做买卖可以讲，兄弟国家的关系在讨论问题时要有平等的关系。修正主义在讲平等，对待别的兄弟国家就不讲平等，这不是骗人吗？博爱，更不行了，爱敌人行不行？所以这是骗人的话，一点真理性也没有，因为不符客观事实。

下面马克思讲，由于他不懂这些，“这样，他就陷落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当中，他们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永久的，而不是历史的规律——这规律，仅只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是现实的。因此，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现实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着问题，把现实的关系看做仅只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的体现。”(第 13 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把共产主义看做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最高体现，是所谓“人情”的体现，就是人道主义范畴的体现。现代修正主义主要还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一些客观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

“……而这些抽象的东西，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已睡眠在上帝的胸怀里的一些公式。”(第 13 页)

所有这些公式，在盘古开天辟地以前就在上帝的脑子里了，还是黑格尔主义。

“这里，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就开始陷于严重的智力上的困境。倘若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神的心胸里的流出物，倘若它们都是人们的隐秘的和永久的生命，那为什么，第一，发展会存在着；第二，蒲鲁东先生会不会不是保守主义者？对于这明显的矛盾，他是用对抗的全部体系来作为说明的。”

为什么说还要改革、还要发展，为什么不早一点实现上帝的这种范畴？为什么以前不会实现，偏偏要蒲鲁东才能实现？蒲鲁东就用他的全部对抗的体系来说明。他怎样调和对抗的体系？

“试举例来解释这个对抗的体系。”

蒲鲁东的体系里面有互相对抗的一些范畴，他要把它调和。

“垄断好，因为这是经济范畴，也就是神的流出物。竞争好，因为它同样也是经济范畴。”

两个对抗都好，怎么办？

“……至于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那却是不好的。”（第 13 页）

他这样解释：作为神的范畴是好的，但是作为现实存在，垄断和竞争是不好的。

“……尤其因为垄断和竞争彼此要互相吞没的，就更不好。怎么办呢？蒲鲁东先生以为，这两种永久的神的思想既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显然地在神的胸怀里也同样会具有着双方思想的综合”（第 14 页）。蒲鲁东只有用神的思想调和，人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在这里，垄断的坏处由于竞争而得到均衡，相反地也是一样。”（同上）现实世界不调和没有办法，由于神的因素就调和起来。

“……观念双方之间的斗争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即只有它们的好的方面向着外部显露出来。神必须培养这些隐秘的思想，然后应用它们，而一切就会美满了。”（同上）

就是说，要像神一样，把自己对抗的概念的好的东西都设法显露出来，使它把那些坏的东西都能够消灭，不显露出来，这样就会融合、美满了。

“……必须去发现那隐藏在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的混沌中间的复杂的公式。”就是调和的公式。“蒲鲁东先生是一分钟也不动摇地以发现这个秘密的资格自任。”（第 14 页）

就是对立面的融合论、对立面的调和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用这种观点来歪曲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面是经过斗争使矛盾解决的，不是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任何矛盾的对立面都不能调和，不管是对抗的或非对抗的。比如我们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这是非对抗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是否能把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加以调和就能解决？不能，只能经过两种思想的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错误克服了，然后才能解决。我们所谓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意思就是说，矛盾是不能经过调和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斗争来解决。并不是没有调和，调和是有的，不过矛盾不能通过它来解决。修正主义者就是和资产阶级调和，要想调和矛盾。调和会不会解决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暂时是有的，有条件的调和是有的；但是调和并不能解决矛盾。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一起谈判，得到一个调和，公报是混合的公报，这当然有一个暂时的统一性，可是矛盾并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能不能经过谈判搞一个调和的公报？不可能。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及1957年莫斯科会议，在个别问题上有一些调和，那是没有解决矛盾，因此修正主义抓住公报里调和的地方，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大做文章，所以矛盾还是发展了。我们不否认一定的条件下调和的事实，但是有这种事实并不等于矛盾要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是不能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的。蒲鲁东也是一种庸俗的调和矛盾的论点，他一分钟也不动摇地想来调和矛盾，所以他就是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用辩证法来反对他的那种变形的形而上学。

“但是，请把视线略微投到现实生活上去吧。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你不仅仅会找到竞争和垄断，也同样会找到它们的综合”，这是另外一种综合，“不是表现为公式，而是表现为运动。垄断生出竞争，竞争生出垄断”。（第14页）对立面互相转化。“然而这种均衡化的结果是造成愈更困难和愈更混乱的局面，而不是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会排除现代局面的困难。”（同上）矛盾总要经过革命才能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越来越激化。“这样，如果把现代经济关系所从属的基础加以改变，把现代的生产方式加以消灭，你就会不只是消灭掉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也会消灭掉它们的综合——竞争与垄断的现实的均衡化所由此产生出来的运动。”（第14页）

“这里我给你举出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范例。”（同上）

“自由和奴役表现为对抗。我不需要讲到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役，它的坏处也用不着提及。只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就是奴役的好的方面。”(同上)

大家对“奴役的好的方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奴役也有好的方面，不是说奴役好，只是说它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问题不在于间接的奴役，不在于无产阶级的奴役。问题是在于直接的奴役，在于苏立南、巴西、北美南部诸州等地的黑种人的奴役。”(第14页)

黑奴是直接的奴役制度。

“直接的奴役之成为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是正如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第15页)

“没有奴役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当时纺纱用的棉花主要靠非洲的黑奴种出来，美国南部就主要是种棉花。

“……奴役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创造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一是巨大的机器工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黑人贸易没有建立以前，殖民地给‘旧大陆’的产品是很少的”美洲没有黑奴就没有这么多的棉花。“并且也没有使世界面貌发生什么显著的改变。这样，奴役——这是具有巨大意义的经济范畴。没有奴役，北美洲——最进步的国家——也许会变成家长制的国度。”(第15页)

奴役是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资本家使用黑奴，奴隶是生产力、劳动力。

“……只要把北美洲从世界地图上除去，你就会看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完全的衰落。”(同上)

当时的黑奴这样重要，没有黑奴，资本主义就不存在。

“……而奴役的消灭，就可以看做是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这样，正由于奴役是经济的范畴，所以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会为一切民族所遇到。现代的人民只能在自己中间掩盖着奴役，但在‘新大陆’又使它暴露出来了。蒲鲁东先生的关于奴役的这些想法究竟是为着什么呢？他是要寻找自由和奴役的综合，寻找真正的黄金般的中心，换句话说——寻找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均衡。”(第15页)

他专门讲奴役的好处，使奴役和自由均衡起来。黄金般的中心，就是说找到天平支架中的一点使两边平衡，这像黄金一样，很不容易找到。找到了重点，两边就平衡了。这里的翻译是用直译法，所以有时看起来有些难懂。

“蒲鲁东先生很能了解人类制造毛呢、麻布和丝织物这些事；而了解这样一些微末的事情，并不算是很大的劳绩。但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类还能适应着自己的生产力来生产出他们在其中制造呢料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更了解不到的是，人们不但生产着与他们的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并且还会创造出观念、范畴。”(第15—16页)观念、范畴不是要有就有的。“也就是创造出一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因此，范畴也和他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久的，它是历史的和过渡的产物。”(第16页)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道德的范畴，不是属于当时历史的，现在就没有真理性。

“……蒲鲁东先生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行动分离开来看时，自然是不死的、不变化的、不运动的，它本身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这不外等于说，抽象这东西就是抽象的。多好看的同语反复?”(第16页)

就是说，没有什么意思。把抽象的东西离开了人的生活，看起来当然是永久的。我已经把它抽象了，变成普遍的东西，然后我又说是普遍的、永久的。这是我抽象出来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我就把它看做是永久的。那有什么意思呢？自由、平等、博爱离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来看，那当然可以看做是永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那他就不是永久的东西了。所以冯友兰说抽象的继承，他总是想不开，总觉得这是对的。抽象的东西是永久的、具体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就是继承了抽象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抽象和历史条件剥离开来，所以他觉得它就永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怎么也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所以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真理。我们现在也可以继承他的概念、名词，但只是在形式上借用这个名词。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是借用资产阶级用的名词，并不是继承他的抽象的东西。人要思维，当然总要用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可以创造的、有一些是可以把现成的拿来应用，从概念形式上把它借用过来，如此而已。并不是把资产阶级概念、资产阶级思想抽象地继承下来。

“于是，在范畴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第16页)

“用另外的话来讲，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直接肯定，说资产阶级的生活在他看来是永久的真理，他是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因为他把在思想的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加以神化。当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思想的、范畴的形式上呈现到他前面来时，他就把它当做自发地生出来的、天赋着独自的生命的、永久的本质。因此，他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线。”(第16页)

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是资产阶级的范畴，他把它看做是永久的，结果事实上等于肯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永久的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替资产阶级的生活辩护的科学家一般地都不直接地说这一个生活是永久的，但是他把生活里面反映出来的概念说成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这样一来，就把他所辩护的制度说成是永久的。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谓的道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道不变，实际上就是说封建统治永久不变。蒲鲁东讲的某些道的不变，就是理性不变。中国旧的“道”翻成现在的语言，就是理性。蒲鲁东讲理性不变，他的理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因此他讲理性不变，实际上就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因为他是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立论，并把他们当做永久的真理，他就要寻找这些思想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均衡，却看不见它们的保持均衡的现代的方式，正是惟一可能的方式”(第16页)。

只有现在他才能说成精神、观念，超出了这些观念的都要消灭。

“事实上，一切良善的资产者们所做的，他都做了。”(同上)

良善的资产阶级，就是主观上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们主观上都认为自己要把社会制度搞得很好，甚至要为劳动者谋福利，实际上他是资产者。主观上以为自己是为人类谋福利，为劳动者谋福利，甚至真的以为是替人类的幸福着想。蒲鲁东也是这样，他以为他搞社会主义，他要来解放工人阶级。

“……他们都告诉你们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也就是作为抽象的概念来看，是生活的惟一基础，但在实际上，他们都还希望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希望竞争不要有竞争的悲惨结果。”这是好心。“他们都希望着不可能的事，也就是希望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不要具有这些条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就像封建的形式是过渡的一样。”(第17页)

董仲舒就希望封建社会按照道的原则永久地存在下去，他不希望会发现封建社会的具体罪恶，不了解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形式。

“……这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人类是一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设想不到那样的社会制度，在里面人会不再是资产者。”(第17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这种味道，他就是认为不可能有那样一种共产主义，那种共产主义里面的人不要求个人的利益，不追求个人的物质刺激，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幸福是永久的范畴，永久的真理，所以共产主义也是为了实现这种永久的真理。赫鲁晓夫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人的积极性的惟一鼓励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物质刺激，最多再加上精神刺激，精神刺激无非是名誉、表扬，不是什么政治思想，和物质刺激是差不了多少的。他认为人都是要名利的，他不相信人不要名利，因此他认为走向共产主义惟一的道路就是物质刺激，就是个人主义。蒋介石从前“剿共”的时候，得意洋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人不要钱，不相信人不要做官，我有钱一定能够搞垮共产党！他就不能理解有一些人就是不要钱，就是不要做官，甚至生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共产主义。他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也不大能理解，他以为像新西兰这样一个小党，几百人的小党，那还不容易吗？六百镑(英币)就想收买它。他就没想到，这个党虽小，就是收买不了，他们就不爱钱。夏吉的党虽然比新西兰的党大一些，但是行得通，因为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可以收买，大概八九万卢布，比六百镑高一些。他不能设想，在资产阶级的人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蒲鲁东也是这样，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他脑子里的人是资产者。蒲鲁东是主张分散小生产，不主张集中的生活，实际上是为个体生产辩护，为小生产者辩护。

“因此，蒲鲁东先生必然是教条主义者。”(第17页)

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客观唯心主义——它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一般是主观唯心主义或经验主义，只看眼前利益，表面现象，感觉就是实践，物质就是感觉的复合，有用的就是真理。修正主义一般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教条主义是客观唯心主义。蒲鲁东是教条主义者。

“……他把那引起现代世界的变革的历史运动，归结为要在两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中间去找到适当的均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位灵敏的青年就用技

巧来发现隐秘的神的思想。发现两个孤立的思想的统一，其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使它们从实际生活孤立起来，使它们脱离了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性的结合，即现代的生产的缘故。”（第 17 页）

像竞争和垄断，实际上不是互相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蒲鲁东先生使它脱离了经济，变为两个东西外部对抗的、互相孤立的概念。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的头脑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那人类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不能再适应于这生产力的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

所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他不研究历史运动，而用头脑里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它，“来代替那一国的许多阶级中间以及在许多的国家中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来代替那惟一能够解决这些纠葛的、实际的、强有力的、群众的行动，来代替这一广泛的、长期的而又复杂的运动。”（第 17 页）

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蒲鲁东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去暴露这些矛盾，不去研究由于这些矛盾引起的阶级斗争、国内、国际的战争，以及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不可少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他只要脑子里主观空想的对立的调和、综合。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不要暴露矛盾，不要去展开和解决斗争，不要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相反地，要调和矛盾，迁就、让步、迎合、投降，想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

“……这样一来，有学问的人，能够知道神的隐秘的思想的人们，就创造着历史，而普通的人民只要在实践中承受他们的启示就行了。”（第 17—18 页）

修正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就是那些明智的人、明智的头脑创造历史，至于亚、非、拉美搞民兵、游击战争的人，都应该听那些明智的人的话，当然他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蒲鲁东不同，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是一样的，是掩盖矛盾、取消斗争，反对人民的革命运动，用自己认为是明智的头脑来代替这种运动。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是一切政治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现代的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并不是通过社会的行动，而是通过他头脑中所进行的辩证法的转动。”马克思的修辞很漂亮。“在他看来，范畴即是推动力”，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来改变实际生活。“因此就用不着靠改变实际生活来改变范

畴。完全相反，应该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就发生现实生活的改变。”(第 18 页)

“由于热望着调和矛盾，蒲鲁东先生就根本不问一问，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加以推翻。”矛盾的基础就是根本的制度，他根本不问。“他和那些想把国王、众议院和上议院都看做社会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做永久的范畴的政治教条主义者完全一模一样。”他认为现存的制度的基础不能推翻。“他只想去寻找新的公式来使这些势力得到均衡，其实它们的均衡恰恰是在它们的现代的运动里，在这些势力之一或者成为另一势力的胜利者，或者成为奴隶的运动里。”(第 18 页)这里说的现代的运动，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起来了。均衡只有依靠运动来解决，只有依靠两个势力的斗争，谁战胜谁的斗争来解决。

“……像这样，在 18 世纪就有过很多平庸的头脑努力想寻找真正的形式来使社会的诸阶层，即贵族、国王、国会等等得到均衡，而到后来，不论国王、国会或贵族都没有了。”(第 18 页)

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有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的资产阶级就是改良主义，他的改良主义就是要和国王、贵族妥协。18 世纪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也还有一些平庸头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者都失败了。

“……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中对抗势力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就是这些对抗势力的真正的均衡。”(第 18 页)

这里均衡不是调和，而是矛盾解决了。矛盾的真正均衡实际上就是矛盾的解决。

“因为蒲鲁东先生把永久的观念，纯粹的理性的范畴摆在一个

方面，而把人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在他看来，这只是那范畴的应用)摆在另一个方面，因此你在他那里一开始就遇到关于生活和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在种种的形式里反复出现的二元论。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抗，只不过是表示蒲鲁东先生对于他们神化了的范畴的平凡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没有能力来理解罢了。”(第 18—19 页)

这里说的二元论不是一般哲学上讲的二元论。蒲鲁东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这里的二元论是讲他们的整个言论，他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他的思想经常受到现实的反驳，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的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就是他的理性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是无法一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蒲鲁东把范畴神化了，把平凡的历史摆在一边，结果就无法理解，这两个东西经常打架、经常互相否定。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我已不能再涉及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可笑的责难。请你暂且同意我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情况不了解的人，是更没有能力来理解那为破坏这个社会而进行的运动，以及这个革命运动的文献表现的。”（第19页）

蒲鲁东根本不懂得革命。

“我对蒲鲁东先生完全同意的惟一的一点，一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所表示的反感。”（第19页）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就是指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实际的，不能实现的，他以为他的观点是实际的。

“……在他以前，我已经因为嘲笑了卑屈的、温情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我的敌意。”（同上）

因为他对乌托邦有反感，我也曾经嘲笑过乌托邦，因此，在这一点上大家有同感，都是对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意。

“……但蒲鲁东先生只能算是为自己造成了一些奇怪的错觉，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幻想——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妇爱的夸夸其谈以及他的一切庸俗议论——来和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相对立。”（第19页）

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赞美那种小生产、小家庭夫妇的代表，所以他的思想是庸俗的。他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来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对立，他以为自己比那些高。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觉，其实他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高，还比空想社会主义庸俗。

“而后者，例如就傅立叶来说，是比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的骄傲自大的鄙俗见解更为深刻得多的。”（第19页）

那种社会主义的温情的幻想虽然是空想，但是他的思想比蒲鲁东深刻，因为它能够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像蒲鲁东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

所以说它深刻得多，就是因为他想搞社会主义、想解放无产阶级。蒲鲁东是肯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傅立叶是想要取消私有制。

“……由于他自己也很感觉到自己的论据的完全空虚，自己谈论这一切事情的十足无能，因此突然不能自抑地陷于狂怒，陷于高傲的愤怒、哀号起来，发狂、谩骂、谴责、诅咒，捶胸顿足，向神和人吹嘘自己的清白，说社会主义的丑事与自己毫不相干！”(第 19 页)

这里有一些像赫鲁晓夫，自己感觉到空虚，只好用谩骂、发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

“……他并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或他所认为的温情幻想给予批判。”(同上)

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批判。

“……他像圣者，像教皇一样，把诅咒加在贫穷的罪人身上，而对小资产阶级的及可怜的、色情的和宗法式的家庭幻想则唱起光荣的颂歌。”(第 19—20 页)

这也有一些像赫鲁晓夫，他不是咒骂那些贫穷的人吗！他说，人多不过是一堆肉，是死尸运动。

“……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经济学者。”(第 20 页)

这里的所谓“经济学者”，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

“……小资产者在发现了的社会里，由于他本身的地位关系，一方面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者，这就是说，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感受到人民的苦难。”(第 20 页)

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但是又感到人民的苦难，所以就要搞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者有两重性，这一段讲得非常深刻。

“……他同时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有着这样的骄傲：他是不偏不倚的，他发现了那敢于说与中庸之道的确有所不同的真正的均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它的本质的基础。”(第 20 页)

他承认有矛盾，但是又要调和矛盾、掩盖矛盾。

“……它本身不外就是具有形体的社会的矛盾。它需要在理论上证明它在实际上的情形，而蒲鲁东先生的功劳就在于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

的解说者；”他在理论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真正的功劳，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以后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第 20 页）

马克思承认蒲鲁东有一个功劳，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理论化了，又系统地提出来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联合小资产阶级，并且和小资产阶级作斗争，改造小资产阶级，使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会小资产阶级参加，所以，了解小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批判他的错误，另一方面肯定他有什么功劳，在哪一点上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是否定的，但是又肯定他做了一些历史上需要做的工作。

“我很想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第 20 页）

这一段不必解释了。

第二次辅导

(1964.3.12)

3.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讲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很短，是讲阶级问题的，大家都能看懂。要注意的就是关于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这里面主要是关于阶级学说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讲了三条：第一，它的来源是生产；第二，有个去路，有个来龙去脉；第三，将来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很短，但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讲得很深刻，很清楚。和修正主义有原则的区别，和资产阶级学说也有原则的区别。资产阶级学说：第一，不看生产；第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封信，马克思讲到英国宪章党和他自己的关系。这里重要的就是，这些宪章党的主持人“相信我们是宪章党的惟一亲密的同盟者”（第 22 页）。别人要出钱买票才能参加的会，他是被邀请去的。下面讲那时大家不承认这点，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权利来把历史已经归属于我们的地位重新抓住”（第 22 页）。工人运动、工人党，归根结底要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可能一个

时候被机会主义者所影响，他讲法国侨民集团，法国人可能是指受蒲鲁东影响的人。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讲德国革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德国的一切事情都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要能够得到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那时一切就会很顺利……”。（第 23 页）这是他的工农联盟思想，这个思想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已经开始有了。他总结了拿破仑政变的经验，为什么拿破仑那样的流氓会做了皇帝？归根结底是靠法国小农的支持。那时候农民不认识无产阶级，对拿破仑有幻想，拿破仑解决土地问题，这实际上不是拿破仑的功劳，是法国革命的功劳，使农民得到土地。后来拿破仑成了领袖，农民以为是拿破仑的功劳，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就利用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思想出来活动，做了皇帝。

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马克思就讲到拿破仑第三得到农民支持上了台，将来农民对拿破仑第三的幻想破灭，那时拿破仑的纪念碑就要倒了。农民就会支持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胜利。那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意思。

第四和第五封信没有什么好讲的。第四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第二段开头一句话：“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联系的见解的正确性”（第 24 页）。第

五封信也是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的生产手段决定劳动组织的学说，能够有比在杀人工业里所有着的还更辉煌的确证吗？”（第 24 页）。

战争是政治的尖端表现，战争的主体—军队，把社会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在军队里特别会首先表现出来。这是这两封信的中心意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队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战争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军队里特别突出地能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如果联系到现在来说，为什么现在解放军总是走在前头呢？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有党的领导，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学习。联系这个问题来考虑，军队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走在前头。

第六封信，是马克思在 1865 年 2 月 23 日给库格曼的，这封信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很值得参考。我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第 27 页，第三条开头一句：“由于还在他进行宣传工作以前，我就从伦敦这儿向他详细地解释过和证明过：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干涉—这是荒谬的见解”。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势力妥协，要用社会

主义思想直接干涉它，使它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变，那是荒谬的见解。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当时就争论这个问题，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想去干涉，勾结普鲁士政府，幻想普鲁士政府可以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他投降了普鲁士政府，投降了俾斯麦，出卖了工人阶级。但他说是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干涉，这是表面的借口，是错误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和平过渡就是这样的思想。什么叫和平过渡？在现有政权下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结构改革，现有政权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拉萨尔早有结构改革的思想，马克思早已驳斥过了。

下面揭露拉萨尔的背叛，他和俾斯麦签订了条约。拉萨尔刚死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揭露这点，有种种的原因；他和拉萨尔还有点友谊，有个伯爵夫人苦苦哀求，写了申诉信。伯爵夫人受了拉萨尔的帮助，对拉萨尔有好感，在拉萨尔死后，写了申诉信，替拉萨尔说好话。马克思、恩格斯觉得应该参加到《北极星》杂志里。这是拉萨尔派主持的，想参加进去影响他们。由于这些原因，暂时没有揭露他，只写了个声明。但后来《北极星》派捣乱，所以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他的底交出来了。

这封信还有一点，第29页这一段很重要，这是讲拉萨尔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会叛变工人阶级的原因：“拉萨尔走上了这条歪路，是因为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的政治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政治家。米克尔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客，拉萨尔是学资产阶级政客的，是现实的政治家。

我要特别提起大家注意，赫鲁晓夫经常讲现实性。去年年底他接待合众社记者，发表了谈话，甚至这样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乐观主义的基础就是现实主义。他不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就是一种世界观。赫鲁晓夫要说这种话的原因，就是想把话说得使资产阶级喜欢听，因为资产阶级经常讲现实主义。戴高乐是现实主义，肯尼迪是现实主义，资产阶级政客喜欢讲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也跟着讲现实主义，甚至说是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他是为讨好资产阶级而说这个话的。同时说他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什么东西？现实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他是政客，要从政治上考虑，要用能更普遍影响人的名词，所以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资产

阶级政客的现实主义，赫鲁晓夫嘴里讲的现实主义或现实态度，都是实用主义。

拉萨尔这种行动中表现了实用主义，这点马克思也有揭露。“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习惯于只看见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作为‘现实性’的利益”(第29页)。所谓现实，就是习惯于看到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现实的利益，就是眼前利益。实用主义的特点就是眼前利益。下面说：“也因为这个阶级在事实上甚至于对封建主义也到处进行了妥协”。一个是为眼前利益，一个是对环境采取妥协态度，应付环境的态度，这不完全是实用主义吗？那时候没有实用主义的名词，但已经有了实用主义。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实用主义。

这一段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下一段还讲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卑劣的‘现实的政策’，一它使德国资产阶级忍受了1849年至1859年的反动并对民众之被愚弄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第30页)。现实的政策就是这种政策，肯尼迪耍和平手腕，这是他的现实政策。戴高乐的现实政策承认中国，这当然好了，从中国方面说，是中国的胜利。但从戴高乐方面说，他的现实政策有他的打算。一方面承认我们，和我们搞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和我们斗争。不过现在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大，所以对我们在友好方面讲得多一点。对资产阶级的现实政策，是不能不警惕的，因为它主要是谈眼前利益，为着眼前利益，可以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但它只是暂时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决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进一步来剥削人民。如果你不注意，就要上当，就要被愚弄。它刚承认我们，就向蒋介石致敬，如果我们不公开宣传不承认两个中国，它也就不会那样快的想办法对蒋介石方面施加压力。蒋介石撤回大使，和法国断交，是因为富尔的一个谈话，当然富尔是代表戴高乐的，他公开讲蒋介石政权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一个个人的政治代表，这样蒋介石政府吃不消了，就主动断交。

我们平常看到资产阶级讲现实的政策、现实主义觉得还有点好，它现实了嘛。我们有时讲反映现实，这是革命的反映现实，用革命的态度反映现实，和现实主义不一样。名词有点混淆，听不出问题来，要在哲学上加以揭露。上一次我讲实用主义，对这点没有很好地展开来讲。

这篇文章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讲现实的问题是好几种。在31页上说：“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但他们是‘现实的政

治家”。“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这是客气话，也许他们主观上想搞社会主义，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想就现存的条件来作打算，而不愿意让米克尔独占‘现实的政治家’的特权”。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政客争风头，和资产阶级搞和平的竞赛。也许他们真心想将来搞社会主义，但他们现在要和资产阶级比赛，要学资产阶级。也许赫鲁晓夫脑子里想将来搞共产主义，可以作为他主观上想搞共产主义，马克思对施维泽尔就是这样的解释。也许他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在要向资产阶级学习，要向资产阶级争地位，要作官。

“他们知道，在普鲁士(并且也在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报纸和工人运动是只能在警察允许之下存在的”。他们明明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就想来顺应当前那样的环境，想不去刺激政府，等等”，不作非法活动。“全然就像我们的‘共和主义的’现实的政治家一

样地‘接受’霍亨索伦族的皇帝”(第32页)。资产阶级现实的政客向封建皇帝妥协，无产阶级“现实的政治家”向资产阶级投降。

第32页倒数第一段也讲了这个问题，拉萨尔的信徒和马克思作对，举出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极端愚蠢地生怕失掉自己的影响”，患得患失。“第二，他们知道我是公开反对德国人所谓的‘现实的政治家’的。(这是这样一种‘现实性’，它使得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第32—33页)所以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公开反对现实主义。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问题。

第七封信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第一封信是批判蒲鲁东的理论，这封信是反对蒲鲁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破坏行为。

第一段有两句话可以注意一下，“我有意地限制了它的论点”，马克思给第一国际搞纲领，在日内瓦会议上，他的纲领有意识地把论点加以限制，不要搞得太高，“使它们可以取得工人们的直接的同意和共同的行动，并且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们组织成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营养料和推动力”(第34页)。根据工人阶级现在的情况，把自己的革命论点稍微限制一点，这不是原则上取消，是按照工人现在能接受的程度。这不是应付环境，应付环境是应付资产阶级。这不是应付资产阶级，是为了提高工人，根据工人阶级现有的水平来提高它，最大限度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他的目的是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搞的纲领就要做到这点。

要团结最大多数。毛主席讲得更形象了，毛主席又发展了，组织群众，搞群众运动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怎样争取？就是靠我们的政策、纲领。纲领、政策不好，路线不好，就争取不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必须依靠这样的力量，因为这样，就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是什么态度？这里面有描写：“他们傲慢地对待一切革命的、也即是从阶级斗争本身生长起来的行动，傲慢地对待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也即是那些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如像劳动日的法律上的规定)来加以贯彻的运动”(第34页)。他们是反对政治运动、反对集中的社会运动的。第一封信讲到蒲鲁东轻视政治，认为只要靠头脑的转动，就可以使世界转动。蒲鲁东不向社会求诉、不向国家求诉，意思就是说，不要解决国家问题，不要解决政治问题，只要去解决一般社会问题就行了。不要集中地解决社会问题，只要零碎地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就是集中起来解决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各种运动，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运动，也是目标在于夺取政权的运动，至少是为国家问题斗争的运动。政治和国家分不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怎样集中？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国家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就是夺取政权问题，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夺取政权，国家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就是不向国家问题去求诉，以为撇开国家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只要直接去处理一件一件的社会问题，就算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这封信主要是反对蒲鲁东这种观点。

下面还有句话可以注意：“借口自由，借口反对统治权或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安静地容忍了并且容忍着最可耻的暴政”(第34—35页)。对暴政一点不关心。“在事实上只是宣扬了由蒲鲁东主义所观念化了的普通的资产阶级经济”，“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现在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作对，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搞他的个人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者搞个人主义，但对一般群众，他又耍搞权威主义。

第八封信是讲经济学，这封信在这里，逻辑上是插进的东西，不过历史顺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讲经济学，所以不一定要多研究。

有两点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关于按比例分工规律的问题。“同样地谁也明白，为要产生出与多种多样的需要的量相适应的物品的量，就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在数量

上确定了的社会综合劳动的量”。有多少物品，就要有多少劳动。下面一句比较重要：“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的必然性，决不会在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之下被消灭，能够变更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第 36 页）。这句话值得研究。就是讲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是必然现象。自从有劳动分工以后，整个来说，劳动就要按比例分配，整个社会劳动的发展也要按比例发展，这是必然的，是带支配力量的总的趋势。问题就是形式不同。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是要通过危机来解决的。因为它是一种无政府生产，所以不会有意识地来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比例大大破坏，结果发生危机。在危机的调节下，比例有适当的恢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采取有计划的形式，比较自觉的形式。

这句话讲形式会变更，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盲目的，被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则能比较自觉地掌握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不一定能立刻百分之百地掌握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规律。我们搞了十几年，是不是能完全掌握？我们的方向是要掌握，是要运用这个规律，但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掌握。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意识地要去掌握这个规律，主观上有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还不能完全体现这个规律，我们的计划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体现这个规律。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中间还有许多盲目性，特别是最大的比例，工农业的比例长期不自觉。毛主席看的最早，1953 年就提出工农业并举，1959 年着重讲农业为基础。这样才开始更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比例。从 1959 年提出农业为基础，到全党了解农业为基础还有几年的距离。大家了解了，实践上完全贯彻了又要有个过程，所以说还有距离。我们掌握规律，要经过反复实践，中间会有差错的问题，只要方向是这样，就是社会主义。

这段话是比较重要的。

后面讲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问题。这里面讲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理论的历史终归证明了，价值关系的理解经常总是同样的，不过有时比较明确些，或者比较模糊些”。人对价值的理解，不管是哪个国家，总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的思想会一样呢？这是“由于思维过程本身是从特定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它本身就是自然的过程”（第 37 页）。因为它要反映它的自然过程，它有它的自然规律。“因此现实地理解着的思维只能是同样的，不过随着发展的成熟性的不

同，特别是随着思维器官的发展的不同，而有着程度上的差别罢了”（第 37 页）。不承认天才，这也是片面的，有天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天才不可以学，不能完全学到，也可以接近。上高山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往那里走去，总是一天一天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我们要学习，还是可以接近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只要存在条件一致，思维也是基本上一致，只有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没有来往，可是两个社会的思想本质上一致。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对价值的正确理解只能有一个，离开这个就是错误的。

下面批判，“庸俗经济学者一点也没有认识到，现实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的大小是不可能直接成为同一的”。大家学过经济学，就可以不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要点就在于，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第 37 页）。苏联就是要放弃这种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事实上他也没有调节，赫鲁晓夫上台十年就是盲目指挥，到处碰钉子。“合理的东 西和具有自然的必然性的东西，只表现为盲目地作用着的平均数”（第 37 页）。资产阶级社会里，合理的东 西、必然的东西，只是在不断被动的过程中作为平均数表现出来。只要有反复的实践长期的确切的统计，就可以摸索出它的规律来。

研究经济学比较不容易，要研究各种统计，而且要研究长时期的统计。《资本论》里常常出现几十年的统计，一个一个的表，用这些统计来证明规律。搞经济学一定要掌握长期的统计才行。搞一般的社会规律也要这样，只看眼前不行，要看几十年的统计。只看眼前是庸俗经济学，赫鲁晓夫就是庸俗经济学者，在哈萨克开荒就是两年增产，一点东西就高兴得冲昏头脑，立刻做出结论。现在 10 年了，10 年再一看就很清楚了。没有 10 年以上的统计，就看不出规律。

一般看问题也要这样，往往有这种人，看问题只看现在。我们有时候只看现在一时困难了，就以为规律就是困难的规律，一时好了，就以为好得了不得。毛主席经常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在得到胜利的时候指出困难。1957 年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风平浪静的，没有一点困难，是很不合理的幻想。那时候很多人头脑发胀，看不到困难，这当然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但有经验主义的味道。这种经验容易改正，因为是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要经过学习就了解了。

“庸俗经济学者却认为，只要他针对着内部关系的揭露而自负不凡地提出反对的主张，声明事物在现象上是另外一回事，这就算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了”（第 37—38 页）。庸俗经济学就是想用表面现象反对内部关系的科学。我们说，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变，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很明智，艾森豪威尔关心和平，用表面现象掩盖事物的本质，反对我们揭露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这里批判的是庸俗经济学，我们批判的是赫鲁晓夫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

下面的话很好：“事实上他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面前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第 38 页）马克思最反对这种对科学危害性最大的观点，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下面两封信是讲巴黎公社的，又回到阶级斗争了，这是国家问题了，用不着多少解释。

第九封信有一段话说：“如果你看一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是主张最近法国革命的意图不能像从来那样把官僚的军事机构由一双手转递到另一双手，而要打碎它，而这也就是大陆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前提条件。”（第 39 页）打碎国家机器，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和修正主义针锋相对，这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十封信可以注意的，是关于哲学问题。第二段是讲偶然性的问题。他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上还是起作用的，不过不起支配作用。“这些偶然性本身当然要作为组成部分而进入一般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又为另外的偶然性所抵消。但事情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第 41 页）。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群众要起来革命，但眼前由于偶然原因，有重大困难。巴黎公社时普鲁士军队站在巴黎门口镇压革命。这怎么办？马克思说只有两条路，看哪一条好。“因此他们就逼使巴黎人在二者之间择一：或者接受挑战而进入斗争，或者就放弃斗争”（第 42 页）。革命形势面前出现严重困难，你究竟是勇敢地斗争，还是放弃斗争？马克思是主张勇敢斗争的，他说：“在后一种情形下面，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会比随便几个领导者的牺牲更是极大的不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 42 页）。如果放弃斗争，那就是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坚决斗争，可能失败，可能牺牲几个领袖，但牺牲几个领袖也是值得的，工人阶级的道德精神大大振奋，可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宣布，工人阶级敢于作这样的事情，可以作这样的事情。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万岁，有了这个先例，

就可以从中取得经验。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胆小鬼；不敢斗争，或者失败以后，垂头丧气，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道德败坏。这和赫鲁晓夫也是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说，革命不是为了死，即使是壮烈地死去，也不值得。还说：“我们根本不打算死，我们就是要活着”。他认为壮烈的死，都是不值得的，而马克思的看法却相反，认为牺牲几个领袖不要紧，比放弃斗争值得，英雄地死，比跪着投降有价值。英雄地死去，对历史做出了贡献，创造了历史。

下面讲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这是直接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前面的阶段是准备夺取政权，以前的直接行动只限于向国家要求立法，要求八小时工作，没有到直接打碎国家机器的阶段，“尽管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曾直接有所成就，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重要性在于新的出发点却仍然争取到了”（第42页）。这是新的出发点。

毛主席的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马克思早已经有了。

第十一封信，是马克思给波尔特的，这是反对巴枯宁的，反对宗派主义的。第十二封信也是反对巴枯宁的，恩格斯更具体地揭露了巴枯宁的破坏过程，马克思主要是在理论上讲到宗派主义应该反对。

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国际的创立，是为着要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真正的组织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第43页）。要有一个能进行阶级斗争的真正组织。这个话用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也是很好的武器。马克思特别讲到反对宗派主义的必要，在工人运动成熟的时候特别需要。在工人运动没有成熟以前，那是准备阶段，出现各种宗派是不可避免的，成熟以后，就应该统一起来，真正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宗派主义的分裂。不是不要分裂，有了宗派主义，就要和宗派主义分裂。宗派主义的分裂阴谋、破坏阴谋要揭露，要坚决反对。

第二段说：“国际的历史，也正是总委员会对于宗派的不断的斗争，正是对于那些企图在国际本身内部巩固起来来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第43页）宗派还会巩固起来，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这是一种浅薄的尝试。这都可以联系现在。

下面有一段，讲到蒲鲁东主义在巴黎开始很占优势，法国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小农多，蒲鲁东主义很得势。后来集体主义发展了，后来终于与他们

相对形成了实证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集团。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已经主要搞集体主义。实证主义就是注意一下实际要求。工人阶级要求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进行斗争。

下面讲，巴枯宁的话是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我们“三评”了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毫无所知，但作为阴谋家倒是很有本领的。我这本有点出入：“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是个零数，那么，作为阴谋家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的”（第45页）。宗派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搞阴谋活动。

第45页最后一段，讲到什么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一切的运动，一切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反对统治阶级并力图通过‘从外面的压力’来战胜后者的运动，都是政治运动”（第45—46页）。政治运动，是整个阶级对整个阶级的斗争，通过外部压力，这不是说纯粹是外部斗争，是人家说的话，用外部压力战胜后者，这里有国家斗争、政治斗争的意思包含在内。

下面解释经济运动，是个别工厂中、个别工业部门的斗争。下面说：“相反地，如果运动的目的是在于要强迫发布关于八小时劳动日的法律，等等，那就是政治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是要整个阶级动起来，强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让步，这就是政治。发布法律等等就是国家问题，虽然没有推翻国家，但要变成国家法律。政治运动，归根结底是要涉及到国家的。

下面说：“这样，从工人人们的分散的经济运动中到处成长着政治运动”（第46页）。分散的经济运动集中起来，成为全阶级的，就是政治运动。经济斗争变成集中的东西，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围绕国家问题的集中斗争，就是政治运动。

下面说：“成长着力图把自己的利益用普遍的形式，用对于自己的社会具有强制力量的形式实现出来的阶级的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变成普遍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全社会的强制力量。靠什么强制？靠国家力量。政治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工人阶级不是要去把自己的力量普遍化，不是要使它成为全社会带有强制性的，就不叫政治运动。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就是蒲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对集中斗争的强制力量的。

最后还讲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足够开始向统治阶级的集体的权力即政治的权力举行决定性的攻击的地方，他就需要时时刻刻在这方面从事准备。”（第46页）工人阶级要准备对资产阶级的政治

权力进行攻击。下面说：“为此就要不断地进行反对这个权力的宣传鼓动，就要对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工人阶级经常要把自己的纲领和统治阶级的纲领对立起来，而不是要混淆起来。你不对立起来，就没有办法教育工人准备对资产阶级进行总有一天要来的集中的攻击。修正主义恰恰相反，就不愿意对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不愿意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相反地，要替它涂脂抹粉，向它妥协。意大利就是这样，要在现有的宪法下进行改革。丹吉完全是个叛徒，把尼赫鲁的纲领当做自己的纲领。马克思说：“要不是这样，工人阶级就会被后者所玩弄”。不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玩弄工人阶级，修正主义者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生怕刺激资产阶级，总是希望说出话来资产阶级喜欢听，连哲学也要说得资产阶级喜欢听。资产阶级说现实主义，他也就说现实主义。资产阶级讲马赫主义，他也跟着讲马赫主义。马赫主义是列宁所驳倒了，所以不敢公开跟资产阶级教授走，没有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教授的哲学。苏联也不是绝对没有，有人就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哲学太宗派主义了，否定一切。不敢说用资产阶级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不敢，可是采取另外的方式，跟着资产阶级政客的屁股后面跑，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也跟着讲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他自己也玩弄无产阶级。

第十二封信是一些具体的揭露，可以不讲了。

开头一段着重讲到巴枯宁主张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罪恶来自国家，所以要根本反对国家。这封信主要是指出这点，其他都是一些具体历史，就不讲了。

第十三封信，是恩格斯给倍倍尔的，是讲党的统一问题。党的统一、党的分裂，是统一和分裂的辩证法。有许多话在“七评”里都引用了，因此用不着多讲，只是提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三段有一段话很重要：“依照许多经验所证明了的我们的意见，宣传方面的正确的策略并不在于要从这里和那里去夺取敌人的组织成员中的个别人物和集团，而是要去影响广大的、尚未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群众。一个由我自己从荒地里找到的新人，比十个常常要把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因素随身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投诚者更有价值。”（第 57 页）这段话很重要，就是我们宣传的对象主要是什么，政治上联合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面向广大群众，不是某个团体里个别的头子、某些领袖，那些人物和我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当然也要争取，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去影响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修正主义者就是想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拉关系，赫鲁晓夫就是专门和修正主义领袖拉关系。去年开反对氢弹原子弹大会，赫鲁晓夫的代表就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你能在群众中找到一个真正觉悟了的工人，比 10 个经常和我们闹意见的头子要好得多。这是马克思主义面向群众的观点。

你看，甚至说：“如果能做到仅仅吸收群众而不要地方的领袖，那也还行。遗憾的是常常要附带地接受一大堆这类的领袖，他们不是由自己过去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是由自己过去公开的主张联系起来，并且他们首先总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原则，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反倒宣传着真正的拉萨尔思想。”(第 57 页)他想证明社会民主党宣传拉萨尔思想，这是指巴枯宁。巴枯宁反对马克思，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拉在一起，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事实他根本不管。他参加国际的领导，经常要证明他的对。不要姑息这些人，这些人捣乱太厉害，分裂出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下面一段有些话就是“七评”引用的。“不要因为关于‘统一’的叫喊声而把自己弄迷惑了。那些最喜欢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的人，恰恰就是挑起纠纷的主要角色；目前瑞士尤拉的巴枯宁主义者们正是这样，他们是所有的分裂活动的挑拨者，却对于统一比一切都叫喊得更厉害。”(第 57 页)赫鲁晓夫对统一叫喊得最厉害。这一段最后一句说得非常重：“这就是为什么最顽固的宗派主义者和最喜欢播弄是非的人以及最卑劣无耻的人在一定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叫喊统一。”(第 58 页)

对待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下面一段讲了，捣乱很厉害的人，群众也知道他捣乱了，就是说分裂已经成熟了。我们要不要调和？恩格斯说：“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抹煞了已经成熟的裂痕，结果会像什么呢？宗派主义者，也就是巴枯宁主义者就会获得更多几年的时间，来借着国际的名义做出更多的蠢事和丑事来”(第 59 页)。到裂痕已经成熟的时间，要来调和，结果只有让坏人多吃一些丑事、蠢事。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停止论战？就是希望多延长几年，多做点丑事。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呢？危险很大。他说：“最发展的国家的工人们，会要因为不满而走开”。搞丑事的人在这里，真正觉悟的工人要走开。“气泡不会破裂，它会因为受到针刺般的伤害慢慢蜷缩起来，而最近将来的大会一在那里，危机一定会要发展起来一将会变成最庸俗最丑恶的个人间的内讧”。现在妥协，将来闹得更厉害。“因为原则在海牙已

经被牺牲了”。原则已经牺牲了，将来闹得更坏。“这样一来，国际就要在实际上遭到破灭，为了统一而‘破灭’”(第59页)。想统一，结果整个国际都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分裂出来，或者把右派领导打下去，不这样作，统一就完全垮台。

第60页第三段很重要，也是讲分裂问题的。这里引了黑格尔的话，他讲辩证法有些好东西：“此外，老黑格尔就已经说过：党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的生活力量，它走向分裂，并忍受得起分裂”。经过分裂，还能更团结。“无产阶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种种的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不愿意再前进的人们堵塞着道路。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实际上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党的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辩证法：团结是以各种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团结是以分裂来实现的。“这些分派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古罗马帝国处在最严重的被迫害时期的基督教宗派那样”。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宗教，在纪元3世纪以前是被压迫的，由耶稣诞生二三百年间是受压迫的。那时基督教为了团结抵抗罗马统治者的压迫，内部常常要闹分化，因为有些人被收买了。12门徒里有个犹大，得到30元金币，就分裂出去，把耶稣出卖了。以后11个门徒继续团结起来，一直搞了几百年，后来到3世纪，罗马一个皇帝用各种压迫、收买的办法，杀的杀，有一部分收买了。这个皇帝叫君士坦丁，把所有拉拢了的基督教的头子，开了个宗教会议，承认基督教为国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以后，基督教变成统治阶级的教了。

这一段讲的是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团结总是通过分裂发展起来的。不断地巩固团结，不断地发展团结，但同时又不断地分裂。把坏东西分裂出去，团结就能进一步巩固，进一步发展。从前修正主义分裂出去，后来丹吉分裂出去，以后还有什么人分裂出去还要看斗争。分裂不分裂，在于改造不改造，向好的方面改造，就可以不分裂，坚持坏的东西，总归要分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希望，恐怕总归是要分裂出去的。我们还有策略，说要分裂，不是马上和赫鲁晓夫分裂。但要看到这个趋势，看到一分为二，不要那样害怕，不要那样大惊小怪。如果有一天分裂来了，就分裂，如果能不分裂，就不分裂，容忍到一定程度，非分裂不可，就分裂。容忍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一部分人、改造一部分人。有些人跟修正主义走是可以觉悟的，是被迫的。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作东欧的工作。东欧也不是不能一分为二的，就是苏联也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在一定的时候容忍，就是要做工作。你主动的分裂，太快了也不好。要经得起分裂，愿意分裂就分

裂，但也不要时机不成熟就分裂。群众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修正主义还没有彻底孤立的时候，你提出分裂就脱离群众。

可是，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分裂是必然的，团结也是必然的。分裂和团结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一分为二。有人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一分为二，当然会一分为二。既然根本理论是一分为二，当然它本身也是一分为二。问题是怎么分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革命性，一方面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有普遍真理，有具体实践，这也是一分为二。革命搞过头了，也会忘记科学性，太注意科学性，有时候就忘记了革命精神。我们有些搞理论工作的人，在搞理论批评的时候，纯粹搞理论批评，忘记了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些打击。要统一起来，要能结合。这个矛盾结合好了，就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得不好，就会出偏差。偏差很大，就会变成错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会分出反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外来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分裂出来，分出修正主义，分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没有结合。这个矛盾没有结合得好，只注意到普遍原理，忽视具体实践。结果普遍原理变成空的，变成教条主义。现在的教条主义不是这样，现在的教条主义根本没有普遍真理，机械地搬外国的现成的纲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辩证法会不会一分为二？也会一分为二。这也是普遍原则和具体运用的问题，把普遍原则具体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只讲普遍原则，不算辩证法？只是嘴里讲一点，没有运用，这还不是教条主义？所以辩证法是不是有条件，就这点说，是有条件。作为真理性，一定要把普遍原则用来分析具体问题，真正掌握辩证法。讲辩证法是为了要掌握它，要把辩证法学到手，要能用它分析具体问题。这是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说过了，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说的。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律，仅仅这样讲，算不算讲辩证法？我看还不算。讲辩证法，引证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引证大量的毛主席的话，可是思想可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思想。引证也是要的，但引证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拿来具体运用。如果我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你们提出那个问题，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不一分为二的，那我就没有辩证法，只是嘴上讲辩证法，不敢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承认对立统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承认这个规律就要肯定这个规律在一切问题上都能运用，问题是它的转化方法不同，转化形式各种各样，但原则到处都可以运用。问题就是要具体解释。

第十四封信也是关于国际问题的，是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这封信主要是讲国际为什么会有分裂。分裂的发展有一个原因，有的时候得到一个胜利，就会发生这种问题，“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就会要破坏这一切派别之间的天真的合作。这样的胜利就是巴黎公社，它无疑地是国际的精神的产儿，虽然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国际直接的推动；这样，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国际对于公社是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的。当着国际因为公社的关系而成为欧洲的道德力量时，这时纠纷就开始了。每一个流派都想着自己来利用这次胜利。”（第 61 页）到得胜利以后，就要警惕会发生的困难，这是很好的经验。恩格斯总结了个经验，每次胜利以后搞得昏头昏脑，如果不警惕，错误的东西就会发展。在胜利中，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有，想来利用胜利的结果。如果不注意困难，不辨别是非，就会搞得一塌糊涂。第一国际分裂的发展就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在巴黎公社以后的第二年，巴枯宁实在闹得不成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只好把他开除出第一国际。

这封信也讲到第一国际的解散，讲为什么要解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不同，它是各种各样思想集团联合的、各党各派联合的统一战线。第三国际是共产党联合，第二国际是社会民主党联合。第三国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占领导地位，但它不是统治的，有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等。它是一种旧形式，这个形式经过了巴黎公社，它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它的形式过时了。特别是巴枯宁开除以后，马克思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时需要一个新形式，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治的党，但这个党在那时不是成熟的。这里讲了它不成熟的原因。

“在十年的期间国际支配着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奠定将来的方面，它很可以自傲地来回顾自己的工作。但它已经历过了自己的旧的形式。要想像旧时那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即建立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党的联盟，那就必须要有普遍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像 1849 至 1864 年那样”（第 62 页）。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有一个低潮，资本主义有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种低潮前面，组织国际，群众基础不成熟，过了 15 年，恩格斯才组织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才慢慢恢复起来，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那时德国工人运动是中心。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1899 年修正主义大举进攻，10 年就堕落了。第三国际是 1919 到 1943 年，第三国际的寿命很久。说明 20 世纪帝国主义时期是革命战争时期，是帝国主义垮台时期。第二国际时间短，就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发展时期。到了 20 世纪，帝国主义走向崩溃，革命高涨，所以第三国际一直保持它的精力，保持它的革命性。

现在没有国际了，恐怕也会出现一个国际，现在实际上有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中现在出了修正主义。1956年出了赫鲁晓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没有倒，还是有人坚持，不像第二国际有个时期几乎全面垮了，就是俄国有列宁坚持。社会民主党还是一部分，列宁的处境比我们困难得多。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国家，有许多国家站在一起，一开始形势就很好。有些人认为我们孤立，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出修正主义的时候，同时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修正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西，还是赫鲁晓夫1956年搞起来的。现代修正主义，真正主力是赫鲁晓夫集团。

第十五封信，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修正主义(那时是修正主义前身，不叫修正主义)，有倍倍尔等三人在苏黎世作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非常生气，发一个通告反对他们。这一封信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联系。

修正主义和拉萨尔派有点类似，我们还是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三人宣言和拉萨尔主义是一致的，在信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特点。第64页上说：“照这些先生们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为真正的人类爱所鼓舞着的一切人’的全面的党”。这里有赫鲁晓夫的观点。“为着证实这一点，它就应该首先断绝粗糙的无产阶级的热情，并在有教养的和具有慈善心情的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来‘获得优良的口味’和‘熟习优良的语调’”(第64—65页)。赫鲁晓夫自己没有本领说出充满资产阶级优良的语调，就拼命学习资产阶级的优良语调。“那时，某些领袖们的‘不漂亮的风度’就要让位于修养良好的‘资产阶级的风度’(好像这些人们的外表上不漂亮的风度，也不能不算是他们该受斥责的很重要的东西)。那时很快就会出现，许多来自有教养的和有财富的阶级中间的多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必须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鼓动工作获得显著的胜利”。要把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吸引到这边来，赫鲁晓夫现在不能公开地把资产阶级吸引到共产党里来，不能公开地把社会民主党吸引到共产党里来，实际在那里拉拉扯扯。东欧有些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合并起来的。他以为这样才能获得显著的胜利。“德国社会主义是‘过多地重视了争取群众的意义，并因此忽视了所谓上层社会中间的强有力的宣传工作’”(第65页)。

下面一段，他有句话很重要：“一句话，工人阶级没有能力亲手争取自己的解放”。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工人亲手解放自己，要靠别人解放它。“其次呢？

不应该有任何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想法，—只需要用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第 65 页)。只要宣传共产主义吃得好，桌子上有丰盛的盘子资产阶级就可以吸引过来了。

下面一段说：“既然我们希望争取社会的上层，或者即使是争取其中对于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那我们就要注意使他们不至于受惊”(第 65 页)。怕资产阶级受惊！毛主席说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老虎不管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就是那样。修正主义就是怕刺激它，毛主席思想就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有精彩的，第 67 页第二段最后一句话：“消灭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和‘一切独立的人们’不至于害怕来和无产阶级携手”。然而，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受到了愚弄”。像修正主义那样，主张眼睛向上层。发动群众消灭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不至于害怕，让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很高兴，这样愚弄无产阶级。反修正主义，可作的文章很多，“七评”没有作完，这些都还没有写进去。

下面还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人们应该了解’，我们(这是替苏黎世三人说的)并不想‘拒绝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尽可以放到以后的年代来做，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精力都要用来争取达到一定的、十分切近的目的，这目的是在我们能够开始考虑实现更进一步的任務之前，无论如何先要达到的’”。就是一个十分切近的目的就够了！“这样一来，‘现在被悬得太远的要求……所骇退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的群众，就会开始来和我们联合了”(第 67 页)。不要用远大的目的吓唬人，不要树立共产主义旗帜。可以暂时摆一摆，可以口头通过，但实际上不做。

下一页，反驳修正主义的主张：“用不着拒绝纲领；不过应该把它的实现搁置……到一定的时候，接受它，但实际上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在自己生存的期间来追求它，只是为要做成遗嘱来交托给儿子和孙子”(第 68 页)。现在不干共产主义，只搞眼前的利益，等儿子、孙子来搞，我是主张共产主义的，你们去搞好了。“目前则把一切力量和一切精力都用到种种细微末节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方面，借此表示自己多少总算做了些事情，而同时又不至于使资产阶级受惊”(第 68 页)。这些都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描写得非常生动，对修正主义、对机会主义描写得深刻。

第 68 页第三段：“在我们面前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那时，机会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宣称，说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革命地位所激发，可能‘走得太远’了。不是要坚决的反对立场，而是要到处调和；不是要对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要设法去劝说他们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不是要对从上面来的压迫进行忿怒的反抗，而是要温驯地低首下心，承认应该受罚”。承认应该受压迫！？

下面一页，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虚伪，第二行就讲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在纸上也承认这斗争，因为它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否认的事情，而在实际上都来掩盖它、抹煞它、减弱它”。就是在纸上也承认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掩盖它。“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不应该引起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仇恨，或者一般地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就不符合人性，就是好战，就是想用世界大战推进革命。但我是主张斗争的，帮助被压迫人民进行斗争，赞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和平共处也是斗争。但如果真正要斗争，就说你是好战。这一段很精彩。“它应该首先在资产阶级所害怕而在我们这一代又不能完成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是最好让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精力用来实现那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补缀，这样来巩固旧的社会制度，也许借此还能将那最后的灾祸转变为渐进的、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尽可能地和和平的蜕化过程。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煞有介事地注重实际的伪装下面，不仅仅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而且还要企图妨碍所有不属于空谈的事情的出现”（第 70 页）。他们的思想是庸俗进化论，希望一点一滴地渐进的变化，实际上是要巩固旧制度。

下面一段讲到机会主义者讲的人类爱。最后两行反驳了人类的爱的问题：“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不值得注意的和‘粗野的’事情而避开了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就只剩下‘真正的人类爱’和关于‘正义’的空洞词句了”（第 70—71 页）。现代修正主义照样讲人类爱，讲什么人性。这就是上封信讲的，思想总是同样，思想反映现实，现实是同样的，现实只能反映同样的思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反映同样的立场，所以不谋而合的就是一种思想。掩盖矛盾，实用主义、庸俗进化论、人性论，所有赫鲁晓夫有的东西，这里都有，或基本上都有，不过程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后面就讲他们的主张，大家可以自己看。值得注意的是 72 页的第二段，这条是讲无产阶级革命可不可以吸引别的阶级的人参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有条件：“如果有别的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无产阶级

运动里来时，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这一类的成见的残余带进来，而要不条件地学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经过思想改造。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吸引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形而上学，不绝对排斥别的阶级的人，别的阶级的人可以一分为二，不能绝对排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但也不排斥有条件地容许他们进来，条件就是思想改造。

这个思想，毛主席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新的条件下，采取许多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思想改造，毛主席用新的思想改造来概括这个问题。规模更大了，采取新的形式，还有许多新的具体办法，整风的办法，这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条件下考虑到的。把它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充实了，采取许多新的形式表现在更大的规模上。就是这样发展了，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丢掉，另外来一套，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续生长，把枝叶发展起来，开花结果，算不算开花结果？毛主席就是开花结果，我看是可以说的。毛主席就是大量开花结果，做出新的结论，根本原则并不违背，但有了新的形式，有了新的更多的内容，根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这些人带来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反对。“如果有什么理由要暂时容忍他们那我们所要做的也仅只是容忍他们，而不是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还要懂得和他们的分裂仅只是时间的问题。”（第 72 页）如果坚持他们的立场怎么办？还要请他们、求他们留在组织内？没有这个理由，他不改造，一定坚持他的立场，还要影响领导，分裂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在我看来，是已经到来了”（第 72 页）。那时要开除他们。“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党怎样才可以再容忍这些论文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队伍里”。他公开搞宣言、搞纲领，怎么留？“如果党的领导竟然在某种情形下落到了这些人们的手里，那就是说让党随便受到阉割，并使它不能再葆有无产阶级的精力”（第 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一发以后，伯恩施坦感到害怕了，暂时承认一些错误，后来没有开除，可是后来在党内继续要搞他那一套阴谋，而恩格斯死后就进攻了。这里讲了如果修正主义者领导党，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尽力销蚀无产阶级革命精力，有很大的坏处。

最后一段可以提一提：“在将近四十年的期间，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推动作为历史的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强力杠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够和那些企图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取消了的人们走在一道”（第 73 页）。马克思、恩格斯搞了

40年，都是为了要推动阶级斗争，修正主义想取消阶级斗争，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起。

这里面讲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问题。这里把阶级斗争叫直接动力，意思是说还有许多别的动力。动力就是矛盾，其他的动力，就是各种其他的矛盾。其他矛盾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推动历史要靠阶级斗争。其他矛盾包含什么矛盾？产生阶级的那些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不是历史的动力呢？这些基本矛盾都是历史的动力，这些动力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通过阶级斗争直接推动历史发展。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些矛盾都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包括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总之表现为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并且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人民内部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用词很严密，叫直接动力，把直接两字漏掉，就在理论上犯大错误。

第十六封信是给史密特的。从这封信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围，以后好几封信都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讲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这封信开头是批评巴尔特的书，写这封信的时候，恩格斯没

有看过这本书，间接听到了，以后看了。费尔巴哈也提到这本书。这个人用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或经济唯物论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有人说，经济唯物主义以谁为代表？在这封信里恩格斯以巴尔特为代表。我翻译得有毛病，有的地方译成巴特，这是一个人。这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没有看到，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基础。所以恩格斯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当我们说到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时，并不因此就否认观念的领域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对这物质生活条件发生第二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写的那个对象”（第74页）。

如果不懂得相互关系，那就根本不懂得所写的对象，本来想写马克思的思想，可是又完全不懂得。这两句话大家注意一下，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观念领域有第二位的作用。我们常常讲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这两个概念这样来解释，第一性就是第一位的原因，精神第二性，就是

精神在宇宙各种联系中是第二位的原因。不这样了解，就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讲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不够。辩证法按照这样了解，第一位的问题，是物质到精神的问题，物质为原因，精神为结果。然后精神到物质，精神又是原因，可以变为物质，这是第二位的关系。讲宇宙的发展，当然应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这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这方面也不能取消。但有了精神以后，有了高等动物以后，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就整个宇宙说，一个时候没有精神，后来才有精神，在这种关系上，可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等于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涉及人类文化，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用另一个解释，由物质到精神是第一位的关系，而精神到物质是第二位的关系。所以我们谈到精神到物质的关系，那基本上是联系起来讲的。首先物质到精神，然后精神到物质，首先实践到认识，然后认识到实践。

毛主席讲认识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阶段精神到物质。这也是说的这点，第一性的联系是物质到精神，第二性的联系是精神到物质，这种联系都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任何一个，不能片面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两个都要注意。

这里面有个翻译问题，第一位的原因，别的本子译成基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二位的原因，原文倒是第二位的意思，但第一不简单是第一的意思，也不是基本的意思。这是个拉丁字，按照中国旧术语，比较确切的译法是“太初”，就是最初的最初、最原始的、最后的。是纯粹的科学术语，不是简单的、普通的第一，而是最后的第一。翻成基本，有点轻，翻成太初，文不文，白不白，翻成第一位，比较熟悉一点。“太初”两个字，好像太上感应篇，有点迷信。这是哲学术语，是最原始的意思，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世界最初的东西。“太极”两个字好像也有点迷信，被和尚、道士搞得很神秘。其实太极图也不很神秘，就是两个鱼盘在一起，一黑一白，就是矛盾，是最初的东西。黑格尔说矛盾相互关系是最初的原因，阴阳搞在一起是宇宙的最初原因。这并不是宗教名词，最有辩证法味道的哲学名词。

这封信还有个地方可以谈一下。“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曾考虑到，分配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被分配的产品的多少为转移的，而产品的多少，当然又要随着生产和社会机构的进步而发生变更，这也就是说，分配的方式也应该变更”（第75页）。下面讲辩证法，“参加‘社会主义社会’讨论的人们都看不到任何经常变更和进步的东西，而只看到固定的、一成不变地建立起来的分

配方式”(第 75 页)。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学问题,巴尔特讲经济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应该有个固定不变的形式。我们要了解按劳分配,应该很好地研究这段话,按劳分配究竟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或是个基本原则。按照恩格斯的意思,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按劳分配实现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大家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特别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现代修正主义有种想法,好像苏联的分配方式,就是最高的、惟一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它的高薪阶层反对平均主义,高低相差 100 倍到 300 倍。最低 30,最高 3000,特殊情形下,一个院士兼莫斯科大学校长,大体是 9000 到 10000 新卢布。他认为这种分配形式很好,这样做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按需分配。我们的实际生活看得很清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工业有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具体搞法也有不同。以什么为定额?要不要计时工资加奖励?怎样奖励,现在都要研究,不是已经搞得最完善了。农村就更复杂,北京郊区几乎要搞货币工资。像红星人民公社主要是工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搞工分制。还有些地方,工分也不能搞,就是基本口粮加一点照顾,或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或基本口粮加奖励。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就是基本口粮加工分。种类很多,能不能机械地搞一种?那不行。由郊区到边远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不同,采取同样的分配形式,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生产条件,就要采取各种不同方式,这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按劳分配本身要不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变成按需分配。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是很宝贵的。

第 76 页,最后一段第四行,“学生”两个字应该是学者,学生怎么会骄傲自满。

第三次辅导

(1964.3.13)

4.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给史密特)重点讲解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信(1890 年 10 月 27 日于伦敦)一开头说:

“我利用最初的闲暇时间来答复你,我认为你接受 ‘züricherPost’ 报的工作,是做得很对的。你在那里可以和很多人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如果能够经常注意到,苏黎世仅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从那里

所获得的印象，就由于经过了第二遍或第三遍的反映而减弱下来，甚至于受到有意识的伪造。”

(第 82 页)

这一段话是说，你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投机市场，要想通过投机市场认识经济情况不能认识的准确，特别是货币投机市场。货币价值的涨跌，能够反映经济情况，但是不能准确地反映，有时候不但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歪曲，有意识地伪造。

下面解释说：“但你在实际上对所有的机关都是熟悉的，你就应当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地去索取第一手的交易所公报。”要求他注意全面看问题，不要在那一个市里面就根据那个市的交易所来了解经济情况。“那时世界市场就会作为它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反映而显示在你的面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反映，和人的眼球中的反映有相同的情形。它们通过了折光镜，因而在达到人的头脑里时就表现成倒立着的样子。不过前者缺少着能使我们的印象再度倒转回来的神经工具。”(第 82 页)

眼睛的构造像照相机一样，外面的图像到照相机上是倒的，人的像到眼睛里在眼底上是倒的，经过神经的倒转，我们看人就是正的。现在我看大家是正的，实际上在我的眼球里面的影子是倒的，因为有神经的构造，因此我看不出大家是倒立着的。但是，社会上货币市场反映经济情况就不是这样情况，货币市场反映经济市场就是倒反映的，人看起来就是倒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市场决定货币市场，就是生产的情况决定货币的情况。但是在货币交易所里面来看，在货币市场来看，好像货币市场倒过来决定经济情况。比如某一种行业，你的股票价格跌了，为什么跌？之所以跌归根到底是这个行业的生产不景气了，要发生危机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危机，有了这种情形这些企业的股票就跌价了，或者是这些企业还不一定就要衰落，只是有一点衰落的因素，但是搞货币投机的人，看到了这种因素，大家一起哄起来出卖股票，结果价格就跌了，价格跌的结果影响这个企业更困难，它的股票大家都不要，于是这个企业的股份投资就有人要来兑现，这个企业本来就有点困难，股票再一跌就更困难了。股票的跌首先是由于企业本来有一点不好，但交易所把这个不好企业的股票一出卖，这个企业就更不好了。由此在表面上看起来，在股票市场上大家都不要这种股票，都来出卖股票，使得股票的价格就跌了，引起了企业的衰落。表面上是这样的现象，好像是货币市场，有价证券市场的变化引起了经济生产的变化，而不是像原来的规律，

经济生产的变化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变化。这种颠倒的情形在市场上就不会像人的神经一样再把它恢复正确了，而把颠倒的印象直接表现出来。这是现象和本质不一致，现象里面有倒立着的假象。

交易所的人只能通过货币市场和有关证券市场的倒立着的反映来看工业运动和世界市场，因而就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对于这一点，还是在四十年代时我就已经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要依据伦敦的交易所公报来构成关于工业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周期的高涨和低落等观念，是不中用的，因为那些先生们总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说明一切现象，而货币市场的危机本身大部分都只能看做仅仅是些征兆。”（第82—83页）

这是说，有时危机往往在征兆以后暴露出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货币市场的危机产生在工业生产的危机以前，因此似乎货币市场是原因，工业市场是结果。这一句话可以用来作为《自然辩证法》中有一段话来解释，就是在感觉中间先后出现的东西不一定表明因果规律。所以休谟怀疑因果规律，他认为这是感觉先后反复出现多次，这种反复多次，只是一种感觉习惯，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不可知论者就抓住这个片面作为他不可知论的理由。他抓住的这个片面确实存在，但是他把这种片面现象夸大了，认为是因果规律。在感觉这种现象里面先后出现并不一定等于因果规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的确很多，比如我们看到寒暑表上升了，因此温度提高了，我们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表上升了，然后才知道温度上升，如果不看到就不知道温度上升。有时就有这样的错觉，气温上升是由于寒暑表上升，因为我们是先看到寒暑表上升，实际上是相反的，气温上升了，寒暑表才上升。

“这在那时是为着要拒绝把一定时期的生产过剩作为说明工业危机的发生的原因，因此全部事情还更包含着一种力图曲解真相的目的。”（第83页）

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要掩饰生产过剩是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因此故意说工业发生危机是由于货币市场发生了问题。我们解放以后没有这种事情了，解放以前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形，报纸上常登某个工业发生危机了。为什么？是因为银根吃紧。银根吃紧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工厂的流动资金没有了，工资发不出去，没有钱买原料，反正是有各种困难，要关门、破产。债还不起，一个企业经常向银行借债来补充流动资金，债太多了，银行就不借了。银行逼债，工人要工资，没有办法只好关门、破产。这种现象是货币发生了困难，结果使得企业也就发生了困难。这种论调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虽不一定每天有，几乎也是每星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把货币发生危机作为工业发

生危机的原因，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他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容易销出去，因此钱拿不回来，流动资金就少了。资产阶级采取人为地利用货币的力量来缓和危机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的办法。这不是讲一个企业，是整个企业发生了周转不灵，仓库里面的存货太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向政府要求帮助，这时政府一个是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再一种是让银行多印钞票，然后银行借债给企业使得他手头松一些，流动资金比较松了，既发了工资，债也可以缓一下，以前的旧债可以借一笔新债来还。仓库里面堆着的东西暂时卖不出去也不要紧，而且也还可以卖一些，因为通货膨胀，经营商业的企业可以向银行借钱向工厂买些东西，工厂的存货就可以销掉一些。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工业企业产生一种人为的缓和，这也是一种现象。货币市场松动了引起企业生产、工业市场的松动，这种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是客观事实，但这不是第一性的事实，是第二性的。首先是工业危机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危机，工业影响货币，生产影响货币，以后才是货币影响生产，本来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面，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了第一性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弱点，故意这样做。

恩格斯讲这是40年以前的情形，下面他说：“在今天，这一点至少对于我们永远是永远不存在了”。这是说故意歪曲真相的情形。就英国来说是这样的，实际上至少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看。“而且下面的情形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即货币市场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危机，而工业领域的直接的瓦解对它只能起从属的作用，或甚至于不起什么作用。在这里，就需要对于最近二十年的许多事情特别从历史上加以探讨和确定。”

这里面讲货币和生产的关系，货币市场和工业市场的关系，相当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过货币市场并不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内部也有生产关系，第一位的关系是生产影响货币，第二位的关系是货币影响生产。同时也像上层建筑一样，上层建筑本身有相对的独立性，货币市场本身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规律，他在服从总规律以外有自己的规律。所谓总的规律，就是货币市场的变化归根到底决定于工业市场的变化，除了这个以外，货币本身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时货币危机的产生不需要工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以直接产生。有时候，市场上买卖人的心理状态也会起这种作用；有时候，在政治上造一个谣言，也可以发生这种危机。

解放以前蒋介石政府经常利用政治谣言来制造货币市场的变化。比如他造谣说国民党打了胜仗。这个谣言一哄，国民党的工业股票或是金圆券就涨起来了。不过这是一天两天的现象，因为很快大家会看到真相，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存的股票卖出去，看到卖完了，就跌价，所有买他股票的人吃大亏。这是一种赌博，国民党经常搞，搞到最后钱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不但是老百姓发生问题，民族资本家也受他的骗。

所以，货币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你要了解问题的真相就需要对 20 年来的事情特别是从历史上加以探讨和确定，要经过长期的研究。

“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实现着劳动分工的地方，个别的劳动过程在相互的关系上就成为独立的东西。”（第 83 页）

这句话译得长一些，有点难懂，另外一个译本好懂一些：全社会各种劳动有分工的地方，每一种劳动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比如农业和工业有分工，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关系。农业是农业，工业是工业，封建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是搞在一起的，没有全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生产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当着贸易把生产品和本来意义的生产分离开来时，它就有了它自己所有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生产的运动在总的方面是起着支配作用的，但在个别的部分和在这总的从属性的范围之内，贸易的运动还是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即在这新因素的本性里所包含着的规律。”（第 83 页）

这也是解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这是讲贸易和生产也是一种分工，这种社会贸易和生产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贸易有自己独立性，自己的规律，比如供给和需要的规律，这个规律不直接是生产的规律，而直接是贸易的规律，市场货物多了就跌价，货物少了就涨价，这种情形最后决定于生产。当然有时候市场货物多不一定是生产多了，有时候市场货物少不一定是生产少了，用的多少也可以影响价格或者是跌价。货币市场也有自己的规律，现在我们不用金属货币了，从前用金属货币的时候，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和生产没有关系。如果在货币市场出现了两种银币，一种是含银成分高的，一种是含银成分差一些的，两种货币在市场上使用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经过一定时候，在市场上充满了银子成分低的货币，银子成分高的货币很快会在市场上消失，这是货币市场的规律，这个规律和生产没有关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17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把它当作一个规律表现出来。

“这贸易的运动有它自己固有的样式，并且它自己又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表现出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由于对黄金的渴望引起的，这种渴望在以前已经把葡萄牙人驱使到非洲去了(参看谢特柏尔的‘贵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工业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贸易的发展是那么强烈地使人要求更多的交换手段，而德国—1450年到1550年间最大的产银国家—却不能满足这样大的要求。从1500年到1800年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征服印度，目的都是为了要从印度输入。没有人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什么。可是结果，这些纯粹由贸易的利益所引起的发现和征服，对于工业竟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反作用：单单为了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就建立了和发展了巨大的工业。”(第83—84页)

最初是从这些殖民地国家输入一些工业国所需要的东西，但这种输入不久工业发展变成了输出为主了。

“货币市场也是一样。当着货币贸易从商品贸易分离开来时，它就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生产与商品贸易所规定的限界之内—具有着自己所固有的发展，具有着由它本身的特性规定的特殊的规律和样式。不仅如此，当着货币贸易在自己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中搞大成为有价证券的贸易，并且这有价证券又不仅仅表现为国家的证券”(第84页)。这是指公债，我们国家也有公债，但我们现在的公债是不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债可以到交易所买卖。

“而且还把工业和运输企业的股票也包含在内时，当着货币贸易(它在总的方面是受生产支配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生产的一部分取得了直接的支配权时—那时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会更为强烈和更为复杂了。”(第84页)上面我们讲的用通货膨胀来影响生产这是一种方法。

“银行家成了铁道、煤井、矿坑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具有着两重的性质：它的劳动既必须适合于直接的生产的利益，又必须适合于股东们的要求，因为他是银行家。”这种生产银行家觉得可以发财他才干，不能发财，他就不去搞了。“这里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铁道。它们的全部业务都从属于当前的某个吉·古尔得、万得比特之流在交易所的活动，一对于个别的铁道及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利益来说是完全异类的活动。”(同上)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交易所活动可以引起生产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能够支配铁道的生产活动。

“就是在这里，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许多铁道公司在几十年间为着划分他们的区域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斗争，在这斗争里花费了巨量的金钱，并不是为着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仅仅是由于持有股票的银行家们力图使交易所的活动容易进行这个惟一的目的。”(同上)

恩格斯这封信是 1890 年写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于帝国主义时期，银行垄断资本的作用逐渐抬头，所以这封信表明恩格斯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到银行垄断资本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苗头。当然没有列宁后来写《帝国主义论》的时候看得那样清楚，但是在那个时候所出现的这种突出现象，恩格斯已经看到了，而在前几十年的信或者是文章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在 90 年代恩格斯写这封信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这几点意见中—关于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这几点意见中，我已经在基本上回答了你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问题。”(第 85 页)

这一句话是他的中心点。生产、贸易和货币这几点的关系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第一性决定第二性的关系，同时第二性关系又反过来决定第一性的关系。事物在相互关系中间，有第一性的关系和第二性的关系。一切关系互为因果，但是互为因果中间有第一性因果关系和第二性因果关系；有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要分清。找到第一位原因时不要忽视第二位原因。第二位原因也是原因，它有它一定的独立作用。它跟《自然辩证法》后面讲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自然辩证法》只讲相互关系，没有讲相互关系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得更全面了。在相互关系中有第一性关系和第二性关系的区别。在恩格斯的信里，这种第一性、第二性的相互关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的基本原则。经常要注意第二位原因，我们很容易忽视第二位原因。

“从劳动分工的观点上来看，这就最容易了解。社会产生出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公共的职能。担负这些职能的人们就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他们由此获得了甚至于与他们的授权者互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他们与后者相对地成为独立的东西，于是一这就出现了国家。”(第 85 页)

这里讲到国家问题，国家本来是经济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形成国家以后，国家反过来可以影响阶级斗争，影响经济。而且国家里面的人有一定的独立性，国家统治者个人的特点有时会对社会起作用，做总统的

人的特点不同，他起的作用也会有些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决定政治的规律，只是在某些具体特点方面，某些事情发展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

“同样的情形也在商品贸易以及稍迟以后的货币贸易里存在：新的独立的力量在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从属于生产的运动的，但由于它内部存在着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由于一度赋予它而渐渐地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相对的独立性”，这里直接用相对独立性这个名词了。“使得它对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也发生了反作用。这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的运动，另一方面是那向着最大可能的独立性进展的、一经产生之后，还能够进行独立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经济的运动在总的方面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但它仍然不能不受到那依据于它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并且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第 85 页）

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老挝和柬埔寨从前同样是法国殖民地情况差不多，里面都有共产党。当头子都是亲王，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富马，两个人的思想有一点不同，两个国家的结果不同，发展不同，如果富马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到老挝，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就不同了。苏加诺他有特点，崇拜孙中山，要学习孙中山，所以出现了像印尼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跟阶级斗争有关系，但是和出现苏加诺崇拜孙中山有关系。如果换一个人，情况也不一定这样。国家领导人站在国家领导地位就有相对的独立性，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但不是起最后决定作用。不过那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总是要最后胜利的，但是有些胜利得快一些，有些胜利得慢一些。这里面就有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问题。也有偶然性的问题，某一个人当了总统，当了首相，也有若干作用。

“这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运动，另一方面是与国家政权同时产生出来的反对势力的运动。就像金融的市场在总的方面，在上面所说的保留条件之下，并且自然是颠倒地，反映着工业市场一样，政府和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从来就存在着、斗争着的阶级间的斗争，而这反映也是同样地颠倒着：它已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追求政治原则上的斗争。它是这样的颠倒，使得我们要经过成千年的时间，才能够再发现事情的真相。”（第 86 页）

这个运动本来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看起来就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由它决定的。政治斗争是为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不同的政治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情形：它可能是循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事情就进行得更快；它可能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这样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大民族里，国家权力都要在一定的期间走向破灭；或者，它会把经济发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断，并推进到另外的方向——这一种情形，归根到底又会归结为前面两种的一种。很明白，在第二和第三两种情形里，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会给与很大的损害，会造成大量的力和物的浪费。”(第 86 页)

举例来说，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情形：第一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把经济向前推动得很快，实现飞速发展；另外一种修正主义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因此要引起经济的破灭；第三种情形最确切的例子是外来民族的侵略，武装占领这个地方，它把经济切断了，比如欧洲人到了美洲，原来美洲印第安人是原始公社末期，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是向封建社会发展，但是，欧洲人一去就切断了。还有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占领了汉族的农业区域，如蒙古族和满族，可以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切断。切断的结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新入侵的国家它的方向和经济发展一致，比如蒙古入侵汉族，清占领汉族地区，它来了以后，仍然按照向前发展的方向从事政治活动。蒙古族开始到华北想把一些农田改成牧场，几乎要实行了，后来耶律楚材(是金人投降蒙古的，他有帮助金人搞统治的经验)要忽必烈不要这样搞，搞了牧场不好，还是让汉人照样生产下去，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每年可以收很多粮食来供给西征(打欧洲)，如果不这样搞，尽搞成牧场，那么多牛羊运不到欧洲去，对西征没有好处。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套，按照汉族制度来进行统治，所以生产没有受到大破坏。清朝也是这样，入关以后很快建立了统治，特别是康熙统治比较好，到了乾隆是发展的时代，这是清朝封建社会比较好的时代，和汉、唐一样是兴旺的时代，这是因为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他是满清人，是进攻汉族的，我们就歧视他，把清朝人的统治看得一塌糊涂，一定把他说得很坏，这样不公平，他的统治比崇祯皇帝的统治好得多。欧洲人到美洲这个方向也是前进的，生产也是超过历史阶段发展的。另一种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相反，比如忽必烈刚到中原的打算，如果这个打算实行了，经济就发生很大破坏。但是不管哪一种切断，对经济、物力都会有大破坏。因为切断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尽管以后仍然还是前进的，可是在切断的过程里面有破坏，比如蒙

古人、满清人南下都有大破坏，对于这一点不能因为他以后有进步就给他涂脂抹粉，“扬州十日”、“嘉定之屠”，把全城人都杀光了，这些坏事他还是做了的。所以，恩格斯这里讲的可以概括一切历史情形。还有这样的情形，欧洲罗马帝国是奴隶制，很发达，后来日耳曼人进来把罗马帝国搞垮了，日耳曼人要用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来代替奴隶制度，所以他的方向是反动的，那时的破坏大了，经济受破坏，文化也受破坏。日耳曼的领袖认为学习文化是最丑的事情，是可耻的事情。有一个日耳曼的领袖，他的女儿认识了罗马教士(基督教士是有些文化的)，她跟这个教士学习拉丁文，非常有兴趣，学了两年很有文化了，后来她父亲知道了就禁止了，处罚了她，也处罚那个教士，认为我们是高贵的人，是全能的，怎么能干“下流”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文化是倒退的，从6世纪到9世纪这三百多年中间是过渡时期，9世纪才开始恢复。那个时候奴隶制度垮了，究竟是一个什么制度?很混乱。封建制度是9世纪开始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暂时切断了、倒退了，最后还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最后还是出现了封建制度。

“除此而外，还有经济资源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这一种情形，这在以往的某些情况下面，有时会使一整个地区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全部遭到毁灭。这种情形在今天却多半只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大民族中间是这样：被打击者最后常常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要比胜利者得到更多的胜利。”(第86页)

在奴隶制时代，占领一个地方可以把整个部落屠杀了，比如欧洲人到美洲，把印第安部落几乎全部屠杀光了，因为它是落后民族，是原始部落时代，抵抗力小，一下子可以杀光。近代就不同了，殖民地国家要摆脱殖民统治，最后的结果是相反的。恩格斯的话可以作为预言，把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情况都预见到了。

下面是讲法律问题，这一段比较重要。

“就法律来说，也是一样：当有了新的分工的必要而产生职业的法律家时，于是又展开了一种新的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对于生产和交换虽然有着它的一般的依赖性，但同时对于后者又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反作用能力。”(第86—87页)

为什么上层建筑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上层建筑不是空的，是有一批人组成的，有一批人始终以上层建筑为职业，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层，这是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就要搞它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个近代的国家里，法律不仅仅应该适应于一般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应作为它的表现，并且还必须是一种内部首尾一贯的、不至于因为有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表现。为要完成这一点，就使得经济关系的反映的确切性愈更受到破坏。法律的典籍愈是不能作为严峻的、尖锐的、没有伪装的一个阶级统治的表现时，那破坏也就愈更厉害。”(第87页)

第一段话比较重要，上层建筑除了它是一批人外，要有独立性，就要搞自己的系统，要使内部在自己的逻辑上能够首尾一贯，因此基本上它要反映经济的要求，可是为了它的逻辑系统，就不能完全反映。剥削阶级统治的时候，他要伪装成为全人类的，他要以全人类的名义贯串他的系统。用冯友兰的话是他要采取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这也不是冯友兰的话，有这么一种伪装的普遍性，冯友兰把这种普遍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形式，实际上完全是阶级的，但是因为它有这种形式不是完全确切反映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内部本来是矛盾的，而一种法律观点只能反映这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的东西，这一派和那一派有不同的法律观点，某一派的法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它能够反映这个阶层的利益，但是不能完全反映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这就发生冲突。

中国古代，特别是讲儒家学说，讲经学的人，他的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和封建阶级某些人的意见是有矛盾的，因为他讲爱民，不要过分糟蹋老百姓，可是统治阶级里面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人，偏偏不爱民，荒淫无耻，这就有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变成对抗性的，讲经学的人往往要遭殃，甚至遭到杀头。有时这个阶级的统治不稳了，非要他的东西来欺骗不可，就用他一下，讲经学的人一般不是当权的，比如汉朝的董仲舒，在意识形态方面代表统治阶级，而他本人在统治阶级里面来说是倒霉的，没有当过宰相，做过部分地方的国家官吏，不是皇帝的直接帮手。这种人在封建社会来说是正派人，他的言论里面有时也反映一些民生疾苦，而且对老百姓糟蹋得太厉害，有反感，但又不是真正站在老百姓方面，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着想，希望能够永久统治下去，希望不要发生封建统治规律所必然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但言论里面反映一些民生疾苦，描写了一些豪强糟蹋老百姓的现象，把它写成文章，奏本上也有一些暴露。

讲到对法律、道德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一点。“继承”这两个字有广义、狭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是建立马克思主义要利用旧的历史材料，旧的历史文化不管好的坏的统统要利用。利用的意思是总结历史经验，

并不是说要把它拿过来作为自己的，而是把它拿过来研究，研究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广义来说，所有的历史遗产，我们都继承。是继承材料，把材料留下来，比如我们图书馆里面把所有封建时代的东西，不管好的坏的统统保存起来，这也是继承，是广义的继承。

狭义的继承是我们是不是要它，是不是拿过来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利用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样来解释继承就要严格一些，首先我们只能继承人民中间的东西，有科学贡献的东西，对大众有利的东西，并且在继承的时候，即使这些东西也要找精华，要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原封原样地继承。因此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统统不要，丢掉它。对于封建道德我们继承不继承？不继承。封建法律当然不继承，要根本决裂。但是要不要把材料保留下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呢？还是要的。一点也不研究过去，怎么能够把现在建立得更好呢？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还有一些概念、形式可以利用，这种利用并不是继承封建道德，或者是资本主义道德本身，是利用它的学说。利用过来以后，形式、内容都变了，比如资产阶级讲自由，我们也讲自由，但我们讲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东西，从形式上看，还是自由这二个字，但怎么自由，和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根本不同，我们是又有纪律又有自由，自由和纪律是结合的；而资产阶级形式上是讲自由，但和纪律完全相反，是对立的。恩格斯提出关于继承问题的理论原则，具体的我们要作很多研究。

“应该说这事的本身就已经和‘法律概念’有着矛盾了。”法律概念既然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就应当一点一滴地反映经济，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反映。“1792年到1796年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彻底的法律观念，在‘拿破仑法典’里面已经有了许多方面的伪装。”1792年那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倾向性比较明显，到了“拿破仑法典”里面就更明显了。“而所有在法典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些，还要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每天每天各式各样地减弱下来。但这并不妨害‘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律典籍成为整个大陆上的一切法典编纂的基础。因此，‘法律发展’的进程主要地不外就是这样，首先是企图要排除那把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时所发生的矛盾，并建立起一种调和的法律体系；接着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不断地把这体系冲破，于是，又把它卷入新的矛盾里（我在这里暂时只是就民法来说的）。”（第87页）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矛盾，不断地扩大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不但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封建社会也是这样，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学说，道德学说的基本精神不变，而个别部分是经常变的。

“经济关系之在法律原理上的反映，也必然同样是一种头脚倒立着的东西、它的出现并不为当事者所意识到，法律家总以为自己是根据着先验的原则行事，而不知道一切只是经济的反映——于是一切都头脚倒立着了。”(第 87 页)

上层建筑专家没有这种自觉性，不知道是在反映经济。“而这种颠倒，在它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它之能够反过来对于经济基础给以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能够变更经济基础，这对于我们好像都是自明之理。”(第 88 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是独立发展的，是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第一性关系。

“就家庭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继承权的基础是经济的。可是，好像在英国有着绝对的遗嘱自由，而法国对于这自由却有着严格的限制，这就很难说它们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这就有法律中的相对独立性起作用了。“然而两者都非常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因为他们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第 88 页)

“至于说到那浮悬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那么，这里面还有着一种史前的、从历史时代中发生和继承下来的内容，这内容在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是荒谬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史前时代的低度的经济发展，把关于自然的虚伪的表象当做了补充，有时也当做了条件甚至于原因。”(第 88 页)

这里，恩格斯把宗教、哲学和法律加以区别，法律包括道德，比较直接反映阶级利益，所以，它更直接决定于经济，继承性比较少一些。新的宗教、哲学跟史前时代的关系更多一些，新的宗教或者是新的哲学，差不多都要利用旧的哲学思想，旧的宗教神话建立起来的。西方的宗教哲学和东方宗教哲学是两个系统，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当然最重要的东西是共同的)。西方哲学受基督教的影响大一些，中国的哲学一般说宗教的影响少一些，特别是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就哲学方面来讲，宗教概念、神话概念比较少一些，孔子不讲鬼神，他也相信有鬼神，半信半疑，但不怎么讲鬼神。儒家学说不谈神

的问题，只讲天，实际上唯心主义的，儒家的“天”就是神。西方哲学讲上帝，这是受宗教影响，这里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早期经济不发达对于自然界的规律不能认识，因此就用一些精灵、魔力来作消极的解释。

“但是，虽然经济的需要曾是，而且愈来愈更显著地成为前进着的自然认识的主要推动力，但如果有人想给这一切原始的荒谬思想都找到经济的原因，那就未免迂腐了。”(第88页)

这种荒谬思想有时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产生的，不是由于经济原因。

“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承担这个任务的人们，就又是从属于特殊的分工的领域，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自己是在一种独立的领域里工作着。在社会分工的内部他们愈更形成一种独立的集团，那他们的生产物，以至于他们的谬误，对于全社会的发展甚至于经济的就愈更会发生反影响。但不论如何，他们本身仍然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支配的影响之下的。例如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形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就最容易得到证明。霍布斯是最初的近代唯物主义者(在18世纪的意义)，但又是当时的绝对专制主义者，当时正是绝对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的全盛时代，而在英国正是开始与民众进行斗争的时代。”(第88—89页)

霍布斯是英国的一位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17世纪人，他的唯物主义是带有18世纪性质的。他在政治上是绝对专制主义者，拥护君主专制，可是他的唯物主义是18世纪的，就是说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这说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立场上可以站在封建贵族立场，可是作为哲学家，他向前走了一步，在哲学上和资产阶级一致了。

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要简单化，阶级立场反动的哲学家，不一定哲学上都是反动的；有了进步政治思想的哲学家，不要毫无根据的一点材料都没有就说他的阶级立场一定是进步的。有一些人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因此就一定要凑一点材料把老子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者这是荒谬的。他是周天子的史官或者是图书馆长这一类人，如果说那个时候是奴隶制度，他就是和奴隶主站在一起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哲学家可以自相矛盾的，他作为一个阶级是落后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以

他在哲学上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在政治方面是代表贵族方面的。文学上也是这种情形，比如有的作家，作为阶级代表人是站在贵族方面的，但是作为文学家是好的文学家，是反映现实的，他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而他的文艺作品是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他自己就有矛盾。这个矛盾说明搞意识形态的人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对于贵族奴隶主有相对独立性，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和工商业奴隶主站在一起。

冯友兰解释老子是荒谬的，他说老子是贵族奴隶主的代表，是反动的，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为什么？因为立场最反动，哲学最进步，好像只有反动的立场才能够有进步的哲学。他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因此不会解释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出版了，就是讲这一套的。立场越反动怎么会哲学越进步，进步哲学是反映他的反动立场的，反动阶级已经没落了，没落就绝望，绝望就讲辩证法。他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意思。“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 1688 年的阶级调和的产儿。”(第 89 页)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采取了调和的方法。霍布斯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英国革命的时候他跑到法国，等到英国革命胜利了，又回到了英国，和资产阶级妥协了。洛克是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儿，他的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一点二元论的因素。

“英国的无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即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甚至于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家。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里，显现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人性质一时而积极地，时而又消极地。”(第 89 页)这是指向封建势力妥协的那一种资产阶级。“但是，作为特定的分工领域，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倒能够奏起第一把提琴来：例如 18 世纪的法国对于英国(法国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学上的)，后来的德国对于前两者。”(第 89 页)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打先锋，不一定直接反映经济，只要能够综合一些材料然后就能向前进，例如 18 世纪法国对英国，18 世纪法国比英国经济落后，但是法国的唯物主义比英国高。德国也是这样，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是在 19 世纪初期，在哲学上比它先进。

“但不论在法国或在德国，哲学，就像当时一般的文学的繁荣一样，仍然是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结果。”(第 89 页)归根到底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尽管是落后，但是在落后基础上高涨，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是落后，但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是高涨。

“我认为就是在这些领域上，经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仍然是无可辩驳，不过它要表现在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条件之内”即有条件地反映经济。“例如在哲学里就表现为经济影响对于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有哲学材料所起的作用(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着作用的)。”(第 89—90 页)

先行者遗留的材料一大堆，哲学家要在这一堆材料里面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哪一些对他有用，这最后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斗争。

“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在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这决定作用也多半是间接的，当它是作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而对哲学发生着重大的直接作用的时候。”(第 90 页)

经济往往通过政治、法律然后影响哲学，正因为这样，哲学内部矛盾才会突出，哲学家从阶级立场上反映他的阶级，在哲学上可以因为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的前哲学的影响，比如当前哲学思想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影响，使得他的哲学表现和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有矛盾。这种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所以研究上层建筑问题很复杂，尤其是更高的上层建筑更复杂，特别是哲学史，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化。现在有些同志简单化，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很复杂，有很多简单化的东西，要完全搞清楚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下面几段没有什么，不念了，最后一段念一下。

“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常常只看见这里是原因，那里又是结果。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不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只存在于危机时期，不知道整个大的进程是表现在相互作用里——虽然是极不相等的力的相互作用，虽然经济的运动在这里一直都是最强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一不知道这里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里面有绝对，第一性与第二性是绝对的。“这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对于他们，黑格尔是不曾存在过的……”(第 91 页)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

5.第十七封信、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

讲解

现在回过头来讲第十七封信：恩格斯给布洛赫

—1890年9月21至22日于伦敦

这封信没有很多可讲的，主要还是开始那几句话。可以读一下。

“……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第78页）

有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了。经济是最后的决定原因，但不是惟一决定的东西，上层建筑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是有区别的，要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接近还是稍微远一些，比如道德和法律，直接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更接近经济一些；哲学、宗教、文艺离经济间接一些。上面我们说过，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他的哲学思想发生矛盾的情形，在道德形式、法律形式里面一般看不出来。阶级立场是封建贵族的，但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情形在道德、法律里面一般是没的，因为道德、法律直接反映经济，直接反映阶级。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创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第78页）

经济产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产生斗争的政治形式，斗争的形式再产生新的阶级斗争，统治的阶级就把政治固定为法律。另外，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又有意识形态的各种学说，这种政治、法律、哲学学说、宗教概念又反映阶级斗争。所以第一是经济，第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法律，然后意识形态又反映阶级斗争，反映政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意识形态又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毛主席概括得很好，比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里面的说法完全一些。斯大林说，上层建筑首先是产生于经济，经济反映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观点，然后这种观点又产生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

制度。好像先是经济，经济变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形成政治制度，这种提法有可以考虑的地方，值得研究。

“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第78页)，这是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斗争发生影响，这就是反作用。原来意识形态是反映政治的，现在反过来对政治发生影响。发生什么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同上)

上层建筑中间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反映基础、反映政治，而且能够反过来影响政治，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对于政治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讲在政治斗争的形式方面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而不是讲对它的内容，上层建筑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内容，只能反映政治斗争，然后又影响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但是不能把它的本质改变了。可是对于它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决定政治斗争是采取这种形式还是采取那种形式，是采取宗教形式还是采取法律形式，或者是采取别的什么形式，或者是采取不同的学派形式、党派形式。比如我们中国从前有党派形式，明朝有东林党，从形式上看是学派。

“这里存在着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第78页)

这封信主要的是这些，后面所讲的都是些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看。

第十九封信：恩格斯给梅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第十九封信的内容多一些，原来决定把第二十一封信念一下，看起来第二十一封信的内容不那么多，所以第十九封信多讲一些，把原来的程序改变一下。

这封信也是讲观念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这封信的第二段要注意一下，这不是涉及哲学本身问题，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恩格斯的谦虚态度，要好好读一读，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梅林说：“你把超过了我的分内的过多功绩归到了我身上，尤其是当我想到，有许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有时是由我独立地发现的，其实在我之前，早已由眼光更深刻和视野更广阔的马克思所揭示出来了。”这很使人感动。虽然不是哲学本身的东西，也应当注意，特别是我们研究理论的人，谨防自己好像写出一点东西，好像是自己创造了

什么东西，要警惕这一点。恩格斯始终把马克思称为巨人，把自己当做帮手，这种态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段可以念一下，这是对梅林的书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点遗漏，这一点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我的文章里通常地强调得不够，而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都同样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最初是把主要的着重点放在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思想体系的观念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济因素如何对它们发生制约作用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了内容的缘故，竟忽视了形式的问题，如：这些观念的形成是经过什么途径的？这就使我们的论敌找到了所期望的口实，来挑起误解以至于进行曲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保尔·巴尔特。”

梅林这本书里面对于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的独立性没有太注意，所以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对梅林提出意见要注意这一问题，但是他提意见的时候是用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来的，我自己强调得不够，只注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没有注意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有它的继承性、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内容一定是反映经济，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上层建筑形式只是从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发展起来的。《反杜林论》也讲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内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就它的形式来讲，是18世纪那一些思想家，一些思想材料的继承。所以讲继承性是讲继承的什么形式，如果讲内容，新的意识形态和旧的意识形态有原则的区别，特别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以前的意识形态根本是决裂的关系，但就形式来讲不一定。我们也会利用一些以往观念形态的材料。继承性问题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区别方面来着眼、来考虑、来研究，才能解决问题，不要笼统讲我们是继承或者是不要继承，不加以分析笼统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下面一段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还是讲思想家主观上的观念形态有它独立发展的过程。

“思想体系是一种过程，这过程虽然是凭借着所谓思想家的意识来完成，但所凭借的是虚伪的意识。推动着思想家的那真正的原动力，在思想家是不知道的，不这样它就不会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第93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知道的，这是写以前的思想家。“这就是说，思想家自己所想像到的只是假的或表面的原动力。因为它是思维过程，所以不论它的内容或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里引导出来，或者是从思想家自己的或者从他的先行者

的。”(第 93 页)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形式来说,是从德国哲学引导出来的,从英国经济学引导出来的,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出来的。

“思想家仅仅是凭借着思想上的材料来工作,他毫不踌躇地把这材料当做从思想里产生的东西,而不再进一步去探究比较远一些的、不隶属于思维的源泉,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自明的,因为他们以为,既然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思想为媒介的,那么归根到底它的基础也就应该是思想了。”(第 93 页)这不需要解释了,念一念是表示它的重要性。

“历史方面的学者(这里说的历史方面,是简单地概括了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的领域,一句话,即属于社会而不是只属于自然的一切领域)——历史方面的学者”(第 94 页)。这不是讲一般地写一写历史,是研究社会方面的学者,“在每一科学领域里都保有着一定的材料,这材料是从前一辈的思维里独立地形成起来,并在这些相互继承下来的后辈的头脑里构成一种独立的、特有的发展系列。”(同上)这些都是些思想家自己主观的错觉。这都不需要解释了。

另外注意一下第 95 页第二段,恩格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对于事情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对它只能略微提到)”,指思想观念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给予它所应该受到的重视。这是一个旧的典故:在开始时常常因为内容而忽视了形式。如像已经说过的,我就是这样做了,而缺点常常是在事后才看出来。因此,我不仅仅要避免为这种事向你提出责难,——相反地,像我这样一个在更早时候就负有同样罪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我只是希望你在将来对于这一点提起注意。”(第 95 页)

下面一段前几句话可以念一下:

“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些学者们的荒唐观念:说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体系部门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因此也就否定了它们对于历史的一切作用。”(第 95 页)讲两个意思,一是思想体系的独立作用,一是思想体系对于历史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一些人就曲解了。“这种看法的基础乃是那呆板的,把原因和结果当做僵硬地互相对立的两极来看的非辩证法观念,是对于相互作用的绝对忽视。”(第 95 页)下面是说一些例子,“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记了:当一种历史的现象被其他的、归根到底被经济的原因推动到世界上来时,它就能够在对于周围环境甚至于它本身的原因发生反作用。”(第 95 页)不仅对于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反作用,对于自己本身还有反作用,形式继承性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用。

这一封信就是这几点要注意，意思都讲了，没有什么别的要讲。

第二十封信：恩格斯给丹尼尔逊

—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这封信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上次讲过，这封信等于批判了俄国的民粹派。民粹派认为原始公社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了这一点，他说：“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在俄国，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不可能由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发展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不曾在某些其他的国家里已经体现于生活中并可以引为范例的话。”(第101页)这一句话是反对民粹派的重要的话，这还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死板地只讲一点，农村公社不可能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怎么才可能，怎么才不可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都要看条件，一切都要看到它的相对方面。民粹派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原始公社要发展为高级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没有范例。但是这个问题在俄国革命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比如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有一些少数民族是原始公社末期，它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有了范例，有了党的领导，才能这样做。

第二十一封信：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这封信有一些需要解释的问题，有一些复杂、不明确的问题，念一下。

“一、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关系(我们把它看做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是一定社会的人类在生产他们的生活物资和互相交换生产物(在分工存在着的情形下)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第103页)

交换和分工分不开，没有分工不会有交换。这里讲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分工就不是交换。社会发生了分工以后就有了交换，我们讲的经济关系是在生产生活资料的时候和互相交换生产物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所以经济关系是讲生产关系，不是讲别的关系。

“因此它里面包括着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又决定着生产物的分配，从而，又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支配和奴役的关系，从而又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第103页)

可以引起这样的误解：恩格斯是不是把技术也当做生产关系看待？从字面看的确可以做这种解释，因此，有人批评恩格斯在这里搞错了，把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混淆起来了。现在恩格斯不在了，没有办法去问他，只有我们自己来研究。在我看来，在这里，恩格斯没有直接把技术当做生产关系，只是说经济关系里面包括着技术，它不能脱离技术。要了解生产关系要注意到技术，研究经济关系要考虑生产力。为什么？他解释说：“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不是说技术等于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他上面讲的经济关系是讲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并没有讲技术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包含生产关系的意思。和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一样，生产和交换方式不是一个意思。当时使用名词没有严格按照他们后来确定的名词使用，他上面写的可以解释成恩格斯把技术当成交换方式，而后来的解释是把技术和交换方式分开，和阶级关系更有分别。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恩格斯在这里没有错，至少是基本上没有错，只是用词、用概念不很严格，也可能是写一封信因匆忙而随便一点。当时写这封信是1894年，当时恩格斯已经很老了，身体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写一封信不很严谨是可以理解的。大体上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交换方式，决定分配，决定阶级，决定国家和政治。

下面这句话也是有误解的：“此外在经济关系的概念里所包含着的，还有经济关系依以活动地理的基础，还有那在事实上遗留下来的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残余之能保存下来常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力)，自然也还有那从外部把这个社会形式包围起来的环境。”(第103页)

如果照那一种解释，恩格斯把地理、旧社会的残余都包括在生产关系里面，那恩格斯就犯了大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我看恩格斯不至于这样。恩格斯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地理的基础就是经济关系，只是一种条件，就是说，在研究经济关系的时候要研究地理条件，这是要防止简单化的意思。马克思《资本论》里面也讲了很多地理条件，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新大陆这有区别。在新大陆发现以前或是发现以后，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地理条件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它的特点。恩格斯也没有把地理条件归入生产关系，这只是条件。从外部把社会包围起来的环境是一些自然条件，这要考虑。这里不是只提出地理，而且还提出各种自然环境和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更用不着解释了，没有什么可以误会的。所以，恩格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只是用语上不够严密，这种问题可能是有的。

“倘若如你所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就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从属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十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第 103—104 页）

这里有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科学决定生产，还是生产决定科学？照恩格斯的看法，是相互关系，在相互关系里面有第一性、第二性。其中有生产和科学的关系，又有技术和科学的关系。技术决定科学，这是第一性的，科学又决定技术这是第二性的。这是辩证法里面相当普遍的问题，到处都有相互关系，相互关系里面都有第一性、第二性的分别，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辩证规律。我们看问题都要这样看，特别是研究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太复杂了，所以只看因果关系是片面的，要看相互关系，单看到相互关系也有一些片面性，在这相互关系里面又要看到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要抓住这一点。

“二、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但种族也正因为是一种经济的因素。在这里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第 104 页）是不是会有人把种族看成是经济关系？不能这样解释。民族特点也是一种经济的因素，是影响经济产生特点的条件。下面都是一些具体解释，不一定要讲了。

这一本书就讲到这里，以后有疑问可以提出来。

第 22 章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1964.04)

【1964年4月16、17日,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班”、“60班”、“61班”)党史专业班进入专业学习,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学员的要求,艾思奇从党史的角度讲解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阐述了这两篇著作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便用这个中心意思作为标题。讲稿按速记稿整理,在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基本上保持原貌。】

(一九六四年四月)

第一次讲课

(1964.4.16)

今天,给党史专业的同志们讲一讲毛主席这两篇哲学著作,准备分为四个问题来讲。

一、毛主席在当时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二、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提出的任务,简单地说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三、从认识过程上来克服主观主义。

四、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

第三个问题主要讲《实践论》,第四个问题主要讲《矛盾论》。

大家要求我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讲一讲,第三、第四是讲主要内容的。这和哲学课不同,哲学课是要把内容中的各个方面都讲一讲,现在是讲党史课,结合党史讲最主要的内容,和实际工作中最有密切联系的内容。

1.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这个问题总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在革命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作思想准备。所谓新的历史时期，在当时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这是1937年，大概是八九月这个时间。我是9月底(或是10月初)到延安的。这时毛主席刚把《矛盾论》讲完，我很遗憾，没有听。当时是给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我到延安以后，得到了毛主席讲课的提纲。

这个时期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基本上从“七·七”事变就算结束了，或者说早一点是“双十二”事变(1936年)放了蒋介石就基本结束了。但还有一些残余，后来还有一些小冲突。到了“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进攻，这时国民党正式宣布抗战。八九月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正式宣布向日本抵抗，他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抗战之责，这话是在庐山会议上宣布的。这对我们有利，地无分南北，我们在北方，什么人都有抗战的责任，我们也有。抗战正式开始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以后庐山会议正式宣布，国民党代表中国向日本宣战。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一些空隙。内战停止了，内部的斗争不用太忙了，毛主席有时间读了很多哲学书。搞哲学这样的理论，一般地搞当然随时都可以，但要系统地搞，像毛主席这样写出讲义，是要有一些时间的。所以这是为了更好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进行革命斗争，为了在新的革命斗争里面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毛主席考虑到要使全党作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能够学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亲自教育我们的党，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长征以后集中起来的骨干，有了长期锻炼的干部，对这些干部进行世界观的教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提出这样的任务，也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结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觉得有必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不是毛主席自己要做准备，毛主席自己是有准备的，是讲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准备。因为，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干部没有准备，尽管我们有很忠实的干部，尽管我们在斗争中非常英勇，非常坚决，但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犯了大错误，都走了很大的弯路。应该说，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

都有伟大的成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这是很大的成绩，后来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发展了，由小组发展到很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失败以后还有几千人，而且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出来，并且取得了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了农村，取得了农村革命的经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创造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进行革命斗争的规律，这个规律当时仅仅适用于中国，在当时是一件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怪事。毛主席讲只有中国有这个条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只有中国才能在整个白色包围下，出现红色小点，能够在农村里面建立根据地，当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都说成是中国的特殊规律。

今天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形势发展了。当时要想在非洲，要想在马来亚，要想在拉丁美洲出现农村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时期。那时帝国主义在大战以后，在俄国革命以后，能够空出手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革命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了。时间最长的是非洲的摩洛哥革命，打了好几年，最后也全部被消灭了。欧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爆发了革命，都失败了。只有俄国一个国家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不可能出现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在那个时期来说，是全世界一件怪事。怪事这是个形容词，其实也不是怪事，是中国特有的情形。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其他殖民地国家是一个帝国主义控制的，内部没有几个帝国主义争权夺利，没有军阀内战，比如印度就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中国是半殖民地，就不同了。许多帝国主义要争夺这一块地方，帝国主义的争夺反映在国内，出现了军阀混战，反动派不能集中起来，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人民革命，他们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矛盾、军阀矛盾中间找到发展的地盘，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创造了这么一条无产阶级的新道路，摸到了这么一个新规律。这一条道路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能够有一个时期空出手来镇压别国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不同，我们中央最初有一种估计(这是一个假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要遭殃，可能要被镇压下去。这个事

实也有，但结果不是这样，这个假设后来改变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们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没有一个时期停止过，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是时候稳定，资本主义世界(就世界范围来说)，相对稳定不存在了。革命是此起彼伏，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胜利的是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是比较迟的，这是讲社会主义革命，其他一般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斗争胜利的有阿尔及利亚，它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走社会主义方向，而群众有一大部分要走社会主义方向，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不大愿意走，但有人民的压力，不能不有所进步表示，能不能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收外国的企业，没收大企业，没收大庄园，声明分配土地给农民，他分配土地想用恩赐的办法，不是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革命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现在还在不断地爆发，武装斗争不断地出现。有的地方被镇压下去了，比如刚果，有的地方起来了，比如南非、委内瑞拉就是最明显的，方针、方向清楚。拉丁美洲有一些党的领袖想搞和平过渡，但是不断出现左派，巴西的领导想搞和平过渡，但是党分裂了，也存在农民战争。所以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有能力来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它更衰落了，力量更削弱了，削弱很多，使得它没有力量能够把各国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形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特殊怪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普遍规律，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许多国家进行革命的一般道路。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人民革命力量最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锁链中间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农村武装斗争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通过农村的武装斗争进入人民革命，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成为现在人民革命的一个基本道路。能不能算是基本道路，没有文件可查，我觉得是这样，可以这样说。我们讲问题可以多少加一点创造，如果错了，我收回，如果是对的，是创造。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在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这么一点发展。

从前十月革命的时候，曾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从城市搞起，后来变成了一种教条，在“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妨碍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经验证明，不能把它作为教条。现在，通过城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城市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这个教条实际上成为修正主义议会道路。因为你一定要在城市里面搞，而城市里面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强大的，一般情形下在城市里搞暴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历来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就是由于对外或对内战争中，反动派的武装垮了，比如巴

黎公社为什么能在巴黎搞起来?因为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打败了,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垮了,在这个条件下,城市里面搞起来了。俄国革命也是这样的。沙皇的军队在东线总司令兴登堡领导下在一次战役中打垮了,被俘虏了二十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革命有可能搞起来。在平时,反动统治者没有因为战争搞垮了军队,你在城市里面搞,要取得革命胜利一般是不可能的。眼睛里面如果只看到城市,结果是议会道路。这次中央很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革命首先在这个地方搞起来,这个地方就整个世界来说,是世界的农村,而革命,多半是从农村搞起来的,古巴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阿尔及利亚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南非也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委内瑞拉正在农村里面搞,巴西也正在农村里面搞。现在没有一个国家革命是首先在城市里面胜利的。所以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讲时代要看到现代的新情况,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的新情况。

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找到了这样一个农村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找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造。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果也是非常伟大的。抗日战争以前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首先应该肯定有伟大的成果。

但是,也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犯了很大的错误。遭受挫折的原因是犯了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错误很大,使得革命功败垂成,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打到南京,结果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了,又垮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都垮了。损失是很大的,挫折也很大,很痛心。原因就是党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也就是没有思想准备。经验总结为思想、理论,才是真正有经验,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功和失败,就要考虑到重新给党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有了思想准备,进一步革命就会搞得更好了。当然,革命总是曲折的,不能希望革命的发展是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即使有了思想准备,即使指导思想已经完全正确,干部也能够领会正确的指导,但也不一定就能够避免曲折,也不能希望一点错误、一点损失也没有,要是这样希望,就是幻想,没有这种可能。一切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所以,曲折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有思想准备,就可以做到少犯错误,特别是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避免犯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

没有思想准备，就会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犯全党性的、战略性的错误。从中央的领导起，陈独秀是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路线就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有李立三、王明、博古、瞿秋白同志很短时期的盲动错误，也是多少带有全党性的。本来是已经有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能够成为党的路线，没有被全党干部接受，而多数干部接受了陈独秀、李立三或者是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就是全党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多数人不能分清是非，因此多数人跟着错误路线走，而正确的路线反而孤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为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如果党的干部有了思想准备，即经验经过了总结，那么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也就是大的错误就可以避免了。

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党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都没有成为全党性的，到现在一直还有错误，但都不是全党性的，包括前几年的“五风”错误，这是普遍的错误，但你不能说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说是中央的，因为中央及时看到了错误，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毛主席看到了这个问题，开了郑州会议，如果坚持下去，可能是路线性的。个别地方可能是路线性的，但全党来说不是路线性的。所以，如果有了思想准备，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可以避免犯很大的错误，可以少犯错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不犯错误。一点错误不犯也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党，怎么能一点错误不犯呢？但是我们可以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太大，即使犯了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如果能够这样做，就能避免大的曲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少绕大弯路。完全不绕弯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弯路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不可避免，如果敌人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这时你不走一点弯路怎么行？有的时候，弯路是要走的，曲折是要经过的，我们不能避免一切曲折。但是，可以避免太大的曲折，太大的失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而且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有这种必要，而且有这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也可能实现这种要求，条件就是一个：要有思想准备。中央指导正确，全党有思想准备，至少是主要干部要有思想准备。

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六中全会有一个“论新阶段”，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应该要求我们搞的更好一些。过去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没有搞好，中途失败了，挫折很大，现在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应该避免以前那种失败，凡是正确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提

出这种要求，应当担起这个领导责任。毛主席在进入新阶段以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的结果认为应该要使党的主要干部有思想准备。

怎么才能使党的干部能够有思想准备，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要借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特别是向错误学习，也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就是总结经验，学习的基础就是经验。当然要学习理论，但不通过总结经验来学，是没有办法学好的，我们已经有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很够我们干部学习的，我看那时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要教育党的干部向错误学习，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可以从政治方面总结，可以从军事方面总结，也可以从经济方面总结。在当时党的历史上有这种情形，军事方面的总结比较早，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做了军事总结，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追在屁股后面，生死存亡问题要决定，“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已经垮台了，不能不总结，并且不能不依靠毛主席来总结，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把军事问题做了总结。我们看遵义会议的总结里面对政治方面还是有保留的，没有总结，那时要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是不行的，做不到，因为当时的领导集团除了毛主席以外，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在，如果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在遵义会议时说在政治路线上也错误了，全党要大吵起来，时机不成熟。在这方面要学习毛主席，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地解决，时机不成熟要等待。政治上不是没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按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在政治上解决才能最后根本解决。一个党发生了根本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在路线上解决。比如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后还是政治上解决。因为，这个斗争最主要的是政治斗争，但最难解决。最不容易妥协，最不能调和的也是这个问题，其他枝节问题搞一些让步容易，政治上根本路线问题不能让步，对修正主义不能让步，我们也不能让步。党的问题，革命问题，最主要的、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可是，在遵义会议上不能解决，但是，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全党统一不起来，党的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在政治路线统一的基础上，组织上统一，然后其他方面才能统一。在遵义会议上时机不成熟，所以毛主席在等待，只把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军事问题，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能得到全党接受，教条主义者也不能不接受，张闻天就比较快地接受了。政治问题就很难，“七大”的时候，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接受了，后来有的人又犯教条主义的老毛病。所以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如果一个人犯了根本性的政治错误，很不容易解决，

当然，不是不能解决。所以，要注意不要犯政治上、路线上的错误，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要根本解决问题，全面解决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解决，必须对全党的经验，革命的经验做政治总结，这个政治总结在遵义会议上是做不了的，什么时候做的呢？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才做了，从1935年至1945年是10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开始等待了10年。在遵义会议上，军事上做了结论，政治上做了保留，遵义会议决议初稿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两句，后来“毛选”上没有了，因为那时是一种暂时的让步，“毛选”出来应该删掉。

要做政治总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必须对全部历史经验做全面分析，必须对党内各种历史上的争论加以全面清理，从各方面分清是非，不但要分清是非，而且要搞清楚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分清是非，必须把为什么搞清楚，不然，还是等于没有分清是非。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就要使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所谓思想准备，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使我们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他掌握了这个武器，就会总结经验，不掌握这个武器，虽然有经验也不能总结，有同样经验的人，他的思想武器不同，世界观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不要以为有了经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有了经验，自己就背起了包袱，我是老经验、老资格，我就是一定正确了。不见得。有了经验，没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会犯错误，甚至会犯的更大一些。因为他有了经验，他可以拿经验做武器，有经验也可以吓唬人。有经验是好的，但运用的不好，可以吓唬人，可以俘虏没有经验的人，可以使一些没有经验的人盲目服从。这种事情不少，赫鲁晓夫你说他没有经验？他还干了几十年的革命，但他是修正主义。他是在苏联党里面长期做中央负责工作的人，不能说没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是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那还会有错误？有错误还能做部长会议主席？还能做党的总书记？青年小伙子一定会这样想。不但是青年小伙子，就是老伙子也还是会这样想的，因为它是列宁的党、苏联有40年的革命经验，怎么会错呢？现在有很多人是拿这一块招牌，它是40年的党，列宁的党，怎么不听他的话？怎么不服从他？所以是非的标准，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掌握起来，不掌握起来，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不可能真正分清是非。

是非的标准是实践，搞革命失败了，那你就搞的不对。所以遵义会议的时候，军事工作的决议能够做下来，因为实践就是一个标准，不管你吹的

多好，打了败仗，敌人追打的你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不肯定这一点。有了实践作基础，就可以初步分清是非了，只要有了一些经验，哪一件事办的对，哪一件事办的不对，逐步可以了解。但是，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只有实践的经验，可以大体上知道是非，但是如果对实践经验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是非还不能够最后分清，因为原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斯大林后期在肃反问题上，党内生活问题上，还有在农业上出了一些问题。肯定地说，斯大林是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对的，但是，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可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修正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这个错误的经验发展修正主义；莫洛托夫不会否认有些事情做错了，但是他没有发展修正主义。所以仅仅凭经验初步分清哪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非，如果不进一步说为什么是，为什么非，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产生错误的想法。所以，解决问题不是只靠经验，而要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这就是说，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从立场、观点、方法方面解决问题，没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真正总结经验。王明、博古也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是没有读过这种书，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口头上的，不能成为武器，用莫斯科宣言的话来说：不能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就是言行不一致，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做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德波林学派错误的特点就是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但不能在实际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只是讲的是这种武器，但不能掌握这种武器，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工作中、实践中的问题，不能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讲是讲得好的，但说明一二个问题就错误了。这种情形，还是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所以，要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实际工作里面，才能够正确地总结以往的经验，也才能正确的观察当前的问题，预见将来的问题，才能对革命工作的当前情况，发展的前途，做出正确的观察和估计。所以，毛主席就考虑这个问题，要使我们党的这些有经验的干部，不仅仅是有经验，而且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来总结这些经验，这样我们党的干部，对革命工作得到一种思想准备。因为有了这样的考虑，毛主席就写哲学提纲，写《实践论》、《矛盾论》，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这样做才能真正把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才能真正从错误中间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也

才能真正克服错误。这样来批判错误，才能得到积极的结果，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一点也是有经验做根据的。在抗日战争以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错误不是没有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曾经受了批判，盲动主义受了批判，后来立三路线又受了批判，结果还是犯错误，不但犯更大的立场、路线的错误，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已经批判过的错误又重新犯呢？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些错误呢？以前不了解，后来了解了。这些错误虽然经过批判，但不能真正克服，原因是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基础，没有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这些错误，批判这些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批判过，这个批判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分析为什么犯错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盲动主义批判了，是“六大”批判的，但是“六大”决议里面有许多新的错误的因素，以后又出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还是一种盲动主义。“四中全会”又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可是又犯王明、博古的错误，错误更大了。这是更大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点在1941年、1942年整风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党在整风的时候已经讲过为什么过去批判了的错误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所以重犯这种错误。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民主革命进入抗战新阶段的前夜，这时毛主席对党的干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解决党内问题，解决是非问题，对克服过去的错误问题，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上起这样的作用，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为了分析过去的是非，为了使党善于向错误学习，真正能够克服错误，为了这个目的，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党的主要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就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问题。在当时凡是我们的正确的领导者，我们英明的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少奇同志在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人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以后不久，内容就是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为了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对党的革命工作做思想准备，使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是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所以刘少奇同志是毛主席伟大的帮手、伟大的亲密战友不

是偶然的。同样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真正考虑每一个时期的革命问题，每一个时期的关键问题。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党员有思想准备，是我们党善于学习经验的关键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当时理论上的考虑，也是有历史经验证明的。毛主席为什么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始终正确？经验证明，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正确，是毛主席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一直注意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问题，随时注意反对主观主义。为什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能够考虑到首先搞农民革命运动？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反对陈独秀的主观主义，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要靠工人，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眼睛就看到工人、城市；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知道共产党要有同盟军，要到农村里面找。为什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毛主席首先到井冈山？古田会议决议很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决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实际的工作里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要搞唯心主义。在这样一种根本思想指导下，所以毛主席始终是正确的，和王明、博古这些人的路线斗争的时候，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路线的思想当时就有了，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根本环节上去掌握问题，所以，毛主席不仅仅是在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才考虑到党的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才考虑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问题，而是在以前，在指导革命的时候，一贯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因此他的指导没有犯根本性的错误。当然，小的错误不能说没有犯，毛主席自己也讲，小错误也是有过的。干革命工作，一点小错误都没有，不可能。我们说毛主席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的路线始终是正确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因为暂时问题，一个时期的问题，材料不够、经验不够、看的稍微偏一些，就说他不是一贯正确。我们现在的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这是应该肯定的。列宁说他犯过个别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也说犯过个别的错误，你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一贯正确，列宁不是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贯正确的，斯大林后期在许多大一些的问题上不能说是一贯正确的，因此，一贯性就取消了。他的错误是比较大的，不是个别的、暂时的，是好几年，而且这个错误涉及到部分世界观问题，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主观性、片面性，所以，他的一贯性就有缺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因为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暂时的看法稍微不合实际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也不可避免。这些经验也证明，抓世界观问题，是党的

思想准备，搞好党的工作，善于学习经验，是克服错误的关键问题。毛主席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向党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教育，不是偶然的，是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做基础的。

根据上面讲的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号召党员干部来学习，这一件事情的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是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说明有这个必要，两次革命战争中间发生的屡次错误与失败，说明党的干部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不重犯错误，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定要重犯错误。所以，毛主席对党的这些主要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的写作不是随便凭空想出来，不是一般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都要学习哲学。这种考虑也是有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迫切需要这一点。

为了抗日战争搞的更好，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抗日战争中间要抓住的矛盾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比前两个时期要复杂一些。因为，以前都是国内战争，以后变成了民族战争。当然，国内还有斗争，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要想在抗日战争里面，使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座的干部基本上都经过抗日战争，有许多同志两次国内战争没有经过，但抗日战争都是经过了的，抗日战争工作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了解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哪里能处理得了。国外有矛盾，国内也有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同汪精卫政府的敌我矛盾；一种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中有统一战线，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是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一个时候是敌我，一个时候是人民内部，性质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分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国演义”，在中国有两次“三国演义”，1500年前有一个“三国演义”，1500年后又有一个“三国演义”。我们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毛主席不做《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报告，不写这样的著作，不根据这些著作对党进行整风，抗日战争的8年能不能得到胜利，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蒋介石的天下可能稳下来，现在蒋介石不是在台湾，还是在南京，这是很可能的。

“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几次出现，初次出现是王明带来的，后来又出现也是外国带来的，最后到我们反攻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右倾的企图，还想我们不要和蒋介石打仗，这是国际上的意见，国内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同意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同意，因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前有一个时候，有些人有和平幻想。资产阶级、右派、国际上有这种意见，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很希望我们搞南北朝，甚至于搞所谓中间路线，让民主人士当总统、学习捷克的贝纳斯。捷克在解放后，最初是中间人士当总统，那个时候，捷克没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要复辟，把它打垮了。要是没有毛主席给我们党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以后的前途是不能设想的，不能设想有今天这样好的前途，这一点要充分估计。

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一定要充分估计它的作用，不要把这两篇著作简单的当成是哲学教科书，而应当看成是党在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党的贡献，非常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对以后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仅仅有这两篇文章也不行，如果没有后来的学习、没有发展成为整风运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哲学思想没有掌握群众，也不能起这么大的历史作用。这个著作之所以起作用，毛主席不但讲了，而且把它变成了实际行动，掌握了我们的干部，以后通过干部掌握了群众，所以发生了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实践论》、《矛盾论》本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是我们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总结。经验总结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方面总结的最高点，是哲学总结，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哲学的总结是政治总结的准备，没有世界观水平的总结，政治总结也是搞不好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后来的1942—1945年的整风运动，以及对这个时期的整个党的经验的全面总结，打下了思想基础，打下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革命中吸收新的经验，使自己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的。《实践论》、《矛盾论》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通过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使自己丰富起来，使哲学丰富起来，这两篇著作不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甚至把斯大林时期哲学发展成果，这一普遍真理结合到中国实践经验上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发展，大家看一看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的确是发展了，而且是在很重要的问题上发展了，因为以前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

宁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是这样的意思，相反地，是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伟大，他们所发现的这些观点，他们奠定的世界观，能够不断地在新的实践经验里面得到证明，不断地在新的斗争中能够发展，永远有生命力，永远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力的战斗武器。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比较，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面稍微一般一些、原则一些，但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面，就充分展开了。

毛主席写这两篇文章不是随便写出来的，花了很大的功夫，看了很多书，在写这个文章以前，考虑了几个星期，好几天睡不着觉，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写。毛主席那时四十多岁，精力很旺盛，精心创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写的，所以，他的著作到现在越来越感到正确。最初我们读的时候，对它的意义看不出来，今天来看它的意义，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在反修正主义斗争来看，它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所起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写哲学文章，随便考虑一下就写了，隔上二年看起来，就有许多毛病。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已经是二十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还可以看出许多新的东西。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有这个特点，你碰到新的情况，再去读它，又发现新的东西。《共产党宣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读还是有新的东西，经典著作是不朽的，它有这种不朽的特点。

2.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所提出来的任务

讲理论总是先把要讲的内容首先点一下。写理论文章都有一个一般的规律，开头总是要把中心意思点出来，一开头就看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使人想看下去，写文章是这样，讲理论一般也是习惯于这样讲，现在把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一下。

这两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说，是要教导我们党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写这两篇哲学著作所提出的任务是这样的，要求我们解决这样的任务。三句话可以重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莫斯科《宣言》里面的话。在实际工作里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里面反对主观主义。

毛主席写哲学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不是无的放矢。我们有一些人写哲学著作，也不是无的放矢，不过目的有一点不同，是换一点稿费。当然

也不是说所有写哲学文章的都是这样，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马马虎虎一写，在报纸上发表，换稿费，不是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形从来都有。这也是有的放矢，但这是另外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有的放矢，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的放矢。还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有的放矢，就是要吓唬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都不是有的放矢。写文章换稿费、写文章吓唬人，都不是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为了实际工作，“的”是针对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就是它的“的”。为了指导实际工作，为了克服实际工作里面的错误，《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实践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干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什么是？什么是非？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使我们干部学会正确分清是非，学会区别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学会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里面找出来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为什么错误，为什么正确，正确和错误怎么区别。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里面给我们以回答。就是说，凡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路线，从思想上来说，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能够求得一致，为什么是错误的？就是主观与客观分裂。《实践论》里面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在哪里，一切错误思想的原因是什么，陈独秀为什么会错误？王明路线为什么会错误？立三路线为什么会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就是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反过来说，正确的思想，马克思思想、恩格斯思想、列宁思想、毛主席思想的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不分裂，主观与客观经常能够取得一致。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呢？要克服错误，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求得一致，使认识与实践不要脱离。克服错误的方法，就是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总的来说是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实现这样的任务，做思想准备就是要准备我们的思想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准备我们在新的革命斗争阶段，努力使主观认识与客观求得一致。并且发现某些有分裂的地方，努力克服这种分裂，随时注意不要使我们的认识脱离实际。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向我们党的干部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提出来的任务。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改造世界呢？就要通过一个方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能够经常取得一致，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不要与实践脱节。求得主观与客观一致，认识与实践不要脱节，并且要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呢？因为主观与客观是一个矛盾，

主观与客观经常有矛盾，认识与实践也经常有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努力克服矛盾，求得一致，这样才能克服分裂。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点不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共同点，都肯定正确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一致，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因此，要克服错误也就是要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分裂。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克服错误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裂，努力使主观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告诉我们主观与客观为什么会分裂？因此怎么克服分裂这个问题他也不能解决，因为他找不到原因。原因找不到，也就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种错误，凡是找不到原因，也就没有办法解决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批判以后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批判了，也没有找到原因，也就没有克服。旧唯物主义有一个缺点，虽然认识到认识应该正确反映客观，错误就是因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分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分裂，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完全解决(部分解决也可能的)怎么克服主观与客观分裂的问题。我们说他不能完全解决，就是说 he 也可以解决一些，不是完全不能解决，如果完全不能解决，旧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就没有作用了。旧唯物主义还是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因为它肯定了主观应当反映客观，因此它也指导人们努力研究客观世界，在历史上也起一些作用。它提出这个原则，使人有一个努力方向，有了这个努力方向，多少总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过去的旧唯物主义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也起一些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唯物主义帮助了资产阶级认识了一部分社会规律，认识到应当革命，打破了宗教思想，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到传统思想是不对的，应当搞革命，比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起了作用，但只能起一部分作用，暂时的作用，法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认识方向就错误了，它不知道社会还要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永久不变。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长久起指导我们认识的作用，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指导我们不断进行革命。26年前，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又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这两篇著作今天照样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我们不断地进行革命。但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只能指导一个时候的革命斗争，不能完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分裂问题，不能长久解决这一问题。而《实践论》、《矛盾论》就能够解决问题，能使主观符合客观，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帮助我们不断地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旧唯物主义高明的地方、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高明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旧唯物主义的长处，与旧唯物主义正确的东西完全一致，但是，旧唯物主义的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完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里面积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的；旧唯物主义中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没有。旧唯物主义中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旧唯物主义所没有的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

旧唯物主义缺乏什么呢？有一点是正确的，它肯定了人的主观认识应该反映客观，正确认识是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旧唯物主义是有的。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旧唯物主义却没有，就是以前的唯物主义它不懂得：第一，人的认识依赖实践，与实践分不开，是以实践为基础；第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主观反映客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两点旧唯物主义没有。旧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要人偶然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够一下子认识一切真理，不了解正确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尽头。正确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的，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逐渐正确起来。由不正确到正确，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知到知，由知道很少到知道很多，这是一个过程。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没有辩证法。不懂得这一点，也就不懂得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找不到为什么会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有时好像是正确的东西，忽然一下变成错误。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一个时候的确是正确的思想，隔一个时候变成了错误？这一点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教条主义为什么会错误？不是因为他的教条绝对错误，他的教条的来源，原来是正确的，但是被教条主义者一用，变成错误的了。真理会变成错误，因为条件、地点变了，运用错了，它就错了。在认识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它是正确的，在另一个时候运用不当就错了。所以，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这两点，但是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旧唯物主义没有。

所以，旧唯物主义者不能完全解决分清是非问题。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不能最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解决这一点，就能够完全弄清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我们说的这两点，集中起来主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统一的，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处理唯物主义的问题，处理人的认识问题，处理反映论问题。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心是肯定了主观与客观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绝对的，是永远有矛盾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因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绝对的，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不可能绝对一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客观实践的一致，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最正确的认识，也是在不同程度上与客观实践有不一致的地方，最正确的认识也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列宁曾经反复讲，人的主观认识，最多也不过是与客观实践近似而已。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实际上是近似的反映。有没有绝对的反映，正确到主观与客观不是近似，简直是一个东西了，没有这回事。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要把这当成一个缺点，这是真理。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实践只能是近似的，能够最大限度的近似，就算是最正确的认识，因为不管你怎么正确认识，比较起客观实际来总要少一些东西，因为客观实际总要比你的认识丰富一些，再怎么聪明的人，脑子里认识问题，总没有客观实际这样丰富，任何时候总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肯定这一点，不肯定这一点，就会自满了。

过去哲学界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会自满，连黑格尔这么著名的人，这么大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达到了顶点，世界上的哲学问题被他发现完了，从此不要再努力了，以后的人不要再学习了，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一到认为自己的认识已经到完全与客观一致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能进步了，也就没有办法进步了。你研究一下，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毛病。王明认为自己的思想绝对与客观一致。这些人不能批评，你批评他，他就大发雷霆，就打击你。

我曾经和王明有过一些接触，有一个时候我翻译列宁的《谈谈辩证法》，他也翻译，他翻译后把稿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觉得他翻的不错，有的比我好，但在个别地方，有些字我看是翻译错了，就是在讲到肯定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因此才能够认识到发展的源泉。“源泉”这两个字他翻成“钥匙”，这两个字本来俄文是双关，钥匙与源泉可以通用，但是按照德文、英文是“源泉”，他翻成“钥匙”。我提意见说，你的稿子总的比我翻的好，我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学习，但这两个字是不是考虑一下，把它翻成源泉好一些。我这个态度是非常客气的，但这意见一提，很快就挨了一个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好像是成为“二元论”，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王明已经被批判了，我的胆子也大了，我说，你是错误的，按照英文、德文原意，从全文来说翻成“源泉”还是好一些。这人不懂得认识论，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认识的真理，一个字都不能批评，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提出意见，当他领导的时候，你不能提批评的意见，每一个字都必须服从。你们想一想赫鲁晓夫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所说的话，你们谁敢对

他哪个字批评一下，你试一试，当然我们不是苏共党员，没有这个机会，假如有这个机会，你试一试，不挨棒子才怪呢。这些人的脑子里没有辩证法。

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应当听取群众任何一个微小的意见。当然，群众的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要分析，但有时是对的。古人比赫鲁晓夫、王明聪明一些，中国有句古话这是千古不朽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也是辩证法。这些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就没有辩证法，他以为自己是智者，智者千虑绝无一失，愚者千虑绝无一得。他们的逻辑、认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应当肯定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不是绝对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近似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讲了这个问题。

认识既然是近似的，是不是总是要有错误呢？小小的错误总是有一点点的，有一些不叫错误，就是主观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想问题，有一些地方和客观不一致，这不是错误，这是某些不一致，这是必然的。所以，正确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的认识是一贯正确的。我们说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正确，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我们的领袖人物，我们这些经典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使他的主观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深入事物本质，不断地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到本质，由不知到知，经常能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最大限度的接近，最大限度的近似，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就了不起，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经常做到这一点，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人估计问题能经常八九不离十，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估计问题经常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能经常做到八九不离十就了不起了，这就是一贯正确，党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这一点，当然，还有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中央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差一些，到了后期不是八九不离十，是三七开，变成了六七不离八。我们这些人估计问题能够四五不离六就不错了。我们能够做到四五不离六，或者五六不离七，就很不简单，能够经常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就可以了，而是说现在的水平，努力把力还是可以提高的。毛主席不是不能学习的，长期努力可以提高，可以接近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司马迁赞扬孔子，从前人的眼睛里面的孔子，就是现在我们眼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这话很好，意思是，孔子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仰望他呀，不断向他走去，不断地努力

接近他呀，虽然还不能到他那一步，我们的心总是不断地向他努力。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虽然不能到他们那一步，但总是努力向他们学习，努力接近他们，心里不断地向往着他们。

反过来说，错误是什么呢？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正确的认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断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保持近似。错误是相反的，我们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是不断的接近客观实际，而是在一个时期忽然离开了客观实际，甚至不断地越离越远，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往往是开始认识是正确的，是接近客观实际的，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脱离了实践，不注意保持近似，结果实践发展了，客观实际发展了，而我们的主观认识还是停顿不前，结果是主观与客观分裂了。不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是实践、认识之后停顿了，不再实践、不再认识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原来是正确的认识，经过一个时期，变成了错误。得到了一个正确思想，如果努力下去，不断丰富，原来的内容还是保持着，经过了丰富，还是正确认识，只要它不断的发展，原来正确的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原来的认识只有这么一点，不再丰富了，实践发展了，它本身贫乏，就离开了正确的认识，就变成了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在最初出发的时候就错的，不是一开始就错，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起发展的实践来说，是分裂了，所以就错误了。马克思的某一句话原来是正确的，后来也应该可以是正确的，只要是补充新的内容，他的话永远可以有生命力，但是，不补充新的内容来处理新的问题，就分裂了，就错误了。这不是原来正确的东西本身变成了错误，不是真理本身变成错误，而是真理本身要发展，你不让它发展，就变成错误的了。所以原来是正确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不去努力进一步接近客观实际、脱离实践的发展，就变成了错误。要保持原来正确的东西永远正确，你必须丰富它，否则，就可以和客观分裂，就变成了错误，甚至于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实践论》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规律，要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每一个循环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一贯正确。中央和毛主席认识问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个正确的认识，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的其他著作里不断地发展，不断充实，不断丰富，革命每发展到一个段落，总是添上一些新的内容，所以他一贯是正确的。如果毛主席仅仅靠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指导中

国几十年的革命，一点也不加新的内容，会不会犯错误呢？肯定是会的。但是，毛主席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一贯正确的。

不断向新经验学习，不断吸收新经验来丰富我们原来的认识，任何时候防止主观认识停顿起来，这样保持我们中央的思想一贯正确。我去年讲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唯心主义，但有人不同意。我今天再一次肯定这一点。应当承认中央的领导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因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是个别的，凡是一贯正确的东西，一贯正确的领导所做出来的工作，一定是成绩为主，而且我今天还要肯定这一点，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去年有一点不敢讲这话，那个时候讲大受反对，你说成绩是主要的可以勉强接受，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中央文件做根据，因为今天中央还没有这样讲，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可以这样讲，大家考虑考虑，错了收回。为什么我今天可以这样说呢？去年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以前的三年直接在困难中，直接感到大量的缺点与错误，不能充分理解成绩为主，因为看的缺点太多了，困难太多了，根据直接经验，你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脑子里有一点想不通，你现在根据情况好转的这样快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天灾、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能够在很短时间里面把它转过来。从困难转变的这样快这点来看，不能不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理论。我们相信，以后日子过的越长、越能够肯定这一点，再过一年，到了秋收以后再看。六亿多人的事，要想在一年就看出它的是非，看出正确与不正确，是不可能的。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出，现在已经看出这个苗头来了，我想现在重新肯定一下毛主席这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指示，我们不妨敢想敢说，错了我们收回。现在有“三不”原则，大家不会给我戴“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

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来了解中央的指导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一贯正确，就是他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现的人的认识规律，指出要使人的主观认识不断保持对客观实际的近似状态，不断接近客观实际的发展过程，不断从经验里面学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每循环一次，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大家要我讲一讲中心思想，这就是它的中心思想。这是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方向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说

的没有这么完全，没有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来。如果大家一定要说我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是宁愿戴这个帽子的。列宁也只是概括一些，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列宁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包含毛主席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但是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展开，毛主席的《实践论》把它展开了，所以就更明确了。这并不是说列宁就错了，列宁对这个规律已经掌握了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里面也有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讲了，但还是萌芽状态。毛主席的发展，并不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根本观点里面，加了什么另外的东西，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那些，并没有另外的东西，不过他展开了，就像一棵小树，从前是小树，现在变成了大树。树还是那棵树，并没有变成另外的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树，经过了几十年以后，变成了大树，原来是一棵小松树，现在变成了大松树。这里面没有什么贬低不贬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生长发展的。毛主席就是能够掌握这样的规律，能够认识规律，不只是在思想上认识这个规律，不是口头上说，不只是在文字上写出了一本《实践论》，而是把规律运用在实际行动中，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永远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处于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所有党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因此才能正确指导我们党的工作，正确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来进行革命，能够比较迅速地得到胜利，能够避免犯根本性的、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能够经常保持一个正确的路线，有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比任何人更快地发现错误，比任何人更早地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这是毛主席在工作中的特点，这就是一贯正确，这里面没有什么主观主义，没有什么唯心主义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如果去年还有同志不了解，不能接受这一点，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思想清理一下。

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中心内容。

第二次讲课

(1964.4.17)

今天接着昨天的问题讲下去。昨天把第一个问题基本上讲完了，但还没有完全讲完。所以还要讲一点。昨天主要是讲《实践论》、《矛盾论》的任务，

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坚持哲学的党性。

什么叫主观主义呢？昨天也讲了，主要就是主客观分离。

分离的原因，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分离的，是在认识的过程中分离的，在认识过程中，主观认识逐渐脱离实践，这样，就不能够使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人的认识总是和客观有些矛盾的。所以某些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地方总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部分的错误也总是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要看认识能不能越来越更接近客观，能不能经常保持认识和客观实际情况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

我们讲的反对主观主义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主观主义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很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也就是路线性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王明、博古的路线错误，修正主义的错误，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这几年来刮“五风”的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个别部门的错误是很大的主观主义。主观和客观发生了很大的分离，有时候分离到完全违反客观的情况，根本不顾客观情况去作工作。这一种叫主观主义。

至于我们的认识和客观实际有某些不符合的地方，甚至于有某些个别的错误，这不能说是不错，照习惯说法，基本上不错，根本上不错，但个别的部分、有些地方有些错误，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叫主观主义呢？能不能叫唯心主义呢？这种情形就不能叫做唯心主义，不能叫做主观主义。所以，要加以区别，要把主观和客观某些不符合同错误加以区别开来。个别的部分的不太重要的错误、不带根本性的错误，和根本错误有区别。就是说，不能把任何错误、任何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情形都叫做主观主义，都叫作唯心主义。如果不作这种区别，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唯心主义，列宁也有唯心主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种个别的小一点的错误，他们也犯过嘛！不能因为有这么一种情形，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主观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就有了问题，不能这样说。这个思想，我以前也反复讲过，大家在许多问题上也注意到，我觉得还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重复一下是为了使大家比较深刻地了解，为什么中央是一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是反对的什么东西。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反对主观主义，目的是要照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的，不要犯大的错误，犯小一点的错误，小错误犯了以后，可以比较快的看出来，及时改正。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算是坚持了辩证唯物

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经过努力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

唯物主义是一条认识的路线，就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在走的过程里，不断接近客观，主客观不要分离。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反对的是这样一种错误，就是在实践过程里不经常依赖实践，而在一定时候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分离了。这种情形，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观主义。

主观和客观某些不一致，或者个别不重要的错误，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在认识上就永远不脱离实践。所谓不脱离实践，就是要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是一个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对，那个实践也不对，那个实践的方向也不对。不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脱离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实践，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就是说，不脱离群众路线，能够经常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避免主观主义，就有可能避免犯大的错误。出了个别的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能够修正错误。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认识上结合实践，而且要结合阶级实践。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一点也不能够脱离实践。实践性和阶级性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实践就是阶级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有实践性的，有阶级性的。这种哲学要求我们经常注意到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要求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把实践作为基础，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实践，要在行动上，在实际工作里，通过这条实践的路，才有可能克服主观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中心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道路，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在实际工作里克服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所谓找到一条道路，就是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永远结合阶级实践的路线，在认识上永远不脱离阶级实践的路线，方法上就是辩证法。《实践论》告诉我们的这一条道路，可以避免主观主义，避免唯心主义的道路，坚持哲学上党性的道路。《矛盾论》告诉我们一个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主要是要注意这一点，一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一个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学会克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

下面具体讲两篇文章的特点。第三个问题是讲《实践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克服主观主义。这是《实践论》的中心任务。第四个问题是讲《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

3. 《实践论》的作用和意义

党史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其错误来说，是根本性的错误，就其思想来说，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典型表现。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

到1937年的时候，我们党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根据实践所提供的充分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主观主义。因为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犯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还有局部的罗章龙、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各种各样的错误，提供了许多材料，告诉我们什么是主观主义。毛主席的《实践论》，无非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在《实践论》的文字里，没有写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因为这是哲学著作，不一定把具体事情讲的很多，而且在当时也不好讲，如果在1937年那个时候就写出来，三次“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那也不行。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情况，当时说出来，很多干部不能接受。虽然有这样的事实，但对事实的本质，许多人不了解。有了经验，并不等于了解经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本质。知道陈独秀的错误，知道立三路线的错误，知道王明、博古的错误，但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这种错误的本质，而且在当时还有些人坚持错误。在没有总结以前，你在当时如果说王明、博古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要争吵不休的。所以，当时明确地写出来没有办法使人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党还没有作结论。所以《实践论》、《矛盾论》里没有明确指出来。它举的例子是国民党到延安去的考察团，不举党内问题为例。但实际上它概括了以前的错误，并且从认识论上找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单从《实践论》的意义来讲，就是在我们党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取得了经验，犯了一些错误之后，能够从哲学著作上，从世界观的水平上，来概括这些错误，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原因找出来。《实践论》把过去那些错误总结出来两方面的根源。所谓两方面的根源，就是一方面从经验(感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另一方面从理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两种根源产生了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这两种形式在后来整风的时候概括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实践论》里没有明白这样讲。但是，《实践论》已经从实质上讲到两种错误的形式。一种错误就是理性认识脱离感性认识，脱离实践。在《实践论》上讲，这种认识否认实际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从书本上得到的一点东西自称为“知识里手”的人，实际上是指的教条主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经验主义，只是满足于个人的局部经验，不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革命工作的错误中做出哲学总结，找出错误两方面的根源，指出了错误的两种根本形式，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这应该说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贡献。因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的名词，以前的马列著作里也讲过，但那些讲法多半是涉及到一些纯粹学术上的理论问题，以前讲实际工作里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没有毛主席讲的这样深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话从恩格斯起就讲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把理论当做教条呢？这个原因用专门的哲学著作来作系统的说明，这应该说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原来的基本原理来发展的。而是把原来的基本原理更展开、更深入地作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也批判了教条主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批判了经验主义。但是，对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根源，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是毛主席的贡献。

为什么主观主义会有两种根源，会出现两种形式？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作了系统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是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上来，把人的认识看做不断发展、充满矛盾的过程。人的认识是矛盾的过程，这个矛盾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和客观永远有矛盾。犯错误的人，是主观和客观有了大矛盾不能解决。不犯错误的人，或者政治路线掌握得很正确的人，也不能够说主观和客观没有矛盾。矛盾是绝对的。没有矛盾，认识不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跟客观世界有没有矛盾？应该说有矛盾。如果说没有矛盾，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就用不着列宁再来写《帝国主义论》了。《资本论》是正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仅仅是《资本论》所说的那些东西，如果简单地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那就不够了，那就有矛盾。《资本论》解决了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客观发展过程和人的主观认识的矛盾。马克思用了几十年的功夫解决了这个矛盾。但是，到了20世纪，又发生了矛盾，所以列宁又来解决这个问题。

革命的主观认识和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有矛盾。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最初的认识就跟巴黎公社运动有点矛盾，因为他开始时不大赞成巴黎公社的

一些同志搞暴动，他感到要失败，所以不大同意。但是，巴黎公社已经搞起来了，他又赞扬巴黎公社，从巴黎公社里学到许多新的东西，学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这样就解决矛盾了。

到了 20 世纪，俄国革命出现了，如果列宁简单地按照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来指导行动，那就不够了。列宁最初在俄国革命以前，并不知道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列宁在主观上对这个东西是无知的。俄国革命逐渐酝酿起来，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的主观和客观是有矛盾的。等到俄国革命开展起来，工、农、士兵创造了苏维埃，然后列宁才找到了克服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从运动中找到了苏维埃的形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好形式。

后来，我们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多多少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用到中国来，我们也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后来怎么样？苏维埃这个名字不大适合中国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用了这个名字就完全错了。在这个名字之下，毛主席根据中国的情况，正确指导了革命运动。但是，在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把这样一种形式作了错误的运用。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研究。当时采取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形式，采用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妥当？至少可以这样说，采用这样一个名字，是当时没有很好解决主客观矛盾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理论还起作用的一种表现。不是说我们的共和国即当时的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就错了，不是这种意思。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所以不能不采取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名字，是我们党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主客观认识的矛盾，至少没有很好解决，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中国农村革命运动里，用什么名字更好，更接近现实，主观近似客观，用什么名义算是最大限度近似客观，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毛主席就叫做农村革命根据地，或者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叫解放区。教条主义者一定把它叫做独立国，叫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的著作里总是把它叫做根据地。因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利用这种形式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恐怕还没有。还有主观主义的影响。后来到了长征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字取消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根据地、解放区，现在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的。

认识的过程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主客观的矛盾包含着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包含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也包含着正确和错误的矛盾，

不知和知的矛盾，包含着各方面的矛盾。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认识与实践、感性和理性、不知和知、正确与错误这些矛盾。总的来说，这些矛盾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离，克服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克服主客观分离、克服错误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就是正确地运用、掌握认识的规律性。在人的认识过程里，正确地掌握认识的规律。不论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在自己的认识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过程里，违背了认识的规律。

《实践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违背认识的规律。首先是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有的一些什么规律。认识了这个规律，就懂得怎么样才能够不违背这个规律。《实践论》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总的来讲，就是从实践中逐步取得感性认识，逐步取得经验，然后把感性认识加以总结，使它变成理性认识。按照《整顿党的作风》来说，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综合性的、有条理的知识，然后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认识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的。这个规律，大家在学哲学的时候都反复学过了，用不着怎样解释了。这个规律，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实践论》里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系统地说明了认识的规律是一个反复不断的过程。我们用辩证法的名词来说，就是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然后重新又来一个循环。这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循环的过程，是认识的根本规律。就是说，认识永远是按照螺旋形不断发展的。如果我们认识了 this 根本规律，而且也照着这个规律去考察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保证我们的认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近似客观实际。如果我们的认识不能照这个规律做下去，就是说在螺旋发展中间有了停顿。认识规律是不允许有停顿的，要不断地从经验到理论，由感性到理性，又回到实践，要求不断反复，不容许停顿，如果我们有所停顿，那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主观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主客观分离是怎样出现的呢？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就是在认识的过程上，认识不断上升的螺旋形发展过程里，我们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那么就从某一点起，开始主观和客观分离，就要犯更大的错误。如果你的认识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一停顿下来，正确的就变成错误的了。

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一些领导者所犯的路线错误，不管是“左”倾冒险路线，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管是教条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你要找他的根源，都可以从这一点上来找。可以肯定，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在认识不断发展的螺旋过程里，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跟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前进，那么

就犯这种分离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经验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教条主义?根据这个规律来看,就很清楚。

经验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之所以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就是有经验的人就局部经验范围内使自己的认识停顿下来,满足于已经有了的经验,满足于一知半解。经验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形式,是由于在认识的经验阶段(认识的感性阶段)停顿下来,不总结经验,不读书,不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所以才出现经验主义的毛病。他们得到一点具体经验,从这里面作结论。说通俗一点就是这样的,根据一点局部的经验,就对问题作全面的结论。

我们说修正主义的观点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丢掉了普遍真理,而解释问题总是抓住某些个别事实把它夸大。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认识错误的根源,他说: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是讲认识),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像普遍的现象。他们不是把大量的材料加以分析,而是抓住一个经验就作结论,就把它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每一篇修正主义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脱离事情各方面的联系,只抓住某一点,比如说,古巴事件,作了那么一个卑鄙的让步,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个现象,美国剑拔弩张的形势松了一点,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大战避免了。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修正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那样卑躬屈膝的让步,紧张形势多少松了一点,解除了当时那种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解除一切紧张,对古巴的包围依然存在。他们就抓住了这个事情做出了结论:这是他对和平的很大功劳。这是经验主义的主要方法。

在党史的过程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是教条主义,当时的经验主义者是为教条主义服务的,做了俘虏。怎么样做了俘虏呢?从认识上可以得到说明,因为经验主义者常常总是看到一点,看不到全面的联系,对教条主义提出的主张,他可以从某些个别经验里去找到证明。教条主义者说,革命应该是进攻的,因而提出了冒险主义的战略,这种冒险主义的战略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可以根据他的一个战役,或者一个战斗的胜利,他可以做出结论,说教条主义的战略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你看我们这个战役把敌人打垮了嘛!这说明我们可以进攻。在一个战斗上,一个战役上,在毛主席

的指导下，的确是进攻过敌人，消灭了敌人。他就根据这一点来为教条主义服务，他根据这一点把他夸大，得出结论，认为在整个的战略上可以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教条主义根据外国的经验，提出了这种战略上进攻的方针。经验主义者根据一个战斗、一个战役的胜利事实来为他服务。他之所以是经验主义，他停顿在局部的经验之下，根据局部经验就做了一般的结论，不继续研究各方面的经验，不分析总结各方面的经验。这就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就是自己的认识停顿在理性认识的某一点上，从认识的规律来说，在认识过程的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再去注意新的经验，就是在理性认识环节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在新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吸收新的经验，这样使主观和客观分离，这就是教条主义。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王明、博古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一些国际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形成一种书本上的理论)，把它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却看不起中国的经验，轻视农村革命新的经验。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这句话就是教条主义者停顿在书本理论的某一点上，不继续吸取新的经验一种教条主义的典型口号。

《实践论》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这是《实践论》的要点之一、中心点之一。指出主观主义两种来源、两种形式这一点，也就使我们懂得了怎么样去克服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使我们懂得了从两方面去克服主观主义。

我们大家知道，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当时，党内领导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一般还是在军事问题上有根本的改变，其他问题上还没有根本改变。当然也有一些改变，毛主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许多干部还有迷信教条主义的情况。一直到抗日初期，王明回来以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志跟着他走，项英同志就是。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遵义会议以前，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教条主义占党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当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因此，毛主席著作的主要批判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因此是全面的。所以从《实践论》、《矛盾论》里不但可以找到克服教条主义的武器，而且也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的武器。

当时，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占统治地位呢？

主要原因，我们党是处于一个幼年的阶段，一般说来，是缺乏足够的经验的，除了少数人(像毛主席)以外，一般党员是缺乏足够经验的。这就使得教

条主义得以占统治地位。当时我们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非常相信国际上的经验，非常相信苏联的经验。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我们党跟印度党很大不同之点，就是非常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是这样的。可是，由于我们幼年的党非常忠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苏联的经验，教条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来使自己占统治地位。因为他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些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我们许多同志没有读多少马列主义的书，书本知识比较少，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另一个是还有外国的指挥棒。教条主义的来源有两方面，书本上的现成知识，外国的命令，这两个东西，在当时，我们处于幼年的党的一般党员，都是非常相信的。教条主义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特点，也是个弱点，篡夺了党的领导地位。

那么，当时的教条主义，是不是只限于“左”倾冒险主义呢？

还不是这样的。当时就有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也是教条主义。陈独秀的思想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呢？恐怕还不能说是经验主义。他也没有多少经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旧的狭隘的教条把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片面化了，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够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反对列宁的。列宁的著作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应该由无产阶级努力夺取领导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列宁的著作明确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领导权。当时的教条主义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论点，结果就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李立三阐明的是城市暴动的路线。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路线是很明显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就是陈独秀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看恐怕也是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片面化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东西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虽然不很明确，但也有无产阶级要夺取领导的因素。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路线，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走。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讲到要领导，但实际上有这种意思。这种革命的成分，右倾机会主义把它取消了。

另一个就是陈独秀从外国搬来了教条，外国的东西就是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革命的东 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又是

冒险主义，又是机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我没有搞这个专业，提不出很充分的材料来。据我的了解，我觉得可以这样说。经验的成分也有，比如害怕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经常威胁着要分裂。从经验中也可以看出来、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里，总是要分裂出去的。陈独秀恐怕主要的还是教条的问题。所以，教条主义不一定是“左”倾冒险主义。把教条主义跟“左”倾冒险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现代修正主义提到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把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当做一回事。实际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本身也有教条主义的来源。修正主义主要世界观的基础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这是他们主要的东西，而不是教条主义。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取消了。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他的有力根据。因此，修正主义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就是经常强调新的经验，强调实践。所谓实践，有两种解释：我们的解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修正主义者讲的实践，讲的经验，是某些个别的经验，个别的事实，他要我们注意某些个别暂时的事实，暂时的现象，丢掉了远大的东西，全面的東西。列宁已经说过，修正主义的特点，是迁就眼前的事变，为了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就丢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现代修正主义者有这么一种提法，你看，和平过渡有可能，为什么有可能？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民主、有议会选举，共产党还可以到议会里取得议席。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呢？的确有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这个片面的事实做出了结论，说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政权。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对于这一点有很明确的反驳。他说：修正主义者看不到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他只看到议会可以使无产阶级的代表有点席位，他不知道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结果，最后会引起比先前更激烈的暴力革命，他看不到辩证法规律发展的前途，只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眼前某些好处，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修正主义一般的哲学基础，都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也有两种。毛主席批判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那种经验主义，还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我们过去有很多好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斗争，取得了许多经验。这种经验，的的确确是斗争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主观幻想，不是个人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一般说我们认识的经验主义是这一种，他的缺点就是狭隘一点。他的经验是局部性的，没有很广泛的基础，但他的经验的的确确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说的经验有这种问题。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另一种经验主义，就是把经验看作主观自身的东西，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那就是马赫主义的经验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是从主观出发产生经验，这一些经验根本不能够反映任何客观事实，就是从主观要求出发生造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从主观利益出发的主观幻想，是个人主义的，也叫唯我论，我认为对就是对，对我有利的那就是对。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有那些修正主义者，那样喜欢和平过渡，为什么那样害怕革命，就是从自己的主观利益出发。他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不搞革命，他可以做官，可以在议会里面每年有很高的工资。在意大利，不仅可以在议会里做官，而且也可以在地方政府里做官。这些人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经验问题的，所以他很害怕革命，不但害怕国内革命，而且害怕国际上紧张局势。因为国际上一紧张，本国的资产阶级搞法西斯主义，一搞法西斯主义，他的议会议员就干不成了，官也做不成了。为什么这样怕国际战争？当然我们不要世界战争，但是战争来了也有办法对付，有什么可怕的！修正主义就怕，修正主义的许多言论里清楚地讲到这一点，如果战争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就要法西斯主义化了，他们的所谓工人运动就要受很大损失，就是他的议会官做不成了，和平的官做不成了，要到“地下”受苦了。唯我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基础。

我们党史上像毛主席批判的经验主义，不是这一种，虽然也是错误的，但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他的经验是客观斗争的具体反映，或者是个别的、有局限性的、局部性的经验。在过去，我们党的干部中有没有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呢？也有，但是少数。党内有个人野心的人，从个人野心出发找事实、找材料，来证明他的机会主义。

经验主义怎么样为教条主义服务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顺便解释一下。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是通过一种办法，就是用局部的经验为教条主义服务，用局部的经验来证明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那么经验主义者也根据一个局部经验，比如某个资产阶级领袖在某个个别时候，的确做了一篇演讲，的确要革命。蒋介石在广州政府时大讲世界革命，有时个别的行动也像是革命的，在个别问题上也要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有事实。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在行动上有个别部分的表现。经验主义就根据这种个别的、暂时的事实，就来肯定教条主义的教

条是正确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俘虏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这样。教条主义能够用教条吓唬人，而经验主义能够用局部经验证明教条主义。所以，有经验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不吸收更多的经验，那总是可以被教条主义俘虏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占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经验主义者拥护他。没有经验主义者的拥护，他的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也站不稳。这是我们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实践论》的主要贡献，就是指出了主观主义两种危险、主客观分离的两种来源，指出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因此，也就使我们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即克服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方法。经验主义来源于两方面，形式是两种。所以要从两方面克服经验主义。当时，毛主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着重指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都是这样的，比较着重于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实践论》、《矛盾论》以外的著作，也是多半针对教条主义的。毛主席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这个口号坚持了好多年，这个口号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这就是说，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要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要经常从实践中吸取新的认识来源，不要使我们的认识停顿在局部的经验方面，不要随随便便根据个别的经验来对问题下判断。经验必须总结，必须有大量的材料来丰富经验。不经过总结就来对问题作结论，那么一定要成为经验主义。毛主席说，克服教条主义，要重视经验；克服经验主义，要总结经验。这些理论问题，从前讲哲学的时候对大家讲过，大家也了解。

总的来说，不管克服经验主义也好，或者克服教条主义也好，要避免主观主义，避免犯大错误，总的方法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不断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我们的立场。我觉得斯大林的一句话是对的，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句话里就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有它的立场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的阶级性的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没有阶级性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也有阶级性，任何一种哲学都有阶级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特点，是公开承认阶级性的；而其他哲学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实践论》里讲的这句话，跟斯大林那句话是一致的。修正主义就要修

正这一点。老修正主义修正了这一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一定要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要康德主义，也可以要马赫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也照样重复老修正主义的精神，就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他实质上是这样做的。

苏联的哲学当然也讲辩证唯物主义，可是他们就有一个特点，他们现在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闭口不提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不特别提出来。现在他们怎么样提呢？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的哲学，真正人的世界观，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世界观。这是他们口头上的提法。苏联库西宁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里面一部分讲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一句话讲到唯物主义的发展跟阶级联系着，很突出。讲唯物主义的发展，从古代到马克思主义前，全是讲唯物主义跟自然科学的关系，不讲唯物主义跟阶级的关系，不敢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这是他们理论上、口头上的提法。在实践上，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丢掉了辩证唯物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所谓实用，凡是与我有利的就对。“左”倾冒险主义也好，右倾机会主义也好，都认为对我有利的就是对的。一切以我的利益为标准，我认为有利的就是对的。

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解决问题，

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克服主观主义总的方法。这里指的方法有两方面，如果对教条主义来说，就是要立场、观点、方法跟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经验主义来说，对自己的经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总结。对教条主义者来说，就是要注意实践，注意经验；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要着重读马列主义的书。这是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的，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来总结经验。这种做法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在认识过程上克服了主观主义。

《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一些。

4. 《矛盾论》的作用和意义

《矛盾论》的主要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方面来克服主观主义。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最近，有些人批判斯大林，说斯大林把理论和方法割裂了。这个批判在日本也有，在

法国也有，在苏联也有。我觉得这种批判是不对的。因为斯大林并没有仅仅把辩证法看做方法，也没有忽视唯物主义这个方法的作用。那完全是断章取义。因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第一句话就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这个世界观，你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是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它虽然名字叫无产阶级政党，实质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它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党的世界观。所以，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一种世界观提出来的。毛主席的《矛盾论》也是把辩证法当做世界观来提的。斯大林不仅仅把它当做方法提出来。

有些搞哲学的人，之所以说斯大林把辩证法仅仅看做方法，把唯物主义看做理论，是因为斯大林曾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所谓了解，也就是一种方法的意思。我们在了解事物的时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斯大林的哲学是有些错误的，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他，那是一种无的放矢。这是不正确的批评。

修正主义想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党性的特点，他不敢承认哲学的阶级性，而且也不敢公开承认党性。所谓实践性，就是指的这个哲学把实践当做自己认识的基础。这个哲学肯定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们这里说《矛盾论》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这个意思不是说辩证法仅仅是一个方法，这是讲它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掌握考察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的正确方法。至于辩证法本身，首先是一种世界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看到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眼中的实践，应该是辩证的，是永远发展的，是不断革命的。永远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任何时候停顿在一点上，没有任何时候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任何时候都是不断革命的。这是我们眼睛中的实践。这种看法作为方法来考察一切问题，分析、解决一切问题，来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学习《实践论》时，就学到一个原则，就是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我们的认识的方法，是从实践中取得经验，然后加以总结，变成理论，变成思想，变成全面性的、有条理的、综合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内容就是能够

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经验主义的经验知识，是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反映它的内部联系。根据议会里面可以允许共产党作代表这个事实做出结论说，和平道路有希望。这种经验主义的讲法，能不能反映事物内部的联系，能不能反映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律性呢？那是不能够反映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们都是英勇斗争的，但是有少数同志被困难吓倒了，他们根据某些困难就做出决定来，说革命没有希望，或者做出结论说应该跟资产阶级妥协，应该跟资产阶级走，这些人做出的结论就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这些结论能不能反映革命实践的内部联系呢？能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呢？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是经过困难达到胜利。不能由于困难就说革命没有希望，不能由于困难就向资产阶级妥协，跟资产阶级走。为什么王明的教条主义得到经验主义者的支持。因为这种经验主义者根据片面的困难经验做出了应该跟资产阶级走的结论。比如，项英同志牺牲了，牺牲了的同志我们说他的坏话不大好，他可以代表这些有些经验的人，在经验中有点吓倒了，因此觉得应该向资产阶级妥协。这就支持了右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经验如果不总结，就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

要使我们认识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性，就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总结”两个字，首先是你不能够片面，不能把局部的经验拿来作结论。你把许多经验综合起来，然后才能叫总结。认识的任务就是要达到理性认识。《实践论》里面讲过，达到理性认识的方法就是总结经验。可是，总结经验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总结？有会总结的，有不会总结的。不会总结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尽管你有很多经验，不会总结就要总结出错误的结论。也可能你的经验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经验很少做出的结论会犯错误，经验很多如果不善于总结也照样会犯错误。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尽管你有经验，但也总结不好。善于总结经验，就是要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能够掌握到一种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就革命的经验来说，民主革命也好，社会主义革命也好，就拿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来说，辩证法主要是分析阶级矛盾的方法。当然也要分析其他矛盾，要分析各种矛盾。但是，中心问题，各种矛盾的中心点，是阶级矛盾。毛主席在《农村调查》序言里讲到我们要作调查，对一切事物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调查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历史上的运用，在社会运动中的运用。

《矛盾论》这篇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当然它也是教导我们懂得辩证法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对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能够掌握辩证法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方法，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善于总结工作的人，就是不善于用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在大量的经验里去研究它的矛盾，分析它的矛盾。根据分析矛盾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辩证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矛盾论》的主要任务。这个思想，在《矛盾论》第一节最后一段就讲过这个问题，以前讲过，现在不念了，无非是讲我们学习辩证法的宇宙观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主观主义为什么成为主观主义，为什么他会犯错误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重视直接实践的经验，第二个是不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不能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把我们经验里所暴露出来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就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来说，不管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从方法上来讲，主要的是不善于分析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善于分析阶级关系。就是违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原则，即是要根据阶级分析的结果来分清敌友，分清敌友之后，就可以正确地决定战略、策略。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对我们国家的问题采用辩证的方法考察问题、总结问题。从他的著作里的第一篇文章起，就开始努力对我们国内的阶级关系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那些有错误的人的文章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不管是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李立三也好，我们把他们写的东西拿来跟毛主席的著作作个比较，其中根本的不同点：一个是不懂得掌握辩证法、不会分析阶级；一个是充分掌握辩证法，善于分析阶级，这种分析跟国内现实的阶级关系达到最大限度的近似程度，最大限度地反映我们真实的阶级关系。毛主席的特点就在于这一点。一直到搞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还是紧紧抓住分析阶级这一个环节。有些地方，有些人觉得现在已经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毛主席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对于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有一个时期，我们好多人有这种观点：土地改革以后，在中国的条件下，没有多少富农，就是中农了；再进一步合作化以后，都是集体农民，都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有什么阶级！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问题，现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主义的农村没有阶级问题。只有我们中国，毛主席在1955年底，把我国的农民分成上中农，下中农，把农民分为阶层来了解，然后解决了在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始终准确地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曾经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马恩通信集，如果要问他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一点，始终如一地贯彻辩证法。不管教条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在方法上来说，都是不懂得分析矛盾、不懂得分析阶级。当然，教条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过几本书，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因此，他们写的文章当然也谈到阶级。如果你说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谈阶级，这也不是事实，谈还是谈的。如果一点不谈阶级，那就不能把自己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不采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是过不了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里，完全不谈阶级是没有的。过去党史上的主观主义者也讲阶级，也讲辩证法。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真正认真地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认真掌握分析阶级的方法，相反，把分析矛盾、分析阶级的方法加以个人的曲解。曲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谈阶级，但尽量把某些阶级矛盾掩盖起来。比如把敌对的阶级矛盾说成不是敌对的，甚至说成虽然有阶级，但是没有矛盾。另一种，对阶级矛盾虽然也加以承认，也肯定，但对这些矛盾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不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做深刻的分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问题、解释问题、总结经验，结果就会歪曲阶级的真实关系，使得我们主观的认识和客观阶级关系的真实情况发生分离。在党内，或者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在谈阶级的时候，多半是这两种，口头上谈阶级，实际上否认阶级矛盾，或者口头上承认阶级矛盾，但不作全面的分析、了解，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这两种错误方法产生两种机会主义。大体上第一种方法多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基础，第二种方法多半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基础。

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多半是在方法上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也有两种掩盖的方法：

一种是承认有阶级存在，也看成有阶级矛盾存在，但尽量把这个矛盾看成不重要的东西，甚至把一切都看成已经没有矛盾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不重要的，至少在民主革命运动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该没有矛盾，具体在政治上来说，不需要跟他争夺领导权，无产阶级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战略、策略当做自己的战略、策略。现在印度的丹吉完

全把尼赫鲁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党跟国大党一样，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陈独秀主张给资产阶级抬轿子。无产阶级既然给资产阶级抬轿子，你组织党干什么？组织党是为了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你不跟他作斗争，反而还要给他抬轿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意大利的党就有这样的问题。加入你这个党，不如加入社会民主党。加入你这个党不过是为了争取选票而已，加入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给我当议员，我肯定加入社会民主党，也许他会给我。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没有矛盾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这样的，口号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通过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通过“蒋委员长”。一切通过他，好像共产党存在的必要就没有了。从历史上总结一下，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就有这个问题，尽量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盾看成不重要的，把对抗的矛盾，看成非对抗的矛盾，甚至看成没有矛盾。

掩盖矛盾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阶级矛盾偷换为另外的矛盾。

你们可以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研究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现代修正主义在很多地方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他把它换成另外一种矛盾，叫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矛盾。现在世界上的修正主义有这么一种世界观，人类世界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只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谓先进包括帝国主义，包括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来，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没有了，只有一个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矛盾。用这种方法来掩盖矛盾，在形式逻辑上叫这种手法为偷换概念的方法。你不细心研究，看不出毛病来。的确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帝国主义跟殖民地有发达不发达的区别，从生产力来说，有这种情况。你说没有事实根据，也有一点。实用主义者总有点事实，单单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这种区别就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不像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他把生产关系丢开了，社会制度丢开了，想用生产力方面的区别来取消生产关系方面的区别。用这种方法掩盖了阶级矛盾，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手法。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取消辩证法。

“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还不一定是掩盖矛盾，掩盖矛盾就不会成为冒险主义。冒险主义还是要斗争的。要斗争，就要承认矛盾。问题是他对矛盾的分析是片面的、表面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在表面上把矛

盾看做不重要的，一个时期看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妥协了，表面看起来好像一团和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下来谈判，我们曾经和尼赫鲁在一个时期搞得很好，尼赫鲁来中国，我们去几十万人欢迎；周总理去，他们也是几十万人欢迎。万隆会议，和他们谈得很好。如果只看到这种表面现象，看不到深刻的对立，也可以做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冒险主义在分析矛盾时，一般是有表面性、片面性的。比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毛病，就是没有注意对中国力量的分析。这一点是跟斯大林的教条有关。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里把打击方向指向中间分子。教条主义把这句话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对中间阶层，他不去争取，而且把他看做主要危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博古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提法，认为中间分子比反动派更危险。这种提法，在当时的一般党员来说，还是相信的，我那个时候也有点相信。他也有理由，因为他是站在中间，容易欺骗党，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中间跟无产阶级对立，你看不出来。如果你看不出民族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当然会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你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得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危险，看不出他的两面性，不去争取，相反却去打击他，那就会出现冒险主义。王明那时的思想，可以说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教条主义。

斯大林这个人，我们党已经肯定了，他是三七开，主要还是对的。他在1927年前后一直到1930年，把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的斗争搞成世界性的斗争。我们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肯定了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贡献。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中国反对陈独秀主义，也是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大概斯大林在1926、1927年前后，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主要正确的地方有两点：一点是肯定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点是无产阶级要发动农民。这个思想基本上跟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而跟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相反。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是有贡献的，对中国有贡献。斯大林后来在1936年反对德波林主义时(那是在哲学问题上)，也是有贡献的。在政治上批判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在哲学上批判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哲学上也是有功劳的。这个斗争后来也对中国有贡献。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也综合了当时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成果。《矛盾论》特别明确提出反对德波林学派。但是，斯大林有一个缺点，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三七开。他早期还是正确的，但已经有缺点，到了晚期，主观性、片面性就发展了。他打击中间派这种思想那是早有了的。《列

宁主义问题》是在1924年写的，他在1924年分析阶级这一方面就有不彻底性，就有片面性。当然，他这个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著作来的。列宁的“两个策略”中，主张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跟资产阶级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这样提出来是对的，也应该参加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跟资产阶级联合，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像资产阶级那样不敢搞彻底。资产阶级不愿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无产阶级一定要搞到底，用搞到底的办法跟资产阶级斗争，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列宁是这样提的，斯大林的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观点来的，但是过分夸大了。他把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改成打击资产阶级，把打击目标指向资产阶级，就过火了。本来是真理，他说多了一点，就变成错误的。民主革命的打击对象，怎么是自由资产阶级呢？应该是封建势力，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够把自由资产阶级当做打击的对象。列宁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因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反动的，不能够说有革命性，向封建势力妥协是主要的。所以，在俄国革命时提出又联合又斗争，是不恰当的。在向沙皇政府进攻的时候，暂时搞一点统一战线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提又联合又斗争。因为这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俄国本身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对列宁这种思想，把资产阶级当做全国的打击对象，说得过火了一点，这就错了。斯大林很早就有片面性，分析阶级时就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被王明、博古当做教条用到中国来，在中国也要打击中间势力，那就犯了更大的错误。斯大林那时是在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的错误，只是限于理论方面，把教条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这个错误就变成行动了。这样一种不顾客观事实的片面分析，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使当时党的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发生很大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错误，很大的损失。斯大林主要是有功的，但是有缺点。他的缺点被教条主义者发展了，所以造成了1930年以后两次特别是第三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个冒险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当时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矛盾论》里又讲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的。这又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本来教条主义大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为什么又说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呢？斯大林反对德波林学派，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那么教条主义也反对斯大林了？恐怕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有疑问，要解释一下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 1929、1930 年反对德波林学派是有功劳的，但是后来斯大林自己的思想也陷入了德波林派的错误，他自己的片面性、主观性到后期发展了。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德波林派的主要特点，不是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讲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的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当时斯大林批评德波林学派，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他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脱离实际，是空讲理论，抽象地讲理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丝毫不去研究，不注意当时的革命实际经验。这个毛病，后来斯大林自己也逐渐逐渐发展了，特别是在集体化得到胜利以后，从 1932 年起，特别是 1936 年以后，斯大林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实际生活里面阶级斗争也不断出现。但是，在 1936 年他就作了结论，说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阶级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这个结论是德波林主义，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对于中国的问题，斯大林到了后来的看法，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仅是对中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指导，他不顾实际情况，有时对阶级观点作了右的分析，有时候作了“左”的分析。对王明、博古那时的关系来说，对中国阶级关系，是作了“左”的分析，打击中间力量。

到了后来，从 1935 年起，主要转折点是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季米特洛夫领导的，代表大会规定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对的，但那里面开始出现了右的东西，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思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斯大林右的思想，在苏联国内来说，是从 1935 年到 1936 年开始的，肯定苏联没有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忽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看见广大人民跟法西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看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时候没有看出来，是不对的。那时提出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季米特洛夫组织的那次大会，总的来说，是对的。但里面有主观主义，有些片面性，所以王明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这个来源，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就有了，是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搬来了教条。“左”倾冒险主义一般有片面的分析，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片面的分析。我们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对矛盾作了片面的分析，关键问题是对中国阶级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

所以，《矛盾论》的中心内容，是在方法论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就是从分析矛盾这个问题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两种

形式。一个来源，是掩盖矛盾，因而就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另一个来源，是分析矛盾有片面性、表面性，因而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当时来说是这样的，后来也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形式是这样的，从认识论上，从认识的过程上来说，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即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方法上来说，又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掩盖矛盾，即右倾机会主义的形式；一种是片面地分析矛盾，即“左”倾冒险主义的形式。片面地分析矛盾，也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形式。

我们还记得，1953年有一个时候，高岗问题发生前后，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说现在有新的主观主义的形式。两种主观主义的形式，一种是急躁冒进，一种是保守主义。这是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主观主义的不同形式。这种不同形式的方法上的来源，对矛盾的分析，对辩证法的掌握，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否认矛盾，或者是反对辩证法，或者是不能真正掌握辩证法，出现了片面性。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论》，帮助我们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主观主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形式，因此我们也根据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就可以找到克服主观主义的另外两方面的方法。两种根源、两种形式，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克服主观主义。这两种方法，《矛盾论》本身已经有了，一种是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在方法上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要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性。《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普遍性这一段，是我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要武器。修正主义的病根、它的危害，在方法论上就在于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口头上也不会完全反对辩证法，不完全否认矛盾，他也要讲讲辩证法，讲讲矛盾分析的问题。但是，他搞修正主义是抓住了这么一点：就是把矛盾说成不是普遍的，把阶级矛盾说成对有阶级社会来说，不一定是普遍的，在某些情况下就没有矛盾，某些情况下没有阶级。或者是有阶级，但这种阶级矛盾也不重要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病根，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

德波林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矛盾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事物的发展某一个阶段上有矛盾，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又没有矛盾。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者，他就是这样运用德波林学派这一点。陈独秀也不是根本否认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有矛盾，他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里面，无产阶级完全应该跟资产阶级走。他从这一点来反对辩证法，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在事实上就等于否认了辩证法。因为承认辩证法，就一定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你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认为辩证法不是根本的规律，对立的统一不是根本的规律，那么也就否认了辩证法。针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之所以后来犯右的错误，由于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矛盾。否认了这一点，就走向右了。铁托之所以是修正主义，他主要是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种修正主义的手法，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普遍性，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长期性。要肯定这一点。反对修正主义把阶级矛盾偷换成另外的矛盾，这是《矛盾论》给了我们一个反对主观主义的一方面的武器。

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着冒险主义，针对着教条主义，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就应该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所谓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强调在分析矛盾的时候，分析阶级的时候，要作到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具体性，尽可能作深刻的分析。因为“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在方法上的主要毛病是缺乏这一点，即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对矛盾作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分析。

《矛盾论》这篇著作，在党史上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毛主席在这里面特别是对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讲的多一些，并且讲到要用更大的力量来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因为当时许多同志都作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不大注意对中国的矛盾的研究，对中国的阶级特点不大注意。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它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而对普遍性这一方面讲得少一些。如果我们在研究辩证法、运用辩证法、运用矛盾的分析方法的时候，能够既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又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就能够得到克服各种机会主义的好处，既可以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又可以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因此，研究辩证法要全面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要把普遍性的观点和特殊性的观点结合起来，不能偏废哪一方面，不能只注意普遍性而不作具体分析，也不能借口具体的特点而把矛盾的普遍性否认了，偏于哪一方面都会犯错误。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完全克服主观主义。

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论》里有一句话：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辩证法的精髓。所谓掌握普遍性，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肯定事物是有矛盾的，社会是有阶级矛盾的，在分析以前，我们脑子里先作这种准备，就不会犯错误，这是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要坚决不动摇。有了这个坚决不动摇的观点，在进一步分析矛盾的时候，就要注意全面性，尽可能深刻的分析，不要抓住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做，就能够正确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就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观正确运用到工作上来。《矛盾论》本身就是全面注意到这两方面，虽然它比较偏重强调特殊性，由于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教条主义统治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为了反对这个主要危险，所以比较多地强调特殊性。但是，我们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要注意它是全面的。《矛盾论》教导我们，一方面毫不动摇地肯定矛盾的普遍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分析的全面性，注意尽可能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特殊矛盾问题。真正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才能够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真正能够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它的矛盾，这个行动本身也就贯彻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主要还是能够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你对特殊性的认识够了，那自然而然就贯彻了普遍性。因此，就是现在我们用更大的力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不是主要反对冒险主义。我们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是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但是，在分析国际国内的问题上，能够很好地做具体的分析，做全面的分析，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克服修正主义，不仅仅是坚持普遍性就够了。要彻底克服修正主义，还是要对世界矛盾、国内矛盾做全面深刻的分析。我们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文章，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第一次对当前时代的世界矛盾做了比较最全面最深刻的分析。将来有些著作里，当然还可能做进一步深刻的分析。

怎样才能做到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呢？《矛盾论》也给我们指出了一些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对一个矛盾我们应当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同时有很多矛盾，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需要从这两方面来研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呢？这个方法，首先是对矛盾的双方（即对立的双方）的特点先做研究，了解了对立的双方的特点，然后

综合起来，那么对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了解了。比如在我们过去的民主革命里，如果把反动派、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特点弄清楚了，又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势力这一方面弄清楚了，那么对民主革命的矛盾特点也就弄清楚了。当时的反动派，无非是国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内霸占农民的土地，靠土地来剥削农民。而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则是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两方面的特点都弄清楚了，那么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清楚了，就是人民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矛盾。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搞民主，要实现民族独立，就是民主和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矛盾。任何一种矛盾，要把它的特点弄清楚，首先要把两方面的特点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一点，你解决矛盾时就会犯错误。比如，如果弄不清当时矛盾的一方是要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可能在当时的革命中要反对资本家。“左”倾冒险主义就有这个问题，打击中间力量，就是打击资产阶级，就把革命的阶段性搞混乱了。这样也把革命战略、策略搞错了。

王明、博古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对苏区来说，要反对什么富农路线。当时革命的人民只要求反对地主，而他的打击对象把富农包括在内。把革命的阶段搞错了，也就搞错了战略和策略，就是对矛盾的双方没有搞清楚，因此对整个矛盾总的特点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大段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中心思想是要我们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然后再综合起来看矛盾的总的特点。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矛盾很复杂，同时有许许多多矛盾交错在一起，那时应该怎么去掌握这许许多多矛盾的特殊性呢？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出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是决定许多交错复杂矛盾的共同特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矛盾，能够规定其他矛盾发展的一种矛盾。要善于分析矛盾，不但要注意一定矛盾的具体特点，而且要注意从很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的特点，掌握主要矛盾的特点。这个问题，是党的历史上很重要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之一，就是不知道这一种变化，不懂得掌握主要的矛盾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九·一八”以后，我们革命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国内矛盾转到民族矛盾方面来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国内矛盾是主要矛盾，全国人民跟蒋介石统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在“九·一八”以后，国内矛盾逐渐失去了主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跟中国人民的矛盾转变为主要矛盾。这个变化，教条主义者不理解，因此他就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他不把联合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看做主要的战略任务，而提出另外的口

号，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动派和革命派的最后决战。把它当做主要的口号。教条主义者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看不清楚主要的矛盾。所以《矛盾论》里特别专门讲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历史转变关头的重大问题。后来《毛泽东选集》里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是以掌握主要矛盾的思想为基础来分析全国的矛盾的。

所以，《矛盾论》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形势，使我们找到这样一种武器。这个武器里的主要东西，要我们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抓住矛盾的特点，对矛盾做具体深刻全面的分析，找到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个方法，是毛主席不仅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遍真理(只有教条主义才从书上抄来真理)，而且是结合中国十几年的革命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然后提出辩证法应该怎样运用，特别是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掌握主要矛盾。这个思想在后来我们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首先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帮助我们党掌握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帮助我们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注意到在解决民族矛盾这个大前提下来解决第二类矛盾，包括我们国内跟蒋介石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时，又注意到这些矛盾的特点。不像王明那样，忽视了矛盾的对抗性。虽然注意到这个矛盾是第二类的矛盾，但也不忘记它是对抗性的。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抓住了每个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就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搞得很正确，使得我们革命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我们的胜利是比较快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发展的更快，避免了全党性的路线错误。《实践论》、《矛盾论》出现以后，我们党还犯过错误。但是，全党的路线性的错误避免了。一个时期因为没有克服教条主义，部分的右倾机会主义出现了，可是没有影响整个中央，没有影响全党。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的错误、个别性的错误也有一点，“左”一点的也有，只有部分暂时的偏差。暂时的错误不算主观主义。总的领导不能算主观主义，这是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不可能避免，有时是可以避免的暂时错误。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很顺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几年来，也不能说出现过什么全党性的错误，个别地区也许可以说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全党性的错误则没有。前几年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对初步搞起来有经验，因为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怎么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件事，全世界都没有经验，苏联始终停顿在集体农庄的水平上不能前进。如何前进?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我们一点经验没有。1958年以来这几年虽然

有这么多的损失，有错误，有缺点，甚至于死人，但我们摸出一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没摸出来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像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一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今天看来，价值也很大。对亚、非、拉美的国家来说，很有价值。古巴的胜利，不是因为看了毛主席的著作才取得胜利的？其他亚、非、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参考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那个时候，也有牺牲，也有困难。现在看来，那时的错误、缺点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如果归结于思想上的原因，要归功于毛主席给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应该说，《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我们党的建设方面、革命思想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应该作充分的估计。

第 23 章 关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布置

(1964.05)

【1964年5月,中央高级党校“59班”和“60班”哲学专业,进入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阶段。艾思奇按照党校的教学计划,于5月19日作了具体的布置,讲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针和方法,概要地讲了毛泽东同志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小标题是我们加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

今天布置新的阶段的学习。按照原来的计划,明天开始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就算结束了。

1.关于学习的程序

这段的学习时间从5月20号到6月底,或者还多几天。为什么要多几天呢?本来这段学习计划是十六七号开始,因为《哲学笔记》这一课延长了两三天,所以这个学习也就推迟了两三天。如果6月底学完就算了,学不完就延长几天,尽可能6月底学完。

这个计划已经跟各支部商量过了,第一个星期(20号到26号),按照历史顺序学习毛主席有关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中心还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三篇文章。这阶段可以说是复习毛主席著作,着重研究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第二段,从5月27号到6月5号,这个星期着重研究《实践论》里面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当然不是只学《实践论》,还要再研究一下毛主席著作里面有关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头的那一段。我们要着重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

第三段,从6月6号到23号,以《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学习主席关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6月23号到6月底，这个星期写学习心得。希望大家在第三段的时候开始酝酿，按照个人准备的专题，自己着重研究。一方面研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多研究一下自己要研究的问题。6月23号以后，大家就可以写心得，写到6月底，如果写不完，可以延长几天。

关于辅导的安排，今天布置了以后，大家就去学习，学一个星期，根据大家在读书中有些什么问题作些辅导。第一段到5月27日就可以讲讲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的问题。6月6号到23号可以讲讲关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辅导课主要是这两次，希望作为解答问题的形式来讲，这就要看大家提的问题多少，问题多也讲，少也讲，没有问题也讲，反正我们也要学习，没有问题我们也参加考试，讲讲心得。希望在这一段大家多读书，多想问题，多组织一些讨论，多讨论可能问题就多一些。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参加讨论，了解大家的情况。

关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杨老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所要讲的也就是以前讲过的，今年写了一个学习“双十条”的提纲，大家都看过了，现在了解的东西，基本上是提纲上的东西，当然也有些发展。提纲写得很简单，研究得也不够，如果大家不提什么问题，还让我讲，只能讲提纲上的那些东西，当然也可以多讲几次。如果要问毛主席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在历史上有什么发展？我只能讲提纲那些。毛主席的发展可能不止这些，一方面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有限，只能讲这些；另一方面，毛主席思想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不能给毛泽东思想加上一个框子，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讲的辩证法问题就超过了过去的。特别是1957、1958年大跃进以后，毛主席自己也讲，这些年辩证法大发展了。当时我们对所说的这些话也不很了解，现在比较了解一些了。什么叫辩证法大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发展，甚至于毛主席自己的辩证法也有发展，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讲成固定不变的东西，好像就是那几点发展了。现在可以肯定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都有发展，我们讲课就是根据自己的了解提一些意见，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辅导就是这样两段，两段不一定是讲两次，一段可以讲几次。另外可能还有一些知识方面的问题需要辅导，在学习过程中再定，如果大家提出什么要求，有必要的話，教研室其他同志还可以讲一讲。

大体上学习程序就是这样。有的同志提出这段学习时间是否可以长一些。这个要求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好短一些，只有一个半

月的时间。按照大家的要求是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现在就缩短一些。好在大家学了好几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从上半年到现在，学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后三章。学了这些著作以后，可以对马、恩、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比过去知道得多一些，有一个更明确的了解。特别是列宁在辩证法方面有什么新的贡献，学习了《哲学笔记》以后会比较清楚了。虽然时间短，但是可以把毛主席著作和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相比较，这样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比较清楚比较容易一些。所以，虽然时间短一些，只要大家能抓紧时间是能有所得的。

2.关于学习的书目

现在讲一下要读的书。学习书目基本上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出来的，一共有 26 篇文章，有些全读，有些读一部分。

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全读。这是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不需要全读，只读“(一)国内的政治状况；(一)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两节。

第三篇文章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只读“关于主观主义”这部分。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直接讲唯物主义的文章。前两篇毛主席要是讲阶级分析、矛盾问题，这篇主要是讲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

第四篇文章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很重要，可以全读。这篇著作的哲学意义很大，对矛盾作了详细的分析，还讲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在那时能提出现象和本质、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很高的哲学水平是不能设想的。这说明当时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观点非常坚定，非常明确。

第五篇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也是哲学意义很高的。有些具体战争问题可以不读，着重读第一、三、四章。第一章是直接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在这一章里作了明确地、有发展意义的论述，这样清楚地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少有的。里面讲到如何去掌握，惟一的就是通过实践，要在做的当中学习，在干的当中

学习。这些都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很重要的思想。另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围剿反围剿的问题，阶级分析、矛盾的分析，这都是辩证法问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围剿反围剿的不断反复，不断的斗争，引起向对立面的不断转化，这些都在战争问题上展开了。这篇文章是很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各方面都涉及到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后要读的两篇文章，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的著作，也是抗日战争开始的著作。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实践中认识经验的全部总结。哲学著作主要的总结是认识经验，不过认识经验还是以实践的经验为基础，实践的经验是自有共产党以来，一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包括成功的、失败的、正确的、错误的，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得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毛主席的著作不只是毛主席自己写的，还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形式上是用笔写的，实质上是用血写的。实践的经验就是政治经验、军事经验、经济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都跟全国人民的流血斗争相结合的。所以，得到这些著作不容易，是血的经验产生的。

这是第六、七两篇。

第八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是1937年5月抗日战争准备时期写的，主要读前几段，后面的政治问题可以不读。在这篇文章里面第一次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所以一定要读。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矛盾论》中把主要矛盾问题看得很重，我们在认识上要注意抓主要矛盾。这个思想毛主席在1937年以前已经有了，这是在1937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作为结论写出来的，虽然是政治文章，但是可以看做是辩证法的发展。

第九篇文章是《论持久战》，这篇著作只读几段就行了。“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这两段是分析矛盾问题的。“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这两段，值得特别研究一下，这里涉及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怎样变化的问题。这个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有，战略怎样由防御转为进攻，这跟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关系。

另外，还可以读“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这两段，这些都是有关哲学问题的。然后再读“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些段非常重要，辩证法思想掌握得非常深刻非常具体。怎样掌握矛盾的主

要方面，这些段里都有了。“能动性在战争中”和“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是学习唯物主义很重要的章节。认识论中的主观能动性怎样掌握？怎样发挥？“能动性在战争中”就是讲什么叫能动性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是讲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改造世界，这个问题在这里讲得非常深。

关于《论持久战》就读这几节。

第十篇文章是《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也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因为这里讲的有些问题在《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都有了。要看就看第一节“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第十一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是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有所发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怎样搞阶级斗争，怎样搞政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亚、非、拉国家还在运用这个思想。这篇不一定全读，只着重读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第四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五节“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再加上第六节“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如果对文化问题有兴趣，也可以读一下有关文化方面的那几节。第十一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部分也可以参考。“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四个时期”这两节也可以读一下。为什么需要读一下呢？关于上层建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部分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中央最近提倡演现代戏，少奇同志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说到我们现在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现在的文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是新民主主义的。现在演的一些戏，所谓推陈出新，推出一些新民主主义的东西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没有活人的东西。现在的活人是搞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最好的也就是民主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封建的牛鬼蛇神的東西。因此上层建筑和基础不能适应，这样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为基础服务。多少演一点“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还可以，如果变成我们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就不好了。古代人、死人占领了舞台，我们上层建筑的主要方面就是旧的，我们的基础是新的，但是旧的上层建筑占了主要地位，怎么能不跟基础矛盾！为了让上层建筑为基础很好的服务，所以要让现代人在舞

台上占主要地位，就是让活着的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在舞台上占主要地位。“芦荡火种”这个戏演得很成功，最好都看一下。这在京戏中是一件大事情，京戏很难演现代戏，过去改编的都失败了。这次赵燕侠演得很成功，也许还有缺点，我还没有看过。上层建筑能有这样的改变，这在京戏里面是一件大事。因为京戏过去完全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而且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所以它很难改。现在改了，现代人变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革命。

关于《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读这几节。

第十二篇文章是《论政策》，这篇也不要全读，只读前四页多就行了，以后关于各项具体政策可以不读。这篇文章是一分为二分析方法最集中体现的文章。如何运用矛盾的具体分析，矛盾的一分为二，敌我的一分为二，这里都讲了。我们这方面有顽固派，有革命的中间派。顽固派又可以一分为二，有抗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顽固派、中间派、进步派，每一派又可以一分为二。敌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一分为二的方法用得最集中的就是这篇文章，所以特别值得学习。如何用辩证法、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也讲到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复杂的问题，也没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复杂，又是直接敌人，又是间接敌人，又是直接朋友，又是间接朋友。就是现在的亚、非、拉也没有这样复杂的情况。当时一个国家分为三个国家(汪精卫的国家、蒋介石统治的国家和解放区)，现在最复杂的是分为两个国家，像老挝。三个国家也就是三种情况，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区，汪精卫是殖民地，蒋介石是半殖民地，解放区是完全独立的。当然现在亚、非、拉的国家也还有不同的问题，如南越打仗可以打到海里去，我们那时就没有那么打。南越国家小，更困难一些，所以他的游击战有发展，只讲我们的情况也未免有点“大国沙文主义”，还要承认他们的发展。

第十三篇文章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第十四篇文章是《整顿党的作风》。

第十五篇文章是《反对党八股》。

这三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说是哲学性质的著作，要全读。

第十六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研究上层建筑很需要的东西，这里谈到上层建筑怎样为基础服务。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时间少也可以不读，也可以摆在后面读。关于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人性论问题，这几段都可以读一下。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

提出的一些问题，这里毛主席在原则上解决了。还有歌功颂德……这几段也可以读一下，对上层建筑究竟应该怎样看，是歌功颂德呢？还是暴露。这些都谈到了。“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这段也要读一下。动机和效果问题，这是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还有“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可以看一看。

第十七篇文章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全读。这篇文章又是工作方法，又是思想方法，基本上是哲学性质的文章。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结合在一起了，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同时也是我们的认识路线。这些基本思想在这里都有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很重大的发展。认识要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更具体了，直接跟我们的革命工作方法结合起来了，这是很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这也是以前马克思主义著作里面根本没有发挥过的问题。

第十八篇文章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全读。这是在新的时期，再一次的阶级分析，从这里学习辩证法，学习唯物主义。主要的是辩证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一般的同志往往到形势一改变就忘记了阶级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好形势来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模糊了。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许多同志头脑昏了，在延安有些人把草席子烧掉了，认为很快就可以到大城市过舒服日子了。但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还没有听到日本宣布投降，马上就想到“蒋委员长”要下山摘桃子，马上给那些胜利麻痹思想打了一下预防针。每一个顺利的时期，都会片面地看到好的方面，忘记了困难。实际上当时并不怎么顺利，就是因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了，于是就忘记了困难。

第十九篇文章是《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全读。这是对国际上的阶级矛盾的看法，毛主席那时已经预见到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所以就提出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纸老虎的真面目还没有显出来，但是毛主席那时就看到这个东西。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主席作了结论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经过10年出现了这个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为东风压倒西风造成一个条件。当时资本主义四分五裂，法西斯垮了，那时毛主席嘲笑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是算小账，蚀大本。美英法和德意日法西斯打仗得到一点便宜，就整个世界形势来说，这是小便宜，但是整个资本主义垮了，这

是蚀了大本。美英法和德意日法西斯自己打自己，而人民胜利了。不过当时蚀的本还是比较小，只是垮了东欧那一块，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后来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朝鲜、越南，然后就是亚非拉革命不断地爆发，帝国主义要想压也压不下去。这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革命没有消灭，其他国家的革命压下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打垮了法西斯，没有把跟着起来的革命压下去，特别是中国革命一胜利，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再加上这几年，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也可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基本上出现了，更显著的时期是1956年、1957年以后，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时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50年。第一个50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时期，那时是资本主义自然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备时期。第二个50年是从1898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这是资本主义的衰亡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胜利的时期。但是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期，基本上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有两次大论战。1949年以后就是新的时期，是第三个50年，世界的基本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面临胜利的时代。再过40年，世界革命在很多国家取得胜利，不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是世界革命的胜利。所以，毛主席对斯特朗的谈话，可以说是为世界新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期的形势，提出了一个初步正确的结论。这篇文章很值得读一读。

第二十篇文章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是1947年写的，当时宣布全国革命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变成劣势，我们要进攻，是这样的形势。从中国来说，是中国的东风压倒西风。1947年以前，中国革命战争基本上是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1947年开始，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进攻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只读第六节就行了。这一节主要是对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提出革命对象是什么？当时有三大革命对象，特别对官僚资本做了新的规定，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文件思想的发展。这里还讲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个思想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出来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对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国内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也基本上讲到了。胜利以后，革命开始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个文件里已经开始有了萌芽。我们当时看不懂，对这个文件的重要性也不大清楚。

这里已经把新中国的经济成分讲清楚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大体上是这种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提得很清楚。

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读一读第一、二两节，这是讲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优势转过来了。这对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非常深刻。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人民算是出了一口气，很深刻地描写了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我们说的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具体的，比较小的，像丰福生运用在伙房里的；有的是大的，毛主席运用在全国革命中。所以我们研究哲学不要干巴巴的，要活的来看。

第二十一篇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二十二篇文章是《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有许多发展。

第二十三篇文章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说明什么叫历史唯心主义，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有阶级分析，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我们平常总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唯心主义的。当然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结合我们的实践斗争，结合政治来看，太强调这点也不利。如果只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不能讲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根本问题有三个：一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问题；一个是人民群众问题，核心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这篇文章很重要，这篇文章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不着重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着重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

第二十四篇文章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读。

第二十五篇文章是《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里有认识论问题，有阶级分析问题，有辩证法问题。这十条基本上全读，或者只读前半部分，后面有些具体政策可以不读。

第二十六篇文章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不一定全读，可以读前几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有阶级的问题，反对他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

大体上就是学这些文章。也还可以考虑读一下毛主席在1955年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里主席对农村阶级作了新的分析，这是过去马克思

主义著作中所没有过的。把农民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这是新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读一下。

这些文章如果全读，有五百多页，一个星期读不完，如果有选择地读，有三百多页，可以读完。因为全书都读过了，脑子里有了印象，所以读一部分也可以。

3.关于学习的方法

现在讲一讲学习方法。我们现在安排的学习程序也和学习方

法有关系。为什么要从毛主席著作中挑选这些篇来读？也是从方法上考虑的。现在这个学习方法，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用历史的观点来了解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说，不要把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不要看成是现成的公式。好像他一开始就把哲学发展成这几点，以后就按照这几去解决问题，去做工作。事实上不是这样，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也是一样。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个 50 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 50 年(主要的是第三个 50 年)，实际上在这以前也有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就一步步在发展。我看有两次大发展，第一次是民主革命时期有一个大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发展的中心标志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出现。如果再加些什么东西，整风时的几篇著作也可以算，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哲学思想发展的标志。毛主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这两篇著作的时间也很值得注意，1937 年出现这两篇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大发展，而在国际上来说，恰恰是苏联的 1936 年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发展了，而是停顿了。斯大林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法的，他的代表性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是这个著作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有点停顿，特别是辩证法停顿了。主要是辩证法削弱了，或者是辩证法有些地方不能坚持了，被否定了。这本书多数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解释通俗、鲜明，是一本初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好的著作，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内，苏联的哲学家没有

人能写这样的著作。有些人攻击他把辩证法的标准说成四个特征，违背了列宁的三个规律的思想。这没有什么，只是一种写法的问题，列宁写十六要素还不是一种写法！要根据实际的需要，特别着重写几点是可以的。恩格斯根据当时的论战需要，特别强调黑格尔的东西，写了《反杜林论》。那时反辩证法的思想很厉害，反黑格尔，强调康德，这是哲学界的一种分歧。所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黑格尔。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讲：我宁肯做黑格尔的学生。当时要强调黑格尔的哲学的辩证性质，所以就强调黑格尔贡献了什么东西，黑格尔讲了三个规律，马克思把它改造了，这在当时是需要的。斯大林讲四个特征。也有他的重要性，不但不应该攻击，而且这样的提法在当时应该肯定，他是结合实践的需要，而强调实际意义的。所以，修正主义那样批评他是不对的。斯大林这个小册子的毛病就是辩证法削弱了。否定之否定没有谈，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唯物主义也讲得简单了一些，也是个缺点。如果讲他的错误主要有一点，就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否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取消了矛盾的普遍性，取消了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运用矛盾规律。而恰恰矛盾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是比较根本的问题，要批评他着重批评这点就够了。所以说辩证法三个规律也好，四个特征也好，或者是十六要素也好，但核心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如果说辩证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其他两个规律不讲也可以。毛主席就是这样的看法，归根结底是对立统一的规律。《矛盾论》的意义就是把辩证法归结为矛盾的规律，用矛盾的规律来说明辩证法。以后苏联的辩证法基本上没有发展，哲学著作都是解释斯大林的著作，做注释工作，文字上有些进步，内容实质上没有什么进步。

恰恰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当时只看到国内意义；现在看起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具有普遍意义。从1936年37年以后，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是毛主席。斯大林也继承了传统，但是出了毛病。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一个大发展。

1957年产生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代表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次大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直接有国际意义，直接指导了世界革命。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历史，从世界上的哲学著作来看，还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有新的发展，但是没有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直接起作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接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在这篇著作里面第一次提出修正主义是

主要的危险，后来两次莫斯科会议上都规定了，这个意义很大。因为这是进入第三个50年论战，所以它的意义更大了。

因为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死的公式，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他的哲学本身就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就结合好了，不是一下就完成了，而是一步一步地完成的。而且一个时期完成了，也不等于结束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完成了第一个时期的结合过程，但并不等于结束，完成了这个过程又发展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要重新结合，又要发展。普遍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来的，特别是从列宁那里来的。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最早的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但是更直接、更多的是接受了列宁的哲学思想。然后，毛主席又结合中国的实践，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一步一步地发展。所以，我们要研究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如果不按照历史顺序来学习，永远也学不好。

我们现在的安排，就是按照历史顺序，把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在脑子里找到一条线索，他在某个革命时期发展了哪一方面，强调哪一点，另一个时期又发展了哪一点，他不是在一个时期什么都发展，而是这方面、那方面逐步发展的，然后再作一个全面总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毛主席就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跟中国的实践结合，毛主席的每篇文章都反映了某个方面的结合，经过16年的实践，作了全面的总结，这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所以，我们读《实践论》、《矛盾论》时，要看做这样的著作，就是说这个著作是1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就是16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的认识经验的总结。

我们党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党的历史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个结合是一个解决矛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是有矛盾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表现，因此需要解决这个矛盾。党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就犯错误，就不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人解决得好，有的人解决得不好，解决得好就能使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解决得不好就会出

现错误。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分为二，也就是有矛盾解决得正确的方面，有解决得不正确的方面，于是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斗争。

党的历史就是一个认识过程，对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矛盾有的解决得好，有的解决得不好。犯错误的人主观上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陈独秀也好，还是王明也好，他们都自以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一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就不要马克思主义，比如张国焘。主观上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主观上想搞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主观上想搞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矛盾解决得不好，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又慢慢变成公开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是必然的。因为整个过程是一分为二的过程。现代修正主义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制造分裂的理论基础。分裂是客观事实，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我们要制造分裂的理论基础，因为客观上有分裂主义要和马克思主义分裂。所以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始终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正确的认识路线和错误的认识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的认识路线就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错误的认识路线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那就是唯心主义的路线、形而上学的路线、历史唯心主义的路线。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互相结合的，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就是这样的斗争，在认识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的斗争。错误的路线在形式上自以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上已经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了。我们研究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要研究我们党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因为时间不多，不能把反面材料拿来读，有正面材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时，就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从那时开始就有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唯心主义就是主观主义)。

我们读毛主席这些著作的时候，要注意摸这个线索：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毛主席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是怎样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怎样导致错误，毛主席怎样纠正错误。这个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创造了一种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毛主席再加以总结，这样就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的

文章。我们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一定要看到这两篇文章的写作的历史条件。毛主席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同时在解决实践问题中独立的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哪些方面，在这个时期发展了这些方面，在那个时期发展了那些方面，最后总结成系统的东西。1937年以前可以说是《实践论》、《矛盾论》的酝酿时期，经过16年到1937年成熟了。这两篇著作标志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完成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定要这样学习，才能了解《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什么阐明这样的问题，阐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不结合实践，不结合历史，就不知道意义何在。

有些人批评《实践论》、《矛盾论》，批评得乱七八糟，因为他根本不结合实践。日本有一个人批评《实践论》没有讲辩证逻辑问题，他说：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重要的东西。这些批评是无的放矢，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内容。有人批评说，把认识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不合理，因为人的思想不都是理性的，人的认识还有悟性认识。还有人说：康德的时候就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这不是又退到康德那去了吗！这完全是书呆子，是乱扣帽子。

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强调把理性认识分为理性和悟性两部分，因为意义不大。理性认识本身也有发展过程，它的内部也有小的阶段，要分也可以，不分也可以。要作专门的详细的研究也可以分一分，也可以分为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第一步比较抽象，然后搞得更具体，也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在毛主席著作里面不需要谈这个问题。所以不结合实践根本不能了解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意义，那些批评的人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他也不想承认中国的伟大革命运动。修正主义者怎么愿意承认，他就是乱来，只要能抓住一点理由，不管什么都可以。所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注意到这是党的历史上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对毛主席的每篇著作都应该这样看，这个著作是经过长期认识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我们这段学习就是这样布置，从历史上把线索弄清楚，然后再分开研究几个部分。第一个星期先按照历史顺序把文件读一下，读的时候可以着重想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学，毛主席当时在认识上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讲，不这样为什么会犯错误。先去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然后再研究现在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不但政治上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认识上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

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就是一般的错误也是离开了正确的认识。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研究历史线索。

第一个星期按照历史过程通读一遍，第二个星期分别研究几个方面的问题，如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实际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很难分，《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著作也很难分。所以第三个星期就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学，也就是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学，实际上只有两个阶段，可以作为两个部分来学。

4.关于学习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我们学习中要重点研究的是：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方面的问题。下面我先简单讲一下。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就是代表著作。《实践论》这篇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和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这两条路线的内容怎样理解呢？也可以按照列宁的提法来理解。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一般地讲到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这个提法完全对，但是现在看起来提得还不够。列宁讲：“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列宁区别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的斗争。这对不对呢？完全对，用来概括所有整个党的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可以这样概括。但是这个提法用来专门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点不够，因为讲的是两条路线，包含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专门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它的重点是解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这个概括专门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还不够。因此还必须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来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讲道：“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句话可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路线）斗争的特点。这两条路线是什么路线呢？一条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认识路线

就是这样的路线。与此相反的路线，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我们党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还是相分裂，是认识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相脱离，这样来概括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比较完全的，比列宁概括得更具体一些。因为列宁只一般地概括了唯物主义，实践问题没有提，所以他只有一个物质到感觉和思想，或者是思想和感觉到物质这样的对立。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同了，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要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只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而没有强调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如果说《实践论》有什么发展，在这些地方就是发展。列宁没有特别阐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和列宁都讲了实践问题，但是在讲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上，没有概括实践问题。

关于《实践论》发展了什么东西，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讲，现在不多讲了。

另外，《实践论》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或者是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或者是相分裂，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新的特征，就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直接结合到工作里面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多半是在哲学上从理论斗争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当然也间接和实际工作有联系，但是列宁所反对的不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而是学术上、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实践论》中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就不是学术上的，而是实际工作中的，如陈独秀、王明。这也是一种发展。

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些公式的提出，都是发展，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得更具体了。

关于《实践论》的内容就讲这些。以后又发展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进一步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新的提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讲过理论可以变成物质力量。毛主席进一步发展成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而且对解决实际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这种思想也有很突出的发展。

刚才讲的是主要的几点。这几说明毛主席在哲学思想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发展和丰富是经过牺牲多少人，是经过血的教训总结得来的。

在第三个星期以后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时，方法也是照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到我们党在历史上对认识论的问题上也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个斗争归纳起来就是一条，不是什么四个特征或

者是三个规律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一分为二，还是不要一分为二。要不要暴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特别是要不要分析阶级矛盾)。特别是在胜利的关头，这个问题就尖锐起来，一得到胜利就冲昏了头脑。1927年出现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出现了和平思想。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了，又冲昏了头脑，认为阶级斗争过时了。每一个转变，特别是得到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需要一分为二的问题。王明、博古的三次“左”倾路线也反映了这个冲昏头脑的问题。毛主席辛辛苦苦领导红军取得了胜利，他们就要搞全国总罢工，就没有考虑到全国的形势要一分为二。当时有的地方革命形势才刚搞起来，有的地方革命还是低潮，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矛盾。对阶级矛盾是承认的，但是对阶级矛盾没有作具体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一律是阶级敌人，不一分为二，这种倾向经常发生。党的整个历史贯穿着这种倾向，要跟这种倾向作斗争。《矛盾论》是这种斗争的第一次总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再一次的总结，现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一次总结。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出版了几年，我们有些忘记了，虽然嘴上不讲阶级分析过时了，但实际上已经不讲阶级分析了。成绩与缺点要不要一分为二，今年中央又有一个指示，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中央就来了一个比学赶帮运动。我们党有了这些决议以后，是不是成绩与缺点的一分为二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一定就解决。比如学习大庆，有的同志对大庆的评功摆好就很感兴趣，对四严就不起劲。前几天报纸上有一个通讯，讲到有一个人丢了一个螺丝钉，感到严重得很，想一切办法去找，到处找也找不到，但是他决心找下去，非找到不可，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么一个小的螺丝钉都这样严格对待。但是我们有时把严格和粗暴看成一个东西，其实严格可以不粗暴，我们要反对粗暴，但是不要因为反对粗暴而把严格丢掉了。所以现在学习大庆的时候还有这个问题，这里也有一分为二的问题。由于脑子里受旧的成见的影响，就妨碍我们一分为二。有的人认为整风不好，因为整风有点粗暴，就把整风完全否定了，这里有点经验主义，把整风中的缺点、错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夸大了，因此一碰到整风就紧张。其实，整风也可以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可以不粗暴。当然，没有经验的时候，粗暴是不可避免的，有了经验就可以避免，这时就不至于或者基本上不至于重复以往的经验，就可以不至于紧张。所以，解决一分为二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学习辩证法这部分，着重研究党在历史上要不要一分为二的过程，研究历史的过程对毛主席思想的发展会更深刻一些。

《矛盾论》是对辩证法的全面发展，但更主要的是方法上的发展。在原理上也发展了，如在内因、外因问题上具体化了。方法上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最突出的发展；所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包含在普遍性和特殊性里面。这些问题大家先研究一下，将来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发展更多了，毛主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最突出的、最主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展比较多。其次就是国家问题、上层建筑问题，包括意识形态问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研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方面发展得比较全面，当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发表以前，这方面那方面也有所发展，但这篇著作是总结了所有的发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也是阶级斗争。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可以普遍地研究，但是要从历史过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根本就是历史的方法，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要采取这种方法。不这样学，就有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

第 24 章 世界观问题

(1964.05)

【艾思奇于 1964 年 5 月 25、26、27 日，分三次为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 班”、“60 班”、“61 班”）学员的讲课，这是讲课速记稿。这个稿子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世界观；第二部分，是讲《实践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和其他同一内容的讲稿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有新的见解，讲得也较多；第三部分，讲《矛盾论》，主要讲了关于一分为二的理解和运用问题，是过去没有讲过的；第四部分，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中许多观点和当前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不一致，所以，我们整理时删去了这一部分。速记稿只分三次讲课，标题是整理时所加。】

(一九六四年五月)

第一次讲课

(1964.5.25)

这次的讲题叫做《世界观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准备时设定的，我想大体上还不错。内容想讲四个题目：绪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绪论想稍微讲得简单一点，主要的目的是想比较简单地、明了地说明一下如何通过“三论”来讲毛主席的世界观，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世界观。主要的方向是这样。

1. 绪论——学习毛主席的世界观

有的同志问，什么叫做毛主席的世界观？要我讲一讲，现在就把这个问题作为绪论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叫做毛主席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的答复很简单，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是在无阶级世界观以外，还另外有一个什么毛主席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一定要弄得十分清楚。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就是世界观。

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你从哪一个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世界、来看世界、来看一切问题。毛主席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其次,是你怎样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情况,用什么观点去看世界上的一切情况。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方法也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用什么方法去看世界。

《矛盾论》中讲了两种宇宙观,就是两种世界观。宇宙观、世界观是一个名词。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都是一个意思,不需要三个名词。世界观就是人生观。因为,所谓人生观,就是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是摆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还是摆在资产阶级的地位上?是把自己摆在革命的地位上,还是摆在反动派的地位上?这就是人生观的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际上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毛主席的世界观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什么世界观。毛主席的世界观,一点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讲到一句话:“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这句话也是说的毛主席自己。毛主席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的这种先进人物当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人物。他所应用的世界观不是别的什么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同的就是毛主席应用的更好。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毛主席把这个世界观应用的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毛主席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

毛主席所以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好，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就是他和教条主义者不同，不是把这个世界观当做一个死的、现成的公式，来随便套中国的问题，而是把这个世界观当做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情况，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且从这种分析当中，又得到许多认识的经验。

如何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件事情也要经验，在实践中去认识世界的事情。认识世界本身就需要许多经验。认识经验就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经验，改造自己思想的经验。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毛主席就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命运的，他观察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取得了许多认识经验。毛主席又把这些认识经验重新综合起来，把这个世界观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如果说毛主席的世界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也就是他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了。

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他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讲过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原则，当做死的公式简单地照抄、照背，而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作为方法。着重抓住最根本的原则当做方法来观察中国问题。观察的结果是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经验。根据这些新的认识经验，把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给世界观提供了更多的，更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们讲毛主席世界观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观一点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以外任何特殊的東西；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观，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了发展。

为什么能够得到发展？就是因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当中我们的认识经验。但是，这不止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牵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现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不开，就是早期的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问题也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是分不开的。所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中国革命的认识经验，也就附带联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一般地讲，也可以这样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的著作更多地、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经验。而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更多地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

最后简单地讲，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用这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换句话说，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又把这个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

所以，研究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一方面要研究毛主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理；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毛主席所发挥了的新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的东西。要注意这两个方面。注意这两个方面，又必然要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联系起来。

现在，根据第一条来讲第二条。就是说一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是怎样来的？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其他所有的著作一样，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用另外的话来讲，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的著作都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的产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就产生了毛主席的著作。

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直接或间接地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在某一些方面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某些总结。在中国革命的前半期，毛主席著作主要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如果我们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时期毛主席的著作，都不能得到完全的了解。

我们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也是这样。不仅不能离开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也不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还有一个和其他著作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不但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是革命运动的认识经验的总结。

我们如何去认识革命运动，如何去总结革命运动的经验？对毛主席的“三论”以及其他的哲学著作可以这样看：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大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希望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来串一串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串一串《毛泽东选集》的其他问题，串一串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样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不注意去概括整个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注意联系到整个毛主席的其他著作，那么就没有办法学得好，没有办法理解。

我这次来讲的目的也是想努力按照大家这个要求来做一下，但是很难，恐怕做不好。

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心来概括党史，在某些方面来概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然后再联系现在，联系我们自己，联系我们自己的思想，联系我们自己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跟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一下比较。这是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正确方法。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要用这样的基本方法才能学得好。

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毛主席著作，现在我讲毛主席的著作，也应该按照党史的顺序来进行。因此，讲这个题目也应该是基本上分两段，一段是《实践论》、《矛盾论》，一段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第一次完整的总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加以总结的结果。所以，“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我讲的计划也是分两段。先是《实践论》、《矛盾论》，然后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绪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条：《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史上的地位。这两篇著作和1937年前后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6年(从党的成立到1937年)的实际斗争的历史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总结。遵义会议是党领导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全部政治总结是1945年七大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里，军事、政治、组织、经济的总结都有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一个哲学上的总结。着重总结了认识的经验。

这里讲一讲什么叫认识经验？

我们党在1937年以前的16年当中，始终是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有右的、有“左”的。以陈独秀、王明、博古还有其他人(如张国焘，罗章龙)为代表。所有这些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中间的、党内最主要的斗争。

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 worldview 方面就表现为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不只是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

所谓认识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哪两条路线呢?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另外一方面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

毛主席的认识路线始终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始终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坚持这个路线。就《毛泽东选集》来说,第一篇文章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什么呢?这在后面要详细讲,这里简单地讲一讲,就是一要认识客观现实;二要分析矛盾。毛主席在第一篇文章,第一段一开头就讲到要认清敌友,不能混淆敌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坚持唯物主义,反对那种混淆敌友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是唯物主义。其次是如何认清敌友,这就要进行阶级分析,分析阶级矛盾。毛主席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掌握了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另一方面,毛主席一开始就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路线斗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反对敌友不分的唯心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反对那种不能正确分析矛盾的形而上学。那时候,形而上学主要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就是不分析矛盾,特别是不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所以,我们的党史,在政治上是始终贯串着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也始终贯串着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我们党成立起就是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我们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错误的认识路线就产生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使我们的革命斗争遭到挫折,遭到失败。毛主席的正确认识路线产生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导我们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失败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认识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认识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政治上的经验也是这样。

我们说我们有政治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经历过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熟悉,能够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是只有正确路线经验,而是正面、反面的政治经验都有,这才叫真正有了政治经验。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对修正主义的经验,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然后才能够说我们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

经验。认识经验也是这样。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的经验。正面和反面互相斗争的经验都有了，才能叫做真正有经验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到1937年，经过了16年，我们许多主要的干部大体上取得了两条路线的政治经验，又取得了一些认识的经验。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领导确立了。为什么能够确立？因为这时我们的干部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了。为什么1927年毛主席的领导就确立不起来呢？因为许多干部还没有经验。不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陈独秀是错误的。很多人跟着陈独秀跑。三次“左”倾路线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很多干部没有取得正面、反面的经验。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许多干部对于正确路线产生了什么结果，错误路线产生什么结果，有了实践的经验证明，有了革命胜利和失败的亲身体会。有了经验，相信毛主席的正确，所以毛主席的领导就确立起来了。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十几年的认识经验的总结，是认识上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相互斗争的经验经验的总结。16年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王明、博古所采取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是错误的。十几年来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正确。同时，经过16年新的实践，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进一步充实、发展了。

学习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我们要把它看成概括了16年两条政治路线和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

关于绪论，最后再讲一点，就是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在1937年时，我们中国党主要是忙于中国革命，恐怕是只能管中国革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我们也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那里的工作。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地位还不像今天。在今天，可以说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毛主席的思想是起着基本上的指导作用的。其他国家当然也还有它自己的经验，有它自己的新东西，不能说完全是我们的东西，但是基本上还是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

1937年我们就没有这种地位。但是，我们的斗争、我们的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都和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我们的革命一开始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从开始领导革

命一直和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当时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了
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也同时在某些方面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
共产国际当时经常干涉我们中国的事情，有时指导得好一点，有时提出正确
的意见，有时不正确，有时搞出错误。我们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联系，陈独秀就是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
我们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和苏联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哲学上的问题也是这样。《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著作，不是离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思想孤立出现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认
识路线上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一些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同样有世界观方面、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
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最初是反对黑
格尔。后来，列宁就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批
判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那些人就是孟什维克，就是修正主义。列宁在政
治上反对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哲学上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

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开展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这时主要是政
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认识路
线就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不过，这两个斗争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不是以
哲学上的斗争为主。

在苏联，反对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后，接着又在哲学上专门进行了一
次批判德波林派的斗争。反布哈林是从 1920 年开始的，以后就反对托洛茨
基。1928 年左右，反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接着到 1929 年底，1930 年就开
展了反对德波林哲学学派的斗争。

德波林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普列汉诺夫开始对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有
过贡献，但是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德波林是他的学生，也是修正主义者。
他在俄国革命以后，一直到 1924 年才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开始是专门
研究哲学的，在反对布哈林的时候，他从哲学方面批判了布哈林的形而上学、
机械唯物论。因此，他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有些人曾经认为德波林是苏
联的哲学代表，1928、1929 年世界上也还有这种看法。以后，发现他的哲学
观点并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1929 年底到 1930 年，红色教授学院的一
些人经过研究，发现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

德波林的特点，首先是专门捧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他专门捧普列汉
诺夫写的许多哲学著作，把普列汉诺夫的成绩表扬得很厉害。但是，对列宁

的哲学著作却采取贬低的态度，甚至有时说列宁是普列汉诺夫哲学上的学生。又说列宁是搞政治的，在哲学上好像没有多大贡献。就是这样一种论调。所以，他在精神上、立场上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性，他是没有的。

其次，他的哲学是理论脱离实际。那时，他写了许多哲学书，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但是，这些辩证法的文章都是讲空的理论。德波林不联系革命，特别是不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只讲历史的书本的，只讲抽象的概念和原则，不联系具体实践，理论和实际完全脱离。所以，虽然他在字面上也是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名词，但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就是唯心主义。

所以，当时斯大林给德波林学派加上一个帽子，叫做孟什维克派的唯心主义。因为他贬低了列宁，又理论脱离实际，从这两点肯定了他的本质是孟什维克派的唯心主义。这帽子是戴得正确的，不是勉强戴上的，是他自己本来的帽子。

所以，苏联1930年的批判是对的。现在苏联想要替他翻案。前年替他作了80岁的生日，替他出书，实际上是想替他翻案。他在许多书里骂过马克思和列宁。苏联让他给他以前的著作写序言，于是，他把他骂过列宁的东西偷偷删掉。德波林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称赞二十大，说有了二十大我才翻身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批判是对的，德波林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

说他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是说他一点不讲辩证法，他也讲辩证法。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是取消辩证法的。口头上讲辩证法，实际上在关键问题上丢掉辩证法。主要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事物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和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两个极端是没有矛盾的。矛盾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间才开展起来的，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矛盾，而是开始和最后没有矛盾。因为这样看问题，所以他在关键问题上取消辩证法。另外一个矛盾可以采取和解的办法来解决。可以采取调和的办法来解决，德波林曾经作过自我批评，承认自己认为矛盾可以调和的观点是不对的。

这些地方都说明他是继承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他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全部修掉，而是在要害的地方修掉一些。把最关键最紧要的革命问题取消。修正主义的手法就是这样。一般的

不是紧要的问题，他也可以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但是，在紧要问题上就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1930年苏联开展的反对德波林的斗争，得到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也不是很满意的。因为后来写的一些著作比较粗糙。那时候，主要的人是尤金，尤金曾任驻我国大使，他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他根据批判的结果所写的教科书不是很满意的，教科书很粗糙。但是，有两点主要的成绩。第一，强调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把列宁从前所有的哲学著作里一些宝贵的哲学思想统统地发掘出来了。大量出版列宁的这些著作，列宁的哲学遗产在那个时候被充分地接受下来。第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要为总路线服务，理论研究要为政治的总路线服务。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要联系集体化、工业化的问题，反对抽象地讲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点是当时斗争的最主要的成绩。就这两点来说，成绩是不小的。

我们讲这许多，主要想说明一点，毛主席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候，他是充分地研究了当时苏联反对德波林的成果。反对德波林以后的著作陆续翻译到中国，到1936年差不多中国都翻译齐了。从1937年开始，毛主席花了很多功夫做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了国际上、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我们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著作时，可以注意一下内容，里面对列宁的著作引用的比较多，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更多一些。《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直接地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又加以发展的。这跟苏联第二次大论战有联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里所讲的内容，不是中国一国孤立的现象，而是对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二次大论战的一个发展，是第二次大论战哲学成果在中国的发展，也就像在政治路线上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的斗争的结果一样，在政治上在中国也得到发展。

我想，我们在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些背景。

绪论大概就是讲这一些。

2. 《实践论》——学习毛主席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现在开始讲一点《实践论》。《实践论》要讲八条意见。

第一条，《实践论》的基本内容

我简要地讲一下。

《实践论》是这样的内容：它阐明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所谓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路线。这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包括两方面的，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这两个方面，《实践论》都有批判，不过《实践论》里没有直接使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个名词。后来到了整风运动的时候才使用这个名词，当时是批判了这两种主观主义的。

为什么《实践论》的内容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题目却叫《实践论》呢？主要是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当做认识的基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所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规律都概括为《实践论》，这也是一种创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加以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前马克思、恩格斯都谈到实践在认识论内的重要性，但是像这样突出地、系统地说明实践是认识来源的作用，这在以前的著作里还没有。

毛主席的《实践论》，还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和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实践论》这篇哲学著作，是直接总结了实际工作里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把哲学问题直接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以前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恩格斯、列宁的许多哲学著作，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些著作，直接处理的问题是理论斗争的问题，不是直接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哲学问题。那些著作是总结理论界的斗争成果。当然，通过理论斗争也间接地可以起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反对杜林，是因为杜林在当时工人运动里有影响。所以在理论上把他驳倒，使他的机会主义起不了作用。列宁批判经验批判主义，也是由于许多主观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走了错路。因此，必须把他们的理论粉碎。中国有一点特别。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博古没有很多直接的哲学文章或没有写过什么专门的哲学文章。他们错误的世界观主要是在实

际工作里起作用，主要是在实际斗争、政治斗争里来起它的破坏作用。因此，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直接地去总结实际工作中世界观的斗争。所以，在这一点上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把哲学直接的联系到工作上去，把哲学直接用到实际工作里去，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很着重活的哲学。活的哲学也就是跟实际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现在我们许多工人、农民、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很好。廖初江、丰福生就是掌握了活的哲学，把哲学和实际工作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毛主席创造的一个新的传统，就是一般地不经过理论斗争的环节就直接在实际工作里处理哲学问题。

这种方法在苏联曾经是被反对过的。有一个时期，在苏联有一些搞哲学的人也曾经把哲学原则直接用到工作里去。另外有一些人反对说：这是把哲学庸俗化了。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有这种成见。对于毛主席的这种方法一把哲学思想直接用到改造工作、改造思想这一方面来，苏联的哲学专家是反对的。有一个苏联专家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为什么大家要讲用哲学解决思想问题呢？专家说：“我在中国听到这种话，我就不同意。用哲学解决思想问题，就是等于用大炮打麻雀，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相信这句话。前几年苏联专家还在中国的时候，有人就相信这些话。所以，有一股教条主义的抵抗毛主席思想的潮流。现在也有，不是公开的，但也仍是一个潮流，它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消失的。

用哲学的世界观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这样做，在实践上证明，是产生了很大的力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物质力量。现在更是一个证明，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学得好的，他的思想经过改造以后，他就会发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丰福生讲得好，他的报告是非常系统、非常好的。他是贫农出身，作为贫农，毛主席的著作他很能接受。但是，他的报告还告诉我们一点，接受毛主席著作，不是就等于真正的掌握了毛主席的著作了。你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觉得很高兴，但是，是不是就学到手了呢？不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到手，就是要改造思想。他是贫农出身又是工人，他在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还要改造思想。他讲掌握毛主席的著作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造思想；二是指导工作；三是分析形势。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造思想。他是贫农出身，后来又作了工人，还要改造思想。你如果不是贫农出身，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就认为用不着改造思想，那么，读了，懂了就算是学到手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恐怕

不可以这么说。读毛主席的著作，第一要读懂，如果不改造思想就是还没有完全懂。因为懂得了，还要掌握，使之变成实际，要变成实际就一定要改造思想。

所以，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特点，就是用哲学思想直接联系实际工作。当然，这个联系如果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联系，也是不对的。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当做方法来分析工作中的问题，不是套现成的公式。你要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经常地警惕自己脑子里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因为我们经常要受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抵抗。我们读这两本书是容易的，但是要变成实际就要经常受到旧思想的抵抗。这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突出的特点。它里面没有和哪一个学者进行斗争，没有和哪一个专门的哲学家进行斗争，它只是和工作上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的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一个发展，但是并没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本身的一个发展。

第二条，哲学史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这里不是讲党史上的、而是讲一般哲学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

哲学史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跟我们党史上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基本上一致。我们党史上认识路线的斗争是实际工作上的，哲学史上的认识路线的斗争是理论上的。

为了解《实践论》，需要了解一下哲学史上认识的根本对立。因为《实践论》是整个哲学史的继承，是哲学史上正确路线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论》里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继承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又进一步地发展了。

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对立，是什么对立呢？这个对立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先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任何一派唯物主义在这点上都是共同的，都是反映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从客观的物质世界来的，人的认识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简单地讲，一切唯物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反映论。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回答：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它的核心就

是反映论，就是承认认识是从客观世界来的，认识是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相反，是否认反映论的，就是不承认人的认识是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不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人的意识本身来的，从人的意识、意志、精神本身来的。这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不是有这样两句话吗？毛主席说：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人脑子生就的？毛主席这两句话，就是指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唯心主义对人的认识的来源只有这两个回答。或者回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回答是人的脑子里生来就有的。

这两种答案都是唯心主义的。不过有一点区别，有一点点什么区别呢？

一种就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唯心主义叫做客观唯心主义。

所谓客观唯心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或者叫做“世界精神”，或者叫“世界理性”，甚至于叫“上帝”、“神”。就是说，世界上客观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是能够支配世界、创造世界的。因为世界是它创造的，所以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世界精神”，也可以叫做“世界理性”或者就索性按照宗教的语言叫做“神”。之所以叫它为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它承认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个创造世界、支配世界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在客观世界之外存在着，在个人主观以外存在着，这叫客观唯心主义。

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的认识就是从这伟大的精神里来的，是从“世界理性”或“上帝”那儿来的。那么，怎样得到完全的正确认识呢？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需要“世界理性”给我们以启发，或者受到“上帝”的启示。这种思想实际上等于宗教的思想。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志们是不是有人接触过基督教？基督教的信徒有这个习惯，一碰到困难的问题解决不了，于是就祷告上帝：求上帝赐我以智慧，使我能够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他认为一切智慧、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是“上帝”给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这样。

另外一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毛主席讲的认为认识是人的脑子里生就的思想，认为每个人自己就能认识一切，或者可能认识一切，生就有这种聪明。所以，要紧的是怎么样启发人自己把自己的正确认识发挥出来。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物质世界，也不承认有一个客观的精神世界。就是认为世

界都在我的主观里边，都在人的主观里边。人活在世界上就像做梦一样，看到的各种东西都是自己主观的感觉。

如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彻底地推论下去，那么世界上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我自己。我在这里讲课不是对谁讲课，而是对我自己的感觉讲课。我的感觉里出现了一个课堂，有许多人，因此我讲课的时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感觉讲话，因此一切认识都是在自己的脑子里。

这两种唯心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理论，但是它在实际生活里也是有的。比如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有一种人并不是在理论上讲是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但他是按照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原则行动的。

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批评的那种人，他们就是按照想当然来指导工作，自己的脑子想当然如此，于是就如此来做。这种人的认识路线，就是认为认识是自己脑子里生就的，世界可以由我自己的主观来任意支配的。这种人他也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可是他看问题就是凭想当然。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有些人认为人的思想是头脑里生就的。毛主席的话不是偶然写的，都很有分量，都是大量经验的总结。他提出这问题就是批评一种人，这种人不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钦差大臣里面有，现在还是有的。这种人就是按照想当然办事情，把正确认识看做是自己脑子里生就的。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问

另外，认为人的认识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种人也是有的，教条主义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派。他有一个上帝，从前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人，比如，宋江搞农民起义时，出现了一个天书，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天书，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指示宋江应该作皇帝。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思想。这种天书也就是上帝给的思想。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天书来看，是天上掉下来的，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翻一翻书来解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成是上帝。这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实际上是一种侮辱。不要实践，不要调查研究，只要靠两本天书，一切智慧都有了，一切正确的认识都解决了。这种教条主义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前几年苏联专家对我们不也很有影响吗？不也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所以说，实际工作里边也有这两种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地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历史上唯物主义的路线，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坚决地继承发展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坚决反对唯

心主义的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的，都是坚持了反映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明显地讲反映论。马克思、恩格斯讲了反映论，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讲了反映论，越来越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和唯心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在认识路线上都受到唯心主义的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是对唯心主义的这些抵抗进行坚决的斗争。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批评了当时的唯心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在哲学上都用唯心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这样。从有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有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在列宁时期的修正主义者是考茨基、伯恩斯坦；他们都是搞唯心主义，俄国的经验批判论也是搞唯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有动摇，他前一段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有动摇。斯大林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基本上是坚持唯物主义的，他临死的前一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坚持反对唯心主义的。他一开始就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是哪派呢？有点类似是人的脑子里生就的这一派，认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可以任意改变规律，消灭规律，创造规律。认为人可以任意改变规律，创造规律，任意消灭规律，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斯大林最后还是基本上坚持唯物主义的，但不能够彻底，主要是后期没有彻底坚持辩证法。他领导批判了德波林，但是后来他自己有些思想也是德波林式的。比如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王明、博古这些人的思想就是从他那里来的。轻视中国革命实践，理论脱离实际，那就是德波林的思想。《矛盾论》批评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也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因为，实际上德波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联系。

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世界观继承了、坚持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继承了、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的路线，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继承了、坚持了、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反映论的路线，毫不妥协地反对认识上的唯心主义路线。

毛主席的特点是把这个问题直接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自始至终地进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毛主席都对当时遇到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下边举几个例子。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一开头就讲到要认清敌友。认清敌友和混淆敌友，这就是在认识上的两条路线，认清敌友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你要正

确地反映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离开这个客观实际任意去设想。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形。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没有直接讲哲学，但是也有认清敌我的问题。谁是革命的先锋？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整篇文章贯彻了唯物主义的精神，贯彻了分清敌友，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精神。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就直接用哲学的语言提出了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井冈山的斗争》中的反对想当然，这还不是直接讲哲学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有专门一节讲反对主观主义，这是直接讲到了哲学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边关于坚持唯物主义方面，主要是讲到关于认识现象和认识本质的问题。不要只认识表面的现象，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只是我们认识的敲门砖，只是我们敲门的一个工具。现象本身并不等于门里面的东西，要认识本质。当时革命力量很小，革命很困难，但是，不要只看到这个现象，要进一步反映本质。这里就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唯物主义要求反映本质，不能只看现象，因为现象往往是表面的，纯感觉的。只看现象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感觉看做一切，把表面感觉误认为是客观事实。认为正确的认识就是自己的感觉，正确认识就是在自己感觉里边生就了的。我们要批判这种只看现象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在 1937 年前后，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也是直接的哲学的语言，这是明确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没有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就不能发表主观的意见，你的发言权只能是反映客观事实。谁给你发言的权利？只有经过调查才能有这个权利。没有经过调查就没有这种权利。唯心主义就不是这样看，他认为没有调查研究也可以有权利，唯物主义则不允许有这种权利，唯物主义的权利只能是从调查研究来的。

我们再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 1936 年写的，在这里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又进一步发展了，哲学语言写的更深刻了。这里讲到要认识战争的规律。这一个著作的哲学部分很多，里边明确讲到人的主观要符合于客观情况。在“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那一段里边，讲到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战争规律的问题？就是因为主观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但要认识一般规律而且还要认识具体的规律，特殊的规律。这就使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发展了。

从历史顺序上来看，毛主席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也是发展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斗争的发展，一个一个地具体化、深刻化、发展了。《实践论》就

是在1937年写的，它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起一直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十几年以来，毛主席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一个成果，一个最系统的综合的成果，也是以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实践论》里边有许多思想，是在以前的十几年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突出了，一个时期另一个方面又突出了，情况不同，突出的方面不同。碰到一个钦差大臣是搞想当然的唯心主义的，他就批判想当然；《井冈山的斗争》是碰到有些人只看到现象不看到本质，就提出认识本质的问题；遵义会议以后，他总结了战争问题，提出了规律问题。总的来说是反映论。要着重反映什么东西？这就要看情况，看一定的斗争情况。唯物主义就这样在十几年中间一步一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逐渐积累起来，最后才有了《实践论》。在《实践论》中，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规律的问题，批判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调查研究的问题等等，都综合在里面。

关于哲学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写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主席，是坚持了历史上两条认识路线斗争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实践论》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

第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路线的特点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了一般的唯物主义，但是，不仅仅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只有一般的唯物主义，只讲认识是反映、认识的来源是客观物质世界，那么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坚持这一原则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不在这里，如果单讲这一点，就和以前的唯物主义没有区别。

所以，要了解《实践论》，还得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路线不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路线，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个唯物主义上面有辩证法三个字，或简称辩证唯物主义路线。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这个特点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人的实践和人的认识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认识世界的，不是离开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是仅仅坐在房子里东看看、西望望就能认识世界的。《实践论》批判了以前的一种说法，什么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坐在房子里，不出门，不活动，不改造世界，就知道天下的事情，这个话是不对的，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人是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不是坐在房子里边随便东张西望就可以把世界认识清楚的。《实践论》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这一点。以前的马克思

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坐在房子里边就可以认识一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和人的历史活动是分不开的，所以认识是跟着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同一个时期的人，由于在实践中的地位不同，认识也就会不同。实践中的地位不同就是立场不同，你是真正改造世界还是反对改造世界，这就是实践的立场不同。改造世界是实践，阻碍别人去改造世界也是一种实践。这两种实践可以规定人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古代人的认识没有我们现代人的认识多，这就是由于古代人的实践发展的水平比较低。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前进了，认识也就前进了。

我们说的实践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改造社会的实践；一种是反对改造社会的实践。实践这个名词是包括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在内的，其中有一种活动是最重要的，就是改造世界。不是任何一种实践都能保证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认识是从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得来的，这种实践叫做变革的实践，也就是革命的行动。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有变革的实践，革命的行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反对改造世界的人是不是完全不能认识世界？当然也不是。但是，他的认识总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反动派对于世界发展的最主要的东西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比如，反动派是不是一点也不了解战争的规律呢？反动派是不是一点也不懂得战略策略的原则呢？也不是，有些战略、策略的原则一般地也可以知道一些，但是最主要的东西他不会知道。比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讲的我们革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我们公开讲出来，反动派也没有办法掌握。小的战略策略他会掌握，个别的局部的一些东西他可以掌握。但是每一个时代最完全的、最高的正确认识还是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人才能完全掌握。所以，只有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才有可能掌握最正确的认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是一般的反映论的路线，而是能动革命的反映论，反映论加“能动的革命的”这两个词。能动性、革命性，就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当中，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所以叫做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提法也是毛主席的创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概念，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这样具体地加以概括，没有在哲学上作过这个概括。所以这也还是一个贡献，是在哲学上的一个贡献。

《实践论》讲到，我们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我们对我们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反映论和反对反映论的斗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不仅仅是这样的内容，不仅仅是一般的反映论和反对反映论的斗争的问题。

我们对于党的历史上在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怎样了解呢？这个问题要根据《实践论》作进一步的说明。

《实践论》倒数第三段开头两句话帮助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5页）毛主席所反对的错误的认识路线，就是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路线。辩证唯物主义所坚持的路线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路线。或者说，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路线。认识一点也不能脱离实践，这是《实践论》上讲的话。要保证认识能够正确，主观能够很好地反映客观，就必须时时刻刻使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实际工作里面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路线的斗争。

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有种种的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也有种种的脱离。有的人是“想当然”就脱离了，有的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就脱离了；有的人只讲一般规律，如战争的一般规律，不讲中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通过教条主义方法脱离了。所以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有种种的路线，一不注意就脱离了。

毛主席的伟大，就是在于他在整个实际斗争中，对各种各样脱离的道路经常保持警惕，经常坚持不脱离，只要一发现某些人的认识从哪一条小路上脱离了，马上就提出警告。

在井冈山的时候革命很困难，有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忘记了本质，毛主席就马上提出了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本质的警告。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中讲到，有时有些同志间互相批评都是没有根据的主观主义的随便乱批评。毛主席指出，这些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主观主义，指出这样做会破坏自己的团结。

革命战争中的教条主义者讲什么一般战争规律，甚至讲第一次世界战争的规律。那时搬了一个外国人(德国人)来，他自以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那么一点知识，就想搞一点一般战争的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毛主席就提出警告，这是没有调查研究，是和中国实践脱离的。

人的认识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是很容易的。没有高度的唯物主义自觉性，就不容易完全防止这种分裂和脱离。我们现在由于有了政权，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多了，就从办公室这条小路离开了实践，离开了客观。这叫做官僚主义。有了政权，最危险的就是官僚主义。没有政权以前，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主要危险恐怕还是教条主义多一点，其他方面也有，但教条主义是比较最大的一种力量，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因为它最容易吓唬人。第三国际是苏联人、外国人，我们当时是半殖民地，自己有自卑心理，很容易迷信，由于迷信，就脱离了。有了政权以后的问题，就是官僚主义比较多。斯大林批评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他主要批评苏维埃政权领导者能够任意改变客观规律、创造规律。斯大林也看到了掌握政权容易跑到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去。

所以，要注意，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是有各种各样的路线，各种各样的小路，有政权时候最危险的是官僚主义。

1937年可以说是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告一个段落的时期。政治上、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告一个段落，在认识路线上也大体上告一个段落。毛主席在那时候就做出这样的总结，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认识经验的总结；另外一方面也继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经验、认识斗争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两篇著作不仅仅有中国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当时主要是有中国意义。因为那时候国际上也不一定就承认它有什么世界意义。那时候国际上斯大林为主要旗帜。可是我们也要注意，正是那时——1937年——斯大林的唯物主义也有所削弱。这时斯大林领导了反对德波林主义的斗争，但是后来德波林的某些方面又成为斯大林自己的弱点。1936年、1937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一宣布就使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

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的哲学成果，还是中国继承发展了。就以1936、1937年反对德波林斗争的成果来说，真正发展了的还是中国，是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继承了列宁思想，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了，而在

苏联没有得到真正很好地发展。苏联反对德波林的成绩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理论不能脱离实践。

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普遍真理，是一个方向。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方向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了。

我们说，1937年两条路线认识的斗争告一个段落，这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告一个段落，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正确路线占主要的方面。以前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虽然指导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正确路线没有在全党取得主要地位。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37年以后，毛主席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成了当时党内的主导的路线。他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他的认识路线已经成为主导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斗争告一段落。这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斗争了。所谓告一个段落，就是正确的认识路线占主要地位。错误路线并不是完全没有了，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永远会有的，现在还是照样有。所以，《实践论》的思想，现在照样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思想，也是从《实践论》的思想发展来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思想，在《实践论》里就有的。

所以，认识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告一个段落，并不是结束了，而是正确路线占了主导地位。从1937年以后，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毛主席坚持的路线，基本上成为我们党的主导的认识路线。但是唯心主义路线还是经常起来抵抗，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是不断地存在，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斗争还扩大了，从前主要集中在党内，现在扩大到世界范围。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二十五条”里面，不是专门讲哲学，但是也有一条，就是反对用主观臆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修正主义就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里面的哪一派？就是认识是脑子里生就的那一派。赫鲁晓夫就是代表。他认为正确的认识就是他脑子里生就的，他说的话是不能批评的。

第四条，《实践论》的中心是讲实践

我想特别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是变革的实践，什么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个问题《实践论》里作了最具体、最全面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了变革的实践，但是变革的实践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哲学著作里还没有集中加以说明。毛主席《实践论》的贡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作了集中的说明。现在对我们来说，已变成了常识。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讲到，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其次是阶级斗争。所以，变革的实践最基本的东西是生产，其次是阶级斗争，然后就是和生产、阶级斗争有关系的科学实验。这样就集中地概括了变革实践的主要内容。

这个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都有，列宁的著作里也有。他们也讲了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但是在一篇哲学著作里集中概括起来，这是毛主席《实践论》的一个贡献。根本思想、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样地集中，就又有发展，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对我们现在工作的指导有很大的意义。比如官僚主义，这是我们有了政权以后最容易出毛病的问题，就要通过三大革命的实践来克服。其重要性就在这里。集中起来以后对行动的指导、工作的指导，特别起作用。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告诉我们，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知识，一种是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就是改造自然斗争的经验总结，社会知识就是改造社会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两种知识再加以总结就成为哲学知识。不管是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都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实践里来的，或是从生产斗争里来的，或是从阶级斗争里来的。所以，一切知识的来源最后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改造自然的革命的实践；另外，在生产中就要发生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进行生产的时候就要改变人的社会关系。我们为了使农村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生产，就不能不改造个体经济，把它变成合作社、公社，就不能不改造社会。生产本身又是改造自然的实践，又是改造社会的实践。

阶级斗争主要是改造社会的斗争。它的实践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对社会的正确认识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这方面。所以，我们要认识自然的规律就一定要参加生产的实践；要认识、改造社会，也要参加生产实践；改善人和人的关系，也要参加生产实践。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一定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要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上进行斗争。中央号召我们参加阶级斗争，并不是要我们随便站在哪个阶级立场去斗争。你站在富裕农民那里，也是参加阶级斗争。那不是中央所要我们参加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我们站在贫农、下

中农方面。归根到底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领导贫农、下中农对富裕农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

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提出的思想，在《实践论》里基本都有了。《实践论》里讲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也讲到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的实验，也包括我们改造社会的典型试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试验，也是科学实验。所以那时候《实践论》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毛主席已经根据十六年的斗争经验看出我们有许多干部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脱离生产，脱离革命的阶级斗争。教条主义者是最明显的例子，长期住在莫斯科，偶然回来一下发号施令，根本没有接触阶级斗争，当然更谈不上接触生产、科学实验了。

调查研究包括自己亲身参加的斗争在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不亲身参加斗争，没有自己的经验作基础，你的调查研究也搞不好。所以，首要的问题是要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而且参加阶级斗争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有人参加了阶级斗争，但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么他也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

所以，实践的问题同时也是立场的问题。《实践论》不只是讲唯物主义观点的问题，也讲了立场的问题。你能不能参加斗争这一件事情，就是立场问题。不参加生产，脱离生产，就有脱离劳动人民立场的危险。长期不参加生产，不关心生产，就有不知不觉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危险。参加阶级斗争，也要真正把心放在贫下中农方面，然后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人。教条主义者本来想在莫斯科发号施令，但太远了，后来跑回上海来发号施令，把上海搞得一塌糊涂，蹲不住了，只好跑到江西一带去发号施令。到了江西可以说是参加到实践和阶级斗争里面去了。你说他主观上不要斗争?不是的，他主观上也是要阶级斗争，也要革命的，但是他的心不是完全摆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摆在个人方面多一些。所以他就不能真正参加革命的实践。他也指挥了群众，搞了演讲，但就是没有真正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只懂得照搬条条，不了解实践。

所以，要坚持唯物主义，要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还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有了无产阶级立场，有了真正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才会真正参加生产，真正搞阶级斗争，真正懂得实践。因此，也才能够真正认识社会情况，认识当前形势的本质，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要学好毛主席著作，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廖初江讲到，要革命就要学毛主席著作。反过来，不革命就用不着学毛主席著作，学了也是白学。首先要革命。廖初江问雷锋：“你学好毛主席著作的秘诀是什么？”雷锋一针见血地说：“就是不要忘本！”

丰福生所以能够很容易地领会毛主席著作，他看毛主席著作后体会得那样深，是因为他觉得主席的话讲到他心里去了。他是贫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问题，他一看就感到是讲他自己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践，这就是说明了立场和观点是分不开的。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真正的革命热情，你搞调查研究也是白搞的。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你说他一点调查研究也没有？那也不是。也有调查研究，也有材料，能讲一套，也是从生活里来的。但结论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是相反的。我们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有许多缺点，也有许多错误。你批评的这些错误的确是事实，问题是经过批评以后得到什么结论，同样的批评可以得到积极的结论，也可以得到消极的结论。这就是看你的立场站在哪一方面的问题。

毛主席的《实践论》，从历史上说明了实践是我们认识的基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首先认识的来源是生产实践，然后就是阶级斗争。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有时候也是革命的，有时也有进步的剥削阶级。但是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总有一些偏见。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社会发展规律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认识。不是说剥削阶级一点认识也没有，这也要一分为二。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革命的实践，也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剥削阶级，他总有偏见，没有办法使认识正确，特别是不能够全面地认识。至于反动阶级，那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本质，他的方向，他的认识，都只能是一些错误的荒谬的东西。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使得他们不愿意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使他的思想不愿意正确地反映世界发展的规律。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把思想当做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而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威胁全世界的工具、利诱的工具。最近赫鲁晓夫在阿联讲了几句话，他有一套理论，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要纳赛尔最好不要按照宗教的民族来联合，最好还是联合工人、农民，联合劳动者，和欧洲的劳动者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这一套话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漂亮，好像是有一点马克

思主义的样子。但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实际上是对纳赛尔进行威胁的手段，意思就是暗示纳赛尔：你不要搞亚非团结，要跟我苏联走。他并不是真正讲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这些人就不能讲这些话，只要像周总理那样，讲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就可以了。这样他也愿意接受。当然，在纳赛尔来说他也是实用主义。但在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人只要能够争取他反帝反殖民主义，那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了。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搞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跟他们讲阶级斗争怎么行呢？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要纳赛尔讲阶级斗争，而是要利用这种表面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压纳赛尔，叫他跟苏联走。赫鲁晓夫这些人是把思想言论当做对全世界威胁、利诱的工具，这就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把思想当做实用的工具。不是把思想当做反映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他的阶级利益要求他这样做，所以他绝不可能认识客观真理。

关于实践问题就讲这些。《实践论》的中心问题是实践，所以这里要着重对这个问题作一点研究。实践中特别重要的是革命实践，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保证正确的认识。这是基本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根本的思想。

第二次讲课

(1964.5.26)

现在讲《实践论》的第五条。

第五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

这条讲一讲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实践里边所提出来的关于认识的总规律。规律就是关系，就是联系。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认识的总规律。这条是毛主席《实践论》的总贡献。

如果要讲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什么主要发展？有些问题的发展，昨天已经讲了，比过去讲过的更明确了，更具体了。但是讲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里边最主要的东西，毛主席发展了什么？我看最主要的东西是贯彻了一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就是把认识和实践的内部关系、辩证关系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这个总规律就是《实践论》的最后一节所讲的那些问题。《实践论》就是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论》这篇文章的总结论，也就是这一小节，可以念一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

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6—297页）辩证唯物论全部认识论就是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所以，我们学习《实践论》只要把这几句话学透了，了解透了，而且结合实际能加以掌握，在实际中能掌握这里所讲的原理，就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段是值得反复地加以研究、反复思考，并且结合实际来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以前没有这样全面而又简单明了地概括过。能动的革命的反映，就是它的内容，就是这几句话的概括。这是毛主席在哲学上很大很大的贡献。这样概括以后，就便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在前面所解释的许许多多，都是包括在这里边。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关系、这个规律，列宁也曾经探讨过，但是，他谈的很简单。就是在他的《哲学笔记》里边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82页）所谓直观，就是感性认识，能动地直接观察就是直观，直接观察就是感性认识。由生动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再到实践，这就是辩证法认识论的规律。列宁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就讲过这句话。列宁在别的著作中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恩格斯也讲过这样的话：“真理要靠实践来检查。”马克思也讲过：“真理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都讲得很简单。只是毛主席全面地展开了，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要通过实践来发现真理。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实践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然后又通过实践去证实和检查真理。那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毛主席讲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又在实践中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真理里面包括检查真理。真理性的认识中肯定有正确的，也可能有错误的，这是认识真理的一个辩证过程。用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实践到真理的认识过程，这是一个否定，真理再到实践，是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循环，一个波浪。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螺旋式的。认识真理也是这样一个螺旋、一个螺旋；或者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实践到真理，再由真理到实践。

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的话来说:就是由物质变精神,再由精神变物质。这和实践变认识,认识再变实践,都是一样的,名词不同,它的方面不同,都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或者是一个螺旋、一个螺旋地前进。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向对立面转化两次,就成为一个波浪,成为一个螺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每天有学习、有休息。白天工作,晚上就睡觉。明天再起来工作、学习,晚上再睡觉,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人的认识就是经过这种螺旋式的前进过程,或者是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步一步地发展,两次否定,或者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的话,就是两次飞跃,都是一个意思。两次否定,或者是两次飞跃构成了认识发展的一个步骤。每一个完整的步骤都是经过两次否定、两个飞跃。从实践到认识,这是认识的一半,认识还要在实践中经过检查,然后才算完整的一步。就像人走路,什么叫一步?两条腿左腿走一次,右腿走一次,这就是一步,只有一只脚走了,只算半步。我国的度量衡叫做五尺为步,为什么不叫两尺为步?而叫五尺为步?我们生活习惯上很自然叫五尺为步。一只脚走了,是肯定,再走一只脚,是否定,两次飞跃才能成为一步。

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或者是由物质到精神,再到物质,两次飞跃算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这种步骤是没有止境的。不断反复,不断循环往复,这是人的认识过程。为什么一定要两个步骤才算一步呢?这很容易理解,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这个认识到底确实不确实?很难判断。从实践里边开始得到一点认识,这个认识有了,但是这个认识究竟正确不正确?或者有几分正确的,有几分错误的,单单靠自己本来的认识不能做结论。一定要再拿到实践里去检查,然后才能够分辨出来你所得的认识,是不是正确,或有多少正确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再到实践中去检查,才算走了一个完整的步子。如果有了一点认识,不经过检查,自以为是绝对正确了,不再拿去检查,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使得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就走向主观主义,马上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要坚持唯物主义,一定要不断地用实践检查自己的认识,实践是比认识更高的,实践比理论更高,因为在实践中可以检查理论的普遍性,理论能不能使用,有没有普遍性,可以作检查,同时又能检查理论有没有现实性。列宁有一句话大家觉得很难懂,就是实践比理论高,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现实性的品格。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了理论认识以后,你一定要拿到实践当中去检查才

能够体会这个认识有没有普遍性?有没有现实性?理论的现实性、普遍性,只能在实践当中才能体会到,就是这种意思。

在实践中检验认识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有两点。

第一点,在实践中可以肯定认识中的正确东西。认识正确了,在实践中必然得到一定的结果,那就首先可以肯定认识中正确的东西。其次实践可以帮助改正认识中错误的东西。检查错误,改正错误。肯定正确,改正错误。这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确实实现。

第二点,通过实践可以发展新的认识。因为认识到了实践中去检查的结果,发现实践里边是有新的东西我们原来没有认识到,就可以丰富原来的认识,发展原来的认识。这里毛主席讲到的通过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包括两方面,证实正确的和证实错误的。另外一方面是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当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我们读《毛泽东选集》就是要用这样的眼光来读,把整个《毛泽东选集》当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样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要在《毛泽东选集》里去找什么永久不变的现成公式,不要希望从《毛泽东选集》里边找一些绝对不变的东西,不要以为一拿到手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学习《毛泽东选集》是学习它不断前进的认识方法。当然,毛泽东思想里面有普遍性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革命的最基本的原理。但只讲基本的东西是不够的,要真正能够认识现实或者解决实际问题,那就要不断地在实践过程里边补充和发展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拿阶级关系来说,我看《毛泽东选集》以及我们党史的中心问题是阶级斗争,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始终抓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认识这个核心。阶级斗争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中国的阶级问题,毛主席的整个著作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发展,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毛主席在1926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这个分析从哪里来的?从1921年党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思想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经过四五年阶级斗争的实践,这四五年间,我们读党史,毛主席领导了湖南农民的斗争,领导过工人的斗争,领导过矿工的斗争,在农村里边也组织过农民的斗争,后来又代表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接触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经过接触小资产阶级阶层,这是有了这些年的实践,在实践当中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打过交道，都有过斗争，有过联合，积四五年的经验，然后才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就是从这几年的实践当中得到认识上的总结。几年以前，他是零零碎碎地接触，一个时候接触工人，一个时候接触农民，一个时候接触资产阶级。到1926年把所有的经验概括起来，总结起来，把各阶级的特点都概括起来。所以，这个分析都是有生动的材料、典型的材料来概括的。比如说讲到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抓住了戴季陶。戴季陶当时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后来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他叫一个口号，“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接触的很多，戴季陶是代表人物，他的代表性还可以代表资产阶级的特点。把民族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其他各阶级都有特点。小资产阶级分为几个阶层，农民是可靠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主力军，这些都作了分析。这是第一次由实践到认识。

然后，北伐开始了，农民运动高涨，毛主席又去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里边进行调查，检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检查的结果，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在这个系统的认识里，如果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比，就可以知道有很多新的东西。基本东西没有变，但是有了新的东西。特别是对农民的看法，这是肯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正确的东西，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比如肯定了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这点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打破了原来的认识，认为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就批判了革命中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把农民运动说成是“痞子运动”的观点，肯定了农民运动是好得很，批判了“糟得很”的谬论。在实践当中肯定了正确的东西，抛弃了错误的东西，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东西。农民办了十四件大事，这是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前没有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新事情。批判了错误的，同时也就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分析的正确。资产阶级是动摇的，群众起来它就害怕。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这样的反复。这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实践是1925年以前，1926年得到一个认识，然后再拿到实践里边，农民运动里边去做检查，得到了正确的认识，错误受到了批判，又得到了新东西，又发展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问题也是一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篇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篇文章的阶级分析基本上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样的，基本分析是在新的实践里边照样得到证实，但是这个时候也批判了某些错误的东西。

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跟反动派没有矛盾。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边讲到工商业者也是受排挤的，指出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虽然动摇，但还是受排挤的。进一步证实了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情况比较困难，到农民比较觉悟的地方，同时要有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要能在不是大城市、又不是太偏僻的地方，两省交界的地方找到这种地区，又找到经过大革命的那种农民的地方，像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经过大革命，农民有觉悟，到这些地区去，无产阶级搞革命也能够站得住脚。要坚持革命，只有依靠农民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反动派的力量很大，但是你可以找到地方立足，主要的根源就是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凡是有这种农民的地方，再有适当的地理条件，就能领导农民斗争，就可以站得住脚。又一次证明了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批判了当时有点悲观情绪的那种思想，怀疑红旗能不能存在下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发现了新的认识，新的认识就是在农村里边能使革命站得住脚，在农村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好的办法，是一个新的办法。这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又做出了新的贡献。向来认为革命要从大城市里边搞起来，现在发现依靠农民在农村里可以先把革命搞起来。

到了革命的第三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就是1931年以后，民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过渡，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但是1931年有了“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向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了，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和后期是不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些新的实践。这时，在新的实践当中有各种意见，主要是毛主席跟一切错误路线，特别是跟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由1931年到1935年，这是一个实践的阶段，这是检查究竟是毛主席对，还是王明、博古对？经过四五年的实践得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主要表现在毛主席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写的），那是洛川会议的决议。概括了1921年到1935年的实践，这是在政治上的总结。军事上的总结是遵义会议，以后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什么叫做政治上的总结？政治上的总结就是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总结。在新的实践当中，再一次认识中国阶级。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经过五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对的，还是帝国主义是敌人，封建势力是敌人，买办势力是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农民是同盟军。但是，证实了正确的东西，同时又批判了错误的东西。这几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

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愿意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一种左倾路线的错误。所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这个错误作了批评，在结论上作了批评，并且用实践来证明资产阶级是两面性的，这里特别提到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一方面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三次围剿的时候主力是陈铭枢带头，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来，十九路军又带头抗战，说明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个证明和检验肯定了以前的正确的认识，批评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民族危机前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前，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应该放手和他联合。蔡廷锴来打共产党，不可以和他握手，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们心里很不高兴，但我们必须和他一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又有了新的东西，肯定了正确的，批判了错误的，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先是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最后是哲学方面，在哲学上写了《实践论》。

《实践论》本身就是自有共产党以来认识的反复的一个概括。十几年来，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逐步前进的，这样逐步前进，证明了反复的规律。因此毛主席就在《实践论》中，把这个规律加以全面的说明。所以，这个著作就证实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它本身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不是现成的天书里造出来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概括的。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的认识经验基本上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反复的经验。把我们自己工作中所体验到的这种实践的经验加以概括，所以才写出这篇文章，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毛主席写出这篇文章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写过的，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不出来。不是说列宁不伟大，列宁没有这十几年的经验，他就不能写出来。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出《实践论》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实践经验不能写出这个东西来。以后进一步的革命发展过程也是证明这个认识的反复过程。

我现在只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实，全部《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都可以这样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也可以这样看。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认识的一个步骤并不等于认识的完成，某一种正确认识的完成，要经过好多步骤。看问题的大小，如果问题小一点，简单一点，走几步就可以认识完全；如果问题大，很复杂，完全是新的问题，就要反复走很多步。

也有这种情况，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完成了，但要使干部完成这个正确的认识，就要走更多的步子。主要领导人可以少走几步，一般干部认识完成还要多走几步。比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毛主席在1926年就基本上认识清楚了，再加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问题也认识清楚了，就毛主席来说，正确认识完成了，问题是更丰富了，没有要纠正的错误问题，而是更丰富它的内容的问题。但就一般干部来讲，而且也不一定是一般的干部，对陈独秀、王明、博古、罗章龙这些革命领导人来说，他们就没有完成。王明，博古根本没有实践的问题，陈独秀实际上也是脱离实践，脱离农民。但是，像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之所以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他们脱离了实践。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永远不能跟毛主席的思想一致。但是还有一般广大干部，特别是在实践当中这些人，要得到毛主席那样的完全认识，就要比毛主席迟一些，就要经过反复实践的过程。领导路线存在着斗争，跟谁走呢？又要选择领导，究竟哪一个领导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来说，还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体验才能了解。

所以，就全党来说，我们的干部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认识，最初是遵义会议完成的，大多数干部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完成的，但也不是彻底地完成，彻底地完成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整风，开了“七大”以后，全党干部才统一起来。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反复，要反复多少次因人而不同。马克思主义水平高的人他可以反复的次数少一些，马克思主义水平低的人，他们的反复过程就要长一些，这就是说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早已经明确了，而全党还要经过好多年斗争，才能确立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够全党一致的跟着毛主席的指导走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规律，还要扎根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把这个规律掌握好了，我们肯定可以缩短这个反复过程。学习认识论的重要性，就是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反复过程。现在我们学了认识论，了解了这个规律，我们能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的目的何在呢？就是使我们能自觉地注意到在任何时候不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脱离实践。我们脑子里有什么认识的时候，要很快拿到实践里去检查，而且虚心地接受实践的检查，在实践里感觉有不对的地方，就马上改正。实践中证明是对的，肯定下来，坚持下去，在实践中努力发现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会快一些，我们要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经过的反复就可能少一些，领袖和一般干部完成正确认识的实践的距离就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我们干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都掌握了，那可能使我们领会领袖

的思想要快得多。所有的人要立刻完全领会也不可能，但是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人多一些，领会的就会快一些。这就是认识总规律，重要性就在这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实践论》所提出来的认识总规律，也还不是最后的，不是到此为止就没有发展了。毛主席对自己的这个思想，后来还是继续有发展，特别显著的发展是抗日战争时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我们学《实践论》时需要读一下的，也不要全都读，就是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那几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思想，在写《实践论》的时候还没有，到了抗日战争的这个时候，又经过一些实践的经验，毛主席把这个认识规律加以发展，把认识规律发展成为领导方法的规律。领导艺术跟认识的方法分不开，正确的领导就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方法，正确的领导路线必须跟正确的认识路线相结合，这篇文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这样。

领导者怎么样才能领导得好，领导好就要掌握这样的规律，首先他的领导思想必须是从实践中来的，而所谓实践就是群众的实践。《实践论》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实践不能是一个人的实践，当然首先个人应该参加实践，领导者个人应该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首先自己应该有亲身的经验，但是不能仅仅限于个人的实践，因为个人终归是有限的，再伟大的个人的经验终归是有限的，你比起几千万群众来，再聪明的人也比不了那么多的经验。所以毛主席说：群众往往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领导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当学生，学习群众的各种经验，由实践到认识，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将群众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经验，变成领导的知识，由群众实践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认识。由群众到领导，这就叫做集中起来。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起来？把群众的经验现成地拿来行不行呢？还不行，群众的经验需要集中，因为群众的经验是分散的，几千万群众集合起来，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就一个个群众的经验来说是片断的，而大量的群众的经验汇合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领导的艺术就是要集中群众的经验，把群众大量的经验加以综合，加以分析。群众经验也要一分为二，它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以，领导者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但也不是无条件地跟着走，也不是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当学生，但又不能当尾巴。要学，但学了的东西要分析。好的经验要集中起来，错误的经验就抛弃。所以，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群众的大量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的，属于感性阶段，分散的，片面的，有些是表

面的，抓不到本质的那就去掉。把群众的经验加以研究，研究这些经验不一定几千万群众的意见都去研究，抓住一些典型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粗糙的东西不要，非典型的不要，抓住几条典型的经验，典型的意见。群众说了一些什么典型的话，创造了一些什么典型的经验？发现了，抓住几个麻雀来解剖。然后再去伪存真。有些话是假的，用科学的态度把真实的材料掌握住，然后再根据这些确实的材料，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联系就搞清楚了。联系无非就是联系彼此的矛盾，就是联系彼此的斗争，互相排斥，互相联合，由此及彼的彼此斗争的关系，彼此的联合关系，彼此相互的地位。各种问题弄清楚了，然后就做出总结。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某些农村的调查，也不是在所有地方，所有农村的调查，是选择领导干部，选择某些有经验的群众开调查会，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开调查会，抓住了一些干部，这就是接触下级，然后反映各种意见。反映出来的意见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

这些意见关系到农民对地主采取什么行动，贫农跟地主的的关系，中农跟地主的的关系又怎么样，富农跟地主的的关系又怎么样？这样就集中起来，正确的东西就拿到群众中去坚持，坚持中又要检查，我们所要坚持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肯定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东西，然后找出新的东西。领导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领导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我们认识的方法。或者是正确的领导方法要以正确的认识方法为基础，领导的方法要符合认识规律。所以把认识方法发展成为领导方法，这是很突出的创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个群众路线，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但是，知道这个名词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掌握。现在我们人人赞成群众路线，但是不是人人能真正地走群众路线？那也不一定。如果对认识规律没有掌握，虽然口头上往往讲群众路线，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掌握群众路线。要真正能掌握群众路线，就能掌握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这样一个认识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就叫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是认识路线。群众路线一离开政治路线，就没有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成为群众路线，这

是毛主席的很大贡献。是马、恩、列、斯没有过的。斯大林就不知道群众路线这个名词。

现在我们讲群众路线讲的很多，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讲这个名词，他们有时写文章运用这个名词时打个括弧，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形。现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认识水平上，比起毛主席的思想要落后得多。所以它出现修正主义也是难免的。当然，东方这些国家不同，他们也学习毛主席的认识论，也走群众路线。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我们解放后几年来，毛主席又发展成为逻辑的路线。有些人曾经问，好像毛主席不大讲辩证逻辑，其实毛主席讲辩证逻辑讲的非常好。主要就是在《关于工作方法的六十条》中，这是1958年写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讲到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写文章的过程，用文章来表达领导的思想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逻辑是怎么来的？逻辑也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实践里边观察许多材料，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把这些感性认识集中成为各种概念，对问题下判断先找群众谈问题、谈意见、谈情况，谈了以后，然后找出概念，说这种意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种意见是反映农民的意见，还有那种意见是反映贫下中农的意见，把那些意见概括成为一个概念，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意见，农民的意见，贫农的意见，就是概括起来的概念。有了这种概念就可以研究这个概念对不对？这个概念正确，那个概念错误，做出判断，又可以根据这些判断作推理，既然这概念是错误的，就应该反对，这就是推理。这个意见对，我们就要回到群众中坚持。所谓概念、判断、推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发展的，从实践当中发展出来的，把逻辑当做一种发展的东西，不是现成的。逻辑就是理论，就是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先要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是现成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辩证逻辑就是从发展中看理论，把它看成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怎么样形成这个逻辑？就是从群众里边形成的。形成了逻辑以后，我们就把逻辑写成文章，表达出来，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文字就要回到群众中去，写文字就是为了回到群众中去，所以表达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领导人怎样才能到群众中去，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把这些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怎样才能把文字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那要在表达的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考虑，不要一下子写出来就拿出去。

在《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有一条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也有这样的话，“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1页）。这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把领导的思想表达为文件拿到群众中去，征求下级意见的过程，先在内部征求意见，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写文件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怎么写？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那么，怎样把逻辑搞的很准确，很严格，真正鲜明、生动，那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写出的文件再拿到群众中去进行考验，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吸收新的东西。这样能使这个文件搞得更好，这个办法我们党现在普遍地用。两个十条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表，不发表当然还有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字问题。但有许多东西是文字问题，发下来以后征求意见。工作方法六十条，发展农业生产的什么四十条纲要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这就是涉及到内容是不是完全准确的问题。四十条纲要中有些指标是不是就那样定？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些条是不是就那样定？这些东西都还要考虑。

所以，《实践论》的思想本身也是不断地发展。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就两个发展，一个发展是认识的总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领导规律，领导路线，就是一个发展。后来发展成为逻辑路线，由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逻辑路线，发展成为写文章的路线。怎么样写好文字，怎么样总结好工作，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到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又进一步发展成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一个正确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实践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鲜明的认识，应当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思维与存在是不是对立的统一？根据从《实践论》一直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肯定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是对立的统一呢？思维和存在就是对立面，物质和精神就是对立面。为什么是对立的呢？这是因为主观的精神很容易脱离客观、脱离物质的。人的主观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本身是客观的反映；但你只要不注意，它就会自己活动起来，它会自己用主观的一些材料拼来拼去拼起一些东西，主观幻想就是脱离客观。人的主观意识经常存在着脱离客观、脱离实践的倾向，这就是它的对立性。这个倾向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思维究竟是思维，它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做梦的时候，就可以把许多材料拼起来，梦见一些荒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长着翅膀飞上天。人的主观有这么一些主观

活动，做梦只是一种极端的例子。所谓主观主义就是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自己随便拼凑一些想法。

主观脱离客观是很容易的，稍微不注意就能脱离，主观总是落后于客观，总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反映了以后就满足了，只要一觉得满足了就脱离客观；做工作有了一点成绩，自己就以为很不错了，结果工作里面又出了毛病，稍微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就容易脱离客观。所以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思维要经常能正确反映客观需要条件。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叫做思维和存在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有条件的，条件是：

首先，要能够参加实践。

第二，是还要能够跟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

第三，你还要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拿到实践中去检查，要有一种虚心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态度，而且能够经常这样做。

要保证坚持这几个条件，才有可能使思维和存在经常得到统一，比较经常地得到统一。因为这个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认识也只是近似地最大限度地能够正确反映客观。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正确，无非是保证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客观情况。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己是绝对正确了，说自己任何一点错误都不会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且犯了错误能很快发现，很快改正。这样，能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证最大限度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情况，最大限度地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正确的反映是讲本质，讲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做到这一点，人类认识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多，这是《实践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问题。

有的同志问：现在报纸上争论《桌子的哲学》，这个问题怎么看？根据毛主席的《实践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实践论》讲：我们的认识有两个飞跃，一个是由物质到精神，再一个是由精神到物质。《桌子的哲学》的争论问题，是不是说思想在物质之前，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王若水同志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肯定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因为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现在你说精神在先，物质在后，那不是唯心主义吗？所以，有的同志给他戴了唯心主义的帽子。大概王若水同志文章在文字上有些毛病。我对这些问题没有仔细研究，有些争论的文章也没有仔细看，现在要解答，恐怕不一定做出合适的解答，要表示一下个人的意见，我看，物质在先是为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过这个根本原则要注意怎么来理解。

物质在先的根本原则就是说，最初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所谓第一性，这两个字外国文翻译成中国文，应该翻译成“太初”两字，就是最初最初的东西，没有比它再太初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物质是第一性就带有最根本的性质，最先的东西，第一性是这样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排斥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这个循环过程中，在某一个环节上，精神在物质以前。因为认识是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飞跃是精神到物质。第一个飞跃很显然是物质在精神以前；第二个飞跃又很明显这是精神在先，这是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从辩证法关系来说，在螺旋式上升的后半截又是精神在前，所以说，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如果根本不讲精神在先，那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在唯物主义里面找不到理由。

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思想指导工作。思想对不对？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但是讲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强调认识发展过程里，后一个环节是精神在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决不要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最后的问题，决不要说精神是最初的，归根到底最初的还是物质在先，最初的实践还是物质在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最初环节还是物质在先，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最原始的、太初的、最初的最初，没有比它更初的。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后来才有的，以前就只有物质。最早的时候就没有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就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后来出现了高等动物才有物质到意识。这种情形在低等动物中，一般禽兽，还谈不上认识，只能说是简单的神经反应，不是意识。

人的认识是包括能掌握规律，掌握事情的本质，对于事物的发展方向能多少看得远一些，事情没有出现以前就能预见一定的结果，没有这些就不能叫认识。比如：赫鲁晓夫的那种思想算不算认识？只是一种阴谋诡计，那不是什么认识。他的那个共产主义建设，是不是真正预见共产主义的结果呢？没有的，那是一个诡辩、阴谋诡计的手段，那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使用的工具。真正的认识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本质。这种认识，掌握了规律，掌握了本质，这个认识就可以改造世界了，就可以成为改造世界的原因。原因就是在结果以前，人怎样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先要有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有了认识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就能正确的指导行动，有效地改造世界。在这种意义上说，意识在先。当然这个意识也可以指导错误的行动，但是结果碰钉子，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原因，它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结果，它所希望的结果。

我们讲思想第一，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所以在指导革命行动的这个问题上，革命的理论第一。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思想要去指导行动，要把思想当做中心环节。物质还是第一性，精神还是第二性，决不能说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因为第一性是讲最根本的东西。但是，讲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并不排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这个波浪式的第二环节上认识在先，思想在先。

这个意见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如果不对还可以批评。

主要的基本上讲完了。下面还有几点。

第六条，主观和客观的分裂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很容易分裂和脱离。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子使它脱离，你一不注意它就从一条小路跑开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容易脱离。从基本上来讲，认识必须跟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才能不脱离。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归根结底是实践在先，物质在先。总是先有一点实践而后才能得到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5年以后才写出这样全面的文章。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精神总是比物质出现在后一些。第一个循环，第一个飞跃，总是物质在先，实践在先。

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即使已经得到一定的认识以后，如果不继续跟着实践前进马上就会脱离了。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我们有了认识以后实践又前进了。总的来说，就是认识只要稍微一停顿，不去跟上实践，就会脱离实践，就会脱离客观。脱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主观总是比客观落后一些，认识总是比实践落后一些。稍微落后一点并不等于脱离，问题是认识如果停顿了，即使是稍微一停顿就会脱离。要希望认识和实践绝对一致，主观和客观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近似，多少存在一点不算是脱离。比如我们做一个决议，如果能够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就算是正确的决议，哪怕是有一点毛病。比如说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没有毛病，可以说有一点毛病，但不能说那个决议是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应该说那个决议在当时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我们的发展情况。所以，是正确的决议，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根本问题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有一点缺点的决议、文章、言论不一定就是脱离。只要在当时条件下，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

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是讲实践前进了，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去，这样就是脱离。这是一种脱离。

还有一种脱离就是主观上任意空想，主观相对性发挥到很大的程度，任意胡想，那就完全是脱离。修正主义的言论纯粹是主观臆想。苏共“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完全是主观幻想。究竟那个共产主义怎样建设，规律怎样，一点也摸不到。所以，那是一种完全脱离的、完全主观臆想的。

原来的认识是反映了客观情况，但实践前进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前进，于是就脱离了。我们现在不讲修正主义的那种纯粹臆想的脱离，只讲我们一般的容易脱离的现象。这个问题《实践论》里已经讲了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一种是经验主义的脱离。

教条主义的脱离，就是把原来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一些理论，原来是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拿来机械地用于新的实践斗争中去。新的斗争有许多新的东西，但教条主义者不注意，这样，就产生了教条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的脱离。将外国书本随便抄来想直接解决中国问题。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读毛主席著作，不是学习他的精神实质，不是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想从毛主席书里找出几条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这就必然产生教条主义的脱离。所以，有时候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我们今天不能适用了。这种想法就有教条主义脱离的倾向。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是这样来的：想从《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找出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今天的革命问题。谁要是存在这样的心理学《毛泽东选集》，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毛泽东选集》四卷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是民主革命实践的反映，而今天我们又有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没有直接讲到。当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面几篇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有些原则是能直接解决今天的问题，但也还不够，也还比较简单。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搞？那里面就没有一篇文章写过。所以，要有这想法来学《毛泽东选集》，抱着这种希望来学《毛泽东选集》，就会感觉到《毛泽东选集》对我们没有帮助。如果丰福生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毛泽东选集》，那么《毛泽东选集》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搞的是大师傅工作，《毛泽东选集》没有一篇文章讲到如何当大师傅的，找不到现成的公式。但是，他掌握了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用到他的伙房工作中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脱离实践，脱离客观。想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公式直接解

决问题，就一定要造成主观脱离客观的错误。这种脱离就是生硬地把书本词句，拿来想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解决不通了，就对马克思主义失望了，对毛主席著作也会失望。所以，我们要避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产生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问题。

另外，《实践论》里也批评了经验主义的脱离。经验主义的毛病，就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旧的经验，不去吸收大量的群众的新经验，不去学习群众的新经验，主要是依靠个人的直接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以前大家有一个很恰当的名词叫做“经验随便搬家”。自己有那么一点经验，经验本身是好的，经验本身是从实践中来的，就那么一点范围来说，它本身是和实践不脱离，和客观是一致的，问题是一搬家，搬到新的实践里面、新的条件里面，它就脱离了。

这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就是这两种脱离。

在《实践论》里概括了这两种脱离：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践这两种主要毛病，两种主要现象。这两种脱离本来主观上是想搞好的，不想胡思乱想，也以为自己不是胡思乱想。这跟实用主义者的纯粹按照自己的临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阴谋的需要，来任意指导思想的情况不同。不论教条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它的教条或经验的来源，本来是正确的，因为来源正确，是好的，所以他自以为是能够搞好事情的，自以为能掌握正确思想的，主观上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现成的公式，这是用教条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分析，不做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结果。

《实践论》里讲到机械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是指什么东西呢？

机械唯物主义在认识上就是经验主义，只强调由客观到主观，不强调主观反过来又拿到客观里去考验。因此，它原来是唯物主义的，原来认识是从客观里来的，但是，客观事物发展以后它就脱离了。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在实际行动中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干部的经验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带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的最初经验的发源是唯物主义，它的经验的发源是实践。经验的确是反映了客观一部分情况的，是所谓由物质到精神，有一点唯物主义性质；但是进一步运用经验时，就脱离了物质，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就在工作里变成了唯心主义，这就是经验主义。所以，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成

为真正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后来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它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历史上的机械唯物主义都有这样的性质，都是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到解释社会问题就变成了唯心主义。

我们的经验主义的经验的来源，是唯物主义的，但一到运用经验时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脱离客观，脱离实践。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有各种各样的路线，但主要的有两条大的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我们一般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有革命的要求，我们不会胡思乱想，任意味着良心根据临时的需要任意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思想。我们在主观上不会这样做，那种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地还没有。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但是那种经验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因为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是承认经验要反映客观事物的，所以经验的来源还是唯物主义的。而实用主义的经验是另外一种经验，是主观主义的经验。他把经验解释成为人的主观需要、主观的利益、眼前的利益。把这些主观需要、主观利益和眼前利益，作为他的主要经验来源。所以，这种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我们讲的一般是《实践论》里面所批评的那种经验主义，是从客观来的经验，反映客观实践的经验，反映某些局部的斗争经验。那种经验是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

实用主义的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的需要、眼前的利益就是一切最根本的东西。一切从眼前利益出发，从个人利益，从临时利害需要出发，从阴谋诡计的需要出发，来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毛主席批评的经验主义其实也是批评两种经验主义。《实践论》里批评的一般是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的经验。还有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经验主义，我的需要就是一切，我的主观要求就是一切。赫鲁晓夫的这种经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经验主义。有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根本不能结合实际，根本不能结合革命实践的问题。但是，如果讲实践他也有实践，实用主义者的个人活动也是一种实践，但不是革命的实践。我们讲的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实践，是能够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实践，这种实践只能是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不是那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各种社会活动。资产阶级政客的阴谋诡计也是一种实践，但是那不是革命的实践，那

是反革命的实践。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实用主义者，他们的认识不是脱离实际，而是根本不联系革命实际的问题。

我们所要防止的是脱离革命的实践问题。教条主义本来主观上想要革命，但实际上脱离了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主观上也是要革命的，但是结果也是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因为他们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一般的同志经常警惕这两种脱离就行了。

但是，修正主义的那种主观和客观分裂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危险也要注意。教条主义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如果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改变的话他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经验主义者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中有许多人就是教条主义。从前王明、博古那种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天书。现代修正主义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做天书。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多列士，赫鲁晓夫每一句话他都要跟着重复。多列士原来是反对戴高乐的，最近当赫鲁晓夫派人到法国搞外交，多列士对戴高乐在某些问题上又表示支持，每一件事情都跟着赫鲁晓夫走。修正主义也有他的教条主义，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危害革命的，我们的教条主义也是危害革命的，但他原来主观上还不是反对革命的。他最初主观上肯定还是要革命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首先就是立场错了，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首先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就是要有革命的实践，参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站在革命阶级的方面，要把心摆在革命阶级的一方面，把自己的心贡献给贫苦的工人、农民。如果立场错了，就根本错了。

反对革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错误和正确的问题，那是敌我问题。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敌我问题，一种是是非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有是非问题，但是主要是敌我问题。单纯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我们内部的是非问题。所以，要防止错误，第一要紧的是避免立场站在敌人方面。立场基本上没有问题，就要解决是非问题，解决主观和客观脱离，理论和实践脱离。避免理论和革命实践脱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我们好像都以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讲的，实际上他早就讲了。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讲到：“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其次，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

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4页)分清正确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也很重要。要避免错误首先要分清敌我问题,首先要端正立场,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能划清敌我界限。当然,划清敌我界限,不仅仅是基本上有了革命的立场,参加革命的实践,还要经常防止认识和革命实践脱离。这样,才能完全解决是非问题,才能避免错误,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六条就讲这些。

第七条,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想讲很多,也不希望大家研究得很多。因为这个问题研究多了,就容易钻到名词里面出不来了。这个问题只简单地说明一下就行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两个概念是有自己的解释的。跟一切其他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不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过去的哲学家讲绝对真理就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永远不能发展,完成以后就再也不能增加一点。基督教的圣经是谁也不能批驳它一句的。中国孔子的书谁也不能说它有一句不对,永远是圣旨。从前的哲学讲绝对真理都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他一下子就能提出一个绝对真理,以后,人们永远不要动脑子了,只要跟着他走就行了。赫鲁晓夫大概也以为他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都不错,不能反驳。

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跟以前所谓的绝对真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绝对真理,是人类对周围客观事物认识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停止的过程,这就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这样才是绝对真理呢?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认识过程才能完全反映不断发展的世界。世界是永远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该是永远发展的。所以,只有永远发展,而且经常反映新的客观事物的这样的认识才算是绝对真理。人类有没有能力认识这个绝对真理呢?马克思主义者说,人类是有能力认识这个真理的。不过这种绝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靠一两个人来认识,甚至不能靠几十、几百个人来认识,而是要靠人类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一代一代地增加认识。因为个人的认识或几十、几百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人都是要死的,他不能永远跟着事物发展,光靠个人的认识是做不到的。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是有这种认识绝对真理的能力的。这就是绝对真理。

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有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就是在人类认识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方面的认识。在整个发展过程里的某一阶段认识都是相对真理。为什么叫相对真理呢?就是说别人的认识或一个时代的认识,都是受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所以叫做相对真理。它不是无限地发展下去,不能把无限总是掌握在手里,它只能掌握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它只能认识无限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整个人类是能够认识完全绝对真理的,但个别人就不能认识,就做不到。完全的真理是要靠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断去认识。个别人只能认识整个绝对真理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个部分。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件事,而是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不过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方面。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统一的,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我们就认识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只能认识一部分。我们的认识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个人也只能认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既然有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认识只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我们也能够认识绝对真理,但我们认识的只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认识凡是正确的认识都可以说又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不过它不是完整的绝对真理,不是全部真理,是当时的相对真理,当时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相对真理,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阶段的相对真理,也是列宁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

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这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也是相对真理。毛主席著作是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代这个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因为它是一部分,所以它也带有相对性,只是反映了现代这个阶段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这样。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无非是要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要相信我们是能够认识绝对真理的,是能够掌握正确的认识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有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在当时是绝对真理,但是,又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我们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因此不要满足已经得到的认识,还要不断地前进。

归根到底，讲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无非是要我们注意要努力使我们的认识经常跟着实践前进，经常从群众中去学习，然后又总结群众的经验，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而且经常反复地这样做，永远也不要停止，永远也不要满足于现状。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任何时候都不要犯这种毛病，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毛病。否则，就是忘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忘记了人的认识要不断跟着实践不断前进。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就是这意思。这个问题清楚了，《实践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容易了解了。

第八条，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

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首先要改造客观世界，要参加革命的实践。那么，是实践第一、还是认识第一？是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就根本来讲不能说精神第一。桌子在先还是桌子的概念在先？有时候桌子在先，有时候桌子的观念在先。归根到底是自然产生的桌子在先，没有人工加工的桌子在先。最原始时大家碰到一块石头、土堆，就围在一起，把东西放在上面，根本没有人造过桌子。这是自然的、没有人造的桌子在先。然后，前人对这种桌子的实践首先成为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再加以概括，就成为带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制造一个桌子。所以，认识总是最后，实践在先。归根到底是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就是首先要改造世界。

我们参加革命多年了，最初还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的种种情况而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以后，除认识革命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革命以外，首先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世界就是改造主观世界，由不知到知。在改造世界时是不知的，后来经过实践变为知了，由不知到知，就是主观世界的改造。这时又有一个知得很少到知得比较多，知得不很正确到知得很正确的问题。这时还要解决是非问题，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所以，主观世界是这样改造的：在实践中首先是改造无知的主观世界变成有知的世界，然后进一步使知得很少变成知得很多的世界。知得很多中又有正确与不正确。所以，我们人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这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学习，就是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的改造有没有止境呢？有没有尽头呢？是没有尽头的。因此，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就没有止境的，也没有尽头的。就一个人来说，除

非我们不参加革命，要参加革命就要改造客观世界到底，一直到死才算完结。就一个人来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改造世界才算结束。同样，改造主观世界也是这个问题。个人的认识是相对的，所以，个人改造是可以有止境的，就是生命结束了就停止。除非我们不要作革命家，要革命，就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一点停止。因为我们没有第二个生命。但是，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等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停止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根本规律。当然，有人是反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这是反动派，他们是人类的少数。人类的主流，大多数是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造世界的看法。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是明确地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结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是一般地讲改造世界。《实践论》又把改造世界一分为二，分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要改造，主观世界也要改造。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也是有的，但是没有这样集中地概括起来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人类在生产中改造自己的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马克思是从生产、经济学角度讲的，但从哲学上作这样更高的概括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实践论》里面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我们整风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全党教育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现在还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比较充分地了解，不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了解。现在有些左派兄弟党也能了解，也注意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的问题，也能够接受我们的整风思想。

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在《实践论》里已经开始打下了基础。为什么这几年对整风名义不好？就是对整风有误解。这是对整风运动里作的一些不恰当的方面，作了片面的理解。这个运动里是有些搞得不恰当的地方的，有一些粗暴的东西，实际上是不符合整风原则的。但这种现象被一部分同志夸大了，在主观上片面化了，因此就觉得整风好像是不好。所以，听到整风两个字就紧张。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一分为二，所以才出现这种误会。整风运动的基本精神和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两回事，要一分为二。能够一分为二就能够避免这种误会。所以，应当根据《实践论》里所讲的精神重新对整风做一个正确的估计。

整风运动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正确地决定的一种思想教育方法。它是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一种非常正确的方法，一种科学的方法，符合于人的认识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这就是关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也是毛主席思想的重要一环。

关于《实践论》就讲这些。

3. 《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

《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有些问题就不讲了。今天稍微讲一点，明天就可以讲完。

今天讲一个总的问题，是前面没有讲的。现在分几条来讲。

第一条，《矛盾论》如何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

《矛盾论》就是我们党成立以后 16 年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一个方面的总结。两条认识路线是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也可以说是两种相反的观点、两种对立的观点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认识路线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总的来说，都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种认识论的斗争。把它分开来讲就是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其中也有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立场问题主要是成为犯路线错误的人的问题。一般的同志忠心耿耿要革命，但思想上有一点片面性，有一点脱离实际，有一点经验主义，那不算是立场问题。在政治上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陈独秀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王明、博古三次“左”倾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后来，到抗战初期又成了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分开来讲就是有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和方法问题。

《矛盾论》着重总结了方法上的问题，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两种方法路线问题。现在我们是用理论来说两种方法路线问题，就它的具体内容来说，就是要不要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要不要一分为二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问题：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坚持一分为二这样一种认识路线、方法路线。另外一个方面是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反对一分

为二。所谓反对一分为二，不一定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反对。例如，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写起文章来不一定否认两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和对立的名词，在他们文章里都有。他们是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的。重要的错误都是发生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根本错误。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这样的。修正主义一般地也不否认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他就要掩盖矛盾。所以，我们现在的斗争复杂就在这里。现在的斗争跟以前的斗争不同，以前形而上学在任何问题上都反对一分为二，但马克思主义是占了优势这方面。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是公开的、一般地来反对辩证法，而是说自己要坚持辩证法，辩证法的假面具还要坚持，问题是在关键问题上。比如陈独秀在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只看到资产阶级进步的方面、革命的方面，没看到资产阶级反动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分为二。“左”倾路线也是这样，在其他小问题上也不反对一分为二，而在关键问题上，比如在农民问题上，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反对一分为二。陈独秀强调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面，不分出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左”倾冒险主义只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不分出它革命的方面。关于农民问题也是这样。陈独秀只强调农民的落后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革命的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当时对农民阶级里的富农、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跟反动派之间的区别不是一分为二，富农也反对，富裕农民也反对。

现在我们坚持辩证法的路线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要善于在关键问题上是否是一分为二，做到这点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比如分析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不容易决定。修正主义要掩盖现代世界的主观矛盾——亚、非、拉的主要矛盾正在高涨。他在表面上也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实质上他用种种诡辩的方法来取消这个矛盾。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毛主席一直是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的。不只是在一般问题上注意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做到掌握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阶段，辩证法的掌握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分不开。实践和认识的每一个反复都要对矛盾做一次重新的分析，因此，对辩证法的问题有新的发展，新的内容。实践每前进一步就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就提出新的问题，就要做出新的总结。

《矛盾论》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讲内因和外因、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问题？为什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著作没有讲这些问题？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结合 16 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从 16 年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矛盾论》不过是把 16 年来的革命实践一分为二地反复斗争经验作了总的分析。《矛盾论》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是在 16 年实践中一步一步提出来的，最后才在这篇文章里作了综合，成为系统的文章。同志们自己串串历史自己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体上解决中国阶级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坚持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的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最突出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再一个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层的分析。还有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过去是封建势力，再加上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阶级的特点基本上解决以后，再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基本上是坚持这种分析方法的。

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就出现新问题。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问题：革命稍微得到一点胜利以后，我们革命在战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如三次“左”倾路线都有这个问题。毛主席辛辛苦苦地在井冈山打了两个胜仗，上海的“左”倾指挥者看到那种胜利以后就说可以进攻了，就号召全国大罢工，进攻大城市。因此，在同“左”倾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提出一分为二这个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只要在农村里打了两个胜仗，那么主要方面是在革命方面，因此，就采取进攻的手段。从李立三到王明、博古都是这样。王明、博古反对李立三，但他们比李立三的片面性更厉害，问题搞得更糟。所以这时候，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新的具体特点，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能一般地了解谁是敌人，而要了解敌人和我们谁占主要方面，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谁占主要方面。当时，在大城市里敌人是统治者，敌人明明是支配者，是主要方面，但“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在大城市搞进攻，不采取积蓄力量和防御的战略，不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配合、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配合的这种灵活战术，而一味搞公开斗争，搞公开反对斗争。在这时候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主要方面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规定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这在《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

再进一步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即“九·一八”敌人打进来了。这时候跟“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斗争就提出一个主要矛盾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主要矛盾的问题。还有，在党内斗争中有一个肃反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提出了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实践要求党提出这些新问题，这种新问题是以前别的国家在比较简单的革命斗争中提不出来的。由于我们中国有这样复杂的斗争情况，就提出这些新问题。所以，到了1937年毛主席写《矛盾论》时，就总结了正确与错误经过一个实践过程都得到了证明，然后再把实践变成认识，把物质变成精神，得出这个结论。因此，《矛盾论》就包含这几章。

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在跟“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要不要又联合又斗争，或者是只联合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联合的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然后经过几次实践和认识的反复，最后在1937年完成了这个认识。所以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正确认识地完成，但是，完成并不等于认识最后结束，后来是有发展的。《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是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成的一本著作。

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是不是一分为二是惟一的方法，可不可以一分为三？因为有同志讲我们分析问题总是要分两头和中间；左、右和中间，这不是一分为三么？现在，我可以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中间的东西还是要一分为二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分为二，不是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就是先分成两个极端，除两个极端之外还要注意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再一分为二。因为中间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東西，它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就是左、右摇摆的。要看它怎样摇摆，要看斗争的情况，“左”派坚决，它就动摇到左边；如果“左”派不坚决，中间派就要动摇到右派方面去。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跟我们斗争的，他要争取中间力量。修正主义也是争取中间力量。我们的办法就是坚持我们的路线，表示坚定的态度，中间力量就会摇摆过来。

这次亚非筹备会议不是证明了吗？陈毅副总理坚持不要苏联进来，原来中间想动摇、想推到亚非外长会议去解决，那样的结果不就等于承认苏联可以进来吗？由于陈副总理坚持主张不让苏联进来，这样中间力量就过来了。中间力量是不坚定的，如果陈毅副总理也不坚决，如果会议始终是苏班德里约

掌握，苏联修正主义就胜利了，中间力量就动摇到那里去了，实际上苏班德里约是中间派，他也抵抗不了修正主义的压力。

所以，一分为二就够了。

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如果把一分为二换成一分为三，又降低了一分为二，又把原来可以一分为二的东西变成了独立的东西，又把二合为一了。我们反对“合二为一”，而坚持一分为二。因为中间派总是想把它调和起来，但是矛盾是不能调和的，而要暴露矛盾，揭露矛盾，经过斗争解决矛盾。一分为三实际上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所以，要坚持一分为二。我们要把一分为二坚持到底，这就是辩证法的方法。

第三次讲课

(1964.5.27)

今天接着讲《矛盾论》部分。《矛盾论》部分有些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昨天也联系历史讲了一点，所以，联系历史这一部分可以不必多讲。今天只着重讲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和与当前有关的问题。

现在继续讲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在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里，实际斗争里，运用一分为二辩证法主要抓一些什么问题？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昨天已经讲了，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的提法，开始是在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里面谈到的，这就是统一物一分为二的问题，列宁当时是作为一般真理讲的。最近，毛主席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通俗的普遍应用的方法提出来，作为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方法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分为二，使得辩证法的方法能够很通俗、但又很深刻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联系实际上，用这样的表达方法更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里就是不容易坚持一分为二。就我们这些年来讲，我看在认识上所发生的毛病，在方法上恐怕都是由于对一分为二的方法搞不清楚。在一些大问题上，不能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忘记一分为二的方法，认识就出毛病。

对社会问题来说，对我们的实践的问题来说，一分为二首先是阶级问题。在阶级问题上要一分为二。我们多年来，恐怕从民主革命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出的大问题，带路线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来，都是对阶级问题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从陈独秀起一直到我们这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我们仔细

想一想，很大的路线问题，在方法上都是关系到在阶级观点上不能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政治路线问题本身就是阶级问题。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一开头就讲分清敌我，就是分析阶级的问题，通过分析阶级来分清敌我友。所谓政治路线无非就是阶级斗争的路线，就是分清敌我友的问题。陈独秀搞不清敌我友，王明、博古搞不清敌我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好几次。

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分析。这里面有右的、有“左”的。右的错误是忘记了跟资产阶级的界线。“左”的原因之一是把工人和农民的界线分不清楚，在农民中间想贯彻工人的要求。1958年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候我们有些人忘记了这点。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农民比工人还先进。究竟是工人领导农民，还是农民就等于工人呢？这个问题弄不清楚。这是路线上的问题，根据这一点可以把从陈独秀以来所有关于路线性的问题串起来。

其次，是在形势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刚才我们是讲在历史上对大的问题不能一分为二，因而发生毛病。首先是在阶级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其次就是在形势问题上，不善于一分为二。

形势问题不能一分为二，这个问题也讲过。就是在顺利的时候不能一分为二，不能找到和警惕可能发生的困难；在黑暗的时候，对困难不能一分为二，对坏事不能一分为二。出现一些困难就以为不得了，看不到出路，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惊慌失措。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坏的，但是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反面教员。这个问题的一分为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串我们的历史：顺利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困难的时候又悲观失望。这都是盲目的，头脑不清醒。这也是常常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时期发生错误的原因。

第三，就是对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不能一分为二。看到成绩就以为一切都好了，抓住人家的缺点就以为一切都不好了。这是我们的内部，讲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讲形势、阶级斗争，不是讲敌我问题，是讲人民内部的问题，对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不能一分为二，这是历来都有的。对待人的错误，批评起来就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要讲成绩就生怕讲缺点，只愿意讲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最后一段就是讲要划清两种界线：革命还是反革命，正确还是错误，成绩还是缺点。

毛主席始终坚持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讲到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这个问题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估计。如果他的成绩是七分，错误是三分；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错了。

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毛主席还是坚持。最近，在我们的工作上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在进行一般的工作、发展生产的问题上，要一分为二。现在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就是以一分为二的思想作基础。如果不能在成绩和缺点、错误和正确方面一分为二，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如果自己以为都是成绩了，那么就和别人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就自满自足了。就是因为有成绩也有缺点、有正确也有错误，所以才能比。一方面和别人比，另一方面自己也要比。首先是把自己的内部比一比，把自己的成绩和缺点比一比，是三分还是七分，把自己分析一下，分析以后再跟别人比。不比就没有办法学，没有一个比较，你学什么呢？那也就无所谓赶，无所谓帮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应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我们一切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这三个问题，也还有其他问题。阶级方面一分为二，不但不同阶级要一分为二，同一个阶级也要一分为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分为二，一个是农民的一分为二。我们无产阶级也要一分为二，无产阶级也有先进和落后。党也是这种情形，党内也有一分为二的问题。

阶级一分为二、形势一分为二，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一分为二。这三个问题恐怕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比较普遍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是对我们的工作到处都有影响的，所以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是不是着重在这三个方面来坚持。

第三条，关于如何进行一分为二的问题

有人说，有些问题好像不好一分为二。比如：最反动的人物怎样一分为二？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答。毛主席就经常对最反动的人物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最显著的就是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这就是一分为二。如果希望对帝国主义像对我们自己一样来分，就不可能。我们自己内部一分为二，一般是这样分，就是我们有先进思想，也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有

一部分人比较先进，有一部分人比较落后。就一个同志来说，既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往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先进的方面，也有落后影响的方面。这样一个两分法，如果用到反动派当然用不上了。

有人说有些事难分，我想就是因为又把一分为二公式化了。以为一分为二，就是分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反动派是不是也有成绩和缺点呢？拿这个死的公式到处去用，就用不通了。把辩证法当成一个现成的公式，变成万金油，那就搞不通了。你说它包医百病，实际上有许多病就医不了。所以这里就有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一分为二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形用不同的分法。对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分法，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分。不能主观上决定一个公式，就按照这个公式去分。一分为二仅仅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普遍的方向，这叫矛盾的普遍性。

到处都是—分为二，但是，在分到反动派头上就不能用在我们自己内部的方法来分了。对帝国主义只能这样分：它又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在战略上是纸老虎，在战术上又可能是真老虎。并且对帝国主义的分法也不只是这一方面，毛主席单单就纸老虎问题就有两种分法。毛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这样讲：“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政权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9页）后来它的统治要没落了，那时候它才变成纸老虎。所以，对于统治的剥削阶级，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战略、战术的分法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分法。它上台前后和它没落的时候也要—分为二。尽管它是剥削阶级，它在初上台的时候是真老虎，它是有真正作为的。等到它的政权要垮了的时候，就没有作为了，就成纸老虎了。可是这个纸老虎在战术上可能还是真老虎。这又是一分为二。所以在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上，有两种分法：历史分法和战略、战术的分法，就是纵的分法和横的分法。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分法呢？因为对象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分了，不是我们主观上分的。毛主席这种主观上的分法，无非是经过调查研究它的历史调查了，现状也调查了，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把它的情况如实反映到脑子里来。所以，两分法实际上是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反映，并不是主观上有那么一个公式，把反映的对象人为地分成两部分，而是按照事物的特殊情况正确地反映事物自己的对立面。

又比如说，帝国主义有两手，这也是一分为二。帝国主义是反动的，但是它的反动有两手：有暴力的一手；有和平的一手。这两手对蒋介石也适用。蒋介石从前对中国人民也有两手：暴力的一手；欺骗的一手。公开压迫的一手，笑脸欺骗人民的一手。同一个对象，它有各方面的对立面，所以你可以从各方面来一分为二。蒋介石对人民有欺骗和暴力的两手，对美帝国主义也有两手，又依靠美帝国主义，又和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每一个走狗都有这样的特点。吴庭艳、朴正熙都是这样，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又跟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联蒋反美的。金门打炮就有这样的意义。隔日打炮，打一下拉一下。结果炮是打在美帝国主义身上。打炮单日双日分开，这也是一分为二。这样做，符合情况，符合需要。

所以，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注意事物特殊的性质。如果能够经常注意这样做，我们对待工作，对待斗争，就能够很好地处理问题。

就是对最反动的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不过只是分法和对革命人民的分法不同。

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坏蛋、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但是他又是反面教员。这也是一分为二。

我们党是最幸福的。毛主席把辩证法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处处应用，时时应用。这给我们很大教育，很多问题过去想不通，今天一分，就想通了。坏事可以变好事，从前谁敢这么想！反动派可以作反面教员，从前谁敢这么想！经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讲，我们就清楚了。

地主阶级要打倒，但要一个不杀，这也是一分为二。对地主和他的子女一分为二，对他的子女家属又要一分为二。对于被打倒了的地主又要限制他们，又要改造他们。要消灭他，但又不杀他。我们对剥削者采取改造的办法，这也是一分为二。剥削者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在我们的政权下，剥削者又可以改造为一个劳动者。在他们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是劳动者。我们把他们打倒以后，在我们的统治下，一方面把他们看做剥削者，另一方面也要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

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因为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就好到尽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因为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既是普遍真理，又是

具体实践。列宁在列宁的时代，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没有人能超过他。但是，列宁还是受到了限制，列宁的许多思想还要毛主席来发展。列宁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但并不是尽头，这也是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最坏的东西也可以一分为二。

总之，一分为二这是最普遍的宇宙规律，也是最普遍的方法。不能有任何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是我们主观上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有什么例外。这个问题要很好地、深刻地理解。不管什么样的客观事物都包含各不相同的方面，没有任何事物不由许多不同的方面组成。它的不同方面就是它的内部差异，差异就是矛盾。

一张纸也有两面，两面就是矛盾。我们用纸的时候总是用正面，不去用反面。而正面和反面又是互相排斥的作用。任何东西，它有它的各方面，它的各个方面都是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面。身体上有左手和右手、左腿和右腿、左眼和右眼。鼻子虽然是一个，但是有两个孔。它们都是一组一组的对立面，都是对称的。你找不到没有对称的东西，找不到没有对立面组成的东西。所以不要以为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矛盾。一件事情它有许多方面，许多组矛盾。不过有些矛盾不重要，有些矛盾重要。

我们处理人的问题，主要抓思想问题，不是抓两只眼睛、一只鼻子的问题。在工作中、行动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思想问题。有些不主要的矛盾，可以撇开不管，在日常生活里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没有什么大妨碍。在行动中，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

列宁讲过，每一个事物都有许多方面、许多联系。这种说法是不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有点不一致了？好像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好多方面。

对列宁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列宁讲的是一个事物的内部有许多矛盾、有许多联系。人类有生理的矛盾，有社会的矛盾；要吃饭，就和饭有矛盾；要呼吸空气，就和空气有矛盾。但是人的生活主要是社会生活，主要是人和人的矛盾。有各个方面的矛盾，要研究各个方面的矛盾。生理学家要研究人和周围自然界的矛盾。

因此，矛盾是有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每一个个体内部的各个方面互相发生的矛盾，和外部发生的联系，又有外部的矛盾。所以研究这个矛盾要有全面性。凡是起作用的、重要的矛盾都要作全面的研究。我们讲要全面分析矛盾，不是指对每一件事情的所有矛盾都研究，而是对起主要作用的矛盾作全面的研究。

刚才我们讲的三类大矛盾，从历史到现在，对阶级和形势、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这些矛盾随时都要注意。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研究了中日的民族矛盾以及中国和日本战争与地理条件的矛盾，研究了这些矛盾之后，还要研究国际关系的矛盾。内部矛盾就是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我们是真正进步的正义战争，日本是反动的战争。其他的地理条件，如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是说自然条件的矛盾关系。还有国际关系。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日本就要逐渐孤立。这里研究了内外部矛盾。一分为二要做具体的分析，不是只分析一组矛盾，而是以一组矛盾为中心，它的主要联系也要研究。中日两国谁进步、谁反动的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地理条件、国际环境。这是外部联系。内部条件加外部联系，凡是起重要作用的都加以研究，这样把事情的规律就弄清楚了。

规律是什么东西？规律就是矛盾斗争的结果。矛盾的情况、斗争的情况，又决定了事情发展的基本过程，这种基本过程就是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三个阶段，这是规律。这个规律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敌人是反动的，我们是进步的；敌小我大；敌人是会孤立的，我们是会得到援助，从这样一些矛盾的研究和综合得来的。矛盾弄清楚了，根据矛盾的斗争情况，就可以预见到事情是怎么样发展的，那是必然的。矛盾的情况不同，它的发展结果就不同。对立方面的力量对比、力量消长过程不同，事情的发展也会不同。敌我力量的对比会有变化，开始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以后会变成敌小我大，敌弱我强。这些就是经过了对矛盾的比较具体的分析，对主要起作用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得到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同我们的力量对比，在现在总的说来是人民占优势；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它是要没落的。现在它比较强大，但是它越来越没落。这种矛盾情况综合起来，可以肯定战略上帝国主义要垮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最后消灭，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规律。这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对敌人和人民两方面矛盾的具体情况分析的结果。掌握了矛盾，就能够掌握事情的本质，掌握事情的规律。

一般的事物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既要研究内部矛盾，也要研究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相对的、有联系的。外部联系就是外部矛盾。在小的范围看来是外部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看来又是内部矛盾。例如，一个

国家讲国际关系，是外部联系、外部矛盾；但就整个世界讲，国际关系是世界内部的关系。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相对的。但是，内部矛盾对发展起根本性的作用，外部的矛盾对发展起次要的决定作用。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这个原则也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一个贡献。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外部矛盾能不能起决定作用？是不是只有内部矛盾才起决定作用？

我看这问题可以这样答复。这里面没有什么内外哪一方面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外部矛盾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有条件就起决定作用，不然就不叫条件。还有，我们经常这样讲，事物的发展决定于什么条件，条件就是一种原因，原因对结果总是起决定作用的。相信原因能产生结果，这种思想叫做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的，相信科学上肯定的因果关系，叫因果论。所以说，凡是原因对结果都起决定作用。外因既然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和内因一样，内因也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所以，问题不是哪一方面起决定作用和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问题是内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外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矛盾论》里没有讲外因就不起决定作用，《矛盾论》里只是说，内因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外因也不是说就不起任何决定作用。不过，外因不能起主要决定作用，最根本的决定作用是内因。

所以，要研究事物的发展，首先要把内部矛盾研究清楚。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把内部的阶级矛盾认清楚。中日战争，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断定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胜利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论持久战》里讲我们胜利的根据是：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首先是一国内部，它是进步的。内部运动的斗争里，进步的力量占优势，进步的力量占主导。所以，它就成为我们最后胜利的根据。

这就是说，内因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这些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决定作用。所谓一定范围内，就是说，它不能对事物根本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而只能对事物发展的快慢、速度、规模起决定作用。事物或事情最后得到什么结果，不决定于外因，而决定于内因。

分析事物各种内外矛盾的时候，要着重抓内部矛盾、着重抓内因。关于这个问题，附带着简单地解释一个具体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反动？这种现象在哲学上、在实践上怎样解释？

这解释还是很简单，就是把“五四”运动一分为二。“五四”运动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但是这个进步运动有它反面的东西。“五四”运动本来想打破封建的教条，根据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在打破封建教条，学习西方，也学习苏联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教条。它一方面是前进的运动，但前进运动中又有落后的方面。这前进和落后两个方面，反映了“五四”运动本身有阶级斗争。同样是反封建，但有资产阶级反封建，有无产阶级反封建；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封建，有胡适为代表的反封建，这是一分为二。同样是反封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还有一个是胡适，这里面又有一分为二。胡适带来了洋教条，陈独秀开始带来了我们的新的教条主义。陈独秀还说不上是完全的教条主义，但是有一些学托洛茨基。学托洛茨基是教条主义。许多问题都是一分为二可以解决的。

思维与存在也是对立的统一。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因为思维经常脱离存在。我们说它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思维能够反映存在。但是，这个反映是有条件的。要参加实践，而且要参加革命的实践，要在实践当中进行调查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明一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个问题，有时候说道理越说越不通，这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常常有的，这个问题不如简单地说一下容易了解。

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因为它是对立面，对立面当然都是互相排斥的。既然叫对立面就互相排斥，不然怎么叫对立面呢？所以对立面互相排斥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立的东西，本性就互相对立。所以，它的相互排斥的作用，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是绝对的。既然对立面是互相排斥，要把它们联系起来，没有条件当然不行。没有条件怎么能联系起来呢？这就是统一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利益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是没有条件的。资产阶级要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个对立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这两个阶级既然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要联系起来非有一定的条件不可。条件有各种各样，历史上的条件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要掌握暴力，掌握国家政权来压制工人阶级，要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能在一个社会里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暴力作保证，它的统治就保持不了，统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无产阶级怎么能够和它在一个社会里存在呢？这是有条件的。既然是有条件的，所以也是暂时的，这种条件能够维持也是暂时的。这个条件如果消失，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我们国家里，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的另外一种统一性。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这样就有统一性。它不接受改造就没有统一性。如果资产阶级坚持不接受改造，就要被消灭，就要被镇压。根据事物的本性，根据逻辑，自然可以得到这一点。

事物的本性就是对立的，就是斗争。所谓斗争就是互相排斥。所以，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这是无条件的。这种对立的東西要互相联系起来，总要有一定的条件。要使对立面联系起来，就要有一定的条件。发展主要是靠斗争。有时候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把某种对立面联系起来。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需要这种统一性。为了斗争，需要统一性。为了斗争既然需要这样统一性，那么就要寻找建立统一性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适当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要保证我们的领导地位和独立地位，不去投降敌人，投降就不是联合了；又要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使资产阶级也觉得它的利益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还要加上为了坚持这个政策，跟资产阶级进行某些必要的内部的斗争。要用适当的斗争方法，不是对抗性的，又能够保证我们的领导，又能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政策。为了加强坚持这个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条件找到了，统一战线就找到了，对立的联系能够找到，对立的统一性就可以找到了。有了这种统一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壮大力量，进行斗争。有许多对立面是我们需要它联系起来，需要它有正确的、鲜明的统一性。这些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比如工业和农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工业和农业并举。使工业和农业能够很好地保持统一性。为了使工业和农业能够保持统一性，我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来摸索这个条件。斯大林曾经摸索了一下，没有摸准。摸到一个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是片面的。现在赫鲁晓夫也很想着重发展农业，反把工业削弱了。毛主席在 1953 年提出工农业并举。这个并举提出了一个原则，要使这两个力量很好地联系起来。但是，那时候究竟怎样联系还是摸不清楚。所以，从 1953 年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是搞得不好，总是工业和农业有些矛盾，或是太偏重农业，或是太偏重工业。恐怕前几年主要还是太偏重工业了，恐怕是有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太偏重工业就使得工业和农业的统一性不能很好地掌握和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没有找到这个好的条件。为了找这个条件，从 1953 年毛主席提出并举的原则起，经过很多实践和认识的反复，到 1959 年，毛主席才开始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毛主席这个思想实际上很早就有了，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好像是在 1959 年(是不是?我记

错了，大家可以纠正)。然后，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原则找到了，然后按照这个原则在许多工作上努力再调整。这样，我们就能够基本上把工农业的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

世界上的矛盾有两类：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一类是要把矛盾的一个方面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比如说，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这种矛盾，是要把反革命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把错误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这种对立面是不能两立的，互相排斥的。这类矛盾多半是指新生和腐朽，这是一类性质的矛盾。

还有一类矛盾，它是前进道路上，前进事物中的相互关系。比如：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社会主义进步事业内部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都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仍有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的解决不是消灭一个方面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是有条件的。

比如，领导和群众。首先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领导没有官僚主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结合。而官僚主义很容易产生，因此矛盾经常出现，互相排斥也是经常有的。要建立统一性就必须很好地把这个联系建立起来，就要经常地努力把这个条件掌握起来。工业和农业就需要掌握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原则。在思想上要常有这个原则，还要在实践上采取具体办法能够贯彻这个原则，然后才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联系。就是建立起来了这种联系以后，也不是说能够绝对一劳永逸的，建立以后又会脱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时候领导和群众结合，问题解决了。过一个时候，可能领导又犯了官僚主义，或者群众里有极端民主，就又会脱离。任何一种矛盾，它的对立面要变成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关于《矛盾论》的问题，我想就讲这些问题了。

第25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

(1964.07)

【1964年前，毛泽东提倡并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们提出要求，请艾思奇作辅导。艾思奇根据自己的体会，作了两次辅导报告，共讲了七问题，我们整理时，在前面加了一个“关于读这本书的方法问题”的小标题；删去了第五个问题“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又删去“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艾思奇在讲课中说，这两个问题是讲的国际问题，主要不是讲经济问题，他讲的也比较简单，所以，删去了。这里保留的是五个问题，加上第一个问题，共六个问题是所讲的主要问题，占全稿的95%以上。我们按当时速记稿整理。最后，附录了两段话，是艾思奇在1961年12月25日给干部轮训班作“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解答问题时讲的，与本文相关，所以做了附录。】

(一九六四年七月)

第一次辅导

(1964.7.9)

今天开始辅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讲很多，但不一定都讲，我只着重讲几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容易看的，而且前后有很多重复，所以没有必要一条一条讲。把最主要的讲一讲，我们大家就可以自己看了。像这样讲课，只是提供一种读书的方法，讲的当中，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读这本书的方法。所以，我希望讲了以后，大家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自己读下去了。

1.关于读这本书的方法问题

我想，先说一说读书方法。

读这本书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特别是这本书，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所以读的时候，方法是很重要的。对这本书来说，要多少带一点批判的眼光来读，不要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认为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怎样来批判地读这本书呢？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以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做标准，来批判地读这本书。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肯定下来，实践证明是错的，就应该否定。对的、错的这本书特别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就不能这样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很难说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非常个别的，一般地讲，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是也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著作里面，涉及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的言论都是原则性的，不很具体，也不可能具体。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东西，就可以做种种解释。而过去有些问题被人们不正确的做了解释，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当前实践来做新解释。

在以前，我讲课中也谈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不妨重复一下。

以前我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讲列宁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句话，可以有种种解释。这句话是正确的，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很原则，它不能直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把列宁的话如果解释成对抗完全消灭了，这种解释就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现在赫鲁晓夫还坚持这一点，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对抗。所以我们也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当前实践重新解释。把苏联不正确的解释加以改变，加以改正。

还有一个例子是讲，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到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也是非常原则的，是正确的。可是，因为他很原则，所以以后被人们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前，苏联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就解释成由资本主义到初期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用这种解释就得到一种结论：苏联到了1936年，过渡时期就结束了，以后就不过渡了。这个教条支配了几十年，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只限于初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到1936年，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是斯大林时代的教条。这个教条在人的脑子里成为迷信，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了好几十年。由1936年到1957年，毛泽东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才开始打破这个迷信，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不是初级的共产主义，不是到社会主义。要重新解释，就是要到高级共产主义。

所以，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问题。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中心来对某些重要问题重新作解释。就斯大林的问题来说，对某些问题还要修正他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般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他们提出的许多原则性意见要重新研究。斯大林这本书是有错误的。有正确的要肯定，错误的要否定。这里可以得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这个原则不能怀疑。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许多问题就不能正确解释，或者不能完全正确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都要读，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才有可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正确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来源，也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另外一方面，要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为中心来认真研究，才有可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正确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遗产，真正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就不会被人歪曲。所以，读马列主义著作要以毛主席著作为中心，这点应该肯定。因为许多问题在毛主席著作里面才很具体地展开了，并且使我们了解得更准确，了解得更明确，就不至于被各种歪曲的思想所影响。因此，总的来讲，读这本书要注意两条：一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一条是结合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根据这两条来批判地读这本书。

斯大林的这本书，这里，我们是需要批判的。修正主义也批判它，修正主义攻击它，修正主义把它攻击得一钱不值。但是要注意到修正主义是从右的方面来批判，从右倾机会主义那个立场来批判，来攻击斯大林这本书。所以，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这本书的正确东西也否定了。这本书的真正精华，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也否定了。这本书里面有错误的东西，他倒是把它坚持下来了，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们是从左的方面来批评斯大林这本书的，站在彻底的革命的方面，站在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对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接受下来，还有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的、片面的东西，我们加以否定，加以改造补充。

我想这样读，对我们会有益处，有启发，用这种方法读这本书是有价值的。肯定这本书是有可贵的东西。1952年以前，只想他这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一些具有价值的意见。有些地方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在有些问题上总结得好。1952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我们中国有了毛主席提出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

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就大大发展了。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出来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比这本书丰富得多了。注意到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比斯大林那个时候知道的东西更多了，问题解决得更正确了。斯大林这本书受到很多限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受他个人思想缺点的限制。所以有许多问题解决的不好。关于方法，我就讲这些。

按照这种方法，我先讲几个问题，有些问题不讲了，大家自己可以读。特别是重复的东西不需要讲了。读的方法可以采取个人读的方法，也可以采取1960年中央提倡的方法，大家一起边读边议，读一段大家来发表意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现在就开始讲正文。先讲第一个大题目，书的大题有十节，我想主要讲五个大问题。

2.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这个问题，分几个问题讲，讲七点。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①的客观性问题

从第一题的第1、2段开始到第6段②，这是讲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客观经济发展法则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是不是一个客观法则？或者这个话已经变了，人可以任意改造，或者制定、改变法则，甚至可以废除法则，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斯大林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仍然是客观的，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不能任意制定新的法则，不能创造新的法则。斯大林肯定了这一点。这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坚持了经济学上的唯物主义。他批判了苏维埃国家可以任意废除现成的经济法则，能够创造新的经济法则。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后来给一个人的信③里面指出这种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他所批判的那些的确是主观唯心主义。包括一些什么人呢？现在还在的那些人，最有名的就是现在苏联最吃香的一个哲学家叫费多谢也夫。这个人是在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部长和前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他是参加了苏共“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起草人之一。就是在“二十二大”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人就是以前斯大林批评过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现在这个主观

唯心主义者是赫鲁晓夫手下最主要的搞哲学工作的人。斯大林在这点上是对的。斯大林在哲学观点上抵抗了修正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

【①“法则”一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后改译为“规律”（凡是这样的注，皆为整理者所加）。

②这里所讲的“段”，是作者按书中大题目下划分的自然段。它有别于下面为读者阅读查阅方便起见，在括号内按不同版本页码注明的“段”。本讲稿采用的版本：“旧版”是1953年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版：“新版”是现行通用的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9—612页。

③《答A·B·萨宁那和B·Γ·温什尔两同志》。】

修正主义者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逐渐增加起来，他们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被斯大林揭发了。但是斯大林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斯大林发现了，尽管苏联已经建设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可是，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还要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说明斯大林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不够的。因为他还没有看出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苏联社会里面新的表现。所以，他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主要的东西是对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一个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还有主观唯心主义，也只有他有勇气讲这个话。

当时的苏联哲学界就有这个看法，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苏联已经不成问题了。苏联只是同国外的修正主义斗争，国内没有什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问题。苏联哲学界对这个问题都是这样看的。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任教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了，内部没有什么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了。那还是斯大林这本书已经出来以后，他还是这样地看。这可以说自有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第一次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缺点就是没有揭发他的阶级基础，不知道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上层建筑上、在世界观上的一种表现，不知道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斯大林所以有这个缺点，就是因为1936年他认为苏联已经消灭阶级了，他认为在国家内部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自己定了这个教条，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把自己的脑子就限制住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揭发阶级基础，而实际上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苏维埃政权里面的反映。苏维

埃政权里面有些人已经有了官僚主义，已经是脱离了群众，已经在搞修正主义了，已经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来废除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书的第2段还可以研究一下。他说：“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见旧版第2页第2段；新版第539页倒数第1段至540页第1段）

他的这些分析有一些对的。就是科学法则和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是两回事。那些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了。但是这段话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讲到，政府法令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法律跟客观规律不同，是可以创造的，但是这个法令的创造也不是依照人们的意志随意创造的，人们的意志是具有阶级性的。政府颁布的法令是政府所代表阶级的意志来创造的，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政府的法令也不是跟客观规律完全无关。政府正确的法令应该是反映客观规律的，不应该把法令跟科学法则绝对地分开。好像法律就是可以随便创造了，其实，就是法律，也不是随意创造的，也是决定于阶级。同时，正确的法律也是反映客观规律的。

后边第3段至第6段就用不着讲了。他讲人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规律既然是客观的，人们可以利用客观规律。这个思想是对的，大家都可以看懂，所以不讲了。

（二）关于如何运用法则的问题

现在讲第7段，算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运用法则的问题。

这一段首先肯定了经济法则“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法则。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把某些法则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凿道路的法则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法则或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见旧版第3页第3段；新版第541页第2段）这些话都是对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人们可以发现新的法则，并且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利用就是想办法限制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这些都是对的。这是自觉运用法则，把客观法则运用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去，不要让客观

法则自发地起破坏作用。他这里说的“自发”^①两个字实际上应该这样理解，即不应该让客观法则自发地起作用，应该自觉地掌握它，使它在有利于我们的方向上去发生作用。他讲到水力的问题，就是水流动的作用，如果自发地起作用，就要发生危害。但是修起了水库就可以把这种自发的作用引导到有利于人民的地方去(参见旧版第2页第4段、第3页第3段；新版第540页第3段、第541页第2段)。

【^①此处的“自发”两字，在1979年的版本中没有出现，只有“不可抗拒”的字样。】

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法则是起作用的，价值法则如果自发地起作用，那就要起破坏作用。但是像薛暮桥同志讲的，人们有意识地运用这个价值法则，掌握这个价值法则，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很大的利益。

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个问题，斯大林在这里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法则，就能很顺利地掌握它，运用它来为我们谋福利。这个话是对的。但是只讲到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斯大林看不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要自觉地掌握这个法则，要避免这个法则自发地起破坏作用，要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使所有的社会法则被我们自觉地所掌握。要掌握这些法则，使它实现出来，是要经过斗争的。这一点斯大林没有提出来。

我们读这篇文章要肯定它正确的地方，但是也要看到他没有看到的地方。经济法则为什么会自发地起作用？是不是法则自己起作用的？不是的。它有一个阶级，有一个私有制。经济法则是客观的。但是经济法则的作用是通过人的行动起作用的。这个作用是两种作用。一种是自觉的、被人控制的作用，一种是自发的作用。这两种作用是通过不同阶级的人的行动来发挥的。

社会法则(经济法则包括在内)不能离开人的行动单独起作用。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法则是通过人的行动起作用。所以讲到法则的作用，就有人的作用在里面。

这是第二个问题，如何限制，如何运用经济法则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经济法则人可以掌握，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运用经济法则还要通过斗争。

(三)自然科学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区别问题

第8段讲，自然科学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区别问题。这个问题

可以讲一讲。他说：“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见旧版第4页第1段；新版第541页第3段）这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的。

自然科学法则对人类来说起作用的时间是很长的。社会法则是跟社会发展过程密切结合的。所以，它的某一种法则是在人类某个历史时期产生的。价值法则是在商品生产的历史时期起作用。商品生产如果完全没有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就不起作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必然要发生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封建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了就有了。像苏联，资本主义正在复辟，这个危机问题就有了。像我们这样正常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没有。我们1958年有些困难，不叫危机，不是生产过剩问题。是那一个时期生产的各种比例调节得不好。发生的困难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法则发生作用跟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的，这是对的。但是，这段话使人有一个印象，好像自然科学法则没有任何历史条件限制，这样看也不一定确切。自然科学法则不受人类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是对的。但是自然科学法则仍然受到自然界发展的历史条件限制。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法则都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才起作用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就不一定起作用。举一个例子，如最简单的水，到摄氏一百度就要沸腾起来，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受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的，到了珠穆朗玛峰，这个规律就不起作用。那个地方，水可能在摄氏二三十度就沸腾起来。在西藏高原上，也受这个条件的限制。饭都烧不熟，因为水烧不到一百度。自然规律也不是绝对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斯大林的这个分法有一点简单。

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受人类历史条件的限制，自然界规律受自然界发展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一种规律都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的，任何一种规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规律。除了辩证法规律以外，辩证法规律是普遍规律，是到处都起作用的。但是，世界上辩证法规律都是具体的。辩证法规律的具体表现，也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人类的对抗矛盾规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基本上没有了。有矛盾，但是，没有对抗性。现在是对抗正在消灭，不是已经消灭。对抗性矛盾和非

对抗性矛盾都是矛盾规律。但是人类社会的对抗矛盾规律限于在有阶级的社会。所以，即使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它实际上也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普遍规律是找不到的。实际生活里面辩证法规律都是具体的规律，都是有条件的。

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也从这里面得到解释。不管什么真理，科学真理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它是相对的，但又可以说是绝对的。为什么说是绝对的呢？只要有这种条件，这种规律就一定起作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具备这种条件，这种规律就一定起作用。

我们地球上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就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有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有资本主义，就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规律受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定要有资本主义，才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它的相对性。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会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非洲许多国家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发展，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绝对的。非洲现在没有，将来一定会有。非洲一些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有些国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不光是地球上是这样的，就是火星上如果有人类，也是这样，有了资本主义，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太阳系以外，几万万年以后，哪个星球上有了资本主义，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绝对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这是它的相对性。有了资本主义，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地球上也好，在地球以外也好，永远可以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绝对性。

我们讲《实践论》讲相对性时没有讲到，在这里我们顺便做一些补充。

凡是真理都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只要有这种条件，就起这种作用，这是绝对性。相对性就是在什么条件下起这个作用。这个问题不是这本书最主要的问题，但是跟以前讲的有联系，所以讲一讲。

(四)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问题

下面讲第13、14、15段，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问题。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说明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见旧版第5页第2段；新版第542页第5段）这一段话要注意一下。苏维埃政权和我们的政权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

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这是对的。我们不是用一种新的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而是消灭剥削，这是对的。不过这里面斯大林讲过了一点，就是消灭了任何剥削。要是讲我们正在消灭剥削，就没问题，他讲已经消灭了任何剥削，这就过了一点，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这就是把苏维埃政权的过渡性取消了。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都是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专政也就是过渡时期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照斯大林这个说法，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过渡已经完结了。

第二个说法，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可以说是“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个话我们也可以说的更确切一些。的确，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就生产关系来说，是可以说的。但就生活条件来说，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有了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现成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着重于生产关系上这样来理解，不能说斯大林这样说就不对。因为，他讲经济萌芽的经济，主要是生产关系，我们理解时要注意。任何经济萌芽，生产力的条件也没有了，不能这样说。苏维埃政权可以说是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形式，这个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也要注意，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时候，马上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就有了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先把政权搞起来，然后慢慢地把经济形式搞起来。无产阶级主要的革命基础，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同时，就要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一进大城市，马上就把银行、铁路、邮政等主要大企业掌握起来，你不掌握起来，这个政权就维持不了几天。政权要有经济来源，所以它从旧社会接受一批旧的东西，立刻改变旧的经济基础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真是从“空地上”来创造新社会也不一定很确切。巴黎公社马克思批评他们有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掌握政权以后，没有立刻把银行抓到手，这跟后来政权不大稳固有很大关系。政权在手，就要立刻掌握自己主要的经济基础，然后逐渐扩大这个基础。从各方面来改造这个基础。我们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官僚资本，那么，我们得到胜利以后，马上就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官僚资本把主要经济集中了，所以，我们一到大城市，没收官僚资本，马上建立一个主要经济基础，巩固经济基础，掌握经济命脉，我们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下面是讲苏维埃政权要运用经济法则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也是正确的。他说：“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

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见旧版第5页第4段；新版第543页第2段）这段话基本上是对的。

我们改造生产关系，使它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到现在我们还是这样。这几年来，我们也经常谈这个问题。前几年我们有一些毛病，还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斯大林这段话对我们起过作用，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些话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他讲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些话有些片面。因为第一，苏联生产资料并不都是公有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农村的集体农庄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财产。这句话容易使人理解成苏联的财产都是全体人民的财产。这是现在的事情、还是将来的事情？这个话没有说清楚。应该是将来的事情，但是看起来又好像是现在的事情。说消灭了剥削制度，是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还是就要消灭？这些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做文章，做文章怎样表达得准确，反映客观情况怎样反映得正确，那些话用来表达当时的苏联情况是不准确的。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对的，但是说成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就夸大了。

公有化有两种，一部分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一部分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还有一小部分仍然是个人私有财产。斯大林所讲的“全体人民的财产”的话没有分析，没有一分为二，写文章也要反映客观情况。我们要一分为二，把公有化分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和集体农民的财产，而集体农民的财产，还要分主要是集体农民的财产，部分是个人的财产。自留地是个人财产，我们农业六十条规定，小型、中型工具归个人所有，或者小牲口还是个人的。斯大林在这本书里面写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生产资料不是私有的，生产资料一定是公有的。这本书里的主要毛病就在这里。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了，甚至集体农庄也不是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都是全体人民的。这些提法都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除有公有化之外，还有私有

制；除了全民所有制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他也没有绝对否定，但是许多地方的语言是这样表达的。

(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问题

第16段，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观点，我们

也还要研究，这个话这样说是不错的，是有这个法则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为生产力要有跟它适合的生产关系，它能够顺利地发展。因此斯大林提出这个法则，这是他的创造。以前没有这样的提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种提法是这本书的一个创造，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有这个原则，使我们知道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运用这个法则，实际意义是很大的，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创造。

但是，我们讲这个法则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合又矛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只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合又矛盾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应该作全面的理解。就是毛主席讲的又适合、又矛盾。适合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总是个过程，你把旧的生产关系加以改变，使它适合新的生产力的性质，但是刚刚适合了，生产力又发展了，又开始有新的矛盾了。

矛盾是绝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分为二也是绝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合是相对的、暂时的，它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适合。

我们自解放以来，生产关系改变了多少次。合作化以后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又有了几次调整。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但是不要因此产生一个幻想，就是想用一个办法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以后就不矛盾了，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事实上，生产关系的调整，年年要做，经常要做，因为旧的生产关系要经常抵抗，多个环节经常会产生矛盾。调整的好，基本上适合了，接着又要发生矛盾。发展的总的趋势总是螺旋式的，不是适合了就可以长久适合。

一分为二是暴露矛盾，矛盾暴露了就努力解决，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合。适合了又要暴露新的矛盾，这样不断地出现新的矛盾，解决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发展，不是出现矛盾把矛盾调和起来，就太平无事了。发展，是暴露矛盾，通过斗争解决了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又要在新的阶段进一步解决。如果适合可以一

劳永逸，那就没有发展了。所以(斯大林在《答 A.N·诺特京同志》中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这个公式是形而上学的公式(参见旧版第 46 页第 2 段，新版第 577 页第 6 段)。完全适合那还有什么可斗争?有什么矛盾需要解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讲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我们解决矛盾的要求并不等于说发展只有一个适合的问题，不是得出一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个结论。

经济发展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解决矛盾会阻碍发展。解决了矛盾，还会有新的矛盾出现，这才能发展。解决矛盾是发展告一段落，这个段落解决以后，如果没有新的矛盾出现，就不能发展，只有不断揭露矛盾，才能不断前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法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由这个法则得到一个结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以完全适合，那就变成了形而上学。

究竟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适合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事实上还是矛盾是根本动力。暴露矛盾，解决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这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不暴露矛盾，如果脑子里有一个幻想，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以后矛盾不再出现，结果，矛盾在客观地发展，矛盾的发展会出现我们自己所不愿意出现的东西。如果不努力暴露矛盾，解决矛盾，让它自发地发展，它的必然趋势是倒退。所以斯大林在 1936 年以后，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了，使他在思想上睡觉了。这是后来出现那样大的困难的根本原因。认为没有矛盾了，完全适合了，头脑就不清醒了，客观矛盾看不见，不能自觉暴露矛盾、揭露矛盾，经过斗争解决矛盾，不能像我们党这样特别警惕矛盾，所以他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很严重，就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上台。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我们怎么样运用的呢?运用这个法则就是要经常注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又适合、又不适合的情况，而且要注意不断揭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过斗争解决这个矛盾。自觉地揭露矛盾，然后才知道正确的斗争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斗争?敌我矛盾如何斗争?找到正确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矛盾。解决了矛盾又要去揭露矛盾，经常自觉地这样做，能够这样做才能谈得上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如果不能这样做，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就没有办法掌握。

斯大林也讲到运用这个法则会受到腐朽力量极强烈的反抗。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多多少少感觉到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必要，他是多多少少意识到社会主

义法则是需要阶级斗争的。他在这书里讲到：“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法则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法则是或多或少顺利地进行的；与此相反，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腐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必须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在我国，已经有了这种力量，其形式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了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发生作用的充分广阔场所，其秘密就在于此。”（见旧版第6页第2段；新版第543页第3段）这段话说明斯大林也意识到运用经济法则也有阶级斗争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要依靠工农联盟来反对社会的腐朽力量的反抗，这个精神还是正确的。但是这段话斯大林没有明确地讲出来，说我们用工农联盟的力量来粉碎旧社会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没有明确说出这点。按照我们今天的实践，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来说，应该明确这点。不明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以前有一个教条，认为阶级消灭了，思想不是很清醒的，逻辑不是很清楚。一方面认为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要粉碎旧社会力量的问题。这本书反映斯大林的思想有矛盾。他在1936年已经做了决定，认为没有阶级，没有矛盾，但是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感到有矛盾，意识到有矛盾，但是旧的思想限制他新的思想，他没有决心把这个问题揭露清楚，没有把矛盾清楚地暴露出来。所以这些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也可以解释现在苏维埃政权就是要依靠工农联盟，跟资本主义斗争，也可以解释这个斗争已经完结了、粉碎了，就是说斗争已经没有问题了，已经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要重新解释这个问题。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但是要重新解释。要使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要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要揭露这个矛盾，要经过斗争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应该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腐朽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的力量。斯大林已经感觉到了，可是不能把它的思想明确地表示出来。所以这本书表明他有些辩证法思想，或者说已经想要恢复他原来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恢复得不彻底，很多地方是形而上学的。

（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

下面再讲第17、18段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

以上是讲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发展法则。下边再讲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个法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有计划按比例的主观法则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制定各年度计划作为两点分开来看，这是对的。法则是客观的，有计划是一个客观的法则。这个国家的计划就是要人在主观上反映这种法则，运用这个法则。

苏联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政府制定了这个计划就等于客观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计划并不等于客观法则。计划只是反映客观法则的，如果它反映了就是好的计划，如果不能反映客观法则就是错误的计划。计划可以由人制定，客观法则则不能由人制定。人制定的计划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标准是能不能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制定正确的计划，就要把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内容弄清楚。

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个客观法则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特别是比例，比例依什么为标准?拿什么来比?这个问题以前苏联经济学没有搞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是有发展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原则就是农、轻、重的原则，各种比例以什么为标准，首先是以农业为标准。比例计划的基础是建立在农业上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谭震林同志也讲计划首先要从农业搞起，先看农业搞多少，然后再看轻工业、重工业搞多少，计划有这个顺序，就是农、轻、重。因此，多少的问题不是重工业比轻工业多，轻工业比农业多，问题是计划的顺序，比例的顺序，是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的市场基础。从国家计划来说，又是计划的基础。农业能生产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经济作物，这些农产品除了农民人口消耗以外，能够拿出多少来供给城市、供给工业。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重工业发展多少?轻工业发展多少?城市人口控制到什么程度?文化教育要发展多少也就清楚了。因为，不管轻工业也好，重工业也好，文化教育也好，你首先要解决人的吃饭问题。经济建设，首先要考虑人民生活，要看有没有这样多的饭吃?有没有这样多的衣服穿?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毛主席说：有许多人不懂得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所以有时候连很简单的问题也看不清楚。抓住要害问题，抓住本质问题，才能解决。

斯大林在这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见旧版第7页第1段；新版第544页第1段)必须研究这个计划，把这个计划弄清楚。这些话都是对的，都

有指导意义，是精华。不过，斯大林那个时候对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没有完全弄清楚，知道有这个法则，但是对法则的内容没有弄清楚。

我们说以农业为基础，修正主义就反对我们，说：“中国现在要放弃工业化了”，修正主义说话是互相矛盾的。有时候说我们只要工业，只要原子弹，不要农业，不要人吃饭，有时候又说我们要放弃工业化。前后矛盾。我们自己搞计划的时候也要斗争，这个斗争有时候是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部门想多搞一点，就跟那个部门有矛盾。也有阶级斗争，有的是资产阶级想来破坏这个计划，他就想一些另外的东西。农业上也有斗争，比如制定一个分配计划，富裕农民按照他们的要求提出一个分配计划。贫下中农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制定计划。要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能够被我们运用，所以掌握计划有两条：第一是把这个法则弄清楚，能够使计划正确地反映法则。第二是有斗争。这个斗争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各部门之间的调节问题。

关于前面讲的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问题，还要补充点。斯大林讲了两条，一条是，旧本子是“消灭了任何剥削”，新的本子是“必须消灭任何剥削”，必须消灭任何剥削就准确一些，而“消灭了”剥削就有点毛病。所以，就新本子的提法来说还是对的。(见旧版第5页第3段；新版第542页第6段)不过后面斯大林仍然是肯定了苏联已经“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这点新的版本也没有改变。(见旧版第5页第4段；新版第543页第2段)所以，就这点来说他的提法还是有些不准确，还要研究。前面只是讲原则上消灭了任何剥削，后面讲苏联情况。直接讲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所以刚才我的那个解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有些字句上有差别。

从1936年到1952年经过十几年，苏联社会的矛盾多少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暴露了，但还有1936年公式限制了他的思想，同时他对现实的了解还不很够，所以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发现了一些真理，本来可以说对的，但由于不能根本推翻1936年已经决定了的论断，所以新的思想也就说不明确，新的思想也不能真正完全展开来说明。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则，那也就能消灭法则，而以另外的法则去代替它们了。‘改造’法则的

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的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法则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见旧版第7页第2段；新版第544页第2段)斯大林这里讲法则只能是限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防止它发生破坏作用，不能“改造”和“消灭”，这是对的。值得研究的是对法则问题是不是就是限制它发生破坏作用范围的问题？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认识法则，以后使它按照我们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它的作用。比如黄河决口，它的水到处发生作用，那就不好了，如果我们把水利修得好一点，那么水的作用就按照一定的范围发生作用，这都是对的。不过我自己考虑这样一个意见，是不是可以更广泛一点呢？我们对法则主要是防止它自发地起作用，认识法则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自觉地掌握它的作用，包括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限制破坏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就要使法则不至于自发地起作用，要能够使作用由人类来加以控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能把法则认识清楚，才可以掌握它的作用。除了认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条件必须记住：

第一，我们要有政权。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人民要掌握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可以大规模的创造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来运用这个法则，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人民手里，才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创造条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掌握政权的问题，联系群众的问题。

第二，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掌握政权就要跟资产阶级斗争，这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问题。资产阶级要破坏你创造条件，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把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权和人民要创造条件，他就要破坏。所以，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问题。要能够自觉地运用客观经济法则，这些条件不能不抓紧；政权必须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人民手里。这是一个使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经济法则、控制经济法则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保证，经济建设的保证。这些问题，斯大林在书里都没有提到，没有注意。

研究经济问题，不能不涉及上层建筑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跟上层建筑问题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无产阶级国家来自觉地建设，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涉及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比较少，《资本论》里面讲

上层建筑问题也有，也不是太多。比起社会主义社会涉及到上层建筑问题就比较少，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靠上层建筑来保证的，非常重要，政权真正是无产阶级的，真正是人民的。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复辟的现象，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上层建筑的保证没有解决。斯大林的时候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赫鲁晓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政权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另外政权不仅仅是中央机关的问题，还有地方问题，有企业问题，企业里面设政治部就是要解决地方企业领导权要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斯大林在这本书的第四个题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消灭工业和农业对立的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参见旧版第 23 页第 2 段；新版第 558 页第 2 段)，这个原则上是对的。实际上在组织上没有解决问题。原则是看对了，实际上怎样做，斯大林还是没有搞清楚，没有解决。

(七)为什么要讲经济法则的客观性问题

最后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谈经济法则的客观性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在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我们所熟悉的若干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的新干部来接近我们这个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强烈的愿望要显示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讶，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它能消灭科学法则，能制定新的法则。我们对于这些同志该怎么办呢？”(见旧版第 8 页第 2 段；新版第 544 页第 4 段至 545 页第 1 段)

这段话有些地方可以研究。首先是斯大林感觉到要注意接班人的问题，注意到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思想。另一方面，他认为错误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来源就是青年，青年人没有经验，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无所不能，做什么都不费力。把这个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的责任推到青年身上。其实这个论断不大确切，好像老年人就没有主观唯心主义，实际上应该肯定，苏联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么长的时间还出现主观唯心主义，就不只是青年人的问题，是政权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作风影响的问题。

这一点，斯大林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到这点：我们国家也会出现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我们有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必然要乱搞一通。认为自己有了权力就可以“制定”法则，“改变”法则，“改造”法则。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就是从官僚主义来的，从资产阶级作风来的。这一点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要在斯大林已经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地加以认识。我们如果这样看，就可以说斯大林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这也不确切。主观唯心主义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旧观点，哲学史上早就有了，但是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新问题。所以，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这个观点跟旧的观点有一致性，但是这个观点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它的形式来说是新的形式。从来哲学书里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没有这样讲：有了政权的人可以“制定”法则，“消灭”法则，“改变”法则。

主观唯心主义过去有，但没有上面说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大家学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在那里批判过那么多的主观唯心主义，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所有那些主观唯心主义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问题看成是简单的旧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官僚主义的出现，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结果。或者更具体地说，脱离三大革命的实践，脱离生产斗争，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科学实验。领导机关脱离三大革命实践就会产生主观唯心主义。这不只是青年的问题，青年如果不脱离三大革命的实践，他比老年人更懂得马克思主义。高级干部脱离实际，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科学实验，就会产生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右倾机会主义，进而变成修正主义。把责任推到青年无知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在这点上没有看清楚。关心青年是好的，但是认为老年人就是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那就不一定确切了。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同样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不要脱离革命实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官僚主义，不犯这一条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问题，是新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前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同。以前的主观唯心主义在理论上批判就行了，写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驳得体无完肤就行了，现在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要把它打倒，就要坚决贯彻领导干部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这就困难得多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就讲这么多。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第1段(见旧版第8页第4段至第9页第1段;新版第545页第4段)是斯大林反对有些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应该消除商品生产。他批判这种观点是对的。他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仍然要保存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而不是消除商品生产。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正确总结。

关于消除商品生产的问题,我们回忆一下1958年不是曾经有些同志也想这样搞吗?也有认为可以消灭商品生产的吗?那时候毛主席就批评过这种观点。我们到有些公社参观,看到他们什么都包了,货币也不要了,自己就发了流通券来代替国家的货币。这完全是错误的。这要破坏国家整个社会主义的统一经济。商品交换也不要了。那时,毛主席就批判了这种错误。斯大林这本书的观点,肯定保存商品生产这个观点是对的。

第2段至第6段(见旧版第9页第2段至第6段;新版第545页第5段至546页第1至4段)斯大林讲到某些同志引证恩格斯的一句话“不明确”,说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斯大林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他说恩格斯这个公式不明确,这是对恩格斯的批评。我觉得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也可以不批评,因为恩格斯讲的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社林论》)不过斯大林的这个分析还是对的,就是说,要搞清楚所谓占有生产资料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是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如果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当然可以消灭了;如果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比如是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商品生产还不能消灭,还要有商品生产。这个分析是对的,实际上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性质。他承认了这点,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带有过渡性的。因为它没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仅仅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以,斯大林对这个问题

的分析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有过渡性的，他又不承认。可是既然已经说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那就是还要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是很明确的。有正确的观点，但又不很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在没有完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不能不要商品生产。就这点来说，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商品生产还存在，这就是过渡性的一个表现。这些地方也说明斯大林的分析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表现得不很明确、不彻底，要表达得彻底就要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并没有宣布为全民所有，商品生产依然存在。所以，应该明确承认这个过渡性。

第7段至23段。段落多，读时注意两点：斯大林承认苏联社会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这就肯定了要保持商品生产的出发点，但是他没有明确承认苏联社会的过渡性。

“甚至，不仅在19世纪末叶，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至于说到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农村中却还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应该予以确定的。”（见旧版第10页第3段；新版第546页第7段至547页第1段）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也曾在我们国家内，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已把生产资料如此集中，以致可以剥夺它们，把它们转归社会所有，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因有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而仍然如此分散，以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见旧版第10页第4段；新版第547页第2段）

这两段斯大林讲得肯定一点，即使一个国家的工业里有了社会主义的条件，农业虽然落后，还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这个论断是对的。他反对有些人认为一定要等到农业非常集中，非常发展时才能够夺取政权。这是对的。但是这段也就是承认了工业和农业有很大的差别：工业已到了可以剥夺资产阶级的程度，但农业还是小生产占统治地位。因此，要改造小生产者不能像推翻资产阶级那样把它集中起来，加以剥夺，只能通过搞合作化。就是说，苏联现在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成熟的共产主义。苏联这个社会主义也还要过渡。不过他没有明确承认这点就是了。

下面几段都是讲这个问题的。

斯大林肯定了在苏联也有城乡的根本差别；工业和农业的根本差别。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乡差别仍然存在。他肯定了商品生产要保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城乡差别的存在和工农差别的存在。这也说明了苏联社会的过渡性。

上面这个结论在第 21 段(见旧版第 12 页第 5 段；新版第 548 页第 8 段)说得更明确：“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惟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的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说明商品生产仍然存在。有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农民惟一可以接受的是商品生产的形式，这也说明农民的私有性并没有完全消除，农民私有制的特点没有完全消灭，尽管是集体农庄，是集体农民，但只能接受商品生产这样的形式。斯大林在这里说，通过买卖的形式交换就要讨价还价。城市和农村的交换关系就是国家和集体的关系，也包括国家和农民个人的关系，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或者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还要讨价还价，这不是过渡性是什么呢？

第 24—26 段。“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夺它，因而只有在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见旧版第 1 2 页第 8 段至第 1 3 页第 1 段；新版第 5 4 8 页第 1 1 段至第 5 4 9 页第 1 段）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不应当引导到资本主义，这里有些话是对的，就是商品生产并不等于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对的。但是根据这些话做出结论，说在苏联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那就片面了，所以要根据我们的新经验来重新解释。

接下的一段里他说：“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见旧版第 13 页第 2 段；新版第

549 页第 2 段)他肯定这点, 就是认为苏联搞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这句话是片面的, 要根据我们新的经验重新解释。不能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做出结论, 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生产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商品生产不一定就产生资本主义, 但是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要补充这点。我们的商品生产如果运用得好, 可以不产生资本主义, 可以使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 掌握在集体手里, 成为国家的工具, 成为建设集体经济的工具。搞得好的话就可以避免产生资本主义, 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商品生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商品生产(即使是国家的商品生产)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 没有上层建筑巩固保证这个商品生产, 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里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在集体经济里就更用不着说了。在集体经济里, 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 如果没有贫下中农的认真监督, 集体中的商品生产也可能出现新的资产阶级, 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段我们要做新的补充。

第 27—31 段。斯大林论证了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是有作用的。

斯大林说: “有人说, 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 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 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见旧版第 13 页第 4 段; 新版第 549 页第 4 段)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 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 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 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 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 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 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 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 是它们自己所有的, 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 事实上由集体农庄当做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 不过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见旧版第 14 页第 1 段; 新版第 550 页第 1 段)这段有一些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比如斯大林在这段里肯定在集体农庄中生产资料属于国家, 只有产品属于集体农庄的。这个问题比较片面。因为当时苏联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拖拉机)是由国家供应和管理, 拖拉机由拖拉机站来管理、是国家管理的, 所以主要的机器是国家的。但如果说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的, 恐怕也不完全确实。因为农民除土地、机器以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 就是小一些。农民还可以有牲口, 还可以有一些小工具, 这些生产

资料不仅属于集体农庄所有，而且有些还属于农民个人所有。简单地说，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只有产品属于集体农庄，这种分析恐怕不是完全的，那个时候农业机器不卖给集体农庄，后来斯大林才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了。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把一些机器卖给公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集体农民还是可以有生产资料的。所以这点他概括的不完全。种子也是生产资料，土地在中国是集体所有的，所以他的概括是不完全的。如果把他的概括当做教条来搞社会主义，那就要出问题。

斯大林著作的缺点就是比较简单，好处是简单明了，抓住本质，但是有时候缺乏具体的分析。

这是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集体农庄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它的生产资料不是全民所有，因此，集体农庄、合作社甚至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都不是共产主义，甚至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一它是集体所有，但是不完全，第二，里面有个体所有制残余，所以也不完全。

下面一段：“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见旧版第15页第2段；新版第551页第2段)这段话也是不完全的，如果说，当时苏联的商品生产基本上是特种消费商品的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那末在斯大林活着以前可以这样说，但斯大林以后就不能这样说，赫鲁晓夫这时的商品生产就根本不能这样说。斯大林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是这样，但也不能说在商品生产里一点资本家参加也没有，这是一点。其次，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是不是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恐怕这也不完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小农具的生产，是不是苏联在那时候都是由国家生产了？都不是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农村里面就没有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了？恐怕也不见得。我们现在的工业为农业服务，怎样服务？制造许多生产资料商品卖给农民，当然有一部分是商品生产的，有一部分是供应农民使用的，这也是为农业服务，但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如果把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简单地限制在个人消费品上，这是片面的，用这个原则指导生产会出毛病的，首先就不能很好地贯彻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原则。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要由国家包起来，不作为商

品卖给农民，这怎么能为农民服务？斯大林是坚决不卖拖拉机给农民的，这是过分的。当然拖拉机站还是国家管理好一点，农民要办，技术条件准备不够，就有浪费，国家经管在维修、拆换、拆修上，比较方便。斯大林说让国家搞好，有力量换机器，农民换不起，是有道理的。国家经管比较好，但有些机器还是要卖给农民的。排灌机器如果不卖给公社，一定要用国营排灌场，也不一定好。拖拉机小一点的，还是可以卖给农民的，他们使用起来很方便。我们北方是种麦子，可以卖给农民，大型的卖给农民不大好办。

第 32—36 段。讲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剩余劳动的概念。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写书写文章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有剩余劳动、雇佣劳动。斯大林给予了批评，反对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对的。

斯大林说：“我以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就中我是指这样的一些概念，如‘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见旧版第 15 页第 4 段；新版第 551 页第 4 段)这个思想对不对呢？又对又不对。对的地方是不能说社会主义有什么剩余劳动。总的来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是生产剩余劳动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归劳动人民共同分配，或者是归工人共同分配，或者是归集体农民共同分配。这个共同分配没有剥削。因此，这个劳动都是必要的，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里面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问题根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已经根本消灭了，那就错了，那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过渡性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努力消灭剥削，消灭剩余劳动，因为消灭不消灭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而是客观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因素还存在，除非我们否定这个因素的存在，如果不否定资本主义因素还存在，就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剥削和剩余劳动是逐步消灭的，而不是一下消灭。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好的企业，我们说剥削和剩余劳动是没有的，但建设不好的企业、公社、集体农庄、合作社里面还会有剥削和剩余劳动的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就要作这种分析。

斯大林在这方面就片面了，这些片面性都是由于他在 1936 年说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把剩余劳动说成已经消灭了，做了这些论断以后就改变不过来了，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论断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虽然他已经看到一些社会主义过渡性因素，商品生产存在，城乡的差别还有，可是做不出过渡性的论断来。不是一分为二，不能从许多问题里看出资本主义的因素。所以，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总的缺点。

第二次辅导

(1964.7.10)

4.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关于这一题总的意见是这样：苏联有一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可以取消了。有一些经济学家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和上一段讲的有联系。有这么一些经济学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商品生产，因此，也否认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斯大林就反驳这种观点，主张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是存在的，仍然是起作用的。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价值法则的作用范围是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否认价值法则是不对的，否认价值法则就会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搞乱。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中国在 1958 年下半年出现过的问题。那时候在实际工作里面，有些同志处理经济问题就不顾价值法则，出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些生产由于需要的原故，即使蚀本也要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不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一些必要的企业就是让它蚀本，明明知道蚀本，还是要生产。但是对于这种企业也不能完全忽视经济核算、成本核算。所以还是要用价值法则来做工作，特别是整个总经济计划，就是要使我们的生产有盈利，个别企业可以蚀本，整个生产按总的计划计算起来应该有盈利，不然积累从哪里来呢？积累就是靠每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价值，要能够创造一些新的价值，有了新的价值，才可以作为我们扩大生产的基础，作为进一步积累的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里，价值法则是应该存在的。

什么叫做价值法则呢？价值法则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法则：就是用社会平均劳动来决定价值。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用社会的平均劳动来决定的，就叫做价值法则。

例如：生产一个茶杯，大概要多少劳动日。各种不同的劳动者，生产茶杯所需要的劳动日不同。熟练的劳动者一天就可以生产一个茶杯，非熟练劳动者三天才能生产出来一个。那么杯子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呢？决定于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价值的平均数，比如大体上一个杯子要两个劳动日生产出来。就是说拿到社会上论它的价值的时候，就值两个劳动日。尽管有的人是花了三个劳动日，可是拿到市场上来卖，它的价值只能定两个劳动日。所以，熟练劳动者一个劳动日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卖，它的价值可以定两个劳动日。如果产品是他自己的，自己拿出来卖，熟练劳动者就占便宜，非熟练劳动者就吃亏。因为非熟练劳动者他劳动三天，可是实际上拿回来的是两天的劳动价值。价值法则实际上就是按照社会平均劳动日来定价的。这是价值法则的第一条。

我对经济学不很熟，根据我的了解，价值法则的含义有三条：一条是根据平均劳动日来定价；第二条是商品拿到市场上交换，按照平均劳动日等价交换。你的杯子是两个劳动日的价值，那么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的时候，大体上可以换回两个劳动日的报酬。它换成别的商品也好，换成货币也好。货币是商品的代表，用拿回来的货币买别的商品，所买到的东西大体上也是两个劳动日，所以非熟练劳动实际上把三个劳动日的东西卖出去，只能买回两个劳动日的商品。换成货币只能换成两个劳动日的货币。这叫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不是你劳动多少天就得到多少天的报酬，而是按照平均劳动为标准进行交换，所谓等价交换就是这样的交换。价值法则就是按社会的平均劳动日等价交换。按照生产的产品所包含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日来进行交换，这就叫做等价交换。

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是按照你每天的产品所能包含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日(作了经济上的必要扣除)给你报酬。计时工资名义上是计时，实际上工资的规定不是真正按照实际工作的时间来规定。因为计时工资有等级，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同样的工作时间得到的工资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你每天贡献的产品里面所包含的劳动日有所不同。同样是计时工资，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就低，熟练劳动的工资就高。为什么要有这种等级呢？就是因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在同样一个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平均劳动日的多少不同，价值不同，所以报酬也就不同。如果计时工资不是按劳分配，不是等价交换，那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工资的，如果说有工资，就是按照你劳动多少时间给你多少工资。不管你熟练不熟练。到了共产主义，熟练和不熟练之间的差别也不多了。

再一点，就是价格基本上是决定于价值的。价格是会变化的，每天的价格不一定一样，价格的变化，归根结底大体上是符合于价值的。用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就是价格。那么市场上的价格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市场上的商品价格经常起变化，这个市场价格的变化是不是等于价值的变化呢？不能。因为价值本身的社会平均劳动日（相对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水平）是不变的，但是市场上价格常有波动，波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有时候某些东西太多就跌价，东西少了就涨价。有时候涨价会涨到价值以上，跌价跌到价值以下，一涨一跌不断波动。长期作过一个统计，平均起来，价格大体上和价值差不多。价值法则的内容就是这样。

现在就要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价值法则起不起作用？我们规定社会主义产品价值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按照社会的平均劳动日来定？能不能废除这个法则？不要按照社会的平均劳动日来定，而是按照你实际做了多少天来给你价值。如果废除价值法则，按照实际劳动来定，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会出现这种情形：劳动的人要偷懒。因为一个杯子，熟练劳动者一天搞出来，非熟练劳动者三天才搞出来，如果按照三天的劳动日来定价值，熟练劳动者就要磨洋工了。熟练劳动者三天生产三个杯子得三天的工资，非熟练劳动者三天生产一个杯子也是同样得三天的工资，那么，这样一来，熟练劳动者就不愿意一天生产出一个杯子来，他会觉得吃亏。所以，就不能按照实际劳动日来定价值，而是按照劳动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日给你报酬。这样给报酬，非熟练劳动者就要吃亏一些。因为他吃亏，他就努力使自己变成熟练劳动者，熟练劳动者按照产品的平均劳动来拿报酬，他一天可以搞一个杯子，而杯子的劳动价值是两个劳动日的价值，所以，他一天可以得到两天的报酬，因此他的积极性就得到了鼓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需要这样的价值。因为有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别，有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农民和工人又有生产力水平高和生产力水平低的差别。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差别，就需有平均劳动来计算价值比较合适。既然是用平均劳动来计算价值，需要有等价交换，不能不实行等价交换。

另外，谈市场的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市场价格，国家是可以设法控制的，至少主要的必需品的价格可以控制。但是，控制价格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呢？如果国家的价格很低，低到价值水平以下，如收购农产品规定的价格很低，在农业平均生产价值以下，那么，就是要农民蚀本，即使不蚀本，

农民也赚不到钱，得不到赢利或者赢利很少，不能够搞积累。如果国家这样子搞，农民的积极性就要大大地降低。苏联有一个时期就有过这个问题。所谓“剪刀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太低了，低于工业品的价值以下，使得农民除了收回成本以外，赢利很少，甚至于几乎没有赢利，这就对农业的发展不利。但是，如果你把价格规定的过高了，高于价值太多，那么，国家就要大蚀其本。国家蚀本太多，国家就不能积累。

所以，国家控制价格的原则，是一个总的原则，不是具体问题。总的原则是：大体上要使价格适应价值，基本上和社会平均劳动差不多，以平均劳动为标准，可以高，可以低，具体情形可以有变化。比如，有些是国家急需的东西，可以抬价收买，国家可以蚀一点本，那是个别的、特殊的。有时候，有些东西国家不需要，就可以降低价格。不过社会主义的国家要照顾一个原则，降价，不能使生产者破产。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上有时候供给太多了，要降价，使生产者破产。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的鸡蛋和肉多了，收购价格要降低一点，但是不能够降得太厉害了。在旧社会里，丰收的时候就大跌价，跌到价值以下，结果使农民破产。我们是降到适当的水平。以前因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提高它的价格，使得它的价格高于价值。现在降下来跟价值差不多，有时候比价值稍微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城市和农村应该努力作到等价交换。苏联的“剪刀差”，主要就是一般工业品按照价值定价格，甚至于比价值还高一点。农产品在价值以下，成为不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在旧社会是一个基本规律。城市剥削农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个基本规律。用城市剥削农村的方法，使农民出售一部分产品低于它的价值，低到把剩余劳动完全搞干净，甚至于除了剩余劳动以外，把必要劳动也剥夺了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之间经常是不等价交换，而且是极端不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初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在工业上能够掌握大量的积累，所以就多多少少搞一点不等价交换。苏联就是因为搞重工业，或者是为了快一点搞重工业，所以就压低农民的生活，使农业和工业的“剪刀差”相当大。当然，比起旧社会来说可能还是小一些。这是讲斯大林那个时候。现在，赫鲁晓夫就不同了，恐怕他在名义上是为了农民，要提高农业的生产价格，实际上从其他各方面把农民生产的东西剥夺了。所以，他的农业衰退比斯大林时候还厉害。

价值法则，是不是就是这么几条原则，学过经济学的同志可以研究，可以考虑。这是我的意见，一个是按照社会的平均劳动来决定价值，另一个是市场上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再一个是价格要波动，价格波动的总方向是跟价值适应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波动是自发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的升降，可以由国家控制，自由市场多多少少有点自发的，但是国家限制它的自发性，用国家的力量来控制价格的涨跌，使之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集体为原则。国家如果需要某一种产品，很需要，但是没有，这时候就可以提高价格，蚀本来收购。前两年的蔬菜，我们北京就蚀本收购。在市场上一分钱就买一斤西红柿，而实际上收购西红柿不是一分钱一斤，而是好几分钱一斤，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可以使价格高于价值，高得很多。那么，蚀本怎么办呢？蚀本就在别的地方补，由生产比较多的商品中赚钱，或者有些产品搞高价，如古巴糖、高价点心等。这一方面蚀本，那一方面赚钱。总的来讲，国家付出的价格跟总的生产产品的价值差不多，这样自觉的搞平衡。资本主义社会是自发的平衡。是不是就是这么几点，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据我自己了解，价值法则就是这几点。价值法则的这几个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是不断起作用的，而且我们要自觉地利用它。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法则是肯定起作用的，这一点不能够有任何怀疑、误会。斯大林肯定了这一点，斯大林是对的。那些反对他的经济学家是错误的。说斯大林有缺点和不够的地方，是说他没有进一步地提出中心问题是价值法则自发地起作用呢？还是我们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自觉地加以运用它呢？他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原则，就是限制价值法则的作用范围问题，这是对的，但是，单这点还不够，不是全面的，没有把中心问题提出来，限制作用范围也是一种自觉的控制问题。

这一章的中心内容就是这样一些，正确的和不够的地方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再把这一节的文字说一说。

第1段，第2段，第3段的文字肯定了价值法则是起作用的。（见旧版第17页第1—3段；新版第552页第6—8段）

下面第4段。（见旧版第17页第4段；新版第552页第7段至第553页第1段）

“但是，价值法则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法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作用，可是

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受价值法则影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这一段是讲的这么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价值法则的作用范围是什么？第一，在商品流通的范围内，价值法则是要起作用的。第二，在生产范围里面价值法则也有影响（有影响也就是有作用），所以，在生产范围内价值法则有作用，而且受影响的这种生产主要是指消费品。

在这里面，斯大林有这么一个思想，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只有生活的消费品才能够当做商品来生产（当做能够拿到市场上买卖的商品来生产），生产资料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卖掉的。生产资料是不受价值法则的作用。斯大林的这个思想恐怕要做一些修正。当时在苏联可能就实行这种政策。比如：生产资料，像拖拉机这些东西，只能由国家调拨而不能出卖，所以不是商品生产，因此它就不受价值法则的作用。可是，消费品要拿去跟集体农民交换，要卖给工人，所以消费品也是商品生产，因此只有消费品才受价值法则的作用。这个思想恐怕就是受到苏联当时政策的限制，所以有一点片面性。

现在看起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生产资料恐怕还是要受到价值法则的影响，价值法则也起作用，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我们大量制造农具去卖给农民。我们不只是制造拖拉机搞国营农场、搞拖拉机站，拖拉机还可以卖给公社。还有排灌机器，甚至于有小的电动机。另外，有中小型的农具，我们大量生产，这些都当做商品生产拿去和农民交换，所以就不能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完全不能作为商品生产，只有消费品才能作为商品生产，不能这样说。他这里这样说是片面的。

另外，是不是价值法则在我们生产里面没有调节作用？斯大林讲的这种调节作用，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自发的调节作用，就是生产的東西太多了，在仓库里堆积起来，可是没有人买，那时候价格就降低了，价格低于价值。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者、资本家就不愿意再生产这种商品了。他就停止生产了。

所谓价值法则的调节作用，就是价格降到价值以下，就使商品减产。反过来说，如果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涨到价值以上，生产企业就急于生产，很多资本家就投资生产。生产一下子就多起来了。所以，价值法则调节生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这样调节的，就是生产过剩了，价格跌

到价值以下，就会引起减产，引起生产缩小，反之，生产不足了，在市场上引起供不应求，价格就涨到价值以上，这样就会大大的促进生产，这就是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作用。

这种价值法则，实际上是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当然没有用。但是，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调节作用呢？可不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国家的力量，自觉地利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来调节生产呢？利用价值法则来调节生产，这种调节作用有没有呢？我看还是有的。大家仔细研究一下薛暮桥同志的报告（《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载《红旗》1963年第7、8期），他讲到过这个问题。在那个报告里可以找到我们国家的价格政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我们国家自觉地对那些生产不足的东西设法提高收购价格，使得它的生产增长起来，对那些生产过多的东西，国家可以在收购价格方面加以限制，甚至对坏产品可以不收购。现在，我们规定一条，凡是验收不合规格的，我们就不收购。这也是一种调节。这种调节是自觉地调节。认识了价值法则，利用价值法则去调节生产。

斯大林这里讲的还是有点片面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里面的价值法则没有调节作用，恐怕有点片面。问题不是有没有调节作用，而是那种调节是自发的，还是认识了价值法则以后自觉地用国家的力量，来统筹兼顾，自觉地加以调节。从6亿人口出发，从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用价值法则来自觉地调节生产。我看这种情形是有的，而且不仅是在生活资料方面有，生产资料中有一部分可以这样做，就是国营企业里面，有时候也要用价值法则来调节。你不用这种价值法则来调节，有些生产部门为了赶任务，搞出许多不合格的东西来要你收购。国家花了很多钱，买了不能使用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人不用点价值法则的力量来限制他，那也不行。当然必须强调政治挂帅，政治教育。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里面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样高的觉悟，在思想上一方面要政治挂帅，提倡保质保量，搞比学赶帮运动；另外一方面也要适当地利用价值法则来进行调节。

刚才我们这段还没有念完。“……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法则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

斯大林在这里讲价值法则没有调节作用。但是在企业里面，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可以利用价值法则，这是对的。你怎样核算呢？当然是按照价值法则来核算。因为整个产品要按照社会平均劳动来计算价值，所以，企业内部也只能按照价值法则来搞经济核算。

下面第5段(见旧版第17页第5段至18页第1段，新版第553页第2段)就用不着再解释了，因为都是讲这个问题，企业里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生产？搞经济核算要用价值法则。

再下面第6段(见旧版第18页第2段，新版第553页第3段至554页第1段)用不着讲，主要是批判了苏联一些人不懂得价值法则。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下面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价格不能乱定。怎样规定价格呢？要由价值来规定，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在经济上起破坏作用。

规定价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薛暮桥同志在一次报告里提到国家定价也是有点斗争的。每一种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产品价格高一点，所以各方面都有斗争。所以，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价格机关来平衡各个生产部门的价格。每一个部门都想争自己的价格，有时候争得过分，会出现本位主义，甚至会有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服从国家的整个计划的控制，不照顾国家的大局，只注意自己这方面的利益，就会出现影响全局的问题。比如，你向农民征购农产品时，如果农民的这种产品很多，市场价格很低，如果他一定要国家服从他的利益，还要用很高的价收购，一点也不肯减价，有时候可能是本位问题，有时候是是非问题。本位主义发展了，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问题。只顾自己的小利益，不顾国家的大利益，如果国家过分照顾他这点，他就会利用这点发展资本主义。

再下面第7段。(见旧版第18页第3段至第19页第1段；新版第554页第2段)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也是又对又不对的。价值法则在我们国家，在有些企业里面是不能够成为生产调节者的，特别是国家特别需要的尖端企业，不要因为它蚀

本就不搞了，即使要蚀本也要搞。价值法则成为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有些地方，有些范围里是没有的，这是对的。但他概括得太广了，好像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里面任何调节作用都没有。这一点恐怕还是有片面性的。

他在这一段最后说：

“……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这些话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些话说得过了点，一点自觉的调节都没有了，恐怕还不能这样说。这里面有一句话：“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这是讲苏联当时的情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点，我们现在完全清楚了。

下面第8段、9段(见旧版第19页第2、3段;新版第554页第3、4段)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法则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法则是対立的。这个话说得很对。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这个法则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以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要求为依据的。”

这两段是讲我们的计划是以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法则为依据的。这大体上都是对的。

下面第10段(见旧版第19页第4段;新版第554页第5段)有一点缺点。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这段就说得过了点。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基本法则之一，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法则。因此，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了。我看，如果把“生产调节者的作用”改为“不会起自发的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样说就确切了。而且这也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地方自发的调节作用就仍然存在。

第11段(见旧版第19页第5段;新版第554页第6段至第555页第1段)，讲苏联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高。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法则在中国有了一些发展，就是加上一个高速度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社会主义社

会的生产发展应该是这样：既是有计划按比例，又是高速度的。高速度是对资本主义来说，比资本主义的速度要高。赫鲁晓夫上台以前，苏联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中国现在发展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发展比资本主义社会是快得多。

下面第 13、14 段(见旧版第 19 页第 6 段至第 20 页第 2 段；新版第 555 页第 2 段至第 4 段)斯大林批驳了一种观点。

“有人说：价值法则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恒久的法则。如果价值法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为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末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斯大林否定了这一点。认为将来不会有价值法则起作用。到共产主义社会价值法则就不会起作用了。这个思想我们应该肯定，我们现在应该同意斯大林的这个思想。但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里面，是不是马上就会消灭一切价值法则的作用呢？我们说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经过三个过渡：第一，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三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统一的经济成分。第二，由两种所有制的社会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三，由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价值法则的作用马上就消失了？这个问题恐怕还不能断定，恐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价值法则的消失也可能还要经过一个时期。根据我们过去对许多问题的经验看起来，过渡不会那样纯粹。所以，恐怕也要有一点保留。

如果照斯大林这样一种提法，就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价值法则的作用马上不起作用了。从原则上讲是对的，但是，如果要讲实际情况，实际的发展过程，恐怕不是这样简单，不是一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里面的东西立刻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毛主席在这次中央会议上讲过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那样纯粹，到了共产主义还可能有许多问题。首先，价值法则的影响恐怕还要有一个时期才能完全消失。因为各取所需不是一开始什么东西都各取所需了。到共产主义社会开始可能是必要的生活资料按需分配。按需分配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而是社会根据你的需要分配给你多少。

按需分配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分配呢？也可能是采取交换的办法来分配，开始拿工资，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购买，或者到处设有仓库、商店，你要什么

东西就去拿呢?还要有一定的过渡。过渡到那种时候,你能说价值法则就于干净净的没有作用了?恐怕还不会这样子吧。

第 15 段至 22 段(见旧版第 20 页第 3 段至 22 页第 1 段;新版第 555 页第 5 段至 557 页第 2 段)斯大林在批判了上面的问题以后,下面他又批判了一种观点。

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

这段话里说价值法则调节着各个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发的调节是有的。因为某种生产供不应求,价格高涨,资本家就大批投资生产这种东西。投资的结果就把劳动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了,生产力在这个部门就有所增加。另外一些部门,商品价格跌落了,资本家就不搞了,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就转移了。所谓价值法则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这种情形?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这种情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按计划来调节生产的,不是价值法则自发的调节生产。所以,斯大林的这句话还是对的。有些部门尽管蚀本,但是只要国家需要,国家就投资,劳动力就吸引到这方面来了。这个劳动力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分配的,按照国家计划调节的,不是按照价格的涨落来分配、来调节。

那么,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应该照顾价值法则,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东西就拼命让它蚀本,这也是不对的。在蚀本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蚀得少一点,而且要尽可能地在别的地方有所补偿。一个资本家经营的大公司要采取这种办法,他在这方面蚀本,在另一方面赚钱来补贴。他的企业内部可以平衡。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大企业,国家可以做总的调节,而且这个调节还是要利用价值法则。在这一方面蚀本了,在那一方面赚钱。在蔬菜方面、粮食方面,国家要蚀本,在一些奢侈品方面或者比较稀有的产品方面就增大价值,这样子来补偿。补偿国家的损失,使整个国家总的来说还是收支平衡又有节余。节余从哪里来的?总的来说是利用价值法则。某些方面蚀本了,某些方面赚回来,平衡以后赚的还是要多一点。

所以，完全不用价值法则是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是让价值法则自发地起作用，是自觉地利用价值法则来服务于计划的调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价值法则是自发的起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基本上是利用价值法则来为国家的计划调节服务的。价值法则不是完全不应该利用。不能说因为价值法则在我们的生产里不起调节作用，因此我们就在生产里根本不管价值法则了，不能这样子说。总之，认为价值法则对我们有调节作用，甚至起自发的调节作用，这是错误的。认为价值法则一点调节作用都没有，搞计划的时候不需要对价值法则加以利用，这也是错误的。斯大林这本书在这方面讲得不全面，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有很多是好的。

5.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第1段至5段(见旧版第22页第3段至24页第1段；新版第557页第4段至558页第4段)。斯大林在这个题目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并且承认还有本质的差别；同时认为这种差别是对立。这个思想是对的，或者就他的基本内容来说是对的。(1)承认有差别是完全对的；(2)认为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成为对立的(他所讲的对立实际上包含着对抗的意思)。

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对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城市是一面，乡村是一面，这是对立面。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也是对立面。

在这章里有个缺点，就是好像认为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对立已经消灭了。对抗好像已经完全消灭了。文章里写道：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见旧版第23页第2段；新版第558页第2段)

这句话有缺点，这句话就否认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解释成为：这种对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里已经逐步消灭了。这样解释比较好一些。

斯大林的这本书受到他 1936 年自己规定的教条的束缚，否认了过渡性，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已经看出过渡性，但是他不能肯定这种过渡性。已经承认有差别了，但是又说对立已经消灭了。差别就是矛盾，矛盾包含对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简单地说已经是一种有利的关系了。

这第 3 段讲的：“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城市和乡村利益的对立、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

这句话是比较对的，下面接着讲：“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的。社会主义城市，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的事业上所给

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有系统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见旧版第 22 页第 5 段至 23 页第 1 段；新版第 557 页第 4 段至 558 页第 1 段）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斯大林当时说的话到现在十几年了，苏联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就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不可能，恐怕还很多。所以是对抗正在消灭，而不能说完全消灭了。

下面第 6 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关系也是这样。他说：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的那种敌对的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端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见旧版第 23 页第 4 段至 24 页第 1 段；新版第 558 页第 4 段）

同样地，这段话我们按照刚才的说法来解释。这里的对立就是对抗的意思。就是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基本上消灭了。不是说现在赫鲁晓夫这样的社会，就是在他以前的社会也是说对抗已经基本消灭了。或者是完全消灭了，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样说有点过分。对抗只是在逐渐消灭，因为矛盾的差别仍然存在，对立面仍然存在，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下面讲关于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

第7段至13段(见旧版第24页第2段至26页第2段；新版第558页第5段至560页第4段)：“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引导到商品流通的保存，只有工业和农业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灭。因而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段是对的，没有什么错误。工农业有一个本质的差别，主要就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差别。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消灭这个差别，实际上这就是过渡性。而且把这点当做“头等重要的意义”，也都是正确的。

怎么来消灭差别呢？是不是把工业和农业合起来呢？消灭差别的办法恐怕还是要以工业为主导，使农业工业化。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斗争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业是先进的，农业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消灭差别就是以先进为主导来消灭落后。工业和农业的差别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还是落后一些的。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但是工业是农业的主导，是消灭落后农业的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消灭一面来解决矛盾。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对立面的斗争。经过斗争的结果解决了矛盾，而解决矛盾是把对立面中的落后的一面消灭掉。不是把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总是要消灭一个方面。

苏联讲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可以融合的方法来解决的。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是不对的。解决矛盾并不是对立面融合，而是要消灭对立面的一个方面。有时两个方面都消灭，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比如奴隶社会就是这样的。在奴隶社会矛盾发展到最后时，奴隶主和奴隶都消灭了，然后出现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又有新的对立面。封建社会发展

的结果，是把封建主消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把封建地主和农民融合起来。把封建地主和农民融合起来的思想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幻想。在中国来说，是孔子学说的幻想，想把封建地主和农民折衷，永远保持他的封建统治。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怎么解决？解决的办法是把落后的农业消灭。苏联认为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两种制度可以共同进入共产主义。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怎么解决？是不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简单地结合起来？这样不能解决！现在我们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联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友谊的关系，但是还有矛盾，不能说矛盾就没有了。不能说对立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还是有对立的。脑力劳动者要到农村或工厂劳动，相当费力，不是很容易的事，动员下去以后，有时候搞的比较好一点，有时又回来了，又不好了，这种情形比较多，但是大多数是搞得好的。

对立并没有完全消灭，工作搞得好的，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掌握得好的，对抗可以基本上消灭。知识分子下乡，也可以搞得很好，大多数是可以搞得很好的，可以消灭对抗。即使过去的仇视和不信任没有了，建立了友谊的关系，建立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但是要消灭差别，要解决矛盾还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要消灭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落后的状态，另一方面要消灭脑力劳动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消灭这些东西以后矛盾就能得到解决。所以矛盾的对立面和平共处、互相融合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斯大林在这章里讲到：如果将来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本质上消灭了，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差别都消灭了，这点还是对的。工业和农业的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消灭了，都是全民所有制了，那时候是否工业和农业就没有差别了？还是不能这样说。因为生产条件不同，工业有工业的条件，农业有农业的条件，总是有不同的条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是有差别（参见旧版第 25 页第 2 段至 26 页第 2 段；新版第 560 页第 2 至 4 段）。

斯大林说的将来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本质上消灭了，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差别都消灭了，在这点上讲得很对。为什么对？因为从这点出发，应该得到一个结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工作条件不同就有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条件不同就会有矛盾。所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先进与落后，甚至唯心与唯物的矛盾也还是会有。可是斯

大林没有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思想基本观点是对的。我们肯定他对的观点，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展这个观点。

差别永远是存在的，这里所讲的本质差别，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差别。工业和农业工作条件的差别是不是也算本质的差别。也可以说是本质的差别，工作的条件就有本质的不同。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有没有本质的不同？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应该这样说。但是这个本质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本质是两回事。如果像斯大林所说的本质的差别被消灭了，那么这差别就不是本质的差别了。这个说法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质有各方面的本质。生产关系方面的不同是本质的差别，工作条件的不同也是本质的差别。

现在讲下面几个题，这几个题的问题都比较简单。原书第五六两个题讲的是国际问题，主要不是讲经济问题，所以不需要具体讲了。

6.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这没有什么可讲的。斯大林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总的来说，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法则(见旧版第 34 页第 1 段；新版第 567 页第 5 段)。斯大林批驳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价值法则这一观点，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见旧版第 33 页第 3 段；新版第 567 页第 2 段)。

其次讲到有人说，平均利润率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斯大林也反对这一观点，并给以批判。他指出“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现代的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它不满足于平均利润，要搞“最大限度的利润”(见旧版第 33 页第 5 段和第 34 页第 3 段；新版第 567 页第 4 段和第 568 页第 2 段)。斯大林的这个思想大体上是对的。

这些批判就不需要多讲了，主要讲一讲他所肯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对不对。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

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见旧版第 34 页第 2 段；新版第 568 页第 1 段)

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有没有这个基本的经济法则？有没有这个主要特点？修正主义就反对这个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裁军剩下的钱帮助落后的国家。可见修正主义是反对斯大林这样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我对于世界经济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一般地看来起码斯大林的提法是对的。

垄断资本要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使他们破产、贫困。剥削大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收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这是指什么人说的呢？是不是指大多数人民？不是。美国南方的人民生活非常穷。北方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好一点，是被收买的。

他们用剥削本国的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这三条我看都没有错。

1. 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使他们破产(个别的情形可以例外)，法则就是讲总的趋势，总的趋势是不是大多数人民贫困破产？肯定是。

2. 奴役和不断地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这肯定是事实。要奴役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美国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法国、德国，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变成它的奴隶，听它的话，服从它的指挥。当然，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要奴役戴高乐，这是肯定的，但是戴高乐不听他的话。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他是不是要奴役呢？肯定是这样的。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他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人民坚决反抗。

例如：在古巴问题上，美国是否不想奴役它呢？不是的。因为古巴人民坚决反抗它，使得它没有办法奴役。

3. 为了最高的利润，用搞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美国搞不搞战争？是要搞的。它是大仗不敢搞，小仗不断搞。用小仗来刺激经济。这里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所例外。讲裁军是口头上骗人的话，实际上它哪里裁军！

就这几条，现在不但帝国主义国家这样搞，就是修正主义国家也这样搞。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是不是也这样搞呢？也是这样搞。所以应该肯定斯大林的这段话是正确的。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这个问题以前我讲过，但是讲得不太确切。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见旧版第35页第7段至36页第1段；新版第569页第4段）

斯大林的这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提法有点片面。“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从社会主义生产总的方向来说，可以说是这样要求的。总的要求是技术基础越来越高，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完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看做是一种到处都要这样，那就不一定对了。但是这点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在后面一句“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里的“最大限度”是有毛病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最大限度”也达不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按劳分配，不是“最大限度”的分配。如果是逐步满足社会主义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是可以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经济法则要用毛泽东思想来重新考虑。

1942年毛主席在陕北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这个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发展生产、保证剥削。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当时我们的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解放区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因素。已经有公益金，这就有了社会主义性质。

毛主席主要是指公益金，也是指的当时解放区的一般供给。

发展生产当然不是发展公益金，还是发展一般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这说明当时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因素。生产的领导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而不是发展生产保证剥削。当然还是有剥削的，如吴满有是新富农，就有剥削，那时候提吴满有的方向是有点不对的。总的方向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而不是富农经济的方向，不能让它自由发展。那时最后两年有点右了，保护富农有些过头了。

现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原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个原则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斯大林的所谓基本经济法则恐怕要修改。

有的同志问：社会主义社会有多少基本经济法则。我看考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处。苏联教科书写得不好。因为总考虑这个基本经济法则，从这个公式出发来解决问题。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不要从基本经济法则出发。因为基本经济法则是讲他的总的发展方向，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怎么样发展的问题。具体的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

要了解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具体了解它的发展，还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来研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怎么样又适合、又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怎么样又适合、又矛盾。具体来研究这些矛盾，就可以逐步把社会主义经济搞清楚，把经济发展的过程搞清楚。

所以过分注意基本经济法则不一定恰当。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合、又矛盾的法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适合又矛盾的法则是基本的？应该说，“两个”基本矛盾法则可以解决整个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也是指导我们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是要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是不断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合，适合后又揭露矛盾，揭露后又解决，解决后暂时适合，适合后又出现新矛盾，再解决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主要是由矛盾来推动的，还是由适合来推动的呢？主要是由矛盾来推动的。如果适合是主要的，或者适合是绝对的，那么一适合就可以不进步了。问题是适合以后又不适合了，又要重新调整，这样才能不断发展，不能一劳永逸。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只是暂时的解决了矛盾，出现适合的现象，但是以后又出现新的矛盾。不揭露矛盾就不能前进。所以一分为二是根本规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一定要适合，但是不能绝对适合，这是经济规律的一个方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永远要一分为二，不断地一分为二，经过斗争解决矛盾，暂时达到适合，然后又一分为二，不断地一分为二。

发展总的趋势是不断一分为二。斯大林的书的缺点就是缺乏彻底的一分为二思想。把社会主义的矛盾看的好像一切矛盾解决得差不多了似的。这本

书是他已经看到了矛盾，但是受他的公式的限制。所以他的思想不能彻底的展开，辩证法是不彻底的。

在这本书的后面斯大林《答 A·N·诺特京同志》的信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是仍然有完全适合的思想，所以辩证法不彻底。他从新的现实里看到了辩证法，但是首先讲的是公式、原则，不能彻底地发挥辩证法思想。这点是根本问题。

斯大林在《答诺特京同志》中说：“你断言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使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代，无疑地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像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了。”（见旧版第 45 页第 4 段至第 5 段；新版第 577 页第 3 段至第 4 段）

原来是讲社会主义，现在是讲资本主义，讲国际运动。所以问题更进一步了。完全适合公式更扩大了。这段话里有正确的东西，又有进一步的错误。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已经是不恰当了。进一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有时也完全适合生产力，这是错误的。这个公式应该放弃。因为前面我讲了，生产关系不能与生产力没有矛盾，基本上有矛盾，怎么能说完全适合呢？所以最后一段他不能不作一点解释。

“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见旧版第 46 页第 2 段；新版第 577 页第 6 段）

他把完全适合解释成为这样，这与以前的解释有些冲突。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有时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发生冲突呢？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情形。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开始就是互相冲突的。最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到处捣毁机器，打坏机器不是冲突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工人破坏机器就是发生冲突。所以把“完全适合”解释成为不发生冲突是矛盾着的。不能这样解释。

完全适合是没有矛盾的意思，没有冲突的意思。如果承认有矛盾，就不能说是完全适合。

后面接着说“……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而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同上)

这里讲的惰性力量是什么呢?不清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但是不明白惰性力量究竟是什么?所以更清楚地解释还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本书。

惰性力量就是旧的力量，旧的习惯势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反对改变生产关系，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它是有矛盾的，既然有惰性力量，就不能说完全适合。

我原计划讲这些，有的同志要求多讲，多讲没有必要。前面的第一个问题正在写提纲，也可能是文章。总的还是关于“一分为二”的问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附录: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种提法是有毛病的，这个提法不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里提出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小册子里提出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提了以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有的苏联哲学家就作了夸大的解释，夸大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就没有矛盾了。在斯大林这本小册子出版以后，苏联很快就写文章来解释，像最有名的尤金也写过文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种提法，在苏联相当长的时间在理论上引起了一种混乱，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矛盾了，这种混乱一直到1952年斯大林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的时候还可以看出来，经过15年苏联还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矛盾，持这种见解的是主要倾向，是占优势的，如果不占优势，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了，事实上它成了问题。所以斯大林就不得不在他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补救了一下，对他提出的原则，所引起的后果做了补救。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虽然完全和生产力适合，可是并不是没有矛盾。完全适合了，但是又有矛盾。实际上，这种假定是互相矛盾的，逻辑上是有缺点的，既然有矛盾就不能说完全适合，既然说完全适合就不能说有矛盾。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矛盾，对他原来的提法有修改。

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没有矛盾，要根据毛主席的提法来作说明，……

摘自：艾思奇《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1961.12.25),速记稿第2—3页。

总之，应该肯定这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种提法恐怕要修改。斯大林关于完全适合的问题不但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到：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完全适合的。对社会主义不能这样说，对资本主义恐怕更不能这样说。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但是，完全适合这种提法就不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不能解释为完全适合，因为这种情况不会有。矛盾是绝对的，是自始至终的，矛盾对任何事物总是自始至终的存在，不可能有没有矛盾的时候。德波林学派主张矛盾不是自始至终的，事物开始的时候没有矛盾，开始的时候只有差异。这个理论是错误的。1931年苏联的哲学家米丁、尤金等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批判了这个错误的理论，后来他们自己又不按照原来所坚持的正确原则来解释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矛盾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社会主义初期首先是适合，但是也还有矛盾。

摘自：艾思奇《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1961.12.25),速记稿第4—5页。

第 26 章 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

(1964、1965)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艾思奇先后在中央高级党校内部和校外许多单位，作过多次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辅导报告这两篇稿子，是依据他于 1964 年至 1965 年期间，在中国文联、解放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海军正师级以上青岛学习班等单位的报告速记稿整理而成。我们整理的原则，是把几个稿子作综合比较，吸收各个稿子中深刻的内容，删去一些明显不合适或重复的段落，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不增加任何观点，力求反映艾思奇的哲学思想。】

(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

现在讲讲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写的时间不同，性质相同。所以合起来一起讲。

1. 两条认识路线

这两篇文章都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政治有路线，认识也有路线。一定的认识路线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是联系着的。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政治路线的分歧，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说来，就在于认识路线的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科学的认识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是与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问题。《实践论》是毛主席在 1937 年写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 16 年。《实践论》是对 16 年来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认识论斗争的总结，是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实践论》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一次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民主革命时期，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再一次肯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我们学习这两篇著

作，就是要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认识事物、做工作，要按这一条路线来处理，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走到唯心主义方面去。

讲《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要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了解这种认识路线，努力学会掌握这种认识路线。

在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之前，先简单说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什么区别，界限在哪里呢?

一般唯物主义在认识上都承认反映论，即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承认这一点；唯心主义否认、反对反映论。

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物质通过感觉变成思想。这就是物质变精神。先有物质，而后才有精神；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那本二三十万字的书，就是反复讲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当时斗争的需要。那时，主观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很多人都糊涂了，所以，列宁写了这本书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心主义则相反，否认反映论，否认认识是客观的反映。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有两句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这就是指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天降派”，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认识是脑子里生来就有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什么叫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有的，不过这个客观世界是精神的(是个大精神)，不是物质的。这个精神有的叫上帝，或者是神；有的就叫世界精神。这一派的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是由世界精神的启发而得到的。这种思想和宗教迷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客观世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主观精神。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是批判这种哲学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和这两派斗，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就把哲学史概括了。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有它的弱点，是不够科学的。从前的唯物主义有一种叫做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者叫做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

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反辩证法，免不了在这一个问题上或那一个问题上，变成唯心主义，所以与唯心主义斗争就没有力量，常常被唯心主义打败。以前的唯物主义，除形而上学缺陷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弱点是不懂实践。它们承认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是客观的反映、精神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承认反映这一点，它是正确的，是和唯心主义相反的。唯心主义不承认物质世界，因此，也就不承认人的思想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过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而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唯物主义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它不了解人的主观反映客观需要通过实践。以前的唯物论根本不了解实践的作用、实践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路线。《实践论》就是在认识上坚持唯物主义路线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斯大林（他的前期），都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所谓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反映论——人的认识一定要反映客观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所反对的唯心主义，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都读过《毛泽东选集》，从哲学的眼光来看，每一篇文章都是坚持反映论。有时实际上坚持，不说出来；有时直接说出来，反对主观主义。比如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坚持反映论——正确反映敌我关系。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开宗明义就要分清敌友，反对陈独秀敌友不分的唯心主义（可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以后，革命每到一个关头就直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的路线，就是客观第一，主观第二，主观是客观的反映，都是反映论。这一点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共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同以前的唯物主义又有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著作，深刻透彻地阐明了这个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著作中，许多关键的原则都是长期经验的总结。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这个根本原则；一方面又总结了我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做出新的概括、新的发展。根本原则没有变，但有许多新东西，这同我们丰富的

革命经验是分不开的。这些著作不是提起笔蘸一点墨就写出来的，而是千百万工人、农民、革命先烈流血流汗写成的活的历史。毛主席把这些活的历史写成文章，才有这两篇哲学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这样来的。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我们的革命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2.认识依赖于实践

实践的观点，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来说，是第一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其他唯物论不同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在唯物论里加上实践的观点，以实践的观点作为根本的观点。其他任何一种唯物论都不讲实践，都跟实践脱离，都是离开实践讲唯物主义。离开实践讲唯物主义，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只要对实践轻描淡写，不强调实践，这也会离开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因为“实践”这个名词几千年来就有，但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这个名词有自己的定义。中国在封建社会就有“实践”这个词，意思就是按照某种道德标准来行动。一般使用这个名词都是认为按照某些思想为指导来行动，或者把某种思想付诸行动叫实践，有时候资产阶级把个人冒险也叫实践。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讲“实践”这两个字，主要是讲个人活动、个人奋斗。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者，都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用“实践”这个词，在《实践论》可以看出来，不是按封建道德标准行动，也不是搞什么个人活动，而是指社会实践。文章一开头就讲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当然也有个人的活动，但是是社会的，因为任何人的行动都是社会性的，纯粹的个人活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的活动都带有社会性，所以实践是社会实践。

所谓实践，就是社会实践、人的社会活动。广义的实践就是社会活动。人是通过社会活动来认识世界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决定人的本质、人的一切。为什么说人有社会性？人的认识有社会性？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特点是由自然决定的，自然生就的。老虎，自然界生就它有很尖锐的爪牙，生就它有很强大的胃，能消化大量的肉，它的特点是吃肉，是食肉兽。但是人的特点不是由自然来决定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人在社会关系中间所处的地位不同，它的本性也就不同。阶级社会中有不同的阶

级，它的社会地位不同，阶级地位不同，它的本性就不同。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本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本性。本性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自然界来的，不是从母胎里带来的，而是在进入社会以后，在社会的影响下得来的，是在社会实践当中、在社会活动当中，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和特点，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认识也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同，认识也会不同。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认识问题，便不了解人的社会地位能使人的认识发生区别，好像任何人的认识都是一样的，不会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有区别，不会因为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不同。抽象的人性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认为人人都是一样的，认识也是一样的，感情也是一样的。事实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抽象的人性。资产阶级的文艺总想表现抽象的人性，实际上，抽象的人性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般的人性，只有阶级性。

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分不开，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社会性，人的认识也就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马列主义的认识论，首先就指出人是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的，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来认识世界。所以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所谓不同地位，有先进的地位，有落后、反动的地位。通常是站在先进地位的人比较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要注意这个特点：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毛主席的著作，题目就叫《实践论》。

我想联系文艺上的问题也稍微提一下。文艺可不可说也是一种认识？提出这个意见，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个人认为，文艺是一种认识，文艺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从哲学上看，就是一种认识。不过文艺和科学理论不同，不是根本实质不同，而是形式不同。科学是用理论，用概念、判断、推理，用逻辑系统来认识世界。文艺则是用形象来认识世界，是用从人民生活中间提炼出来的典型的形象来认识世界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文艺也是一种认识，只是形式和科学不同。既然是一种认识，所以也要通过实践来认识，也就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来认识。

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立场不同。社会地位就是实践立场，立场不同，对生活的认识就会不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他所注意的典型也不会相同的。为什么以前的那些文艺作品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因为作者都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使他们感兴趣的典型就是这些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也有他们的典型人物。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与西方古典资产阶级文学不同。17、18、19 世纪有个人主义的典型，俄国 19 世纪文学也是个人主义典型多。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是腐朽透顶了，所以他们在文艺中有兴趣的人物、典型，是杀人犯、强盗、诲淫诲盗。有的典型像疯子一样，英国的“硬壳虫”音乐，那典型不是疯子么？那是资产阶级没落的疯狂。我在一个影片上看到一个法国的现代芭蕾舞，从动作上看起来，人就像木偶，动作像机械，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是僵尸在跳舞。选择什么样的典型就表现作家的认识立场，文艺作家的认识是由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来决定的，所以，改造作者自己的实践立场是改造文艺的根本环节。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科学上，如果没有正确的概念，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文艺上，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典型，就不能有好的作品；如果不能正确的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阶级的典型，也不可能有反映我们时代的好的作品，就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文艺。如果把中间人物当做典型，能不能使我们的文艺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呢？不可能的。你不能超过 30 年代、十八九世纪，因为那些年代有了它自己的最高峰，它确实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有生活作基础，所以能创造那时的最高峰。你现在脱离了过去的时代，而要去学它，如何学得好呢？你不创造今天的先进典型，不可能有什么出路。不是说除了英雄典型以外，其他人物不能写。写是可以写的，但不要把它当做英雄，不要当做歌颂对象来描写。

有一个临时提出的问题，先简单说明一下。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为什么高于认识？实践高于认识，主要是讲理性认识，这是把实践与理论比较起来讲的。理论有普遍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普遍应用，因为理论是反映规律的，凡是规律就带有普遍性。而理论是反映规律的，所以理论总是有普遍性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就叫实践。实践为什么高于理论？首先因为它有理论的普遍性，理论的普遍性都拿到行动当中去贯彻，所以实践本身就有理论本身所有的普遍性，但是在实践当中，又把理论变成现实。理论本身是没有现实性的，理论只书上写一写，脑子里想一想，比较抽象，实践就把抽象的东西，变成活的现实的，所以就有现实性。这个

意思是说，实践比理论更确实，理论究竟对不对，终归要到实践中具体解决。比如实践可以创造典型经验，典型经验就比理论原则更具体，但是又表现了理论。实践里可以创造典型经验，理论本身就只能是原则。这是两者的区别，这区别也就说明高低有所不同。所以由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飞跃，向更高一级飞跃。实践又要产生理论，要证明理论，要再飞跃到实践。这一句话跟另一句话是一个意思，“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就是强调实践第一，强调实践的观点。

不了解实践观点，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不讲实践观点，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脱离了实践，就等于没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讲到实践，但讲得很简要。列宁的著作里发挥了关于实践的思想，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也讲得较少。毛主席就专用《实践论》作题目，突出了实践观点，深入系统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单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在《实践论》出版以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出这么一篇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系统的文章。

强调认识依赖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特点。要正确处理认识，使认识走在正确的路线上，就要注意认识与实践的结合。这个问题跟主观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跟主观主义认识路线、旧唯物论是针锋相对的。旧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变成了主观主义。毛主席总结了多年的经验，简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作里，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有两种答复，一种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答复：是从天上来的，或是脑子里生就的。毛主席否定了这样的答复，提出了另外一个答复，人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大家不要看这话简单，这是概括了、总结了多年的经验，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根本的东西，既深刻又明了地指出来了。这好像很容易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做起来，往往很容易离开了这个原则，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毛主席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认识上，首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来的，或脑子里生出来的，还是从实践中来的？有一种人就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来的。大家也许觉得奇怪，共产党中还有这样的人？明白地这样讲，好像没有，

从前陈独秀、王明没有公开讲，但实际上有人这样做。怎样来了解呢？天上本来不会掉下东西来，古代有人说掉下天书来，那是古代，现在没有这种人。但有这样一些人，他把某一个地方当做天堂，那里有他心目中的上帝；或者是历史上某一个时代有他的天堂、上帝。譬如，有人就认为莫斯科是天堂，上帝就是赫鲁晓夫，所有的认识都要从那里来，那里的上帝说一句话，就照办、照抄。还有人把纽约当天堂，把什么艾森豪威尔，或者罗斯福、肯尼迪当上帝。搞自然科学的，也有的人把某一个自然科学家当上帝，他的认识不用自己脑子去想，专等那里降下天书，把天书照抄。大家想一想，这种“天降派”有没有？我看不但有，而且很多。文艺界有没有“天降派”？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自己不动脑子，就是等某处天堂里给我来一个东西，我就照办。那是上帝那里来的，不能超越，只能照办。各行各业都有这个问题，文艺界也不例外。古代就有人管印度叫西天，本来是地上，却把它当成天，那里也有上帝，到那里去取经。“天”是没有的，是人幻想出来的，他把地上某个地方当天堂，也有人把历史上某个时代当天堂。还有一种人，就是认为认识是脑子里生就的，做工作也不调查研究，凭自己脑子乱想，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文艺界也有这种人，凭偶然灵感进行创作。文艺界是不是这两种都有，天降派，脑子里生就的都有？有时这二者还混合起来，从哪里找来天书，脑子里随便想一想，然后就出现典型，这典型与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无关。这种人有没有？我不大了解，提出这样的问题，请大家研究研究。过去我国革命历史上凡是机会主义，你研究它的认识路线，不外这两种：或是莫斯科来的，或者他自己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或者两种混合的。

毛主席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实践规定得很具体，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这个贡献，不是字面上的贡献，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观主义者虽有“左”倾、右倾的不同，但其共同特点，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认识脱离实践，是德波林主义，德波林思想。德波林在中国不是没有影响的。王明等人认为认识不是从实践中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轻视毛主席在农村创造的经验，瞧不起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挖苦这种经验，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说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左”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都有这种特点，脱离群众，脱离广大群众的实践，自己也不深入阶级斗争实践。陈独秀从前根本不参加农村的斗争，住在城里；王明主要是在莫斯科，到国内苏区时间很短。

毛主席提出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这三大革命运动中来，这一点，在今天更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要使认识得到正确方向，就一定要参加实践，参加实践就是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除了这些实践以外，别的社会活动不可能使我们得到正确认识。“实践”这个词含义很广，包括一切社会活动，但不是一切社会活动都能得到正确认识，只有参加革命实践才能得到正确认识。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工农兵的活动，参加生产、阶级斗争，因此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掌握。每一个时代，凡是比较先进的认识，都是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的人掌握。每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较好的，一般的讲，都是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才能创做出来。个别的例外是有的，哲学上也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一点，就是：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这个原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历史实践的总结。自从有人类以来，知识和生产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任何一个民族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和这个民族生产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比如，对天文的知识表现在历法上，不同的生产水平，就有不同水平的天文知识。游牧民族的历法和农业民族的历法就不一样。我们汉族是农业民族，所以从商朝起就是按照太阳的运动来计算年月日和 24 个节气。这个历法对农业有帮助，哪个节气该种什么东西很方便。游牧民族就不一样，他们不大重视太阳运动的规律，比如西藏的历法就不是太阳历，而是按月亮计算的，月亮圆一次就是一个，圆 12 次就是一年。所以，那个历法的新年没有一定的时候，有时在冬天，有时在夏天。维吾尔族历法也是一样。这是说的古代天文。数学也是从生产斗争中来的，那是几千年、几万年的总结。这都证明自然知识首先发源于生产，是总结生产经验的结果。

社会知识，一方面是从生产来的，一方面是从阶级斗争来的。在阶级社会里，革命的阶级对社会的认识，从来都比反动阶级的认识更正确一些。在统治阶级内又有不同的派别经常打架，有比较进步的，有比较反动的。进步一点的派别认识比较全面，反动腐朽的那一派思想必然是荒谬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就比封建地主阶级的认识要正确，眼界要宽些。所以，人的认识受阶级地位的限制。《实践论》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剥削阶级总是有一定的偏见，所以，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社会科学从来没有很好建立，没有一个系统的社会历史知识，只有对社会的某些问题有正确的观点。因为无产阶级

出现以前，掌握知识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奴隶的文化太低，没有条件总结经验。剥削阶级因为专门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可以总结一些自然经验、社会经验，可是他们是依靠剥削阶级的，是为它辩护的，所以从来没有全面的社会知识，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科学体系。19 世纪末，英国的经济学比较接近社会科学，但也不完全科学。

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只有到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才有。无产阶级从事大生产，眼界很宽，他们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社会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能够创立社会科学，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所以，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要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搞阶级斗争。出身有一些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决定的东西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保证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毛主席不管在哪一篇文章里，绝不一般地讲实践保证我们正确认识，而是讲要保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剥削阶级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又不参加生产劳动，所以他们要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是很困难的。自然科学可以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实验室里搞；同时，由于剥削阶级本身的需要，他们可以掌握自然规律，比如美帝国主义就可以掌握原子能等很多尖端科学知识。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资产阶级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来总结生产经验，进行科学试验，所以，他们也能搞改造自然的斗争，不过也受一定的限制。

我们以前要搞民主革命，自然知识对我们的需要不是太大，当然战争也需要现代化的自然知识。但那时需要最大、最迫切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同了，我们在生产上、科学技术上，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自然知识的需要比过去大得多，因此参加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革命实践，当然阶级斗争是我们向来坚持的革命实践。

在《实践论》里，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特点，就是阶级性和实践性。阶级性就是党性，实践性就是革命性，而党性和革命性又是一个东西。

实践有两种，有革命的实践，也有反革命的实践。反动派的行动也可以说是实践，因为这也是阶级斗争，但那是反革命的实践。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从革命实践中来。革命的实践有两种：一种是对自然的革命，就是生产、自然科学的实验；另一种是对社会的革命，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阶级斗争。这里就有个立场问题。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有分析的，讲阶级斗争是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实践。从历史上看，剥削阶级

是有偏见的。因此，剥削阶级不能帮助我们对社会取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有可能对社会取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在今天来说，我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参加革命实践才能做到，不参加实践，就看不见今天的英雄，只有参加实践，才能看到。《创业史》这部小说为什么发生争论？作者在农村中长期生活，看到了农村中最先进的人物，写在小说里。批评家没有看到这篇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没有在农村中长期生活过，所以争论。谁对？还是作者对，作者看到了这样的英雄人物。你只要到农村去生活一个相当的时期，你就会看到比中间人物高明得多的人物，而且这种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相当多。为什么毛主席说：“遍地英雄下夕烟”，农村里确是遍地英雄。赞扬中间人物，有中间人物思想的人，就不认为是遍地英雄。谁正确？毛主席正确。如果不是遍地英雄，我们的困难怎么能克服得这样快？生产怎么能搞得这样好、这样快？抗美援朝如果不是遍地英雄，怎么能顶住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朝鲜是遍地英雄，随处可以找到英雄。写这种英雄，是不是面就窄了？一点也不窄，英雄多得很。在革命高潮、阶级斗争高潮的情形下，有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有特性、个性，你如果真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个性，面就不窄，而是很广。《水浒传》就有 108 个英雄，那还是封建时代，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一部作品就可以写出那么多。今天的英雄为什么面还会窄呢？这种问题争论要得到解决，还要到实践中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思想在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充分发展了、具体化了，把这种思想变成实际工作中的武器、人人能掌握的武器。我们学习《实践论》，就要学会掌握这个武器。

3. 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实践论》全面而又深刻地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更清楚地说明了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了一句话：人的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81 页）。列宁说了这句话，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把这句话写了一篇文章，具体地告诉我们如何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人的

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虽然讲的很简单,但有新的发展。

认识是从实践来的,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但是,认识怎样从实践来?认识怎样依赖于实践?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就是辩证关系,就是互相转化的关系。实践转化为认识,变为认识;认识又转化为实践,又变为实践。这就叫做互相转化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是两个飞跃的关系,就是由实践向认识飞跃,这是第一个飞跃;然后又由认识向实践飞跃,这是第二个飞跃。互相转化是由两个飞跃构成的,这个思想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又有了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加了一点东西,除由实践变为认识,由认识变为实践外,又加了两点:由物质变为精神,由精神变为物质;由存在变为思维,由思维变为存在。实际上,这种提法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另外两个方面,把《实践论》里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展了。事情是一个事情,但是提法又从新的角度上展开了。为什么要有这种发展?为什么要进一步从另两个方面再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这不仅不是字面上的问题,不仅是话多讲两句的问题,而是概括了一些新的经验、新的问题,从实践问题一直到理论问题。

我们讲的两个飞跃,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都是能动飞跃。《实践论》上有两句话:“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能动”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平常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包括这两个方面。人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能动和被动消极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叫做“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了这个名词。这个提法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这样提过。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都叫反映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唯物论有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论没有注意到认识的能动性,他们不知道有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了解这一点的,实际上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没有使用这个名词。毛主席明确地用了这个名词。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是名词问题,但这是一个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突出地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需要很好地了解。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有能动性，他们总以为人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外界的东西，像镜子一样。镜子反映周围的东西，只能反映表面，有什么反映什么，是消极的，它自己对外界的东西不能有创造性。照相也是这样，有什么现象就照出什么现象，反映表面的现象。人类的认识不那样简单，不像镜子、照相机把表面的东西反映就完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完全用镜子、照相机来做比方。但是从前的唯物论是这样了解的，认为人的主观像一面镜子。外国哲学家认为人的心像一张白纸一样，外界有什么影响，白纸上就有什么反映。事实上，人的认识不是这样简单。人的认识是能动地反映客观的，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所谓能动的飞跃，就是人的主观不是简单地把表面现象反映进来，不是看到什么反映什么。人的思想有一种能力，能动地把假象、不重要的东西丢掉，把本质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抓住。现象不一定暴露本质。我们眼睛看到的東西，耳朵听到的东西，是不是事实？不一定，有的是事实，又可能是表面的事实，不一定是本质。本质是靠感性认识抓不到的。在感性认识中，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真的假的都有，有一些现象就是不能反映本质。

讲一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能不能互相转化的问题，有没有存在变思维、思维变存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的问题。肯定思维和存在有这种相互转化关系的，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主张有同一性的人，就是承认有互相转化关系，因为同一性就是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意思。辩证法讲同一性，不是讲两个东西完全一样，而是讲两个东西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承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要肯定思维与存在能够互相转化，肯定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思维和存在有这种同一性，有互相转化的关系。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在这理论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要不要承认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主义建设里，要不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要不要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客观规律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认识要反映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忽视客观规律，问题是我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就要充分利用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我们的认识变成行动、变成物质。这一点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最重要的。

一切革命斗争，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自发地产生。

从前的社会，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封建社会中，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人脑子里先想到过有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先认识了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资本主义制度。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在封建社会中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这样子，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自发地产生，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出现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者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是骗人的。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印度的国家资本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垄断资本，跟从前蒋介石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是一样的。其他英国、日本都有国有制的经济，但是那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国有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国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广大的干部、群众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如果自觉性削弱了，如果一个国家无产阶级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放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放松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面的经济还可能回到资本主义。农民有两重性，按照他自发的趋势，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如得到无产阶级领导，他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不但农民如此，甚至工厂里也是这样子，工厂里，党如果不抓紧领导，如果马克思主义削弱了，个人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那样一来，工厂里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的东西，贪污盗窃呀，投机倒把呀，本位主义呀，就会出现这些活动。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间，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应该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提出政治挂帅的原则。政治挂帅的原则，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坚决用精神来改变物质，使思维变存在。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有一个发展的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篇幅虽短，但概括了重要的经验，回答了重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实践论》，研究毛主席关于实践的两篇哲学著作，要着重了解两个飞跃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两个飞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实践论》分三个部分讲，

但其中的核心，就是两个飞跃问题。毛主席在这本著作中写得最多的，用篇幅最多的，也是两个飞跃问题。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变认识，实践向认识的飞跃，同时就是物质变精神、存在变思维的飞跃。飞跃的过程主要就是这样的内容：通过实践，对我们来讲，就是通过革命实践，通过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首先由我们的感觉器官对物质世界、客观世界，取得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直接由感觉器官一眼、耳、鼻、舌、身五官得到的。

毛主席解释说，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睁开眼睛看一看，用耳朵去听一听，用鼻子嗅一嗅，用舌尝一尝，用自己的皮肤接触一下，认识必须首先通过五官得来的。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提出用眼、耳、鼻、舌、身，很有意思。提一下很必要，因为我们有些人做了官，这些器官都不使用了。

在实践当中，通过五官，直接得到一些关于外界物质存在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并没有实践飞跃。感性认识只是初步的认识，要实现实践到认识的飞跃，就需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第一个飞跃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为什么感性认识不能算是实现的飞跃？其原因，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感性认识只能给我们对外界的表面的认识、局部的认识。感性认识有时是一些假象，有时感性认识是会骗我们的，因为它是表面的、局部的。单凭感性认识，对事情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比如我们参加革命斗争，最初的时候，革命力量总是比较小，总要碰到困难，甚至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单凭感性认识，不可能认识到敌人是一定要垮的，革命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单凭感性认识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甚至在感觉方面，还感觉到革命势力是站不住脚的。凡是在最艰苦的情况里，参加革命的人，会有这种感觉的。年轻一点的同志，就没有这种经验。年老一点的同志，参加过与反动派斗争的人，会有这种经验的。抗日战争，1941年最黑暗的时候，从感觉上看不出是可以胜利的。还有原子弹，单凭感觉来看，不能看出它是纸老虎。你看它那影片，原子弹爆炸之后，破坏力不是很大么！凭感觉来判断，你就不能说它是纸老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原子弹做出纸老虎的结论，单凭感性认识是不行的，那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有的同志问：经验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没有总结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经过总结了经验是理性认识。我们讲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就是经过总结了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总结了的经验，是理性认识。我

们一般所讲的经验还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中有没有包含理性认识?有时候是交错的。我们平常做工作取得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但是我们工作中也有理性认识,因为我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来做工作。所以,我们的经验当中包含了一些理性认识。事实上,纯粹的感性认识是没有的。我们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分开,是为了把这些关系弄清楚。要承认我们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总结才能变成理性认识。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最重要的内容,最根本的规律准确地找出来。

有的同志问,错误的认识算不算飞跃?我说错误的认识也可以说是飞跃的一种结果。错误有部分的错误,有完全的错误,有主要部分错误,有次要部分错误,所以错误的认识也是第一个飞跃的一种产物。不过,错误的认识没有完成飞跃的任务,没有实现飞跃的目的。第一个飞跃是要取得正确认识,可是,有时可能不正确。不正确的认识来源有种种,来源之一就是立场根本不对,那就会产生根本错误的认识。如果立场是对的,你也可能会出错误,这种错误有种种原因,或者是材料掌握的不够就作结论,或者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没有完全弄清楚等,但只要不是根本性的错误,通过实践的检验,改正错误,可以逐渐取得正确的认识。

我们研究认识论,要研究怎样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不要单凭一些片面的、表面的感觉,就对问题下结论,要避免这一点。学第一个飞跃,就要学会解决这个问题,要懂得实践变认识,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就达到了物质变精神,存在变思维。怎样才能实现这个飞跃?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讲得很清楚,主要的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不要抓住很少一点材料,就来分析问题。第二就是在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以后,对这些丰富的材料还要进行加工改造。所谓“加工改造”,毛主席指出了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四句话。

要实现物质到精神的飞跃,第一,要有大量的材料,不要随便抓住一点,就做结论。我们平常很容易随便看到一点,就轻率的下论断。我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农村、在城市,随便看到一点,就轻易地做出自己的论断。这种情形,对我们没有帮助,只能使我们犯错误。所以,对待任何问题,我们首先要搜集大量的材料。

为什么毛主席一定要我们参加革命实践呢?为什么我们去作一个观察家,走马观花一下不行呢?因为参加革命实践,才有可能掌握比较丰富的材料,特

别是掌握真实的材料。你如果要了解农民的生活，而你不能多少在生产上或阶级斗争中和他站在一起，你就不可能从农民口里听到真实的声音。身体好的最好和他们一起劳动；年老的，身体不好的，不能和农民一起劳动，也要跟农民站在一起。他相信你了，他就告诉你“心里话”，那你才可以得到真实的材料。大量的材料从哪里来？大量的材料要从群众中来。一个人的感性认识是有限的，我们认识问题，自己首先应有亲身的感性认识，但是单是个人的感性认识不够，还要集中群众的感性认识。向群众学习，毛主席自己讲甘心在群众面前当小学生。因为有许多群众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毕恭毕敬地向群众学习，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特别是如果自己有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了架子，到群众中去，你永远也看不出群众中到处可以发现的英雄人物。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也是认识路线。要跟群众很好联系，才有可能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这是第一条，取得大量感性认识的方法是要在革命实践当中，联系群众，有了大量的材料，就比较好办了，就是加工的问题了。

要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第二，还要对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加工的方法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四句话。这是辩证法的方法，分析矛盾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对正确的不正确的加以分析，然后着重掌握比较重要的材料，或者是比较典型的材料，不很典型、不很重要的材料可以放弃；除此而外还有真实材料、假材料、真象、假象，也要“一分为二”。感性认识不都是骗我们的，感性认识使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现象分两种，一种是假象，一种是真象。这是对现象的“一分为二”。到一个农村里碰到群众，他跟你谈话就有两种，一种是假话，一种是真话。要从贫下中农口里得到一些真相，就要费一点力。你到那里去，他要观察你，看你表现怎么样，看一个时候，他才能够说出真心话。所以要有大量的材料，要“耳顺”，就是说，正面的话也听，反面的话也听；“要眼明”，要多看，仔细看，看各种现象，看得比较多了，然后再比较。经过比较、分析，然后再去伪存真，把假象毫不可惜地丢掉，着重抓住真相。

有了重要的材料，又有了真的材料，就容易解决问题了。把材料加以分析，分析这些材料中所包括的各方面事物的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表面和里面，这都是些矛盾，凡是不同方面，都是有矛盾的。农村有富裕中农一面，贫、下中农一面；又有农民一面，地主、富农一面；还有干部一面，群众一面。工厂里，领导和群众，也是这一面，那一

面；群众里也有不同的成分。同样是工人，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有出身于血统工人的，有出身于农民的，也有坏分子钻进来的。此一面，彼一面，就是这些方面的矛盾的相互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加以研究。表面和里面，就是要研究有些人的表现和他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某些现象和实质的关系。掌握了大量材料，加以分析、研究，把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弄清楚了，就是理性认识。所谓总结经验，就是把问题各个方面的关系弄清，提高到理性的认识。所以物质变精神，或存在变思维，也就是通过感性认识，加以分析，把物质或存在中间各个方面的矛盾关系，反映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就是物质变精神。

在科学上，精神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方法；在文艺上就是用典型的形象，但是过程是类似的。科学，就是把感觉提炼为思想，把在物质、存在中所得到的感觉材料，提炼为理论。文艺，就是要把从生活里面所得到的那些初步的艺术素材，提炼为典型的東西。两者都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把物质变成精神，把存在变成思维。没有这个过程，也可以飞跃，但是会变成错误的飞跃。随便看到一些现象，就下判断，就形成概念，就推论，一定要发生错误。看到一个原子弹破坏力那么大，于是就做出这样一种概念来，以为原子弹就是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力量，原子弹一出现，人类就要灭亡。这就是抓住表面的、片面的现象，随便作判断，随便作推论。这也是飞跃，但这是错误的飞跃。我们要求的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要正确地实现认识飞跃。要实现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严格地贯彻毛主席讲的这两点原则，第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第二对大量的材料还要加工改造，根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原则进行加工改造，这样子就可以取得初步的正确的认识。为什么说是初步的？因为尽管严格地贯彻这个原则，但是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完全正确，还不能自己证明，思想不能证明自己是否正确。思想是否正确，不是由思想自己来证明。要证明思想是否正确，那要再回到实践中去证明，所以还要有第二个飞跃。

第二个飞跃，在《实践论》中讲得很清楚，就是把我們主观认识拿到实践里去加以检查、执行。经过检查，原有的思想，可能需要部分改正，可能需要全部改正，也可能基本上不用改正，但还需要补充、发展。第二个飞跃是把人的思想拿去变为实践、变为物质，拿思想去指导实践。这一飞跃同时也是对我们思想的检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对第二个飞跃的思想，比《实践论》有了发展，毛主席说：“这次飞跃，

比起前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在学习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要深刻领会这句话的精神。为什么第二个飞跃比第一个飞跃的意义更加伟大呢？这篇文章也说得清楚。主要有两点：第一，只有经过第二个飞跃，才有可能证明我们的思想是否正确，思想本身不能证明自己，只有在实践中经过第二个飞跃，才能证明；第二，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不是为认识而认识，满足于自己的认识，满足于自己知识丰富，欣赏自己的这些知识，不是这样的，而是为了革命地改造世界。

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把认识当做一种欣赏的东西，文艺界不是有一种“无差别论”么，就是说文艺没有利害关系，说我们搞文艺，就是为了达到一种“无差别境界”，没有什么斗争要求，没有目的。无差别境界是资产阶级思想，无差别就是无利害，不是追求什么，只是为了欣赏，为了简单地满足主观娱乐的要求。“无差别境界”实际上不是什么新思想，而是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就有的一种思想。这种观点，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是德国的康德，康德提出“无差别境界”，比较完整提出一套资产阶级美学理论。科学上也有这种观点，哲学上也有这种观点。刚解放时，我遇到北京大学讲康德哲学的一位教授，他很愿意进步，但是他自己表白：“我就是有点舍不得放弃康德哲学。”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是一种享受呵！我讲康德哲学是一种享受呵！”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如果读康德哲学，恐怕读了会头痛的，而那个哲学家，他钻到那使人头痛的玄学里面，会感到是一种享受！资产阶级在文艺上也长期主张文艺是纯粹的一种享受，用这种思想来与马克思主义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就有一个思想反动的人，钻到我们里面来，主张反对功利主义，散布了这种观点，有一个时期，也迷糊了一些年轻的搞文艺的同志。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谈到功利主义，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认识世界，是有功利的目的，功利主义不一定就是坏的。资产阶级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他们才是最坏的功利主义，用反对功利主义，来掩盖那种最恶劣的功利主义。我们公开讲功利主义，但是我们的功利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功利主义。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改造世界。我们认识世界，就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再扩大一点，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造整个世界，要实现世界革命。要改造自然，也要改造社会。要改造自然，就要对自然界革命；要改造社会，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使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我们认识世界，就是要把我们的认识变为物质力量去改造世界。这个意义就比第一个飞跃意义更大。

今天的无产阶级跟过去的人类不同，过去的人类改造世界，是很不彻底的。历史上发生的革命，也都是不彻底的。今天我们要把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加以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造。所以，在今天来讲，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认识变实践的意义是大得不可估量的，我们要充分了解这个意义。解放军有这样一个口号，就是思想里经常要有枪杆子。我们要学习解放军，做任何工作时，思想上都要有枪杆子。我们要改造世界，消灭敌人，消灭阻碍我们改造世界的敌人。搞科学，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搞文艺工作，我看也要抱着这个目的。搞文艺工作，思想上也要经常有枪杆子。我们创作是为了什么？为了建立我们所要建立的东西，同时也要打倒我们所要打倒的东西。这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搞科学、文艺的人，都是做上层建筑的工作，就是做思想、精神的工作。所以特别要重视这一点，要考虑我们的精神产品，能不能变为物质，能不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的东西，拿到实际工作中去，不能成为这种力量，那么就应该对我们自己的工作进行改造。第一是要改造世界，第二是要通过改造世界，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够质量，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如果在实践当中起了消极的作用，不是变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是成了阻碍世界改造的力量，那就说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创作是错误的、不好的，应该及时改造。

有一个大家常常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在社会斗争中，有时候思想是正确的，但因为力量对比相差太远，还是会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阶级斗争和自然斗争不同，斗争对象是活的人，主动权不是完全由我们掌握的，我们有能动性，对方也有。有的同志说很难找这样的例子。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巴黎公社这个例子，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例子还是适当的。因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正确的，但是失败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没有搞之前，就先说清楚了，说巴黎公社如果搞起来必然要失败，因为力量对比不行，这是冒险的。等到巴黎公社搞起来以后，马克思认为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斗争，对工人阶级的损失会更大。他的意思是说，不斗争，那就是使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使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受到腐蚀而丧失战斗力，这种损失比流血失败还要大。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要失败，主要讲的是力量对比，不是说斗争不应当。马克思的态度同机会主义的态度相反。机会主义者认为本来就不应当

斗争；马克思认为斗争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力量对比不行，失败也是必然的。巴黎公社是有一些错误，后来马克思在总结经验中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例如对敌人太慈悲，没有很快地向凡尔赛进军，没有没收银行，没有注意联合农民等等，但是根本的东西、主要的东西是正确的。如果这些错误都避免了，全部正确，巴黎公社是不是能够胜利呢？也不一定。因为他没有经验，不能不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全部正确，巴黎公社是不是能够永远维持下来？如果不犯错误，可能延长一些时间，不会失败的这样快（只有两个月），可能延长一年两年，可是按照当时的时代条件，还是要失败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时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一个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巴黎公社，我们要看主要的东西，主要是正确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是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失败，不是由于路线的错误而失败。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力量不够，所以失败了。

由此类推，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都是这样，如俄国的 1905 年的革命，中国的广州暴动。广州暴动可能有些错误，但不斗一下是不行的。群众要斗，党也要斗，不斗也不行。泼冷水行不行？泼冷水是根本错误。斗了失败，也是正确的，长了自己的志气，给敌人以震动。广州暴动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具体例子。例如搞地下斗争，秘密暴露，被敌人抓住了，到了法庭，敌人审判，你斗不斗？一定要斗。斗了要杀头，不斗就投降，哪一条路正确？当然斗是正确的。斗了之后杀头，个人生命丧失了，但是他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事情做得正确，但是因为力量对比不行，就可能暂时失败，个别失败，社会斗争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对社会斗争的认识正确不正确要长期检验，反复检验，不是一次检验可以看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只从一次实践做结论。普列汉诺夫对俄国 1905 年的革命就是这样，他埋怨说斗争本来就不应当。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给了严厉的批评。

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提出，怎样理解能动性和主动性的关系？能动性和主动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持久战》20 节里讲能动性，78 节里讲主动性。能动性不等于主动性，因为反动派也有能动性，但它不能正确发挥，他不能掌握正确思想，它的行动不能促进世界的发展。它有能动性，但它不能掌握主动。思想错误的人不能掌握主动性的。工作中、战斗中要掌握主动权，就是要正确地发挥能动性，要正确地指导、正确地指挥。主动性是由正确地发挥能动性来的。毛主席特别强调主动权是跟指挥的正确与不正确分不开的。他说：“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就是说，指挥正确了，就会在战争当中掌握主动

权；指挥错误就会被动。指挥正确就会得到优势，指挥错误就会失去优势而成劣势。优势和劣势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优势和劣势，就是双方军力的对比，力量大的就是优势，力量小的就是劣势。但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能动性而取得优势和劣势。如果客观比较劣势，但由于发挥了能动性，也会得到主动性。例如，过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力量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就处于优势，我们就有主动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把客观的劣势变为优势，可以掌握主动权。要紧的就是两个飞跃能不能掌握的好。第一就是在实践中调查研究搞的好，正确地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正确运用两个飞跃，就能够掌握主动性。

精神变物质，要通过一个环节，就是要通过群众。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这就是说，先进阶级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自然和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精神变物质，要通过被群众所掌握这个环节。毛主席经常讲，我们搞哲学，就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和课堂走出来，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群众掌握了某个哲学观点，用来指导他的行动，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群众学会了“一分为二”，对自己的工作、生产“一分为二”，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这样就能够发扬成绩，勇敢地改正缺点，这个力量就大得很。

我们的文艺工作，也是通过群众，使群众受到教育，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变成物质力量。一个思想只在课堂里讲一讲，是不会改造世界的。文艺只在一个沙龙里念一念，也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但是一个革命的文艺作品，如果拿到群众中去，被群众掌握了，那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李双双》在农村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许多好的文艺作品，也在农村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只在农村，在工厂也是如此，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也如此。首先要改造群众的思想，好的、正确的思想被群众所掌握，就改造了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思想改造了，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改造世界。这样就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革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学习《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要特别重视第二个飞跃。我们做的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我们就要经常考虑，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产品能不能很好地变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能不能被群众所掌握，然后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个问题要经常摆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也就是思想上要有枪杆子。

这个问题是中心问题，讲得多一些。

4.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中，关于认识的总规律，是从两方面来表达的。毛主席在《实践论》的最后一段话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认识的基本过程，是两个飞跃；但是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就不只是两个飞跃，总的说，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没有止境，每一次往复都使人的认识更提高一步，每一次循环，都更丰富、更深刻。有没有尽头？有没有一个最后的认识？没有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一个最后的认识。任何时候，人的认识总是可以发展的，人的认识不能停顿。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认识已到顶，那就是形而上学，有了这种认识的人就没有出息，就不能前进，就没有前途了。

这个总规律，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又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也是认识的总规律。这是对《实践论》提出的总规律的一个补充。《实践论》只是讲，一般人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时候没有尽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又补充了一段，就是对一个正确的认识来说，也可以相对地有一点尽头，就是经过多次实践，可以得到完成。

认识的总规律，也表现在毛主席最近讲的一段话中，这段话，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是有矛盾的，阶级社会中有矛盾，阶级消灭了，还有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解决，解决了矛盾，就前进一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产生，还要再解决，再前进。有矛盾，就有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解决了问题，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我们党中央在1963年底提出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认识到头了，生产到顶了，不能发挥潜力了。这些观点都是形而上学，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规律的。

人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要相信这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你能不能经常参加革命实践，经常参加革命实践，你就可以经常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第一次实践，来一次认识和实践、思维和存在的互相转化，你就可以前进，每次反复，都可以有所前进。毛主席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大家看看他的著作，从《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思想不断地发展，《毛泽东选集》是按历史实践的年限来编的，在历史的反复中间，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的著作还没有全部出版，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发展，我们是很清楚的。

我们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是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的，党由 1921 年成立，最早到 1935 年遵义会议，全党开始承认毛主席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经过十几年在全党主要干部思想上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认识；到 1945 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全党在毛主席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全党从 1921 年到 1945 年，经过二十多年才完成了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完成了这个认识，对全党起了极重大的作用。1945 年开七大，1949 年全国就解放了。对民主革命的正确认识完成了。正确的认识为全党掌握，为人民掌握就形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已经有了许多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农村、工厂在发展，原子弹爆炸这样快，世界上有些尖端的产品，我们也做出来了；其他各方面也将赶上世界水平。现在是是个别的，将来就变成普遍的。艺术上也是这种情况。艺术上也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总结。一个认识、一个创造都是要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我们现在的戏，就是要反复修改，这也是符合认识的总规律的。

由前面讲认识过程的问题，自然就提出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问题，这跟总规律有关系。所以，也很容易解释。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实际上不太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所认识到的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

所谓相对真理，就是讲人的认识受历史限制。人在一定的世界发展阶段，只能认识这个阶段所能够认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天才，但是他们没有接触到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对抗非对抗的问题，列宁只说过一句话。这说明他们即便是这样的天才，认识的东西也是相对的，只能认识到历史条件允许他们认识到的东西。他们认识的东西不少，《列宁全集》

那么多卷，可是是相对的，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在那个历史时代又是最正确的、最全面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的发展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最正确的，所以是绝对的。什么叫绝对真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真理就是绝对真理。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绝对真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都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斯大林就差一点，有一部分著作有错误，那就不是真理。但是，斯大林主要的东西还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

马、恩、列、斯的认识，毛主席的认识，只能是又绝对又相对，不能纯粹是绝对真理。因为它是客观真理，所以是绝对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不断发展的，没有一个时候停顿，所以又是相对的。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件事，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是永远发展的。从客观真理这方面来说，人总是可以用科学的办法把握客观真理。从客观真理永远是发展的来说，个人永远没有办法把握全部客观真理。即便是最高的天才，也只能把握绝对真理的一个发展阶段。所谓相对真理，就是指个人所把握的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阶段。所以，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开成两个东西。从一方面讲，它是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它只是一部分，是无限发展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又是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都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都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纯粹的、最完全的绝对真理，人有没有可能把握？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可能靠一个人或一代人来实现，要靠整个人类无数代人不断继承下去。因为每一代人所了解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因为是它的一部分，所以也是绝对真理。

客观真理的本身，人的认识内容(只是内容)，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许多自然科学的例子，有的举社会科学的例子。比如声波的频率，每秒钟 130 次就能听见，是不是绝对真理？又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是绝对真理，还是相对真理？这两个例子还是可以说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当然是正确的规律。但是，它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只能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是相对的。你不能讲自然界，比如蜜蜂，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蚂蚁也没有这个问题。它只能应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是相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它是宇宙物质发展到人类阶段才会出现的规律。没有这个阶段以前，就没有这个规律。将来会不会取消这个规律，这就不能下判断了，这是几万万年以后的事。只要人类存在，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矛盾

还会有。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几万万年以后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没有出现以前没有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对整个宇宙来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规律，所以是相对的。但是这个规律又是绝对的。为什么？只要宇宙中存在人类，就一定有这个规律。如果地球以外的某个星球上，也有人类社会的这种组织，就一定也会有这个规律，所以这个真理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一种规律都是这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拿一个最平常的例子讲，水到摄氏一百度就要沸腾。这是个规律，是不是绝对的，有没有一点相对性？你要到珠穆朗玛峰，就不是这样。在西藏高原上，水到六七十度就沸腾了。所以是相对的。可是，这个规律又有绝对性，不管宇宙哪个地方，只要那里有一个大气压，水一定要到一百度就沸腾。不管是在火星、地球，也不管几十万万年以前，或者几十万万年以后，只要有一个大气压的条件，永远都是这样。不能把这只说成是绝对的，也不能只说成是相对的。一种规律总是一定条件下的规律，这是它的相对性；有了这个条件，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可以出现，这就是它的绝对性。一般的社会规律、自然规律都是这样。

有的同志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绝对的。因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只能绕太阳转。但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在宇宙中只是几十万万年以内的事，所以又是相对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规律，不到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都不行。凡是规律都是有条件的，所以是相对的；有这种条件，一定出现这个规律，所以是绝对的。因此，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还有一些最普遍的规律，比如对立统一，一切事物都会发展变化，这些算不算纯粹的绝对真理？也还不能这样说。就它们是最普遍性的规律这一点来说，是绝对真理，是无条件的。到处都是一分为二，所以，它的绝对性大一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矛盾（一分为二），都不是抽象的，没有纯粹普遍性的东西存在，任何一个事物里的矛盾都是具体的。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固然是矛盾，可是它是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是人民之间非阶级的矛盾，和动物生存竞争矛盾也不同。对立统一规律总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存在一个纯粹的、抽象的对立统一规律。普遍的东西不会独立存在。比如人的概念，有老人、小孩、男人、女人。能不能找到一个既不是男人女人，也不是老人小孩？这是找不到的。当然，也有个别的是不男不女的，但是也有

老小的区别。这是人的自然特征。如果讲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人，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人，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纯粹的对立统一。这些规律显然是最普遍的，但是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一定的特殊形式。毛主席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就是这个道理。找普遍性总是在一个一个的特殊性中去找，把它们共同点概括起来就是普遍性。普遍性包含在一个一个具体的特殊性里。对立统一规律的绝对性很大，是最普遍的，但是实际出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的对立统一规律又是具体的。以前，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研究矛盾，是人民和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研究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后还要着重研究人民内部矛盾。所以，矛盾规律的表现也是有条件的。凡是真理，本身既是有条件的，又是绝对的。真理本身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人的认识也只能按照它的特点去认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普遍性固然是绝对性的一个表现，但是普遍性不能独立存在，一定是寄托在一定条件下的特殊性里。所以，任何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实际表现出来，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相对的。相对真理是整个宇宙的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

人类能不能把绝对真理完全认识得一干二净，能不能穷尽绝对真理？我们的答复是不能穷尽的。人类世代代传下去，知识会不断增长，但是要穷尽世界，从此不要思考，这一天是不会有。为什么？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不会穷尽，宇宙不会穷尽，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不能穷尽，头脑的认识怎么能够穷尽？有人问：绝对真理人能不能认识？绝对真理可以认识，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认识，如此无限发展下去，就能越来越多地认识绝对真理。但是，要把绝对真理认识得一干二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绝对真理在现在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出现。比如人类没有出现以前，就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规律。即使“神仙”也不会发现这个规律，因为世界上没有。世界上有了，而后才能认识。共产主义社会有什么规律？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方向。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知道这个方向。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估计。人对将来的认识只能对大体的趋势作一个估计。马克思研究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知道矛盾斗争的结果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有什么具体规律，马克思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比马、恩、列、斯的认识多了一点，确实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究竟还有什么规律，我们认识不清楚，只能把现在能够认识的规

律最大限度的摸清楚。我们能够估计到将来大体的发展方向，因为客观事物有这样一个趋向。抗战的头两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把抗战八年的大体过程估计到了。这是因为抗战八年的过程和抗战头两年的矛盾有联系。现在没有出现的矛盾，我们就不能估计。所以，要完全穷尽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天比一天认识得更多，接近绝对真理，这是可能做到的。

有同志问，战争规律有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跟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差不多是一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真理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即客观存在的物质规律，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本身没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事实。阶级性的问题是在这个规律反映到人脑里的情形下才提出来的，是讲对规律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这就要涉及到阶级的问题。因为这不只是客观事实问题，而是客观事实被人掌握的问题，所以就要谈到阶级性问题了。

真理，从内容来讲，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主观意识不能任意改变它，你要想它不那样不可能。帝国主义一定要垮台，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世界一定要发展，妇女一定要生小孩，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从真理的客观内容来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不为阶级意志所左右的。另一方面，真理又有阶级性。真理也可以一分为二。从真理的认识和运用来说，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真理能掌握多少，是受阶级影响的，运用也是如此。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可以说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掌握。例如物理学、化学，资产阶级可以掌握，无产阶级也可以掌握，可以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理论来全套地掌握。自然科学是自然界规律的系统反映，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人认识了才叫真理，人不认识就叫客观规律。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因为各阶级都可以系统地掌握它。所谓掌握，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能够认识它，另一方面又能利用它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掌握不是认识就完了。要掌握它就是要拿到手里能够用它。为什么目的应用？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比如原子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可以认识，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可以认识。区别在于愿意不愿意认识，这些是受阶级利益影响的。自然科学知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需要，但是也可以分析。有些自然科学，资产阶级不愿意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自然科学要求的程度是不同的。资产阶级考虑它的利润，有些发明创造妨碍它赚钱，他就收买发明权，放置不用。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科学才有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运用是

完全有阶级性的。原子弹，我们是用于防御，资产阶级用于讹诈侵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在认识上就有阶级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有一点有阶级性，就是各阶级掌握自然规律应用的方向可以不同，各阶级是按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应用的。这一点要讲清楚。如何掌握自然科学，并应用在什么方向上去，就这一点来说，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科学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社会规律作为客观事实来说，其本身也是无所谓阶级性的，但是，这个事实反映成人的思想，就有阶级性了。所以，社会科学真理本身是有阶级性的，它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是每个阶级都能同样系统的掌握的。譬如《资本论》关于经济学的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不能掌握。他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部分、某一个方面的规律，在不妨碍它的阶级利益方面，还可以发展它的科学。但是，像资本主义的总规律，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对于资本主义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就不能掌握。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利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材料，肯定了他们一些对的东西，但是他那个体系跟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所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各种反动阶级，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完整地加以掌握。部分地他觉得对他有利的还可以掌握。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演变这方面的规律，美国的杜勒斯就认识到了。现在美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政策是杜勒斯制订出来的。杜勒斯是资产阶级很厉害的政治家，他看出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和平演变的方法来把它搞垮。有这一方面的规律，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规律，只是一个方面的规律。这方面对他有利，他就会掌握。至于和平演变虽然会出现，但是一定会被克服，这一点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他不承认这个规律。他总是往他那一方面想，认为资本主义总可以保存下去。

战争规律也是这样。客观事实本身无所谓阶级性不阶级性，但是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变成学问、变成理论，就有阶级性了。我们有我们的毛泽东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资产阶级不能掌握。我们掌握的军事科学有些东西资产阶级军事学里也有，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封建时代就有人懂得。这是军事规律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部分的东西有时资产阶级也是能掌握的，不过掌握的深度有不同(我们的知己知彼用得很彻底，因为我们人民，特别是知彼这一点，任何阶级都赶不上我们)。但是，一个战争规律体系，成为军事理论、军事科学，这就有阶级性了。毛主席的军事科学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十大军事原则只有我们能够掌握，资产阶级知道了也不能掌握。

关于认识的总规律就讲这一些。

《实践论》的部分，讲完了。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主要是这几个问题，其他问题不是主要的，不必着重去研究。学习了这两篇文章，只要抓住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认识的总规律这三个主要问题应用到工作中就行了。其他问题，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认识无止境的问题。这是包括“认识总规律”中，了解了认识的总规律，就了解这一点。

第 27 章 学习《矛盾论》辅导报告

(1964、1965)

【见《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题注。】

(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

《矛盾论》这篇文章眉目很清楚，毛主席标了许多小标题，为了讲起来方便、并抓着要点，把几个问题合并了一下，讲以下四个问题。

1.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有的同志问：恩格斯对辩证法提出三条规律，为什么不能并列，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讲辩证法，讲三个基本规律。那时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把辩证法各个方面的规律讲清楚。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有联系，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吸收了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归纳起来，黑格尔的哲学最有价值的是三个基本规律。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加以改造，他没有着重讲核心。列宁特别突出地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这是一个发展。列宁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从实践中、斗争中来的。列宁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修正主义。当时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反对它的唯物论，一是反对它的辩证法，着重破坏它的对立统一规律。因此，列宁特别突出地讲对立统一规律。

毛主席的《矛盾论》，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列宁讲辩证法核心的时候，曾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需要说明和发挥”这句话，可以说是列宁在学习上的遗嘱。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说明、发挥这个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可以说是实现了列宁的遗嘱，系统地说明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问题。

所谓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其意思就是《矛盾论》上讲的，我们只要能够把对立统一规律本身各方面的问题弄清楚了，那就基本上懂得了辩证法。学辩证法，不要按照教科书那样，枝枝节节地学许多具体问题，不要泛泛地去研究三个规律和一些范畴，而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搞清楚了，其他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什么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就可以得到自然地解决。每个规律都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有关系的。比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实际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由肯定转为否定，由否定又变为新的肯定，就是否定之否定。今天我们在这里听课是工作，算是肯定，工作一天要休息，又转化为否定，休息完了明天又工作，又是新的肯定。这就算是否定之否定。肯定和否定互相转化，也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所以，辩证法的规律、范畴，都是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

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不能跟对立统一规律平列看待。其他的规律当然也是基本规律，但基本规律也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毛主席的著作着重发挥了列宁的上述思想。《矛盾论》里系统发挥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

要了解事物为什么发展，首先要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它的内部矛盾。事物发展的原因，不能说是量变到质变，也不能说是否定之否定。有些反对辩证法的人说：“辩证法就是否定的否定。”这是曲解。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事物的内部原因，除非你坚持形而上学，不承认世界上的东西会发展。如承认世界的一切都在发展，就得承认事物有矛盾，而且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承认这一点，事物发展就得不到说明。如果你说发展没有内部原因，而是外部来的，那就很危险，就有脱离唯物论而成唯心论，承认有神论、承认宗教的危险。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把整个世界发展看成为外来的原因，和尚、道士、牧师就可以钻这个空子说，整个世界发展是外来的原因，只有神仙、上帝才能推动世界发展。

所以，承认世界发展，要坚持彻底的唯物论，一定要肯定世界上一切事物自己本身有矛盾，而自己本身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因。事物发展是由自己内部力量，内部力量即内部矛盾。彻底的唯物论一定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辩证法就是要承认一切事物运动发展都是由于事物内部原因，事物本身的原因

而产生的，由事物内部的矛盾而产生的。没有矛盾，就没有动力；没有矛盾，还有什么发展？

如果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矛盾，自己的工作只有成绩，没有毛病，已经够了，那还怎样前进？没有矛盾，也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也就不能向前发展了。只有把工作“一分为二”，我的工作应当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改正什么，发展什么，然后才有可能看到我要怎样发展。一定要承认矛盾，承认发展，要“一分为二”；如果你不承认矛盾，不承认自己工作有矛盾，就会停止前进，甚至倒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就是因为不承认矛盾，不承认自己的工作有矛盾，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很多教训。

不承认矛盾，就不能前进。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原因，是发展的依据。毛主席在《两种宇宙观》这一节里讲得很清楚，任何时候都是承认事物内部原因是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原因；外因也有作用，但不能成为根据，不能起最后决定的作用；只能在某种条件、时间、某种情形下起某种决定作用，但不能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向。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内因。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外因，自我批评是内因。外因也是不可少的，批评是帮助，但是人的思想问题最后解决一定要靠自我批评。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批评，别人的帮助也不能真正起作用；如果有认真的自我批评，对于自己的进步就会起很大的推进作用。

所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主要是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在思想工作中，首先要抓内部原因，当然也不能忽视外部原因。

所谓矛盾是“一分为二”，矛盾是对立统一，因为矛盾是一个东西内部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开始用过“一分为二”的提法，“统一物分成两个部分”。毛主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观察事物、检查工作、解决问题，都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所谓“一分为二”就是暴露矛盾，看起来统一的东西没有矛盾，但是要把它暴露出来，加以分析。毛主席在合作化运动中把中农“一分为二”，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这个“一分为二”起了很大作用，过去认为中农是动摇阶级，而没有加以分析，现在把中农“一分为二”，对农村工作有很大意义。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我们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对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

党内的矛盾也是这样。团结—批评—团结，批评就是一分为二，第二个团结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团结。把错误分出去，然后才能真正团结。犯错误也是“一分为二”，一种是改正错误，一种是离开革命队伍转化出去，这都叫“一分为二”。我们党的历史也是这样，经过了两种“一分为二”，陈独秀分裂出去了，受他影响的跟他划清界限，跟党站在一起。张国焘几乎是一个人分出去了。发展是“一分为二”，是不断“一分为二”的过程，什么时候“一分为二”停止了，发展也就停止了。如果有人阻碍“一分为二”，就是阻碍事物的发展。

有的同志问，外因能不能起决定作用？凡是原因对结果都有某种决定作用。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着重讲内因的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最后的原因。外因也是一种原因。世界上的事物是联系的，问题不是决定不决定。外因如果没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就不叫原因了，就不起作用了。现在主要讲哪个是第一位的原因，这样提问题才好解决。毛主席讲内因是根据，是第一位的；外因是条件，是第二位的。条件有没有决定作用？我们常常讲，问题决定于什么条件。这样讲也不错。问题是外因能不能起主要决定作用？外因不能起最根本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外因不起决定作用，这是名词问题，反正它不是根本的。内因也可以说是条件，但它是根本条件。外因，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不管怎么大，甚至起深刻的影响，但它不是最后的。有些外因影响是很大的。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深刻的影响。这是不是外因成了最后的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外因虽然作用很大，究竟起什么作用，不决定于外因；结果怎么样，也要看它内部矛盾的转化。俄国革命对世界革命有很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引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土耳其革命，苏联用很大力量帮助土耳其的基马尔，土耳其独立了，结果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旧民主主义革命还很不彻底，现在的土耳其仍然是很落后的。中国同时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发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把俄国革命当做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吗？不能。不能说俄国革命引起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说促进了这个革命。中国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在于中国有比资产阶级先进的无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革命碰了许多钉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有各种各样的革命，譬如农民革命、改良主义革命、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人民懂得，所有这些革命都不行，连孙中山都知道旧民主主义不行。有了这样的内部基础，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就出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原因还是内部矛盾。现在中国革命对亚非拉人民革命的影响也是这样。中国

革命对不同的国家起了不同的作用，因为各国情况不同。所以，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被内因所接受。俄国革命经验被中国所接受，起了作用；土耳其没有接受思想帮助，只接受了物质帮助。批评起作用，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得靠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一个人犯错误，他的思想像赫鲁晓夫一样，你再批评也不能起作用。

外因和内因算不算一对矛盾？也可以算一对矛盾。因为是一对矛盾，就会互相转化。怎样转化呢？外因在一定范围内也可叫内因。比如西藏的解放，是我们把人民解放军开进去，帮助西藏的农奴取得解放的。解放军开进去，对西藏这一地区来说，是外因。但是，在国际上来说，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情，因而是内因，不能说是外因，如果说是外因，那尼赫鲁就同意了。内因和外因就是这样转化的。转化要有条件，条件就是外因。范围不同，内外不同。中国和外国，外国对我国的影响，是外因；但就整个地球来说，是人类历史内部的矛盾，是内因。对内因和外因的转化，一般地只能这样看。在工作中，有时要着重抓内因，有时要着重抓外因。在不同的时间内，着重点可以转化，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外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内因、外因也是讲的“一分为二”。矛盾的规律是“一分为二”的规律，这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们主要要掌握这个核心。掌握这个核心，还要注意下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普遍性是什么意思？《矛盾论》讲得很清楚：“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简单地说，矛盾对于世界一切事物都没有例外。如果认为世界上有哪一种东西有例外，那么，辩证法就不彻底。彻底的辩证法观点，就要承认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而且自始至终有矛盾，毫无例外。修正主义者有一种手法，可以叫做“例外论”。就是用矛盾有例外，矛盾不是普遍的这种诡辩来宣传修正主义。它一般承认世界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在紧要问题上否认矛盾。它承认阶级社会有矛盾，但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它一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又说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它可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又说今天的这种矛盾可以和解，矛盾变为乌有。这些都是荒谬的。

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矛盾就化为乌有么？毛主席说，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先进、落后的矛盾，还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而且还会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我们彻底承认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任何时候都有矛盾的。绝不能说可以有某种事情某个时候便没有了矛盾。

矛盾是不是完全普遍的？有没有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很早就有分歧。德波林学派就是认为矛盾不那么普遍。德波林的观点是：事物发展的开始没有矛盾，事物内部各方面只有差异，不是矛盾，矛盾是在发展到一定时候才有的。同时，事物发展到最后也没有矛盾，矛盾发展到最后就可以和解。既然可以和解，当然也就说不上矛盾了。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特别讲到差异是不是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说：差异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一事物发展的开始就有矛盾，就包含着矛盾，不过不太显著、没有激化罢了。从现象上来看，是差异，实际上是矛盾。一个阶级社会开始就有阶级矛盾，但是德波林学派认为只有差异、没有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有没有矛盾，德波林学派认为没有矛盾。马列主义者认为有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每一差异就包含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暴露出矛盾的性质。这个思想不是不重要的，而是很重要的。从差异里面看出矛盾是很重要的辩证方法。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的方法。毛主席的辩证法思想之所以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运用得非常出色。我们要学会善于从差异中发现问题，运用从差异中发现矛盾的方法，不是要我们抓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是着重抓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要抓主要的矛盾，从看来仅仅是差异的现象中抓住我们要抓的问题。

我们认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是有矛盾的。过去一般只是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有差别。我们肯定差异就是矛盾，就要肯定三大差别就是矛盾，所以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也有矛盾。这一点，苏联坚决不承认。现在苏联的一些哲学家的文章，说领导与群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只有差别，没有矛盾。我们要揭露这种反辩证法的思想，坚持有差别就有矛盾的原则。有差异的地方就有矛盾，问题是矛盾表现得显著不显著、激烈不激烈，激化的程度有区别。

很多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把自己“一分为二”，有成绩有缺点，有正确有错误。能不能说蒋介石、约翰逊、赫鲁晓夫，也是有成绩、有缺点，有正确、有错误？如果用不上这个公式，就想不通了，就认为“一分为二”完蛋了。这样的观点，还是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要讲清这个问题，必须

打破这个框框。“一分为二”是个方向，不是框框，是工作指南，只负责指出一条道路，至于如何分析，要看具体情况，对自己的工作是可以这样分的：有缺点，有成绩；有正确，有错误；有长处，有短处。对敌人就不能这样分析。对蒋介石、约翰逊、赫鲁晓夫就不能这样分析。约翰逊假和平真备战，是“一分为二”。赫鲁晓夫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对亚非拉革命假同情、真捣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是假团结、真分裂，这也是“一分为二”。这样分析，就没有问题了，符合事物的特点。修正主义是敌人，又是教员，不过是反面的教员。帝国主义、反动派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如此等等，这都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没有例外的；同时，不同事物有不同的“一分为二”。

承认矛盾普遍性对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们观察任何问题、解决任何问题，都得坚决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这个方法不能有任何例外，在任何时候不能有任何动摇。这在今天特别应该强调，因为对“一分为二”的方法动摇，是很容易发生的。

在形势的分析上，常常可以看到对“一分为二”的观点有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困难的情形下，只看到黑暗一面，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趋势。

对形势的估计，也有相反的情形：在顺利时就看不到困难了。在顺利时又能看到可能遭到的困难，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

再一种动摇的情况，是对工作不能“一分为二”。工作有了成绩，就看不到缺点；对自己只看到成绩，看不到缺点，而对别人只抓住缺点，否定成绩。这也是对辩证法的动摇。

这些情形是生活中的例子，比较容易出現动摇。有这些动摇，就妨碍我们正确认识问题。

不管社会科学或文学，没有辩证法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就会使工作发生偏差。所以研究矛盾，承认矛盾普遍性，主要是在工作上掌握“一分为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任何动摇，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工作、对周围一切事情要“一分为二”；对权威也要“一分为二”；对19世纪的高峰，也不能颂扬备至，也要“一分为二”。30年代的作品当然也不是一塌糊涂，也要肯定，也有成绩，但绝不能认为比我们今天60年代的作品高。只有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才能看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前进。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一分为二”，对每一个事物要“一分为二”，同时又要按矛盾的不同情形来作具体的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特点。矛盾是普遍的，但每一个事物的矛盾又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在对具体问题上要作具体分析。《矛盾论》一文用很大篇幅论述矛盾的特殊性，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当时主要的错误，是不承认矛盾的特殊性，不注意国内阶级矛盾的特殊性。

具体矛盾要具体分析。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忽视一面，而只注意一面。矛盾的普遍性是要坚持“一分为二”；矛盾的特殊性是用“一分为二”作具体分析，没有具体分析，就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就不能真正解决矛盾。所以，对一个矛盾的不同发展时期要做具体分析。同一个人昨天和今天就不一定相同。同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每一个阶段，又有它的特点。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在科学上是如此，在文艺上也是如此。文艺上反对公式主义，就是因为它对社会矛盾没有具体分析。公式主义不好，它妨害文艺创作。好的文艺作品，一般都能提出问题，通过文艺典型，暴露矛盾，解决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这样：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具体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当做一个题目联系起来讲，原因就要注意在研究矛盾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就要把“一分为二”作为最普遍的方法，对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都要“一分为二”，都不要动摇，不要认为可以没有矛盾了。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注意每一种矛盾都有特点，即有个性。在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时，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要注意它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不注意矛盾的特点，就要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矛盾论》里指出教条主义错误之一，就是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注意中国矛盾的特性。毛主席写这篇著作时，王明的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不承认、不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辩证法没有学好，有些问题就会想不通，譬如对人要“一分为二”，总是要分为正确与错误，那么对帝国主义是否也可以这样分？如果对它不能这样

分，就不能搞“一分为二”了，是否“一分为二”就无效了。这类问题是普遍的，到处都有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一分为二”不是死的公式。不同的事物，矛盾不同，对立的两面不都是一样的。对任何人都用简单的正确与错误来分，就没有效果，这就是公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分，世界革命人民可以这样分，有正确有错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正确认识没有完成以前，免不了有一些错误。但对帝国主义不能这样分。我们文艺作品写一个坏人，就可以把这个人的两面性写出来。坏人作假，作品上可以写出他的作假，同时又写出他的本质一面。一个很坏的人如果只简单写他坏的一面，有时还不够，要把它的假象写出来，揭露出来，那才能够说是全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正确与错误也有不同的分法。斯大林是三七开，有些人是倒三七开。有些人的错误很少，是暂时的错误，如马克思、恩格斯写文章中也写到在某个问题，有过错误看法，这错误很小。列宁与斯大林比较起来，不能说列宁也三七开；但不能说列宁一点错误都没有，列宁讲过自己也有过错误。不过，这是个别的情况。正确与错误有各种各样特殊性，斯大林三七开，就可以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比例不同，质量也就不同了。如果倒三七开，这个人就不很好了。譬如普列汉诺夫在早期，有好的地方，有对的地方，但是后来成了叛徒，叛变革命了，就不能算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变成修正主义者了。

对矛盾要做具体分析，把矛盾的两面，每一面都作具体的分析。我们讲和平，帝国主义也讲和平，这和平不一样，帝国主义的和平是假和平，与他的真备战联系起来，一研究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矛盾，它是反动的两面性。反动就是反动，可是反动也有反动的两面性。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投降美帝，可是与美帝之间也有矛盾，美帝有时又想把他一脚踢开，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美帝经常有斗争，斗争不是为了反美帝，而是为了取得奴才资格，他不斗争，就会像吴庭艳一样下台。蒋介石投靠美帝，是美帝的奴才，又怕当不成奴才，这是奴才与主子间的矛盾。

运用辩证法，最重要、最困难的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我们要努力学的就是这一点。毛主席明确地讲，要用较大的力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偷懒和怕麻烦的人，就没有办法运用辩证法。随便抓一个公式来，没有办法掌握辩证法。要掌握辩证法，既要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特别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不能放弃，放弃了矛盾的普遍性，不搞“一分为二”，就会离开辩证法。但是，你主观上不动摇，承认矛盾

的普遍性，在实际上做的时候，不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结果还是不能掌握辩证法。我们要有坚定的观点，同时要落脚到具体分析上。能不能作具体分析，是能不能掌握辩证法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把事物“一分为二”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作具体分析呢？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斗争，为了工作。没有具体分析，就不能用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矛盾。解决矛盾，就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从哪里来？从具体分析中来。解决矛盾要经过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斗争，决定于矛盾的特点。对矛盾的特点认识清楚了，才能找到针锋相对地同他斗争的方法。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拿起枪杆子来和它斗争，没有武装斗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自己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就不能拿枪杆子来搞。这也拿枪杆子来搞，那成什么样子呀！要作具体分析，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武装斗争也有不同的斗法。我们的方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方法是对敌人的强弱点作了具体分析才能做到的。即使原则上掌握了这个方法，实际上做的时候不作具体分析，不能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还是不行的。

总之，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都要坚持“一分为二”，应用两分法，但是，又要根据矛盾的不同情形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千篇一律，把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等当做死的公式简单地套用。

3.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件复杂的事情同时存在很多矛盾，要注意用最大力量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主要矛盾是带关键性的矛盾，是事情的主要环节，是我们斗争的主攻方向。解决矛盾，要斗争，斗争方面多了，就要考虑，哪是主攻方面，要用主要力量。主要矛盾又表现为主要斗争。主要斗争搞好了，其他的斗争就容易胜利了。主要斗争失败了，其他斗争胜利了，也会垮台；主要斗争胜利了，个别的斗争失败也不要紧。主要矛盾对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主要矛盾是会变化的，要经常注意它的变化。在历史上关于主要矛盾运用在实际斗争中最好的例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与王明关于要不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论。王明看不到抗日战争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已是主要矛盾，看不到全民的抗日要求，把自己孤立起来了。1935年遵义会议后，大

家认识一致了，才搞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那就是我们抓住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

我们的文艺创作也有这些问题，要不要反映主要矛盾？创作反映当前的主要矛盾，这是艰苦的工作。要创作，就要熟悉，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搞“活报”容易，要搞成艺术作品，就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一个时代的作品应当反映他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每个时代的杰出作品，好的或很好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品，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古代很多杰出的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因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我们今天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努力反映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就斗争来说，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斗争，是斗争中、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它关系着斗争的胜败，关系着对立面能不能转化。因此，我们运用辩证法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分析主要矛盾。学毛主席著作，凡是学习好的，都不约而同地注意主要矛盾问题。在工作中会不会运用辩证法，就看你会不会找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找主要矛盾，是要费力气的。因为有些主要矛盾不太好找，而且主要矛盾是变化的。一个主要矛盾解决了，又出现第二个主要矛盾。变化的时间长短不同，但总是要变化的。世界的主要矛盾变得慢一些。具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可能几天一变。我们学习哲学，用哲学来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怎么来确定主要矛盾？找主要矛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说要用最大的力量去找出主要矛盾。矛盾是很多的、很复杂的。不找出一个主要矛盾，工作就被动，就不容易解决问题。确定主要矛盾用什么方法？我的实践经验不多，很难说具体办法，讲哲学也只能讲原则，因为有不同的情况，这一件事的这一个方法不能代替另一件事的方法。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找主要矛盾的方法。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去实践中去摸，经过几次实践，把自己的想法加以比较，而后就可以找出来。有时候找得不对，放弃了再找，总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有些情况的主要矛盾比较显著，容易找，比如日本打进来了，只要有一点辩证法头脑的，也就可以感觉到。有些问题，某些资产阶级都看出来，可是有些人就是看不见。“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有很明显的不同，很快转向抗日方面，就想找共产党。可是教条主

义就不承认，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危险。主观主义害人到了这样的程度！

只要是立场、观点、方法正确，经过研究，主要矛盾是不难找到的。有的时候找主要矛盾要经过一些实践、认识的反复。具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往往要经过实践才能找到。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其他工作也就迎刃而解。主要矛盾也就是我们主要用力的方向。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对我们确定战略策略有重要意义，主要矛盾抓住了，我们的战略策略就可以正确。战略部署要根据主要矛盾来确定。

再讲一下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关系问题。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基本矛盾是整个运动过程中能够起决定作用，起根本作用的矛盾，时间可以是很长的。比如民主革命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始至终有一种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和三大敌人的矛盾。主要矛盾则不同，它是整个过程中某一个时期(阶段)特别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全部的基本矛盾，只是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组成为一种，称为主要矛盾。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并不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人民的矛盾。讲基本矛盾，整个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那个时期主要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要用主要力量去反对它。其他的矛盾要照顾，但是，解决其他的矛盾，一定要服从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土改就不搞了，而搞减租减息。主要矛盾突出了，次要矛盾缓和了。

主要矛盾一般是一个时期的，也有很长的过程，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如此。说长期，是不是始终都有？这还要看情况，比如把资产阶级的进攻打下去以后，就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生产，发展经济，加快建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讲矛盾的焦点，有时也是指主要矛盾。有时候，一些名词是可以通用的。焦点并不等于它是主要矛盾，是指许多矛盾集中点。但是，有时是总矛盾最突出的一点，最主要的一点。讲亚、非、拉是矛盾的焦点，就是指主要矛盾。亚、非、拉可以说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点。焦点就是集中点，也是主要矛盾的所在地。各种矛盾的焦点，就是讲全世界的矛盾在当前一个时期来说，都要集中到那里去解决。有时候主要矛盾也可以讲引起主要斗争的矛盾，主要矛盾表现为主要斗争。我们日常工作中讲的主要环节，就是我们主要用力的地方。焦点和主要矛盾的意义多少有点不同，但有时候可以看成是一件事。各

方面都用主要力量去争取亚、非、拉，所以，现在主要斗争所在，又是焦点、主要环节。

下面再讲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矛盾两个方面中间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不是两片虎符，半斤八两相等，不是平均的。矛盾的对立面不可能平均，而且关系经常变化，总有一方占优势，占主导地位。旧社会剥削阶级占优势，今天总的说来是人民占优势。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有国家政权嘛！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占优势、占支配地位的矛盾方面。分析矛盾时，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现在讲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矛盾，和人民的矛盾，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人民占优势，到处可以证明。我们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矛盾的优势，因为它确定事物的性质。

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毛主席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也不是偶然的，是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分不开的。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个问题仍然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主要的有两点：第一，认清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矛盾的性质、事物的性质；第二，认清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矛盾的恰当的斗争方法，在战争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恰当的战略战术。

如果找不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搞不清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最为明显。社会性质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我国在1949年以前，除了解放区以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1949年以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好人、坏人，决定于好思想、坏思想哪个占统治地位。不能说好人一点错误、缺点也没有。好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党性占统治地位，有时也有点个人打算，但是碰到与党的利益矛盾的时候，能够服从党的利益。坏人不同，他们是追求个人利益，牺牲党的利益。人的品质好坏以哪个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来决定。

矛盾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确定战略、策略、工作方法。可以从两方面确定：首先是从客观方面研究矛盾力量的对比，看哪一方面占优势、主导地位，然后，在主观上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战略、策略。我们大家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1927年敌我力量对比，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因此敌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战略（只讲战略）应该是防御，保存、积蓄力量。政治上、军事上都

应该是这样。那时候分清谁是主要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当时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他们不承认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写文件动不动就是敌人是“惊恐万状”、“吓得发抖”，总是把我们看做占优势，敌人占劣势。特别是毛主席辛辛苦苦组织了游击队打了一些胜仗，主观主义就更嚣张起来，抓着一些胜仗贪天功为己功，而认为他们“正确”。他们既然认为革命力量占主导，所以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战略上要实行进攻的思想，在城市里要搞公开的游行示威，在乡村里就主张进攻大城市。在敌人力量占主导时，我们采取战略进攻是错误的。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部讲的是战略防御，一直到1947年6月以后才说“军队向前进”。你们看1947年以前，哪有一篇文章讲这个话。这讲的是战略，还有战术。战略和战术是对立的统一。战略上的防御不等于战术上都是防。战役、战术是个局部问题，战略是个全局问题。在战略上是防御，但在战役战术上则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进攻。当然，也有防御，这是有条件的。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了。毛主席运用辩证法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运用得非常全面。在战略上把敌我力量对比“一分为二”，在一个时期里，肯定他们是优势，采取防御；但是不把战略上观点片面扩大，机械地运用到战役战斗上，而是重新作分析。战役战斗上我们的力量必须占优势，而且我们要自觉地组织这种优势。比如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毛主席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术的进攻作这样巧妙的结合，以前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像中国革命战争这样复杂、曲折。毛主席在战争问题上，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哲学上作了最高的总结。“一分为二”，不是简单的分一分就完了，它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折衷论，不是半斤八两。分了以后，还要掂掂轻重，哪个方面是主要的。不掂轻重就不知道相互的关系怎么样。

主要方面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工作中着重抓哪一方面？《矛盾论》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说到了：“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立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这里讲了实践和理论的矛盾，在工作中抓实践还是抓理论？有时候应该

用主要力量抓实践，有时候应该着重抓理论。当着很多同志都脱离实践了，搞官僚主义了，就要用主要力量号召大家参加实践。等到大家都参加了实践，这方面没有问题了，总结经验又成了主要的问题。那时我们的工作就应该抓总结经验。在工作中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哪一方面有问题，就把这一方面作为我们主要用力方面，着重去抓它。这也是研究主要矛盾方面的一个目的，也是运用主要矛盾方面来指导我们工作的一个意义。

从文艺方面说，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应有什么特点？决定于什么？文艺作品都要写矛盾，要确定作品有没有社会主义性质，标准很多，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标准，首先是劳动人民成为主角，特别是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作主角，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可以不可以写中间人物，当然可以写，为什么不能写？反动派还要写嘛！作品中没有反派、没有中间人物，就没有戏啦！要写，问题是把你把它摆在什么地位。如果你要把它摆在主要地位，当做歌颂对象，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文艺特点。

我们现在的文艺算不算社会主义文化？有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有一个标准，就是要看在文艺戏剧中，工农兵是否占主要地位。苏联的芭蕾舞一直演《吉赛尔》、《天鹅湖》、《天方夜谭》，从来没有出现工人和农民，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搬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来。我们可不可以演一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然可以，问题是它该占什么地位？如果帝王将相占主要地位，我们的戏剧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戏剧文化，也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尽管你也把这些戏送到工厂农村去演，但是在舞台上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工农兵而是过去的帝王将相，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要把这种现象倒过来。帝王将相的东西，为了参考，可以少演，分量要少一些。量和质有关系，大量的应当是现代的东西，应当是工农兵英雄，应当是劳动人民。过去的、外国的东西可以小量的存在。我们要很好地努力，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矛盾的性质问题，对文化、文艺意义很大。

4.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

同一性是指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斗争性是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对立的东西联系起来叫做同一性，相互排斥就是斗争性。研究和分析矛盾的对立面如何相互联系，又怎样相互斗争、排斥，就是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性质。同一性有两种，一种是对立面互为存在的条件，你不能离开我，我

不能离开你，在统一体内同时存在，叫互为存在的条件；另外一种互相转化，转化中间联系起来。例如劳逸结合，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不断转化。工作、休息联系起来，有同一性。辩证法中讲的同一性与形而上学讲的同一性不同，形而上学的同一是等同，没有分别，而辩证法的同一，是讲一个统一的东西分为对立的方面，这对立方面有联系，所以它们是同一的。如果资本家改造好了，资产者变为劳动者，这是转化。能转化，就有同一性。

这里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提出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时想不通。例如生转化为死，就想得通，死转化为生，就想不通了。这个想不通，还是没有注意到转化是有条件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人活到老，转化为死，这是有条件的；已经死了的人变为活人，除非是假死，真死就没有条件可以转化为活。但是在另一方面，另外条件、另外情形下，还是可以理解的。情形有好几种。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够活下去？我们身上有一些细胞天天死去，又天天产生新的细胞，我们才能活下来。如果旧的细胞不消灭，老不死，新的生长不出来，人就活不下去。从这一点看，是死变为生。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从个人与集体关系看，个人死了，集体可以活。黄继光死了，队伍前进了。一个人死了，保住了集体。在战斗中有这种情形，个人的死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这正是辩证法，也是死变为生。

我们学辩证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揭露矛盾，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努力促进对立方面向进步的方面转化。我们的工作转化的工作，向前进方面转化的工作，使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使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使资产阶级改造成劳动人民，甚至“五类分子”也要通过劳动得到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一切事情向进步的方面转化，坏的变成好的，落后的变先进的，坏事变好事。学辩证法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学会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我们都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了解了这个任务、方向之后，就可能做得更自觉、做得更好。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是列宁所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原则。这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忘记这个原则，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第一次讲这一原则，都是有所指，都是针对修正主义的。老牌修正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调和，经过谈判，经过协议，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有没有这种同一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搞谈判，可以达成协议，这种协议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绝对不能。列宁指出和资产阶级谈判

都是暂时的。我们跟帝国主义也可以谈判，但都是暂时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讲过两次，一次是在《矛盾论》。那正是与国民党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王明回来了，他提出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共产党不要领导，他把统一战线看得很绝对。毛主席讲国民党与我们搞统一战线是要整我们，他要我们抗日，这是借刀杀人，先消灭我们三分之二的力量，将来再消灭三分之一。他们是要消灭我们，这是他们的绝对的方针。当时毛主席这番话有极重要意义。毛主席第二次谈到这个问题，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1957年那正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敲锣打鼓，当时一片乐观，有些人便认为资产阶级没有问题了，他们欢迎社会主义。那时有些人就忘记了同一性是相对的。资产阶级敲锣打鼓公私合营，好像非常欢迎社会主义，非常欢迎无产阶级专政，好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绝对没有问题。殊不知他们表面上是一套，回到家里对亲戚朋友讲的又一套。他们说：“我们是上了贼船”。《水浒传》里不是有“贼船”吗？阮小二、阮小五是农民英雄，统治者说他们是强盗。有钱人上了他们的船，划到江心，停下来讲条件：你是吃板刀面还是吃浑沌面？吃板刀面，就是砍头；吃浑沌面，就是把你绑起来，抛到江里。反正是要同你的财产“一分为二”，把财产留下。他们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表面上跟我们讲统一，实际上跟我们讲斗争。事实证明，他们敲锣打鼓是被迫的、相对的、表面的，而且只是一方面，根本的东西同我们斗争，斗争是绝对的。毛主席重申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也是“有的放矢”的。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两句话可以统一到毛主席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句话是归纳了列宁的思想。两个对立面能够在一个统一体中共存，能够互相依赖，是通过斗争才产生的，是斗争的结果。斗争是根本的。对立面要互相依赖，就要互相斗争，不斗争就不能互相依赖。你要去依赖它，就要跟它斗争。所以，辩证法是很妙的，有时脑子不灵活一点就想不通。对立面又是互相依赖，又是互相斗争，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但是斗争是根本的。你不斗争就依赖不了。资产阶级不跟无产阶级斗，不斗得把无产阶级压迫在底下，它就依赖不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要活下去，也是要斗。你不斗，活也活不成。你要出卖劳动力，能够保持自己活下去的水平，非要经常斗不可。

统一战线也是一种互相依赖，你不斗就不行，不斗就没有统一战线。我们要搞统一战线，为了工作的目的，要跟一些别的阶级联合，所以要互相依赖。要互相依赖就非斗不可，不斗就依赖不了。对资产阶级不斗一下，它不跟你搞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必须是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的统一战线一定要依靠无产阶级掌握领导。你要掌握领导，要资产阶级跟着你走，就非要斗不可。要利用他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要依赖，不是完全靠他，这也算是依赖。

所以，没有斗争就没有同一性，没有斗争就达不到同一。有没有同一性，互相依赖到什么程度，要看斗争得怎样。所以说，同一性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最根本的条件是斗争，保持一定的斗争水平，才能出现某种同一性。这些问题要从实质上来了解，不能从形式上来了解。从形式上来看，任何时候矛盾都有同一性，任何时候矛盾都有斗争性，是否说斗争也是绝对的，同一性也是绝对的？从形式上看好像是这回事，没有斗争当然不叫矛盾，可是，没有同一性也就很难说是矛盾。两个东西一点联系也没有，发生不了斗争，当然也就没有同一性了。从形式上看，好像同一性也是绝对的，因为任何矛盾都有对立的同一性。问题的实质是同一性只是斗争的结果，因为对立面要互相依赖，所以必须要斗争，经过斗争才能出现同一性。同一性是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目的，如统一战线是我们的要求，这个要求能够实现，必须经过斗争。所以，斗争是根本的，同一性是斗争的结果，因此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是一个纠缠最多的问题，许多同志觉得不好理解。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永远也不能解决。什么方法能解决，什么方法不能解决？教条主义的方法，抠字面的方法，从原则出发又回到原则去的方法，那就无法解决，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研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多多少少有点从原则出发又回到原则，多多少少有点抠名词、概念。在这种影响下，就不能解决，这种影响很大，许多人舍不得丢掉这种方法。他们认为，凡是矛盾总有斗争性，总有同一性，有斗争的地方就一定有统一，要斗争就要有联系。因此，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好像也是绝对的。就是因为有这一套逻辑，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毫不可惜地抛弃这种纯粹从原则出发的方法。

矛盾的同一性是对立面的同一性，本性是互相排斥，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原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在文化、文艺工作中，有没有了解这个原则？我们

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采取什么态度，符合这个原则么？很值得我们研究。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对立面的本性，斗争性不是绝对的就不能叫做对立面。从逻辑上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对立性，对立性总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例子。

广义的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不是光指打架。自然界也有同一性、斗争性。矛盾怎么样推动事物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统一，又不统一，所以才推动事物发展。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矛盾规律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全面：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相互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一个社会的两个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联系起来，暂时互相依赖，但又天天在搞斗争。这个斗争最后要破坏这个同一性，这样就出现飞跃的发展。

矛盾斗争是绝对的，但斗争的方法是具体的。不同的情况下面，不同的条件下面，应该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主要是区别两种矛盾，区别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两种矛盾。这是涉及矛盾性质的问题。对抗性矛盾通过对抗性斗争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用非对抗性斗争来解决，不能混淆。区别两种矛盾，用两种不同方法解决，这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矛盾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总的分起来基本上是两种：对抗的与非对抗的。这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特别重要，所以特别提出来研究一下。

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专门讲，为什么《矛盾论》要讲这个问题？这也是从实践中来的。16年的斗争碰到了要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1927年陈独秀就把对抗矛盾看做是非对抗的，甚至不承认这个矛盾。蒋介石拿了枪来屠杀工人农民，他还要把工人农民的自卫武装缴掉。另外还有非对抗的问题用对抗办法来解决。比如党内的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犯了错误。所以，流血的经验逼迫人要考虑区别一下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失败的经验，流血的经验，使我们得到许多感性认识。这些感性认识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思想，就是要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性质。把物质变为精神，就出现在《矛盾论》里的一节。学这一段主要想一想历史经验。所有讲的问题，都是由流血的经验作基础的。可以说，这些著作是用血写的，不是用墨写的。流血的感性认识使人非考虑这些问题不可。不搞清楚还要犯错误。这样大的国家犯错误不得了，小国家犯错误使小国家的革命失败，几亿人口的国家犯一个错误，就要涉及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

有人问：对抗矛盾是不是就是敌我矛盾？不可以这样说，对抗这个概念比敌我的概念还要宽一些。有些对抗矛盾，比如炸弹爆炸就无所谓敌我问题。对抗在自然界也可以出现，敌我矛盾则是阶级社会的现象。敌我矛盾一定是对抗的矛盾。对抗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时候变成对抗，比如工人打起架来了，农民甩起扁担来了。这样的对抗是不是敌我矛盾？不是的。内部矛盾也会发生对抗。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条件。

第 28 章 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来偷换革命辩证法

(1965.05)

【1963 年至 1965 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从文艺开始，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学术领域，包括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是在毛泽东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是学术问题，也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上纲为“阶级调和论”、“修正主义”观点，作为反党事件来处理。

艾思奇在当时情况下，按照中央的指示，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坚持“一分为二”辩证法，批评“合二而一”观点，提出事物的不可分是相对的，可分是绝对的观点。但是，文章出现了上纲过高的问题，学术上也有偏颇，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按照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时的原文收入，未加任何改动。】

(一九六五年五月)

“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杨献珍同志散布了这个修正主义观点。有一个时期，一些人看不出它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合二而一”披着一层辩证法的画皮；杨献珍等同志百般地粉饰了这层画皮，使它在在一个时期迷惑了人。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仔细注意，就可以知道，这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公式，拿来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

如果把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具体分析一下，就更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基本思想，包括在他的下面几段话里：

“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学习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思想联系起来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

杨献珍同志这个基本思想，在他自己讲课的手稿里，在他授意别人所写的文章里，都作了系统的解释。这里既包括他关于客观事物的见解，也包括他关于人的主观如何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见解。把他们的解释概括起来，就是：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因此，人们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包括制定和执行路线政策)的方法，就是要经过“一分为二”达到“合二而一”。这就是他所谓的“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合二而一”，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规律，又是人们主观上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目的和原则，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就是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

在这个基本思想里，“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还有什么地位呢？它只是个陪衬罢了。杨献珍同志明明是要彻底地用“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来否定和偷换“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1.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决不是“合二而一”的

把客观事物说成是“合二而一”，这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根据。让我们先摘引几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关于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的论点，然后再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加以说明。

恩格斯的论点是：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自然辩证法》，第174页）

列宁的论点是这样的：

“一分为二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原译作“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也可以译作“一分为二”。）

“‘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8页)

“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再看毛泽东同志的论点: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关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论点,和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共同点吗?不但没有共同点,而且是根本相反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只强调“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而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却着重强调对立面之间的“不断的斗争”,强调“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强调一切现象和过程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肯定对立面之间的联系,指出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但在这里他们又特别强调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把对立统一规律解释成“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而更应该强调这种联系是可分的。列宁曾用“一分为二”的概念来概括辩证法的主要实质;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加以展开,指出“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也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难道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犯了根本的错误,竟要杨献珍同志发明一个“合二而一”的公式来加以修正吗?当然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错误,根本错误的恰恰是杨献珍同志的修正。

这里的决定性的分歧是在于:我们要不要承认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要不要承认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永无止境的前进发展的过程。唯物辩证法承认客观事物就是这样的过程,形而上学则反对这样的理解,把客观事物看做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各自孤立的东西。形而上学也不能不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解释,它把后者解释成仅仅是量的增加和减少,解释成既成事物的永无止境的循环。按照形而上学的这些理解,当然可以把客观事物纳入“合二而一”的公式;把对立

的统一曲解成“只是”对立面的双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这就是“合二而一”；把发展曲解成两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的交替出现，曲解成走马灯式的循环，这也算“合二而一”。然而这究竟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结合论和循环论，因此也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合二而一”是形而上学的公式，怎样能把它硬塞进辩证法的范畴里来呢？

但是，如果承认客观事物是辩证的运动变化过程，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减和循环，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永无止境的前进发展的过程，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合二而一”的公式，决不能概括这样的过程，也不能表达这个过程任何一个方面、一个环节、一个部分的实质。这个过程只能看成是对立的统一，或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对立的统一，是事物内部不断地相互斗争着的对立面的统一，由于“不断的斗争”，尽管对立面之间存在着联系，甚至存在着某种“不可分离的联系”，但这个“不可分”终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对立面之间的不断的斗争使它们的统一经常存在着走向破裂、分解的趋势，而且迟早总要使破裂、分解成为现实，从而使事物由旧的运动形态转变为新的运动形态；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这正是“一分为二”的过程，这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对立的统一，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是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本规律，它决不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统一、取消了斗争的统一、无条件的和平共处的统一，因此，决不能把它的实质说成是“合二而一”。

杨献珍同志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列举了许多事物运动的例子，从自然界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一直到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运动，说这一切运动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对立面“合二而一”构成的。其实，他们的例子举得愈多，就愈加暴露自己不但对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而且对于所谈到的事例都是毫无常识。因为那些自然界的、社会的和人类认识的运动，正是统一物“一分为二”的矛盾斗争的表现，而决不是什么“两个侧面”的“合二而一”。

什么是物体间的机械运动？举例来说，如：一个物体的运动能量经过冲突、摩擦等形式转移到另一物体，这个能量的转移，使前者失去它的能量，而后者则获得了前者失去的相等的能量。这就是一种机械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对于后者来说，就是前者的能量起了“作用”；对于前者来说，它失去能量，就表现为后者对它起了“反作用”。所以，作用和反作用，只是同一个能量在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间“一分为二”的表现。机械运动，能量在两个物体间转

移的运动，正是由于同一个能量的“一分为二”、作用和反作用的统一和斗争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作用和反作用的“合二而一”。物理运动的吸引和排斥，例如电磁的吸引和排斥，是由于同一电磁波“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两极的表现。同极互相排斥，异极互相吸引，这个排斥和吸引的统一和斗争，才引起由电磁推动的运动；这个运动决不是由于排斥和吸引的“合二而一”。化学上的化合和分解，在化学运动中是有联系的，但不同原素化合的时候，就是对分解的排斥和斗争，反过来，分解对于化合，也是如此，两者永远是在互相排斥、互相转化的过程之中，怎能算是“合二而一”呢？同化和异化是有生命的蛋白体和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的两个对立方面，这两个对立方面的统一和斗争引起了生命物体的新陈代谢运动和它的生长和衰亡过程，而新陈代谢和生长、衰亡的过程，正是生物体本身的新旧成份不断“一分为二”的过程，怎能把这说成是“合二而一”呢？生物和环境的关系还表现为遗传和适应的一分为二的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指出：“进化论证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则进化到人”（《自然辩证法》，第174页）。恩格斯在这里着重说到遗传和适应这两个侧面的“不断斗争”，根本没有把它们看成是“合二而一”的。就社会生活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社会生产过程“一分为二”的表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统一的社会形态“一分为二”的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又表现为人和人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合二而一”了，也就是说，它们相互间都“完全适合”了，它们不再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再表现为人和人的矛盾了，一切人们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完全一致了，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岂不是就要停顿下来了吗？

杨献珍同志等人想用来证明他们的“合二而一”论的例子，全部都是站不住脚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一切发展过程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斗争，都是“一分为二”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日益暴露、发展、激化和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里，对立面之间自始至终不断地进行着斗争，使对立面由统一到不能保持统一，由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到相互依存的分解和破裂，最后就转化到相反的方面或转化为较高的形态，这就是矛盾的解决；这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新矛盾，新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新的一分为二的过程，新

的由对立面的统一到不统一、由相互依存到分解、破裂，并再转到较高形态的过程。一切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前进运动过程。只要我们承认一切事物都是这样辩证地发展着的，那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事物的统一体中的对立面的联系，决不是不可分的，而是必然要分解、分裂的。杨献珍同志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抹煞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把对立的统一规律歪曲成“合二而一”，是毫无根据的。

2.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的， 而不是“合二而一”的

再谈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是由“一分为二”达到“合二而一”。它有两种具体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认识“合二而一”的事物，然后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的时候，一律要遵循“合二而一”的公式。第二种解释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分析与综合两个方面，“一分为二”只是指分析而言，“合二而一”则是指的综合。这些解释都包含在杨献珍同志的讲稿里。

这两种解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为两者都是把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结为“合二而一”，归结为“只是”“要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或者是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政策的时候“结合”起来，或者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综合”起来。杨献珍同志所谓的“结合”和“综合”，在这里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杨献珍同志的这些思想，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的。

让我们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提法引用几段，来作一个比较。

列宁说：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毛泽东同志说：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

又说：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矛盾论》）

“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矛盾论》）

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辩证方法的主要论点，怎能归结为“合二而一”，怎能归结为“只是”“要把两个对立的的思想联系起来”呢？这里说的是“要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要把现象看做“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更加展开的说法，就是要分析和暴露事物的矛盾，研究矛盾着的对立面如何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研究它们在相互依存中和依存破裂后各用何种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并根据这些研究，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简单地说，辩证法就是通过暴露矛盾来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正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根本不能归结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

让我们把《毛泽东选集》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例子来研究一下。这篇文章把当时中国相互矛盾着的各个主要阶级——其中包括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殊性，一一作了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9页）这个结论，既是经过分析而达到的综合，又规定了当时革命斗争的总的政策路线。这个综合的内容是什么？它规定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难道可以说是“合二而一”的路线吗？恰恰相反！这条路线是要回答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革命的首要问题”，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条路线，就是分清敌友的路线；这正是“一分为二”的路线，而决不是“合二而一”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但在敌我之间“一分为二”，在朋友之间，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动

摇不定的朋友“一分为二”。如果在革命的政策路线上不能掌握这个“一分为二”的原则，而是采用“合二而一”的原则，不是分清敌友，而是敌友不分，或者在朋友中只是一味“求同存异”，没有斗争，那就不能“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就会把革命领错了路而使革命失败。当时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个最好的例证。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正是针对陈独秀把敌友“合二而一”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写的。杨献珍同志要把“合二而一”的公式作为党的政策路线的根据，这不就是说要走投降主义的路线吗？

革命的路线，就是解决社会阶级矛盾的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要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要解决阶级矛盾，必须首先暴露阶级矛盾，必须分析矛盾着的各个阶级，分析它们的各自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它们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把这个分析的结果加以综合，就要指出在革命斗争中应该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联合什么阶级，反对什么阶级；发展什么势力，消灭什么势力。这就是解决社会阶级矛盾的方法，这就是革命的路线。暴露阶级矛盾是把矛盾着的阶级“一分为二”，解决阶级矛盾的路线，是要分清敌友，指出应该发展什么势力和消灭什么势力，也是“一分为二”，根本不是什么“合二而一”。杨献珍同志授意艾恒武、林青山所写的文章里，摘引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段文字。他们企图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条路线也可以纳入他们的“合二而一”的框框。但他们除了简单的摘引之外，找不出任何一个字来说明这条路线怎样能是“合二而一”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首先是对国际上的四个基本矛盾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的结果，是针对着现代修正主义者投靠敌人、出卖革命的反动思想和阴谋行为，再一次把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敌友关系正确地指明出来的结果。这正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认识了和指出了全世界的阶级矛盾及其解决的方法。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最明显、最不容易掩盖的现实生活的辩证法，它和“合二而一”论的对立，是非常清楚、非常尖锐的。因此，在杨献珍同志等人的讲课和文章中，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狡猾的手法，就是尽量回避直接谈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不能不谈到的时候，也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或者只谈某些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问题，强调“求同存异”、“共同的要求”，不谈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他们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不是直接属于

阶级斗争的、比较容易隐蔽自己的思想原形的问题上去，用在红与专、劳与逸、质与量、工业与农业等等的结合问题上去。结合这个名词，望文生义，比较容易被曲解成“合二而一”；好像其中只有着两个对立面联系起来的问题，而不存在对立面的斗争，相互依存的破裂、分解和一方战胜、克服另一方的问题。杨献珍等同志就是着重抓着“结合”这个名词来制造矛盾调和论的。

如果抛弃咬文嚼字的诡辩，把各种“结合”的问题从实质上加以具体分析，那么，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完全站不住脚跟。“结合”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相反的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那就是指用折衷、拼凑的方法，把两个一成不变的东西机械地粘合在一起，杨献珍同志的所谓结合，实质上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解。与此相反，按照辩证法的理解，所谓结合的实质，就是要在运动、发展中去掌握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正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关系；它仍然表现为不断地暴露矛盾、展开斗争、克服矛盾的过程；仍然表现为由对立的统一到统一的分解，经过对立面的斗争，和一方战胜、克服另一方面达到新的对立的统一，这样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总之，仍然是“一分为二”的运动过程。

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不外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对立面互为存在条件而共处于统一体中，或者是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起初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统一体中，如在一定质的基础上量的增长。但这个共处不是“合二而一”式的共处，它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在变化的，不是长久“不可分”的，而是终归要分解的。量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质因素，就要把量的发展推进到和旧质决裂的地步，就要使量和质“一分为二”，使原来的共处关系发生变化、分解，并引导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个对立面的转化，也就是辩证法的“结合”的一种表现。而且常常是更重要的表现。劳逸结合，就是主要通过工作和休息的互相转化来实现的。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也不是“合二而一”，因为每一次转化，都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环节，相互转化不是走马灯式的循环过程，而是某些新的更高一级的东西不断出现和某些旧的东西不断被克服、战胜、以至消灭的过程。杨献珍等人所谓的“合二而一”式的“结合”是取消了斗争，一劳永逸地把“两个对立的方面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的所谓“结合”；抹煞了新与旧的代谢关系，把对立面的双方都看成是“万古长青”，任何一方都不会有什么东西被战胜、克服或消灭的所谓“结合”，这样的“结合”，其实只是杨献珍同志等人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虚构，在辩证地运动着的客观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结合”论，实际上是利用“结合”这个名词的外表形式来玩弄诡

辩，是以反对片面性为借口，把辩证法歪曲成折衷主义，为修正主义者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妄想提供一个“理论”的工具。

3.不能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因素

在这次论战过程中，有些同志搜寻了种种理由，想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某种因素。他们的观点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陷入了“合二而一”论的谬误。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时候，也必须对这些错误观点加以澄清。

有些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侧面。他们以为“一分为二”只表达了对对立面斗争性，“合二而一”则表达了对对立面同一性。他们说事物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是“一分为二”的补充。这些同志是把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机械地、形而上学地割裂了。实际上对立面的同一性只是不断地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着的对立面之间的有条件的同一性。这样的同一性，永远也不会是“合二而一”的。只看事情的表面而不对事情的实质加以分析的人，才会相信对立的相互依存是“合二而一”的。首先，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是说统一物自身分裂为互相依存的对立面，而不能说成是两个东西凑起来“构成一个统一体”。共处在一个社会中的对立的阶级是这个社会本身分裂为两个阶级，而不是两个阶级凑成一个社会。这就只能用“一分为二”来表达，而不能说成是“合二而一”。其次，两个对立面共处统一体中的时候，它们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因此，它们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经常不均衡的，其中必有一方面居于主要的、支配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着的两个对立面，总有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次要方面。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不是这个阶级统治，就是那个阶级统治；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对立面双方在统一体中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主要与次要的关系，因而不能简单地叫做“合二而一”。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对立面的不断的斗争，也不是完全稳定的，而只能是相对稳定的，是经常存在着分解、分裂的趋向，并且迟早要走向分裂、分解的。所以，就其发展的趋势来说，同一性也正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的。不但如此，就是同一性的相对稳定，也还要依靠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在一定条件下保持得住。对立面之间既然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的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处于主要的、支配的地位的矛盾方面，如果不通过斗争，怎能

保持它的这个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呢？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不经过斗争，无产阶级怎能保持这个领导权呢？国家是阶级的专政，不通过斗争，统治阶级怎能保证它的政权的稳定呢？“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不是在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千百次地证明了真理吗？只有对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的斗争，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行为，保卫和平；对帝国主义迁就、妥协，恰恰是帮助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阴谋，鼓励它来破坏和平，这不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真理么？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违背这些真理，不是无数次地碰得焦头烂额吗？毛泽东同志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正是从哲学上概括了上述的真理，正是深刻地概括了同一性的“一分为二”的实质。

杨献珍同志讲统一战线，只强调统一战线的“求同存异”、“共同的要求”，不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政策、独立组织，不谈通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杨献珍同志企图掩盖统一战线的这个“一分为二”的内容，把它歪曲成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合二而一”的投降政策。

有些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一个环节。他们以为矛盾的暴露、发展、激化是“一分为二”，而矛盾的解决就是“合二而一”，例如说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革命，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就是“合二而一”。因此，这些同志又提出了一个公式，说事物是由“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又再到“一分为二”的不断循环交替的过程。这些同志实际上是把事物的辩证运动歪曲成机械的循环论思想，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他们的论点抹煞了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实质，即矛盾的解决是事物的积极的方面克服消极的方面，新生的力量战胜腐朽的力量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的结果，是前者彻底战胜后者的结果。决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合二而一”。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这些同志还企图把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歪曲成他们的循环论。他们把其中一前一后的两个团结，硬说成是“合二而一”。其实团结本身也就包含着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某种

斗争。只是斗争的具体内容、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有其不同的特殊性而已。由团结出发进行批评和斗争，正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是经过批评和斗争，克服了错误，也是“一分为二”的结果。这个更高的基础，决不是正确和错误“合二而一”的基础，而恰恰是正确与错误“一分为二”之后的基础。在新的团结中又会出现新的不同意见，又会继续“一分为二”，然后又要通过批评和斗争，使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再进入更高基础上的团结。把这样的过程说成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循环，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些同志把事物机械地划分为两类，说一类矛盾是通过对立面的一方战胜、克服和消灭另一方来解决的，而另一类则是通过对立面的“结合”来解决的。他们硬说只有前一类矛盾才具有“一分为二”的性质，而后一类矛盾则是“合二而一”的。这种思想的错误，在前面我们批判杨献珍同志对于党的“结合”政策的曲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批判到了，用不着再来重复。

我们已经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基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又指出了那些想用各种理由把“合二而一”曲解成辩证法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或一部分的观点的错误。根据这些分析批判，可以得出结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不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和辩证法根本相反的东西。它是系统的调和矛盾和取消斗争的哲学。许多同志说，杨献珍同志的思想，和苏联德波林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错。德波林的特点，也是在于宣扬矛盾调和论，推崇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德波林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实际上比德波林主义还更为露骨、更为系统，它的反动性也超过了德波林主义！

（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

第 29 章 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谈话

(1965.11)

【1965 年 11 月 6 日，艾思奇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座谈会。艾思奇根据船山信一在北京讲学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回答。这个谈话是根据哲学所金顺福等同志的记录稿整理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船山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很欢迎。中日两国哲学家互相交流，对促进哲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船山先生在讲学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讲一点个人的意见。

1.关于矛盾、差异、对立的关系问题

矛盾是最根本的范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讲矛盾是普遍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一切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毛主席同列宁是一致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讲：一分为二以及对其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列宁不止一次地讲辩证法就是研究矛盾的学说，他把对立统一学说称作辩证法的核心，认为矛盾、对立统一是辩证法中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矛盾规律是贯彻于一切事物之中的，任何事物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矛盾。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承认矛盾是普遍的。从此出发，来解释矛盾之外，还有差异、对立等范畴问题。简单地讲，同一、对立、差异等都是以矛盾为基础的，乃是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因为，事物的矛盾不是任何时候都采取一种形式的。矛盾暴露的情况不同，程度不同，就有不同的形式。矛盾在开始时不是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开始时甚至看不出有什么矛盾，好像是同一，没有什么矛盾似的。

资本主义开始时，它在反对封建制度时，其内部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好像看不出矛盾。以后可以看出其阶级有差异，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它们的差异表现在反封建的目标上有差异。资产阶级胜利以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发展了，没有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了，矛盾成为对立。欧洲在 19 世纪

就是这样。两个阶级的对立暴露以后，矛盾就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时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

同一、差异、对立、矛盾，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黑格尔的公式给予这样的解释，就有实际意义。矛盾充分暴露了，人们认识到了以后，就可以找到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根据。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排列，与矛盾发展及人们认识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表现出矛盾的发展过程。

差异与矛盾是两个形式，但矛盾是根本，差异是矛盾的表现。可以说，差异就是矛盾。差异是否是矛盾是有争论的。苏联就有人认为差异不是矛盾。这是错误的。他们想要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们甚至讲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矛盾。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16年的经验可以肯定，三个差异就是矛盾。当然不是对抗，但是是矛盾，有时还是尖锐的矛盾。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这几对差异，是要经过斗争的，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正在采取许多办法，包括发展经济、发展教育等等，来克服这些矛盾，消灭这些差异。苏联不承认差异是矛盾，不去消灭，差异就越来越大，已表现为对立了。苏共二十大宣传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还远得很，这样下去，永远到不了共产主义。只要看看他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差别就可以看出。体力劳动者每月工资挣20—30卢布，和高工资相比相差几百倍。脑力劳动者加上额外的收入，差别就更大。这两种差别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这是已经形成了对立，已不是差别了。消灭三大差别，就是消灭三大矛盾，只有经过矛盾斗争才能加以消灭。

对立和矛盾本来就分不开。矛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矛盾。对立表现在矛盾发展阶段的差异上，在本质上还是对立。农民中有中农，看起来是一个阶层，似乎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没有矛盾。仔细分析一下，当一个中农有较富或较贫的差别，就可以叫做上中农或下中农。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就是这么分析的。这种差异也不仅仅是差异，形式上是富裕程度的差异，实际上就包含着矛盾，这表现在下中农较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农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中农积极地跟党走，上中农就须经过大量的工作。同是一个中农，因有富裕之差别，就包含产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因为他们基本的倾向是对立的，这种斗争不是敌对斗争，但还是斗争。苏联科学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企图掩盖矛盾。

矛盾、对立、差异是密切相联系的，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这是根据我们实际生活概括出来的。

2.关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首先，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社会的辩证过程，是具体事物的辩证过程。主观辩证法是以逻辑形式反映自然、社会的辩证法。如说：资本主义发展是客观辩证法，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即是主观辩证法。没有客观辩证法就没有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需在客观辩证法发展到成熟程度时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客观辩证法存在于19世纪前，而《资本论》在19世纪50年代后才逐渐完成。二者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第四章中就讲到这两个系列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管哪一个都是表示矛盾发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但是，形式上却有区别。可从各方面看，主要是客观辩证法复杂，它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主观辩证法反映了客观辩证法的根本的东西，比较纯粹地反映了客观辩证法的规律，抽掉了其偶然因素，概括了必然过程。

3.关于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问题

我想讲讲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用主义的影响大，存在主义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对前者批判多，对后者批判较少。40年前，实用主义来到中国，它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作用，但那时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实用主义一面反对封建主义，另一面又反对马克思主义。从40年前起，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就开始批判实用主义，这种批判一直不断。解放以后，还展开一次很大的批判，1954—1955年做了一次全面的批判。我们认为，实用主义使用了一些科学的唯物论的概念，但所谓唯物论科学是假的，实际是主观唯心主义，主要是它不承认认识反映客观规律。

存在主义，我们没有什么研究，据我们了解，人的问题，马克思已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也许不够，还要研究。

4.关于认识的辩证法问题

关于认识辩证法再说几句话。认识的辩证法讲人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如《实践论》中讲的。毛主席发展了列宁讲的认识规律，作了系统的发挥。主要讲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这个规律，可以全面地概括人的认识过程。日本哲学家的文章，我们看过，他们认为讲感性到理性不够，应该按德国古典哲学那样的提法：感性理智或悟性到理性。我们认为理性认识包括了理性和悟性的东西，理性有不同发展程度，有片面和全面之分。悟性是片面的理性认识，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在理性认识中克服了片面性，由感性到理性之初，往往有些片面性，正确的认识是经过反复实践，克服了片面性，掌握客观辩证法。毛主席经常强调克服片面性，克服悟性的缺点。

最后，我们说，通过这次座谈，对船山先生的意见比较了解了。船山不赞成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问题是如何克服它们，更好地战胜唯心主义。作为专业研究人员来看，我们大家都拥护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在发展，不是到了顶点。毛泽东思想也在不断发展。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我们还要在经典著作方面进行研究。我们希望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共同研究，反对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可能彼此有缺点，但经过研究之后可以改正，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第 30 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讲学提纲)

(1965 春、秋)

【这份“讲学提纲”，原是 1965 年春，为了准备出国讲学而写的，又于是年秋，作了最后修改。后因故没有出国，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是作为学习材料，在中央党校内部印发学工人员参考。1977 年 9 月，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同志曾提供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四十周年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发给到会同志参考。这份“讲学提纲”，共有四个题目，除本题外，还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除最后一题和当前精神不符未收入外，其他三题独立成篇，作过一些整理。本篇原无小标题，是整理时加的。原有“提纲初稿”字样，改为“讲学提纲”。】

(一九六五年春、秋)

世界上自从产生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历了列宁所说的两个五十年，并进入了我们当代的新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些特定的重大历史实践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理论、策略、组织等方面正确地解决了各个时期的这些问题，并且和当时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得以胜利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任务，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三个五十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个五十年(19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批判地继

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积极成果，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十年左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逐步战胜了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等所代表的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机会主义派别，使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工人运动中被公认的指导思想，为下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完成了理论、策略和组织等方面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五十年(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实现胜利的时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打碎帝国主义锁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首先是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实现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随后又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粉碎了德意日的法西斯的进攻，推动一系列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是这个时期世界人民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个时期人类历史的这些伟大发展，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分不开。首先是列宁，他应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和解决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新的革命实践问题，特别是在理论上和策略上解决了如何在帝国主义时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何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举列宁的旗帜，并且继续发展列宁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经过了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并使之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在不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已被公认为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时机会主义已不再采取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对立、自成一派的形式出现，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下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修正主义。

这个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间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和德国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俄国的孟什维克的论战，通

过这次论战，列宁揭露了和粉碎了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背叛阴谋，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大论战是在列宁去世后，以坚持列宁路线的斯大林为一方，以布哈林、托洛茨基为另一方的论战。这次论战首先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它的党内展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胜利，保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保证了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这次论战也发展成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各国共产党在这次论战中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在本国党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后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就是这次大论战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保证中国到后来终于取得了全国的革命胜利。

本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了我们的当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及其他各国革命人民对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时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东风日益压倒西风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日益压倒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力量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胜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灭亡的时代。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因为它面临着这些新的重大革命历史实践问题。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前阶段的任务和特征。

机会主义也在当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曾经是以列宁的思想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于 1948 年就露头了，但它的最大代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利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党的威信，从 1956 年开始把一整套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由此挑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又一次新的大论战。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是要取消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各国反动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取消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的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它偷偷地改变成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和资产阶级政党，以便于帮助资本主义的复辟。总之，现代修正主义是要从理论、策略和组织等等方面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为日渐灭亡的帝国主义效劳，为病入膏肓的各国反动派输血。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每一步胜利都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新的发展。代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的伟大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

2.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阶段的特点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相应地由一个阶段推进到更新的阶段。

从思想的形式方面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是由于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在进步时期所做出的哲学的成果，即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是由于不断地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斗争的结果。但从事情的内容和实质来看，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哲学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先进力量的兴起，为着正确理解这个新的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批判了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把唯物主义扩大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上来。当时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进化论、能量转化法则、生物蛋白体的发现—开始突破了18世纪以前自然科学界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坚固的自然科学的根据。

在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五十年间，他们先后又批判了蒲鲁东、拉萨尔的浅薄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批判了杜林的图式主义(也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末流)，还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曾经流行一时，而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界的时髦。这种情形，也在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者中表现出来。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战斗的哲学著作中，

就要比较着重从辩证法方面来发展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且不止一次地强调了黑格尔哲学在辩证法方面的贡献。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5页）。这些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个五十年间的一个主要特点。

列宁在和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也批判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队伍中的反映。列宁说：“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3页）这就是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列宁当时的情况。

这时的资产阶级哲学界，和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当年有所不同：唯物主义完全被抛弃了，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变成了主流。这些哲学流派给自己粉饰了各种“科学”的招牌，如“实证论”、“新实证论”、“新实在论”之类，但究其实质来说，只是18世纪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再版。在恩格斯的晚年，资产阶级哲学界的这个反动倾向已开始显露出来。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里曾对这种从唯物论倒退的倾向提出过严肃的批评。特别是在20世纪初，由于镭、X射线和电子的发现，自然科学界根深蒂固的旧形而上学物质观宣告破产了，当时自然科学家曾认为这是“物理学的危机”；科学界的思想出现了混乱状态。这就给各种各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提供了便利的气候，使它们在资产阶级教授中间大大地泛滥起来。修正主义者哲学方面，就是完全跟在这些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跑的。

列宁在哲学上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不能不着重针对这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发展到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由于这一年的革命遭到失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动摇，他们不但不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正确地消化革命的经验，反而开始背叛这个世界观，反而和资产阶级教授站到一起来批评、“修正”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他们标榜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这些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以及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彻底的反击。

这些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主要是在于想毁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这一次列宁在哲学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得用主要的力量从唯物主义方面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自始至终，从哲学的各种角度上、也从自然科学新发现方面反复不断地阐明了唯物主义的一些最根本的原理，即物质是根源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等等。列宁的这部著作，主要地就是坚持了和发挥了这些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与此相反，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特别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列宁当时在哲学上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要贡献和主要特点。

应该指出，说列宁在当时用主要力量从唯物主义方面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决不是说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即辩证法方面就完全没有注意。

修正主义者不但企图毁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而且攻击了它的革命的辩证法，想用调和矛盾的庸俗进化论来代替它。修正主义者的政治言论充满了折中主义和诡辩论。一方面，为着彻底驳斥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谬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着正确理解物理学的新发现，给习惯于形而上学物质观的自然科学界遭受到的“危机”指出一条解脱困境的道路，都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是，列宁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由于战斗的任务要求集中主要力量歼灭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就没有特别加以阐明。只是在几年之后，才在他的《哲学笔记》里着重研究了这一问题。

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包括两个问题，即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和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问题。列宁在1914年到1916年写的《哲学笔记》里，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新的贡献。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主要地就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哲学笔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公式：“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2页）。在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问题上，列宁指出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的核心，“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实质，并且强调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列宁的这些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新发展的重要标志。

列宁在哲学上的这些贡献，受到了修正主义者抹煞和攻击，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起来和他们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第二次大论战中，还包含着哲学方面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就是当时在苏联出现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这个学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外衣下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否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宣扬“对立物的和解”，即矛盾调和论的观点。斯大林领导了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并正确地指出了这个学派的错误实质，把它叫做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

对德波林学派的揭露和批判，促使苏联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大大地注意到对列宁的哲学遗产的研究，注意到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如何正确地阐明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列宁对于辩证法方面的新贡献，在这次新的大论战的条件下，有必要进一步地加以研究和发展。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次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修正，和 1905 年后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修正有所不同，他们不是直接从唯物主义方面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公开地站在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立场上来攻击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是主要地从辩证法方面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通过歪曲和反对辩证法的途径走上唯心主义的路线。德波林学派的唯心主义就是采取了这种迂回的、隐蔽的形式。它的特点，主要就在于取消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破坏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歪曲成掩盖阶级矛盾、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烦琐的空论。尽管它在口头上也承认物质的根源性和反映论的原理，但实际上却走的是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道路。要彻底揭露德波林学派的唯心主义，需要更着重坚持和发挥列宁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宝贵思想。这就是说，在新的论战的条件下，又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哲学上特别强调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特别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而是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任务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第二次大论战在中国的展开，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又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对党内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多次地提出尖锐的批判。党内的这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者，并不是在学术理论的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派别，并不是在口头上言论上公开反对物质的根源性和认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些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他们之所以成为主观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仅就哲学世界观方面来说，主要是由于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没有能力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不会应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的阶级矛盾。这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曾成为特别严重的思想障碍，它使党员和干部不能清醒地认识周围事物的实际情况，不能正确地掌握革命的路线政策，从而导致革命多次的失败和挫折。艰苦、曲折、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要求我们的党认真地、彻底地克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错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路线详细地指明出来，让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会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列宁的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来对中国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加以全面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这个历史要求。这两篇著作，是第二次大论战、特别是哲学方面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在中国取得的伟大成果。它从哲学上概括了十几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实践和认识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贡献。它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法规律，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辩证规律；它按照列宁的遗志，把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从各方面系统地加以解释和发挥。这两篇著作作为彻底粉碎革命斗争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错误奠定了颠扑不破的理论基础，为以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照亮了思想上的前进道路。

3.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

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进行的大论战中，也包含着哲学世界观方面的论战。和在政治上一样，在哲学上，现代修正主义者基本上是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用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来篡改唯物主义，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不过，在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有新的巨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很多新发现，特别是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又进一步揭示了物质结构的极其复杂的内容，对于辩证法的世界观又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包括哲学世界观方面的斗争，不论从它的实践内容或理论内容来说，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斗争将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特别是列宁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个时期还只是开始不久，它将要取得多么宏伟的成果，还难于作全面的估计，只能就当前已经知道的情况说明它的某些特点。

如果说列宁生前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主要是跟着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屁股后面跑，那么，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者们则主要地是在实际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中破坏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他们热衷于拾取资产阶级政客的智慧，把美国资本家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奉为自己的思想的指南。他们强调眼前的物质利益，抹煞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大量使用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两面三刀等等的作伪手法来玩弄诡辩术。他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又妄图掩盖和抹煞当前世界上存在着的对抗性矛盾，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他们到处散布这些谬论，幻想以此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阻止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帮助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阻止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便帮助帝国主义维持它的摇摇欲坠的世界统治。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这些背叛和歪曲，要求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批判，通过这个揭露和批判，把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新的实

实践经验 and 认识经验总结起来，把现代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发现、新成果概括起来，进一步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由于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并且，有些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又跟到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攻击，反对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概括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因此，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还需要就对立统一学说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加以新的阐明，也就是要进一步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次大论战中都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在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有些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开始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概括现代新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具有着划时代的决定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

正当赫鲁晓夫集团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抛出他们的一套现代修正主义纲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来和现代修正主义相对抗。这些报告又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除个别地区外)开始建立起来的条件下作成的。它总结了中国全国解放后七八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综合了世界上自有无产阶级专政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它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充满着矛盾的社会，十大关系就是十类矛盾。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复辟的企图，仍然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贯彻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学说，贯彻和发展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抹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同志

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论上提供了戳穿现代修正主义骗术的锐利无比的新武器。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列宁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发展，他概括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也概括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新发现，提出“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当前需要对这个辩证法观点作广泛的宣传，要使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把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规定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项迫切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了这个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敌友关系问题，观察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各方面的实际工作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要想胜利地实现这样的过程，首先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广大干部能够正确地认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规律。问题是在于怎样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以往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如果不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尽管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大讲辩证唯物主义，而在实际工作和行动中仍然可能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仍然不可能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做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大量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从哲学上加以总结，进一步具体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正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最根本的原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原理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肯定和发展，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干部要获得正确认识，首先必须亲自参加三大革命的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也如在自然科学的问题上一样，每一个正确认识的完成，往往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这些认识论的原理，坚持应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即“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我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面临的一切问题，这是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避

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保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到底的保证。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过去哲学家们的思想根本不同。以往的哲学家们总是妄想建立一个“说明世界”的最后完成的体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则是要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随着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历史斗争任务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作用，是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行动才能实现的。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历史，始终证明了这个真理。当代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任务，比以前的阶段更为宏伟。这要求在比以前更深、更广的程度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来武装群众。毛泽东同志号召哲学从书斋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这在当代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群众中散布各种谎言，使用各种骗术，妄图阻碍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无产阶级要胜利实现自己在当代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交到广大群众的手里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交到广大群众的手里去！

第 31 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讲学提纲)

(1965 春、秋)

【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讲学提纲)》题注。我们整理时删去了两段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例子。】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一九六五年春、秋)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中，经常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就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看，这个斗争，又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直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下来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在认识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把革命引向胜利。所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要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实际行动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原理做了系统的阐明。现在我们准备就这个认识论的主要原理做一些解释。

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

我们在哲学上研究认识论，目的是在于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问题，唯物主义者的回答和唯心主义者根本不同。一切唯物主义都肯定，人的主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反映；正确的思想，就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唯心主义者的答复和这相反。唯心主义者不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不承认正确的认识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他们把人的认识看做是人的精神内部(或者是个人的精神内部，或者是哲学家臆想的什么“宇宙精神”内部)自生出来的东西。他们心目中的人的正确思想，不外只有两个来源：或者是从天上(即从所谓“宇宙精神”或上帝那里)掉下

来的，或者是个人的头脑里生来固有的。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就往往可以碰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把国外的某些地方看成是自己的“天堂”，专门等待那里的“上帝”降下来某种“天书”，把它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来简单地照抄，而自己对周围的事情则根本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以为这样就找到了指导工作的正确思想。这种人就是把正确的思想看做天上掉下来的。有些人带着主观上的“想当然”来从事工作，以为只要根据周围事情的一些表面印象，凭自己的头脑随便想一想，就可以找到正确思想。这种人就是把正确的思想看做自己头脑里生就的。这两种人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爱好者，是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拥护者。唯物主义者认识上坚决反对这些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引向这条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上去。不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就会使我们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战争迟早遭受挫折和失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跟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共同点，又有根本的区别。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都反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都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根源性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而正确思想则是客观事物规律性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仅仅承认这一点，最多只能回答认识论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正确思想的问题，而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弱点，正是在于他们都不能解决人们怎样才能掌握到正确思想的问题，不知道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怎样才能反映到我们头脑里来。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唯物主义都不了解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础，不知道人们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实际斗争，才能一步一步地对客观事物获得正确的全面的认识。这些唯物主义都不能理解人类的能动的革命的活动在认识论上的重大意义，他们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旁观者，以为人的头脑似乎就像一面静止不动的镜子一样，不必通过实践活动就可以深入反映客观事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叫做直观的反映论。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则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它的基本特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就在于肯定“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列宁：《哲学笔记》)，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离开了实践观点来讲反映论，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就再三地强调人的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这个真理，他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是在于，他不仅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并且又对实践概念的内容做了进一步具体的分析和阐明：他指出人类认识所依赖的实践，主要地就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由此做出结论，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和论断，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来概括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量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结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认识路线之间的长期历史斗争的总结。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曾经出现过的主观主义者的领导错误，是一个彻底打中要害的揭露和批判。因为所有主观主义者的领导错误，不论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的认识路线的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轻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就是使自己的认识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领导者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认真向他们学习，必须学会善于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才有可能在革命工作和革命战争中避免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个原则，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对于文艺工作者和其他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也是同样适用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我们建设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这个实践观点，当做我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指针，号召广大干部普遍地积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实践经验证明，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条原则，是使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免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是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稳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确实保证。

2.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

人们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那么，在实践中人们的认识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认识发展的过程和这个过程的规律性。其中最基本的规律是：任何正确思想的形成，在认识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过两个飞跃阶段，即从实践到认识或由物质到精神、存在到思维的飞跃，然后又由认识到实践或精神到物质、思维到存在的飞跃。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首先是要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即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官能，直接从外界的客观事物获得许多感觉，在脑子里生起许多印象，并形成这些印象间的各种外部联系。这些就叫做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它只能使我们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而不能帮助我们抓着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例如，在我们最初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革命处在困难时期的时候，我们的感性认识给我们的印象，通常只能看到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而不可能直接把握到敌人必然灭亡、革命力量必然要得到胜利这个事情的本质和规律性(即事物的内部联系)。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要能深刻地了解到敌人虽然表面强大而实际却很虚弱，就必须使我们的感性认识飞跃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由实践到认识的飞跃，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实际上也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人的感性认识怎样才能飞跃到理性认识？这需要通过两个步骤：第一，要积累十分丰富的感觉材料；第二，要对这些感性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是在事物的现象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要揭示这个本质和规律性，需要掌握大量的感觉材料。片面的感觉经验只能为我们提供事物的某些表面现象的知识，甚至于只能提供和本质不一致的假象；只根据零碎不全的材料，就不可能保证对事物做出正确的论断，甚至只能做出错误的论断。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诡辩，常常就是利用和夸大一些片面的现象和假象，来作为自己的荒谬臆说的根据。为了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错误，革命的领导者必须亲身参加群众的实践斗争，认真作调查研究，认真向群众学习，努力去集中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十分丰富的(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觉材料，才能避免单凭个人的或少数人的狭隘的感觉经验，来对问题做出片面的、错误的论断。

有了十分丰富的和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并不就等于已经飞跃到理性认识，正像工厂生产有了原料并不等于已经有了产品一样。要实现这个飞跃，就要像工厂生产一样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制造，使之发生一个由量到质的变化。我们头脑的思考能力，就是对感性认识的加工厂。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所说的“改造制作工夫”，就是说的要采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将感觉材料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方面加以分析和综合。这就是首先要重要的(精的)材料和不重要的(粗的)材料一分为二，把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材料和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虚假的材料(即假象)一分为二，然后着重根据重要的和真实的材料，来研究事物的矛盾的各方面(即此一面和彼一面、表面和里面)之间的关系。例如，就社会生活来说，就要研究这一个阶级和那一个阶级的关系，各种政治思想的表现和它们的经济实质之间的关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革命斗争中的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的关系，反动势力的强大的外表和它的虚弱的实质的关系等等。只有应用这个“一分为二”的方法，把大量的感觉材料概括起来，在思想上进行这样的改造制作工夫，由此造出比较正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才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实践到认识、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由存在到思想飞跃的阶段。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要求我们在实现了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之后，还要反过来把我们所获得的理性认识再变为实践，也就是把精神再变为物质，把思维再变为存在。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把前一阶段所获得的认识放到实践中去，看这些认识(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

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同志强调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比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意义更加伟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指出：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的问题，乃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就是说，要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是真理，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在实践中始终不能获得成功，始终不能按照预期的想法把精神变成物质、思维变成存在，那就证明指导他行动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一个人尽管会背诵经典著作，熟悉某些科学原理原则，如果他不能把这些原理原则运用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取得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胜利，那就不能说，他已经真正掌握了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和正确的科学原理原则。只有经过群众实践能变为物质的思想，或者是经过某些暂时的失败终于获得成功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才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帝国主义的这个逻辑，就在实践中证明了它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人民的这个逻辑，就是在实践中证明革命的人民能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真理。

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的意义之所以伟大，还在于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是仅只为了说明世界而认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识世界，只是为了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人类的历史是由必然王国不断地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所谓自由的王国，就是能够按照预期的计划和目的，胜利地实现改造世界的活动的意思。“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哲学上的名言。这句名言反映了辩证法的客观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把这句话作如此理解：似乎仅仅只要认识了必然，就等于已经得到了自由，那就是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必然，是在认识

上准备了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条件，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这个飞跃。要实现这个飞跃，还必须把已获得的必然的认识，变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只有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实践活动，只有按照预期的想法把精神变为物质、思维变为存在，才能算是真正实现了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有了正确的思想，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再好的思想也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必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必然转化为自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由认识到实践、精神到物质、思维到存在的飞跃，具有着比以前任何历史时代更为伟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和以前的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地产生出来，而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自觉地建设起来。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还必须不断地和剥削阶级的抵抗进行斗争，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如果不去经常努力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不去经常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不可能防止资本主义自发的反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现在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反过来，也可以说，广大工农群众在思想上有了社会主义，就会在客观上、物质上得到社会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思想第一”、“政治挂帅”的原则。反对“思想第一”、“政治挂帅”的原则，叫嚷什么“物质刺激”的“原则”，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论观点。我们要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这个反动观点，从而也就要强调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这个飞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特别伟大的意义。

这里，主要的关键是在于：要把认识变为实践、精神变为物质、思维变为存在，首先需要使正确的思想变成广大群众的思想，也就是要使之成为群众手中所掌握的精神武器。毛泽东同志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就会化为革命斗争的行动。革命的领导者不但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把实践经验变为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指导思想再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使之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集中了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大量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

策，再把它交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手里，发动他们坚持下去，这样就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以后几年中间克服了许多困难，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这些都表现出认识变实践、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这个飞跃的极其伟大的意义。

3.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研究了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来研究认识发展的总的规律性，认识了这个总的规律，就有可能在工作中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形而上学唯物论者以为，人们可以不必通过实践，只要偶然找到某种巧妙的方法，一下子就能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的，因而是错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再由精神到物质、由思维到存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是一条认识规律。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全部科学的发展史，各个历史时代的革命斗争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都证明这条认识规律的正确性。

不了解上述认识的辩证规律的人，虽然在正确路线、政策指导下面进行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一旦遇到缺点和困难时，就不知道从这些缺点和困难中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来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我们对于这个正确路线政策的认识，而是相反地，把这种暂时的局部的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误认为是我们的全部认识的根本错误，因而对本来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也发生怀疑。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以片面代替全面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观点。几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克服困难和缺点的经验，对于那些有着形而上学观点的人，给予了很好的教育。这些经验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认识规律，即在一个问题的认识上，要获得正确的思想，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一步步得到完全实现。

关于认识发展的规律，列宁曾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有过简单的论述，他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列宁这个初步提示出来的基本思想，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著作中关于两个飞跃的理论里得到进一步的全面的

系统的发展，并且提出了一条关于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条总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实践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概括了人类历史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所获得的十分丰富的认识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实践和认识经验。我国革命经历了非常曲折、复杂、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经验包括着互相矛盾的内容：一方面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正面经验；这就是按照上述认识的总规律，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反复集中人民群众斗争中所取得新的经验来补充、改正和发展原有的指导思想，使我们指导革命的理论、政策、方针、计划等等不断地一级比一级更高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走过的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反面经验；这就是不顾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只凭着“天上”降下来的或自己头脑中随意想出来的意见来向革命发号施令。我国革命的实践（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始终证明了，在革命指导思想遵循了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时候，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得到胜利和发展；当革命指导思想陷进了主观主义认识路线去的时候，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就遭到挫折和失败。把这些大量的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就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坚决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规律，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认识路线，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使我们的认识向前发展，就必须坚决跟违背这条认识发展总规律的主观主义认识路线作斗争。

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脱离和轻视革命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生搬硬套地搬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国外的经验，或者简单地跟着国外某些人鹦鹉学舌，这是教条主义的形式；另一种是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把狭隘的经验当做普遍的真理，“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实践论》），这是经验主义的形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中国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认识路线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并且成为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当时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进行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尖锐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革命斗争

中不但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丰富经验，也掌握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丰富经验。

要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遵循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来观察和解决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这里还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密切联系。要正确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就必须同时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过程，也就是领导思想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在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又从精神到物质、由思维到存在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掌握客观真理，一级比一级更高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让我们学会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社会帝国

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向着有史以来空前广阔的自由王国飞跃前进吧！

第 32 章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讲学提纲)

(1965 春、秋)

【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讲学提纲)》题注，整理时删去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一段。】

(一九六五年春、秋)

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指出了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矛盾规律，或对立统一规律。列宁说：“一分为二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参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07 页，“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也可以译作“一分为二”。)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40 页)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应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国革命战争的复杂经验，肯定了列宁的这个宝贵思想，并且按照列宁的遗志，把辩证法的这个最根本的规律从各方面作了系统的解释和发挥。他告诉我们，只要把矛盾规律的各方面问题弄清楚，也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为什么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是因为，辩证法的宇宙观告诉我们，事物的内部矛盾，乃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这里所说的“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就是指由事物自己内部矛盾所引起的运动。他说：“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

既然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就必须首先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暴露事物内部的矛盾，研究这些矛盾如何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我们研究辩证法，主要地也就是要学会观察和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

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斗争中,学会善于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学会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学习辩证法的主要目的。

和辩证法宇宙观相反的,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自己运动,不承认事物内部存在着推动自己发展变化的动力,不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因此,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否认矛盾,掩盖矛盾的方法;就是用片面夸大来代替事物内部矛盾的全面分析;就是反对“一分为二”的观点;就是在思想上抹煞了事物内部自己发展的动力,把事物本身都看成是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错误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就属于形而上学的性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三和”、“两全”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线)的世界观基础,也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矛盾调和论。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法则或对立统一法则是宇宙万物的最普遍的规律,辩证法的宇宙观,首先要肯定这个真理。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指出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批判了形而上学否认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这个根本错误之后,接着就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第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说,世界上充满着矛盾,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包含着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事物。自然界的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一切事物是遵循着矛盾规律而变化发展,不可能找到任何例外。

既然肯定了矛盾规律在一切事物中的普遍性,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观察任何问题的時候,自始至终都必须坚持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有所动摇,不应该把任何问题看做例外,否则,就不能避免认识的错误。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常常是通过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德波林学派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他们硬说一事物在开始的时候只包含着差异,而没

有矛盾；在一事物发展终结的时候，矛盾就被调和，而不是经过斗争来解决矛盾。有些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家散布矛盾将要被“融合”、“结合”，以至于矛盾“将要化为乌有”的谬论，这就是通过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来反对唯物辩证法，来为那些投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治变节行为制造理论的口实。

在一些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中间，也往往因为不能坚持分析矛盾的辩证方法，而在认识上发生各种错误。例如，对周围形势的观察，往往不能“一分为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悲观失望，把事情看得一片黑暗，不会从困难形势中看出克服困难的条件；在工作发展顺利的时候，又盲目乐观，既不注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善于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新的困难。有些人在估计自己工作的时候，只愿意谈成绩，不愿意看缺点，因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或者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丧失前进的积极性。这些错误思想，都是以片面代替全面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表现。不坚决克服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就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障碍。只有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观察形势，正确地对待顺利和困难、成绩和缺点、胜利和失败等等的关系问题，从而使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善于及时发现缺点、克服困难，善于利用和创造顺利条件，把我们的事业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不断地推向前进。

在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辩证法还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力量来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事物内部都普遍地存在着矛盾，但每一事物的矛盾都各有其自己的、与其他事物矛盾互不相同的特点，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但在它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这个矛盾运动又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表现。因此，要学会善于坚持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来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每一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点以及它们的各个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研究。

矛盾的特殊性之所以需要特别加以重视，是因为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地解决；而只有认识了每一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特殊的方法。因此，在研究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的时候，都不应该预先设想一个既成的固定公式，主观随意地硬套到这个事物上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科学的矛盾分析方法的范例：中国革命包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期。在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阶级矛盾都分别做出精确的具体分析，把握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根据它们不同的特点指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矛盾的具体斗争方法。像中国这样空前曲折而复杂的革命斗争，能够取得迅速发展和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克服了任何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掌握和运用了具体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科学的辩证方法。

凡是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观察问题的时候符合于这个“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

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事物矛盾不能够具体地分析它的特殊性，那也就不能够真正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真正贯彻辩证法的方法。如果我们用一个预先设想的公式，去解释各种不同事物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与事物本身的矛盾特点毫无关系的主观主义的(公式主义的)臆想，从而也就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有的人由于用这种公式主义的方法处理事物的矛盾碰了钉子，他们不去检查这个公式主义方法的错误，却反而对辩证法的正确性在思想上发生动摇。所以，要坚决贯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才能在一事物和一切事物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正确地掌握辩证法。

怎样来对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要把握事物矛盾的总体的特殊性，就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首先把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着的各个对立方面的特点，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综合起来，就能把握这些对立面的相互联结的特点，就能把握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矛盾论》)

要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决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一个方面同其他方面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而是相反地，要把他们放在与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

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矛盾论》）

总之，我们应用辩证法去观察问题，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具体矛盾，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在矛盾总体中的具体地位以及它们具体的相互关系，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就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认识事物固有的相互关系和内部规律性。主观主义的错误根源之一，就在于丢掉了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灵魂，就在于把事情的片面误认为全面，把表面的现象错看成事情的本质，因而就使主观脱离客观，走上唯心主义的路线。

2.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的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关系中，首先应该研究的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问题。例如，在我们研究同时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的时候，要想暴露这个复杂的事物的矛盾总体的特殊性，就必须着重研究这些矛盾中哪一种矛盾居于主要地位。不同的矛盾之间也表现为相互矛盾的关系。在这个相互矛盾的关系中，必有一种矛盾居于主要地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有把握到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够把握这个复杂事物的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才能够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到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领土大举进攻，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复杂矛盾中，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当时中国共产党把握了这个主要矛盾，根据这个主要矛盾的特点，正确地规定了这个时期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中国人民来进行斗争，解决这个革命时期的各种复杂矛盾，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不但在复杂事物的各种矛盾之间有主要和次要的关系，在同一种矛盾中间，相互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也有着主要和次要的区别；其中主要的矛盾方面，就是在矛盾总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要了解每一种矛盾的总体特殊性，要了解

包含这种矛盾的事物的特殊性质，并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特殊方法，就必须要在它的两个对立的方面中，去找到主要的矛盾方面。

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和中国人民的阶级矛盾中间，三大敌人居于统治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也规定了必须采用民族民主革命的方法，主要地是采用革命战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全国解放后，统治权转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手里，他们成为社会阶级矛盾的支配的主要方面，这就使中国社会根本改变了性质，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有着又统一又斗争的关系，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不外就是要研究事物内部的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就是指对立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性质。矛盾的斗争性，就是指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关系。暴露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暴露这一事物内部的对立面是如何成为同一的，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的；在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全部过程中，又是怎样自始至终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

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说，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内部推动自己本身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但在研究事物运动变化这个根本原因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列宁所指出的一个原则，即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从这两个阶级的产生一直到阶级的消灭，自始至终任何时候都不会停顿的，因而是绝对的，而这两个阶级的同一性则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是相对的。例如，这两个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统一战线这个同一性，只是在这个革命的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存在。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自始至终两个阶级之间都不断地进行着斗争。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条件变了，这个同一性也就不存在了；但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面，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着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不同了。这个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长

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的一面之外，还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就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统一战线。和平改造决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而是相反地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要在最后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对立的同一性的特点。

不能离开斗争性来看同一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论》）实际上，对立面的同一性应该看做是对立面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必须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实现。不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新老殖民主义者激烈的革命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转化为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这不是很清楚吗？

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也只能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才能保持得住。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对立面是互相排斥的，要使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没有一定的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相互依存中，对立面的双方总有一方居于主要的支配地位，这个主要的支配的地位正是斗争的结果。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领导的地位，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如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反动性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坚持革命的路线政策，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因而也就不会有这个统一战线。这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斗争是绝对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都要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矛盾是普遍的，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原理突出地表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共产党人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辩证法指出了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这决不是意味着一切矛盾的解决都要经过对抗的斗争。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

式。当我们在工作中考虑解决矛盾斗争的方法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区别对抗和非对抗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

毛泽东同志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矛盾论》）对非对抗的矛盾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或者对对抗的矛盾采取非对抗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采取错误的斗争方法来处理工作和问题，必然要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括和批判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历史教训。

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相互转化的情形，并且要学会善于随着这个转化而改变斗争的形式，才能避免在工作中产生重大错误，使工作少受损失。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大量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真理。